

马列著作选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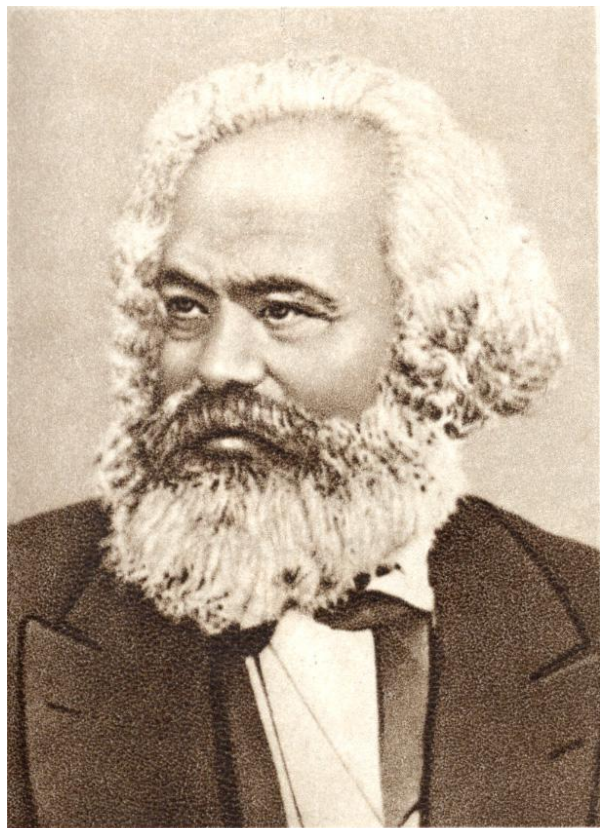
战 士 读 本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列著作选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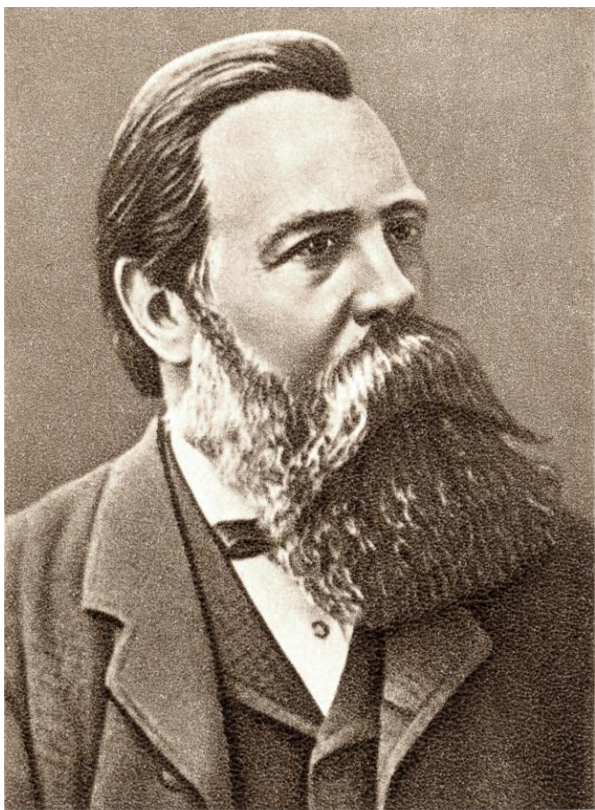
战 士 读 本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Karl Marx

www.mzdb1.cn



F. Engels

www.mzdb1.cn



В.И. Ленин (Ленин)

www.mzdb1.cn



M. G. Amun.

www.mzdb1.cn

學智高別主義

毛澤東

出 版 说 明

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的教导，为了适应我军广大战士和基层干部学习马列著作的迫切需要，我们选编了这本《马列著作选读》（战士读本）。根据总政治部的指示，本书发给全军战士、在编职工和营以下干部每人一本。退伍或复员、转业时可以带走。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

为满足初学马列著作的青年同志的需求，现把1977年版的《马列著作选读》（战士读本）制成电子版，供初学者学习入门。

原书为六十四开版印刷。为方便阅读，本电子书制作改为三十二开本排版。

毛泽东博览网站

2023 年 7 月

www.mzdbl.cn

目 录

马克思和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节录）	1
1872 年德文版序言	1
1883 年德文版序言	4
共产党宣言	6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	6
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21
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32
1. 反动的社会主义	32
(甲) 封建的社会主义	32
(乙) 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34
(丙) 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36
2. 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39
3.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41
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44
马克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51
马克思 哥达纲领批判	61
恩格斯写的序言	61
给威·白拉克的信	63
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	66
一	66
二	79

	三	81
	四	82
附 录		90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1869年在埃森纳赫通过）	90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1875年在哥达通过）	92
恩格斯	论权威	102
恩格斯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107
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	124
恩格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141
	一	141
	二	155
	三	164
恩格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	194
恩格斯	致左尔格的信	198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202
	1888年单行本序言	202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205
	一	205
	二	215
	三	226
	四	235
列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266
列宁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278
列宁	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	291
列宁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	306
	一	306

	二	307
	三	308
列宁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310
	一	311
	二	312
	三	314
列宁	卡尔·马克思(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摘录)	317
	序言	317
	马克思的学说	322
	哲学唯物主义	323
	辩证法	326
	唯物主义历史观	328
	阶级斗争	330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333
	价值	333
	剩余价值	335
	资本积累	337
	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338
	平均利润率	339
	地租论	341
	农业资本主义进化	343
	社会主义	346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	349
列宁	谈谈辩证法问题	361
列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通俗的论述(节录)	368

序 言	368
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	370
(一)	370
(二)	370
(三)	372
(四)	373
(五)	374
七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	376
八 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	387
九 对帝国主义的批评	398
十 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413
列宁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	424
一	424
二	428
三	431
列宁 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 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节录)	443
初版序言	443
第二版序言	445
第一章 阶级社会和国家	445
1.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445
2. 特殊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	448
3. 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452
4. 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	455
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 1848-1851 年的经验	462
1. 革命的前夜	462

2. 革命的总结	467
3. 1852 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	473
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 1871 年巴黎公社的经验	
马克思的分析	476
1. 公社社员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476
2. 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481
3. 取消议会制	485
4. 组织起民族的统一	491
5. 消灭寄生物——国家	495
第四章 续前 恩格斯的补充说明	497
1. “住宅问题”	497
2. 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500
3. 给贝贝尔的信	505
4. 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	508
5. 1891 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 所写的导言	515
6. 恩格斯论民主的消除	521
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524
1. 马克思如何提出问题	525
2.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527
3.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533
4.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537
初版跋	545
列宁 怎样组织竞赛?	558
列宁 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揭幕典礼上的 讲话 (1918 年 11 月 7 日)	569

列宁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节录）	571
	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	571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580
列宁	伟大的创举（论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 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590
列宁	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	618
列宁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	622
	1	622
	2	623
	3	625
	4	626
	5	630
列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节录）	633
	二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633
	五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 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636
	八 不做任何妥协吗？	644
列宁	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在俄国共产主义 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演说）	664
斯大林	悼列宁（1924年1月26日在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 表大会上的演说）	684

马克思和恩格斯

共产党宣言¹（节录）

1872年德文版序言²

共产主义者同盟³这个在当时条件下自然只能是秘密团体的国际工人组织，1847年11月在伦敦代表大会上委托我们两人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结果就产生了这个《宣言》，《宣言》原稿在二月革命⁴前几星期寄到伦敦付印。《宣言》最初用德文出版，后来又用德文在德国、英国和美国至少翻印过十二次。第一个英译本是由海伦·麦克法林女士翻译的，于1850年在伦敦《红色共和党人》⁵杂志上发表，后来在1871年至少又有三种不同的英译本在美国出版。法译本于1848年六月起义⁶前不久第一次在巴黎印行，最近又在纽约《社会主义者报》⁷上刊载；现在又有人在准备新译本。波兰文译本在德文本初版问世后不久就在伦敦出现。俄译本是在六十年代在日内瓦出版的。丹麦文译本也是在原书问世后不久就出版了。

不管最近二十五年来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

《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个别地方本来可以作某些修改。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殊的意义。现在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应该有不同的写法了。由于最近二十五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见《法兰西内战。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宣言》德文版第19页^①，那里把这个思想发挥得更加完备。）其次，很明显，对于社会主义文献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是不完全的，因为这一批判只包括到1847年为止；同样也很明显，关于共产党人对待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问题所提出的意见（第四章）虽然大体上至今还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政治形势已经完全改变，而当时所列举的那些党派大部分已被历史的发展进程彻底扫除，所以这些意见在实践方面毕竟是过时了。

但是《宣言》是一个历史文件，我们已没有权利来加以修改。下次再版时也许能加上一篇包括从1847年到现在这段时期的导言。这次再版太仓卒了，以致我们竟来不及做这件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2页——编者注

工作。

卡尔·马克思 费里德里希·恩格斯

1872年6月24日于伦敦

载于1872年在莱比锡出版的
《共产党宣言。附有作者序言
的新版》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8卷第104—105页

1883 年德文版序言⁸

本版序言，不幸只能由我一个人署名了。马克思——这位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应受到欧美整个工人阶级感谢的人物——已经长眠于海格特公墓，他的墓上已经初次长出了青草。在他逝世以后，就更谈不上对《宣言》作什么修改或补充了。因此，我认为更有必要在这里再一次明确地申述下面这一点。

《宣言》中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这个基本思想完全是属于马克思一个人的。^①

① 我在英译本序言中说过：“这一思想在我看来应该对历史学做出象达尔文学说对生物学那样的贡献，我们两人早在 1845 年前的几年中就已经逐渐接近了这个思想。至于当时我个人独自在这方面达到了什么样的进展，从我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可以看出。但是到 1845 年春我在布鲁塞尔重新会见马克思时，他已经把这个思想整理出来，并且用几乎象我在上面的叙述中所用的那样明晰的语句向我说明了。”（恩格斯在 1890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这一点我已经屡次说过，但正是现在必须在《宣言》本身的前面也写明这一点。

弗·恩格斯

1883年6月28日于伦敦

载于1883年在霍廷根—苏黎世
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1卷第3—4页

共产党宣言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⁹、法国的激进党人和德国的警察，都为驱除这个幽灵而结成了神圣同盟¹⁰。

有哪一个反对党不被它的当政的敌人骂为共产党呢？又有哪一个反对党不拿共产主义这个罪名去回敬更进步的反对党人和自己的反动敌人呢？

从这一事实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

共产主义已经被欧洲的一切势力公认为一种势力；

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对抗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

为了这个目的，各国共产党人集会于伦敦，拟定了如下的宣言，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来米文和丹麦文公布于世。

一、资产者和无产者^①

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②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① 资产阶级是指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现代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②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

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第。

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

② 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可记载的历史。在 1847 年，关于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发现了俄国的公社土地公有制，毛勒证明了这种所有制是一切条顿族的历史发展所由起始的社会基础，而且人们逐渐发现，土地公有的村社是从印度起到爱尔兰止各地社会的原始形态。最后，摩尔根发现了氏族的真正的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这一卓绝发现把这种原始共产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揭示出来了。随着这种原始公社的解体，社会开始分裂为各个独特的、终于彼此对抗的阶级。关于这个解体过程，我试图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6 年斯图加特第 2 版）中加以探讨。（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的注。）在 1890 年德文版中删去了这个注的最后一句话。）

③ 行会师傅就是在行会中享有全权的会员，他是行会内部的工匠，而不是行会的首长。（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

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合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的出现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化大工业化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整批整批产业军的统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等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愈是扩展，资产阶级也愈是发展，愈是增加自己的资本，愈是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都排挤到后面去。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①伴随着。它在封建领主统治下是被压迫的等级，在公社^②里是武装的和自治的团体，在一些地方组成独立的城市共和国^③，在另一些地方组成君主国中的纳税的第三等级^④，后来，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它是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甚至是大君主的主要基础；最后，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

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

① “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这个阶级的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编者注

② 法国的新兴城市，甚至在它们从封建领主手里争得地方自治和“第三等级”的政治权利以前，就已经称为“公社”了。一般说来，这里是把英国当做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典型国家，而把法国当做资产阶级政治发展的典型国家。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意大利和法国的市民，从他们的封建领主手中买得或争得最初的自治权以后，就把自己的城市共同体称为“公社”。(恩格斯在 1890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③ 在 1888 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例如在意大利和德国)”。——编者注

④ 在 1888 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例如在法国)”——编者注

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好勇斗狠，是以懒散怠惰作为它的相应的补充的。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移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

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①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

① “过去”在1890年德文版中是“其他”。——编者注

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褻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不管反动派怎样惋惜，资产阶级还是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

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

① 这句话中的“文学”（Literatur）一词是指科学、艺术、哲学等方面的书面著作。——编者注

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产阶级使乡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乡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象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了。

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能够料想到有这样的生产力潜伏在社会劳动里呢？

由此可见，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发展的

一定阶段上，封建社会的生产和交换在其中进行的关系，封建的农业和工业组织，一句话，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①。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打破，而且果然被打破了。

起而代之的是自由竞争以及与自由竞争相适应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和政治统治。

现在，我们眼前又进行着类似的运动。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循环中愈来愈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次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吞噬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活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

① 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没有这句话。——编者注

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①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

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

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现在却对准资产阶级自己了。

但是，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种武器的人——现代的工人，即无产者。

资产阶级即资本愈发展，无产阶级即现代工人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跟着发展；现代的工人只有当他们找到工作的时候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当他们的劳动增殖资本的时候才能找到工作。这些不得不把自己零星出卖的工人，象其他任何货物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所以他们同样地受到竞争方面的一切变化的影响，受到市场方面的一切波动的影响。

由于机器的推广和分工的发展，无产者的劳动已经失去了任何独立的性质，因而也失去了对工人的任何吸引力。工人变成了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要求他做的只是极其简单、极

^① 在 1872、1883 和 1890 年德文版中删去了：“资产阶级文明和”。——编者注

其单调和极容易学会的操作。因此，花在工人身上的费用，几乎只限于维持工人生活和延续工人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但是，商品的价格，从而劳动的价格^①，是同它的生产费用相等的。因此，劳动愈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愈减少。不仅如此，机器愈推广，分工愈细致，劳动量也就愈增加，这或者是由于工作时间的延长，或者是由于在一定时间内所要求的劳动量的增加，机器运转的加速，等等。

现代工业已经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群众就象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他们是产业军的普通士兵，受着各级军士和军官的层层监视。他们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奴隶，并且每日每时都受机器、受监工、首先是受各个厂主资产者本人的奴役。这种专制制度愈是公开地把发财致富宣布为自己的最终^①目的，它就愈是可鄙、可恨和可恶。

手的操作所要求的技巧和气力愈少，换句话说，现代工业愈发达，男工也就愈受到女工的排挤^②。对工人阶级来说，性别和年龄的差别再没有什么社会意义了。他们都只是劳动工具，不过因为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需要不同的费用罢了。

当厂主对工人的剥削告一段落，工人领到了用现钱支付的工资的时候，马上就有资产阶级中的另一部分人——房东、店主、当铺老板等等向他们扑来。

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

① 在 1890 年德文版中去了：“最终”。——编注

② “受到女工的排挤”在 1848 年第一个德文版（2 月出版的二十三页本）中是：“受到女工和童工的排挤”。——编者注

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足以经营大工业，经不起较大资本家的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手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法弄得一钱不值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的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的。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最初是个别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个别资产者作斗争。他们不仅仅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他们攻击生产工具本身^①；他们毁坏寻些来竞争的外国商品，捣毁机器，烧毁工厂，力图恢复已经失去的中世纪工人的地位。

在这个阶段上，工人们还是分散在全国各地并为竞争所分裂的群众。广大工人群众的团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当时资产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必须而且暂还能够把整个无产阶级发动起来。因此，在这个阶段上，无产者不是同自己的敌人作斗争，而是同自己的敌人的敌人作斗争，即同君主专制的残余、地主、非工业资产阶级和小资产者作斗争。因此，整个历史运动都集中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条件下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

但是，随着工业的发展，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它结合成更大的集体，它的力量日益增长，它愈来愈感觉

① 这句话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他们不是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是攻击生产工具本身”。——编者注

到自己的力量。机器使劳动的差别愈来愈小，使工资几乎到处都降到同样低的水平，因而无产阶级的利益和生活状况也愈来愈趋于一致。资产者彼此间日益加剧的竞争以及由此引起的商业危机，使工人的工资愈来愈不稳定；机器的日益迅速的和继续不断的改良，使工人的整个生活地位愈来愈没有保障；个别工人和个别资产者之间的冲突愈来愈具有两个阶级的冲突的性质。工人开始成立反对资产者的同盟^①；他们联合起来保卫自己的工资。他们甚至建立了经常性的团体，以便一旦发生冲突在生活上有所保障。有些地方，斗争转变为起义。

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愈来愈扩大的团结。这种团结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只要有了这种联系，就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而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中世纪的市民靠乡间小道需要几百年才能达到的团结，现代的无产者利用铁路只要几年就可以达到了。

无产者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这件事，不断地由于工人的自相竞争而受到破坏。但是，这种组织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产生，并且一次比一次更强大，更坚固，更有力。它利用资产阶级内部的分裂，迫使他们用法律形式承认工人的个别利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¹²就是一个例

① 在 1888 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工联)”——编者注

子。

一般说来，旧社会内部的冲突在许多方面都促进了无产阶级的发展。资产阶级处于不断的斗争中：最初是反对贵族，后来又反对其利益同工业进步相矛盾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并且经常反对一切外国的资产阶级。在这一切斗争中，资产阶级都不得不向无产阶级呼吁，要求无产阶级援助，这样就把无产阶级卷进了政治运动。于是，资产阶级自己就把自己的教育因素^①即反对自身的武器给予了无产阶级。

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工业的进步把统治阶级中的整个整个的阶层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受到威胁。他们也给无产阶级带来了大量的教育因素^②。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着未来的阶级。所以，正象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

① “教育因素”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政治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因素”。
——编者注

② “大量的教育因素”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启蒙和进步的新因素”。
——编者注

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

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的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被人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

旧社会的生活条件在无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中已经被消灭了。无产者是没有财产的；他们和妻子儿女的关系同资产阶级的家庭关系再没有共同之处了；现代的工业劳动，现代的资本压迫，无论在英国或法国，无论在美国或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年来全都是掩盖资产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偏见。

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无产者只有消灭自己的现存的占有方式，从而消灭全部现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会生产力。无产者没有什么自己的东西必须加以保护，他们必须摧毁至今保护和保障私有财产的一切。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

的^①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转变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我们已经看到，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都是建立在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的对立之上的。但是，为了有可能压迫一个阶级，就必须保证这个阶级至少有能够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的条件。农奴曾经在农奴制度下挣扎到公社社员的位置，小资产者曾经在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下挣扎到资产者的地位。现代的工人却相反，他们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工人变成赤贫者，贫困比人口和财富增长得还要快。由此可以明显地看出，资产阶级再不能做社会的统治阶级了，再不能把自己阶级的生存条件当做支配一切的规律强加于社会了。资产阶级不能统治下去了，因为它甚至不能保证自己的奴隶维持奴隶的生活，因为它不得不让自己的奴隶落到不能养活它反而要它来养活的地步。社会再不能在它统治下生活下去了，就是说，它的存在不再同社会相容了。

①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自觉的”——编者注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①；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

共产党人同一般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

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

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②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

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级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因此，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

① 这句话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编者注

② “特殊的”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宗派的”。——编者注

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①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比其余的无产阶级群众优越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

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在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概表现。消灭先前存在的所有制关系，并不是共产主义所独具的特征。

一切所有制关系都经历了经常历史更替、经常的历史变更。

例如，法国革命废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

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筑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筑在一个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②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

① “最坚决的、始终推动运动前进的”在 1888 英文版中是：“最先进的和最坚决的”。——编者注

② “一个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编者注

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有人责备我们共产党人，说我们要消灭个人挣得的、自己劳动得来的财产，要消灭构成个人的一切自由、活动和独立的基础的财产。

好一个劳动得来的、自己挣得的、自己赚来的财产！你们说的是资产阶级所有制以前的那种小资产者的、小农的财产吗？那种财产用不着我们去消灭，工业的发展已经把它消灭了，而且每天都在消灭它。

或者，你们说的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吧？

但是，难道雇佣劳动，无产者的劳动，会给无产者创造出财产来吗？没有的事。这种劳动所创造的是资本，即剥削雇佣劳动的财产，只有在不断产生出新的雇佣劳动来重新加以剥削的条件下才能增加起来的财产。现今的这种财产是在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对立中运动的。让我们来看看这种对立的两个方面吧。

做一个资本家，这就是说，他在生产中不仅占有一种纯粹个人的地位，而且占有一种社会的地位。资本是集体的产物，它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被运用起来。

因此，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

因此，把资本变为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公共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时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

现在，我们来看看雇佣劳动。

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

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因此，雇佣工人靠自己的劳动所占有的东西，只够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我们决不打算消灭这种供直接生命再生产用的劳动产品的个人占有，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的东西使人们有可能支配别人的劳动。我们要消灭的只是这种占有的可怜的性质，在这种占有下，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生活，并且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生活的时候才能生活。

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活的劳动只是增殖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的一种手段。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只是扩大、丰富和提高工人的生活的一种手段。

因此，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

而资产阶级却把消灭这种关系说成是消灭个性和自由！它说对了。的确，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

在现今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范围内，所谓自由就是贸易自由，买卖自由。

但是，买卖一消失，自由的买卖也就会消失。我们的资产者关于自由买卖的空谈，也象他们的其他一切关于自由的大话一样，仅仅对于不自由的买卖来说，对于中世纪被奴役的市民来说，才是有意义的，而对于共产主义要消灭买卖、消灭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本身这一点来说，却是毫无意义的。

你们一听到我们要消灭私有制，就惊慌起来。但是，在

你们的现存社会里，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被消灭了；这种私有制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私有财产对十分之九的成员来说已经不存在。可见，你们责备我们，原来是说我们要消灭那种以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财产为必要条件的所有制。

总而言之，你们责备我们，原来是说我们要消灭你们的那种所有制。的确，我们是要这样做的。

你们说，从劳动不再能变为资本、货币、地租，一句话，不再能变为可以垄断的社会力量的时候起，就是说，从个人财产不再能变为资产阶级财产^①的时候起，个性就被消灭了。

由此可见，你们是承认，你们所理解的个性，不外是生产者、资产阶级私有者。这样的个性确实应当被消灭。

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有人反驳说，私有制一消灭，一切活动就会停止，懒惰之风就会兴起。

这样说来，资产阶级社会早就应该因懒惰而灭亡了，因为在这个社会里是劳者不获，获者不劳的。所有这些顾虑，都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同义反复：一旦没有资本，也就不再有雇佣劳动了。

所有这些对共产主义的物质产品的占有方式和生产方式的责备，都同样被推广到精神产品的占有和生产方面。正如

^①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变为资本”。——编者注

消灭阶级的所有制在资产者看来是消灭生产本身一样，消灭阶级的教育在他们看来就等于消灭一切教育。

资产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

但是，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象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

你们的偏私观念使你们把自己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从历史的、在生产过程中是暂时的关系变成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理性规律，这种偏私观念是你们和一切灭亡了的统治阶级所共有的。你们谈到古代所有制的时候所能理解的，你们谈到封建所有制的时候所能理解的，一谈到资产阶级所有制你们就再也不能理解了。

消灭家庭！连极端的激进党人也对共产党人的这种可耻的意图表示愤慨。

现代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是建筑在资本上面，建筑在私人发财上面的。这种家庭的充分发展的形式，只是在资产阶级中才存在，而它的补充现象是无产者的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淫。

资产者的家庭自然会随着它的这种补充现象的消失而消失，两者都要随着资本的消失而消失。

也许你们是责备我们，说我们要消灭父母对子女的剥削

吧？我们承认这种罪状。

但是，你们说，我们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

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借以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

无产者的一切家庭联系愈是由于大工业的发展而被破坏，他们的子女愈是由于这种发展而被变成单纯的买卖对象和劳动工具，资产阶级关于家庭和教育、关于父母和子女的亲密关系的空话就愈是令人作呕。

但是，你们共产党人是要实行公妻制的啊，——整个资产阶级异口同声地我们这样叫喊。

资产者原来是在把自己的妻子看做单纯的生产工具的。他们听说生产工具将要公共使用，自然就不能不想到妇女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他们想也没有想到，问题正在于消灭妇女被当做单纯生产工具看待的地位。

其实，我们的资产者装得道貌岸然，对所谓的共产党人的正式公妻制表示惊讶，那是再可笑不过了。公妻制无需共产党人来实行，它差不多是一向就有的。

我们的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女儿受他们支配为满足，正式的娼妓更不必说了，他们还以互相诱奸妻子为最大的享乐。

资产阶级的婚姻实际上是公妻制。人们至多只能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妻制来代替伪善地掩盖着的公妻制。其实，不言而喻，随着现在的生产关系的消灭，从这种关系中产生的公妻制，即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卖淫，也就消失了。

还有人责备共产党人，说他们要取消祖国，取消民族。

工人没有祖国。决不能剥夺他们所没有的东西。因为无产阶级首先必须取得政治统治，上升为民族的阶级^①，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所以它本身暂时还是民族的，虽然这里所说的“民族的”一词和资产阶级所理解的完全不同。

随着资产阶级的的发展，随着贸易自由的实现和世界市场的建立，随着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的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隔绝和对立日益消失了。

无产阶级的统治将使它们更快地消失。联合的行动，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

人对人的剥削一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

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一消失，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

从宗教的、哲学的和一般意识形态的观点对共产主义提出的种种责难，都不值得详细讨论了。

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

^① “民族的阶级”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民族的领导阶级”——编者注

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这难道需要经过深思才能了解吗？

思想的历史除了证明精神生产随着物质生产的改造而改造，还证明了什么呢？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当人们谈到使整个社会革命化的思想时，他们只是表明了一个事实：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

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十八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①占统治地位罢了。

“诚然”，——有人会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以及其他的观念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是不断改变的。但是，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本身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

此外，还存在着永恒的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这些真理是社会发展的一切阶段所共有的。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的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史发展进程相矛盾的。”

这种责难有什么意思呢？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

① “在信仰的领域里”在 18721883 和 1890 年德文版中是“在知识的领域里”。——编者注

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各个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

但是，不管这种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有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种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①，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不过，我们还是把资产阶级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责难撇开吧。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要做到这一点，当然首先必须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采取这样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在经济上似乎是不够充分的和没有力量的，但是在运动进程中它们会越出本身^②，而且作为变革全部生产方式的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① 在1890年德文版中删去了：“这些形式”。——编者注

②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里加上了：“使进一步向旧的社会制度进攻成为必要”。
——编者注

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会是不同的。

但是，最先进的国家几乎都可以采取下面的措施：

1. 剥夺地产，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2. 征收高额累进税。
3. 废除继承权。
4. 没收一切流亡分子和叛乱分子的财产。
5. 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6. 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
7. 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按照总的计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壤。
8.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军，特别是在农业方面。
9. 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①逐步消灭^②。
10. 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等等。

在发展进程中，当阶级差别已经消失而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手里的时候，公众的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原来意义上的政治权力，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

① “对立”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差别”。——编者注

② 在1888年英文版中这一条是：“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通过把人口更平均地分布于全国的办法逐步消灭城乡之间的差别”。——编者注

定要联合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末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也就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①，从而消灭了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

1. 反动的社会主义

(甲) 封建的社会主义

法国和英国的贵族，按照他们的历史地位所负的使命，就是写一些抨击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作品。在法国的 1830 年七月革命和英国的改革运动¹³中，他们再一次被可恨的暴发户打败了。从此就再谈不上严重的政治斗争了。他们还能进行的只是文字斗争。但是，即使在文字方面也不可能重弹复辟时期^②的老调了。为了激起同情，贵族们不得不装模做样，

① “消灭了阶级对立和阶级本身的存在条件”在 18721883 和 1890 年德文版中是：“消灭了阶级对立的存在条件，消灭了阶级本身”——编者注

② 这里所指的并不是 1660-1689 年英国的复辟时期而是 1814-1830 年法国的复辟时期。（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似乎他们已经不关心自身的利益，似乎只是为了被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才声讨资产阶级。他们用来泄愤的手段是：唱唱诅咒他们的新统治者的歌，并向他叽叽咕咕地说一些或多或少凶险的预言。

这样就产生了封建的社会主义，其中半是挽歌，半是谤文；半是过去的回音，半是未来的恫吓；它有时也能用辛辣、俏皮而尖刻的评论刺中资产阶级的心，但是它由于完全不能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

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每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

一部分法国正统派¹⁴和“青年英国”¹⁵，都表演过这出戏。

封建主说，他们的剥削方式和资产阶级的剥削不同，那他们只是忘记了，他们是在完全不同的、目前已经过时的情况和条件下进行剥削的。他们说，在他们的统治下并没有出现过现代的无产阶级，那他们只是忘记了，现代的资产阶级正是他们的社会制度的必然产物。

不过，他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批评的反动性质，他们控告资产阶级的主要罪状正是在于：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有一个将把整个旧社会制度炸毁的阶级发展起来。

他们责备资产阶级，与其说是因为它产生了一般的无产阶级，不如说是因为它产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

因此，在政治实践中，他们参与对工人阶级采取的一切暴力措施，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违背自己的那一套冠冕堂

皇的言词，屈身拾取金苹果^①，不顾信义、仁爱和名誉去做羊毛、甜菜和烧酒的买卖。

正如僧侣总是同封建主携手同行一样，僧侣的社会主义也总是同封建的社会主义携手同行的。

要给基督教禁欲主义涂上一层社会主义的色彩，是再容易不过了。基督教不是也激烈反对私有制，反对婚姻，反对国家吗？它不是提倡用行善和求乞、独身和禁欲、修道和礼拜来代替这一切吗？基督教的^②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僧侣用来使贵族的怨愤神圣化的圣水罢了。

（乙）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封建贵族并不是被资产阶级所推翻的、其生活条件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里日益恶化和消失的唯一阶级。中世纪的城关市民等级和小农等级是现代资产阶级的前身。在工商业不很发达的国家里，这个阶级至今还在新兴的资产阶级身旁苟延残喘。

在现代文明已经发展的国家里，形成了一个新的小资产

-
- ① “金苹果”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工业树上掉下来的金苹果”——编者注
- ② 这里主要是指德国，那里的土地贵族和容克地主通过管事自行经营自己的很大一部分土地，他们还开设大规模的甜菜糖厂和土豆酒厂较富有的英国贵族还没有落到这种地步，但是，他们也知道怎样让人家用他们的名义创办颇为可疑的股份公司，以补偿地租的下降（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 ③ 在 1848 年德文版中是：“神圣的和今天的”，在 1872、1883 和 1890 年德文版中是：“基督教的”。——编者注

阶级，它摇摆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并且作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补充部分不断地重新组成。但是，这一阶级的成员经常被竞争抛到无产阶级队伍里去，而且，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他们甚至觉察到，他们很快就会完全失去他们作为现代社会中一个独立部分的地位，在商业、工业和农业中很快就会被监工和雇员所代替。

在农民阶级远远超过人口半数的国家，例如在法国，那些站在无产阶级方面反对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自然是用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的尺度去批判资产阶级制度的，是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替工人说话的。这样就形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西斯蒙第¹⁶就是这个学派的首领，对法国来说是这样，对英国来说也是这样。

这种社会主义非常精辟地分析了现代生产关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经济学家的虚伪的粉饰。它确凿地证明了机器和分工的破坏作用、资本和地产的积聚、生产过剩、危机、小资产者和小农的必然没落、无产阶级的贫困、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财富分配的极不平均、各民族之间的毁灭性的工业战争，以及旧风尚、旧家庭关系和旧民族性的解体。

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按其积极的内容来说，或者是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的社会，或者是企图重新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去。它在这两种场合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的。

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农业中的宗法经济，——这就是它的最后结论。

这一思潮在它以后的发展中变成了一种怯懦的悲叹^①。

(丙) 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

德国的哲学家、半哲学家和才子们，贪婪地抓住了这种文献，不过他们忘记了：在这种著作从法国搬到德国的时候，法国的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时搬过去。在德国的条件下，法国的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只具有纯粹文献的形式。它必然表现为关于真正的社会^②、关于实现人的本质的无谓思辨^③。这样，第一次法国革命的要求，在十八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看来，不过是一般“实践理性”的要求，而革命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在他们心目中就是纯粹意志、本来面目的意志、真正人的意志的规律。

德国著作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把新的法国的思想同他们的旧的哲学良心调和起来，或者毋宁说，就是从他们的哲学观点出发去掌握法国的思想。

这种掌握，就象掌握外国语一样，是通过翻译的。

大家知道，天主教僧侣曾经在古代异教经典的手抄本上

① 在 1888 年英文版中这一句是：“最后，当顽强的历史事实把自我欺骗的一切醉梦驱散的时候，这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就化为一种可怜的哀愁”。——编者注

② 在 1872、1883 和 1890 年德文版中删去了：“关于真正的社会”——编者注

③ 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没有这句话。——编者注

面写上荒诞的天主教圣徒传。德国著作家用相反的态度对待世俗的法国文献。他们在法国的原著下面写上自己的哲学胡说。例如，他们在批判货币关系的法国原著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Entäußerung]”，在批判资产阶级国家的法国原著下面写上所谓“抽象普遍物的统治的废除”，等等。

这种把自己的哲学词句硬塞进法国理论的作法，他们称之为“行动的哲学”、“真正的社会主义”¹⁷、“德国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哲学论证”，等等。

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就这样被完全阉割了。既然这种文献在德国人手里已不再表现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于是德国人就认为：他们克服了“法国人的片面性”，他们不代表真实的要求，而代表真理的要求，不代表无产者的利益，而代表人的本质的利益，即一般人的利益，这种人不属于任何阶级，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

现在，这种曾经郑重其事地看待自己那一套拙劣的小学生作业并且大言不惭地加以吹嘘的德国社会主义，渐渐失去了它那种自炫博学的天真。

德国的特别是普鲁士的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和君主专制的斗争，一句话，自由主义运动，愈来愈严重了。

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

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德国的社会主义恰好忘记了，法国的批判（德国的社会主义是这种批判的可怜的回声）是以现代的资产阶级社会以及相应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相当的政治制度为前提的，而这一切前提当时在德国正是尚待争取的。

这种社会主义成了德意志各邦专制政府及其随从——僧侣、教员、容克地主和官僚求之不得的、吓唬来势汹汹的资产阶级的稻草人。

这种社会主义是这些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

既然“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这样成了这些政府对付德国资产阶级的武器，那末它也就直接代表了一种反动的利益，即德国小市民的利益。在德国，十六世纪遗留下来的、从那时起经常以不同形式重新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是现存制度的真实的社会基础。

保存这个小资产阶级，就是保存德国的现存制度。这个阶级胆战心惊地从资产阶级的工业统治和政治统治那里等候着无可幸免的灭亡，这一方面是由于资本的积聚，另一方面是由于革命无产阶级的兴起。在它看来，“真正的”社会主义能起一箭双雕的作用。“真正的”社会主义象瘟疫一样流行起来了。

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给自己的那几条干瘪的“永恒真理”披上一件用思辨的蛛丝织成的、绣满华丽辞藻的花朵和浸透甜情蜜意的甘露的外衣，这件光彩夺目的外衣只是使他们的货物在这些顾客中间增加销路罢了。

同时，德国的社会主义也愈来愈认识到自己的使命就是充当这种小市民的堂堂代表。

它宣布德意志民族是模范的民族，德国小市民是模范的人。它给这些小市民的每一种丑行都加上奥秘的、高尚的、社会主义的意义，使之变成完全相反的东西。它贯彻到底，直接反对共产主义的“野蛮破坏的”倾向，并且宣布自己是不偏不倚的超乎任何阶级斗争之上的。现今在德国流行的一切所谓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除了极少数的例外，都属于这一类卑鄙龌龊的、令人委靡的文献。^①

2. 保守的或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想要消除社会的弊病，以便保障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

这一部分人包括：经济学家、博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劳动阶级状况改善派、慈善事业组织者、动物保护协会会员、戒酒运动协会发起人以及形形色色的小改良家。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甚至被制成一些完整的体系。

我们可以举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作为例子。

社会主义的资产者愿意要现代社会的生存条件，但是不

① 1848 年的革命风暴已经把这个可恶的流派一扫而光，并且使这一流派的代表人物再也没有兴趣拿社会主义来投机了。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和典型人物是卡尔·格律恩先生。（恩格斯在 1890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要由这些条件必然产生的斗争和危险。他们愿意要现存的社会，但是不要那些使这个社会革命化和解体的因素。他们愿意要资产阶级，但是不要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看来，它所统治的世界自然是最美好的世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把这种安慰人心的观念制成半套或整套的体系。它要求无产阶级实现它的体系，走进新的耶路撒冷，其实它不过是要求无产阶级停留在现今的社会里，但是要抛弃他们关于这个社会的可恶的观念。

这种社会主义的另一种不够系统、但是比较实际的形式，力图使工人阶级厌弃一切革命运动，硬说能给工人阶级带来好处的并不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改革，而仅仅是物质生活条件即经济关系的改变。但是，这种社会主义所理解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改变，绝对不是只有通过革命的途径才能实现的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消灭，而是一些行政上的改良，这些改良是在这种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实行的，因而丝毫不会改变资本和雇佣劳动的关系，至多只能减少资产阶级的统治费用和简化它的国家行政事务。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只有在它变成纯粹的演说辞令的时候，才获得自己的适当的表现。

自由贸易！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关税！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单身牢房！

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这才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唯一认真说出的最后的话。

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归结起来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3.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这里，我们不谈在现代一切大革命中表达过无产阶级要求的文献（巴贝夫¹⁸等人的著作）。

无产阶级在普遍激动的时代、在推翻封建社会的时期直接实现自己阶级利益的最初尝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败，这是由于当时无产阶级本身还不够发展，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只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产物。随着这些早期的无产阶级运动而出现的革命文献，就其内容来说必然是反动的。这种文献倡导普遍的禁欲主义和粗陋的平均主义。

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体系，圣西门、傅立叶、欧文¹⁹等人的体系，是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还不发展的最初时期出现的。关于这个时期，我们在前面已经叙述过了（见《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诚然，这些体系的发明家看到了阶级的对立，看到了统治着的社会本身中的破坏因素的作用。但是，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方面的任何历史主动性，看不到它所特有的任何政治运动。

由于阶级对立的发展是同工业的发展步调一致的，所以这些发明家也不可能看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于是他们就去探求某种社会科学、社会规律，以便创造这些条件。

这样，社会的活动就要由他们个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解放的历史条件就要由幻想的条件来代替，无产阶级的逐步组

织成为阶级就要由他们特意设计出来的社会组织来代替。在他们看来，今后的世界历史不过是宣传和实施他们的社会计划的历史。

诚然，他们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主要是代表工人阶级这一受苦最深的阶级的利益。在他们的心目中，无产阶级只是一个受苦最深的阶级。

但是，由于阶级斗争不发展，由于他们本身的生活地位，他们就以为自己是高高超乎这种阶级对立之上的。他们要改善社会一切成员的生活状况，甚至生活最优裕的成员也包括在内。因此，他们总是不加区别地向整个社会呼吁，而且主要是向统治阶级呼吁。他们以为，人们只要理解他们的体系，就会承认这种体系是最美好的社会的最美好的计划。

因此，他们拒绝一切政治行动，特别是一切革命行动；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达到自己的目的，并且企图通过一些小型的、当然不会成功的试验，通过示范的力量来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

这种对未来社会的幻想的描绘，是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①。

但是，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含有批判的成分。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

① “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的”在1872、1883和1890年德文版中是“从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中产生的”。——编者注

的主张^①，例如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②，消灭家庭，消灭私人经营，消灭雇佣劳动，提倡社会和谐，把国家变成纯粹的生产管理机构，——所有这些主张都只是表明要消灭阶级对立，而这种阶级对立在当时刚刚开始发展，它们所知道的只是这种对立的早期的、不明显的、不确定的形式。因此，这些主张本身还带有纯粹空想的性质。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阶级斗争愈发展和愈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这种反对阶级斗争的幻想，就愈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所以，虽然这些体系的创始人在许多方面是革命的，但是他们的信徒总是组成一些反动的宗派。这些信徒无视无产阶级的历史进展，还是死守着老师们的旧观点。因此，他们一贯地企图削弱阶级斗争，调和对立。他们还总是梦想用试验的办法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空想，创办单个的法伦斯泰尔，建立国内移民区，创立小伊加利亚^③，即袖珍版的新耶路撒冷，——而为了建造这一切空中

① “它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的主张”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它们所提出的实际措施”。——编者注

② “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在 1888 年英文版中是：“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差别”。——编者

③ 法伦斯泰尔是沙尔·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主义移民区，伊加利亚是卡贝给自己的理想国和后来他在美洲创立的共产主义移民区所起的名称。（恩格斯在 1888 年英文版上加的注）

国内移民区是欧文给他的示范性的共产主义社会所起的名称法伦斯泰尔是傅立叶所设计的社会宫的名称。伊加利亚是具有卡贝所描绘的那种共产主义制度的乌托邦幻想国。（恩格斯在 1890 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楼阁，他们就不得不求助于资产阶级的善心和钱袋。他们逐渐地堕落到上述反动的或保守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伙中去了，所不同的只是他们更加系统地卖弄学问，狂热地迷信自己那一套社会科学的奇功异效。

因此，他们激烈地反对工人的一切政治运动，认为这种运动只是由于盲目地不相信新福音才发生的。

在英国，有欧文主义者反对宪章派²⁰，在法国，有傅立叶主义者反对改革派²¹。

四、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党派的态度

看过第二章之后，就可以了解共产党人对已经形成的工人政党的态度，因而也就可以了解他们对英国宪章派和北美土地改革派²²的态度。

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在法国，共产党人同社会主义民主党联合起来反对保守的和激进的资产阶级，但是并不因此放弃对那些从革命的传统中产生出来的空谈和幻想采取批判态度的权利。

① 当时这个党在议会中的代表是赖德律-洛兰，在著作界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在报纸方面的代表是《改革报》。“社会主义民主党”这个名称在它的发明者那里是指民主党或共和党中或多或少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一部分人。（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加的注）当时在法国以社会主义民主党自称的政党，在政治方面的代表是赖德律-洛兰，在著作界的代表是路易·勃朗因此，它同现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有天壤之别的。（恩格斯在1890年德文版上加的注）

在瑞士，共产党人支持激进党人，但是并不忽略这个政党是由互相矛盾的分子组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法国式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一部分是激进的资产者。

在波兰人中间，共产党人支持那个把土地革命当做民族解放的条件的政党，即发动过 1846 年克拉科夫起义²³的政党。

在德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的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反对君主专制、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小市民的反动性。

但是，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

共产党人把自己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因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因为同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相比，德国将在整个欧洲文明更进步的条件下，拥有发展得多的无产阶级去实现这个变革，因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

总之，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

在所有这些运动中，他们都特别强调所有制问题，把它作为运动的基本问题，不管这个问题当时的发展程度怎样。

最后，共产党人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

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写于 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

1848 年 2 月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

在伦敦出版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4 卷第 461——504 页

注 释

- 1 《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最伟大的纲领性文件。列宁说：“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

《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写于 1847 年 12 月—1848 年 1 月。1848 年 2 月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发表，共 23 页。1848 年 3 月至 7 月《宣言》又在德国流亡者的民主派机关报《德意志伦敦报》上连载。1848 年在伦敦重印了《宣言》的德文

本共 30 页。这个版本是后来经马克思和恩格斯赞同的各种版本的基础。

《宣言》在 1848 年译成许多种欧洲文字(法文、波兰文意大利文丹麦文佛来米文和瑞典文)。在 1848 年的各种版本中未提作者的名字。1850 年英国宪章派的机关刊物《红色共和党人》在登载《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文时,该杂志的编辑乔·哈尼在序言中第一次指出作者的名字。

- 2 1872 年《宣言》出了新的德文版,这是由《人民国家报》编辑部倡议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为该版合写了一篇序言,并在正文中做了某些修改。1872 年的版本以及后来 1883 年和 1890 年的德文本,书名都改为《共产主义宣言》。
- 3 共产主义者同盟是第一个无产阶级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它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于 1847 年 6 月初在伦敦成立的。同盟的纲领和组织原则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之下制定的。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 年 11 月 29 日—12 月 8 日)一致通过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制定的科学共产主义的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了一个纲领性文件,即 1848 年 2 月发表的《共产党宣言》。

由于法国革命爆发在伦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于 1848 年 2 月底把同盟的领导权移交给了以马克思为首的布鲁塞尔区部委员会。在马克思被驱逐出布鲁塞尔并迁居到巴黎以后,巴黎于 3 月初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的驻在地。恩格斯也当选为中央委员。

1848 年 3 月下半月到 4 月初,马克思、恩格斯和数百名德国工人(他们多半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回国参加已经爆发的德国革命。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3 月底所写成的《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5 卷第 3—5 页)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次革命中的政治纲领。当时,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已成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的领导和指导中心。

虽然革命的失败打击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但它于 1849—1850 年进行了改组并且继续进行活动。1850 年夏,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内部在策略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达到了很尖锐的程度。多数派坚决反对维利希—沙佩尔集团所提出的宗派主义、冒险主义的策略,它无视客观规律和德国及欧洲其他各国的现实政治形势而主张立即发动革命。1850

年9月中，维利希-沙佩尔集团的分裂活动终于导致了同盟与该集团的分裂。1851年5月，由于警察的迫害和盟员的被捕，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德国的活动实际上已经停顿。1852年11月17日，在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发生后不久，同盟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宣告解散，但是它的盟员还是继续工作，为未来的革命斗争锻炼干部。

共产主义者同盟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它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学校，是无产阶级政党的萌芽，相当大量的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都积极参加国际工人协会的建立工作。

- 4 指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1848年2月24日法国人民推翻了法国路易-菲力普王朝。
- 5 《红色共和党人》（《The Red Republican》）是1850年6-11月由乔哈尼出版的宪章派周刊。该刊在1850年11月（第2124期）曾以《德国共产党宣言》为题登载过《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文。
- 7 《社会主义者报》（《Le Socialiste》）是1871年10月至1873年5月在纽约出版的法文周报，国际法国人支部的机关报；它支持国际北美联合会里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海牙代表大会以后与国际断绝了关系。1872年1--2月该报曾发表了《共产党宣言》。
- 8 1883年出版了《宣言》的第三个德文本。这是在马克思逝世后经恩格斯校阅过的第一个版本。
- 9 梅特涅，克雷门斯（1773-1859）——公爵，奥地利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反动分子，曾任外交大臣（1809-1821）和首相（1821-1848），神圣同盟的组织者之一。

基佐，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1787-1874）——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1840年至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代表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
- 10 神圣同盟是沙皇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为了镇压各国的革命运动和维护各国的封建君主制度，于1815年建立的欧洲各专制君主的反动联盟。
- 11 在比较后期的各种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劳动力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格”等等比较确切的概念（这是由马克思开始采用的）分别代替了“劳动的价值”和“劳动的价格”等等概念。

- 12 1847年6月8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只适用于童工和女工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但是实际上许多厂主并没有遵守这项法律。
- 13 指选举法的改革。选举法改革法案于1831年为英国下院所通过，1832年6月为上院最后批准。这次改革旨在反对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的政治垄断，为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打开了进入议会的大门。为实现改革而斗争的主力军——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受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欺骗而没有获得选举权。
- 14 正统派 是法国1792年被推翻的、代表世袭大地主利益的波旁王朝长系的拥护者。1830年该王朝第二次被推翻后，正统派就结成了政党。在反对以金融贵族和大资产阶级为支柱的当政的奥尔良王朝时，一部分正统派常常抓住社会问题进行蛊惑宣传，说自己维护劳动者，使他们不受资产者的剥削。
- 15 “青年英国”是英国托利党中的一些政治活动家和著作家的集团，成立半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青年英国”的活动家们反映了土地贵展对安时须经济势力和政治势力的增强心怀不满，他们采取蛊惑手段，企图把工人阶级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并利用工人阶级来反对资产阶级。
- 16 西斯蒙第，让·沙尔·列奥纳尔·西蒙·德(1773-1842)——瑞士经济学家，批判资本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批评家，经济浪漫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
- 17 指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这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主要在德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广泛流行的一种反动思潮。“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卡·格律恩、莫·赫斯、海·克利盖等用仁爱 and 友情的温情宣传冒充社会主义思想，否认在德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33—640页)、《反克利的通告》(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6-102页)、《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23-275页)、《共产党宣言》(见本书第49—53页)中批判了这种思潮。
- 18 巴贝夫，格拉古(1760-1797)(真名弗朗斯瓦·诺埃尔)——法国革命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平等派”密谋的组织者。——第56页。
- 19 圣西门，昂利(1760-1825)——伟大的法国空想19社会主义者。
傅立叶，沙尔(1772—1837)——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欧文，罗伯特(1771-1858)——伟大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 20 宪章派是宪章运动的参加者。宪章运动是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行包括要求普选权和一系列为工人保证此项权利的许多条件的人民宪章。按照列宁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276页）。宪章运动的衰落，是由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这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其表现就是工人领袖放弃对宪章运动的支持。
- 21 指《改革报》（见注148）的支持者。《改革报》派联合了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附和该派的有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们主张建立共和国并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
- 22 “青年美国”是美国手工业者和工人的组织。该组织是1845年创立的群众性的全国改革协会的核心，该协会的参加者又称作“民族改良派”或“北美土地改革派”。协会宣称它的宗旨是无偿地分给每一个劳动者一块土地。四十年代后半期协会宣传土地改革，反对种植场奴隶主及土地投机分子，并提出了许多其他民主要求（实行十小时工作日、废除农奴制、取消常备军等等）。许多德国手工业侨民参加了这一土地改革运动，但是曾经一度参加过全国改革协会的克利盖和他的集团却鼓吹“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反动的空想，引诱德国侨民脱离争取民主的斗争。
- 23 波兰人民为了民族解放曾准备在1846年2月举行起义。起义的主要发起人是波兰的革命民主主义者（邓波夫斯基等人）。但是，由于波兰小贵族的背叛行为和普鲁士警察逮捕了起义的领袖，总起义没有成功，只是个别地方发出了革命的火花。只有在从1815年起由奥、俄、普共管的克拉科夫，起义者在2月22日取得了胜利并建立了国民政府，发表了废除封建义务的宣言。克拉科夫起义在1846年3月初被镇压下去了。在1846年11月，奥、普、俄签订了关于把克拉科夫并入奥地利帝国的条约。

马 克 思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¹

我考察资产阶级经济制度是按照以下的次序：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在前三项下，我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分成的三大阶级的经济生活条件；其他三项的相互联系是一目了然的。第一册论述资本，其第一篇由下列各章组成：（1）商品，（2）货币或简单流通，（3）资本一般。前两章构成本分册的内容。我面前的全部材料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

我把已经起草好的一篇总的导言²压下了，因为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不过在这里倒不妨谈一下我自己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经过。

我学的专业本来是法律，但我只是把它排在哲学和历史之次当作辅助学科来研究。1842—1843年间，我作为³的主编，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莱茵省议会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析分的讨论，当时的莱茵省总督冯·沙培尔先生就摩塞尔农民状况同展开的官方论战，最后，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辩论，是促使我去研究经济问题

的最初动因⁴。另一方面，在善良的“前进”愿望大大超过实际知识的时候，在上可以听到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带着微弱哲学色彩的回声。我曾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但是同时在和《奥格斯堡总汇报》⁵的一次争论中坦率承认，我以往的研究还不容许我对法兰西思潮的内容本身妄加评判。我倒非常乐意利用发行人以为把报纸的态度放温和些就可以使那已经落在该报头上的死刑判决撤销的幻想，以便从社会舞台退回书房。

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⁶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这部著作的导言曾发表在1844年巴黎出版的《德法年鉴》⁷上。我的研究得出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我在巴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后来因基佐⁸先生下令驱逐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继续进行研究。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

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

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自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批判经济学范畴的天才大纲（在《德法年鉴》上）⁹发表以后，我同他不断通讯交换意见，他从另一条道路（请参考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①）得出同我一样的结果，当1845年春他也住在布鲁塞尔时，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¹⁰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社，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在我们当时从这方面或那方面向公众表达我们见解的各种著作中，我只提出我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和我自己发表的《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②。我们见解中有决定意义的论点，在我的1847年出版的为反对蒲鲁东¹¹而写的著作《哲学的贫困》^③中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虽然只是论战性的表述。我用德文写的关于《雇佣劳动》¹²一书，汇集了我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¹³上对于这个问题的讲演，这本书的印刷由于二月革命¹⁴和我因此被迫离开比利时而中断。

1848年和1849年《新莱茵报》¹⁵的出版以及随后发生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卷第269—587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195—209页。——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1—198页。——编者注

的一些事变，打断了我的经济研究工作，到 1850 年我在伦敦才能重新进行这一工作。英国博物馆中堆积着政治经济学史的大量资料，伦敦对于考察资产阶级社会是一个方便的地点，最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发现，资产阶级社会似乎踏进了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切决定我再从头开始，用批判的精神来透彻地研究新的材料。这些研究一部分自然要涉及到似乎完全属于本题之外的学科，在这方面不得不多少费些时间。但是使我所能够支配的时间特别受到限制的，是谋生的迫切需要。八年来，我一直为第一流英美报纸“纽约每日论坛报”¹⁵ 撰稿（写作真正的报纸通讯在我只是例外），这使我的研究工作必然时时间断。然而，由于评论英国和大陆突出经济事件的论文在我的投稿中占着很大部分，我不得不去熟悉政治经济科学本身范围以外的实际的细节。

我以上简短地叙述了自己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经过，这只是为了证明，我的见解，不管人们对它怎样评论，不管它多么不合乎统治阶级的自私的偏见，却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但是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¹⁸

卡尔·马克思

1859 年 1 月于伦敦

载于 1850 年 5 月 13 日在柏林出版

《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3 卷第 7—11 页

注 释

- 1 这是马克思为他在 1858 年 8 月—1859 年 1 月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所写的序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马克思在写作这本书以前，进行了十五年的各方面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这一过程中研究了大量的社会经济文献，制定了自己的经济学说的原理。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有巨大的理论意义和独立的科学意义，其中对马克思所发现的唯一科学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实质作了精辟的说明，对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本身下了经典性的定义。列宁指出，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对运用到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周密的说明（参看本书《卡尔·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一节）。

马克思在世时，《政治经济学批判》没有再版只有序言是个例外，它曾于 1859 年 6 月 4 日发表在伦敦德文报纸《人民报》上，但发表时作了某些删节。

- 2 指马克思为一部经济学巨著写的、但没有完成的《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86—114 页）。
- 3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是 1842 年 1 月 1 日至 1843 年 3 月 31 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办的。该报曾吸收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 年 4 月马克思开始为撰稿，同年 10 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当局对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了。
- 4 指马克思的著作《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关于林木

- 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35—181、210—243页）。
- 5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是德国的一种反动日报，1798年创刊；1810年至1882年在奥格斯堡出版。1842年发表了捏造的空想共产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在其《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揭露了这种捏造，该文发表在1842年10月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130—134页）。
 - 6 黑格尔，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的代表，客观唯心主义者，最全面地研究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
 - 7 《德法年鉴》（《Deutsch-Französische Jahrbücher》）是在巴黎出版的德文刊物，主编是马克思和阿·卢格。仅仅在1844年2月出版过一期双刊号其中刊载有马克思的著作《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哲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9—451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一卷第1—15页），以及恩格斯的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626—655页）。这些著作标志着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民主主义最终地转到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杂志停刊的主要原因是马克思和资产阶级激进分子卢格之间存在着原则上的意见分歧。
 - 8 见本书《共产党宣言》注9。
 - 9 指恩格斯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页）。一第75页。
 - 10 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640页）。

- 11 蒲鲁东，比埃尔·约瑟夫(1809--1865)六一法国政论家;庸俗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小资产阶级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1848年是制宪会议议员。
- 12 指马克思的著作《雇佣劳动与资本》(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40—380页)。
- 13 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7年8月13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目的是对侨居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向他们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的领导下，协会成了团结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合法中心，并跟佛来米和瓦伦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中的优秀分子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后不久，由于该会成员被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出境，协会在布鲁塞尔的活动即告停止-第76页。
- 14 见本书《共产党宣言》注4。
- 15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1848年61日至1849年5月19日每日在科伦出版，主编是马克思，参加编辑部的有恩格斯、威·沃尔弗、格·维尔特、斐·沃尔弗、恩·德朗克、斐·弗莱里格拉特和亨·毕尔格尔斯。

民主派中无产阶级一翼的战斗机关报《新莱茵报》起了人民群众的教育者的作用，号召他们起来和反革命作斗争。决定报纸对德国和欧洲革命最重要问题的立场的社论，通常都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执笔。

《新莱茵报》的坚决的、不妥协的立场，战斗的国际主义精神，它对普鲁士政府以及科伦地方当局的政治上的揭发，使该报在创刊后的最初几个月就受到封建保皇派和自由派资产阶级报刊的攻击，并且受到政府的迫害，而这种迫害在1848年11—12月普鲁士的反革命政变以后更变本加厉了。

尽管遭到种种迫害和警察局的阻挠,《新莱茵报》还是英勇地捍卫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利益,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1849年5月,在反革命势力全面进攻的形势下,普鲁士政府借口马克思没有普鲁士国籍而下令把他驱逐出境。由于马克思被驱逐出境和《新莱茵报》的其他编辑遭受迫害,该报停刊了。1849年5月19日,《新莱茵报》用红色油墨印出了最后一号即第301号。报纸的编辑在致科伦工人的告别书中说:“无论何时何地,他们的最后一句话始终将是:工人阶级的解放!”

- 16 指1848年在加利福尼亚和1851年在澳大利亚发现了丰富的金矿,这一发现对欧美各国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影响。
- 17 《纽约每日论坛报》(《New-York Daily Tribune》)是美国的一家报纸,1841年至1924年出版。该报由著名的美国新闻工作者和政治活动家霍拉斯·格里利创办,在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是美国辉格党左翼的机关报,后来是共和党的机关报。四+至五十年代,该报站在进步的立场上反对奴隶占有制。参加该报工作的有许多著名的美国作家和新闻工作者,受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查理·德纳从四十年代末起是该报的编辑之一。马克思从1851年8月开始为该报撰稿,一直到1862年3月,继续了十年以上。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文章,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恩格斯的文章多是在曼彻斯特写的,许多文章上注明的日期并不是写作的真正日期,因为马克思在论文上通常标明的是寄往纽约的日期。有些论文是在伦敦写的,而马克思注明的却是巴黎、维也纳或柏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的文章,涉及国际政治、工人运动、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殖民地扩张、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等等极其重要的问题。在欧洲的反动时期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利用这个发行很广的美国报纸,以具体材料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态和这个社会所固有的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并且说明资产阶级民主的局限性。

《纽约每日论坛报》编辑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常常随意处理,有些文章不署作者名字而作为编辑部的社论刊登出去。自1855年

中期起,克思和恩格斯发表的一切文章都被去掉了署名。有时编辑部竟然还删改文章的内容,并任意加注日期。编辑部的这些行为曾一再引起马克思的抗议。从1857年秋天起,由于美国发生经济危机,报纸的财政状况受到影响,编辑部向马克思提出减少他对《纽约每日论坛报》通讯的数量。到美国国内战争开始时,马克思完全停止了撰稿。马克思所以和《纽约每日论坛报》断绝关系,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编辑部内主张同各蓄奴州妥协的人的势力加强和该报离开了进步立场。后来该报的方向更日益右倾。

18 引自但丁的《神曲》。

马 克 思

哥 达 纲 领 批 判¹（节录）

恩格斯写的序言

这里刊印的手稿——对纲领草案的批判以及给白拉克²的附信——曾于1875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³召开以前不久送给白拉克，请他转给盖布、奥艾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⁴过目，然后退还马克思。既然哈雷党代表大会⁵已把关于哥达纲领的讨论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还延迟发表这个有关这次讨论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那我就要犯隐匿罪了。

但是，这个手稿还有另外的和更广泛的意义。其中第一次明确而坚定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⁶从他开始从事鼓动工作起就采取的方针的态度，并且同样地表明了对拉萨尔的经济学原则和策略的态度。

这里用以剖析纲领草案的那种无情的尖锐性，用来表述得出的结论和揭露草案缺点的那种严厉性，——这一切在十五年以后的今天已不会使人见怪了。道地的拉萨尔主义者只是在国外还作为一些孤独的残余存在着，而哥达纲领甚至也被它的那些创造者们在哈雷当做完全不能令人满意的东西抛

弃了。

虽然如此，凡是在对内容没有影响的地方，我还是把一些针对个别人的尖锐的词句和评语删掉了，而用省略号来代替。如果马克思今天发表这个手稿，他自己也会这样作的。手稿中有些地方口气很激烈，这是由下述两种情况引起的：第一，马克思和我对德国运动的关系，比其他任何一国运动的关系都更为亲切；因此这个纲领草案中所表现的断然的退步，就不能不使我们感到特别愤慨。第二，我们那时正在同巴枯宁⁷及其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最激烈的斗争，——那时离国际海牙代表大会⁸闭幕才两年，——他们把德国工人运动中发生的一切都归咎于我们；因而我们不得不预料，他们也会诬指我们是这个纲领的秘密创作者。这些顾虑现在已经消失，因而一些有关的地方也就随之失去必要性了。

由于出版法的缘故，有些语句只用省略号暗示出来。凡是我不得不选用比较缓和的说法的地方，都加上了方括弧。其他地方都按手稿付印。

弗·恩格斯

1891年1月6日于伦敦

载于载于1890—1891年《新时代》

杂志第1卷第18期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2卷第105—106页

给威·白拉克的信

1875年5月5日于伦敦

亲爱的白拉克：

对合并纲领的下列批评意见，请您阅后转交盖布和奥艾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过目。我工作太忙，已经不得不远远超过医生给我规定的工作时间。所以，写这么多张纸，对我来说决不是一种“享受”。但是，为了使党内的朋友们——而这些意见就是为他们写的——以后不致误解我这方面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这是必要的。这里指的是，在合并大会以后，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的一个简短的声明，声明的内容是：我们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我们和它毫无共同之点。

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在国外有一种为党的敌人所热心支持的见解——一种完全荒谬的见解，仿佛我们在这里秘密地领导所谓爱森纳赫党⁹的运动。例如巴枯宁还在他新近出版的一本俄文著作里要我不仅为这个党的所有纲领等等负责，甚至要为李卜克内西自从和人民党¹⁰合作以来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负责¹¹。

撇开这一点不谈，我的义务也不容许我即使只用外交式的沉默方法来承认一个我认为应当根本抛弃并且会使党瓦解的纲领。

一步实际运动要比一打纲领更为重要。所以，既然不可能

——而局势也不容许这样做——超过爱森纳赫纲领¹²，那就干脆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好了。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应该是把这件事情推迟到由较长时间的共同工作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做），这就是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判定党的运动水平的界碑。

拉萨尔派¹³的领袖们之所以跑来靠拢我们，是因为他们为形势所迫。如果一开始就向他们声明决不会拿原则来做买卖，那末他们就只好满足于一个行动纲领或共同行动的组织计划了。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允许他们拿着全权委托书来出席，并且自己承认他们的这种全权委托书有效，就是说，向那些本身需要援助的人们无条件投降。不仅如此，他们甚至在召开妥协的代表大会以前就召开了代表大会，而自己的党却只是在事后才召开自己的代表大会。人们显然是想杜绝一切批评，不让自己的党有一个深思的机会。大家知道，合并这一事实本身是使工人感到满意的；但是，如果有人以为这种一时的成功不是用过高的代价换来的，那他就错了。

此外，即使这个纲领没有把拉萨尔的信条奉为神圣，也是完全不适宜的。

我将在最近把《资本论》法文版的最后几册寄给您。排印工作因法国政府禁止而耽搁了很久。在本星期内或下星期初本书可以印完。前六册您已经收到没有？请把伯恩哈特·贝克尔¹⁴的地址也告诉我，我也要给他寄最后几册去。¹⁵

《人民国家报》出版社¹⁶有一种特别的习气。例如到现在为止连一本新版的“科伦共产党人案件”¹⁷也没有给我寄来。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尔·马克思

写于 1875 年 5 月 5 日

摘要载于 1890—1891 年《新时代》

杂志第 1 卷第 18 期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9 卷第 13—14 页

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



1. “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本段第一部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劳动一样也是使用价值（而物质财富本来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的源泉，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表现，即人的劳动力的表现。上面那句话在一切儿童识字课本里都可以找到，但是这句话只是在它包含着劳动具备了相应的对象和资料这层意思的时候才是正确的。然而，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对那些唯一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避而不谈。只有一个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分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当做隶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资产者有很充分的理由给劳动加上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从劳动所受的自然制约性中才产生出如下的情况：一个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

人，在任何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为占有劳动的物质条件的他人做奴隶。他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他人的允许才能生存。

但是不管这句话缺点如何，我们且把它放在一旁，不去管它。那么结论应当怎样呢？显然应当是：

“既然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要不占有劳动的产品就不能占有财富。因此，如果他自己不劳动，他就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而且他自己的文化也是靠别人的劳动获得的。”

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借助于“而因为”这种暧昧的字眼添上第二句话，以便从第二句中，而不是从第一句中作出结论来。

本段第二部分：“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

根据第一句话，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就是说，任何一个社会都不能离开劳动。相反地，我们现在却看到，任何一种“有益的”劳动都不能离开社会。

那么同样也可以说，只有在社会里，无益的、甚至有损公益的劳动才能成为一个职业部门，只有在社会里才可以游手好闲，如此等等，——一句话，可以抄袭卢梭¹⁸的全部著作了。

而什么是“有益的”劳动呢？只不过是能产生预期效果的劳动。一个蒙昧人（而人在他已不再是猿类以后就是蒙昧人）用石头击毙野兽，采集果实等等，就是进行“有益的”劳动。

第三，结论：“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多妙的结论！既然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劳动所得就应当属于社会，而单个的工人从中获得的仅仅是**不必用来维持劳动“条件”**即维持社会的那一部分。

事实上，这个论点在一切时代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的捍卫者**所承认。首先要满足政府方面以及依附于它的各个方面的要求，因为政府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机关；其次要满足各种私有财产^①方面的要求，因为各种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基础，如此等等。你们看，这些空洞的辞句是随便怎么摆弄都可以的。

本段第一和第二两部分只有像下面这样说才能有些合乎情理的联系：

“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换个说法，“只有在社会里和通过社会”，“才能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

这个论点无可争辩地是正确的，因为孤立的劳动（假定它的物质条件是具备的）虽能创造使用价值，但它既不能创造财富，也不能创造文化。

但是另一个论点也是同样无可争辩的：

“随着劳动的社会性的发展，以及由此而来的劳动之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愚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文化也发展起来。”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是：“私有者”。——编者注

这是到现时为止的全部历史的规律。因此，不应当泛泛地谈论“劳动”和“社会”，而应当在这里清楚地证明，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终创造了物质的和其他的条件，使工人能够并且不得不铲除这个社会祸害^①。

实际上，把这整个行文和内容都不妥当的条文放在这里，只不过是為了要把拉萨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作为第一个口号写在党的旗帜上。以后我还要回过来谈“劳动所得”、“平等的权利”等等，因为同样的东西在下面又以稍微不同的形式重复出现。

2. “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

这段从国际章程中抄来的话，经过这番“修订”就变成荒谬的了。

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所垄断（地产的垄断甚至是资本垄断的基础）。无论是前一个或者后一个垄断者阶级，国际章程在有关条文中都没有提到。它谈到的是“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生活源泉”这一补充语充分表明，劳动资料也包括土地。

其所以作这种修订，是因为拉萨尔由于现在大家都知道的理由仅仅攻击了资本家阶级，而没有攻击土地所有者。在英国，资本家多半不是他的工厂所在的那块土地的所有者。

3. “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是：“历史祸害”。——编者注

的公共财产，要求集体调节总劳动并公平分配劳动所得。”

“把劳动资料提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应当是说把它们“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这不过是顺便提一句罢了。

什么是“劳动所得”呢？是劳动的产品呢，还是产品的价值？如果是后者，那末，是产品的总价值呢，或者只是劳动新添加在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上的那部分价值？

“劳动所得”是拉萨尔为了代替明确的经济概念而提出的一个模糊观念。

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

难道资产者不是断定今天的分配是“公平的”吗？难道它事实上不是在现今的生产方式基础上唯一“公平的”分配吗？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经济关系产生出法权关系吗？难道各种社会主义宗派分子关于“公平的”分配不是有各种极为不同的观念吗？

为了弄清楚“公平的”分配一语在这里指什么东西，我们必须把第一段和本段对照一下。本段设想的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劳动资料是公共财产，总劳动是由集体调节的”，而在第一段里我们则看到，“劳动所得应当不折不扣和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属于社会一切成员”？也属于不劳动的成员吗？那么“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又在哪里呢？只属于社会中劳动的成员吗？那么社会一切成员的“平等的权利”又在哪里呢？

“社会一切成员”和“平等的权利”显然只是些空话。问题的实质在于：在这个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劳动者都应

当得到“不折不扣的”拉萨尔的“劳动所得”。

如果我们把“劳动所得”这个用语首先理解为劳动的产品，那末集体的劳动所得就是社会总产品。

现在从它里面应该扣除：

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

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

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

从“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里扣除这些部分，在经济上是必要的，至于扣除多少，应当根据现有的资料 and 力量来确定，部分地应当根据概率论来确定，但是这些扣除根据公平原则无论如何是不能计算的。

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他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

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

第一，和生产没有关系^①的一般管理费用。

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

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

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

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

只有现在才谈得上纲领在拉萨尔的影响下偏狭地专门注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是：“没有直接关系”。——编者注

意的那种“分配”，就是说，才谈得上在集体中的个别生产者之间进行分配的那部分消费资料。

“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福利。

正如“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一语消失了一样，“劳动所得”一语现在也在整个地消失。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于是，“劳动所得”这个由于含意模糊就是现在也不能接受的用语，便失去了任何意义。

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所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例如，社会劳动日是由所有的个人劳动小时构成的；每一个生产者的个人劳动时间就是社会劳动日中他所提供的部分，就是他在社会劳动日里的一分。他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扣除他为社会基金而进行的劳动），而他

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部分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

显然，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交换（就它是等价的交换而言）的同一原则。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因为在改变了的环境下，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至于消费资料在各个生产者中间的分配，那末这里通行的是商品等价物的交换中也通行的同一原则，即一种形式的一定量的劳动可以和另一种形式的同量劳动相交换。

所以，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法权，虽然原则和实践在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而在商品交换中，等价物的交换只存在于平均数中，并不是存在于每个个别场合。

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还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生产者的权利是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的尺度——劳动——来计量。

但是，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而劳动，为了要使它能够成为一种尺度，就必须按照它的时间或强度来确定，不然它就不成其为尺度了。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①不同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还有：“劳动者的”。——编者注

等的个人天赋，因而也就默认^①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的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的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例如在现在所讲的这个场合，把他们只当做劳动者；再不把他们看做别的什么，把其他一切都撇开了。其次，一个劳动者已经结婚，另一个则没有；一个劳动者的子女较多，另一个的子女较少，如此等等。在劳动成果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还有：“劳动者的”。——编者注

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我较为详细地一方面谈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另一方面谈到“平等的权利”和“公平的分配”，这是为了要指出：这些人犯了多么大的罪，他们一方面企图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思，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另一方面又打算用民主主义者和法国社会主义者所惯用的关于权利等等的空洞的废话，来歪曲那些花费了很大力量才灌输给党而现在已在党内扎了根的现实主义观点。

除了上述的一切之外，把所谓分配看做事物的本质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那也是根本错误的。

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例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本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的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生产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的，那末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末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

4. “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

前一句是从国际章程的导言中抄来的，但是经过了“修订”。那里写道：“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这里却说“工人阶级”应当解放——解放什么？——“劳动”。谁能了解，就让他去了解吧。

另一方面，作为一种补偿，后一句却纯粹引用了拉萨尔的话：“对它（工人阶级）说来，其他一切阶级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在《共产党宣言》里写道：“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①

在这里，资产阶级作为大工业的体现者，对那些力求保持过时的生产方式所创造的一切社会阵地的封建主和中等等级说来，是被当做革命阶级看待的。所以他们并不是同资产阶级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

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说来是革命的，因为它本身是在大工业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它力求使生产摆脱资产阶级企图永远保存的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宣言》又补充说：“中间等级……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

所以，从这个观点看来，说什么对工人阶级说来，中间等级“同资产阶级一起”并且加上封建主“只组成反动的一帮”，这也是荒谬的。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61页。——编者注

难道在最近这次选举¹⁹中有人向手工业者、小工业家等等以及农民宣布说：“对我们说来，你们同资产者和封建主一起只组成反动的一帮”吗？

拉萨尔熟知《共产党宣言》，就像他的信徒熟知他写的福音书一样。他这样粗暴地歪曲《宣言》，不过是为了粉饰他同专制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这些敌人结成的反资产阶级联盟。

此外，在上面这一段里他的格言是勉强被塞进去的，它同那句从国际章程中摘来但被歪曲了的引语毫不相干。这纯粹是一种狂妄无耻的做法，这种做法当然绝对不是俾斯麦先生所不喜欢的，这是柏林的马拉²⁰所干出来的廉价的无耻行径之一。

5. “工人阶级为了本身的解放，首先是在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内进行活动，同时意识到，它的为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所共有的那种意图必然导致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

同《共产党宣言》和先前的一切社会主义相反，拉萨尔以最狭隘的民族观点来对待工人运动。有人竟在这方面追随他，而且这是在国际的活动以后！

为了能够进行斗争，工人阶级必须在国内组成为一个阶级，而且它的直接的斗争舞台就是本国，这是不言而喻的。所以，它的阶级斗争不是就内容来说，而是像《共产党宣言》所指出“就形式来说”是本国范围内的斗争。但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范围”，例如德意志帝国，本身在经济上又处在“世界市场的范围内”，而在政治上则处在“国家体系的范围内”。

任何一个商人都知道，德国的贸易同时就是对外贸易，而俾斯麦²¹先生的伟大恰好在于他实行一种**国际**的政策。

而德国工人党把自己的国际主义归结为什么呢？就是意识到它的意图所导致的结果将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这句话是从资产阶级的和平和自由同盟²²那里抄来的，它应当被当做各国工人阶级在反对各国统治阶级及其政府的共同斗争中的国际兄弟联合的等价物。这样，关于德国工人阶级的**国际职责**连一个字也没有提到！德国工人阶级就应当这样对付本国的、为反对工人阶级而已经同其他一切国家的资产者紧密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和俾斯麦先生的国际阴谋政策²³！

实际上，这个纲领的国际主义，比那个自由贸易派²⁴的国际主义**还差得难以估量**。自由贸易派也说，它的意图所导致的结果是“各民族的国际的兄弟联合”。但是它还**做一些事**使贸易成为国际性的，而决不满足于一切民族各自在本国内从事贸易的意识。

各国工人阶级的国际活动绝对不依赖于“**国际工人协会**”²⁵的存在。“国际工人协会”只是要为这种活动创立一个中央机关的第一个尝试；这种尝试由于它所产生的推动力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成绩，但是在巴黎公社失败之后，已经不能再以它的**第一个历史形态**继续下去了。

俾斯麦的《北德报》为了取悦于自己的主人，宣称德国工人党在新纲领中放弃了国际主义，它的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²⁶。

二

“德国工人党从这些原则出发，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和——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关于“自由”国家，我以后再讲。

这样，德国工人党将来就不得不相信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²⁷了！为了不让它埋没掉，竟胡说什么“废除工资制度（应当说：雇佣劳动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如果我废除了雇佣劳动，那末我当然也废除了它的规律，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还是海绵的。但是拉萨尔反对雇佣劳动的斗争几乎只是绕着这个所谓规律兜圈子。所以，为了证明拉萨尔派已经获得胜利，“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都应当被废除掉，而不是不连同后者。

大家知道，在“铁的工资规律”中，除了从歌德的“永恒的、铁的、伟大的规律”²⁸中抄来的“铁的”这个词以外，没有一样东西是拉萨尔的。“铁的”这个词是虔诚的信徒们借以互相识别的一个标记。但是，如果我接受带有拉萨尔印记因而是拉萨尔意义下的规律，那末我就不得不连同他的论据一块接受下来。这个论据是什么呢？正如朗格²⁹在拉萨尔死后不久的言行所表明的，这就是（朗格自己宣扬的）马尔萨斯的人口论³⁰。但是，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那末，我即使把雇佣劳动废除了一百次，也还废除不了这个规律，因为在

这种情况下，这个规律不仅支配着雇佣劳动制度，而且支配着一切社会制度。经济学家们五十多年以来正是以此为根据证明社会主义不能消除**自然本身造成的**贫困，而只能使它**普遍化**，使它同时分布在社会的整个表面上！

但是，这一切都不是主要的。**完全撇开**拉萨尔对这个规律的**错误**了解不谈，真正令人气愤的退步是在于：

自从拉萨尔死后，在**我们党内**，这样一种科学见解已经给自己开辟了道路，这就是**工资不是它表面上呈现的那种东西**，不是**劳动的价值或价格**，而只是**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的掩蔽形式**。这样，过去关于工资的全部资产阶级见解以及对这种见解的全部批评都被彻底推翻了，并且弄清了：雇佣工人只有为资本家（因而也为他们的剩余价值的分享者）白白地劳动一定的时间，才被允许为维持自己的生活而劳动，就是说，才被允许**生存**；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而现在，当这个见解已经在我们党内愈来愈给自己开辟出道路的时候，竟有人倒退到拉萨尔的教条那里去，虽然他们应当知道，拉萨尔并不懂得什么是工资，而是跟着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外表当做事物的本质。

这正像奴隶们最终发现了自己处于奴隶地位的秘密而举行起义时，其中有一个为陈旧观点所束缚的奴隶竟要在起义的纲领上写道：奴隶制度必须废除，因为在奴隶制度下，奴

隶的给养最大限度不能超过一定的、非常低的标准！

我们党的代表们对这个在党员群众中广泛传播的见解竟能进行这样惊人的侵犯，仅仅这一事实岂不就证明了他们在草拟妥协的纲领时轻率得多么令人不能容忍，多么缺乏责任感！

本段末尾“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这一不明确的语句，应当改成：随着阶级差别的消灭，一切由此差别产生的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也就自行消失。

三

“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生产合作社。无论在工业中，或是在农业中，生产合作社都必须普遍建立起来，以便从它们里面产生出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

在拉萨尔的“铁的工资规律”之后，就是这个先知提出的救世良方。这里“道路开辟”得确实不错。现存的阶级斗争被换上了拙劣的报刊作家的空话：需要“开辟道路”来“解决”的“社会问题”。“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不是从社会的革命转变过程中，而是从国家给予生产合作社的“国家帮助”中“产生出来”，并且这些生产合作社是由国家而不是由工人“建立起来”的。这真不愧为拉萨尔的幻想：靠国家贷款能够建设一个新社会，就像能够建设一条新

铁路一样！

由于还知道点羞耻，于是就把“国家帮助”置于……“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之下。

第一，德国的“劳动人民”大多数是农民而不是无产者。

第二，“民主的”这个词在德文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什么是“劳动人民的人民当权的监督呢”？何况所说的是这样的劳动人民，他们通过向国家提出的这些要求表明他们充分意识到自己既没有当权，也没有成熟到当权的程度！

在这里详细批评毕舍在路易—菲力浦时代为了对付法国社会主义者而开列并由“工场”³¹派的反动工人所采用的药方，那是多余的。主要的过失不在于把这个特殊的万灵药方写入了纲领，而在于从阶级运动的立场完全退到宗派运动的立场。

如果工人们力求在社会的范围内，首先是在本民族的范围内建立集体生产的条件，这只是表明，他们在争取变革现在的生产条件，而这同靠国家帮助建立合作社毫无共同之处。至于现存的合作社，那末只有它们是工人自己独立创设的，既不受政府的保护，也不受资产者的保护，才是可贵的。

四

现在我们来谈民主的一节。

A. “国家的自由基础”。

首先，照第二节的说法，德国工人党力求争取“自由国家”。

自由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呢？

使国家变成“自由的”，这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在德意志帝国，“国家”差不多是和俄国一样地“自由”。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站在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

德国工人党——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的时候——表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它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的社会也是一样）当做现存国家的基础（或者不把未来社会当做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

而且在纲领中还荒谬地滥用了“现代国家”、“现代社会”等字眼，甚至更荒谬地误解了向之提出自己要求的那个国家！

“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特殊的历史发展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发展了。“现代国家”却各不相同。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不一样，在英国同在美国不一样。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

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极重要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

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但是，这个纲领既没谈到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也没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纲领的政治要求除了陈旧的^①、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如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等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内容。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人民党、和平和自由同盟的回声。所有这些要求凡不属于空想的，都已经实现了。不过实现了这些要求的国家不是在德意志帝国内，而是在瑞士、美国等等。这类“未来的国家”就是现代的国家，虽然它是存在于德意志帝国的“范围”以外。

但是他们忘记了一点。既然德国工人党明确地声明，它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 19 卷中没有：陈旧的。——编者注

是在“现代民族国家”内，就是说，是在自己的国家即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进行活动，——否则，它的大部分要求就没有意义了，因为人们只要求他们所没有的东西——那末，它就不应该忘记主要的一点，这就是这一切美丽的东西都建立在承认所谓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只有在民主共和国内才是适宜的。

既然他们没有勇气^①——而这是明智的，因为形势要求小心谨慎——像法国工人纲领在路易-菲利浦和路易-拿破仑³²时代那样要求民主共和国，那就不应当采取这个既不“诚实”³³也不体面的手法：居然向一个以议会形式粉饰门面、混杂着封建残余、已经受到资产阶级影响、按官僚制度组织起来、并以警察来保卫的、军事专制制度的国家，要求只有在民主共和国里才有意义的东西，并且还庄严地向这个国家保证：他们认为能够用“合法手段”争得这类东西！

庸俗的民主派把民主共和国看做千年王国，他们完全没有想到，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最后的国家形式里阶级斗争要进行最后的决战，——就连这样的庸俗的民主派也比这种局限于为警察所容许而为逻辑所不容许的范围内的民主主义高明得多。

事实上，他们是把“国家”了解为政府机器，或者了解为构成一个由于分工而和社会分离的独特机体的国家，这可以从下面的话得到证明：“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实行统一的累进所得税……”。赋税是政府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有一个脚注：“1891年版是：既然他们不能”。——编者注

机器的经济基础，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在存在于瑞士的“未来国家”里，这种要求差不多已经实现了。所得税是以不同社会阶级的不同收入来源为前提，就是说，以资本主义社会为前提。所以，利物浦的财政改革派——以格莱斯顿的弟弟为首的资产者们——提出和这个纲领相同的要求，这是不足为奇的。

B. 德国工人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国家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基础：

1. 通过国家去实施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

平等的国民教育？他们怎样理解这句话呢？是不是以为在现代社会里（而所谈到的只能是现代社会）教育对一切阶级都可能是平等的呢？或者是要求上层阶级也被迫降到很低的教育水平——国民小学，即降到不仅唯一适合于雇佣工人的经济状况、而且唯一适合于农民的经济状况的教育水平呢？

“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实施免费教育”。前者甚至存在于德国，后者就国民小学来说存在于瑞士和美国。如果说，在美国的几个州里，高等学校也是“免费的”，那末，事实上这不过是从总税收中替上层阶级支付了教育费用而已。顺便指出，A. 项第5条所要求的“免费诉讼”也是如此。刑事诉讼到处都是免费的；而民事诉讼几乎只涉及财产纠纷，因而几乎只和有产阶级有关。难道它们应当用人民的金钱来打官司吗？

在关于学校的一段里，和国民小学一起至少还应当提出技术学校（理论的和实践的）。

“通过国家来实施国民教育”是完全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小学的经费、教员的资格、学习的科目等等，并且像美国那样通过国家视察员来监督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这和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两回事！相反地，应该使政府和教会一样地对学校不起任何影响。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他们会说，他们谈的是“未来的国家”，但是这种空洞的遁辞在这里也无济于事，——我们已经看到，在这方面是怎样一回事了），倒是国家需要从人民方面受到严格的教育。

但是整个纲领，尽管满是民主的喧嚣，却彻头彻尾地感染了拉萨尔派的对国家的忠顺信仰，或者说感染了并不比前者好一些的对民主奇迹的信仰，或者说得更正确些，它是这两种同样背离社会主义的对奇迹的信仰的妥协。

“科学自由”——普鲁士宪法中有一条就是这样写的。为什么把它写在这里呢？

“信仰自由”！如果现在，在进行“文化斗争”³⁴的时候，要想提醒自由主义者记住他们的旧口号，那末只有采用下面这样的形式才能做到这一点：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可能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就像实现自己的肉体需要一样^①，不受警察干涉。但是工人党本来应当乘此机会说出自己的看法：资产阶级的“信仰自由”不过是容忍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自由而已，而工人党却力求把信仰从宗教的妖术中解放出来。但是他们不愿越过“资产阶级的”水平。

①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德文版第19卷中这里有一个脚注：“1891年版是：实现自己的宗教需要……”。——编者注

现在我就要讲完了，因为纲领中接下去的部分在里面并不是主要的。所以我在这里只简单地谈一谈。

2. “正常的劳动日。”

其他任何国家的工人党都没有局限于这种含糊的要求，而总是明确地指出，在当前条件下多长的劳动日是正常的。

3. “限制妇女劳动和禁止童工。”

如果限制妇女劳动指的是劳动日的长短和工间休息等等，那末劳动日的正常化就应当已经包括了这个问题；否则，限制妇女劳动只能意味着在那些对妇女身体特别有害或者对女性不道德的劳动部门中禁止妇女劳动。如果指的就是这点，那就应当加以说明。

“禁止童工”！这里绝对必须指出**年龄界限**。

普遍禁止童工是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

实行这一措施——如果可能的话——是反动的，因为在按照各种年龄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的条件下，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

4. “对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国家监督。”

在普鲁士德意志这样一个国家里，应该明确地要求，工厂视察员只有经过法庭才能撤换；每个工人都可以向法庭告发视察员的失职行为；视察员必须是医生出身。

5. “调整监狱劳动。”

在一个一般的工人纲领里面，这是一种微不足道的要求。无论如何应该明白说出，工人们完全不愿意由于担心竞争而让一般犯人受到牲畜一样的待遇，特别是不愿意使他们失掉改过自新的唯一手段即生产劳动。这是应当期望于社会主义者的最低限度的东西。

6. “有效的责任法。”

应该说明，“有效的”责任法是指什么东西。

顺便指出，在关于正常劳动日的一条中，忽略了工厂立法中关于卫生设施和安全措施等等那一部分。只有当这些规定遭到破坏时，责任法才发生效力。

总之，这一部分也是写得很草率的。

我已经说了，我已经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写于 1875 年 4 月—5 月初

摘要载于 1890—1891 年《新时代》

杂志第 1 卷第 18 期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9 卷第 15—35 页

附 录

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

(1869 年在爱森纳赫通过)

I. 社会民主工党争取建立自由的人民国家。

II. 社会民主工党的每一成员必须竭力实现如下各项原则：

1. 现今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是极不合理的，因而必须最坚决地反对

2. 为劳动阶级的解放而斗争不是为阶级特权和优先权而斗争，而是为平等权利和平等义务，为消灭一切阶级统治而斗争。

3. 工人对资本家的经济依附性构成一切形式的奴役的基础，因此，社会民主工党在通过合作劳动消灭现今的生产方式(工资制度的条件下，争取使每个工人获得充分的劳动收入

4. 政治自由是劳动阶级经济解放的必不可少的前提。因此，社会问题同政治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前者的解决取决于后者，而且只有在民主国家中才有可能。

5. 鉴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解放和经济解放只有当工人阶级共同地和统一地进行斗争的时候才是可能的，社会民主工党承认自己是统一的组织，但是它也使每一个的成员能够利

用自己的影响来为整体的利益服务。

6. 鉴于工人的解放既不是一个地方的任务，也不是一个国家的任务，而是涉及一切具有现代社会的国家的社会任务，社会民主工党认为自己是一一在结社法允许的限度内一一国际工人协会的一个分支，并拥护它的一切努力。

III 社会民主工党主张把下列各点作为鼓动工作中的最近要求：

1. 凡年满二十岁的男子在国会、各该邦的议会、省和区的代表机构以及其它一切代表机关的选举中，都理享有普遍的、平等的、直接的和秘密的选举权。当选的代表应给以足够维持生活的薪俸。

2. 实行人民的直接立法制度（即提出和否决议案的权利）。

3. 废除等级、财产、出身和信仰的一切特权。

4. 以人民军队代替常备军。

5. 教会同国家分离，学校同教会分离。

6. 实行国民小学的义务教育，以及一切公立教育机构的免费教育。

7. 保证法庭的独立性，建立陪审法庭和专业法庭，实行正式的和口头的诉讼手续，实行免费诉讼。

8. 废除一切出版、集会和结社的法律；实行正常劳动日制度，限制妇女劳动，禁止儿童劳动。

9. 取消一切间接税，实行单一的直接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

10. 要求对合作社事业提供国家支持，对在民主保障下的自由的生产合作社给以国家信贷。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

(1875 年在哥达通过)

一、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普遍有益的劳动只有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全部劳动产品属于社会，即在普遍履行劳动义务的条件下，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的一切成员，按照每个人的合理需要属于每个人。

在现代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造成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

劳动的解放要求把劳动资料变为社会的公共财产，在用于公益目的的条件下对总劳动实行集体调节，公平分配劳动所得。这

劳动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的事情，对它来说，其他一切阶级只是反动的一帮。金丽

二、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从这些原则出发，力求用一切合法手段来争取自由国家和社会主义社会，通过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来粉碎铁的工资规律，废除任何形式的剥削，消除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不平等。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虽然首先是在民族范围内进行活动的，但是它意识到工人运动的国际性质并决心履行工人所承

担的一切义务，以便使一切人的兄弟联合成为现实。

为了替社会问题的解决开辟道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要求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监督下，依靠国家帮助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合作社。无论在工业中，或是在农业中，生产合作社都必须普遍建立起来，以便从它们里面产生出调节总劳动的社会主义组织。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要求把下列各项作为国家的基础：

1. 凡年满二十岁的国民在国家和地方的一切选举和投票中都享有秘密投票和义务投票的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和投票权。选举日或投票日必须定在星期日或节日。

2. 实行人民的直接立法制度。由人民决定宣战与媾和的问题。

3. 实行普遍军事训练。以人民军队代替常备名

4. 废除一切特别法律，尤其是关于出版、结社和集会的法律；废除限制自由发表意见、自由探讨和自由思想的一切法律。

5. 实行人民裁判。实行免费诉讼。

6. 通过国家实行普遍的和平等的国民教育。

实施普遍的义务教育。在一切学校实施免费教育。

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在现代社会内部提出下列要求：

1. 本着上述要求的精神尽可能扩大政治上的权利和自由。

2. 向国家和地方缴纳单一的累进所得税，取消一切现行的、特别是加重人民负担的间接税。

3. 保证无限的集会结社的权利。
4. 实行同社会需要相适合的正常劳动日。禁止星期日劳动。
5. 禁止童工和一切有害于健康和道德的妇女劳动。
6. 实行保护工人生命和健康的法律。监督工人住宅的卫生状况。通过工人选出的人员对矿山、工厂工业、作坊工业和家庭工业实行监督。实施有效的雇主责任法。
7. 调整监狱劳动。
8. 工人的互助基金和救济基金完全由工人自己管理。

注 释

- 1 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是对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的典范。这一著作于 1875 年 4—5 月初写成并于 1875 年 5 月 5 日寄给了爱森纳赫派的领导（给威·白拉克）。它包含了对将要合并的社会民主党的纲领草案的批评意见，这些意见是为在哥达举行的合并大会而准备的。

《哥达纲领批判》是恩格斯于 1891 年不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领导的反对而首先发表的。它当时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 1890-1891 年第 1 卷第 18 期上，并附有恩格斯的序言。

恩格斯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的同时，也一起发表了直接同它有关的马克思在 1875 年 5 月 5 日给威·白拉克的信。

正如大家从恩格斯 1891 年 2 月 23 日给卡·考茨基的信中所知道的，在发表《哥达纲领批判》时，恩格斯不得不同意缓和某些最尖锐的地方。收在本卷中的这一文件同马克思的手稿完全一致。

- 2 白拉克，威廉（1842-1880）——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不伦瑞克社会主义书籍的出版者，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创始人（1869）和领导人之一，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成员（1877—1879），接近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反对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分子，但不彻底。
- 3 在哥达代表大会上（1875 年 5 月 22-27 日），德国当时存在的两个工人组织——由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于 1869 年在爱森纳赫建立的并由他们领导的社会民主工党（所谓爱森纳赫派）和由哈森克莱维尔、哈塞尔曼和特耳克领导的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合并成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 4 盖布，奥古斯特（1842-1879）——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汉堡的书商；全德

工人联合会会员，1869年爱森纳赫代表大会的参加者和社会民主工党创始人之一，党的财务委员(1872—1878)，德意志帝国国会议员(1874—1877)。

奥艾尔，伊格纳茨(1846—1907)——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改良主义者，职业是鞍匠，社会民主党领导人之一，曾多次当选为国会议员。

倍倍尔，奥古斯特(1840—1913)——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旋工；1867年起领导德意志工人协会联合会，第一国际会员，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曾进行反对拉萨尔派的斗争，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二国际的活动家，在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初反对改良主义和修正主义，在他活动的后期犯过一系列中派性质的错误。

李卜克内西，威廉(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一国际会员，曾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进行反对拉萨尔主义、捍卫国际的原则的斗争，1867年起为国会议员，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人民国家报》编辑(1869—1876)和《前进报》编辑(1876—1878和1890—1900)，普法战争时期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捍卫巴黎公社，在某些问题上对待机会主义采取调和主义立场，1889、1891和1893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 5 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在反社会党人法取消后举行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0年10月16日根据哥达纲领要起草人威廉·李卜克内西的提议，决定起草一个新纲领草案，提交下届党代表大会讨论这个新纲领于1891年10月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被通过，一般称为爱尔福特纲领。
- 6 拉萨尔，斐迪南(1825—1864)——全德工人联合会创建人之一；支持在反革命普鲁士的霸权下“自上”统一德国的政策，在德国工人运动中创立了机会主义的派别。
- 7 巴枯宁，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1814—1876)——俄国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在第一国际内进行阴谋破坏活动，在海牙代表大会

(1872)上被开除出国际。

- 8 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于 1872 年 9 月 2-7 日举行。和过去历次代表大会相比，海牙代表大会按其组成来说是最有代表性的大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有代表十五个全国性组织的六十五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领导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战友们多年来为反对工人运动中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宗派主义而进行的斗争胜利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分裂活动受到谴责，他们的领导者巴枯宁等被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为将来建立各国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
- 9 1869 年 8 月 7-9 日在爱森纳赫举行了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社会民主党人的全德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即后来大家敦悉的爱森纳赫党。代表大会通过的纲领，即爱森纳赫纲领，总的来说，保持了国际的各项要求的精神。
- 10 德国人民党 成立于 1865 年，由主要是德国南部各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一部分资产阶级民主派组成。德国人民党反对确立普鲁士对德国的领导权。这个党执行反普鲁士政策，提出一般民主口号，同时也反映了德意志某些邦的分立主义意图。它宣传建立联邦制的德国的思想，反对以集中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形式统一德国。
- 1866 年，以工人为基本核心的萨克森人民党并入德国人民党。人民党的这支左翼，除了反普鲁士的情绪和力求共同努力以民主方法解决国家的全民族的统一问题之外，在实质上与原来的德国人民党毫无共同之点，以后它就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后来该党的基本成员脱离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于 1869 年 8 月参加了社会民主工党的建立工作。
- 11 指巴枯宁在他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所说的话，该书第 1 卷于 1873 年在瑞士出版。马克思在自己作的巴枯宁这本书的摘要中揭露了巴枯宁提出的责难是毫无根据的（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655-708 页）。

- 12 参看本文注 9。
- 13 拉萨尔派 是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和信徒。拉萨尔派认为可以用普鲁士反动政府资助工人合作社的办法把资本主义和平地改造为社会主义，他们主张用争取普选权的斗争和议会中的和平活动来代替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
- 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拉萨尔派，并指出他们“多年来一直是组织无产阶级的绊脚石，而最终成了警察手中的简单工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36 页）。在马克思的著作《哥达纲领批判》（见本书第 91-123 页）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中对拉萨尔派的理论观点和策略做了批判。
- 14 贝克尔，伯恩哈特(1826-1882)——德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拉萨尔分子，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1864—1865)，后来加入爱森纳赫派，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
- 15 指马克思亲自校订的《资本论》第 1 卷的法文译本，这一译本于 1872—1875 年在巴黎分册出版。
- 16 《人民国家报》出版社是社会民主工党的出版社，它附属于中央机关报《人民国家报》编辑部。
- 17 指马克思的著作《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0 第 8 卷第 457—536 页）的第二版，它是由《人民国家报》出版社于 1875 年在莱比锡出版的。
- 18 卢梭，让·雅克(1712-1778)——杰出的法国启蒙运动者，民主主义者，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
- 19 指 1874 年 1 月 10 日的帝国国会选举。
- 20 马克思在这里大概是把《新社会民主党人报》的主编哈赛尔讽刺地称为马拉。

《新社会民主党人报》(《Neuer Sozial-Demokrat》)是1871年至1876年在柏林每周出版三次的德文报纸,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该报的方针完全反映了拉萨尔派所执行的迎合俾斯麦制度和巴结德国统治阶级的政策,反映了拉萨尔派领导人的机会主义和民族主义。该报站在宗派主义的立场上,一贯反对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领导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工党,支持巴枯宁分子和其他反无产阶级流派的人们所进行的仇视总委员会的活动。

- 21 俾斯麦,奥托(1815—1898)——公爵,普鲁士和德国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普鲁士容克(地主)的代表,曾任驻彼得堡大使(1859—1862)和驻巴黎大使(1862);普鲁士首相(1862—1872和1873—1890);北德意志联邦首相(1867—1871)和德意志帝国首相(1871—1890),以反革命的方法实现德国的统一,工人运动的死敌,1878年颁布了反社会党人非常法。
- 22 和平和自由同盟是由一批小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维·雨果朱·加里波第等人曾积极参加)于1867年在瑞士建立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组织,1867—1868年米·巴枯宁参加了同盟的工作。起初,同盟在巴枯宁的影响下企图利用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协会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和平和自由同盟曾声称通过建立“欧洲联邦”可以消除战争,以此在群众中散布荒谬的幻想,诱使无产阶级放弃阶级斗争。
- 23 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在1871—1872年,斯麦企图同奥地利和俄国签订一个正式协定,目的是要共同迫害革命运动,特别是第一国际。1873年10月,根据俾斯麦的倡议,缔结了所谓三国同盟,即德国、俄国和奥匈帝国三国政府之间就一旦发生“欧洲动荡”采取共同行动的协定。
- 24 自由贸易派主张自由贸易和国家不干涉国内的经济生活。自由贸易派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那里形成了所谓曼彻斯特学派,即反映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的一个派别。在曼彻斯特领导自由贸易运动的是1838年组织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四十至五十年代,自由贸易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治集团,以后加入了英国自由党。

25 国际工人协会 即第一国际,1864 年秋由马克思创立。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持的第一国际,领导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并同蒲鲁东义、巴枯宁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反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巩固了各国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在 1872 年海牙代表大会后实际上已停止活动,1876 年正式宣布解散。第一国际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奠定了工人国际组织的基础,使工人做好向资本进行革命进攻的准备。(见《列宁全集》第 29 卷第 274 页)。

26 马克思指的是 1875 年 3 月 20 日《北德总汇报》就德国社会民党的领草案发表的一篇社论;社论指出,“社会民主党的鼓动在某些方面变得比较谨慎了;它在背弃国际”。

《北德总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是德国保守派的日报,十九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是俾斯麦政府的半官方报纸 1861 年至 1918 年在柏林出版。

27 拉萨尔对他的“铁的工资规律”作了如下的表述“这个在现今的关系之下,在劳动的供求的支配之下,决定着工资的规律是这样的平均工资始终停留在一国人民为维持生存和繁殖后代按照习惯所要求的生活水平上。

这是这样的一个中心点:实际日工资总是在它周围摆动,既不能长久地高于它,也不能长久地低于它。实际的日工资不能长期地高于这个平均数,因为,否则就会由于工人状况的改善而发生工人人口从而人手供应的增加,结果又会把工资压低到原来的或者低于原来的水平。

工资也不可能长期地大大低于这个必要的生活水平。因为,那时就会发生人口外流、独身生活、节制生育,以至最后由于贫困而造成工人人数减少等现象,这样,就会使工人人手的供应短缺,从而使工资重新回到它原来的较高的水平。因此,实际的平均工资处于运动之中,始终围绕着它这个重心上下摆动,时而高些,时而低些。”(见《工人读本,拉萨尔 1863 年 5 月 17 和 19 日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演讲》1887 年霍廷根—苏黎世版)

拉萨尔最初是在《就莱比锡全德工人代表大会的召开给中央委员会

- 的公开答复》(1863 年黎世版第 15-16 页)中论述这个“规律”的。
- 28 引自歌德的诗《神圣的》。
- 29 朗格, 弗里德里希·阿尔伯特(1828-1875)-29 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 新康德主义者, 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敌人。
- 30 指弗·阿·朗格在其著作《工人问题对现在和将来的意义》1865 年杜伊斯堡版第 144—161、180 页(《Die Arbeiterfrage in ihrer Bedeutung für Gegenwart und Zukunft》. Duisburg, 1865, S. 144—161, 180)上所发表的言论。
- 31 “工场”(《L' Atelier》)是一种法文月刊, 受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手工业者和工人的刊物, 1840 年至 1850 年在巴黎出版, 编辑部由工人代表组成, 每三月改选一次。
- 32 路易-菲利浦(1773-1850)--奥尔良公爵, 法国国王(1830-1848)。
拿破仑第三(路易-拿破仑·波拿巴)(1808-1873)一拿破仑第一的侄子, 第二共和国总(1848-1851), 法国皇帝(1852--1870)。一第 117 页。
- 33 人们把爱森纳赫派称为“诚实的人”。
- 34 “文化斗争”是资产阶级自由派给俾斯麦政府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采取的一套法律措施所起的名称。这套措施是在为世俗文化而斗争的幌子下实行的, 其目的是反对天主教, 反对支持德国西南部中小各邦的官吏、地主和资产阶级的分裂主义和反普鲁士倾向的“中央”党。在八十年代, 俾斯麦为了纠集反动力量把这些措施中的大部分取消了。

恩格斯

论权威¹

有些社会主义者近来开始了一次真正的十字军征讨，来反对他们称之为**权威原则**的东西。他们只要宣布这种或那种行为是**权威的**，就足以给它定罪了。这种简单化的方法竟被滥用到这种地步，以致必须比较详细地来分析一下这个问题。这里所说的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但是，既然这两种说法都不好听，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又使服从的一方感到难堪，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否可以不要这种关系呢，我们能不能——在现代社会中既有的条件下——创造出另一种社会制度来，使这个权威成为没有意义的东西而归于消失呢。我们只要考察一下作为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基础的那些经济关系，即工业关系和农业关系，就会发现，它们有一种使各个分散的活动愈来愈为人们的联合活动所代替的趋势。代替各个分散的生产者的小作坊的，是拥有庞大工厂的现代工业，在这种工厂中有数百个工人操纵着蒸汽发动的复杂机器；大路上的客运马车和货运马车已被铁路上的火车所代替，小型帆船和内海帆船已被轮船所代替。甚至在农业中，机器和蒸汽也愈来愈占统治地位，它们正缓慢地但却一贯地使那些靠雇佣工人耕作

大片土地的大资本家来代替小自耕农。可见，联合活动、互相依赖的工作过程的复杂化，正在取代各个人的独立活动。但是，联合活动就是组织起来，而没有权威能够组织起来吗？

我们假定，社会革命推翻了现在以自己的权威支配财富的生产和流通的资本家。我们再完全按照反权威主义者的观点来假定，土地和劳动工具都成了那些使用它们的工人的集体财产。在这种情况下，权威将会消失呢，还是只会改变自己的形式？我们就来看一看。

就拿纺纱厂做例子罢。棉花至少要经过六道连续工序才会成为棉纱，并且这些工序大部分是在不同的车间进行的。其次，为了使机器不断运转，就需要工程师照管蒸汽机，需要技师进行日常检修，需要许多工人把生产品由一个车间搬到另一个车间等等。所有这些劳动者——男人、女人和儿童——都被迫按照那根本不管什么个人自治的蒸汽权威决定的时间开始和停止工作。所以，劳动者们首先必须商定劳动时间；而劳动时间一经确定，大家就要毫无例外地一律遵守。其次，在每个车间里，时时都会发生有关生产过程、材料分配等局部问题，要求马上解决，否则整个生产就会立刻停顿下来。不管这些问题是怎样解决的，是根据领导各该劳动部门的代表的决定来解决的呢，还是在可能情况下用多数表决的办法来解决，个别人的意志总是要表示服从，这就是说，问题是靠权威来解决的。大工厂里的自动机器，比任何雇用工人的小资本家要专制得多。至少就劳动时间而言，可以在这些工厂的大门上写上这样一句话：**进门者请放弃一切自治²！**如果说人靠科学和创造天才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对

人进行报复，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从一种真正的专制，而不管社会组织怎样。想消灭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即想消灭蒸汽纺纱机而恢复手纺车。

再拿铁路做例子。这里，无数人的合作也是绝对必要的；为了避免不幸事故，这种合作必须依照准确规定的时间来进行。在这里，活动的首要条件也是要有有一个能处理一切所属问题的起支配作用的意志，——不论体现这个意志的是一个代表，还是一个负责执行有关的大多数人的决议的委员会，都是一样。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一个表现得很明显的权威。不仅如此，假如铁路员工对乘客先生们的权威被取消了，那末，第一趟开出的列车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但是，能最清楚地说明需要权威，而且是需要最专断的权威的，要算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船了。那里，在危险关头，要拯救大家的生命，所有的人就得立即绝对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先生们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这些深奥的思想家，简直是开我们的玩笑。

这样，我们看到，一方面是一定的权威，不管它是怎样造成的，另一方面是一定的服从，这两者，不管社会组织怎样，在产品的生产和流通赖以进行的物质条件下，都是我们所必需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生产和流通的物质条件，不可

避免地随着大工业和大农业的发展而复杂化，并且趋向于日益扩大这种权威的范围。所以，把权威原则说成是绝对坏的东西，而把自治原则说成是绝对好的东西，这是荒谬的。权威与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拚命反对字眼。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也太少了吗？

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运动。在

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

写于 1872 年 10 月 1873 年 3 月

原文意大利文

载于 1873 年 12 月《1874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共和国年鉴》文集

第 18 卷第 341—344 页

注 释

- 1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应《人民报》编辑恩·比尼亚米的屡次请求为《共和国年鉴》这本文集而写的。比尼亚米向恩格斯提出这个请求最早是在 1872 年 7 月。1872 年 11 月 3 日，比尼亚米通知说，他已收到了恩格斯的文
章，但由于比尼亚米被捕，文章丢失了。1873 年 3 月恩格斯寄给比尼亚米《论权威》一文，比尼亚米在 1873 年 12 月予以发表。

马克思，特别是恩格斯在 1872 年期间同无政府主义对意大利工人阶级的影响进行了斗争，恩格斯在为《人民报》写的一系列论文中批判了无政府主义。恩格斯的这篇论文和马克思为那本文集而写的论文《政治冷淡主义》，是团结在《人民报》周围的社会主义者的组织同无政府主义进行斗争的理论基础。

《人民报》（《La Plebe》）是一家意大利报纸由恩·比尼亚米主编。1868 年至 1875 年在洛迪出版；1875 年至 1883 年在米兰出版；七十年代初以前是资产阶级民主派报纸，后来是社会主义的报纸，1872 年至 1873 年是国际支部的机关报，支持总委员会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刊登过国际的文件和恩格斯的文
章。

- 2 恩格斯套用了但丁的长诗“神曲”，“地狱篇”第三歌第三节地狱大门上的题词。

恩 格 斯

劳动在从猿到人 转变过程中的作用¹

政治经济学家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其实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但是劳动还远不止如此。它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

在好几十万年以前，在地质学家叫作第三纪的地球发展阶段的某个还不能确切肯定的时期，据推测是在这个阶段的末期，在热带的某个地方——大概是现在已经沉入印度洋底的一片大陆，生活着一种特别高度发展的类人猿。达尔文²曾经向我们大致地描述了我们的这些祖先：它们满身是毛，有须和尖耸的耳朵，成群地生活在树上。³

这些猿类，大概首先由于它们的生活方式的影响，使手在攀援时从事和脚不同的活动因而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帮助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现在还活着的一切类人猿，都能直立起来并且单凭两脚

向前移动。但是它们只是在迫切需要的时候才这样做，并且非常不灵便。它们自然的走法是半直立的姿势，而且需要用手来帮助；大多数的类人猿是以捏成拳头的手的指节骨支撑在地上，两腿蜷起，使身体穿过长臂之间前进，就像跛子撑着两根拐杖行走一样，一般讲来，我们现在还可以在猿类中间观察到从四肢行走到两脚行走的一切过渡阶段。但是一切猿类都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候才用两脚行走。

如果说我们遍体长毛的祖先的直立行走，一定是首先成为惯例，而后来才渐渐成为必然，那未必须有这样的前提：手在这个时期已经愈来愈多地从事于其它活动了。在猿类中手和脚的运用已经有了某种分工。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攀援时手和脚是有不同用途的手主要是用来摘取和拿住食物，就像比较低级的哺乳动物用前掌所作的那样。有些猿类用手在树林中筑巢，或者像黑猩猩一样在树枝间搭棚以避风雨。它们用手拿着木棒抵御敌人或者以果实和石块向敌人投掷。它们在被捉住以后用手做出许多简单的模仿人的动作。但是，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甚至和人最相似的猿类的不发达的手和经过几十万年的劳动而高度完善化的人手之间，有多么巨大的差别。骨节和筋肉的数目和一般排列，在两种手中是相同的，然而即使最低级的野蛮人的手，也能做几百种为任何猿手所模仿不了的动作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

因此，我们的祖先在从猿转变到人的好几十万年的过程中逐渐学会了使自己的手适应于一些动作，这些动作在开始时只能是非常简单的。最低级的野蛮人，甚至那种可以认为

已向更加近似兽类的状态倒退而同时身体也退化了的野蛮人，也总还是远远高出于这种过渡期间的生物。在人用手把第一块石头做成刀子以前，可能已经经过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和这段时间相比，我们所知道的历史时间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但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完成了：**手变得自由了**，能够不断地获得新的技巧，而这样获得的较大的灵活性便遗传下来一代一代地增加着。

所以，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是由于劳动，由于和日新月异的动作相适应，由于这样所引起的肌肉、韧带以及在更长时间内引起的骨骼的特别发展遗传下来，而且由于这些遗传下来的灵巧性以愈来愈新的方式运用于新的愈来愈复杂的动作，人的手才达到这样高度的完善，在这个基础上它才能仿佛凭着魔力似地产生了拉斐尔的绘画、托尔瓦德森的雕刻以及帕格尼尼的音乐⁴。

但是手并不是孤立的。它仅仅是整个极其复杂的机体的一个肢体。凡是有利于手的，也有利于手所服务的整个身体，而且这是从两方面进行的。

首先是由于达尔文所称的生长相关律。依据这一规律，一个有机生物的个别部分的特定形态，总是和其它部分的某些形态相联系的，虽然在表面上和这些形态似乎没有任何关联。例如，一切具有无细胞核的红血球并以两个骨节(颞骨)来联结后脑骨和第一节脊椎骨的动物，无例外地都有乳腺来哺育幼子。同样地，哺乳动物中的偶蹄通常是和那用来反刍的复杂的胃囊相联系的。身体某一部分的形态的改变，总是引起其它部分的形态的改变，虽然我们还不能解释这种联系。

蓝眼睛的纯白猫总是或差不多总是聋的。人手的逐渐灵巧以及与此同时发生的脚适应于直立行走的发展，由于这种相关律，无疑地也要反过来作用于机体的其它部分。但是这种作用现在还研究得太少，所以我们在这里只能作一般的叙述。

更重要得多的是手的发展对其余机体的直接的、可证明的反作用。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社会化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社会化的动物，显然不可能从一种非社会化的最近的祖先发展而来。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在每一个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帮助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需要产生了自己的器官：猿类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了发出一个个清晰的音节。

语言是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的，这是唯一正确的解释，拿动物来比较，就可以证明。动物之间，甚至在高度发展的动物之间，彼此要传达的东西也很少，不用分音节的语言就可以互相传达出来。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一种动物感觉到不能说或不能听懂人的语言是一种缺陷。如果它们经过人的驯养，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狗和马在和人的接触中所养成的对于分音节的语言的听觉是这样敏锐，以致它们在自己的想象所及的范围内，能够容易地学会懂得任何一种语

言。此外，它们还获得了如对人依恋、感谢等等表现感情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它们以前所没有的。和这些动物常接触的人不能不相信：这些动物现在常常感觉到不能说话是一种缺陷。不过可惜它们的发音器官已经向一定的方向专门发展得太厉害了，所以无论如何这种缺陷是补救不了的。但是，只要有了发音器官，这种不能说话的情形，在某种限度内是可以克服的。鸟的口部器官和人的口部器官肯定是根本不同的，然而鸟是唯一能学会说话的动物，而且在鸟里面是具有最讨厌的声音的鹦鹉说得最好。我们别再说鹦鹉不懂得它自己所说是怎么了。它一连几小时唠唠叨叨地反复说它那几句话，的确是出于它十分喜欢说话和喜欢跟人往来。但是在它的想象所及的范围内，它也能学会懂得它所说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把骂人的话教给鹦鹉，使它能够想象得到这句话的意思（这是从热带回来的水手们的一种主要娱乐），然后惹它发怒，那末我们马上会看到：它会象柏林沿街叫卖蔬菜的女人一样正确地使用它的骂人的话。它在乞求好吃的东西时，情况也是这样。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就大小和完善的程度来说，远远超过前者。在脑髓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它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步发展起来了。正如语言的逐渐发展必然是和听觉器官的相应完善化同时进行的一样，脑髓的发展也完全是和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化同时进行的。鹰比人看得远得多，但是人的眼睛识别东西却远胜于鹰。狗比人

具有更锐敏得多的嗅觉，但是它不能辨别在人看来是各种东西的特定标志的气味的百分之一。至于触觉（猿类刚刚有一点儿最粗糙的萌芽），只是由于劳动才随着人手本身的形成而形成。

脑髓和为它服务的感官、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对劳动和语言起作用，为二者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愈来愈新的推动力。这种进一步的发展并不是在人最终同猿分离时就停止了，而是整个说来仍然大踏步地前进，虽然在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时代就程度和方向来说是不同的，有时甚至由于局部的和暂时的退步而中断；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生了新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获得了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确定的方向。

从攀树的猿群进化到人类社会之前，一定经过了几十万年——这在地球的历史上只不过是人的生命中的一秒钟^①。但是人类社会最后毕竟出现了。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是劳动，猿群满足于把它们由于地理位置或由于抗拒了附近的猿群而分得的地区内的食物吃光。它们为了获取新的食物地区而进行迁徙和斗争，但是除了无意识地用自己的粪便来施肥，它们没有能力从这块食物地区得到比自然界所供给的更多的东西。一旦己的粪便来施肥，它们没有能力从这块食物地区得到比自然界所供给的更多的东西。一旦所有可能占据的食物地区都被占据了，猿类就不能再扩大

① 这方面的第一权威威廉·汤姆生爵士曾经计算过：从地球冷却，以致地面上能够生长植物和动物的时候起，大概已经过去了一亿多年。

繁殖了；动物的数目最多只能和往常一样。但是一切动物对食物都是非常浪费的，并且常常摧毁还在胚胎状态中的食物。狼不象猎人那样爱护第二年就要替它生小鹿的牝鹿；希腊的山羊不等幼嫩的灌木长大就把它们吃光，它们把这个国家所有的山岭都啃得光秃秃的。动物的这种“滥用资源”在物种的渐变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因为它逼迫着动物去适应和平常吃的不一样的食物，因此它们的血液就有了和过去不一样的化学成分，整个身体的结构也渐渐变得不同了，至于一下子固定下来的物种，那就灭绝了。毫无疑问，这种滥用资源有力地促进了我们的祖先转变成人。在智力和适应能力都比其它一切猿类高得多的一种猿类那里，这种滥用资源必然造成的结果，是食料植物的数目愈来愈增大，食料植物中可食用的部分也愈来愈加多，总之，就是食物愈来愈复杂，因而输入身体内的材料也愈来愈复杂，而这些材料就是这种猿转变成人的化学条件。但是，这一切还不是真正的劳动。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我们所发现的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根据所发现的史前时期的人的遗物来判断，根据最早历史时期的人和现在最不开化的野蛮人的生活方式来判断，最古老的工具是些什么东西呢？是打猎的工具和捕鱼的工具，而前者同时又是武器。但是打猎和捕鱼的前提，是从只吃植物转变到同时也吃肉，而这又是转变到人的重要的一步。肉类食物几乎是现成地包含着为身体新陈代谢所必需的最重要的材料，它缩短了消化过程以及身体内其它植物性的即与植物生活相适应的过程的时间，因此赢得了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材料和更多的精力来过真正动物的生活。这种在形成

中的人离植物界愈远，他超出于动物界也就愈高。正如既吃肉也吃植物的习惯，使野猫和野狗变成了人的奴仆一样，既吃植物也吃肉的习惯，大大地促进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体力和独立性。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肉类食物对于脑髓的影响；脑髓因此得到了比过去多得多的为本身的营养和发展所必需的材料，因此它能够一代一代更迅速更完善地发展起来。请素食主义者先生们原谅，如果不吃肉，人是不会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的，即使在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民族中，有一个时期曾因吃肉而吃起人来（柏林人的祖先，韦累塔比人或维耳茨人，在十世纪还吃他们的父母）⁵，但是在今天这对于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肉类食物引起了两种新的有决定意义的进步，即火的使用和动物的驯养。前者更加缩短了消化过程，因为它为口提供了可说是已经半消化了的食物；后者使肉类食物更加丰富起来，因为它和打猎一起开辟了新的更经常的食物来源，除此以外还供给了就养分来说至少和肉相等的象牛乳及乳制品一类的新的食物，这样，这两种进步就直接成为人的新的解放手段。一件一件地详细地谈它们的间接的影响，未免离题太远了，虽然对于人类和社会的发展来说，这些影响也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正如学会了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一样，人也学会了在任何气候下生活。人分布在所有可以居住的地面上，人是唯一能独立自主地这样做的动物。其它的动物，虽然也习惯于各种气候，但不是独立自主地，而只是跟着人学会这样做的，例如家畜和寄生虫就是这样从原来居住的总是一样炎热的地

带，迁移到比较冷的、在一年中分成冬夏两季的地带后就产生了新的需要：需要有住房和衣服来抵御寒冷和潮湿，需要有新的劳动领域以及由此而来的新的活动，这就使人离开动物愈来愈远了。

由于手、发音器官和脑髓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共同作用，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愈来愈高的目的。劳动本身一代一代地变得更加不同、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除打猎和畜牧外、又有了农业，农业以后又有了纺纱、织布……冶金、制陶器和航行。同商业和手工业一起，最后出现了艺术和科学；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法律和政治发展起来了，而且和它们一起，人的存在在人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宗教，也发展起来了。在所有这些首先表现为头脑的产物并且似乎统治着人类社会的东西面前，由劳动的手所制造的较为简易的产品就退到了次要的地位；何况能计划怎样劳动的头脑在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例如，在原始的家庭中），已经能不通过自己的手而是通过别人的手来执行它所计划好的劳动了。迅速前进的文明完全被归功于头脑，归功于脑髓的发展和活动，人们已经习惯于以他们的思维而不是以他们的需要来解释他们的行为（当然，这些需要是反映在头脑中，是被意识到的）。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便产生了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特别是从古代世界崩溃时起，就统治着人的头脑。它现在还非常有力地统治着人的头脑，甚至达尔文学派的最富有唯物精神的自然科学家们还弄不清人类是怎样产生的，因为他们在唯心主义的影响下，没有认识到劳动在这中间所起的作用。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动物通过它们的活动也改变外部自然界，虽然在程度上不如人所作的那样。我们也看到：由动物改变了的环境，又反过来作用于原先改变环境的动物使它们起变化。因为在自然界中没有孤立发生的東西。事物是互相作用着的，并且在大多数情形下，正是忘记了这种多方面的运动和相互作用，阻碍我们的自然科学家去看清最简单的事物。我们已经看到：山羊怎样阻碍希腊森林的恢复；在圣海伦岛，第一批航海者带来的山羊和猪，把岛上旧有的一切植物几乎全吃光了，因而为后来的水手和移民所带来的植物的繁殖准备了地方。但是，如果说动物不断地影响它周围的环境，那末，这是无意地发生的，而且对于动物本身来说是偶然的事情。但是人离开动物愈远，他们对自然界的作用就愈带有经过思考的、有计划的、向着一定的和事先知道的目标前进的特征。动物在消灭某一地方的植物时，并不明白它们是在干什么。人消灭植物，是为了在这块腾出来的土地上播种五谷，或者种植树木和葡萄，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可以得到多倍的收获。他们把有用的植物和家畜从一个国家带到另一个国家，这样把全世界的动植物都改变了。不仅如此，植物和动物经过人工培养以后，在人的手下改变了它们的模样，甚至再也不能认出它们本来的面目了。我们至今还没有发现那演化成为谷类的野生植物。我们那些彼此如此不同的狗，或者我们那些种类繁多的马，究竟是从哪一种野生动物演化而来的，始终还是一个争论的问题。

但是，不用说，我们并不想否认，动物是具有从事有计划的、经过思考的行动的能力的。相反地，凡是有原生质和

有生命的蛋白质存在和起反应，即完成某种即使是由外面的定的刺激所引起的极简单运动的地方，这种有计划的行动，就已经以萌芽的形式存在着这种反应甚至在还没有细胞（更不用说什么神经细胞）的地方，就已经存在着。食虫植物捕获食物的方法，虽然完全是无意识的，但在某一方面也表现出是有计划的。动物从事有意识有计划的行动的能力，和神经系统的发展相应地发展起来了，而在哺乳动物那里则达到了已经相当高的阶段。在英国猎狐的时候，每天都可以观察到：狐是怎样正确地运用它关于地形的丰富知识来躲避它的追逐者，怎样出色地知道和利用一切有利的地势来中断它的踪迹。在我们的那些由于和人类相处而有比较高度的发展的家畜中间，我们每天都可以观察到一些和小孩的行动具有同等程度的机灵的行动。因为，正如母腹内的人的胚胎发展史，仅仅是我们的动物祖先从虫豸开始的几百万年的肉体发展更的一个缩影一样，孩童的精神发展是我们的动物祖先、至少是比较近的动物祖先的智力发展的一个缩影，只是这个缩影更加简略一些罢了。但是一切动物的一切有计划的行动，都不能在自然界上打下它们的意志的印记。这一点只有人能做到。

一句话，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它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而造成这一区别的还是劳动^①。

但是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

^① 在页边写着：“改良”。——编者注

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美索不达米亚、希腊小亚细亚以及其它各地的居民，为了想得到耕地，把森林都砍完了，但是他们想不到这些地方今天竟因此成为荒芜不毛之地，因为他们使这些地方失去了森林，也失去了积聚和贮存水分的中心⁶。阿尔卑斯山的意大利人，在山南坡砍光了在北坡被十分细心地保护的松林，他们没有预料到，这样一来，他们把他们区域里的高山牧畜业的基础给摧毁了；他们更没有预料到，他们这样做，竟使山泉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内枯竭了，而在雨季又使更加凶猛的洪水倾泻到平原上。在欧洲传播栽种马铃薯的人，并不知道他们也把瘰癧症和多粉的块根一起传播过来了。因此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相反地，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存在于自然界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它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

事实上，我们一天天地学会更加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的惯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较近或比较远的影响。特别从本世纪自然科学大踏步前进以来，我们就愈来愈能够认识到，因而也学会支配至少是我们最普通的生产行为所引起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地不仅感觉到，而且也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而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类和自然、灵魂和

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也就愈不可能存在了，这种观点是从古典古代崩溃以后在欧洲发生并在基督教中得到最大发展的。

但是，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末我们想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我们已经提到过马铃薯以及随它而来的瘰癧症的传播。但是，和工人的生活降低到吃马铃薯这一事实对世界各国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所发生的影响比起来瘰癧症算得了什么呢？1847年，爱尔兰因马铃薯受病害的缘故发生了大饥荒，饿死了一百万吃马铃薯或差不多专吃马铃薯的爱尔兰人，并且有两百万人逃亡海外，和这种饥荒比起来，瘰癧症算得了什么呢？当阿拉伯人学会蒸馏酒精的时候，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却因此制造出使当时还没有被发现的美洲的土人逐渐灭种的主要工具。后来，当哥伦布⁷发现美洲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因此复活了在欧洲久已绝迹的奴隶制度，并奠定了贩卖黑奴的基础。十六世纪和十八世纪从事创造蒸汽机的人们也没有料到，他们所造成的工具，比其它任何东西都更会使全世界的社会状况革命化，特别是在欧洲，由于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而绝大多数人则一无所有，起初是资产阶级获得了社会的和政治的统治，而后就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发生阶级斗争，这一阶级斗争，只能以资产阶级的崩溃和一切阶级对立的消灭而告终。但是经过长期的常常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分析，我们在这一领域中，也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的间接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因而我们就

有可能也去支配和调节这种影响。

但是要实行这种调节，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到目前为止存在过的一切生产方式，都只在于取得劳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那些只是在以后才显现出来的、由于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发生作用的进一步的结果，是完全被忽视的。原始的土地公有制，一方面适应于眼界完全局限于眼前事物的人们的发展程度，另一方面则以可用土地的一定剩余为前提，这种剩余的土地提供了一定的活动余地来对付这种原始经济的不虞的灾祸。剩余的可用土地用尽了，公有制也就衰落了。而一切较高的生产形式，都导致居民的分为不同的阶级，因而导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对立；因此，只要生产不局限于被压迫者的最必需的生活用品，统治阶级的利益就成为生产的推动因素。在西欧现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这一点表现得最完全，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不仅如此，甚至就连这个有益效果本身——只就所制造的或交换来的商品的效用而言——也完全退居次要地位了；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

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即古典政治经济学，主要只研究人在生产和交换中的行为所产生的可以直接预期的社会影响。这完全适应于这样一种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的理论表现就是这种社会科学。当一个资本家为着直接的利润去进行生

产和交换时，他只能首先注意到最近的最直接的结果。一个厂主或商人在卖出他所制造的或买进的商品时，只要获得普通的利润，他就心满意足，不再去关心以后商品和买主的情形怎样了。这些行为的自然影响也是如此。当西班牙的种植场主在古巴焚烧山坡上的森林，认为木灰作为能获得最高利润的咖啡树的肥料足够用一个世代时，他们怎么会关心到，以后热带的大雨会冲掉毫无掩护的沃土面只留下赤裸裸的岩石呢？在今天的生产方式中，对自然界和社会，主要只注意到最初的最显著的结果，然后人们又感到惊奇的是：为达到上述结果而采取的行为所产生的比较远的影响，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在大多数情形下甚至是完全相反的；需要和供给之间的协调，变成二者的绝对对立，每十年一次的工业循环的过程展示了这种对立，德国在“崩溃”⁸中也体验到了这种对立的小小的前奏；建立在劳动者本人的劳动之上的私有制必然发展为劳动者的丧失一切财产，而同时一切财富却愈来愈集中到不劳动者的手中；而[……] ^①

写于 1873—1883 年

节选选自《自然辩证法》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0 卷第 509—521 页

① 手稿到此中断。——编者注

注 释

- 1 在《自然辩证法》第二束材料的目录中，恩格斯对这篇论文所加的标题就是这样的。这篇论文原来打算用作以《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Die drei Grundformen der Knechtschaft》）为题的一本内容较广的著作的导言。后来，恩格斯把这个标题改为《对工人的奴役。导言》（《Die Knechtung des Arbeiters. Einleitung》）。但是由于该著作没有完成，恩格斯终于给他已经写成的导言部分加上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标题，这个标题符合手稿基本部分的内容。这篇论文很可能是1876年6月写成的。可以作为这个说法的佐证的，是威·李卜克内西1876年6月10日给恩格斯的信，李卜克内西在信中写道：他迫不及待地等待着恩格斯答应给《人民国家报》写的著作《奴役的三种基本形式》。这篇论文1896年第一次发表于《新时代》杂志第14年卷第2卷第545—554页。
- 2 达尔文，查理·罗伯特（1809—1882）——伟大的英国自然科学家，科学的生物进化学的奠基人。
- 3 见查·达尔文《人类起源和性的选择》第6章《论人类的血缘和谱系》Ch.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Vol. I, London, 1871）。
- 4 拉斐尔·桑蒂（1483—1520）——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意大利画家。
托尔瓦德森，倍尔特（1768—1844）——著名的丹麦雕刻家。
帕格尼尼，尼古洛（1782—1840）——伟大的意大利提琴家和作曲家。
- 5 恩格斯指的是雅·格林的著作《古代德国法律》1828年哥丁根版第488页

(J. Grimm. 《Deutsche Rechtsalterthümer》. Göttingen, 1828, S. 488) 所引用的德国修道士拉贝奥·诺特克尔(约952—1022)的证明材料。恩格斯在其未完成的著作《爱尔兰史》中引证了诺特克尔的这个材料(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6卷第559页)。

- 6 在关于人类活动影响植物界和气候的变化问题上,恩格斯利用了卡·弗腊斯的著作《各个时代的气候和植物界》1847年兰德斯胡特版(C. Fraas. 《Klima und Pflanzenwelt in der Zeit》. Landshut, 1847)。马克思在1868年3月25日的信中曾请恩格斯注意这本书。
- 7 哥伦布,克里斯托弗尔(1451—1506)发现美洲的杰出的航海家,在西班牙供职,热那亚人。
- 8 指187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在德国,危机于1873年5月以“大崩溃”开始,这是一直延续到七十年代末的长期危机的序幕。

《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写于1847年12月—1848年1月。1848年2月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形式发表,共23页。1848年3月至7月《宣言》又在德国流亡者的民主派机关报《德意志伦敦报》上连载。1848年在伦敦重印了《宣言》的德文本共30页。这个版本是后来经马克思和恩格斯赞同的各种版本的基础。《宣言》在1848年译成许多种欧洲文字(法文、波兰文意大利文丹麦文佛来米文和瑞典文)。在1848年的各种版本中未提作者的名字。1850年英国宪章派的机关刊物《红色共和党人》在登载《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文时,该杂志的编辑乔·哈尼在序言中第一次指出作者的名字。

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

第一个给社会主义、因而也给现代整个工人运动提供了科学基础的人——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生在特利尔。起初他在波恩和柏林研究法学，但不久就专门致力于研究历史和哲学，并且在1842年已经准备当哲学副教授讲授哲学了，然而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¹死后所发生的政治运动，却使他终生转到了另一个方向。在他的参加下，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领袖康普豪森先生和汉泽曼²先生等人，在科伦创办了³，由于马克思对莱茵省议会辩论的批评引起了极大的注意，1842年秋他被聘为该报的主笔。的出版当然是经过检查的，但检查机关对它也没有办法^①。差不多总是能登载必要的文章；先是给检查官送一些次要的材料让他去删除，一直到他自行让步，或者在第二天出不了报纸的威胁下不得不让步为止。如果再有十种像那样有勇气的报纸，而出版人又不惜额外花上几百塔勒排版费的话，那末德国的书报检查早在1843年就无法进行了。可是德国的报馆老板都是些卑微胆怯的庸人，所以《莱

① 第一个对进行检查的是警察顾问多里沙尔，就是他曾把《科伦日报》⁴上关于斐拉雷特（后来的萨克森国王约翰）译但丁“神曲”一书的广告删去，并且批示说“神圣的东西不可作戏曲”。

茵报》是孤军作战。它把检查官一个个都弄得一筹莫展。最后，对它规定了双重检查，在它受过第一次检查之后，行政区长官还要最后检查一次。但是这样也无济于事。1843年初，政府声称对这个报纸无可奈何，就干脆把它封闭了。

马克思（这时他已经同后来的反动大臣冯·威斯特华伦的妹妹结婚）迁到了巴黎，在那里和阿·卢格⁵一起开始出版《德法年鉴》⁶，他在该刊物上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开端，陆续写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的文章。后来他和恩格斯共同出版了《神圣家族。驳布鲁诺·鲍威尔及其伙伴》一书，这是针对当时德国哲学唯心主义的最后一种表现形式所作的讽刺性的批判。

马克思除了研究政治经济学和法国大革命史而外，还总是腾出时间利用适当机会抨击普鲁士政府；普鲁士政府对他进行了报复，1845年春天，它指使基佐内阁下令把马克思驱逐出法国⁸。亚历山大·冯·洪堡⁹先生大概在这件事情上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马克思移居布鲁塞尔，并于1847年和1848年在那里用法文先后发表了《哲学的贫困》一书，即对蒲鲁东的《贫困的哲学》一书的批判，以及《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同时，他在布鲁塞尔创立了德意志工人协会¹⁰，从而开始了实际的鼓动工作。1847年他和他的政治上的朋友加入已存在多年的秘密的共产主义者同盟¹¹之后，实际的鼓动工作对于他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了。同盟的全部组织这时已根本改造了；这个先前多少是密谋性的团体，现在变成了一个平常的、只是不得已才是秘密的共产主义宣传组织，变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个组织。凡是有德意志工人协会的

地方，就有这个同盟存在；英国、比利时、法国、瑞士几乎所有的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以及德国很多工人协会的领导成员，都加入了同盟，同盟在初生的德国工人运动中尽的力量很大。同时我们的同盟第一个强调指出了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并且在实际上证明了这点，——它的成员中有英国人、比利时人、匈牙利人、波兰人和其他国籍的人，并且还举行了（特别在伦敦）许多国际工人会议。

在 1847 年召开的两次代表大会上，同盟进行了改组。第二次大会决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起草一篇宣言，把党的基本原则规定下来并公布于世。《共产党宣言》就是这样产生的，它第一次发表在 1848 年二月革命前不久，后来被译成欧洲几乎所有的文字。

马克思参加了《德意志—布鲁塞尔报》¹²，该报无情地揭露了祖国在警察统治下的太平状况，普鲁士政府又以此为借口要求把马克思驱逐出境，不过没有成功。可是，当布鲁塞尔由于二月革命影响也开始发生民众骚动，看来比利时就要发生革命的时候，比利时政府就毫不客气地把马克思逮捕起来并把他驱逐出境了。这时法国临时政府通过弗洛孔¹³，邀请他重返巴黎，他接受了这个邀请。

当时在巴黎的德国人策划把在法国的德国工人编成武装军团，利用这种军团把革命和共和制度输入德国，马克思到了巴黎，首先就反对这种冒险。因为一方面，德国应该自己来实现自己的革命；另一方面，在法国组织的任何外籍的革命军团，都会被临时政府的拉马丁¹⁴之流事先出卖给所要推翻的那个政府，比利时和巴登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三月革命以后，马克思迁到科伦，在那里创办了《新莱茵报》¹⁵，这个报纸从1848年6月1日出版到1849年5月19日，是当时民主运动中唯一代表无产阶级观点的报纸。单从它对1848年6月巴黎起义者表示无条件声援的事实中就可以明白看出这点，为此，差不多全体股东都脱离了这家报纸。《十字报》¹⁶曾指责《新莱茵报》攻击一切圣物——上自国王和帝国摄政王，下至宪兵，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当时有8000守备部队的普鲁士要塞内——的行为是“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¹⁷；突然变得反动的莱茵省自由主义庸人们表示了愤怒；1848年秋天科伦的戒严状态迫使《新莱茵报》停刊了很久；法兰克福的帝国司法部曾要求科伦的检察官对该报一篇又一篇的文章提出诉讼，——这一切都没有用，报纸在警察面前仍然从容地继续编辑和印行，而且它的销行和声誉随着它对政府和资产阶级的尖锐攻击愈益扩大了。1848年11月普鲁士发生政变时，《新莱茵报》在每号报头上号召人民抗税，以暴力对付暴力。1849年春天，报纸曾因为这一点，另外还因为一篇文章，被告到陪审法庭，但两次都宣判无罪。最后，1849年德勒斯顿和莱茵省的五月起义¹⁸被镇压下去了，在集结和动员相当大的兵力以后，普鲁士开始了对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讨伐，这时政府认为自己已经十分巩固，足以采用暴力来消灭《新莱茵报》了。该报在6月19日用红色油墨印了最后的一号。

马克思又到了巴黎，但在1849年6月13日示威¹⁹以后几个星期，法国政府迫使他选择一条路：或者是迁到布列塔尼，或者是离开法国。他选择了后一条路，迁到伦敦，在这

里一直住到现在。

以评论性杂志形式继续出版《新莱茵报》²⁰的尝试（1850年于汉堡），不久就因反动势力日益猖獗而只好放弃。1851年12月法国发生政变以后不久，马克思发表了《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纽约出版；第2版于1869年，即战争以前不久在汉堡发行）。1853年间他写了《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最初在巴塞尔发行，其后在波士顿发行，最近又在莱比锡发行）。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盟员在科伦被判罪以后，马克思离开了政治鼓动工作，一方面在十年内专心研究英国博物馆图书馆中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丰富藏书，另一方面又为《纽约每日论坛报》²¹写稿，该报在美国国内战争爆发以前，不仅经常刊载了由他署名的通讯，而且发表了他写的许多论欧洲和亚洲形势的社论。他根据对英国官方文件的仔细研究而写成的抨击帕麦斯顿²²勋爵的激烈论文，在伦敦被翻印成小册子。

他多年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成果，就是1859年问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柏林敦克尔出版社版）。在这部著作中第一次有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的价值论，包括货币学说在内。在意大利战争期间，马克思在伦敦出版的德文《人民报》²³上既反对当时涂上自由主义色彩、装扮成被压迫民族解放者的波拿巴主义²⁴，也反对当时普鲁士企图在中立的幌子下混水摸鱼的政策。同时他还得反击卡尔·福格特²⁵先生，因为此人在当时受拿破仑亲王（普隆—普隆）委托，由路易一拿破仑支薪来进行鼓动，主张德国保持中立，甚至表示同情。福格特有意制造最卑鄙的谣言诬蔑马克思，而马克

思便以《福格特先生》一书（1860年伦敦版）来回击他。在这本书里，马克思揭露了福格特和帝国主义的假民主集团中其他先生的面目，并且根据内部和外部的材料揭发了福格特已被十二月帝国²⁶所收买。整整十年以后，这件事被证实了：1870年在土伊勒里宫发现的并为九月政府公布的波拿巴雇佣人员名单里，在相应的字母下面写着：“福格特——1859年8月付给他4万法郎。”²⁷

最后，1867年在汉堡出版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这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这部著作叙述了他的经济学观点和社会主义观点的基础，以及他对现存社会、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进行的批判的基础。这一划时代的著作的第二版于1872年问世，现在作者正进行第二卷定稿修琢工作。

这时欧洲各国的工人运动又十分壮大了，以致马克思有可能来考虑实现他的宿愿：创立一个包括欧美最先进国家的工人协会，这个协会无论是在工人自己眼中或是在资产阶级及各国政府眼中，都可以说是活生生地表明社会主义运动的国际性质，使无产阶级欢欣鼓舞，使无产阶级的敌人恐慌畏惧。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圣马丁堂为声援当时再次遭到俄国蹂躏的波兰而召开的群众大会，为提出这项建议创造了条件，建议被热烈地通过了。国际工人协会²⁸成立了；在大会上选出了一个临时总委员会，驻在地设在伦敦。从这一届起到海牙代表大会²⁹时止，每届总委员会的灵魂都是马克思。国际总委员会所发表的一切文件，自1864年的成立宣言至1871年的法兰西内战这篇宣言，几乎都是由他起草的。叙述

马克思在国际中的活动，就等于编写这个协会本身的历史，而欧洲工人对协会仍然记忆犹新。

巴黎公社的失败，使国际陷于不能存在的境地。国际被推到欧洲历史舞台前面的时候，也正是它在各地无法再进行任何有成效的实际行动的时候。事变把它提到第七强国³⁰的地位，同时又不允许它动员并运用自己的战斗力量，否则就必然要失败并会使工人运动遭受几十年的压制。况且从各方面还出现了一些分子，企图利用协会迅速提高的声誉来满足个人的功名欲或个人的虚荣心，他们不了解或不顾及国际的真正处境。当时必须作出一种勇敢的决定，而作出这种决定并使之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得到通过的又正是马克思。国际郑重决定，它不对丧失理智的、卑鄙齷齪的分子的中坚——巴枯宁³¹主义者的行动负任何责任；其次，鉴于国际在普遍反动的情况下不可能满足对它提出的过高的要求，并且要继续充分进行活动，就非使工人运动付出许多流血牺牲的代价不可，于是它暂时退出了舞台，决定把总委员会迁到美国。后来事情的发展证明这个在当时和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受到指责的决定是多么正确。这样，一方面杜绝了任何想借国际名义进行无谓盲动的企图；另一方面，各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之间从未间断过的密切联系证明，国际所启发的关于各国无产阶级利益一致和相互团结的觉悟，即使没有一个定形的国际联合会，仍然能够为自己开拓前进的道路，而这样一个联合会的纽带在当时是会变成一种桎梏的。

在海牙代表大会以后，马克思终于得到了宁静和空暇来重新做他的理论工作，因而他的《资本论》第二卷可望不久

就能付印。

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这里我们只能谈到两点。

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史观上实现了变革。以前所有对于历史的见解，都以下述观念为基础：一切历史变动的最终原因，应当到人们变动着的思想中去寻求，并且在一切历史变动中，最重要的、决定全部历史的是政治变动。可是，人的思想究竟从哪里来的，政治变动的动因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没有人发问过。只有在法国史学家和部分英国史学家的新学派中，才产生了一种信念，认为欧洲历史的动力——至少从中世纪起——是新兴资产阶级为争取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同封建贵族所作的斗争。而马克思则证明，过去的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可是，这些阶级是由于什么而产生和存在的呢？是由于当时存在的物质的、可以实际感觉到的条件，即各该时代社会借以生产和交换必要生活资料的那些条件。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依靠的是自给自足的小规模的农民公社的经济，这种公社差不多所有消费品都是自己生产而几乎没有交换关系，并由好战的贵族保护它们不受外敌侵害，使它们具有民族的或者至少是政治的联系。当城市产生，而独立的手工业和最初在国内后来在国际上的商业流转也随之产生的时候，城市资产阶级就发展起来了，这种资产阶级早在中世纪时期，就已经在反对贵族的斗争中争得了在封建制度内同样作为一个特权等级的地位。可是随

着十五世纪中叶以后欧洲以外的世界的发现，资产阶级得到了一个更广大得多的通商地区，从而也得到了发展自己工业的新刺激；在一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中，手工业被已经具有工厂性质的工场手工业所排挤，而工场手工业又被大工业所排挤，这种大工业是由于前一世纪的各种发明，特别是由于蒸汽机的发明才可能建立的。大工业又反过来影响商业，排斥落后国家里的旧式手工劳动，而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建设起现代的新式交通工具——轮船、铁路和电报。这样，资产阶级日益把社会财富和社会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虽然它在长时期内还未能取得政权，政权仍然操在贵族和靠贵族支持的王权手里，但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在法国是从大革命起——它把政权也夺到手了，于是它对于无产阶级和小农说来就成了统治阶级。从这个观点来看，在充分认识了该阶段社会经济状况（而我们那些历史学专家却完全没有这种认识）的条件下，一切历史现象都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明，而每一历史时期的观念和思想也同样可以极其简单地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这些条件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首先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历史上应有的权威此时终于被承认了。

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证明了：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抗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

是一直存在的；人类的大多数总是注定要从事艰苦的劳动和过着悲惨的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只是在人类发展的以前一切阶段上，生产还是如此不发达，以致历史的发展只能在这种对抗形式中进行，历史的进步整个说来只是极少数特权者的事，广大群众则不得不为自己谋取微薄的生活资料，而且还必须为特权者不断增殖财富。这种历史观以上述方法对以往的阶级统治作了自然而合理的解释，不然这种阶级统治就只能用人的恶意来解释，可是这同一个历史观还使我们得到这样的信念：由于现时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把人分成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的最后根据，至少在最先进的国家里已经消失了；统治的大资产阶级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不但不能再领导社会，甚至变成了生产发展的障碍，如各国的商业危机——尤其是最近的一次大崩溃³²——和工业受压抑的状况就是证明；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转到这个由于自己的整个社会地位只有用完全消灭任何阶级统治、任何奴役和任何剥削的方法才能解放自己的阶级手中，社会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资产阶级不能控制的程度，只等待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去掌握它，以便建立这样一种制度，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组织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所制成的产品增长到能够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日益得到满足的程度。

马克思的第二个重要发现，就是彻底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揭露了在现代社会内，在现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怎样进行的。自从政

治经济学提出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价值的源泉这个原理以后，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个问题：雇佣工人拿到的不是他的劳动所生产的全部价值量，而必须把一部分价值交给资本家，这一情况怎么能和上面的原理相容呢？不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者或是社会主义者都企图对这个问题作出有科学根据的答复，但都徒劳无功，直到最后才由马克思作出了解答。他的解答如下：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以两个社会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一方面是资本家阶级，他们占有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他们没有这一切而仅有一种商品即劳动力可以出卖，而他们是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获取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但是商品价值是由商品生产中、从而也是商品再生产中物化的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的；所以，一个平常人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这一天、一月或一年的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数量里面物化的劳动量来决定的。假定一个工人一天的生活资料需要6小时的劳动来生产，或者也可以说，它们所包含的劳动相当于6小时的劳动量；在这种场合，一天的劳动力的价值，还要表现为体现6小时劳动的货币量。再假定说，雇用这个工人的资本家付给他这个数目，即付给他劳动力的全部价值。这样，如果工人每天给这个资本家做6小时的工，那他就完全抵偿了资本家的支出，即以6小时的劳动抵偿了6小时的劳动。在这种场合，这个资本家当然是什么也没有得到；因此，他对事情有完全不同的想法，他说，我购买这个工人的劳动力不是6个小时，而是一整天，因此他就根据情况强迫工人劳动8小时、10小时、12小时、14小时或者更多的时间，

所以第七、第八和以后各小时的产品就是无偿劳动的产品，直接落到资本家的腰包里。这样，给这个资本家做事的工人，不仅再生产着他那由资本家付酬的劳动力的价值，而且还额外地生产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起先被这个资本家占有，然后按一定的经济规律在整个资本家阶级中进行分配，组成为地租、利润、资本积累的源泉，即非劳动阶级所消费或积累的一切财富的源泉。这样也就证明了，现代资本家，也像奴隶主或剥削农奴劳动的封建主一样，是靠占有他人无偿劳动发财致富的，而所有这些剥削形式彼此不同的地方只在于占有这种无偿劳动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这样一来，有产阶级的所谓现代社会制度中占支配地位的是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协调这一类虚伪的空话，就失去了最后的根据，于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就像以前的各种社会一样被揭穿：它也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断缩减的少数人剥削绝大多数人的庞大机构。

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两个重要根据之上的。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这两个发现以及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研究方面的其他同样重要的科学发现，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挥，从而在第一卷还没有涉及到的政治经济学的那些方面，也会受到根本变革。愿马克思有可能不久就把第二卷付印。

写于 1877 年 6 月中

原文是德文

载于 1878 年不伦瑞克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发行的《人民历书》丛刊

第 19 卷第 115 — 125 页

注 释

- 1 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1840)。
- 2 康普豪森, 卢道夫(1803-1890)——德国银行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 1848年3—6月任普鲁士首相, 奉行同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 普鲁士驻中央政权的使节(1848年7月—1849年4月)。
汉泽曼, 大卫(1790-1864)——德国大资本家, 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 1848年3—9月任普鲁士财政大臣, 奉行同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
- 3 见本书第 79 页《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注 3。
- 4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是德国的一家日报, 自 1802 年起即以此名称在科伦出版;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和在此以后的反动统治时期, 该报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的怯懦和背叛的政策; 它经常猛烈地攻击《新莱茵报》。
- 5 卢格, 阿尔诺德(1802-1880)——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资产阶级激进派, 1848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五十年代是在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 1866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 6 见本书第 80 页《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注 7。
- 7 鲍威尔, 布鲁诺(1809-188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 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 资产阶级激进派, 1866 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写有许多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
- 8 恩格斯指的是法国政府在普鲁士政府的压力下于 1845 年 1 月 16 日下达的将马克思和《前进报》(见本书第 279 页《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注

- 5) 某些撰稿人驱逐出法国的命令。
- 9 洪堡, 亚历山大(1769-1859)—德国学者, 自然科学家和旅行家。
- 10 见本书第 81 页《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注 13。
- 11 见本书第 65 页《共产党宣言》注 3。
- 12 《德意志—布鲁塞尔报》(《*Deutsche-Brüsseler-Zeitung*》) 是侨居布鲁塞尔的德国流亡者创办的; 1847 年 1 月创刊, 1848 年 2 月停刊。起初, 该报的方针是由它的编辑、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伯恩施太德决定的, 他力图调和民主营垒的各种派别。但从 1847 年夏天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战友在该报发表文章以后, 报纸就日益成了宣传革命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喉舌。1847 年 9 月起, 马克思和恩格斯成了该报的经常撰稿人并对该报的方针发生直接影响, 1847 年最后几个月, 他们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该报的编辑工作。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领导下, 该报成了形成中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机关报。
- 13 弗洛孔, 斐迪南 (1800-1866) —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改革报》编辑之一, 1848 年为临时政府成员。
- 14 拉马丁, 阿尔丰斯 (1790-1869) —法国诗人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四十年代为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1848 年任外交部长, 是临时政府的实际上的首脑。
- 15 见本书第 82 页《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注 15。
- 16 《十字报》(《*Kreuz-Zeitung*》) 是《新普鲁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 的别名 (因报头上印有后备军的十字章图样), 是德国的一家日报。1848 年 6 月至 1939 年在柏林出版, 该报是反命的宫廷奸党和普鲁士容克(地主), 以及后来的德国保守党极右派的喉舌。

- 17 秦波拉索峰是南美科迪勒拉山脉的最高峰之一。“粗卤无礼的秦波拉索峰”，意即粗卤无礼到了极点。
- 18 1849年5月3-8日在德勒斯顿发生了武装起义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帝国宪法和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担任首相，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几乎没有参加斗争，工人和手工业者在街垒战中起了主要作用。起义遭到政府军队和开抵萨克森的普鲁士军队的镇压。德勒斯顿起义为捍卫帝国宪法的斗争奠定了基础。这一斗争是在1849年5-7月期间在德国南部和西部发生的，斗争以民主力量的失败告终。
- 19 1849年6月13日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了一次和平示威，抗议派遣法国军队去镇压意大利的革命，破坏法兰西共和国的宪法——该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别国人民的自由。这次示威被军队驱散，它的失败证实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破产。6月13日以后，当局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
- 20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12月创办、1850年11月停刊的杂志。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理论和政治刊物，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1849年革命期间出版的《新莱茵报》的续刊。该杂志从1850年3月至11月底总共出了六期，其中有一期是合刊（5、6两期合刊）。杂志在伦敦编辑，在汉堡印刷。在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还有纽约，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打算在侨居美国的德国流亡者中间发行这个杂志。杂志的绝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支持者如威·沃尔弗、约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人撰稿。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杂志上发表的著作有：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3--499页），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127-235和383-483页），以及其他一些著作。这些著作总结了1848-1849年的革命，进一步制定了革命无产阶级

政党的理论和策略。杂志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缺乏而停办。

- 21 见本书第 83 页《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注 17。
- 22 帕麦斯顿子爵，亨利·约翰·坦普尔(1784-1865)—英国国家活动家，初为托利党人，1830 年起为辉格党领袖之一，依靠该党右派，曾任军务大臣(1809—1828)，外交大臣(1830-1834、1835-1841 和 1846-1851)，内务大臣(1852-1855)和首相(1855-1858 和 1859-1865)。
- 23 《人民报》(《Das Volk》)是一家周报，从 1859 年 5 月 7 日至 8 月 20 日在伦敦用德文出版。该报是作为伦敦的德意志工人共产主义教育协会的机关报而创办的。第 1 号由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埃拉尔特·比斯康普出版。从第 2 号起，该报就在马克思的密切参与下出版，从 7 月初起马克思实际上成了该报的编辑。该报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出发，分析了 1859 年意大利战争中的事件，德国统一问题和意大利统一问题，对波拿巴主义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该报总共出版了十六期，1859 年 8 月 20 日该报因缺乏资金而停刊。
- 24 波拿巴主义是大资产阶级依靠暴力和欺骗进行统治的一种形式，产生于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波拿巴·拿破仑统治时期，在拿破仑第三统治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列宁指出：“波拿巴主义是君主制在丧失了旧有的宗法制或封建制的牢靠支柱以后所采取的顺风转舵的手段，这样的君主制不得不竭力维持平衡以防跌倒，卖尽笑脸以便统治，实行收买以便讨好，同社会渣滓、同公开的小偷和骗子讲交情以便不单单靠刺刀维持下去。”(见《列宁全集》第 15 卷第 245 页)波拿巴主义的统治方法是各国资产阶级所惯用的统治方法，在一定阶段是反革命统治的主要形式。
- 25 福格特，卡尔(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 年是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 年 6 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1849 年逃离德国，五十至六十年代是路

易·波拿巴雇用的密探，对无产阶级革命家进行诬蔑性攻击的积极参与者之一，马克思在抨击性著作《福格特先生》(1860)中揭露了他。

- 26 指第二帝国。1851年12月2日波拿巴派发动政变，这次政变的结果是1852年12月2日在法国建立了第二帝国(1852-1870年)的波拿巴政体。
- 27 《皇室文件和通信》1870—1871年巴黎版第1-2卷(《Papiers et correspondance de la famille impériale》.Tomes I—II, Paris, 1870--1871),第2卷第161页。
- 28 见本书第137页《哥达纲领批判》注25。
- 29 见本书第133页《哥达纲领批判》注8。
- 30 十九世纪时所谓欧洲强国有六个:俄国、德国 30 奥地利、英国、法国和意大利。
- 31 巴枯宁主义是一种无政府主义思潮，因米·亚·巴枯宁而得名。巴枯宁主义主张阶级平等，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鼓吹工人阶级放弃一切政治活动。巴枯宁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把国家看做是一切祸害的根源主张立即废除一切国家，实现无政府状态。巴枯宁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凶恶敌人。巴枯宁及其拥护者在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中进行阴谋分裂活动，妄图篡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1872年巴枯宁被开除出第一国际。
- 巴枯宁主义者的理论和策略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严厉批判。列宁称巴枯宁主义是“绝望的小资产者的世界观”(见《列宁全集》第18卷第11页)。巴枯宁主义是民粹派的思想根源之一。
- 32 指1873年席卷奥地利、德国、美国、英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俄国和其他国家的一次经济危机，这次危机的特点是猛烈而深刻。

恩 格 斯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¹

—

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起初表现为十八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

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那时，如黑格尔所说的，是世界用头立地的时代^①，最初，这句话的意思是：人的头脑以及通过它的思维发现的原理要求成为一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后来这句话又有了更广泛的含义：和这些原理矛盾的现实，实际上被上下颠倒了。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

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做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从今以后，迷信、偏私、特权和压迫，必将为永恒的真理，为永恒的正义，为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所排挤。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的王国；永恒的正义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得到实现；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的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而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³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也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十八世纪的伟大思想家们，也和他们的一切先驱者一样，没有能够超出他们自己的时代所给予他们的限制。

但是，除了封建贵族和作为社会所有其余部分的代表出现的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还存在着剥削者和被剥削者、游

① 关于法国革命黑格尔这样写道：“正义思想、正义概念立刻得到了公认，非正义的旧支柱不能对它作任何抵抗。因此，正义思想现在就成了宪法的基础，今后一切都必须以它为根据。自从太阳照耀在天空而行星围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起，还从来没有看到人用头立地，即用思想立地并按照思想去构造现实。阿那克萨哥拉第一个说，Nûs 即理性支配着世界；可是直到现在人们才认识到思想应当支配精神的现实。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能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第一次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谐。”（黑格尔《历史哲学》1840年版第535页²）难道现在不应当用反社会党人法去反对已故的黑格尔教授的这种危险的颠复学说吗？

手好闲的富人和从事劳动的穷人之间的一般的对立。正是由于这种情形，资产阶级的代表才能标榜自己不是其一特殊的阶级的代表，而是整个受苦人类的代表。不仅如此，资产阶级从它产生的时候起就背负着自己的对立面：资本家没有雇佣工人就不能生存，而且，随着中世纪的行会师傅发展成为现代的资产者，行会帮工和行会外的短工便相应地发展成为无产者。虽然总的说来，市民等级在**和贵族斗争时**有权认为自己同时代表当时的各个劳动阶级的利益，但是在每一个大的资产阶级运动中都爆发过作为现代无产阶级的多少发展了的先驱者的那个阶级的独立运动。例如，德国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时期的再洗礼派和托马斯·闵采尔，英国大革命时期的平均派⁴，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贝夫⁵。伴随着一个还没有成熟的阶级的这些革命武装起义，产生了相应的理论表现：在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有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⁶，而在十八世纪已经有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了；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苦修苦练的、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是这个新学说的第一个表现形式。后来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⁷。在圣西门那里，除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欧文在资本主义生产最发达的国家里，在这种生产所造成的种种对立的影响下，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出发，系统地制定了他的消除阶级差别的方案。

所有这三个人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不是作为当时已经

历史地产生的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代表出现的。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想建立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但是他们的王国和启蒙学者的王国是有天壤之别的。按照这些启蒙学者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不正义的，所以也应该像封建制度和以往的一切社会制度一样被抛到垃圾堆里去。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只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五百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我们已经看到，为革命作了准备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家们，如何求助于理性，把理性当做一切现存事物的唯一的裁判者。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国家、理性的社会，要求无情地铲除一切和永恒理性相矛盾的东西。我们也已经看到，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因此，当法国革命把这个理性的社会和这个理性的国家实现了的时候，新制度就表明，不论它较之旧制度如何合理，却决不是绝对合乎理性的。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卢梭的社会契约在恐怖时代获得了实现，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丧失了信心的资产阶级为了摆脱这种恐怖，起初求助于腐败的督政府，最后则托庇于拿破仑的专制

统治。⁸ 早先许下的永久和平变成了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理性的社会的遭遇也并不更好一些。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并没有在普遍的幸福中得到解决，反而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他特权的废除，由于减弱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现在已经实现的脱离封建桎梏的“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是把他们的被大资本和大地主的强大竞争所压垮的小财产出卖给这些大财主的自由，于是这种“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说来就变成了失去财产的自由；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现金交易，如卡莱尔所说的，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犯罪的次数一年比一年增加。如果说，以前在光天化日之下肆无忌惮地干出来的封建罪恶虽然没有消灭，但终究已经暂时被迫收敛了，那末，以前只是暗中偷着干的资产阶级罪恶却更加猖獗了。商业日益变成欺诈。革命的箴言“博爱”⁹在竞争的诡计和嫉妒中获得了实现。贿赂代替了暴力压迫，金钱代替了刀剑，成为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初夜权从封建领主手中转到了资产阶级工厂主的手中。卖淫增加到了前所未闻的程度。婚姻本身和以前一样仍然是法律承认的卖淫的形式，是卖淫的官方的外衣，并且还以不胜枚举的通奸作为补充。总之，和启蒙学者的华美约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那时只是还缺少指明这种失望的人，而这种人随着世纪的转换出现了。1802年出版了圣西门的《日内瓦书信》；1808年出版了傅立叶的第一部著作，虽然他的理论基础在1799年就已经奠定了；1800

年1月1日，欧文担负了新拉纳克的管理工作。¹⁰

但是，在这个时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在英国刚刚产生的大工业，在法国还完全没有。但是，一方面，只有大工业才能发展那些使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生产方式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消灭成为绝对必要的冲突——不仅是大工业所产生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冲突，而且是它所产生的生产力和交换形式本身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大工业又正是通过这些巨大的生产力来发展解决这些冲突所必需的手段。因此，如果说，在1800年左右，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在开始形成，那末，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期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从而能够引导资产阶级革命（甚至是反对资产阶级的）达到胜利，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持久的。在当时才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等级，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

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缺点；消除这些缺点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

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既然这一点已经确定，我们就不再谈论现在已经完全属于过去的这一方面了。让著作界的小贩们去一本正经地挑剔这些现在只能使人发笑的幻想吧，让他们以自己的严谨的思维方式优越于这种“疯狂的念头”而自我陶醉吧。使我们感到高兴的，倒是处处突破幻想的外壳而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和天才思想，而这些却是那班庸人所看不见的。

圣西门是法国大革命的产儿，他在革命爆发时还不到三十岁。这次革命，是第三等级即**从事生产和贸易**的多数国民对以前享有特权的**游手好闲**的等级即贵族和僧侣的胜利。但是，很快就暴露出，第三等级的胜利只是这个等级中的一小部分人的胜利，是第三等级中享有社会特权的阶层即资产阶级夺得政治权力。而且这个资产阶级还在革命过程中就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这是因为它通过没收后**加以拍卖**的贵族和教会的地产进行了投机，同时又以承办军用品欺骗了国家。正是这些骗子的统治在督政府时代使法国和革命濒于复灭，从而使拿破仑得到举行政变的借口。因此，在圣西门的头脑中，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之间的对立就采取了“劳动者”和“游手好闲者”之间的对立的形式。游手好闲者不仅是指旧时的特权分子，而且也包括一切不参加生产和贸易而靠租息为生的人。而“劳动者”不仅是指雇佣工人，而且也包括厂主、商人和银行家。游手好闲者失去了精神领导和政治统治的能力，这已经是确定无疑的，而且由革命最终证实了。至于无财产者没有这种能力，在圣西门看来，这已由恐怖时期的经

验所证明。那末，应当是谁来领导和统治呢？按照圣西门的意见，应当是科学和工业，它们两者由一种新的宗教纽带，即必然是神秘的和等级森严的“新基督教”结合起来，而这种纽带的使命就是恢复从宗教改革时起被破坏了宗教观点的统一。可是，科学就是学者，而工业首先就是积极的资产者，厂主、商人、银行家。这些资产者固然应当成为一种公众的官吏、社会所信托的人，但是对工人还应当保持发号施令和享有经济特权的地位。至于银行家，那末正是他们应当担负起通过调节信用来调节整个社会生产的使命。——这样的见解是完全适应于大工业以及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在法国还只是刚刚产生的那个时代的。但是，圣西门特别强调的是：他随时随地都首先关心“人数最多和最贫穷的阶级”（《la classe la plus nombreuse et la plu spauvre》）的命运。

圣西门在日内瓦书信中已经提出这样一个论点：

“一切人都应当劳动。”

在同一部著作中他已经指出，恐怖统治是无财产的群众的统治。

他们高声说道：“看吧，当你们的伙伴在统治法国的时候，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造成了饥荒！”¹¹

但是，了解到法国革命是阶级斗争，并且不仅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而且是贵族、资产阶级和无财产者之间的阶级斗争，这在1802年是极为天才的发现。在1816年，圣西门宣布说政治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并且预言说政治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¹²。虽然经济状况是政治制度的基础这样的认

识在这里仅仅以萌芽状态表现出来，但是对人的政治统治应当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这种思想，即最近纷纷议论的“废除国家”的思想，已经明白地表达出来了。同样比他的同时代人优越的是：在 1814 年联军刚刚开进巴黎以后，接着又在 1815 年百日战争时，他声明，法国和英国的同盟以及这两个国家和德国的同盟是欧洲的繁荣和和平的唯一保障¹²。在 1815 年向法国人宣传要和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建立同盟，这确实既要有勇气又要有历史远见。¹⁴

如果说，我们在圣西门那里看到了天才的远大眼光，由于他有这种眼光，后来的社会主义者的几乎一切并非严格地是经济的思想都以萌芽状态包含在他的思想中，那末，我们在傅立叶那里就看到了他对现存社会制度所作的具有真正法国人的风趣、但并不因此显得不深刻的批判。傅立叶就资产阶级所说的话，就他们在革命前的狂热的预言者和革命后的被收买的奉承者所说的话，抓住了他们。他无情地揭露资产阶级世界在物质上和道德上的贫困，他不仅拿这种贫困和以往的启蒙学者关于只为理性所统治的社会、关于能给一切人以幸福的文明、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诱人的约言作对比，而且也拿这种贫困和当时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华丽的辞句作对比；他指出，和最响亮的词句相适应的到处都是最可怜的现实，他辛辣地嘲讽这种词句的无可挽救的破产。傅立叶不仅是批评家，他的永远开朗的性格还使他成为一个讽刺家，而且是自古以来最伟大的讽刺家之一。他以巧妙而诙谐的笔调描述了随着革命的低落而盛行起来的投机取巧和当时法国商业中普遍的小商贩气息。他更巧妙地批判了两性关

系的资产阶级形式和妇女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他第一个表明了这样的思想：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¹⁵。但是傅立叶最伟大的地方是表现在他对社会历史的看法上。他把社会历史到目前为止的全部历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蒙昧、野蛮、宗法和文明。最后一个阶段就相当于现在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即从十六世纪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他指出：

“这个文明制度使野蛮时期任何一种以简单的方式干出来的罪恶都采取了复杂的、暧昧的、两面的、虚伪的存在形式”；

文明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运动，是在它不断地重新制造出来而又无法克服的矛盾中运动，因此，它所达到的结果总是和它希望达到或者佯言希望达到的相反¹⁶。所以，譬如说，

“在文明阶段，贫困是由富裕本身所产生的”¹⁷。

我们看到，傅立叶是和他的同时代人黑格尔一样巧妙地掌握了辩证法的。他反对关于人类无限完善化的能力的空谈，而同样辩证地断言，每个历史阶段都有它的上升时期，但是也有它的下降时期¹⁸，而且他还把这个看法用于整个人类的未来。正如康德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了地球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一样，傅立叶在历史研究中提出了人类将来要归于灭亡的思想。

当革命的风暴横扫整个法国的时候，英国正在进行一种比较平静的但是威力并不因此减弱的变革。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工场手工业变成了现代的大工业，从而把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基础革命化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的迟缓的发展进程变成了生产中的真正的狂飚时期。社会愈来愈迅速地分化为大

资本家和无产者，现在处于他们二者之间的，已经不是以前的稳定的中间等级，而是不稳定的手工业者和小商人群众，他们过着不安定的生活，他们是人口中最流动的部分。当时新的生产方式还处在上升时期的最初阶段；它还是正常的、适当的、在当时条件下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但是它在那时已经产生了惊人的社会恶果：无家可归的人聚居在大城市的贫民窟里；一切传统习惯的约束、宗法制从属关系、家庭都解体了；劳动时间，特别是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时间延长到可怕的程度；突然被抛到一个全新的环境中（从乡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稳定的生活条件转到天天都在变化的、毫无保障的生活条件）的劳动阶级大批地堕落了。这时有一个二十九岁的厂主以改革家的身分出现了，这个人具有像孩子一样单纯的高尚的性格，同时又是一个少有的天生的领导者。罗伯特·欧文接受了唯物主义启蒙学者的学说，认为人的性格是先天组织和人在自己的一生中、特别是在发育时期所处的环境这两个方面的产物。社会地位和欧文相同的大多数人，都认为工业革命只是便于浑水摸鱼和大发横财的一片混乱。欧文则认为，工业革命是运用其心爱的理论并把混乱化为秩序的好机会。当他在曼彻斯特领导一个有五百多工人的工厂的时候，就试行了这个理论，并且获得了成效。从1800到1829年间，他以股东兼经理的身分领导了苏格兰的新拉纳克大棉纺厂，他在这里按照同样的精神办事，但是在行动上有更大的自由，而且获得了使他名闻全欧的成效。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两千五百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

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关心成长中的一代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从两岁起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简直很难把他们领回去。欧文的竞争者迫使工人每天劳动十三至十四小时，而在新拉纳克只劳动十小时半。当棉纺织业危机使工厂不得不停工四个月的时候，歇工的工人还继续领取全部工资。虽然如此，这个企业的价值还是增加了一倍多，而且直到最后都给企业主们带来大量的利润。

但是欧文并不对这一切感到满足。他给他的工人创造的生活条件，在他看来还远不是合乎人的尊严的；他说，

“这些人都是我的奴隶”；

他给他们安排的比较好的环境，还远不足以使人的性格和智慧得到全面的合理的发展，更不用说自由发挥其才能了。

“可是，这两千五百人中从事劳动的那一部分人给社会生产的实际财富，在不到半世纪前还需要六十万人才能生产出来。我问自己：这两千五百人所消费的财富和以前六十万人所应当消费的财富之间的差额到哪里去了呢？”

答案是明白的。这个差额是落到企业所有者的手里去了，他们除了领取百分之五的股息以外，还得到三十万英镑（六百万马克）以上的利润，新拉纳克尚且如此，英国其他一切工厂就更不用说了。

“没有这些由机器创造的新财富，就不能进行推翻拿破仑和保持

贵族的社会原则的战争。而这个新的力量是劳动阶级创造的。”^①

因此，果实也应当属于劳动阶级。在欧文看来，以前仅仅使少数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的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只应当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来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欧文的共产主义就是通过这种纯粹营业的方式，作为所谓商业计算的果实产生出来的。它始终都保持着这种实践的性质。例如，在1823年，欧文提出了通过共产主义移民区消除爱尔兰贫困的办法，并附上了关于筹建费用、每年开支和预计收入的详细计算²⁰。而在他的关于未来的最终计划中，他从技术上规定了各种细节，附上了平面图、正面图和鸟瞰图，而这一切都做得非常内行，以致他的改造社会的方法一旦被采纳，则各种细节的安排甚至从专家的眼光看来也很少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转向共产主义是欧文一生中的转折点。当他还只是一个慈善家的时候，他所获得的只是财富、赞扬、名望和荣誉。他是欧洲最有名望的人物。不仅社会地位和他相同的人，而且连达官显贵、王公大人们都点头倾听他的讲话。可是当他提出他的共产主义理论时，情况就完全变了。在他看来，阻碍社会改造的首先有三大障碍：私有制、宗教和现在的婚姻形式。他知道，当他向这些障碍进攻的时候，他所面临的是什

① 摘自《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给一切“欧洲红色共和党人、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1848年的法国临时政府，以及“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负责顾问”¹⁹

么：官场社会的普遍排斥，他的整个社会地位的丧失。但是，他并没有却步，他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进攻，而他所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他被逐出了官场社会，受到了报刊的封锁，他由于以全部财产在美洲进行的共产主义试验的失败而变得一贫如洗，于是他就直接转向工人阶级，在工人阶级中又进行了三十年的活动。当时英国的有利于工人的一切社会运动、一切实际成就，都是和欧文的名字联在一起的。例如，由于他的五年的努力，在 1819 年通过了限制工厂中女工和童工劳动的第一个法律²¹。他主持了英国工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全国各工会联合成一个总工会²²。同时，作为向完全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过渡的措施，一方面他组织了合作社（消费合作社和生产合作社），这些合作社从这时起至少已经在实践上证明，无论商人或厂主都决不是不可缺少的人物；另一方面他组织了劳动市场²³，在这里，劳动产品借助于以劳动小时为单位的劳动券进行交换；这种市场必然要遭到失败，但是充分预示了晚得多的蒲鲁东的交换银行²⁴，而它和后者不同的就是它并没有被描写为医治一切社会病害的万应药方，而只是激进得多的社会改造的第一步。

空想主义者的见解曾经长期地支配着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观点，而且现在还部分地支配着这种观点。法国和英国的一切社会主义者不久前都还信奉这种见解，包括魏特林²⁵在内的先前的德国共产主义也是这样。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

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同时，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又是各不相同的；而因为在每个学派的创始人那里，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独特形式又是由他的主观理解、生活条件、知识水平和思维发展程度所决定的，所以，解决各种绝对真理的这种冲突的办法就只能它们是它们互相磨损。由此只能得出一种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直到今天还统治着法国和英国大多数社会主义工人的头脑，它是由比较温和的批评意见、经济理论和各学派创始人关于未来社会的观念组成的色调极为复杂的混合物，这种混合物的各个组成部分在辩论的激流中愈是像石子在溪流中一样地磨光其锋利的棱角，这种混合物就愈加容易构成。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

二

这时，和十八世纪的法国哲学一起并继它之后，现代德国哲学产生了，而且在黑格尔身上达到了顶峰。它的最大的功绩，就是恢复了辩证法这一最高的思维形式。古希腊的哲学家都是天生的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中最博学的人物亚里士多德就已经研究了辩证思维的最主要的形式。而近代哲学虽然也有辩证法的卓越代表（例如笛卡儿和斯宾诺莎），却日益陷入（特别是由于英国的影响）所谓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十八世纪的法国人也几乎全都为这种思维方式所支配，至少在他们的专门哲学的著作中是如此。可是，在本来意义的哲

学之外，他们也能够写出辩证法的杰作；我们只要提一下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子》²⁶和卢梭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就够了。——在这里，我们来简略地谈谈这两种思维方法的实质。

当我们深思熟虑地考察自然界、人类历史或我们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不动的和不变的，而是一切都在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所以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总的画面，其中各个细节还或多或少地隐在背景中，我们注意得更多的是运动、转变和联系，而不是什么在运动、转变和联系。这个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是古希腊哲学的世界观，而且是由赫拉克利特²⁷第一次明白地表述出来的：一切都存在，同时又不存在，因为一切都在流动，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产生和消失。但是，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我们要是不知知道这些细节，就看不清总的画面。为了认识这些细节，我们不得不把它们从自然的或历史的联系中抽出来，从它们的特性、它们的特殊的原因和结果等等方面来逐个地加以研究。这首先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而这些科学部门，由于十分明显的原因，在古典时代的希腊人那里只占有从属的地位，因为他们首先必须为这种研究搜集材料。只有当自然和历史的材料搜集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进行批判的分析和比较，并相应地进行纲、目和种的划分。因此，精确的自然研究只是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²⁸的希腊人那里才开始，而后来在中

世纪由阿拉伯人继续发展下去；可是真正的自然科学只是从十五世纪后半期才开始，从这时起它就获得了日益迅速的进展。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这是最近四百年来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巨大进展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自然界的事物和过程孤立起来，撇开广泛的总的联系去进行考察，因此就不是把它们看做运动的东西，而是看做静止的东西；不是看做本质上变化着的东西，而是看做永恒不变的东西；不是看做活的东西，而是看做死的东西。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²⁹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以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他们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他们的说法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除此以外，都是鬼话”³⁰。在他们看来，一个事物要么存在，要么就不存在；同样，一个事物不能同时是自己又是别的东西。正和负是绝对互相排斥的；原因和结果也同样是处于固定的相互对立中。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对我们来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它是合乎所谓常识的。然而，常识在它自己的日常活动范围内虽然是极可尊敬的伴侣，但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遇到最惊人的变故。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虽然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

必要的，可是它每一次都迟早要达到一个界限，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因为它看到一个一个的事物，忘了它们互相间的联系；看到它们的存在，忘了它们的产生和消失；看到它们的静止，忘了它们的运动；因为它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例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知道，并且可以肯定地说某种动物存在还是不存在；但是在进行较精确的研究时，我们就发现这有时是极其复杂的事情。这一点法学家们知道得很清楚，他们绞尽脑汁去发现一条判定在子宫内杀死胎儿是否算是谋杀的合理界限，结果总是徒劳。同样，要确定死的时刻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生理学证明，死并不是突然的、一瞬间的事情，而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同样，任何一个有机体，在每一瞬间都是它本身，又不是它本身；在每一瞬间，它同化着自外界供给的物质，并排泄出其他物质；在每一瞬间，它的机体中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的细胞在形成；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这个机体的物质便完全更新了，由其他物质的原子代替了，所以，每个有机体永远是它本身，同时又是别的东西。在进行较精确的考察时，我们也发现，某种对立的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而且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互相渗透的；同样，原因和结果这两个观念，只有在应用于个别场合时才有其本来的意义；可是只要我们把这种个别场合放在它和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来考察，这两个观念就汇合在一起，融化在普遍相互作用的观念中，在这种相互作用中，原因和结果经常交换位置；在此时或此地是结果的，在彼时或彼地就成了原因，反

之亦然。

所有这些过程和思维方法都是形而上学思维的框子所容纳不下的。相反地，对辩证法来说，上述过程正好证明了它自己的方法是正确的，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自然界不是循着一个永远一样的不断重复的圆圈运动，而是经历着实在的历史。这里首先就应当指出达尔文³¹，他极其有力地打击了形而上学的自然观，因为他证明了今天的整个有机界，植物和动物，因而也包括人类在内，都是延续了几百万年的发展过程的产物。可是，因为学会辩证地思维的自然科学家到现在还屈指可数，所以，现在统治于理论自然科学中并使教师和学生、作者和读者都同样感到绝望的那种无限混乱的状态，完全可以从已经达到的成果和传统的思维方式之间的这个冲突中得到说明。

因此，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现代德国哲学一开始就是以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康德一开始他的科学生涯，就把牛顿的稳定的和自从有名的第一次推动作出以后就永远如此的太阳系变成了历史的过程，即太阳和一切行星由旋转的星云团产生

的过程。同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太阳系的产生也预示着它将来的不可避免的灭亡。过了半个世纪，他的观点由拉普拉斯从数学上作出了证明；又过了半个世纪，分光镜证明了，在宇宙的空间存在着凝聚程度不同的炽热的气团。³²

这种现代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达到了顶峰，在这个体系中，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性。

至于黑格尔的体系没有解决它给自己提出的这个任务，在这里是无关紧要的；它的划时代的功绩是在于它提出了这个任务。这不是任何个别的人所能解决的任务。虽然黑格尔和圣西门一样是当时最博学的人，但是他毕竟受到了限制，首先是他自己的必然有限的知识的限制，其次是他那个时代的在广度在深度方面都同样有限的知识和见解的限制。但是除此以外还有第三种限制。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这

样，一切都被弄得头足倒置了，世界的现实联系完全被颠倒了。所以，不论黑格尔如何正确地和天才地把握了一些个别的联系，但由于上述原因，就是在细节上也有许多东西不能不是牵强的、造作的、虚构的，一句话，被歪曲的。黑格尔的体系作为体系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流产，但也是这类流产中的最后一次。就是说，它还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一方面，它以历史的观点作为基本前提，即把人类的历史看做一个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按其本性来说是不能通过发现所谓绝对真理来达到其智慧的顶峰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硬说自己是这个绝对真理的全部内容。包罗万象的、最终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是这决不排除，反而肯定，对于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得到巨大进展的。

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十八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的全部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无论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其中有牛顿所说的永恒的天体和林耐所说的不变的有机物种。和这个自然观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概括了自然科学的最新成就，从这些成就看来，自然界也有自己的时间上的历史，天体和在适宜条件下存在于天体上的有机物种一样是有生有灭的；至于循环，即使它能够存在，也

具有无限加大的规模。在这两种情况下，现代唯物主义都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

但是，当自然观的这种变革只能随着研究工作提供相应的实证的认知材料而实现的时候，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转变的历史事实已经老早就发生了。1831年在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人起义；在1838—184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工人运动，即英国的宪章派运动³³，达到了自己的最高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事实日益令人信服地证明，资产阶级经济学关于资本和劳动的利益一致、关于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通协调和全民幸福的学说完全是撒谎。所有这些事情都再不能不加考虑了，正如作为这些事实的理论表现（虽然是极不完备的表现）的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不能不加考虑一样。但是，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

新的事实迫使人们对以往的全部历史作一番新的研究，

结果发现：以往的全部历史，除原始状态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些互相斗争的社会阶级在任何时候都是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产物，一句话，都是自己时代的经济关系的产物；因而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现实基础，每一个历史时期由法律设施和政治设施以及宗教的、哲学的和其他的观点所构成的全部上层建筑，归根到底都是应由这个基础来说明的。黑格尔把历史观从形而上学中解放了出来，使它成为辩证的，可是他的历史观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现在，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的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被驱逐出来了，唯物主义历史观被提出来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这样一条道路已经找到了。

因此，社会主义现在已经不再被看做某个天才头脑的偶然发现，而被看做两个历史地产生的阶级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斗争的必然产物。它的任务不再是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可是以往的社会主义同这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不相容的，正如法国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同辩证法和现代自然科学不相容一样。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做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但是，问题是在于：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的历史联系和它对一定历史时期的必然性，从而说明它灭亡的必然性，另一方面揭露这种生产方式内部的一直还隐蔽着的性质。这已经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而完成了。已经证明，无偿劳动的占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通过这种生产方式对工人进行的剥削的基本形式；即使资本家按照劳动力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所具有的全部价值来购买他的工人的劳动力，他从这劳动力榨取的价值仍然比他为这劳动力付出的多；这种剩余价值归根到底构成了有产阶级手中日益增加的资本量所由积累而成的价值总量。这样就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和资本生产的过程。

这两个伟大的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都应当归功于**马克思**。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现在的问题首先是对这门科学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

三

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未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相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

去寻找。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苦痛”³⁴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那末，现代社会主义的情况究竟怎样呢？

现在大家几乎都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在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但是，正如从前工场手工业以及在它影响下进一步发展了的手工业同封建的行会桎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时就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限制它的框框发生冲突了。新的生产力已经超过了这种生产力的资产阶级利用形式；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之间的这种冲突，并不是像人的原罪和神的正义的冲突那样产生于人的头脑中，而是实际地、客观地、在我们之外、甚

至不依赖于引起这种冲突的那些人的意志或行动而存在着。现代社会主义不过是这种实际冲突在思想上的反映，是它在头脑中、首先是在那个直接吃到它的苦头的阶级即工人阶级的头脑中的观念的反映。

那末这种冲突表现在哪里呢？

在资本主义生产出现以前，即在中世纪，普遍地存在着以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为基础的小生产：小农、自由农或依附农的农业和城市的手工业。劳动资料——土地、农具、作坊、手工业工具——都是个人的劳动资料，只供个人使用，因而必然是小的、简陋的、有限的。但是，正因为如此，它们也照例是属于生产者自己的。把这些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料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它们变成现代的强有力的生产杠杆，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体现者即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关于资产阶级怎样从十五世纪起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和大工业这三个阶段历史地实现了这种作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编中已经作了详尽的阐述。但是，正如马克思在那里所证明的，资产阶级要是不把这些有限的生产资料从个人的生产资料变为**社会化的**，即只能由**大批人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就不能把它们变成强大的生产力。纺纱机、机动织布机和蒸汽锤代替了纺车、手工织布机和手工锻锤；需要成百上千的人进行协作的工厂代替了小作坊。和生产资料一样，生产本身也从一系列的**个人行动**变成了一系列的**社会行动**，而产品也从个人的产品变成了**社会的产品**。现在工厂所出产的纱、布、金属制品，都是许多工人的共同产品，都必须顺次经过他们的手，然后才变为成品。他们当中没有一

个人能够说：“这是**我**做的，这是**我的**产品”。

但是，在以自发的、无计划地逐渐产生的社会内部分工作为生产的基本形式的地方，这种分工就使产品带有**商品**的形式，商品的相互交换，即买和卖，就使个体生产者有可能满足自己的各式各样的需要。中世纪的情况就是这样。例如，农民把农产品卖给手工业者，而从他们那里买得手工业品。在这个个体生产者即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渗入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支配全社会的自发的**无计划**的分工中间，它确立了在个别工厂里组织起来的**有计划**的分工；在**个体生产**旁边出现了**社会化的生产**。两者的产品在同一市场上出卖，因而价格至少大体相等。但是，有计划的组织要比自发的分工有力；实行社会化劳动的工厂里所制造的产品，要比分散的小生产者所制造的便宜。个体生产在一个又一个的部门中遭到失败，社会化的生产使全部旧的生产方式革命化了。但是它的这种革命性质并没有为人所认识，结果它反而被用来当做提高和促进商品生产的手段。它的产生，是同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一定的已经存在的杠杆即商业资本、手工业、雇佣劳动直接联系着的。由于它本身是作为商品生产的一种新形式出现的，所以商品生产的占有形式对它也保持着全部效力。

在中世纪得到发展的那种商品生产中，劳动产品应当属于谁的问题根本不可能发生。当时个体生产者通常都用自己所有的、往往是自己生产的原料，用自己的劳动资料，用自己成家属的手工劳动来制造产品。这样的产品根本用不着他去占有，它自然是属于他的。因此，产品的所有权是以自己

的劳动为基础的。即使利用过别人的帮助，这种帮助通常也是次要的，而且往往除工资以外还得到别的报酬：行会的学徒和帮工与其说是为了吃饭和挣钱而劳动，不如说是为了自己学成手艺当师傅而劳动。后来生产资料开始集中于大的作坊和手工工场，开始变为真正社会化的生产资料。但是这些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和产品还像从前一样被当做个人的生产资料和产品来处理。从前，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占有产品，因为这些产品通常是他自己的产品，别人的辅助劳动是一种例外，而现在，劳动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的产品，而完全是别人劳动的产品了。这样，现在由社会化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已经不是为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所占有，而是为资本家所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化的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因而在这种形式下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①。这个使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愈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

① 这里无需解释，虽然占有形式还是原来那样，可是占有的性质由于上述过程而经历的革命，并不亚于生产所经历的革命。我占有我自己的产品或者占有别人的产品，这自然是两种很不相同的占有。顺便提一下：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但是只有在历史前提已经具备时，当一萌芽才能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

如上所述，最初的资本家就已经遇到了现成的雇佣劳动形式。但是，那时雇佣劳动是一种例外，一种副业，一种救急办法，一种暂时措施。不时出去打短工的农业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只能借以糊口的几亩土地。行会制度规定今天的帮工明天可以成为师傅。但是，生产资料一旦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并集中于资本家手中，情形就改变了。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变得愈来愈没有价值；他们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雇佣劳动以前是一种例外和救急办法，现在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种副业，现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职业。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此外，由于同时发生的封建制度的崩溃，由于封建主扈从人员被解散，农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园等等，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大量增加了。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渗入了商品生产者即通过自己产品的交换来实现社会联系的个体生产者的社会。但是，每个以商品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都有一个特点：这里的生产者丧失了对他们自己的社会关系的支配权。每个人都用自己偶然拥有的生产资料并为自己的特殊的交换需要而各自进行生产。谁也不知道，他的那种商品出现在市场上的会有

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谁也不知道,他的个人产品是否真正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生产费用,或者是否能卖出去。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占统治地位。但是,商品生产同任何其他生产形式一样,有其特殊的、固有的、和它分不开的规律;这些规律不顾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中、通过无政府状态来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些规律在唯一保留下来的社会联系形式即交换中表现出来,并且作为强制性的竞争规律作用于各个生产者。所以,这些规律起初连这些生产者也不知道,只是由于长期的经验才逐渐被他们揭示出来。所以,这些规律是在不经过生产者并且和生产者对立的情况下,作为他们的生产形式的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产品支配着生产者。

在中世纪的社会里,特别是在最初几世纪,生产基本上是为了供自己消费。它主要只是满足生产者及其家属的需要。在那些有人身依附关系的地方,例如在农村中,生产还满足封建主的需要。因此,在这里没有交换,产品也不具有商品的性质。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只有当他们在满足自己的需要并向封建主缴纳实物租税以后还能生产更多的东西时,他们才开始生产商品;这种投入社会交换即拿去出卖的多余产品就成了商品。诚然,城市手工业者一开始就必然为交换而生产。但是他们也自己生产自己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他们有园圃和小块土地;他们在公共森林中放牧牲畜,并且从这些森林中取得木材和燃料;妇女纺麻,纺羊毛等等。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还只是在形成中。因此,交换是有限的,市场是狭小的,生

产方式是稳定的，地方和外界是隔绝的，地方内部是团结的；农村中有马尔克^①，城市中有行会。

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愈来愈公开、愈来愈有力地发挥作用了。旧日的束缚已经松弛，旧日的壁障已经突破，生产者日益变为独立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表现出来，并且愈来愈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面：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社会化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这一杠杆结束了旧日的和平的稳定状态。它在哪一个工业部门被采用，就不容许任何旧的生产方法在那里和它并存。它控制了手工业，就把旧的手工业消灭掉。劳动场地变成了战场。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斗争不仅爆发于地方的各个生产者之间；地方性的斗争已经发展为全国性的，发展为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商业战争³⁵。最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个斗争成为普遍的，同时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剧烈性。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产业和产业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存问题都决定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清除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的达尔文

① 这里恩格斯指的是他的著作《马尔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51—369页。——编者注

的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的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的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由于自己的起源而固有的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它毫无出路地进行着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的“恶性循环”。诚然，傅立叶在他那个时代还不能看到：这种循环在逐渐缩小；运动宁可说是在按螺旋形进行，并且必然像行星的运动一样，由于和中心相碰撞而告终。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多数人日益变为无产者，而无产者群众又将最终结束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推动力，使大工业中的机器无限改进的可能性变成一种迫使每个工业资本家在遭受毁灭的威胁下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的强制性法令。但是，机器的改进就造成人的劳动的过剩。如果说，机器的采用和推广意味着成百万的手工劳动者为少数机器劳动者所排挤，那末，机器的改进就意味着愈来愈多的机器劳动者本身受到排挤，而归根到底就意味着形成一批超过资本在经营上的平均需要的、待雇的雇佣劳动者，一支真正的产业后备军（我早在 1845 年就这样称呼他们^①），这支后备军在工业开足马力工作的时期可以随意使用，而由于必然随着这个时期到来的崩溃又被抛到街头，这支后备军任何时候都是工人阶级在自己对资本进行生存斗争中的绊脚石，是把工资抑制在合乎资本家需要的低水平上的

①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第 109 页。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 卷第 369 页。——编者注

调节器。这样一来，机器，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成了资本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最有力的武器，劳动资料不断地夺走工人手中的生活资料，工人自己的产品变成了奴役工人的工具^①。于是，劳动资料的节约，一开始就同时成为对劳动力的最严重的浪费和对劳动机能的正常前提的掠夺^②；机器这一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变成了使工人及其家属一生的时间转化为可以随意用来增殖资本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于是，一部分人的过度劳动造成了另一部分人的失业，而在全世界追逐新消费者的大工业，却在国内把群众的消费限制到需要忍饥挨饿这样一个最低水平，从而破坏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使相对的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资本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更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马克思《资本论》第671页）^③。而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期待产品的另一种分配，那就等于希望电池的电极和电池相联时不使水分解，不在阳极放出氧和阴极放出氢。

我们已经看到，现代机器的已经达到最高程度的改进的可能性，怎样由于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而变成一种迫使

① 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5节和第9节。——编者注

② 见《资本论》第1卷第13章第8节b。——编者注

③ 见《资本论》第1卷第23章第4节。——编者注

各个工业资本家不断改进自己的机器、不断提高机器的生产能力的强制性法令。对资本家来说，扩大自己的生产规模的单纯的实际可能性也变成了同样的强制性法令。大工业的巨大的扩张力——气体的膨胀力和它相比简直是儿戏——现在在我们面前表现为不顾任何阻力的、在质量上和数量上进行扩张的需要。这种阻力是由大工业产品的消费、销路和市场形成的。但是，市场向广度和深度方面扩张的能力首先是受完全不同的、力量弱得多的规律支配的。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也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

事实也是这样，自从1825年第一次普遍危机爆发以来，整个工商业世界，一切文明民族及其多少尚未开化的附属地中的生产和交换，差不多每隔十年就要出轨一次。商业停顿，市场盈溢，产品滞销，银根奇紧，信用停止，工厂关门，工人群众因为他们生产的生活资料过多而缺乏生活资料，破产相继发生，拍卖纷至沓来。停滞状态持续了几年，生产力和产品被大量浪费和破坏，直到最后，大批积压的商品以或多或少压低了的价格卖出去，生产和交换的运动逐渐恢复起来。运动逐渐加快，慢步转成快步，工业快步转成跑步，跑步又转成工业、商业、信用和投机事业的真正障碍赛马中的狂奔，最后，经过几次拚命的跳跃重新陷入崩溃的深渊。如此反复不已。从1825年以来，这种情况我们已经历了整整五次，目前（1877年）正经历着第六次。这些危机的性质表现得这样

明显，以致傅立叶把第一次危机称为 *crise plethorique* 即由过剩引起的危机时，就中肯地说明了一切危机的实质³⁶。

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

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自己之旁并凌驾于自己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甚至资本家也由于资本的猛烈聚集而感觉到这一事实，这种聚集是在危机期间通过许多大资本家和更多的小资本家的破产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构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待雇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显得过剩。但是，这种“过剩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傅立叶），因为正是这种过剩阻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为资本。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要不先变为资本，变为剥削人的劳动力的工具，就不能发挥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具有资本属性的必然性，像幽灵一样站在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唯独这个必然性阻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唯独它妨碍生产资料发挥作用，妨碍工人劳动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

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

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做社会生产力看待。无论信用无限膨胀的工业高涨时期，还是由大资本主义企业的破产造成的崩溃本身，都把大量生产资料推向如像我们在各种股份公司中所遇见的那种社会化形式。某些生产资料和交通手段，例如铁路，一开始规模就很大，它们排斥任何其他资本主义经营形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这种形式也嫌不够了；国内同一工业部门的大生产者联合为一个“托拉斯”，即一个以调节生产为目的的联盟；他们规定应该生产的总产量，在他们中间加以分配，并且强制实行预先规定的出售价格。但是，这种托拉斯一遇到不景气的时候大部分就陷于瓦解，正因为如此，它们就趋向于更加集中的社会化：整个工业部门变为一个唯一的庞大的股份公司，国内的竞争让位于这个公司在国内的垄断；例如还在1890年，英国的制硷业就发生了这种情形，现在，这一行业在所有四十八个大工厂合并以后就转到了一个唯一的、统一领导的、拥有一亿两千万马克资本的公司手中了。

在托拉斯中，自由竞争转为垄断，而资本主义社会的无计划生产向行将到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生产投降。当然，这首先还是对资本家有利的。但是，在这里剥削变得这样明显，以致它必然要被消灭。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容忍由托拉斯领导的生产，不会容忍由一小撮专靠剪息票为生的人对全

社会进行的如此露骨的剥削。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无论有或者没有托拉斯，资本主义社会的正式代表——国家终究不得不^①承担起对生产的领导。这种转化为国家财产的必然性首先表现在大规模的交通机构，即邮政、电报和铁路方面。

如果说，危机暴露出资产阶级无能继续驾驭现代生产力，那末，大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向股份公司、托拉斯和国家财产的转变就表明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不是不可缺少的。资本家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资本家拿红利、剪息票、在各种资本家相互争夺彼此的资本的交易所中进行投机，除此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活动了。资本

① 我说“不得不”，因为只有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现代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才意味着在由社会本身占有一切生产力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准备阶段。但是最近，自从俾斯麦致力于国有化以来，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甚至俾斯麦的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显然，如果烟草国营是社会主义的，那末拿破仑和梅特涅就应该算是社会主义的创始人了。如果说，比利时政府出于纯粹日常的政治和财政方面的考虑而自己修建自己的主要铁路，如果说，俾斯麦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必要，只是为了使铁路能够在战时更好地适应和利用，为了把铁路职员训练成政府的投票家畜，主要是为了取得一种不依赖于议会决定的新的收入来源而把普鲁士的主要铁路收归国有，那末，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皇家海外贸易公司³⁷、皇家陶磁厂，甚至陆军被服厂，以致在三十年代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时期由一个聪明人十分严肃地建议过的……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

主义生产方式起初排挤工人，现在却在排挤资本家了，完全像对待工人那样把他们赶到过剩人口中去，虽然暂时还没有把他们赶到产业后备军中去。

但是，无论转化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还是转化为国家财产，都没有消除生产力的资本属性。在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那里，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而现代国家却只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共同的外部条件使之不受工人和个别资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组织。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产力据为己有，就愈是成为真正的总资本家，愈是剥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佣劳动者，无产者。资本关系并没有被消灭，反而被推到了顶点。但是在顶点上是要发生变革的。生产力的国家所有不是冲突的解决，但是它包含着解决冲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决冲突的线索。

这种解决只能是在事实上承认现代生产力的社会本性，因而也就是使生产、占有和交换的方式同生产资料的社会性相适应。而要实现这一点，只有由社会公开地和直接地占有已经发展到除了社会管理不适于任何其他管理的生产力。现在，生产资料和社会性反过来反对生产者本身，周期性地突破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并且只是作为盲目起作用的自然规律强制性地和破坏性地为自己开辟道路，而随着社会对生产力的占有，这种社会性就将为生产者完全自觉地运用，并且从造成混乱和周期性崩溃的原因变为生产本身的最有力的杠杆。

社会力量完全像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像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像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为人服务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同时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这种生产方式迫使人们日益把巨大的社会化的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同时它本身就指明完成这个变革的道路。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

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到目前为止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强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³⁸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

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整个的派别的脑海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社会分裂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是以前生产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摆脱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妨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加紧剥削。

但是，即使阶级的划分根据上面所说具有某种历史的理由，那也只是对一定的时期、一定的社会条件才是这样。这种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的确，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这样一个历史发展阶段为前提，在这个阶段上，不仅某个特定的统治阶级而且任何统治阶级的存在，从而阶级差别本身的存在，都将成

为时代的错误，成为过时的现象。所以，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的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在这个阶段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占有，从而对政治统治、教育垄断和精神领导的占有，不仅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经济、政治和精神发展的障碍。这个阶段现在已经达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精神的破产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未必是一种秘密了，而他们的经济破产则有规律地每十年重复一次。在每次危机中，社会在属于它自己而又不能为它自己所利用的生产力和产品的重压下奄奄一息，面对着生产者没有什么可以消费是因为缺乏消费者这种荒谬的矛盾而束手无策。生产资料的扩张力撑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加给它的桎梏。生产资料从这种桎梏下解放出来，是生产力不断地加速发展的唯一先决条件，因而也是生产本身实际上无限增长的唯一先决条件。但是还不止于此。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不仅会消除生产的现存的人为障碍，而且还会消除生产力和产品的明显的浪费和破坏，这种浪费和破坏在目前是生产的不可分离的伴侣，并且在危机时期达到顶点。此外，这种占有还由于消除了现在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治代表的穷奢极欲的浪费而为全社会节省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和产品。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这种可能性现在是第一次出现了，但是它**确实是出现了**①。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

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才在一定意义上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却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人们自己的社会行动的规律，这些直到现在都如同异己的、统治着人们的自然规律一样而与人们相对立的规律，那时就将被人们熟练地运用起来，因而将服从他们的统治。人们自己的社会结合一直是作为自然界和历史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同他们相对立的，现在则变成他们自己的自由行动了。一直统治着历史的客观的异己的力量，现在处于人们自己的控制之下了。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
- ① 有几个数字可以大体表明现代生产资料即使在资本主义压制下也有巨大的扩张力。根据吉芬的计算³⁹，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全部财富约计如下：

1814年……22亿英镑=440亿马克

1865年……61亿英镑=1220亿马克

1875年……85亿英镑=1700亿马克

至于在危机中生产资料和产品被破坏的情况，根据1878年2月21日在柏林举行的德国工业家第二次代表大会⁴⁰所作的计算，在最近一次崩溃中，单是德国铁工业所遭受的全部损失就达45500万马克。

最后，我们把上述的发展进程简单地概述如下：

一、**中世纪社会**：个体的小生产。生产资料是供个人使用的，因而是原始的、笨拙的、小的、效能很低的。生产或者是为了生产者本身的直接消费，或者是为了他的封建领主的直接消费。只有在生产的东西除了满足这些消费以外还有剩余的时候，这种剩余才拿去出卖和进行交换：所以商品生产刚刚处于形成过程中；但是这时它本身已经包含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萌芽**。

二、**资本主义革命**：起初是工业通过简单协作和工场手工业实现的变革。先前分散的生产资料集中到大作坊中，因而它们就由个人的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化的生产资料，这种转变总的说来是没有触及交换形式的。旧的占有形式仍然起作用。**资本家出现了**：他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当然就占有产品并把它们变为商品。生产已经成为社会的活动，而交换以及和它相伴随的占有，仍旧是个体的活动，单个人的活动：**社会产品被个别资本家所占有**。这就是产生现代社会借以运动并在大工业中表现得特别明显的一切矛盾的基本矛盾。

（a）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工人注定要终身从事雇佣劳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对立**。

（b）支配商品生产的规律日益显露出来，它们的作用日益加强。竞争不可遏止。个别工厂中的社会化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

（c）一方面是机器的改进，这种改进由于竞争而变成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法令，同时就使工人遭到不断的解雇：**产生了产业后备军**。另一方面是生产的无限扩张，这也

成了每个厂主必须遵守的强制性的竞争规律。这两方面造成了生产力的空前发展、供过于求、生产过剩、市场盈溢、十年一次的危机、恶性循环：**这里是生产资料和产品过剩，那里是没有工作和没有生活资料的工人过剩**；但是，生产和社会福利的这两个杠杆不能结合起来，因为生产力和产品要不先转变为资本，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就不允许生产力发挥作用和产品进行流通，而阻碍这种转变的正是生产力和产品的过剩。这种矛盾发展到荒谬的程度：**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形式**。资产阶级已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管理自己的社会生产力。

(d) 资本家本身不得不部分地承认生产力的社会性。大规模的生产机构和交通机构起初由**股份公司**占有，后来由托拉斯占有，然后又由**国家**占有。资产阶级表明自己已成为多余的阶级；它的全部社会职能现在由雇佣的职员来执行了。

三、**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发展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自由的人**。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

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

写于 1880 年 1 月—3 月上半月
载于 1880 年 3 月 20 日, 4 月 20
和 5 月 5 日《社会主义评论》杂志第
3、4 和 5 期, 并于 1880 年在巴黎出
版法文单行本: 弗·恩格斯《空想社
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9 卷第 201—247 页

注 释

- 1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是由 恩格 斯于 1877—1878 年写成的著作作《反杜林论》中的三章编成的。

1880 年恩格斯应保·拉法格的请求把《反杜林论》中的三章（《引论》的第一章、第三编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改写成为一篇独立的通俗的著作, 这一著作首先以《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为题发表在法国社会主义杂志《社会主义评论》上, 后来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在同年出版。这一法文版本成了波兰文和意大利文译本的基础。1883 年, 这一著作出版了德文本, 书名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扉页上标的是 1882 年）。这一著作在恩格斯生前就已经从德文译成了欧洲各种文字, 并且在工人中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宣传起了巨大的作用。这一著作在恩格斯生前的最后一次德文版（第四版）是 1891 年在柏林出版的。这一著作在材料安排上与《反 杜 林 论》的有关章节有所不同, 并且对《反杜林论》的本文作了一些补充和改动。

2

- 3 引自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第 4 部第 3 篇第 3 章。见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 《黑格尔全集》1840 年柏林第 2 版第 9 卷第 535—536 页 (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Werke, Bd. IX. 2. Aufl., Berlin, 1840, S. 535-536)。

- 3 按照卢梭的理论，人们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的条件下，在这种条件下人人都是平等的。私有制的产生和财产不平等的发展决定了人们从自然状态向市民状态的过渡，并导致以社会契约为基础的国家的形成。但是，后来由于政治不平等的发展，社会契约遭到破坏，产生了新的自然状态。消灭这种自然状态，是以新的社会契约为基础的理性国家的使命。

这个理论在卢梭的1755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论人间不平等的起源和原因》(《Discours sur l'origine et les fondemens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Amsterdam, 1755)和1762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Du contrat social; ou, Principes du droit politique》. Amsterdam, 1762)这两部著作中得到了发挥。

- 4 恩格斯指“真正平均派”或“掘地派”，他们是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极左派的代表。“掘地派”代表城乡贫民阶层的利益，他们要求消灭土地私有制，宣传原始的平均共产主义思想，并企图用集体开垦公有土地的办法来实现这种思想。

- 5 见本书《共产党宣言》注18。

- 6 恩格斯首先指空想共产主义者的著作——托·莫尔“乌托邦”(1516年出版)和托·康帕内拉“太阳城”(1623年出版)。

- 7 见本书《共产党宣言》注19。

- 8 恐怖时代是雅各宾派的革命民主专政时期(1793年6月—1794年7月)，当时雅各宾派为了对付吉伦特派和保皇派的反革命恐怖采用了革命的恐怖。

督政府(由五个督政官组成，每年改选一人)是法国执行权的领导机关，它是根据雅各宾派革命专政于1794年失败后所通过的1795年宪法建立的；它存在到1799年波拿巴政变；它支持反对民主力量的恐怖制度，并维护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 9 指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
- 10 《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Lettres d'un habitant de Genève à ses contemporains》）是圣西门的第一部著作；1802年写于日内瓦，1803年匿名发表于巴黎，没有标明出版的地点和时间。恩格斯在写作《反杜林论》所用的版本是：古·雨巴《圣西门。他的生平和著述。附有圣西门名著的摘录》1857年巴黎版（G. Hubbard. 《Saint-Simon. Sa vie et ses travaux. Suivi de fragments des plus célèbres écrits de Saint-Simon》. Paris, 1857）。在这个版本中圣西门的个别著作的日期有不确切的地方。
- 傅立叶的第一部巨著是《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写于十九世纪头几年，1808年在里昂匿名出版（可能考虑到书报检查，在扉页上注明的出版地点是莱比锡）。
- 新拉纳克（New Lanark）是苏格兰拉纳克城附近的一个棉纺厂，创办于1784年，在工厂周围形成一个小镇。
- 11 恩格斯引证的是圣西门的《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这部著作中的第二封信。这些话在雨巴版本的第143页和第135页上。
- 12 恩格斯指《昂·圣西门给一个美国人的信》（第八封信）中的一段话。这些信载于昂·圣西门的论文集《实业，或为贡献出有用和独立的劳动的一切人的利益所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学的议论》1817年巴黎版第2卷（H. Saint-Simon. 《L'industrie, ou Discussions politiques, morales et philosophiques, dans L'intérêt de tous les hommes livrés à des travaux utiles et indépendans》. T. II, Paris, 1817）。这些话在雨巴版本的第155—157页上。
- 13 恩格斯指的是圣西门同他的学生奥·梯叶里合著的两本书：《论欧洲社会的改组，或论欧洲各民族在保持各自的民族独立性的条件下联合为一个政治统一体的必要性和手段》（《De la réorganisation de la société européenne, ou De la nécessité et des moyens de rassembler les peuples de l'Europe en un seul

corps politique, en conservant à chacun son indépendance nationale》)和《关于应当用来对付1815年同盟的措施的意见》(《Opinion sur les mesures à prendre contre la coalition de 1815》);这两本小册子都在巴黎出版,第一本在1814年10月,第二本在1815年。在雨巴的版本中,从第一本小册子作的摘录在第149—154页,而这两本小册子的内容则刊在第68—76页。

第六次反法同盟的参加国(俄国、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等国)的同盟国军于1814年3月31日进入巴黎。拿破仑帝国垮台了,而拿破仑本人在宣布退位以后被流放到埃尔巴岛。在法国发生了波旁王朝的第一次复辟。

百日是指拿破仑恢复帝制的短暂时期,从1815年3月20日他从埃尔巴岛回到巴黎时起,到同年6月22日他在滑铁卢失败后第二次退位时为止。

- 14 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的军队在滑铁卢(比利时)被威灵顿指挥的英荷联军和布吕歇尔指挥的普鲁士军击败。这次战役在1815年的战局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预先决定了第七次反法同盟(英国、俄国、奥地利、普鲁士、瑞典等国)的彻底胜利和拿破仑帝国的崩溃。
- 15 这个思想在傅立叶的第一本书《关于四种运动的理论》中已经得到了发挥,书中包含着这样一个总的论点:“某一时代的社会进步和变迁是同妇女走向自由的程度相适应的,而社会秩序的衰落是同妇女自由减少的程度相适应的。”傅立叶在下述公式中概括了这个论点:“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见《傅立叶全集》1841年巴黎版第1卷第195—196页)。
- 16 参看沙·傅立叶《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第1卷和第4卷;《傅立叶全集》1843年巴黎版第2卷第78—79页和1841年巴黎版第5卷第213—214页(Ch. Fourier. 《Théorie de l'unité universelle》, vol. I et IV; Œuvres complètes, t. II, Paris, 1843, p. 78-79 et t. V, Paris, 1841, p. 213—214)。

关于文明制度在其中运动的“恶性循环”,见沙·傅立叶《经济的和协会的新世界,或按情欲分类的引人入胜的和合乎自然的劳动方式的

发现》；《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27—46、390页（Ch. Fourier.《Le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et sociétaire, Ou Invention du procédé d'industrie attrayante et naturelle distribuée en séries passionnées》；Oeuvres complètes, t. VI, Paris, 1845, p. 27—46, 390）。该书第一版于1829年在巴黎出版。并参看《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1卷第202页。

- 17 《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6卷第35页。
- 18 《傅立叶全集》1845年巴黎版第1卷第50页及以下页。
- 19 罗·欧文《人类头脑和实践中的革命，或将来由非理性到理性的过渡》1849年伦敦版（R. Owen.《The Revolution in the Mind and Practice of the Human Race; or, the Coming Change from Irrationality to Rationality》. London, 1849）。上一页所引用的欧文传记材料，出处相同。
- 20 罗·欧文《关于在都柏林举行的几次公众集会的报告……3月18日、4月12日和19日、5月3日》1823年都柏林版（R. Owen.《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at the several public meetings, held in Dublin……on the 18th March, 12th April, 19th April and 3rd May》. Dublin, 1823）。
- 21 1815年1月，欧文在格拉斯哥的一次群众集会上提出了一系列改善工厂的童工和成年工人的状况的措施。根据1815年6月欧文的倡议提出的法案到1819年7月才被议会通过，成为法律，而且还大大地打了折扣。调整棉纺厂劳动的法律禁止9岁以下的儿童作工，限定18岁以下的工人的工作日为12小时，规定所有工人有两次工间休息作为早饭和午饭的时间，共一个半小时。
- 22 1833年10月，在欧文的主持下在伦敦举行了合作社和职工的代表大会，会上正式成立了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全国产业部门大联盟；联盟的章程于1834年2月被通过。按照欧文的想法，这个联盟应当把生产管理的权力

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通过和平的途径实现对社会的彻底改造。但是这个空想的计划遭到了失败。由于受到资产阶级社会和国家的强烈反对，该联盟于1834年8月宣告解散。

- 23 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市场是英国各城市的工人合作社创办的。他一直存在到1834年年中。在这些交换市场上，劳动产品是用以一小时劳动时间为单位的劳动券来进行交换的。这些企图在商品资本主义经济条件下建立不用货币的交换的乌托邦做法，很快就失败了。
- 24 蒲鲁东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做了组织交换银行的尝试。他的人民银行（Banquedupeuple）于1849年1月31日在巴黎成立。银行存在了两个月左右，而且只是在纸面上：它在开始正常业务活动以前就破产了，并于4月初宣告关闭。
- 25 魏特林，威藤（1808-1871）——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著名活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理论家之一；职业是裁缝。
- 26 德·狄德罗的对话《拉摩的侄子》（《Le neveu de Rameau》）是1762年前后写成的，后来又经作者修改了两次。最初它是由歌德的德译本形式于1805年在莱比锡出版。真正的法文版发表在1821年巴黎版《狄德罗轶文集》（《Oeuvres inédites de Diderot》，Paris, 1821）该书实际上是在1823年出版的。
- 27 赫拉克利特（约公元前540-480）——杰出的古希27腊哲学家，辩证法的奠基人之一，自发的唯物主义者。
- 28 科学发展的亚历山大里亚时期是指纪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七世纪的时期，这个时期是因埃及的一个城市、当时国际经济关系最大中心之一亚历山大里亚（位于地中海沿岸）而得名的。在亚历山大里亚时期，许多科学，如数学和力学（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地理学、天文学、解剖学、生理学等等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
- 29 培根，弗兰西斯，维鲁拉姆男爵（1561-1626）——杰出的英国哲学家，英

国唯物主义的创始人；自然科学家和历史学家。

洛克，约翰(1682-1704)——著名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感觉论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他摇摆于货币名目论和货币金属论之间。

30 圣经《马太福音》第5章第37节。

31 见本书第《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注2。

32 根据康德的星云假说，太阳系是从原始星云（拉丁文：nebula——雾）发展而来的，他在1755年科尼斯堡和莱比锡出版的著作《自然通史和天体论，或根据牛顿原理论述宇宙的结构和机械起源的尝试》（《Allgemeine Naturgeschichte und Theorie des Himmels, oder Versuch von der Verfassung und dem mechanischen Ursprunge des ganzen Weltgebäudes nach Newtonischen Grundsätzen abgehandelt》. Königsberg und Leipzig, 1755）中阐述了这一假说。这本书是匿名出版的。

拉普拉斯关于太阳系的构成的假说，最初是在他于法兰西共和国四年[1796年]在巴黎出版的《宇宙体系解说》第1—2卷（《Exposition du système du monde》. T. I - II, Paris, l'an IV de la République Française[1796]）中进行了阐述。在拉普拉斯生前编好而在死后出版的（1835年）该书的最后一版即第六版中，这个假说在最后一个注，即第七个注中又得到了阐述。

宇宙空间存在着类似康德—拉普拉斯星云假说所设想的原始星云炽热的云雾体，英国天文学家威·哈金斯于1864年用光谱学方法证明了这一点，他在天文学中广泛地运用了，基尔霍夫和罗·本生在1859年造的光谱分析法。恩格斯在这里参考了安·赛奇《太阳》1872年不伦瑞克版第787、789-790页（A. Secchi. 《Die Sonne》 Braunschweig, 1872, S. 787, 789-790）。

33 指宪章运动。这是十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中期英国工人的政治运动，其口号是争取实行包括要求普选权和一系列为工人保证此项权利的许多条件的人民宪章。按照列宁的定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见《列宁全集》第29卷

- 第 276 页)。宪章运动的衰落，是由于英国工商业垄断的加强以及英国资产阶级用超额利润收买英国工人阶级上层(“工人贵族”)，这造成了英国工人阶级中机会主义倾向的增长，其表现就是工联领袖放弃对宪章运动的支持。
- 34 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
- 35 指欧洲各大国之间为争夺同印度和美洲通商的霸权以及殖民地市场而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进行的一系列战争。最初主要的竞争国家是英国和荷兰(1652—1654、1664—1667 和 1672—1674 年的英荷战争是典型的商业战争)，后来决定性的斗争是在英国和法国之间展开的。所有这些战争的胜利者是英国，到十八世纪末，在它手中已经集中了几乎全部的世界贸易。
- 36 《傅立叶全集》1845 年巴黎版第 1 卷第 50 页及以下页。
- 37 海外贸易公司是 1772 年在普鲁士成立的贸易信用公司。该公司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贷款，实际上起了政府的银行老板和财政方面的经纪人的作用。1904 年正式成为普鲁士国家银行。
- 38 “自由的人民国家”是七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纲领性要求和流行口号。对这个口号的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见本卷第 19—25、30 页，并见列宁的著作《国家与革命》第 1 章第 4 节和第 4 章第 3 节(《列宁全集》中文版第 25 卷第 382—388 页和第 426—429 页)。
- 39 这里关于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全部财富的材料引自罗·吉芬的报告《近来联合王国的资本积累》。这个报告是 1878 年 1 月 15 日在统计学会宣读的，发表在 1878 年 3 月号伦敦《统计学会杂志》上。
- 40 德国工业家中央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 1878 年 2 月 21—22 日在柏林举行。

恩格斯

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¹

3月14日下午两点三刻，当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停止思想了。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总共不过两分钟，等我们再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但已经是永远地睡着了。

这个人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着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在不久将来就会使人感觉到。

正像达尔文²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价值的发现，这里就豁然开朗了，而先前无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或

者社会主义批评家所做的一切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甚至只要能作出一个这样的发现，也已经是幸福的了。但是马克思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肤浅地研究的。

这位科学巨匠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即使它的实际应用甚至还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但是当有了立即会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产生革命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完全不同了。例如，他曾经密切地注意电学方面各种发现的发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注意了马赛尔·德普勒的发现³。

因为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某种方式参加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所建立的国家制度的事业，参加赖有他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解放条件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这实际上就是他毕生的使命。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⁵，《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⁶，《新莱茵报》（1848—1849年）⁷，《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⁸，以及许多富有战斗性的小册子，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是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作为这一切工作的完成——老实说，协会的这位创始人即使别的什么也没有做，也可以拿这一成果引以自豪。

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是当代最遭嫉恨和最受诬蔑的人。各国政府——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纷纷争先恐后地诽谤他，诅咒他。他对这一切毫不在意，把它们当做蛛丝一样轻轻抹去，只是在万分必要时才给予答复。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亚，千百万革命战友无不对他表示尊敬、爱戴和悼念，而我敢大胆地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

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垂不朽！

载于 1883 年 3 月 22 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13
号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9 卷第 374——376 页

注 释

- 1 这是恩格斯 1883 年 3 月 17 日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葬马克思时用英语发表的讲话，标题是编者加的。
- 2 《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注 2。
- 3 在 1882 年慕尼黑电气展览会上，法国物理学家马 3 赛尔·德普勒展出了他在米斯巴赫至慕尼黑之间架设的第一条实验性输电线路。
- 4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注 3。
- 5 《前进报》（《Vorwärts!》）是德国的报纸，该报于 1844 年 1 月至 12 月在巴黎出版，每周出两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该报发表过文章。马克思从 1844 年夏天起开始密切地参与该报的编辑工作，该报在他的影响下开始具有共产主义性质，该报对普鲁士反动制度展开了尖锐的批评。根据普鲁士政府的要求，基佐内阁于 1845 年 1 月下令把马克思及该报其他一些撰稿人驱逐出法国；《前进报》因而停刊。
- 6 见本书《卡尔·马克思》注 12。
- 7 见本书《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注 15。
- 8 见本书《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注 17。
- 9 见本书《哥达纲领批判》注 25。

恩格斯
致左尔格¹的信
霍布根

1883年3月15日晚11时45分于伦敦

亲爱的左尔格：

你的电报已于今晚收到。衷心感谢！

当时要把马克思的健康状况定期告诉你是不可能的，因为病情一直变化不定。现在简单地谈谈主要情况。

在他夫人逝世前不久，1881年10月，他得了胸膜炎。痊愈后，在1882年2月被送到阿尔及尔，由于路上碰到寒冷潮湿的天气，到那里又得了胸膜炎。那里天气一直很坏；他的病刚一治好，由于夏天的酷暑即将到来，他被送到蒙特卡罗（摩纳哥）去。到那里他又得了一次胸膜炎，但病势较轻。那里天气也很坏。最后，病治好了，他到了巴黎附近的阿尔让台，住在他的女儿龙格夫人家里。在那里，他用附近的恩吉安硫矿泉水医治他的慢性支气管炎。那里虽然天气仍旧不好，但治疗还是有效的。然后他又到斐维住了六个星期，九月间，他从那里回来时，看起来健康几乎完全恢复了。医生许可他到英国南部的海滨去过冬。而他自己对无所事事的漫游生活已感到很厌倦，所以，要是再一次把他流放到欧洲

南部去，也许对他的身体有好处，而对他的精神却有害处。当伦敦雾季开始的时候，他被送到威特岛去。那里阴雨连绵；他又感冒了。新年时我和肖莱马²想去看他，但是得到通知，要杜西³马上到他那里去。紧接着燕妮⁴去世了；他回到这里的时候又得了支气管炎。由于过去的种种情况，加上他这么大的年纪，这是很危险的。此外还产生许多并发症，尤其是肺脓肿以及体力异常迅速的衰竭。虽然如此，病情总是在好转；上星期五，给他治病的主要医生（伦敦最好的青年医生之一，是由雷伊·朗凯斯特专门推荐的）还给了我们莫大的希望。但只要在显微镜下观察过一次肺部组织的人都知道，肺部化脓的地方血管壁穿孔的危险是多么大。所以，六个星期以来，每天早晨当我走到拐角的地方的时候，我总是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看看窗帘是不是放下来了。昨天下午两点半钟——这是白天探望他的最合适的时间——我到了他家里，看到全家都在掉泪：似乎快到临终的时刻了。我就询问了情况，想弄清原因，进行安慰。先是少量出血，接着体力就立刻衰竭了。我们那个非常好的老琳蘅⁵看护他要胜过任何母亲照顾自己的孩子，她走上楼去，立刻又下来了，说他处在半睡状态，我可以跟她一起上去。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躺在那里睡着了，但是已经长眠不醒了。脉搏和呼吸都已停止。在两分钟之内，他就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

由于自然的必然性而发生的一切事件，不管多么可怕，它们自身都包含着一种安慰。这一次情况也是一样。医术或许还能保证他勉强拖几年，无能为力地活着，不是很快地死去，而是慢慢地死去，以此来证明医术的胜利。但是，这是

我们的马克思绝不能忍受的。眼前摆着许多未完成的工作，受着想要完成它们而又不能做到的唐达鲁士⁶式的痛苦，这样活着，对他来说，比安然地死去还要痛苦一千倍。他常常喜欢引用伊壁鸠鲁⁷的话：“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⁸不能眼看着这个伟大的天才象废人一样勉强活着，去给医学增光，去受他健壮时经常予以痛击的庸人们嘲笑，——不能那样，现在的情况要比那样好一千倍，我们后天把他送到他夫人安息的墓地去，这要比那样好一千倍。

根据过去发生的、连医生也不如我了解得清楚的情况来看，我认为只有这一条出路。

尽管这样，人类却失去了一个头脑，而且是它在当代所拥有的最重要的一个头脑。无产阶级运动在沿着自己的道路继续前进，但是，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德国人在紧要关头都自然地去请教的中心点没有了，他们过去每次都从这里得到只有天才和造诣极深的人才能作出的明确而无可反驳的忠告。那些土名人和小天才（如果不说他们是骗子的话），现在可以为所欲为了。最后的胜利依然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迂回曲折的道路，暂时的和局部的迷误——虽然这也是难免的——，现在将会比以前多得多了。不过我们一定要克服这些障碍，否则，我们活着干什么呢？我们决不会因此丧失勇气。

你的 弗·恩格斯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5卷第458—460页

注 释

- 1 左尔格，弗里德里希·阿道夫(1828-1906)-国际工人运动、美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卓越活动家，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的参加者 1852 年侨居美国，第一国际美国各支部的组织者联合会委员会书记，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纽约总委员会总书记（1872—1874），北美社会主义工人党(1876)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
- 2 肖莱马，卡尔（1834-1892）——著名的德国有机化学家，辩证唯物主义者，曼彻斯特的教授，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
- 3 杜西一一即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
马克思-艾威林，爱琳娜（1855-1898）——八十至九十年代英国工人运动和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政论家，马克思的女儿，1884 年起为爱德华。艾威林的妻子；曾在恩格斯直接领导下工作，积极参加非熟练工人群众运动的组织工作，1889 年伦敦码头工人罢工的组织者之一；曾参加 1889 年国际社会主义工人代表大会筹备工作。
- 4 指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龙格，她于 1883 年 1 月 11 日去世。
- 5 德穆特，海伦（琳衡）（1823—1890）——马克思家的女佣和忠实的朋友。
- 6 唐达鲁士是古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王，因侮辱诸神被罚沉沦地狱，永世受苦。他身立水中，头上悬挂着果子，每当他想掬水解渴或摘果充饥的时候，水和果子就消失不见。
- 7 伊壁鸠鲁(约公元前 341-270)——杰出的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
- 8 引自伊壁鸠鲁给美诺寇的信《论道德》第 2 章(此处系套用)。

恩格斯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¹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²

1888年单行本序言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在柏林出版）的序言中说，1845年我们两人在布鲁塞尔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特别是由马克思所制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同德国哲学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³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八开本两厚册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耗子的牙齿去批判了”^①。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四十多年，马克思也已逝世了。不论他或我，都再没有过机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关于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曾经在某些地方做了说明，但是无论哪个地方都说得不够全面系统。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

① 见本书《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编者注

来没有回顾过他。

这期间，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文明世界的一切语言中都找到了代表。另一方面，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各国，好像有点要复活的样子。甚至在德国，各大学里借哲学名义来施舍的折衷主义残羹剩汁，看来已惹得人人都讨厌起来了。

因此，我越来越觉得把我们和黑格尔哲学的关系，即我们怎样从这一哲学出发并且怎样同它脱离，做一个简要而有系统的说明是很必要的了。同样地，我认为我们还欠着一笔信誉债，就是要完全承认，在我们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所以，当“新时代”杂志编辑部要我写一篇批评文章来评述施达克⁴那本论费尔巴哈的书⁵时，我也就欣然同意了。我的这篇文章发表在该杂志1886年第4期和第5期上，现在这个版本是经过修订的单行本。

把这几页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重读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一部分是解释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个解释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在旧稿里面对于费尔巴哈的学说本身没有批判；所以，旧稿对于我们现在这一目的是不适用的。可是我在马克思的一本旧笔记中找到了十一条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拿来作为本书的附录。^①这是一份供进一步研究用的匆匆写成的笔记，根本没有打算付印。但是这些笔记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9页。——编者注

文件，是非常宝贵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88年2月21日于伦敦

载于1888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
典哲学的终结》一书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1卷第411—412页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①使我们返回到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就时间来说距离我们不过一代之久，但是它对德国现在的一代人却如此陌生，似乎已经相隔整整一个世纪了。然而这终究是德国准备 1848 年革命的时期；那以后我国所发生的一切，仅仅是 1848 年的继续，仅仅是革命遗嘱的执行罢了。

正像在十八世纪的法国一样，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哲学革命也作了政治变革的前导。但是这两个哲学革命看起来是多么地不同呵！法国人同一切官方科学，同教会，常常也同国家进行公开的斗争；他们的著作要拿到国外，拿到荷兰或英国去印刷，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狱^⑥。反之，德国人是一些教授，是一些由国家任命的青年的导师；他们的著作是公认的教科书，而全部发展的最终体系，即黑格尔的体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推崇为普鲁士王国的国家哲学！在这些教授后面，在他们的迂腐晦涩的言词后面，在他们的笨拙枯燥的语句里面竟能隐藏着革命吗？不正是那时

① 哲学博士卡·尼·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 年斯图加特斐·恩克书店版。

被认为是革命代表者的人即自由派激烈反对这种使头脑混乱的哲学吗？但是不论政府或自由派都没有看到的東西，至少有一个人在 1833 年已经看到了，这个人就是亨利希·海涅。⁷

举个例子来说吧。不论哪一个哲学命题都没有像黑格尔的一个著名命题那样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这个命题就是：

“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⁸

这显然是把现存的一切神圣化，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⁹是这样想的，他的臣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在黑格尔看来，凡是现存的决非无条件地也是现实的。在他看来，现实的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的东西：

“现实性在其展开过程中表明为必然性”；

所以他决不承认政府的任何一个措施——黑格尔本人举“某种税制”为例——都已经无条件地是现实的。¹⁰但是必然的东西归根到底会表明自己也是合理的。所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在应用于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时，意思只是说：这个国家在它是必然的这个限度内是合理的，是合乎理性的。如果说，在我们看来，它终究是恶劣的，而且尽管恶劣，它仍旧继续存在，那末，政府的恶劣，就可以用臣民的相应的恶劣来辩护和说明。当时的普鲁士人有他们所应该有的政府。

但是，根据黑格尔的意见，现实性决不是某种社会制度或政治制度在一切环境和一切时代所固有的属性。恰恰相反，罗马共和国是现实的，但是把它排斥掉的罗马帝国也是现实的。法国的君主制在 1789 年已经变得如此不现实，即如此丧

失了任何必然性，如此不合理，以致必须由大革命（黑格尔谈论这次革命时总是兴高采烈的）来把它消灭掉。所以，在这里，君主制是不现实的，革命是现实的。同样，在发展的进程中，以前的一切现实的东西都会成为不现实的，都会丧失自己的必然性、自己存在的权利、自己的合理性；一种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现实的东西就会起来代替正在衰亡的现实的东西，——如果旧的东西足够理智，不加抵抗即行死亡，那就和平地代替；如果旧的东西抵抗这种必然性，那就通过暴力来代替。这样一来，黑格尔的这个命题，由于黑格尔的辩证法本身，就转化为自己的反面：凡在人类历史领域中是现实的，随着时间的推移，都会成为不合理的，因而按其本性来说已经是不合理的，一开始就包含着不合理性；凡在人们头脑中是合理的，都注定要成为现实的，不管它和现存的、表面的现实多么矛盾。按照黑格尔的思维方法的一切规则，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个命题，就变为另一个命题：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¹¹

但是，黑格尔哲学（我们在这里只限于考察这种作为从康德¹²以来的整个运动的顶峰的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哲学所应当认识的真理，在黑格尔看来，不再是一堆现成的、一经发现就只要熟读死记的教条了；现在，真理是包含在认识过程本身中，包含在科学的长期的历史发展中，而科学从认识的较低阶段上升到较高阶段，愈升愈高，但是永远不能通过所谓绝对真理的发现而达到这样一点，在这一点上它再也不能前进一步，除了袖手一旁惊愕地望着这

个已经获得的绝对真理出神，就再也无事可做了。这不仅在哲学认识的领域中是如此，就是在任何其他认识领域中以及在实践行动的领域中也是如此。历史同认识一样，永远不会把人类的某种完美的理想状态看做尽善尽美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反之，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是必然的，因此，对它所由发生的时代和条件说来，都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对它自己内部逐渐发展起来的新的、更高的条件来说，它就变成过时的和没有存在的理由了；它不得不让位于更高的阶段，而这个更高的阶段也同样是要走向衰落和灭亡的。正如资产阶级依靠大工业、竞争和世界市场在实践中推翻了一切稳固的、历来受人尊崇的制度一样，这种辩证哲学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相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在它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也不过是这一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而已。诚然，它也有保守的方面：它承认认识和社会的每一个阶段对自己的时间和条件来说都有存在的理由，但也不过如此而已。这种看法的保守性是相对的，它的革命性质是绝对的——这就是辩证哲学所承认的唯一绝对的东西。

我们在这里没有必要去研究这种看法是否完全跟自然科学的现状相符合的问题，自然科学预言了地球本身的可能的末日和它的可居性的相当确实的末日，从而承认，人类历史

不仅有上升的过程，而且也有下降的过程。无论如何，我们现在距离社会历史开始下降的转折点还相当远，我们也不能要求黑格尔哲学去研究当时还根本没有被自然科学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

但是这里必须指出一点：黑格尔并没有这样清楚他作出如上的阐述。这是他的方法必然要得出的结论，但是他本人从来没有这样明确地作出这个结论。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¹³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他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在《逻辑学》中，他可以再把这个终点变为起点，因为在这里，终点，即绝对观念——其所以是绝对的，只是因为他关于这个观念绝对说不出什么来，——使自己“外化”（即转化）为自然界，然后在精神中，即在思维中和在历史中，再返回到自身。但是要在全部哲学的终点上这样返回到起点，只有一条路可走，即把历史的终点设想成这样：人类将达到正是对这个绝对观念的认识，并宣布对绝对观念的这种认识已经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但是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哲学的认识是这样，历史的实践也是这样。人类既然通过黑格尔想出了绝对观念，那末在实践中也一定达到了能够把这个绝对观念变成现实的地步。因此，绝对观念就

不必向自己的同时代人提出太高的实践的政治要求。因此，我们在《法哲学》的结尾发现，绝对观念应当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这么顽强而毫无结果地向他的臣民许诺的那种等级制君主政体中得到实现，就是说，应当在有产阶级那种适应于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有限的和温和的间接统治中得到实现；在这里还用思辨的方法给我们证明了贵族的必要性。

可见，单是体系的内部需要就足以说明，为什么彻底革命的思维方法竟产生了极其温和的政治结论。这个结论的特殊形式当然是由下列情况造成的：黑格尔是一个德国人而且和他的同时代人歌德¹⁴一样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妨碍黑格尔的体系包括了以前的任何体系所不可比拟的巨大领域，而且没有妨碍它在这一领域中发展了现在还令人惊奇的丰富思想。精神现象学（也可以叫做同精神胚胎学和精神古生物学类似的学问，是对个人意识各个发展阶段的阐述，这些阶段可以看做人的意识在历史上所经过的各个阶段的缩影）、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而精神哲学又分成各个历史部门来研究，如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哲学史、美学等等，——在所有这些不同的历史领域中，黑格尔都力求找出并指出贯穿这些领域的发展线索；同时，因为他不仅是一个富于创造性的天才，而且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物，所以他在每一个领域中都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当然，由于“体系”的需要，他在这里常常不得不

求救于强制性的结构，这些结构直到现在还引起他的渺小的敌人如此可怕的喊叫。但是这些结构仅仅是他的建筑物的骨架和脚手架；人们只要不是无谓地停留在它们面前，而是深入到大厦里面去，那就会发现无数的珍宝，这些珍宝就是在今天也还具有充分的价值。在一切哲学家看来，正是“体系”是暂时性的东西，因为体系产生于人的精神的永恒的需要，即克服一切矛盾的需要。但是，假定一切矛盾都一下子永远消除了，那末我们就会达到所谓绝对真理，世界历史就会终结，而历史是一定要继续发展下去的，虽然它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这样就产生了一个新的、不可解决的矛盾。既然我们了解到（对获得这种了解来说，归根到底没有一个人比黑格尔本人对我们的帮助更大）：这样给哲学提出任务，无非就是要求一个哲学家完成那只有全人类在其前进的发展中才能完成的事情，那末全部以往所理解的哲学也就终结了。我们就把沿着这个途径达不到而且对每个个别人也是达不到的“绝对真理”撇在一边，而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

可以理解，黑格尔的体系在德国的富有哲学味道的气氛中曾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这是一次胜利进军，它延续了几十年，而且决没有随着黑格尔的逝世而停止。相反地，正是在 1830 到 1840 年这个时期，“黑格尔主义”的独占统治

达到了顶点，它甚至或多或少地感染了自己的敌人；正是在这个时期，黑格爾的观点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大量浸入了各种科学，甚至渗透了通俗读物和日报，而普通的“有教养的意识”就是从这些通俗读物和日报中汲取自己的思想材料的。但是这一全线胜利仅仅是一种内部斗争的序幕罢了。

黑格爾的整个学说，如我们所看到的，给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都留下了广阔的活动场所；而在当时的理论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特别重视黑格爾的体系的人，在两个领域中都可以成为相当保守的，认为辩证方法是主要的东西的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可以属于最极端的反对派。黑格爾本人，虽然在他的著作中相当频繁地爆发出革命的怒火，但是总的说来似乎更倾向于保守的方面；他在体系上所花费的“艰苦的思想工作”的确比他在方法上所花费的要多得多。到三十年代末，他的学派内的分裂愈来愈明显了。左翼，即所谓青年黑格爾派，在反对正统的虔信派教徒和封建反动派的斗争中一点一点地放弃了在哲学上对当前的紧迫问题所采取的超然态度，由于这种态度，他们的学说在此之前曾经得到了政府的容忍、甚至保护；到了1840年，正统教派的伪善和封建专制的反动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登上了王座，这时人们就不可避免地要公开站在这方面或那方面了。斗争依旧是用哲学的武器进行的，但已经不再是为了抽象的哲学目的；问题已经直接是要消灭传统的宗教和现存的国家了。如果说，在《德国年鉴》¹⁶中实践的终极目的主要还是穿着哲学的外衣出场，那末，在1842年的《莱茵报》¹⁷上青年黑格爾派已经直接作为

努力向上的激进资产阶级的哲学出现，只是为了迷惑书报检查机关才用哲学伪装起来。

但是，政治在当时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就转为反宗教的斗争；这一斗争，特别是从1840年起，间接地也是政治斗争。1835年出版的施特劳斯¹⁸的《耶稣传》¹⁹成了头一个推动力。后来，布鲁诺·鲍威尔²⁰反对该书中所阐述的福音神话发生说，证明许多福音故事都是作者自己虚构的。两人之间的争论是在“自我意识”对“实体”的斗争这一哲学幌子下进行的。神奇的福音故事是如何发生的，是在宗教团体内部通过不自觉的、传统的神话发生的途径形成的呢，还是福音书作者自己虚构的，——这个问题竟扩展为这样一个问题：在世界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是“实体”呢，还是“自我意识”；最后，出现了施蒂纳²¹，现代无政府主义的先知（巴枯宁²²从他那里抄袭了好多东西），他用他的至上的“唯一者”²³压倒了至上的“自我意识”。

我们不打算更详细地考察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的这一方面。在我们看来，更重要的是：由于对现存宗教进行斗争的实际必要性，大批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返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他们在这里跟自己的学派的体系发生了冲突。唯物主义把自然界看做唯一现实的东西，而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界只是绝对观念的“外化”，好像是这个观念的退化；无论如何，思维及其思想产物即观念在这里是本原的，而自然界是派生的，只是由于观念的下降才存在。他们就在这个矛盾中徬徨，尽管程度各不相同。

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²⁴出版了。它一下

子就消除了这个矛盾，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即自然界的产物本身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魔法被解除了；“体系”被炸开了，而且被抛在一旁，矛盾既然仅仅是存在于想像之中，也就解决了。——这部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会过的人才能想像得到。那时大家都很兴奋：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的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①中看出来。

甚至这部书的缺点也加强了它的一时的影响。美文学的、有时甚至是夸张的笔调赢得了广大的读者，无论如何，在抽象而费解的黑格尔主义的长期统治以后，使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对于爱的过度崇拜也是这样。这种崇拜，虽然不能加以辩护，但是情有可原，因为它是反对已经变得不能容忍的“纯粹思维”的专制的。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从1844年起在德国的“有教养的”人们中间像瘟疫一样传播开来的“真正的社会主义”²⁵，正是把费尔巴哈的这两个弱点当做自己的出发点的。它以美文学的词句代替了科学的认识，主张靠“爱”来实现人类的解放，而不主张用经济上改革生产的办法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一句话，它沉溺在令人厌恶的美文学和泛爱的空谈中了。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卡尔·格律恩先生²⁶。

还有一点不应当忘记，这就是：黑格尔学派虽然解体了，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268页。——编者注

但是黑格尔哲学并没有被批判地克服。施特劳斯和鲍威尔各自抓住黑格尔哲学的一个方面，在论战中互相攻击。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并且干脆把它抛在一旁。但是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像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一任务是怎样实现的。

但是这时，1848年的革命毫不客气地把任何哲学都撇在一旁，正如费尔巴哈把他的黑格尔撇在一旁一样。这样一来，费尔巴哈本人也被挤到后台去了。

二

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远古时代，人们还完全不知道自己身体的构造，并且受梦中景象的影响^①，于是就产生一种观念：他们的思维和感觉不是他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这个身体之中而在人死亡时就离开身体的灵魂的活动。从这个时候起，人们不得不思考这种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既

① 蒙昧人和低级野蛮人中间，现在还流行着这样一种观念：梦中出现的人的形象是暂时离开肉体的灵魂；因而现实的人应当对自己出现于他人梦中时针对做梦者而采取的行为负责。例如伊姆·特恩于1884年在圭亚那的印第安人中就发现了这种情形。²⁷

然灵魂在人死时离开肉体而继续活着，那末就没有任何理由去设想它本身还会死亡；这样就产生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那个发展阶段上决不是一种安慰，而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命运，并且往往是一种真正的不幸，例如在希腊人那里就是这样。到处引起这种个人不死的无聊臆想的，并不是宗教上的安慰的需要，而是由普遍的局限性所产生的困境：不知道已经被认为存在的灵魂在肉体死后究竟怎么样了。同样，由于自然力被人格化，最初的神产生了。随着宗教的向前发展，这些神愈来愈具有了超世界的形象，直到最后，由于智力发展中自然发生的抽象化过程——几乎可以说是蒸馏过程，在人们的头脑中，从或多或少有限的和互相限制的许多神中产生了一神教的唯一的神的观念。

因此，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的关系问题，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像一切宗教一样，其根源在于蒙昧时代的狭隘而愚昧的观念。但是，这个问题，只是在欧洲人从基督教中世纪的长期冬眠中觉醒以后，才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思维对存在的地位问题，这个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也起过巨大作用的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这个问题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了出来：世界是神创造的呢，还是从来就有的？

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

义的各种学派。

除此之外，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本来没有任何别的意思，它们在这里也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给它们加上别的意思，就会造成怎样的混乱。

但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对这个问题的肯定回答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在现实世界中所认识的，正是这个世界的思想内容，也就是那种使世界成为绝对观念的逐渐实现的东西，这个绝对观念是从来就存在的，是不依赖于世界并且先于世界而在某处存在的；但是思维能够认识那一开始就已经是思想内容的内容，这是十分明显的。同样明显的是，在这里，要证明的东西已经默默地包含在前提里面了。但是这决不妨碍黑格尔从他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证中做出进一步的结论：因为对他的思维来说他的哲学是正确的，所以他的哲学也就是唯一正确的；只要人类马上把他的哲学从理论转移到实践中去，并按照黑格尔的原则来改造全世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会得到证实。这是他和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所共有的幻想。

但是，另外还有许多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

谟²⁸和康德就属于这一类，而他们在哲学的发展上是起过很重要的作用的。对驳斥这一观点具有决定性的东西，已经由黑格尔说过了，凡是从唯心主义观点出发所能说的，他都说了；费尔巴哈所附加的唯物主义的的东西，与其说是深刻的，不如说是机智的。对这些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既然我们自己能够制造出某一自然过程，使它按照它的条件产生出来，并使它为我们的目的服务，从而证明我们对这一过程的理解是正确的，那末康德的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就完结了。动植物体内所产生的化学物质，在有机化学把它们一一制造出来以前，一直是这种“自在之物”；当有机化学开始把它们制造出来时，“自在之物”就变成为我之物了，例如茜草的色素——茜素，我们已经不再从田地里的茜草根中取得，而是用便宜得多、简单得多的方法从煤焦油里提炼出来了。哥白尼²⁹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³⁰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一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³¹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³²，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如果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复活康德的观点，而英国的不可知论者企图复活休谟的观点（在那里休谟的观点从来没有绝迹），那末，鉴于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推翻，这种企图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而在实践上只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羞答答的作法。

但是，在从笛卡儿³³到黑格尔和从霍布斯³⁴到费尔巴哈这一长时期内，推动哲学家前进的，决不像他们所想像的那样，只是纯粹思想的力量。恰恰相反，真正推动他们前进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和工业的强大而日益迅速的进步，在唯物主义者那里，这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而唯心主义体系也愈来愈加进了唯物主义的内容，力图用泛神论的观点来调和精神和物质的对立；因此，归根结底，黑格尔的体系只是一种就方法和内容来说唯心主义地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

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施达克在他对费尔巴哈的评述中，首先研究费尔巴哈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这个基本问题的立场。在简短的导言里，作者对以前的、特别是从康德以来的哲学家的见解，都是用不必要的晦涩难解的哲学语言来阐述的，并且由于过分形式主义地死守黑格尔著作中的个别词句而大大贬低了黑格尔。在这个导言以后，他详细地叙述了费尔巴哈的有关著作中一贯表现出来的“形而上学”本身的发展进程。这一部分叙述得很用心，很明白，不过像整本书一样，决不是到处都不能避免的哲学用语堆砌得太多了。作者愈是不保持同一学派或者哪怕是费尔巴哈本人的用语，愈是把各种学派、特别是在今天像传染病一样流行的、自称为哲学派别的那些学派的用语混在一起，这种堆砌所造成的混乱就愈大。

费尔巴哈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诚然，他从来不是完全正统的黑格尔主义者）走向唯物主义的发展进程，这一发展使他在一定的阶段上同自己的这位先驱者的唯心主义体系完全决裂了。最后，他不可遏止地意识到，黑格尔的

“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超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但是费尔巴哈到这里就突然停止不前了。他不能克服通常的哲学偏见，即不反对事情本质而反对唯物主义这个名词的偏见。他说：

“在我看来，唯物主义是人类本质和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我认为它不是像生理学家、狭义的自然科学家如摩莱肖特³⁵所认为的那样，不是像他们从他们的观点和专业出发所必然主张的那样，即不是大厦本身。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完全一致；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³⁶

费尔巴哈在这里把唯物主义这种建立在对物质和精神关系的特定理解上的一般世界观同这一世界观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即十八世纪所表现的特殊形式混为一谈了。不仅如此，他还把唯物主义同它的一种肤浅的、庸俗的形式混为一谈，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现在就以这种形式继续存在于自然科学家和医生的头脑中，并且被毕希纳³⁷、福格特³⁸和摩莱肖特在五十年代拿着到处叫卖。但是，像唯心主义一样，唯物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的发展阶段。甚至随着自然科学领域中每一个划时代的发现，唯物主义也必然要改变自己的形式；而自从历史也被唯物主义地解释的时候起，一条新的发展道路也在这里开辟出来了。

上一世纪的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唯物主义，因为那时在所有自然科学中达到了某种完善地步的只有力学，而且只有刚体（天空的和地上的）力学，简言之，即重量的力学。化学刚刚处于幼稚的燃素说的形态中。生物学尚在襁褓中；对植物和动物的机体只作过极粗浅的研究，并用纯粹机械的原因来加以解释；正如在笛卡儿看来动物是机器一样，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者看来，人是机器。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力学定律虽然也起作用，但是被其他较高的定律排挤到次要地位），这是法国古典唯物主义的一个特有的、但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这种唯物主义的第二个特有的局限性在于：它不能把世界理解为一种过程，理解为一种处在不断的历史发展中的物质。这是同当时的自然科学状况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形而上学的即反辩证法的哲学思维方法相适应的。人们知道自然界是处在永恒的运动中。但是根据当时的想法，这种运动是永远绕着一个圆圈旋转，因而始终停留在同一地点；总是产生同一的结果。这种想法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康德的太阳系发生说刚刚提出，而且还只是被看做纯粹的奇谈。地球发展史，即地质学，还完全没有人知道，而关于现今的生物是由简单到复杂这样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结果的看法，当时还根本不可能科学地提出来。因此，对自然界的非历史的观点是不可避免的。根据这一点大可不必去责备十八世纪的哲学家，因为连黑格尔也有这种观点。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只是观念的“外化”，它在时间上不能发展，只是在空间中展示自己的多样性，因此，它把自己所包含的一切发展阶段同时地和

一个挨着一个地展示出来，并且注定永远重复总是同一的过程。黑格尔把发展是在空间以内、但在时间（这是一切发展的基本条件）以外发生的这种谬论强加于自然界，恰恰是在地质学、胚胎学、植物和动物生理学以及有机化学都已经建立起来，并且在这些新科学的基础上到处都产生了预示后来的进化论的天才猜测（例如歌德和拉马克³⁹）的时候。但是，体系要求这样，因此，方法为了要迎合体系就不得不背叛自己。

这种非历史的观点也表现在历史领域中。在这里，反对中世纪残余的斗争限制了人们的视野。中世纪被看做是由千年来普遍野蛮状态所引起的历史的简单中断；中世纪的巨大进步——欧洲文化领域的扩大，在那里一个挨着一个形成的富有生命力的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巨大的技术进步，这一切都没有被人看到。这样一来，对伟大历史联系的合理看法就不可能产生，而历史至多不过是一部供哲学家使用的例证和插图的汇集罢了。

五十年代在德国把唯物主义庸俗化的小贩们，丝毫没有超出他们的老师们的这个范围。自然科学后来获得的一切进步，仅仅成了他们否认有世界创造主存在的新论据；而在进一步发展理论方面，他们实际上什么事也没有做。如果说，唯心主义当时已经智穷才竭，并且在1848年革命中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那末，使它感到满足的是，唯物主义在这个时候更是江河日下。费尔巴哈拒绝为这种唯物主义负责是完全对的；只是他不应该把这些巡回传教士的学说同一般唯物主义混淆起来。

但是，这里应当注意两种情况。第一，当费尔巴哈在世

时，自然科学也还是处在剧烈的酝酿过程中，这一过程只是在最近十五年才达到了足以澄清问题的、相对完善的地步；新的认识材料以空前的规模被提供出来，但是，只是到最近才有可能在这种接连而来的发现的混乱状态中建立起联系，从而使它们条理化。虽然这三个决定性的发现——细胞、能量的转化和以达尔文命名的进化论，费尔巴哈全看到了，但是，这位在乡间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怎么能够充分研究科学，给这些发现以足够的评价呢？就是在自然科学家当中，当时有一部分人还对这些发现持有异议，有一部分人还不懂得充分利用这些发现。这里唯一可以非难的，是德国的可怜的状况，由于这种状况，当时哲学讲席全被那些故弄玄虚的、折衷主义的、打小算盘的人所占据，而比这些家伙高明百倍的费尔巴哈，却不得不在穷乡僻壤中过着农民式的孤陋寡闻的生活。因而，现在已经成为可能的、排除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一切片面性的、历史的自然观，始终没有为费尔巴哈所了解，这就不是他的过错了。

第二，费尔巴哈说，纯粹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虽然

“是人类知识的大厦的基础，但是，不是大厦本身”，

这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也有自己的发展史和自己的科学。因此，任务在于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即所谓历史科学和哲学科学的总和，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是，这个任务费尔巴哈是完成不了的。他虽然有“基础”，但是在这里还没有摆脱传统的唯心主义束缚，这

一点他自己也是承认的，他说：

“向后退时，我同唯物主义者是一致的；但是往前进时就不一致了。”

但是在这里，在社会领域内，正是费尔巴哈本人没有“前进”，没有超过自己在 1840 年或 1844 年的观点，这仍旧主要是由于他的孤寂生活，这种生活迫使这位比其他任何哲学家都更爱好社交的哲学家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而不是从和他才智相当的人们的友好或敌对的接触中得出自己的思想。费尔巴哈在这个领域内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仍然是唯心主义者，我们将在下面加以详细的考察。

这里还应当指出，施达克在找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时找错了地方。他说：

“费尔巴哈是唯心主义者，他相信人类的进步。”（第 19 页）“唯心主义仍旧是一切的基础，根基。在我们看来，实在论只是在追求自己的理想的意图时使我们不致误入迷途而已。难道同情、爱以及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不是理想的力量吗？”（第 VIII 页）

第一，在这里无非是把对理想目的的追求叫做唯心主义。但这些目的必然地至多是同康德的唯心主义及其“绝对命令”有联系；然而连康德都把自己的哲学叫做“先验的唯心主义”，这决不是因为那里面也讲到过道德的理想，而完全是由于别的理由，这理由施达克是会记得的。有一种偏见，认为哲学唯心主义的中心就是对道德理想即对社会理想的信仰，这种偏见是在哲学之外产生的，是在那些把席勒⁴⁰诗歌中符合他们需要的少数哲学上的只言片语背得烂熟的德国庸人中产生的。没有一个人比恰恰是十足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

更尖锐地批评了康德的软弱无力的“绝对命令”(它之所以软弱无力,是因为它要求不可能的东西,因而永远达不到任何现实的东西),没有一个人比他更辛辣地嘲笑了席勒所传播的那种沉湎于不能实现的理想的庸人倾向(参见“现象学”⁴¹)。

第二,决不能避免这种情况: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甚至吃喝也是由于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饥渴引起的,并且是由于同样通过头脑感觉到的饱足而停止。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通过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末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这样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者呢?

第三,认为人类(至少在现时)总的说来是沿着进步方向运动的这种信念,是同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绝对不相干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同自然神论者⁴²伏尔泰和卢梭⁴³一样,几乎狂热地抱有这种信念,并且往往为它付出最大的个人牺牲。如果说,有谁为了“对真理和正义的热诚”(就这句话的正面的意思说)而献出了整个生命,那末,例如狄德罗⁴⁴就是这样的人。由此可见,施达克把这一切说成是唯心主义,这只是证明:“唯物主义”这个名词以及两个派别的全部对立,在这里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

事实上,施达克在这里向庸人的那种由于教士的多年诽谤而对“唯物主义”这个名称产生的偏见做了不可饶恕的让步,虽然这也许是不自觉的。庸人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

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简言之，即他本人暗中迷恋着的一切齷齪行为；而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对美德、普遍的人类爱的信仰，总之，对“美好世界”的信仰，——他在别人面前夸耀这个“美好世界”，但是他自己至多只是在这样的时候才相信这个“美好世界”，这时，他由于自己平时的“唯物主义的”放纵而必然感到懊丧或遭到破产，并因此唱出了他心爱的歌：人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

在其他方面，施达克极力保护费尔巴哈，反对现今在德国以哲学家名义大吹大擂的大学讲师们的攻击和学说。对关心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些不肖子孙的人们来说，这的确是很重要的；对施达克本人来说，这也许是必要的。不过我们就此饶了读者吧。

三

我们一接触到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和伦理学，他的真正的唯心主义就显露出来了。费尔巴哈决不希望废除宗教，他是希望使宗教完善化。哲学本身应当溶化在宗教中。

“人类的各个时期彼此借以区别的，仅仅是宗教的变迁。其一历史运动，只有在它深入人心时，才是根深蒂固的。心不是宗教的形式，因而宗教也不应当存在于心中；心是宗教的本质。”⁴⁵（引自施达克的书第 168 页）

按照费尔巴哈的看法，宗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心灵的关系，过去这种关系是在现实的虚幻反映中（借助于

一个神或许多神这些人类特性的虚幻反映)寻找自己的真理,现在却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在我和你之间的爱中寻找自己的真理了。归根到底,在费尔巴哈那里,性爱即使不是他的新宗教借以实现最高形式,也是最高形式之一。

人与人之间的、特别是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是自从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性爱特别是在最近八百年间获得了这样的意义和地位,竟成了这个时期中一切诗歌必须环绕着旋转的轴心了。现存的实在的宗教只限于使国家对性爱的管理即婚姻立法高度神圣化;这种宗教也许明天就会完全消失,但是爱情和友谊的实践并不会发生丝毫变化。在法国,在1793到1798年这个期间,基督教的确曾经消失到这种程度,连拿破仑去恢复它也不能不遇到抵抗和困难,但是在这一期间,并没有感觉到需要用费尔巴哈的新宗教去代替它。

在这里,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就在于:他不是直截了当地按照本来面貌看待人们彼此间以相互倾慕为基础的关系,即性爱、友谊、同情、舍己精神等等,而是把这些关系和某种特殊的、在他看来也属于过去的宗教联系起来,断定这些关系只有在人们用宗教一词使之高度神圣化以后才会获得自己的完整的意义。在他看来,主要的并不是存在着这种纯粹人的关系,而是要把这些关系看做新的、真正的宗教。这些关系只是在盖上了宗教的印记以后才被认为是完满的。宗教一词是从 *religare* 一词来的,本来是联系的意思。因此,两个人之间的任何联系都是宗教。这种语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加在这个词上的意义,并不是通过它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得到的,而是按照语源所应该具有的。

因此，为了宗教这个对唯心主义回忆很宝贵的名词不致从语言中消失，性爱和性关系竟被尊崇为“宗教”。在四十年代，巴黎的路易·勃朗⁴⁶派改良主义者正是这样说的，他们也认为不信宗教的人只是一种怪物，并且对我们说：因此，无神论就是你们的宗教！费尔巴哈想根据一种本质上是唯物主义的的自然观建立真正的宗教，这等于把现代化学当做真正的炼金术。如果无神的宗教可以存在，那末没有哲人之石的炼金术也是可以存在的了。况且，炼金术和宗教之间是有很紧密的联系的。哲人之石有许多类似神的特性，公元头两世纪埃及和希腊的炼金术士在基督教学说的形成上也出了一分力量。柯普和拜特洛⁴⁷所提供的材料就证明了这一点。

费尔巴哈的下面这个论断是绝对错误的：

“人类的各个时期彼此借以区别的，仅仅是宗教的变迁。”

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旧的自发产生的部落宗教和民族宗教不进行宣传，一旦部落或民族的独立遭到破坏，它们便失掉任何抵抗力；在日耳曼人那里，甚至只要他们一接触正在崩溃的罗马世界帝国，一接触它刚刚采用的、适应于它的经济、政治、精神状态的世界基督教，这种情形就发生了。仅仅在研究这些多少是人工造成的世界宗教，特别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一般的历史运动带有宗教的色彩，而且，甚至在基督教的领域中，这种宗教色彩，对具有真正普遍意义的革命来说，也只表现在资产阶级解放斗争的最初阶段，即从十三世纪起到十七世纪止；同时，这种色彩不能像费尔巴哈所想的那样，用

人的心灵和人的宗教需要来解释，而要用整个中世纪的历史来解释，中世纪只知道一种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但是到了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已经强大得足以建立他们自己的、同他们的阶级地位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了，这时他们才进行了他们的伟大而彻底的革命——法国革命，而且仅仅诉诸法律的和政治的观念，只是在宗教堵住他们的道路时，他们才理会宗教；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要用某种新的宗教来代替旧的宗教；大家知道，罗伯斯比尔⁴⁸在这方面曾遭受了怎样的失败。

在我们不得不生活于其中的、以阶级对立和阶级统治为基础的社会里，同他人交往时表现纯粹人类感情的可能性，今天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我们没有理由去把这种感情尊崇为宗教，从而更多地破坏这种可能性。同样，对历史上的伟大的阶级斗争的理解，特别是在德国，也已经被流行的历史编纂学弄得够模糊了，我们没有必要去把这一斗争的历史变为教会史的单纯附属品，使这种理解成为完全不可能。由此可见，现在我们已经超过费尔巴哈多么远了。现在连他那赞美新的爱的宗教的“最美丽的篇章”都不堪卒读了。

费尔巴哈认真地研究过的唯一的宗教，是基督教这个以一神教为基础的西方的世界宗教。他指出，基督教的神只是人的虚幻的反映，人的映像。但是，这个神本身是长期的抽象过程的产物，是以前的许多部落神和民族神集中起来的精华。与此相应，这个神所反映的人也不是一个现实的人，而同样也是许多现实的人的精华，是抽象的人，因而本身又是一个想像的形象。费尔巴哈在每一页上都宣传感性，宣传专心研究具体的东西，研究现实，可是这同一个费尔巴哈，一谈

到某种比人们之间的纯粹性关系更进一步的关系，就变成完全抽象的了。

他在这种关系中仅仅看到一个方面——道德。在这里，和黑格尔比较起来，费尔巴哈的惊人的贫乏又使我们诧异。黑格尔的伦理学或关于伦理的学说就是法哲学，其中包括：（1）抽象的法，（2）道德，（3）伦理，其中又包括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在这里，形式是唯心的，内容是现实的。法律、经济、政治的全部领域连同道德都包括在这里。在费尔巴哈那里情况恰恰相反。就形式讲，他是现实的，他把人作为出发点；但是，关于这个人生活其中的世界却根本没有讲到，因而这个人始终是宗教哲学中所说的那种抽象的人。这个人不是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他是从一神教的神羽化而来的，所以他也不是生活在现实的、历史地发生和历史地确定了的世界里面；虽然他同其他的人来往，但是任何一个其他的人和他本人一样是抽象的。在宗教哲学里，我们终究还可以看到男人和女人，但是在伦理学里，连这最后一点差别也消失了。的确，在费尔巴哈那里间或也有这样的命题：

“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⁴⁹——“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营养物，那末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食物了。”⁵⁰——“政治应当成为我们的宗教。”⁵¹等等。

但是，费尔巴哈完全不知道利用这些命题，这些命题仍旧是纯粹的空话，甚至施达克也不得不承认，政治对费尔巴哈是一个不可通过的区域，而

“关于社会的科学，即社会学，对他来说，是一个未知的地带”⁵²。

在善恶对立的研究上，他同黑格尔比起来也是很肤浅的。黑格尔指出：

“人们以为，当他们说人本性是善的这句话时，他们就说出了—种很伟大的思想；但是他们忘记了，当人们说人本性是恶的这句话时，是说出了一种更伟大得多的思想。”⁵³

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这里有双重的意思，一方面，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另一方面，自从阶级对立产生以来，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关于这方面，例如封建制度的和资产阶级的历史就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持续不断的证明。但是，费尔巴哈就没有想到要研究道德上的恶所起的历史作用。历史对他来说是一个令人感到不愉快的可怕的领域。甚至他的名言：

“当人刚刚脱离自然界的时候，他也只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物，而不是人。人是人、文化、历史的产物。”⁵⁴

甚至这句名言在他那里也仍然是毫无结果的。

从上述一切可以明白，关于道德，费尔巴哈所告诉我们的东西是极其贫乏的。追求幸福的欲望是人生下来就有的，因而应当成为一切道德的基础。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受到双重的矫正。第一，受到我们的行为的自然后果的矫正：酒醉之后，必定头痛；放荡成习，必生疾病。第二，受到我们的行为的社会后果的矫正：要是我们不尊重他人追求幸福的同样的欲望，那末他们就会反抗，妨碍我们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由此可见：我们要满足我们的这种欲望，就必须能够正确地

估量我们的行为的后果，同时还必须承认他人的相应的欲望的平等权利。因此，对己以合理的自我节制，对人以爱（永远是爱！），这就是费尔巴哈的道德的基本准则，其余的一切都是从这个准则推出来的。无论费尔巴哈的妙语横生的议论或施达克的热烈无比的赞美，都不能掩盖这几个命题的贫瘠和空泛。

当一个人专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他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才能得到满足，而且决不是对己对人都有利。他需要和外部世界来往，需要满足这种欲望的手段：食物、异性、书籍、谈话、辩论、活动、消费品和操作对象。二者必居其一：或者费尔巴哈的道德是以每一个人无疑地都有这些满足欲望的手段和对象为前提，或者它只向每一个人提供无法应用的忠告，因而它对于没有这些手段的人是一文不值的。这一点，费尔巴哈自己也是说得很直截了当的：

“皇宫中的人所想的，和茅屋中的人所想的是不同的。”“如果你因为饥饿、贫困而身体内没有营养物，那末你的头脑中、你的感觉中，以及你的心中便没有供道德用的食物了。”

关于他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情况是否好一些呢？费尔巴哈无条件地提出这种要求，认为这种要求是适合于任何时代和任何情况的。但是这种要求从什么时候起被认为是适合的呢？在古代的奴隶和奴隶主之间，在中世纪的农奴和领主之间，难道谈得上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吗？被压迫阶级追求幸福的欲望不是被冷酷无情地和“由于正当理由”变成了统治阶级的这种欲望的牺牲品吗？——是的，这也是不道德的，但是现在平等权利被承认了。自从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

制度的斗争中并在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不得不废除一切等级的即个人的特权，而且起初在私法方面、后来逐渐在公法方面实施了个人在法律上的平等权利以来，平等权利在口头上是被承认了。但是，追求幸福的欲望只有极微小的一部分可以靠理想的权利来满足，绝大部分却要靠物质的手段来实现，而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所关心的，是使绝大多数权利平等的人仅有最必需的东西来勉强维持生活，所以资本主义对多数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所给予的尊重，即使一般说来多些，也未必比奴隶制或农奴制所给予的多。关于幸福的精神手段、教育手段，情况是否好一些呢？就连“萨多瓦的小学教师”⁵⁵不也是一个神话人物吗？

不仅如此。根据费尔巴哈的道德论，证券交易所就是最高的道德殿堂，只要人们的投机始终都是得当的。如果我追求幸福的欲望把我引进了交易所，而且我在那里又善于正确地估量我的行为的后果，因而这些后果只使我感到愉快而不引起任何损失，就是说，如果我经常赚钱的话，那末费尔巴哈的指示就算执行了。我也并没有因此就妨碍另一个人追求幸福的同样的欲望，因为另一个人和我一样地是自愿到交易所里去的，他和我成立投机交易时是按照他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正如我是按照我追求幸福的欲望行事一样。如果他赔了钱，那末这就证明他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因为他盘算错了，而且，在我对他执行应得的惩罚时，我甚至可以摆出现代拉达曼的架子来。在交易所里，只要爱不纯粹是一个温情的字眼，也是由爱统治一切的，因为每个人都靠别人来满足自己追求幸福的欲望，而这就是爱应当完成和实际从事的事情。同

时，如果我在那里正确地预见到我的行动的后果，因而赌赢了，那末我就执行了费尔巴哈道德的一切最严格的要求，而且我还会成为富翁。换句话说，费尔巴哈的道德是完全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管他自己多么不愿意或想不到是这样。

可是爱呵！——真的，在费尔巴哈那里，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他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在一个分成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的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

简单扼要地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先驱者一样的。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实际上，每一个阶级，甚至每一个行业，都各有各的道德，而且也破坏这种道德，如果它们能这样做而不受惩罚的话。至于那要把一切人都联合起来的爱，则表现在战争、争吵、诉讼、家庭纠纷、离婚以及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最高限度的剥削中。

但是，费尔巴哈所提供的强大推动力怎么能对他本人也毫无结果呢？理由很简单，因为费尔巴哈不能找到从他自己所极端憎恶的抽象王国通向活生生的现实世界的道路。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但是，要从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

转到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需把这些人当作在历史中行动的人去研究。而费尔巴哈反对这样做，因此，他所不了解的 1848 年对他来说只意味着和现实世界的最后分离，意味着退入孤寂的生活。在这方面，主要又要归咎于德国的状况，这种状况使他落得这种可怜的结局。

但是费尔巴哈所没有走的一步，终究是有人要走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 1845 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

四

施特劳斯、鲍威尔、施蒂纳、费尔巴哈，就他们没有离开哲学的立足地这一点来说，都是黑格尔哲学的支脉。施特劳斯写了《耶稣传》和《教义学》⁵⁶以后，就只从事于写作勒南⁵⁷式的哲学和教会史的美文学作品；鲍威尔只是在基督教起源史方面做了一些事情，虽然他在这里所做的也是一些重要的事情；施蒂纳甚至在巴枯宁把他同蒲鲁东混合起来并且把这个混合物命名为“无政府主义”以后，依然是一个宝贝；唯有费尔巴哈是个杰出的哲学家。但是，哲学，这一似乎凌驾于一切专门科学之上并包括一切专门科学的科学，对他来说不仅仍然是不可逾越的屏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且，他作为一个哲学家，也停留在半路上，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他没有批判地克

服黑格尔，而是简单地把黑格尔当做无用的东西抛在一边，同时，他本人除了矫揉造作的爱的宗教和贫乏无力的道德，拿不出什么积极的东西来和黑格尔体系的百科全书式的丰富内容相抗衡。

但是，从黑格尔学派的解体过程中还产生了另一个派别，唯一的产生真实结果的派别。这个派别主要是同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①

同黑格尔哲学的分离，在这里也是由于返回到唯物主义观点而产生的结果。这就是说，人们在理解现实世界（自然界和历史）时，决意按照它本身在每一个不以先人为主的唯心主义怪想来对待它的人面前所呈现的那样来理解；他们决意毫不怜惜地牺牲一切和事实（从事实本身的联系而不是从幻想的联系来把握的事实）不相符合的唯心主义怪想。除此以外，唯物主义根本没有更多的意义，只是在这里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

① 请允许我在这里作一点个人的说明。近来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到我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因此，我在这里不得不说几句话，把这个问题澄清。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四十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至多除几个专门的领域外，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很容易地做到。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公正的。

黑格尔不是简单地被放在一边，恰恰相反，上面所说的他的革命方面，即辩证方法，是被当做出发点的。但是这个方法在黑格尔的形式中是无用的。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绝对概念不仅是从来就存在的（不知在哪里？），而且是全部现存世界的真正的活的灵魂。它通过在“逻辑学”中详细探讨过并且完全包含在它自身中的一切预备阶段而向自身发展；然后它使自己“外化”，转化为自然界，它在自然界中并没有意识到它自己，而是采取自然必然性的形式，经过新的发展，最后在人身上重新达到自我意识，这个自我意识，在历史中又从粗糙的形式中挣脱出来，直到绝对概念终于在黑格尔哲学中又完全地达到自身为止。因此，在自然界中和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因果联系，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的运动的翻版，而这种概念的自己的运动是从来就有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但无论如何是同任何能思维的人脑无关的。这种意识形态的颠倒应该是应该消除的。我们重新唯物地把我们头脑中的概念看做现实事物的反映，而不是把现实事物看做绝对概念的某一阶段的反映。这样，辩证法就归结为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这两个系列的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大部分也是如此。这样，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

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⁵⁸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①

而这样一来，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方面就恢复了，同时也摆脱了那些曾经在黑格尔那里阻碍它贯彻到底的唯心主义装饰。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事物以及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在这种变化中，前进的发展，不管一切表面的偶然性，也不管一切暂时的倒退，终究会给自己开辟出道路，——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如此深入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把这个思想具体地实际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如果人们在研究工作中始终从这个观点出发，那末关于最终解决和永恒真理的要求就永远不会提出了；人们就始终会意识到他们所获得的一切知识必然具有的局限性，意识到他们在获得知识时所处的环境对这些知识的制约性；人们也不再敬重还在不断流行的旧形而上学所不能克服的对立，即真理和谬误、善和恶、同一和差别、必然和偶然之间的对立于了；人们知道：这些对立只有相对的意义；今天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认识都有它隐蔽着的、以后会显露出来的错误的方面，同样，今天

^① 见《人脑活动的实质。一个手艺人的描述》汉堡迈斯纳出版社。⁵⁹

已经被认为是错误的认识也有它合乎真理的方面，因而它从前才能被认为是合乎真理的；被断定为必然的东西，是由纯粹的偶然性构成的，而所谓偶然的東西，是一种有必然性隐藏在里面的形式，如此等等。

旧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黑格尔称之为“形而上学的”方法，主要是把**事物**当作一成不变的东西去研究，它的残余还牢牢地盘据在人们的头脑中，这种方法在当时是有重大的历史根据的。必须先研究事物，而后才能研究过程。必须先知道一个事物是什么，而后才能觉察这个事物中所发生的变化。自然科学中的情形正是这样。认为事物是既成的东西的旧形而上学，是从那种把非生物和生物当作既成事物来研究的自然科学中产生的。而当这种研究已经进展到可以向前迈出决定性的一步，即可以过渡到系统地研究这些事物在自然界本身中所发生的变化的时候，在哲学领域内也就响起了旧形而上学的丧钟。事实上，直到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研究植物机体和动物机体中的过程的生理学，研究单个机体从胚胎到成熟的发育过程的胚胎学，研究地壳逐渐形成过程的地质学，——所有这些科学都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产儿。

但是，首先是三大发现使我们对自然过程的相互联系的认识大踏步地前进了：第一是发现了细胞，发现细胞是这样一种单位，整个植物体和动物体都是从它的繁殖和分化中发

育起来的。由于这一发现，我们不仅知道一切高等有机体都是按照一个共同规律发育和生长的，而且通过细胞的变异能力指出了使有机体能改变自己的物种并从而能实现一个比个体发育更高的发育的道路。——第二是能的转化，它向我们表明了一切首先在无机自然界中起作用的所谓力，即机械力及其补充，所谓位能、热、放射（光或辐射热）、电、磁、化学能，都是普遍运动的各种表现形式，这些运动形式按照一定的度量关系由一种转变为另一种，因此，当一种形式的量消失时，就有另一种形式的一定的量代之出现，因此，自然界中的一切运动都可以归结为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不断转化的过程。——最后，达尔文第一次从联系中证明了，今天存在于我们周围的有机自然物，包括人在内，都是少数原始单细胞胚胎的长期发育过程的产物，而这些胚胎又是由那些通过化学途径产生的原生质或蛋白质形成的。

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描绘这样一幅总的图画，在以前是所谓自然哲学的任务。而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像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

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一种退步**。

现在也被我们理解为历史发展过程的自然界的情况是这样，社会历史的一切部门和研究人类的（和神的）事物的一切科学的情况也是这样。在这里，历史哲学、法哲学、宗教哲学等等也都是以哲学家头脑中臆造的联系来代替应当在事变中指出的现实的联系，把历史（其全部和各个部分）看做观念的逐渐实现，而且当然始终只是哲学家本人所喜爱的那些观念的逐渐实现。这样看来，历史是不自觉地、但必然是为了实现某种预定的理想目的而努力，例如在黑格尔那里，是为了实现他的绝对观念而努力，而达到这个绝对观念的坚定不移的意向就构成了历史事变中的内在联系。这样，人们就用一种新的——不自觉的或逐渐自觉的——神秘的天意来代替现实的、尚未知道的联系。因此，在这里也完全像在自然领域里一样，应该发现现实的联系，从而清除这种臆造的人为的联系；这一任务，归根到底，就是要发现那些作为支配规律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上为自己开辟道路的一般运动规律。

但是，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的反作用撇开不谈）全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动力，这些动力彼此发生作用，而一般规律就表现在这些动力的相互作用中。在所发生的任何事情中，无论在外表上看得出的无数表面的偶然性中，或者在

可以证实这些偶然性内部的规律性的最终结果中，都没有任何事情是作为预期的自觉的目的发生的。反之，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个别时代和个别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即使在这一领域内，尽管各个人都有自觉期望的目的，在表面上，总的说来好像也是偶然性在支配着。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互相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这样，历史事件似乎总的说来同样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但是，在表面上是偶然性在起作用的地方，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的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因此，问题也在于，这许多个别的人所期望的是什么。愿望是由激情或思虑来决定的。而直接决定激

情或思虑的杠杆是各式各样的。有的可能是外界的事物，有的可能是精神方面的动机，如功名心、“对真理和正义的热忱”、个人的憎恶，或者甚至是各种纯粹个人的怪癖。但是，一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在历史上活动的许多个别愿望在大多数场合下所得到的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往往是恰恰相反的结果，因而它们的动机对全部结果来说同样地只有从属的意义。另一方面，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在这些动机背后隐藏着的是什么样的动力？在行动者的头脑中以这些动机的形式出现的历史原因又是什么？

旧唯物主义从来没有给自己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因此，它的历史观——如果它有某种历史观的话，——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旧唯物主义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历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很多有教益的东西；而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的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些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不彻底的地方并不在于承认精神的动力，而在于不从这些动力进一步追溯到它的动因。反之，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例如黑格尔，他不从古希腊历史本身的内在联系去说明古希腊的历史，而只是简单地断

定，古希腊的历史无非是“美好的个性形式”的制定，是真正的“艺术作品”的实现⁶⁰。在这里，黑格尔关于古希腊人作了许多精彩而深刻的评论，但是这种只是一些空谈的说明现在已经不能使我们满足了。

因此，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的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使人们行动起来的一切，都必然要经过他们的头脑；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自从工人不再像1848年在莱茵河流域那样简单地捣毁机器以来，工人已经丝毫不能容忍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应用机器了。

但是，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化了，因而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就是说，至少从1815年签订欧洲和约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

族(landed aristocracy)和资产阶级(middle class)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⁶¹,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而从1830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

但是这些阶级是怎样产生的呢?初看起来,从前大规模的封建土地占有制的起源,还可以(至少首先是)归于政治原因,归于暴力掠夺,但是这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就不行了。在这里,显而易见,这两个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而同样明显的是,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一样,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由于经济关系发生变化,确切些说,是由于生产方式发生变化而产生的两个阶级。最初是从行会手工业到工场手工业的过渡,随后又是从工场手工业到使用蒸汽和机器的大工业的过渡,使这两个阶级发展起来了。在一定阶段上,资产阶级使用的新的生产力——首先是分工和许多局部工人在一个综合性手工工场里的联合——以及通过生产力发展起来的交换条件和交换需要,同现存的、历史上继承下来的而且被法律神圣化的生产

秩序不相容了，就是说，同封建社会制度的行会特权以及许多其他的个人特权和地方特权（这些特权对于非特权等级来说都是桎梏）不相容了。资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起来反抗封建土地占有者和行会师傅所代表的生产秩序；结局是大家都知道的：封建桎梏被打碎了，在英国是逐渐被打碎的，在法国是一下子被打碎的，在德国还没有被打碎。但是，正像工场手工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曾经和封建的生产秩序发生冲突一样，大工业现在已经同代替封建生产秩序的资产阶级生产秩序相冲突了。被这种秩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狭隘范围所束缚的大工业，一方面使全体广大人民群众愈来愈无产阶级化，另一方面生产出愈来愈多的没有销路的产品。生产过剩和大众的贫困，两者互为因果，这就是大工业所陷入的荒谬的矛盾，这个矛盾必然地要求通过改变生产方式来使生产力摆脱桎梏。

因此，在现代历史中至少已经证明：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因此，至少在这里，国家，政治制度是从属的东西，而市民社会，经济关系的领域是决定性的因素。从传统的观点看来（这种观点也是黑格尔所尊崇的），国家是决定性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表面现象是和这种看法符合的。就个别人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一定要转变为他的愿望的动机，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同样，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一個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愿望，才能以法

律形式取得普遍效力。这是问题的形式方面，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不过要问一下，这个仅仅是形式上的愿望（不论是个别人的或国家的）有什么内容呢？这一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人们所期望的正是这个而不是别的呢？在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时，我们就发现，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愿望总的说来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但是，既然甚至在拥有巨量生产资料和交通工具的现代，国家都不是一个具有独立发展的独立领域，而它的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那末，以前的一切时期就必然更是这样了，那时人们物质生活的生产还没有使用这样丰富的辅助手段来进行，因而这种生产的必要性必不可免地在更大程度上支配着人们。既然在今天这个大工业和铁路的时代，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那末，在以前的时代，国家就必然更加是这样了，那时每一代人都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得多地耗费一生中的时间来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因而要比我们今天更多地依赖于这种物质需要。对从前各个时代的历史的研究，只要在这方面是认真进行的，都会最充分地证实这一点；但是，不用说，在这里不能进行这种研究了。

如果说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末不言而喻，私法也是这样，因为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但是，这种确认所采取的形式可以是很不相同的。人们可以把旧的封建法权形式

的很大一部分保存下来，并且赋予这种形式以资产阶级的内容，甚至直接给封建的名称加上资产阶级的含意，就像在英国与民族的全部发展相一致而发生的那样；但是人们也可以像在西欧大陆上那样，把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即罗马法⁶²以及它对简单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质的法律关系（如买主和卖主、债权人和债务人、契约、债务等等）所作的无比明确的规定作为基础。这样做时，为了仍然是小资产阶级的和半封建的社会的利益，人们可以或者是简单地通过审判的实践贬低这个法律，使它适合于这个社会的状况（普通法），或者是依靠所谓开明的满口道德说教的法学家的帮助把它改造为一种适应于这种社会状况的特殊法典；这个法典，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从法学观点看来也是不好的（普鲁士国家法）；但是这样做时，人们也可以在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以同一个罗马法为基础，创造像法兰西民法典⁶³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因此，如果说民法准则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现了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那末这种准则就可以依情况的不同而把这些条件有时表现得好，有时表现得坏。

国家作为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出现在我们面前。社会创立一个机关来保护自己的共同利益，免遭内部和外部的侵犯。这种机关就是国家政权。它刚一产生，对社会来说就是独立的，而且它愈是成为某个阶级的机关，愈是直接地实现这一阶级的统治，它就愈加独立。被压迫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必然要变成政治的斗争，变成首先是反对这一阶级的政治统治的斗争；对这一政治斗争同它的经济基础的联系的认识，就日益模糊起来，并且会完全消失。即使在

斗争参加者那里情况不完全是这样，但是在历史家那里差不多总是这样的。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底安⁶⁴一人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

但是国家一旦成了对社会的独立力量，马上就产生了新的意识形态。这就是说，在职业政治家那里，在公法理论家和私法法学家那里，同经济事实的联系就完全消失了。因为经济事实要取得法律上的承认，必须在每一个别场合下采取法律动机的形式，而且，因为在这里，不言而喻地要考虑到现行的整个法律体系，所以，现在法律形式就是一切，而经济内容则什么也不是。公法和私法被看做两个独立的领域，两者各有自己的独立的历史发展，本身都可以系统地加以描述，并要求彻底根除一切内部矛盾，以便作出这种描述。

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愈来愈混乱，愈来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但是这一联系是存在着的。从十五世纪中叶起的整个文艺复兴时代，在本质上是城市的从而是市民阶级的产物，同样，从那时起重新觉醒的哲学也是如此。哲学的内容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在前一世纪的那些往往既是哲学家又是政治经济学家的英国人和法国人那里，这种情形是表现得很明显的，而在黑格尔学派那里，这一情况我们在上面已经说明过了。

现在我们再简略地谈谈宗教，因为宗教离开物质生活最远，而且好像是同物质生活最不相干。宗教是在最原始的时

代从人们关于自己本身的自然和周围的外部自然的错误的、最原始的观念中产生的。但是，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就是说，它就不是把思想当作独立地发展的、仅仅服从自身规律的独立本质来处理了。头脑中发生这一思想过程的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这一思想过程的进行，这一事实，对这些人来说必然是没有意识到的，否则，全部意识形态就完结了。因此，大部分是每个有血统关系的民族集团所共有的这些最初的宗教观念，在这些集团分裂以后，便在每个民族那里依各自遇到的生活条件而独特地发展起来，而这一过程对一系列民族集团来说，特别是对雅利安人（所谓印欧人）来说，已由比较神话学详细地证实了。这样在每一个民族中形成的神，都是民族的神，这些神的王国不越出它们所守护的民族领域，在这个界线以外，就由别的神无可争辩地统治了。只要这些民族存在，这些神也就继续活在人们的观念中；这些民族没落了，这些神也就随着灭亡。罗马世界帝国使得旧有的民族没落了（关于罗马世界帝国产生的经济条件，我们没有必要在这里加以研究），旧有的民族的神就灭亡了，甚至罗马的那些仅仅适合于罗马城的狭小圈子的神也灭亡了；罗马曾企图除本地的神以外还承认和供奉一切多少受崇敬异族的神，这种企图清楚地表现了拿一种世界宗教来充实世界帝国的需要。但是一种新的世界宗教是不能这样用皇帝的敕令创造出来的。新的世界宗教，即基督教，已经从普遍化了的东方神学、特别是犹太神学和庸俗化了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斯多葛

派⁶⁵哲学的混合中悄悄地产生了。我们必须重新进行艰苦的研究，才可以知道基督教最初是什么样子，因为它那流传到我们今天的官方形式仅仅是尼西亚宗教会议为了使它成为国教并使它适合于成为国教这个目的而赋予它的那种形式。⁶⁶它在二百五十年后已经变成国教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它是适应时势的宗教。在中世纪，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基督教成为一种同它相适应的、具有相应的封建教阶制的宗教。当市民阶级兴起的时候，新教异端首先在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中间、在那里的城市最繁荣的时代同封建的天主教相对抗而发展起来。⁶⁷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因此，当时任何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都不得不采取神学的形式；对于完全受宗教影响的群众的感情说来，要掀起巨大的风暴，就必须让群众的切身利益披上宗教的外衣出现。市民阶级从最初起就给自己制造了一种由无财产的、不属于任何公认的等级的城市平民、零工和各种仆役所组成的附属品，即后来无产阶级的前身，同样，宗教异端也早就分成了两派：市民温和派和甚至也为市民异教徒所憎恶的平民革命派。

新教异端的不可根绝是同正在兴起的市民阶级的不可战胜相适应的；当这个市民阶级已经充分强大的时候，他们从前的主要是同封建贵族进行的地方性斗争便开始采取民族的规模了。第一次大规模的行动发生在德国，这就是所谓的宗教改革⁶⁸。那时市民阶级既不够强大又不够发展，不足以把其他的叛乱等级——城市平民、下级贵族和乡村农民——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之下。贵族首先被击溃；农民举行了起义，

形成了这次整个革命运动的顶点；城市背弃了农民，革命被各邦君主的军队镇压下去了，这些君主囊括了革命的全部果实。从那时起，德国有整整三个世纪从那些能独立地干预历史的国家的行列中消失了。但是除德国人路德⁶⁹外，还出现了法国人加尔文⁷⁰，他以真正法国式的尖锐性突出了宗教改革的资产阶级性质，使教会共和化和民主化。当路德的宗教改革在德国已经蜕化并把德国引向灭亡的时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却成了日内瓦、荷兰和苏格兰共和党人的旗帜，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发生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在这里，加尔文教是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因此，在1689年革命由于一部分贵族同资产阶级间的妥协而结束以后，它也没有得到完全的承认。⁷¹英国的国家教会恢复了，但不是恢复到它以前的形式，即由国王充任教皇的天主教，而是强烈地加尔文教化了。旧的国家教会庆祝欢乐的天主教礼拜日，反对枯燥的加尔文派礼拜日。新的资产阶级化的国家教会，则采用后一种礼拜日，这种礼拜日至今还在装饰着英国。

在法国，1685年加尔文教的少数派曾遭到镇压，被迫归依天主教或者被驱逐出境。⁷²但是这有什么用处呢？那时自由思想家比埃尔·培尔⁷³已经在进行活动，1694年伏尔泰诞生了。路易十四⁷⁴的暴力措施只是方便了法国的市民阶级，使他们可以赋予自己的革命以唯一同已经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相适应的、非宗教的、纯粹政治的形式。出席国民会议的不是新教派，而是自由思想家了。由此可见，基督教已经踏进了最后阶段。此后，它已不能成为任何进步阶级的意向的

意识形态外衣了；它愈来愈变成统治阶级专有的东西，统治阶级只把它当作使下层阶级就范的统治手段。同时，每个不同的阶级都利用它自己认为适合的宗教：占有土地的容克利用天主教的耶稣会派或新教的正统派，自由的和激进的资产者则利用唯理派，至于这些老爷们自己相信还是不相信他们各自的宗教，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

这样，我们看到，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但是，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在这里只说这一点就够了。

上面的叙述只能是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一个概述，至多也只能是一些说明。证据只能由历史本身中提供；而在这里我敢肯定地说，在其他著作中这种证据已经提供得很充分了。但是这种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不再是要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要从事实中发现这种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

* * *

随着 1848 年革命的爆发，“有教养的”德国抛弃了理论，转入了实践的领域。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小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已经为真正的大工业所代替；德国重新出现在世界市场上；新的小德意志帝国⁷⁵ 至少排除了由于小邦割据、封建残

余和官僚制度在这一发展道路上造成的最显著的弊病。但是随着思辨^①离开哲学家的书房而在证券交易所里筑起自己的殿堂，有教养的德国也就失去了在德国的最深沉的政治屈辱时代曾经是德国的光荣的伟大理论兴趣，失去了那种不管所得成果在实践上是否能实现，不管它是否违警都同样地热中于纯粹科学研究的兴趣。诚然，德国的官方自然科学，特别是在专门研究的领域中仍然保持着时代的高度，但是，正如美国“科学”杂志已经公正地指出的，在研究个别事实之间的巨大联系方面，在把这些联系概括为规律方面所获得的决定性的成就，现在更多地是出在英国，而不像从前那样出在德国。而在包括哲学在内的历史科学的领域内，那种旧有的在理论上毫无顾忌的精神已随着古典哲学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动脑筋的折衷主义，是对职位和收入的担忧，直到极其卑劣的向上爬的思想。这种科学的官方代表都变成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的毫无掩饰的思想家，但这已经是在资产阶级和现存国家同工人阶级处于公开敌对地位的时代。

德国人的理论兴趣，现在只是在工人阶级中还没有衰退，继续存在着。在这里，它是根除不了的。在这里，没有对地位、利益的任何顾虑，没有乞求上司庇护的念头。反之，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愈加符合于工人的利益和愿望。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的新派别，一开始就主要是面向工人阶级的，并且得到了工人阶级的同情，这种同情，它在官方科学那里是既寻找不到也期望

① 双关语：“思辨”的原文是《Spekulation》，也有“投机”的意思。——编者注

不到的。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写于 1886 年初

载于 1886 年《新时代》杂志第 4 期

和第 5 期,并于 1888 年以单行本

式在斯图加特出版

原文是德文

选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21 卷第 301—353 页 形

注 释

- 1 费尔巴哈，路德维希(1804—1872)一马克思前德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 2 恩格斯的著作《落德维希·费尔巴哈 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之一。书中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对其哲学先驱——德国古典哲学的最杰出代表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关系，并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作了系统的叙述。这部著作最初刊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新时代》上，后来出了单行本，恩格斯专门为单行本写了序言。1894年，巴黎的杂志《新纪元》第4期和第5期上登载了劳拉·拉法格翻译并经恩格斯审阅过的译文。

《新纪元》(*L'Ère nouvelle*)是法国的社会主义月刊，1893—1894年在巴黎出版；茹·盖得，让·饶勒斯，保·拉法格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等人都曾为该杂志撰稿。
- 3 见本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注6。
- 4 施达克，卡尔·尼古拉(1858-1926)——丹麦资产阶级哲学家和社会学家。
- 5 卡·尼·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C. N. Starcke. *Ludwig Feuerbach*). Stuttgart, 1885)。
- 6 巴士底狱是十四至十八世纪巴黎的城堡和国家监狱。十六世纪起，主要用来囚禁政治犯。
- 7 恩格斯指海涅关于德国哲学革命的言论，这些言论包含在海涅的著作《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中。这部著作发表于1834年，它是对德国精神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进行评论(一部分发表于1833年)的继续。海

涅的这些言论贯彻了这样的思想：当时由黑格尔哲学总其成的德国哲学革命，是德国即将到来的民主革命的序幕。

- 8 恩格斯在这里套用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中的话。这部著作的第一版于 1821 年在柏林出版。
- 9 见本书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注 1。
- 10 见乔·威·弗·黑格尔《哲学全书缩写本。第一部。逻辑》第 147 节；第 142 节附释 (G. W. F. Hegel. 《Encyclopa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Grundrisse. Erster Teil. Die Logik》, § 1471; § 142, Zusatz)。该书第一版于 1817 年在海得尔堡出版。—第 211 页。
- 11 这里套用了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三场(《浮士德的书斋》)里的菲斯特斐勒司的话。
- 12 康德, 伊曼努尔(1724—1804)——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 唯心主义者, 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家, 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
- 13 乔·威·弗·黑格尔《逻辑学》1812-1816 年纽伦堡版 (G. W. F. Hegel. 《Wissenschaft der Logik》. Nurnberg, 1812-1816)。这部著作共分三册: (1) 客观逻辑, 存在论 (1812 年出版); (2) 客观逻辑, 本质论 (1813 年出版); (3) 主观逻辑或概念论 (181 年出版)。
- 14 歌德, 约翰·沃尔弗干格 (1749-1832)——伟大的德国作家和思想家, 也以自然科学方面的著作闻名。
- 15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1795-1861)——普鲁士国王 (1840-1861)。
- 16 《德国年鉴》(《Deutsche Jahrbucher》) 是青年黑格尔派的文学哲学杂志《德国科学和艺术年鉴》(《Deutsche Jahrbücher für Wissenschaft und Kunst》) 的简称, 该杂志以日报形式在莱比锡出版。从 1841 年 7 月到 1843 年 1 月, 杂志用上述名称出版, 以前 (1838-1841 年)

曾以《德国科学和艺术哈雷年鉴》(《Hallische Jahrbücher für 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 Kunst》)的名称出版;1841年6月以前杂志由阿·卢格和泰·艾希特迈耶尔在哈雷负责编辑,而从1841年7月起则由阿·卢格在德勒斯顿负责编辑。由于《哈雷年鉴》在普鲁士境内遭到停刊的威胁,编辑部从普鲁士的哈雷城迁往萨克森,并更改了杂志的名称。但是,即使用了新的名称,杂志也没有出版多久。1843年1月该杂志被萨克森政府查封,并经联邦议会决定在全国查禁。

- 17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是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的日报。该报是莱茵省一些反对普鲁士专制政体的资产阶级人士创办的。该报曾吸收几个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起马克思为该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对《莱茵报》进行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后来把它封闭。
- 18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乔(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著名的青年黑格尔分子之一;《耶稣传》的作者,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党人。
- 19 大·弗·施特劳斯《耶稣传》1835—1836年杜宾根版第1—2卷(D.F
- 20 见本书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注7。
- 21 施蒂纳,麦克斯(1806-1856)(卡斯巴尔·施米特的笔名)——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之一。
- 22 见本书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注7。
- 23 指麦·施蒂纳的著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年比版(M. Shner,《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 Leipzig, 1845)。
- 24 L. 费尔巴哈《基督教的本质》莱比锡,1841。L. Feuerbach. 《Das Wesen

des Christenthums》Leipzig, 1841.

- 25 见本书《共产党宣言》注 17。
- 26 格律恩, 卡尔(1817-1887)2-德国小资产阶级政论家, 四十年代中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 1850—1861 年侨居布鲁塞尔, 1861 年回到德国, 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高等商业工艺学校任艺术史、文学史和哲学史教授(1862-1865), 1870 年到维也纳; 1874 年出版了路·尔巴哈的书信集和遗著。
- 27 恩格斯大概指的是埃·斐·伊姆·特恩的著作《在走亚那的印第安人中间》1883 年伦敦版第 344-346 页(E. F. im Thurn, 《Among the Indians of Guiana》. London, 1883, p. 344-346)。
- 28 休谟, 大卫(1711-1776)—英国哲学家, 主观唯心主义者, 不可知论者; 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重商主义的反对者, 货币数量论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 29 哥白尼, 尼古拉(1473-1543)——伟大的波兰天文学家, 宇宙的太阳中心说的创始人。
- 30 勒维烈, 乌尔本·让·约瑟夫(1811—1877)—杰出的法国天文学家和数学家, 1846 年不依靠亚当斯而独立地计算出当时还不知道的海王星的轨道, 并确定这个行星在宇宙中的位置。
- 31 加勒, 约翰·哥特弗里德(1812-1910)—德国天文学家, 1846 年根据勒维烈的计算发现了海王星。
- 32 指 1846 年德国天文学家约翰·加勒发现的海王星。
- 33 笛卡儿, 勒奈(1596-1650)—著名的法国二元论哲学家, 数学家和自然科学家。

- 34 霍布斯, 托马斯(1588-1679)——著名的英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 他的社会政治观点具有鲜明的反民主的倾向。
- 35 摩莱肖特, 雅科布(1822-1893)——资产阶级生理学家和哲学家, 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生于荷兰;曾在德国、瑞士和意大利的学校中任教。
- 36 恩格斯在这里引证了费尔巴哈的箴言。这段引文在施达克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年斯图加特版第166页上引用过。引文摘自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书简、稿及其哲学特征的阐述》1874年莱比锡和海得尔堡版第2卷第308页(KGrin. 《Ludwig Feuerbachin seinem Briefwechsel und Nachlass sowierin2seinerePhilosophischen Charakterentwicklung》. Bd. II, Leipzig und Heidelberg, 1874, S: 308)。
- 37 毕希纳, 路德维希(1824-1899)——德国资产阶级生理学家和哲学家, 庸俗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
- 38 见本书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注25。
- 39 拉马克, 让·巴蒂斯特·比埃尔·安都昂(1744—391829)——杰出的法国自然科学家, 生物学上第一个完整的进化论的创立者, 达尔文的先驱。
- 40 席勒, 弗里德里希(1759-1805)——伟大的德国作家。
- 41 乔·威·弗·黑格尔《精神现象学》(G. W. F. 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该著作第一版于1807年在班堡和维尔堡出版。
- 42 自然神论者是一种宗教哲学学说的拥护者。这种学说认为神是非人格的、有理性的世界始因, 但是神不干预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在封建教会世界观统治的条件下, 自然神论往往站在唯理论的立场上批判中世纪的神学世界观, 揭露僧侣们的寄生生活和招摇撞骗的行为。
- 43 伏尔泰, 弗朗斯瓦·玛丽(1694-1778)(真姓阿鲁埃)——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 讽刺作家, 历史学家, 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著名代表, 反

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

卢梭见本书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注 18。

- 44 狄德罗, 德尼(1713—1784)——杰出的法国哲学家, 机械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 无神论者, 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 启蒙运动者, 百科全书派领袖, 1749 年因自己的著作遭要塞监禁。
- 45 这段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哲学原理。变化的必然性》(《Grundsätze der Philosophie. Nothwendigkeit einer Veränderung》), 载于卡·格律图《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74 年莱比锡和海得尔堡版第 1 卷第 407 页。
- 46 勃朗, 路易(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 历史学家; 1848 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 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 1848 年 8 月流亡英国, 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 1871 年国民议会议员, 反对巴黎公社。
- 47 柯普, 海尔曼·弗兰茨·摩里茨(1817—1892)——德国化学家和化学历史学家。
拜特洛, 比埃尔·欧仁·马尔塞伦(1827—1907)——著名的法国化学家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研究有机化学和热化学, 以及农业化学和化学史。
- 48 罗伯斯比尔, 马克西米利安(1758—1794)——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 雅各宾派的领袖, 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
- 49 这段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驳躯体和灵魂、肉体 and 精神的二元论》(《Wider den Dualismus von Leib und Seele, Fleisch und Geist》), 见《费尔巴哈全集》1846 年莱比锡版第 2 卷第 363 页(《Ludwig Feuerbach's sämtliche Werke》, Bd. II, Leipzig, 1846, S: 363)
- 50 这段引文在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 年斯图加特版第 254

- 页上引用过。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贫穷操纵并取消所有法律》(Noth meistert alle Gesetze und hebt sie auf)), 载于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74 年莱比锡和海得尔第 2 第 285-286 页。
- 51 这段引文在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 年斯图加特版第 280 页上引用过。引文摘自费尔巴哈的著作《哲学原理。变化的必然性》, 载于卡·格律恩《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74 年莱比锡和海得尔堡版第 1 卷第 409 页。
- 52 卡·尼·施达克《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85 年斯图加特版第 280 页。
- 53 恩格斯在这里概述了黑格尔主要发表在下述著作中的思想:《法哲学原理》第 18、139 节以及《宗教学讲演录》第 3 部第 2 篇第 3 章《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 Dritter Theil, 11. 3)。后面这本著作的第一版于 1832 年在柏林出版。
- 54 见路·费尔巴哈的著作《我的哲学经历的特征描述片断》(Fragmente zur Charakteristik meines Philosophischen Curriculum vitae), 载于《费尔巴哈全集》1846 年莱比锡版第 2 第 411 页。
- 55 普军在萨多瓦一役获胜(在 1866 年普战争中)后德国资产阶级政论中的流行用语, 意思是说普鲁士的胜利似乎是由于普鲁士国民教育制度的优越。这一用语源出《外国》杂志的编辑奥·佩舍耳, 他在该杂志 1866 年 7 月 17 日第 29 期上的一篇文章《最近的战争史的教训》(Die Lehren der jüngsten Kriegsgeschichte)中用了这个用语。
- 56 指大·弗·施特劳斯《基督教教理的历史发展及其和现代科学的斗争》1840-1841 年杜宾根和斯图加特版第 1-2 卷(《Die christliche Glaubenslehre in ihrer geschichtlichen Entwicklung und im Kampfe mit der modernen Wissenschaft》. Bd. I-II, Tübingen —

Stuttgart, 1840-1841);这部著作的第二部,根据它的主要内容,名为《基督教教理的物质内容(教义学)》(《Der materiale Inbegriff der christlichen Glaubenslehre (Dogmatik)》)。

- 57 勒南,厄内斯特·约瑟夫(1823—1892)——法国宗教史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以早期基督教史方面的著作闻名。
- 58 狄慈根,约瑟夫(1828-188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自学成功的哲学家,独立地得出了辩证唯物主义若干原理,职业是制革工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1872)代表。
- 59 恩格斯指的是约,狄慈根的著作《人脑活动的实质。一个手艺人的描述纯粹的和实践的理性的再批判》1869年汉堡版(《Das Wesen der menschlichen Kopfarbeit. Dargestellt von einem Handarbeiter? Eine abermalige Kritik der reinen und praktischen Vernunft》. Hamburg, 1869)。
- 60 见乔·威·弗·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第2部第2篇(G. W. F. Hegel. 《Vorlesungen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 Zweiter Theil, zweiter Abschnitt)。这本书的第一版于1837年在柏林出版。
- 61 梯叶里,雅克·尼古拉·奥古斯丹(1705-1850)——复辟时期法国自由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接近于了解物质因素和阶级斗争在封建社会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建立的历史中的作用。

基佐见本书第67页,《共产党宣言》注9。米涅,弗朗斯瓦·奥古斯特·玛丽(1796-1884)——复辟时期法国自由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曾着手解释阶级斗争在资产阶级社会创建史中的作用。

梯也尔,阿道夫(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内务大臣(1832、1834),首相(183、1840),第二共和医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政府首脑(内阁总理)(1871),

共和国总统(1871—1873),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

- 62 是调整罗马奴隶占有制社会的财产关系的一部民法汇编,它是在六世纪查士丁尼皇帝在位时编算的。恩格斯说它是“商品生产者社会的第一个世界性法律”。
- 63 民法典是1804—1810年法国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制订的(因此民法典又通称为拿破仑法典)、系统地阐明资产阶级法权的五部法典之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5页注117)。
- 64 阿庇安(一世纪末至二世纪七十年代)一杰出的古罗马历史学家。
- 65 斯多葛派是公元前四世纪末在古希腊产生并存在到公元六世纪的一个哲学学派,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摇摆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在罗马帝国时代,斯多葛派哲学变成了一种反动的宗教唯心主义学说。斯多葛派坚持肉体之外存在着灵魂,主张神秘主义和宿命论、听天由命、不抗恶、自我舍弃和禁欲主义等等。斯多葛派的学说对基督教的形成有相当大的影响。
- 66 尼西亚宗教会议是第一次所谓罗马帝国基督教会世界主教会议。这次会议是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城召开的。会议通过了一切基督徒必须遵守的信条(正统基督教会教义的基本原则),不承认信条以叛国罪论。
- 67 阿尔比派是一个教派,十二至十三世纪广泛流行于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中。它的主要发源地是法国南部阿尔比城。阿尔比派反对天主教的豪华仪式和教阶制度,它以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居民对封建制度的抗议。法国南部的部分贵族也加入了阿尔比派,他们企图剥夺教会的土地。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曾组织十字军征伐阿尔比派。经过二十年战争和残酷的镇压,阿尔比派运动终于失败。

- 68 指十六世纪德国马丁·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运动。参看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第二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99—419页）。
- 69 路德，马丁(1483—1546)——宗教改革的名活动家，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德国市民等级的思想家，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
- 70 加尔文，让(1509—1564)——宗教改革的著名活动家，新教教派之一——加尔文教派的创始人，该教派代表了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产阶级利益。
- 71 指1688年英国政变。由于这次政变，在英国推翻了斯图亚特王朝，确立了建立在土地贵族和大资产阶级妥协基础上的、以奥伦治的威廉(从1689年起)为首的君主立宪制。
- 72 鉴于从十七世纪二十年代起对胡格诺教徒(加尔文派新教徒)所施加的政治迫害和宗教迫害加剧了，路易十四于1685年取消1598年颁布的南特敕令。这个敕令曾给予胡格诺教徒以信教和敬神的自由，由于南特敕令的取消，数十万胡格诺教徒从法国流亡他方。
- 73 培尔。比埃尔(1647—1706)——法国怀疑论哲学家，宗教独断论的批评者。
- 74 路易十四(1638—1715)——法国国王(1643—1715)。
- 75 指1871年1月在普鲁领导下建立的不包括奥地利在内的德意志帝国。

列 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一盏多么明亮的智慧之灯熄灭了，
一颗多么伟大的心停止跳动了！¹

1895年新历8月5日（7月24日），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伦敦与世长辞了。在他的朋友卡尔·马克思（1883年逝世）之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自从命运使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相遇之后，这两位朋友的毕生工作，就成了他们的共同事业。因此，要了解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有什么贡献，就必须清楚地了解马克思的学说和活动对现代工人运动发展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指出，工人阶级及其要求是现代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现代经济制度在造成资产阶级的同时，也必然造成并组织无产阶级。他们指出，能使人类摆脱现在所受的灾难的，并不是个别高尚人物善意的尝试，而是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科学著作中，最先说明了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到现在为止的全部有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都是不断更替地由一些社会阶级统治和战胜另一些社会阶级的历史。这种情形，在阶级斗争和阶级统治的基础，即私有制和混乱的社会生产消灭以前，将会继续下去。无产阶级的利益要求

消灭这种基础，所以有组织的工人自觉进行的阶级斗争，目标就应该对准这种基础。而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观点，现在已为正在争取自己解放的全体无产阶级所领会，但是当这两位朋友在四十年代参加社会主义的宣传和当时的社会运动时，这样的见解还是完全新的东西。当时许多有才能的或无才能的人，正直的或不正直的人，都醉心于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醉心于反对皇帝、警察和神父的专横暴戾的斗争，而看不见资产阶级利益同无产阶级利益的对立。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工人能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当时有许多幻想家，有时甚至是一些天才人物，都以为只要说服统治者和统治阶级相信现代社会制度是不合理的，就很容易在世界上确立和平和普遍福利。他们幻想不经过斗争就实现社会主义。最后，几乎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阶级的朋友，都认为无产阶级只是一个**溃疡**，他们怀着恐惧的心情看着这个脓疮如何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扩大。因此，他们都设法阻止工业和无产阶级的发展，阻止“历史车轮”的前进。与这种害怕无产阶级发展的普遍心理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的不断增长上。无产者人数愈多，他们这一革命阶级的力量也就愈大，社会主义的实现也就愈是接近，愈有可能。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工人阶级的功绩，可以这样简单地来表达：他们教会了工人阶级自我认识和自我意识，用科学代替了幻想。

因此，恩格斯的**名字和生平**，是每个工人都应该知道的。因此，我们在这本与我们其他一切出版物一样都是以唤醒俄国工人的阶级自我意识为目的的文集中，应该简要地叙述一

下现代无产阶级两位伟大导师之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生平 and 活动。

恩格斯 1820 年生于普鲁士王国莱茵省的巴门城。父亲是个工厂主。1838 年，由于家庭情况，恩格斯中学还没有毕业，就不得不到不来梅一家商号去当办事员。从事商业并没有妨碍恩格斯对科学和政治的研究。当他还是中学生的时侯，就憎恶专制制度和官吏的专横。对哲学的钻研，使他更前进了。当时在德国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是黑格尔²学说，于是恩格斯也成了黑格尔的信徒。黑格尔本人虽然崇拜普鲁士专制国家，他以柏林大学教授的身分为这个国家服务，但是黑格尔的学说是革命的。黑格尔对于人类理性和人类权利的信念，以及他的哲学的基本原理——世界是不断变化着发展着的过程，使这位柏林哲学家的那些不愿与现实调和的学生得出了一种想法，即认为同现状、同现存的不公平现象、同流行罪恶进行的斗争，也是基于世界永恒发展规律的。既然一切都是发展着的，既然一些制度不断被另一些制度所代替，那么为什么普鲁士国王或俄国沙皇的专制制度，极少数人靠剥夺绝大多数人发财致富的现象，资产阶级对人民的统治，却会永远延续下去呢？黑格尔的哲学谈论精神和观念的发展，它是唯心主义的哲学。它从精神的发展中推演出自然界、人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即社会关系的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保留了黑格尔关于永恒的发展过程的思想^①，而抛弃了那种偏执的

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止一次地指出，他们思想的发展，有很多地方得益于德国的大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恩格斯说：“没有德国哲学，也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³——编者注

唯心主义观点；他们面向实际生活之后看到，不能用精神的发展来解释自然界的发展，恰恰相反，要从自然界，从物质中找到对精神的解释……与黑格尔和其他黑格尔主义者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用唯物主义观点观察世界和人类，看出一切自然现象都有物质原因作基础，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受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人们在生产人类必需的产品时彼此所发生的关系。用这种关系才能解释社会生活中的一切现象，人的意向、观念和法律。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生产力的发展又夺走了大多数人的财产，将它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生产力的发展正在消灭私有制，即现代社会制度的基础，这种发展本身就是朝着社会主义者所抱定的那个目标前进的。社会主义者就是要了解，究竟哪种社会力量因其在现代社会中所处的地位而关心社会主义的实现，并使这种力量意识到它的利益和历史使命。这种力量就是无产阶级。恩格斯是在英国，是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结识无产阶级的；1842年他迁到这里，在他父亲与人合办的第一家商号中供职。在这里，他并不是只坐在工厂的办事处里，他常常到工人栖身的肮脏的住宅区去，亲眼看见工人贫穷困苦的情景。但是，他并不满足于亲身的观察，他还阅读了他所能找得到的在他以前论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切著作，仔细研究了他所能看到的一切官方文件。这种研究和观察的成果，就是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⁴一书。上面我们已经提到作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作者恩格斯的主要功绩。在恩格斯以前有很多人描写

过无产阶级的痛苦，并且一再提到必须帮助无产阶级。恩格斯**第一个**指出，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迫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工人阶级的政治运动必然会使工人认识到，除了社会主义，他们没有别的出路。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只有成为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的目标时，才会成为一种力量。这就是恩格斯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一书的基本思想。现在，这些思想已为全体能思考的和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所领会，但在当时却完全是新的。叙述这些思想的著作写得很动人，通篇都是描述英国无产阶级穷苦状况的最确实最惊人的情景。这部著作是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极严厉的控诉。它给人的印象是很深的。从此，到处都有人援引恩格斯的这部著作，认为它是对现代无产阶级状况的最好描述。的确，不论在1845年以前或以后，还没有一本书把工人阶级的穷苦状况描述得这么鲜明，这么真实。

恩格斯到英国后才成为社会主义者。他在曼彻斯特同当时英国工人运动的活动家发生联系，并开始在英国社会主义出版物上发表文章。1844年他在回德国的途中路过巴黎时认识了马克思，在此以前他已经和马克思通过信。马克思在巴黎时，受到法国社会主义者和法国生活的影响也成了社会主义者。在这里，两位朋友合写了一本书：《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⁵。这本书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早一年出版，大部分是马克思写的。它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这种社会主义的主要思想，我们在上面已

经叙述过了。“神圣家族”是给哲学家鲍威尔⁶兄弟及其信徒所取的绰号。这班先生鼓吹一种批判，这种批判超越一切现实、超越政党和政治，否认一切实践活动，而只是“批判地”静观周围世界和其中所发生的事情。鲍威尔先生们高傲地把无产阶级说成是一群没有批判头脑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这个荒谬而有害的思潮。为了现实的人，即为了受统治阶级和国家践踏的工人，他们要求的不是静观，而是为实现美好的社会制度而斗争。在他们看来，能够进行这种斗争和关心这种斗争的力量当然是无产阶级。还在《神圣家族》一书出版以前，恩格斯就在马克思和卢格两人合编的《德法杂志》⁷上发表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⁸一文，从社会主义的观点考察了现代经济制度的基本现象，认为那些现象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而马克思的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真正的革命。

1845年到1847年，恩格斯是在布鲁塞尔和巴黎度过的，他一面从事科学研究，同时又在布鲁塞尔和巴黎的德籍工人中间进行实际工作。这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同秘密的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⁹发生了联系，“同盟”委托他们把他们所制定的社会主义基本原理阐述出来。这样就产生了1848年出版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

1848年的革命首先在法国爆发，然后蔓延到西欧其他国家，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回国了。他们在莱茵普鲁士主编

在科隆出版的民主派的《新莱茵报》¹⁰。这两位朋友成了莱茵普鲁士所有革命民主意向的灵魂。他们尽一切可能保卫人民和自由的利益，使之不受反动势力的侵害。大家知道，当时反动势力获得了胜利。《新莱茵报》被迫停刊，马克思因侨居国外时丧失普鲁士国籍而被驱逐出境，而恩格斯则参加了人民武装起义，在三次战斗中为自由而战，在起义者失败后经瑞士逃往伦敦。

马克思也在伦敦住下。恩格斯不久又到他在四十年代服务过的那家曼彻斯特商号去当办事员，后来又成了这家商号的股东。1870年以前他住在曼彻斯特，马克思住在伦敦，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保持最密切的精神上的联系：他们差不多每天都通信。这两位朋友在通信中交换意见和知识，继续共同创立科学社会主义。1870年恩格斯移居伦敦，直到1883年马克思逝世时为止，他们两人始终过着充满紧张工作的共同精神生活。这种共同的精神生活的成果，在马克思方面，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在恩格斯方面，是许多大大小小的作品。马克思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复杂现象。恩格斯则在笔调明快、往往是论战性的著作中，根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经济理论，阐明最一般的科学问题，以及过去和现在的各种现象。从恩格斯的这些著作中，我们举出下面几种：反对杜林的论战性著作（它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题）^①，《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俄译本1895年圣彼得堡第3版）¹³，《路

① 这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十分有益的书¹¹。可惜只有概述社会主义发展史的那一小部分译成了俄文（《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¹²1892年日内瓦第2版）。

德维希·费尔巴哈》（俄译本附有格·普列汉诺夫的注释，1892年日内瓦版）¹⁴，一篇论俄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文章8（俄译文刊登在日内瓦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第一集和第二集上）¹⁵，几篇关于住宅问题的精彩文章¹⁶，以及两篇篇幅虽小，但价值极大的论述俄国经济发展的文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论俄国》，维·伊·查苏利奇的俄译本，1894年日内瓦版）¹⁷。马克思还没有把他那部论述资本的巨著整理完毕就逝世了。可是，这部著作的草稿已经完成，于是恩格斯在他的朋友逝世后就从事整理和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艰巨工作。1885年他出版了第二卷，1894年出版了第三卷（他没有来得及把第四卷整理好）¹⁸。整理这两卷《资本论》，是一件很费力的工作。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得很对：恩格斯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替他的天才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无意中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在上面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古老传说中有各种非常动人的友谊故事。欧洲无产阶级可以说，它的科学是由这两位学者和战士创造的，他们的关系超过了古人关于人类友谊的一切最动人的传说。恩格斯总是把自己放在马克思之后，总的说来这是十分公正的。他在写给一位老朋友的信中说：“马克思在世的时候，我拉第二小提琴。”¹⁹他对在世时的马克思无限热爱，对死后的马克思无限敬仰。这位严峻的战士和严正的思想家，具有一颗深情挚爱的心。

1848—1849年的运动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流亡中并

没有只限于从事科学工作。马克思在 1864 年创立了“国际工人协会”²⁰，并在整整十年内领导了这个协会。恩格斯也积极地参加了该会的工作。“国际工人协会”依照马克思的意思联合全世界的无产者，它的活动对工人运动的发展起了巨大作用。就是在 70 年代“国际工人协会”解散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起的团结的作用也没有停止。相反，他们作为工人运动精神领导者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不断增长的，因为工人运动本身也在不断发展。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一个人继续担任欧洲社会党人的顾问和领导者。无论是受政府迫害但力量仍然不断迅速增长的德国社会党人，或者是落后国家内那些还需仔细考虑斟酌其初步行动的社会党人，如西班牙、罗马尼亚和俄国的社会党人，都同样向恩格斯征求意见，请求指示。他们都从年老恩格斯的知识和经验的丰富宝库中得到教益。

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懂俄文，都读俄文书籍，非常关心俄国的情况，以同情的态度注视俄国的革命运动，并一直同俄国的革命者保持联系。他们两人都是由民主主义者变成社会主义者的，所以他们仇恨政治专横的民主情感非常强烈。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具有这种直接的政治情感、对政治专横与经济压迫之间的联系之深刻理论认识以及丰富的生活经验，所以他们在政治方面异常敏感。因此，俄国少数革命者所进行的反对强大的沙皇政府的英勇斗争，总是得到这两位久经锻炼的革命家最表同情的反响。相反，那种为了虚幻的经济利益而离开争取政治自由这一俄国社会党人最直接最重要的任务的图谋，在他们看来自然是可疑的，他们甚至直截了当

地认为这是背叛伟大的社会革命事业。“无产阶级的解放应当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²¹，——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教导的。而无产阶级要争取经济上的解放，就必须争得一定的政治权利。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清楚地看到，俄国政治革命对于西欧的工人运动也会有巨大的意义。专制的俄国向来是欧洲一切反动势力的堡垒。1870年的战争造成了德法之间长期的纷争，使俄国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国际地位，这当然只是增加了专制俄国这一反动力量的作用。只有自由的俄国，即既不需要压迫波兰人、芬兰人、德意志人、亚美尼亚人及其他弱小民族，也不需要经常挑拨德法两国关系的俄国，才能使现代欧洲摆脱战争负担而松一口气，才能削弱欧洲的一切反动势力，加强欧洲工人阶级的力量。因此，恩格斯为了西欧工人运动的胜利，也渴望俄国实现政治自由。俄国的革命者因恩格斯的逝世而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无产阶级的伟大战士和导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永垂不朽！

写于 1895 年秋

1913 年第一次载于《工

作者》文集第 1—2 期合

刊

按《启蒙》杂志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 2 卷

第 1-12 页

注 释

- 1 引自尼·阿·涅克拉索夫《纪念杜勃罗留波夫》(见《涅克拉索夫著作和书信全集》1948年俄文版第2卷第200页)。
- 2 见本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注6。
- 3 参看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序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0页)。
- 4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9—587页。
- 5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268页。
- 6 见本书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注7。
- 7 指《德法年鉴》杂志。见本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注7。
- 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6—625页。
- 9 见本书《共产党宣言》注3。
- 10 见本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注15。
- 11 指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364页)。
- 12 1892年以此名称出版了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见本书第197—263页)的俄译本,恩格斯的这一著作是由《反杜林论》中的三章编成的。

- 13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75页。
- 14 指本书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 15 指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13—57页)。这篇文章曾以《沙皇俄国的对外政策》为题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杂志1890年第1期和第2期上。
《社会民主党人》(《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是劳动解放社1890年在伦敦和1892年在日内瓦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政治杂志;不定期出版,总共出过四期。
- 16 指恩格斯的《论住宅问题》(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59—550页)。
- 17 指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和《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6—629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4—510页)。
- 18 列宁按照恩格斯的提法,把马克思的著作《剩余价值理论》称为《资本论》第4卷。恩格斯在《资本论》第2卷序言中写道:“我打算把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4卷发表,同时将第2卷和第3卷已经详细论述过的许多地方删去。”这本著作在恩格斯逝世后,经过考茨基整理,于1905—1910年用德文发表。
- 19 参看恩格斯1884年10月15日给约·菲·贝克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49页)。
- 20 见本书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注25。
- 21 参看马克思的《协会临时章程》、《国际工人协会共同章程》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5页、第17卷第475页和第22卷第68页)。

列 宁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

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自然历史理论触犯了神学的陈腐偏见，引起了并且直到现在还在引起最激烈的斗争。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指出这一阶级的任务，并且证明当前的制度由于经济的发展必然要被新的制度所代替，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这就不足为奇了。

资产阶级的科学和哲学就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官方教授按官方规定讲授科学和哲学是为了愚弄那些出身于有产阶级的青年，为了“训练”他们去反对内外敌人。这种科学对马克思主义连听都不愿听，就宣布马克思主义已经被驳倒，已经被消灭。无论是借驳斥社会主义来猎取名利的青年学者，或者是死抱住各种陈腐“体系”的遗教不放的龙钟老朽，都是同样尽心竭力地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和巩固，必然使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攻击更加频繁，更加剧烈，但是马克思主义每次被官方的科学“消灭”之后，反而愈加巩固愈加坚强，愈加生气勃勃了。

就是在那些同工人阶级的斗争有联系而且主要是在无产

阶级中间流传的学说中，马克思主义也远远不是一下子就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的。马克思主义在它存在的头半个世纪中（从平九世纪四十年代起）下直在同那些与它根本敌对的理论进行斗争。在四十年代前半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清算了站在哲学唯心主义立场上的激进青年黑格尔派。四十年代末，在经济理论方面进行了反对蒲鲁东主义¹的斗争。五十年代完成了这个斗争批判了在狂风暴雨的1848年显露过头角的党派和学说。在六十年代，平争从一般的理论方面转移到更接近于直接工人运动的方面：在第一国际²中清除了巴枯宁主义³。在七十年代初，蒲鲁东主义者米尔柏格在德国出了一个短时期的风头，在七十年代末，实证论者杜林⁴也暂时显露过买角。但是他们两人对无产阶级的影响都已经微不足道了。马克思主义已经无条件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思想体系。

到上一世纪九十年代，这一胜利大体上已经完成了。就是在蒲鲁东主义传统保持得最久的罗曼语各国，工人政党实际上也是拿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和策略的基础的。重新恢复起来的国际工人运动组织，即定期举行的国际代表天会，立刻而且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斗争，就在一切重大问题方面都站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来了。但是，在马克思主义把一切比较完整的、同马克思主义相敌对的学说排挤出去以后，这些学说所表现的趋向便开始给自己另找出路。平争的形式和原因已经改变，广但是斗争还是继续着。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五十年（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一开始就是同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一个反马克思主义派别进行斗争。

这个派别叫做伯恩斯坦派，因为曾经是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的伯恩斯坦以最嚣张的态度和最完整的形式提出了对马克思学说的修改，对马克思学说的修订，即修正主义。甚至在俄国这样一个由于经济落后，由于被农奴制残余所蹂躏的农民占人口大多数而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自然会支持得最久的国家里，这个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也清清楚楚地在我们眼前转变成修正主义了。我们的社会民粹派无论在土地问题上(把全部土地收归地方公有的纲领)，或者在纲领和策略的一般问题上，都不断地用对马克思学说的种种“修改”来代替他们那自成一派而与马克思主义根本敌对的旧体系的日益消亡、日趋没落的残余。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被击溃了。它已经不是站在自己的独立的基地上而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共同的基地上，作为修正主义来继续斗争了。现在我们来看看修正主义的思想内容究竟怎样。

在哲学方面，修正主义跟在资产阶级教授的“科学”的屁股后面跑。教授们要“回到康德⁵那里去”，修正主义就跟在新康德主义者⁶后面蹒跚而行。教授们重复僧侣们已经说过一千遍的、反对哲学唯物主义的滥调，修正主义者就傲慢地微笑着，嘟哝着(按最新出版的手册逐字逐句地嘟哝着)，说唯物主义早已被“驳倒”了。教授们蔑视黑格尔⁷，把黑格尔当作一条“死狗”⁸来对付，耸肩蔑视辩证法，而自己却又宣扬一种比黑格尔唯心主义还要浅薄和庸俗一千倍的唯心主义；修正主义者就跟着他们爬到从哲学上把科学庸俗化的泥潭里面去，用“简单的”(和平静的)“进化论”去代替“狡猾的”

(和革命的)辩证法。教授们拿他们那些唯心主义的和“批判的”体系去适应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哲学”(即神学),以酬答官家给他们的薪俸,修正主义者就附和他们;努力把宗教变成“私人的事情”,不是对现代国家来说而是对先进阶级的政党来说是“私人的事情”。

对马克思学说的这种“修改”的真正的阶级意义是什么,这无须加以说明,因为这是不说自明的。我们仅仅指出,在国际社会民主党中,普列汉诺夫是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过修正主义者在这里大讲特讲的庸俗不堪的滥调的唯一马克思主义者。这一点所以必须坚决地着重指出,是因为现在有些人极其错误地企图以批判普列汉诺夫在策略方面的机会主义为幌子来偷运陈腐反动的哲学垃圾^①。

在政治经济学方面,首先应当指出,修正主义者在这一方面所作的“修改”更广泛详细得多他们竭力用“经济发展中的新材料”来影响公众他们说,集中和大生产排挤小生产的过程,在农业方面完全没有发生,而在商业和工业方面也进行得极其缓慢。他们说,现在危机已经更少见,更微弱了,卡特尔和托拉斯大概会给资本提供根本消除危机的可能。他们说,阶级矛盾有减弱和缓和下去的趋势,所以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最后他们说,就连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也不妨按照柏姆-巴维克⁹的观点来加以纠正。

① 见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等人合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分析这本书不是本文的任务,我现在只声明一点,在最近的将来,我要写几篇论文或专门写一本小册子来说明,本文中关于新康德派修正主义者所说的一切,实质上适用于这些“新的”新休谟派和新贝克莱派修正主义者。(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8卷。)——编者注

在这些问题上对修正主义者进行的斗争，正象二十年前恩格斯同杜林的论战一样，使国际社会主义的理论思想有了颇见成效的活跃。人们用事实和统计数字详细分析了修正主义者的论据证明了修正主义者一贯地粉饰现代小生产。不仅在工业中，而且在农业中，大生产在技术方面和经营方面都比小生产占优势的事实片由无可辩驳的材料证实了。但是在农业中，商品生产比较不发达，而现代的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通常都不大善于特别注意那些表明农业越来越卷入世界经济交换范围的农业特殊部门(有时甚至是特殊作业)。在自然经济的废墟上外小生产是靠饮食无限恶化，经常挨饿，延长工作时间，家畜质量及其饲养情况恶化，总之，是靠手工业生产用来对抗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那些手段来维持的。科学和技术每向前发展一步，都必不可免地叶毫不留情地破坏资本主义社会内的小生产的基础，而社会主义经济学的任务是研究这一过程所表现的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一切形式是向小生产者证明，他们在资本主义统治下不可能支持下去，农民经济在资本主义统治下没有出路，农民必须接受无产者的观点。从科学方面来说，修正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毛病，是他们对一些片面抽出的事实作肤浅的概括，而不把这些事实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联系起来看，从政治方面来说，他们的毛病就是他们不可避免地、有意或无意地号召农民或推动农民去接受业主的观点(即资产阶级的观点)，而不是推动他们去接受革命无产者的观点。

在危机论和崩溃论的问题上，修正主义的情况更糟。只有在极短促的时间内，只有最近视的人，才会在几年的工业

高涨和繁荣的影响下，就想改造马克思学说的基础。危机的时代并没有过去，这是客观现实很快就向修正主义者表明了的事实：在繁荣之后，接着就来了危机。各个危机的形式、次序和情景是改变了，但是危机仍然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卡特尔和托拉斯把生产统一起来了，但是大家都看到，它们同时又使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变本加厉，使无产阶级的生活更加没有保障，资本的压迫更加严重从而使阶级矛盾尖锐到空前的程度。最新的巨型托拉斯恰恰特别显著、特别广泛地表明资本主义正在走向崩溃，无论就每次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来说，或者就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完全崩溃来说都是如此。不久以前在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全欧洲失业人数惊人的增加，更不用说已经有许多迹象出现的、快要到来的工业危机，一一所有这些都使修正主义者不久以前的“理论”被一切人忘记了，似乎连许多修正主义者自己也忘记了。但是这种知识分子的不坚定性所给予工人阶级的教训，是不应当忘记的。

在价值理论的问题上要说明的只有一点，就是除了一些柏姆-巴维克式的异常模糊的暗示和叹息，修正主义者在这方面绝对没有拿出什么东西来，所以他们也就没有在科学思想的发展上留下任何痕迹。

在政治方面，修正主义企图真的修订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即阶级斗争学说。他们说，政治自由、民主以及普选制已经把阶级斗争的根据消灭掉，并且把《共产党宣言》里的“工人没有祖国”这个旧原理变成不正确的了。他们说，在民主制度下，既然是“大多数人的意志”起支配作用，那就不能

把国家看作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能拒绝同进步的社会改良资产阶级实行联合去反对反动派。

毫无疑义，修正主义者的这些反对意见，是一个相当严整的观点体系，即大家早已知道的自由资产阶级的观点体系。自由派总是说，资产阶级议会制度是会消除阶级和阶级区分的，因为一切公民都毫无差别地拥有投票的权利、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全部欧洲史和十世纪初期的全部俄国革命史，都很清楚地表明这种观点是多么荒谬。在“民主”资本主义的自由下，经济上的差别并没有缩小，而是日益扩大，日益加深。议会制度并没有消除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阶级压迫机关的本质，而是暴露这种本质。议会制度有助于教育和组织比先前积极参加政治事变的人多得多的广大居民群众，但是议会制度并不能以此促使危机和政治革命归于消灭，而是在这种政治革命发生时使国内战争最高限度地尖锐化。1871年春天的巴黎事变和1905年冬天的俄国事变，已经再明显不过地证明这种尖锐化是必然要到来的。法国资产阶级连一秒钟都没有犹豫，立刻就同民族公敌，同蹂躏其祖国的外国军队勾结起来镇压无产阶级运动。谁不懂得议会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中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会导致比先前更激烈地用群众的暴力去解决争执），那他就永远不能在这个议会制度的基地上去进行坚持原则的宣传鼓动工作，去真正培养工人群众抱着必胜的信心参加这种“争执”。在西欧同社会改良主义自由派、在俄国革命中同自由改良派（立宪民主党¹⁰）实行联合、妥协和联盟的经验，已经十分确凿地证明这种妥协只能模糊群众的意识，因

为这种妥协不是提高，而是降低群众斗争的真实意义，把努力斗争的人同最不能斗争、最动摇、最容易叛变的人联系在一起。法国的米勒兰主义¹¹是在真正全国的广大范围内运用修正主义政治策略的最大尝试，它给修正主义作了一个使全世界无产阶级永远不会忘记的实际评价。

修正主义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所抱的态度，是它的经济倾向和政治倾向的自然补充。“最终目的算不了什么，运动就是一切”，伯恩施坦的这句风行一时的话，要比许多长篇大论更能表明修正主义的实质。临时应付，迁就眼前的事变，迁就微小的政治变动，忘记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忘记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资本主义演变的基本特点，为谋取实际的或可以设想的一时的利益而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修正主义的政策。从这一政策的实质就可以明白知道这一政策可能采取各种各样的形式，而每一个稍微“新颖的”问题、每一次稍微出人意料和没有预先觉察到的变动（即使这种变动只是在极小的程度上和最短的时期内改变了发展的基本路线）都不可避免地总要引起某种形式的修正主义。

修正主义之不可避免，决定于它在现代社会中的阶级根源。修正主义是国际现象。每一个稍有见识，稍有头脑的社会主义者都丝毫不会怀疑德国正统派和伯恩施坦派的关系、法国盖得派和饶勒斯派（现在尤其是布鲁斯派）¹²、英国社会民主联盟和独立工党¹³、比利时勃鲁克尔和王德威尔得、意大利整体派和改良派¹⁴、俄国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关系实质上都是一样，虽然按所有这些国家的现状来说，彼此有极不

相同的民族条件和历史特点。现代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分化”，现在实质上在各国都已经是按一条路线进行着，这表明比三四十年前有了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三四十年前在各个国家内相互斗争的并不是统一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一些同性质的派别。而现在在罗曼语各国表现为“革命工团主义”¹⁵的“来自左面的修正主义”也依附于马克思主义，同时把它加以“修正”；意大利的拉布里奥拉、法国的拉葛德尔开口闭口都说他们反对向来被人了解得不正确的马克思，而求助于现在被他们正确地了解了的马克思。

我们在这里不能分析这种修正主义的思想内容，它还远不如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那样成熟，还没有国际化，甚至还没有和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作过一次巨大的实际战斗。因此，我们在这里只分析上述那种“来自右面的修正主义”

为什么修正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可避免的呢？为什么它的根源比民族特点的区别和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区别还要深呢？因为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里用同无产阶级并存的总是有广泛的小资产阶级；即小业主阶层。资本主义过去是从小生产中诞生的，现在也还在不断地从小生产中诞生出来。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产生许多“中间阶层”（工厂附属物，如家庭劳动，以及因适应大工业如自行车工业和汽车工业的需要而散布在全国的小作坊等等）。这些新的小生产者也是免不了要重新被抛入无产阶级队伍的。所以，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当然就会不断地渗入广大工人政党的队伍。这种情形当然不可避免，而且一直到无产阶级革命发生的时候还会继续存在，以为必须在大多数人口“完全”无产阶级化以后才能实

现无产阶级革命，那是极其错误的。现在我们往往只是在思想方面经历着的事情，即我们同修改马克思理论的人们所进行的争论，现在只是在工人运动中个别问题的实践上暴露出来的事情，即我们同修正主义者的策略分歧，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在将来无产阶级革命发生时工人阶级还一定会在大得无可比拟的规模上再次经历到，因为无产阶级革命将使一切争论问题尖锐化，将把一切分歧都集中到对决定群众的行动有最直接的意义的几点上，将迫使我们在斗争激烈的时候分清朋友和敌人，抛开坏的同盟者，以便给敌人以决定性的打击。

十九世纪末叶革命马克思主义对修正主义的思想斗争，只是不顾市会们的种种动摇和懦弱而向着本阶级事业的完全胜利迈进的无产阶级所进行的伟大革命战斗的序幕。

写于 1908 年 4 月 3 日

(16 日)以前

载于 1908 年《卡尔·马克思

(1818-1883)》文集

署名：弗拉·伊林

按文集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 17 卷

第 11-19 页

注 释

- 1 蒲鲁东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因法国无政府主义者比·约·蒲鲁东而得名。蒲鲁东从小资产阶级立场来批判资本主义大所有制,幻想使小私有制万古长存,他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工人依靠这些银行的帮助就能购置自己的生产资料,保证“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不懂得无产阶级的作用和意义竭力反对阶级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从无政府主义的立场出发,否认国家的必要性。蒲鲁东派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不是消灭资本主义和它的基础——商品生产,而是使这个基础免除各种弊病和赘瘤等等,不是消灭交换和交换价值,而相反地,是使它“确立’,使它成为普遍的、绝对的、‘公平的’、没有波动、没有危机、没有弊病的东西,——这就是蒲鲁东思想。”(见《列宁全集》第 20 卷第 17 页)
- 2 见本书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注 25。
- 3 见本书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注 31。
- 4 见本书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注 2。
- 5 见本书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注 12。
- 6 新康德主义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在德国产生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它是康德哲学中最反动的唯心主义原理的翻版。新康德主义者在“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下,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他们企图使科学与康德的唯心主义哲学相调和,否认“自在之物”,不承认社会的客观规律等等。德国社会民主党中的新康德主义者(爱·伯恩斯坦、卡·施米特等人)对马克思的哲学,马克思的经济理论及其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进行了修正。在俄国,“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都是新康德主义的拥护者。
- 7 见本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注 6。

- 8 引自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二版跋(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 9 欧根·柏姆-巴维克是奥地利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政治经济学中的所谓“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反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胡说利润来自对现今和未来的财富的主观估价的差别,而不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结果。他掩盖资本主义的矛盾,妄图诱使工人阶级放弃革命斗争。
- 10 见本书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注13。
- 11 米勒兰主义(或内阁主义,即内阁派)是一种机会主义流派,因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参加反动内阁而得名。米勒兰于1899年参加法国反动的资产阶级政府,同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利费将军合作。
- 12 盖得派是茹·盖得的拥护者,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其领导是盖得和拉法格。盖得派曾坚持独立的革命的无产阶级政策;1901年组成为法兰西社会党。
布鲁斯派(可能派)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以布鲁斯、马隆等人为首。布鲁斯、马隆等在1882年造成了法国工人党的分裂并成立新党“法国社会主义革命工人党”。这个派别的领袖们实际上反对革命的策略,他们宣布改良主义的原则:只争取“可能”(《possible》)争得的东西,即主张把工人阶级的活动限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办到的范围内,因此有“可能派”之称。1902年,可能派的多数参加了饶勒斯创立的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1905年,法兰西社会党和法国社会党合并为一个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茹·盖得和法国社会党的整个领导一起转到社会沙文主义立场上去。
- 饶勒斯派是饶勒斯的拥护者。饶勒斯是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右翼改良派的首领,在九十年代同米勒兰一起组织了“独立社会党”。饶勒斯派在要求“自由批评”的伪装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进行修正,鼓吹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实行阶级合作。他们在1902年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国社会党。
- 13 社会民主联盟是英国的社会主义组织,成立于131884年8月。这个组织联合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社会主义者。联

盟的领导长期被以海德门为首的改良主义分子所把持，他们推行机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政策。加入联盟的一小批革命马克思主义者（爱·马克思-艾威林、爱德华·艾威林、汤，曼等人），与海德门的路线相反，进行了争取同群众性的工人运动建立密切联系的斗争。1884年秋联盟发生分裂，左翼成立了独立的组织——社会主义同盟。在此以后，机会主义者在社会民主联盟里的影响加强了但是群众的革命情绪影响之下，联盟内部仍在继续产生不满机会主义领导的革命分子。1907年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条件下，联盟改组为社会民主党，1911年又与独立工党中的左派合并，命名为英国社会党。

英国独立工党于1893年成立。该党的首领是凯尔·哈第、拉只麦克唐纳等人。列宁指出，独立工党“是一个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它“只对社会主义‘独立’，对自由主义则非常依赖”（见《列宁全集》第29卷第450页，第18卷第354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独立工党于1914年8月13日发表宣言反对战争。之后，在1915年2月协约国社会党人伦敦代表会议上独立党人同意代表会议通过的社会沙文主义的决议。从那时起，独立党首领以和平主义词句作掩护，推行社会沙文主义。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在左派党员群众的压力下，独立工党的首领通过了退出第二国际的决议。1921年独立党人参加了所谓第二半国际，在第二半国际瓦解后，他们重新加入了第二国际。

- 14 整体派是十九世纪末法国、意大利和比利时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它主张社会主义不应当只依靠工人阶级，而应当不分阶级地依靠整个“受苦的人”，主张阶级和平，反对阶级斗争。这一个派别的主要代表是法国的马降和意大利的恩利科·费里。九十年代，意大利整体派在一些问题上曾反对过采取极端机会主义立场并同反动的资产阶级合作的改良派。

- 15 “革命工团主义”是十九世纪末在西欧一些国家的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派别。

工团主义者否认工人阶级进行政治斗争的必要性，否认党的领导作用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认为，工会（工团）只要组织工人总罢工而不必进行革命，就能够推翻资本主义，取得生产的管理权。

列 宁

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

现在我们把杜马代表苏尔科夫在国家杜马讨论主教公会预算案时的发言，以及我们杜马党团会议讨论这篇发言稿的材料刊登出来，因为这两个材料提出了一个恰巧在目前是非常重要的和特别迫切的问题。凡是同宗教有关的一切，目前无疑已经引起“社会”各界人士、以至接近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和某些工人群众的兴趣。社会民主党当然应该表明自己对于宗教的态度。

社会民主党的整个世界观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即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屡次说，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它完全继承了法国十八世纪的和德国十九世纪上半期费尔巴哈¹的唯物主义历史传统，即绝对无神论的、坚决反对一切宗教的唯物主义的历史传统。我们要指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马克思看过该书的手稿），自始至终都是揭露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杜林²没有坚持唯物主义，给宗教和宗教哲学留下了后路。必须指出，恩格斯在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著作中责备费尔巴哈，说他反对宗教不是为了消灭宗教而是为了革新宗教，为了创造出一种新的、“高尚的”宗教等等。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³，——马克思的这一句名言是马克思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的全部世界观的基

石。马克思主义始终认为现代所有的宗教和教会、各式各样的宗教团体，都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用来捍卫剥削制度、麻醉工人阶级的机构。

但是，恩格斯同时也多次谴责那些想比社会民主党人做得更“左”或更“革命”的人，谴责他们企图在工人政党的纲领里规定直接承认无神论，即向宗教宣战。1874年，恩格斯谈到当时侨居伦敦的公社布朗基派流亡者发表的著名宣言时，认为他们大声疾呼向宗教宣战是一种愚蠢的举动，指出这样宣战是提高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妨碍宗教真正消亡的最好手段。恩格斯斥责布朗基派不了解只有工人群众的阶级斗争从各方面吸引了最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加自觉的革命的**社会实践**，才能真正把被压迫的群众从宗教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宣布工人政党的政治任务是同宗教作战，那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空谈而已⁴。1877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书中无情地斥责哲学家杜林对唯心主义和宗教所作的让步，即使是些微的让步，但也同样严厉地斥责杜林提出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禁止宗教存在这一似乎是革命的主张。恩格斯说，这样向宗教宣战，就是“比俾斯麦⁵本人有过之无不及”即重蹈俾斯麦反教权派斗争的覆辙（所谓“文化斗争”，Kulturkampf，就是俾斯麦在1870年用警察手段迫害天主教，反对德国天主教会，即反对“中央”党的斗争⁶）。俾斯麦的这场斗争，只是巩固了天主教徒的战斗教权主义，只是危害了真正的文化事业，因为这样一来不是把政治上的分野提到首位，而是把宗教上的分野提到首位，使某些工人阶层和民主派忽视革命的阶级斗争的迫切任务而去重视最表面的、资产阶级虚伪的

反教权主义运动。恩格斯痛斥了妄想做超革命家的杜林，说他想用另一种方式来重复俾斯麦的蠢举，同时恩格斯要求工人政党耐心地努力组织和教育无产阶级，使宗教渐渐消亡，而不要冒险地在政治上对宗教作战。⁷ 这个观点已经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完全接受，例如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张给耶稣会教徒以自由，主张允许他们进入国境，主张取消对付这种或那种宗教的任何警察的斗争手段。“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是爱尔福特纲领⁸ (1891年)的一个有名的条文，这一条确定了社会民主党的上述政治策略。

这个策略现在竟然成为陈规陋矩，竟然产生了一种新的歪曲，即把马克思主义歪曲到它的反面，即歪曲成了机会主义。有人把爱尔福特纲领的这一论点说成这样，似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我们的党，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对于我们社会民主党人来说，对于我们党来说，宗教是私人的事情。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恩格斯虽然没有同这种机会主义观点进行直接的争辩，但是他认为必须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不过不是用辩论的方式而是采用正面叙述的方式。当时恩格斯有意地着重声明，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对于国家来说是私人的事情，但是对于社会民主党本身，对于马克思主义，对于工人政党来说决不是私人的事情。⁹

从外表上看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宗教问题表示意见的经过就是如此。轻率看待马克思主义的人，不善于或不愿意动脑筋的人，觉得这种经过只是表明马克思主义荒谬地自相矛盾和摇摆不定：一方面主张“彻底”无神论，另一方面又“宽容”宗教，这是多么混乱的思想，一方面主张同上帝进行

最最革命的战争，另一方面懦怯地想“迁就”信教的工人，怕把他们吓跑等等，这是多么“没有原则”的动摇。在无政府主义空谈家的作品中，这种攻击马克思主义的说法是很不少的。

可是，只要稍微能认真一些研究马克思主义，考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理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经验，就能很容易地看出想马克思主义对待宗教的策略是十分严谨的并是经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周密考虑的。在迂儒或无知的人看来是动摇的表现，其实都是从辩证唯物主义中得出来的直接的和必然的结论。如果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宗教采取似乎是“温和的”态度是出于所谓“策略上的”考虑，是为了“不把”工人“吓跑”等等，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地，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政治路线，也是同它的哲学原理有密切关系的。

马克思主义就是唯物主义。正因为如此，它同十八世纪百科全书派¹⁰，的唯物主义或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一样，也坚决反对宗教。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比百科全书派和费尔巴哈更进一步，它把唯物主义哲学应用到历史领域，应用到社会科学领域。我们应当同宗教作斗争。这是**整个**唯物主义的起码原则，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原则。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停留在起码原则上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更前进了一步。它认为必须善于同宗教作斗争，为此要善于用**唯物主义**观点来说明群众中的信仰和宗教的根源。同宗教作斗争不应该限于抽象的、思想上的宣传，不能把它归结为这样的宣传；而应该把这一斗争同消灭产生宗教的社会根源的阶级运动的具体实践联系起

来。为什么宗教在城市无产阶级的落后部分中，在广大的半无产阶级阶层中，在农民群众中能够保持它的影响呢？资产阶级的进步人士，即激进派或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者回答说，这是由于人民的愚昧无知。由此得出结论说：打倒宗教，无神论万岁，宣传无神论观点是我们的任务。马克思主义者说：这话不对。这是一种肤浅的、资产阶级的、狭隘的文化主义观点。这种观点不够深刻，这不是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是用唯心主义的观点说明宗教的根源。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根源主要是社会的根源。劳动群众受到社会的压抑，在时时刻刻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最可怕的灾难、最残酷的折磨（比战争、地震等任何非常实践厉害一千倍）的资本主义盲目势力面前，他们觉得似乎毫无办法，——这就是目前宗教最深刻的根源。“恐惧创造神”。现代宗教的根源就是对资举盲目势力的恐惧，而这种势力确实是盲目的势力，因为人民群众不能预见到它，因为它使无产者和小业主在生活中随时随地都可能遭到，而且正在遭到“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偶然发生的”破产和毁灭，使他们变成乞丐，变成穷光蛋，变成娼妓，甚至活活饿死。凡是不愿一直留在预备班的唯物主义者，都应当首先而且特别注意这种根源。只要受资本主义苦役制度压迫、受资本主义盲目破坏势力摆布的群众自己还没有学会团结一致地、有组织地、有计划地、自觉地反对宗教的这种根源，反对任何形式的**资本统治**，那末无论什么启蒙书籍都不能使这些群众不信仰宗教。

由此是否可以说，反宗教的启蒙书籍是有害的或多余的呢？不是的。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只是说，社会民主

党宣传无神论，应当**服从**社会民主党的基本任务发展被剥削**群众**反对剥削者的阶级斗争。

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的原理没有深入思考过的人，也许不能了解(至少是不能一下子了解)这条原则。怎么会这样呢?进行思想宣传，宣扬某种思想，同文化和进步的敌人，同支持了数千年之久的敌人(即宗教)作斗争，为什么要服从阶级斗争，服从在经济政治方面实现一定的实际目标的斗争呢?

这种反对意见也是一种流行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见，这证明反驳者完全不懂得马克思的辩证法，使这种反驳者感到不安的矛盾，是实际生活中的实际矛盾，即辩证的矛盾，而不是字面上的、臆造出来的矛盾。谁认为在理论上宣传无神论，即破除某些无产阶级群众的宗教信仰，同这些群众阶级斗争的成效、进程和条件之间有一种绝对的、不可逾越的界限，那他就不是辩证地看问题，就是把可以移动的、相对的界限看作绝对的界限，就是硬把活的现实中的不可分割的东西加以分割。举个例子来说吧。假定某个地方和某个工业部门的无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先进的，是相当觉悟的社会民主党人，他们当然是无神论者，另一部分则是相当落后的，他们同农村和农民还保持着联系，他们信仰上帝，常到教堂里去，甚至直接受本地某一个建立基督教工会的祭司的影响。再假定这个地方的经济斗争引起了罢工。马克思主义者应该首先使罢工运动得到成功，应当坚决反对在这场斗争中把工人分成无神论者和基督教徒，应当坚决反对这样的划分。在这种情况下，宣传无神论就显得是多余的和有害

的，这倒并不是由于象庸人那样考虑到不要把落后工人吓跑，不要在选举时落选等等，而是从实际推进阶级斗争这一点出发的，因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环境中，阶级斗争能把信基督教的工人吸引到社会民主党和无神论这方面来，而且比枯燥地宣传无神论还要有效一百倍。在这样的时候和这样的环境中，宣传无神论，就只能有**利于僧侣**，因为他们恰恰最愿意用信不信神这一标准来划分工人，以代替是否参加罢工这一标准。无政府主义者鼓吹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对宗教开战，其实是帮助了僧侣和资产阶级（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实际上始终帮助资产阶级一样）。马克思主义者应当是唯物主义者，是宗教的敌人，但是他们应当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就是说，他们不应当抽象地提出反宗教斗争的问题，不应当根据抽象的、纯粹理论的、始终不变的宣传来进行反宗教斗争，而应当具体地、根据当前**实际上**所进行的、对广大群众教育最大最有效的阶级斗争提出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善于估计整个具体情况，随时看清无政府主义同机会主义的界限（这个界限是相对的，是可以移动、可以改变的，但它确实是存在的）既不陷人无政府主义者那种抽象的、口头上的、其实是空洞的“革命主义”，也不陷人小资产者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那种庸俗观念和机会主义，不要象他们那样害怕同宗教作斗争，忘记自己的这种任务，容忍宗教信仰不从阶级斗争的利益出发，而斤斤计较细小的得失。不得罪天序不排斥人，不吓唬人，遵循聪明绝顶的处世之道：“你活，也让别人活”，如此等等。

凡是同社会民主党对宗教的态度有关的枝节问题，都应

该根据上述观点来解决。例如，经常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祭司能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人们通常根据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经验对这一问题作无条件的、肯定的回答。但是这种经验并不完全是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应用于工人运动的结果，而是由西欧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这种条件在俄国并不存在（关于这种条件，我们到下面再谈），所以无条件的肯定的回答在我国是不正确的。不能一成不变地在任何情况下都宣布说祭司不能成为社会民主党党员，但是也不能一成不变地提出相反的规定。如果有一个祭司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共同进行政治工作，真心诚意地完成党的工作，不反对党纲，那我们可以吸收他加入社会民主党，因为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党纲的精神和基本原则同这个祭司的宗教信念的矛盾，也许只是关系到他一个人的矛盾，只是他个人的矛盾，而一个政治组织要用考试的方法检验自己成员所持的观点是否同党纲矛盾，那是办不到的。当然，这种情况即使在欧洲也是绝无仅有的，在俄国更是难于想象了。如果这位祭司加入社会民主党之后，竟在党内积极宣传宗教观点，作为他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工作，那末党当然应该把他开除出自己的队伍我们不仅应当容许，而且应当特别注意吸收信神的工人加入社会民主党，我们绝对反对任何侮辱他们宗教信念的行为，但是我们吸收他们是要用我们党纲的精神来教育他们，而不是要他们来积极反对党纲。我们容许党内自由发表意见，但是以自由结合原则所容许的一定的范围为限：回我们没有义务同积极宣传被党内多数人挨弃的观点的人携手并进。当

不如再举一个例子：假定有的社会民主党党员声明“社会

主义是我的宗教”，并且宣传与此相应的观点，对这种党员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一概加以申斥呢？不能这样做。这种声明确实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而也就背离了社会主义），但是这种背离的意义和所谓的比重在不同环境下可能是不相同的。一个鼓动员或一个在对工人群众讲话的人，为了说得明白一点，[为了给自己的解释开一个头，顺为了用不觉悟的群众最熟悉的说法更具体地说明自己的观点，而说了这样一句话，这是一回事。如果一个作家开始宣传“造神说”¹¹或造神社会主义（就同我们的卢那察尔斯基及其同伙那样），那是另一回事。在前一种情况下，提出申斥就是吹毛求疵，甚至是过分限制鼓动员的自由限制运用“教育法”来影响群众的自由，在后一种情况下，党的申斥却是必须而且应该的。“社会主义是宗教”这一论点，对某些人来说，是从宗教转到社会主义的亡种方式，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从社会主义转到宗教的一种方式。

现在来谈谈西欧哪些条件使“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一点遭到了机会主义的歪曲。当然，这里是有产生一般机会主义的七般原因的影响，机会主义也就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牺牲工人运动根本的利益。无产阶级政党要求国家把宗教宣布为私人的事情，但决不认为同麻醉人民的鸦片作斗争同宗教迷信等等作斗争的问题是“私人的事情”。机会主义者把情况歪曲成这样愚似乎社会民主党认为宗教是私人的事情！

但是除了常见的机会主义歪曲对于这种歪曲，我们的杜马党团在讨论有关宗教问题的演说时完全没有加以说明)而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历史条件使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对宗教

问题采取了目前这种可说是过分冷漠的态度。这些条件分两种第中出反宗教的斗争在历史上是革命资产阶级的任务，在西欧造资产阶级民主派在他们自己的革命时代，或者说在他们自己冲击封建制度和中世纪制度的时代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完成了(或争取完成)这个任务。无论在法国或德国都有资产阶级反宗教斗争的传统，这个斗争在社会主义运动以前很久就开始了(百科全书派，费尔巴哈)。在俄国，由于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条件，这个任务也几乎完全落到工人阶级的肩上。同欧洲比较起来因我国小资产阶级的(民粹主义的)民主派在这方面做的事情并不是(象《路标》¹²中的那些新出现的黑帮立宪民主党人¹³或立宪民主党人黑帮所想的那样)太多了，而是太少了。

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反宗教斗争的传统在欧洲早已造成了无政府主义对于这一斗争所作的纯粹资产阶级性的歪曲，而无政府主义者从正如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屡次说明的，虽然非常“猛烈地攻击资产阶级，但是他们还是站在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立场业共罗曼语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布朗基主义¹⁴者，德国的莫斯特¹⁵(附带说句，他曾经是杜林的门生)之流，奥地利八十年代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反宗教斗争中使革命的空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难怪现在欧洲社会民主党人因反对无政府主义者而做得矫枉过正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在某种程度上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忘记西欧的特殊历史条件图那是不行的。

第二，在西欧，自从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结束以后，自从实现了比较完全的信教自由以后悬反宗教的民主斗争问题在

历史上已被资产阶级民主派反社会主义的斗争排挤到次要的地位，所以资产阶级政府往往故意对教权主义举行假自由主义的“讨伐”，转移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注意力。德国的文化斗争以及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反教权主义斗争，都带有这种性质。资产阶级的反教权主义斗争，是转移工人群众对社会主义的注意力的手段，——这就是目前西欧社会民主党人对反宗教斗争普遍采取“冷漠”态度的根源。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社会民主党人的确应该使反宗教斗争服从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借以对抗资产阶级的俾斯麦分子的反教权主义运动。

俄国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无产阶级是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无产阶级政党应当成为思想上的领袖，领导反对一切中世纪制度的斗争，其中包括反对陈腐的、官方的宗教，反对任何革新宗教、重新建立或用另一种方式建立宗教的企图等等。如果说，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把工人政党要求国家宣布宗教为私人事情的主张偷换成宣布宗教对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民主党本身来说也是私人事情，如果说，恩格斯纠正这种机会主义所用的方式还比较缓和，那末俄国机会主义者仿效德国人的这种歪曲，就应该受到恩格斯严厉一百倍的斥责。

我们的党团在杜马讲坛上声明宗教是麻醉人民的鸦片，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这种先例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每次对宗教问题发表意见时都应该遵循的。是不是还应该更进一步，把无神论的结论发挥得更详细呢？我们认为用不着的。这样，无产阶级政党就会有夸大反宗教斗争意义的危险，这样就会

抹杀资产阶级反宗教斗争同社会主义者反宗教斗争之间的界限。社会民主党党团在黑帮杜马中应该完成的第一件事情，已经光荣地完成了。

第二件事情，也许是社会民主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明教会和僧侣支持黑帮政府和资产阶级反对工人阶级的阶级作用，这一任务也光荣地完成了。当然，关于这个问题还可以说得很多；今后社会民主党人谈这个问题还会对苏尔科夫同志的发言作些补充，但是这篇发言毕竟是很出色的，我们的直接任务就是要各级党组织广泛宣传这篇发言。

第三件事情，就是要十分详尽地说明经常被德国机会主义者歪曲的“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一原理的正确含义。遗憾的是苏尔科夫同志没有这样做。尤其令人遗憾的是，在党团过去的活动中，别洛乌索夫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犯过错误（这个错误《无产者报》¹⁶曾及时指出了）。党团内的讨论情况表明，党团争论无神论问题，却没有正确说明宣布宗教是私人的事情这一著名的要求我们决不把整个党团所犯的这个错误都推在苏尔科夫同志一个人身上。不仅如此。我们公开承认这是全党的过错，因为我们党对这个问题解释不够，没有让社会民主党人充分认识到恩格斯批评德国机会主义者的意思。党团内的讨论情况证明这正是由于对问题了解得不清楚，而不是不愿意考虑到马克思的学说，所以我们深信，党团在以后发言时一定会纠正这一错误。

我们再说一遍，总的说来，苏尔科夫同志的发言是很出色的，各级党组织应当广泛加以宣传。党团对这篇发言的讨论，证明党团在兢兢业业地完成它所肩负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职责。

不过我们希望报道党团内部讨论情况的通讯能更经常地在党的报刊上发表,使得党团同党的关系更加密切,使党能了解党团内部所进行的艰巨的工作,使党和党团的活动在思想上趋于一致。

载于 1909 年 5 月 13 日
(26 日)《无产者报》第
45 号杂志第 3 期

按《启蒙》杂志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 15 卷
第 376-387 页

注 释

- 1 见本书第 364 页,《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注 1。
- 2 杜林,欧根·卡尔(1833-1921)——德国折衷主义哲学家和庸俗经济学家,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在哲学上把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和实证论结合在一起,是个形而上学者,在自然科学和文学方面也有所著述,1863-1877 年为柏林大学讲师。
- 3 参看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 页)。
- 4 见恩格斯《流亡者文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587-505 页)。
- 5 见本书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注 21
- 6 指文化斗争。见本书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注 34。
- 7 参看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54--356 页)。
- 8 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纲领是 1891 年 10 月在爱尔福特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用来代替 1875 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

进了一步，因为它摒弃了拉萨尔主义的教条。但是，爱尔福特纲领还有严重错误，主要是没有又提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没有提出推翻君主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1801年6月恩斯对这个纲领的草案进行了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3-280页)。

9 指恩格斯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一书德文第三版写的导言(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页)。

10 百科全书派是十八世纪法国一部分启蒙思想家所形成的派别。他们在《百科全书》(1751—1780年)的编纂过程中团结在一起，因而被称为百科全书派。《百科全书》的主编是狄德罗。百科全书派坚决反对天主教会、经院哲学以及封建等级制度，在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准备方面起了不小作用。

11 指所谓的“造神说”。这是文学界中的一种敌视马克思主义的宗教哲学思潮，它产生于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党内部分知识分子中间，这些知识分子在1905-1907年革命失败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造神派”(卢那察尔斯基、巴札罗夫等)鼓吹创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的”宗教，企图调和马克思主义和宗教。高尔基有一个时候和他们接近《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1909年)斥责了“造神说”，并在特别决议中声明：布尔什维克派“跟诸如此类的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歪曲”是没有丝毫共同之处的。

12 《路标》是立宪民主党人写的文集，1909年在莫斯科出版，其中有尼·别尔嘉也夫、谢布尔加柯夫、彼·司徒卢威、米个格尔申和其他反革命自由资产阶级代表的文章。路标派在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文章中营企图贬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的传统，他们诬蔑1905年的革命运动，感谢沙皇政府“用刺刀和牢狱”拯救了资产阶级。文集号召知识分子去为专制政府服务。列宁认为《路标》文集在哲学方面和政论方面的纲领同黑帮报纸《莫斯科新闻》的纲领不相上下，并且称该文集是“自由主义者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是一整套对民主派的反动诬蔑”。

13 立宪民主党是俄国主要的资产阶级政党，自由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政党，

1905年10月成立，首 领是巴·尼·米留可夫。立宪民主党人用假民主主义作掩饰，自称为“人民自由”党，力图把农民拉过去。他们企图用君主立宪制的形式来保存沙皇制度。后来立宪民主党变成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党。十月革命胜利后，立宪民主党人组织过反苏维埃共和国的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暴动。

- 14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1805-1881——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许多秘密社团和密谋活动的组织者，1830年和1848年革命的积极参加者，秘密的“四季社”的领导人，1839年5月12日起义的组织者，法国无产阶级运动的著名领袖；曾多次被判处徒刑，巴黎1870年10月31日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时期被反动派四禁在凡尔赛，曾缺席当选为公社委员。

布朗基主义是以布朗基为首的一个流派。

列宁认为布朗基是一个无可怀疑的革命家和社会主义的热烈拥护者，但同时又坚决地批评他的宗派主义和密谋活动的方法。列宁指出，“布朗基主义是否认阶级斗争的理论。布朗基主义不是想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想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见《列宁全集》第10卷第361页）。

- 15 约翰·莫斯特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后来成为政府主义者。

- 16 《无产者报》（《Илпоерапун》）是布尔什维克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创办的秘密报纸；1906年9月3日至1909年12月11日由列宁编辑出版。共出了五十号。《无产者报》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和彼得堡委员会机关报的名义出版，但有时也以莫斯科专区、皮尔姆、库尔斯克、喀山委员会机关报的名义出版。《无产者报》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报。《无产者报》的最初二十号是在芬兰出版的。1908年2月26日至12月14日该报在日内瓦出版，从1909年1月21日起在巴黎出版。

该报发表了列宁的一百多篇文章和短评。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方面起了卓越的作用。1910年1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托洛茨基的隐藏的代理人帮凶调和派设法通过了关于停办《无产者报》的决定。

列 宁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的一点，就是阐明了无产阶级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创造者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作用。自马克思阐述这个学说以后，全世界的事变进程是不是已经证实了这个学说呢？马克思最初提出这个学说，是在1844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于1848年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已对这个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从这时起，世界历史显然分为三个主要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1848年革命到巴黎公社（1871年），第二个时期是从巴黎公社到俄国革命（1905年，第三个时期是从这次俄国革命起。



我们来考察一下马克思学说在每个时期的命运。

在第一个时期的初期，马克思学说决不是占统治地位的。它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之一而已。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是那些基本上与我国民粹派相似的社会主义派别，它们不懂历史运动的唯物主义基础，不会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阶级的作用和意义而用各种貌似社会主义的什么“人民”、“正义”确“权利等辞来掩盖各种民主改革的资产阶级实质。不县昏街变事话界口。1848年的革命，给了马克思以前的一切喧嚷叫嚣、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派别一个致命的打击。各

国的革命，使社会各阶级在行动中暴露了自己的面目。共和派资产阶级在 1848 年六月巴黎事变时枪杀工人¹，最终地证明了只有无产阶级具有社会主义本性。自由资产阶级害怕这个阶级的独立活动，比害怕任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百倍。懦弱的自由派在反动势力面前摇尾乞怜。农民以废除封建残余为满足，开始转向现存秩序方面只是间或动摇于工人民主派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之间。一切关于非阶级的社会主义和非阶级的政治的学说，都是胡说八道。

巴黎公社(1871 年)最终结束了这一资产阶级改革的发展过程，只是由于无产阶级的英勇，才使共和制度即最露骨地表现出阶级关系的那种国家组织形式巩固起来。

在欧洲其他一切国家，更混乱和不彻底的发展过程也导向同样的资产阶级社会的形成。到第上个时期(1848—1871 年)即风暴和革命时期的末期，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已奄奄待毙。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第一国际(1864—1872 年)和德国社会民主党诞生了。

二

第二个时期(1872—1904 年)占第一个时期的区别，就是它带有“和平”性质而没有发生过革命。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了。东方还没有成熟到实现这种革命的程度。

西方进入了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到处都在形成根本正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这些政党学习利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创办自己的日报，建立自己的教育机关、自己的工会和自己的合作社。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

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聚集和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准备无产阶级去作未来的战斗的过程，慢慢地、但是一往直前地进展着。

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内脏腐烂了的自由主义，企图在社会主义的机会主义形态下复活起来。他们把为伟大战斗准备力量的时期说成是放弃这种战斗。他们把改善奴隶状况以便反对雇佣奴隶制度说成是奴隶们为子换取几文钱而出卖自己的自由权。他们怯懦地宣扬“社会和平”（即同奴隶制度讲和平），背弃阶级斗争等等。在社会党议员中间，在工人运动的各种官僚以及“富有同情心的”知识分子中间，他们有很多信徒。

三

当机会主义者刚在拚命赞美“社会和平”，拚命鼓吹在“民主制度”下可以避免风暴的时候，极大的世界风暴的新泉源已在亚洲涌现出来了。继俄国革命之后，发生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些风暴盛行及其“反转来影响”欧洲的时代。不管各种“文明”豺狼切齿痛恨的伟大的中华共和国命运如何，但是，世界上任何力量也不能在亚洲恢复旧的农奴制度，也不能铲除亚洲国家和半亚洲国家人民群众的英勇的民主精神。

有些不注意群众斗争的准备条件和发展条件的人，看见欧洲反资本主义的决战长期迁延下去就陷入失望和无政府主义的境地。现在我们看到，这种无政府主义的失望是多么近视，

多么懦弱。意八亿人民的亚洲投入了为实现与欧洲相同的理想的斗争,从这个事实中所应吸取的不是失望,而是勇气。

亚洲各国革命同样向我们揭示了自由主义的卑鄙无耻、民主群众独立活动的特殊意义、无产阶级与任何资产阶级间的明显界限。有了欧亚两洲的经验,谁若还说什么非阶级的政治和非阶级的社会主义,谁就只配关在笼子里,和澳洲袋鼠一起供人观赏。

欧洲也跟着亚洲行动起来了,不过不是按照亚洲的方式。1872—1904年的“和平”时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物价的飞涨和托拉斯的压榨已使经济斗争空前尖锐化,甚至使那些受自由主义腐化最深的英国工人也动作起来了。就是在德国这个最“顽固的”资产阶级容克国家里,政治危机也在迅速成熟。狂热的军备竞争和帝国主义政策,使得现代欧洲的“社会和平”活象一桶火药。一切资产阶级政党解体与无产阶级成熟的过程,是在一往直前地进展着。

自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后,世界历史三大时代中的每一时代,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但是,即将来临的历史时代,定会使马克思主义这个无产阶级学说获得更大的胜利。

载于1913年3月1日
《真理报》第50号
署名:弗·伊·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18卷
第581—584页

注 释

- 1 指资产阶级共和派政府残暴地镇压1848年6月23—28巴黎无产阶级的起义。

列 宁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 三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的学说在整个文明世界中引起全部资产阶级的科学（官方科学和自由派科学）极大的仇视和憎恨，这种科学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有害的宗派”之类的东西。也不能期望资产阶级的科学会报别的态度，因为建筑在阶级斗争上的社会里是不会有“公正的”社会科学的。全部官方的和自由派的科学都这样或那样地为雇佣奴隶制辩护，而马克思主义则对这种奴隶制宣布了无情的战争。期望在雇佣奴隶制的社会里有公正的科学，正象期望在应不应该用减少资本利润来增加工人工资的问题上有公正的工厂主一样愚蠢可笑。

而且，哲学史和社会科学史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在马克思主义里绝没有与“宗派主义”相似的东西，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巧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最伟大代表的学说的直接继续。

马克思的学说所以万能，就是因为它正确。它十分完备而严密，它给予人们一个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

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世界观。马克思学说是人类在十九世纪所创造的优秀成果——德国的哲学、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的社会主义的当然继承者。

现在我们就来简短地说明一下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来源以及它的三个组成部分。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在欧洲全部近代史中特别是十八世纪末叶，在进行了反对一切中世纪废物、反对农奴制和农奴制思想的决战的法国，唯物主义成为唯一彻底的哲学，它忠于一切自然科学学说，仇视迷信、伪善行为及其他等等。因此，民主的敌人便竭尽一切力量来“驳倒”破坏和诋毁唯物主义，维护那些不管怎样总是维护或支持宗教的各种哲学唯心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并且多次说明，一切离开这个基础的倾向都是极端错误的。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反杜林论》里十分明确和详尽地叙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两部著作也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停止在十八世纪的唯物主义上，而是把哲学向前推进了。他用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成果，特别是用使费尔巴哈¹唯物主义哲学能以产生的黑格尔²体系的成果丰富了哲学。这些成果中最重要的就是辩证法，即最完整深刻而无片面性弊病的关于发展的学说，这种学说认为反映

永恒发展的物质的人类认识是相对的。自然科学方面的最新发现如镭、电子、元素转化等，不管资产阶级哲学家们那些“重新”回到陈旧腐烂的唯心主义去的学说怎样说，却灿烂地证实了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

马克思加深和发展了哲学唯物主义，使它成为完备的唯物主义哲学，把唯物主义对自然界的认识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的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这种科学理论说明，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从一种社会生活结构中会发展出另一种更高级的结构，例如从农奴制度中生长出资本主义。

人的认识反映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自然界，也就是反映发展着的物质；同样，人的**社会认识**（就是哲学、宗教、政治等各种不同的观点和学说）也反映社会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我们知道，例如现代欧洲各国的各种政治形式，都是为巩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统治而服务的。

马克思的哲学是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它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特别是给了工人阶级。

二

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马克思的主要著作《资本论》就是专门研究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

制度的。

古典政治经济学是在马克思以前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形成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³研究经济制度的时候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马克思继续了他们的事业。他严密地论证了并且透彻地发展了这个理论。他证明，任何一个商品的价值，都是由生产这个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决定的。

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方面(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商品的交换表示通过市场来实现的各个生产者之间的联系。货币表明这一联系更加密切,已经把各个生产者的全部经济生活不可分割地联结成一个整体了。资本表明这一联系的继续发展:人的劳动力变成了商品。雇佣工人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占有土地、工厂和劳动工具的人。工人用一部分工作时间作为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生活的开支(工资),而另一部分工作时间工人是无报酬地劳动的,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这也就是利润的来源,资本家阶级财富的来源。

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

由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资本反转来压迫工人,使小业主破产,造成失业大军。大生产在工业中能够取得胜利是十分明显的,在农业中也可以看到同样的现象:大规模资本主义农业日益占优势,使用机器的范围日益扩大,农民经济日益陷入货币资本的绞索,由于技术落后而日益衰败和破产。在农业方面,小生产的衰败的形式虽然不同,但是它的衰败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资本打击着小生产，同时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造成了大资本家同盟的垄断地位。生产本身日益社会化，使几十万以至几百万工人联结成一个有条不紊的经济机体，而共同劳动的产物却归一小撮资本家所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愈来愈严重，危机日益加深，争夺市场的斗争愈来愈疯狂，人民群众的生活愈来愈没有保障。

资本主义制度在使工人愈来愈依赖资本的同时，也造成联合劳动的伟大力量。

马克思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从商品经济的萌芽，从简单的交换一直到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到大生产。

一切资本主义国家(无论老的或新的)发展过程，都一年比一年明显地向愈来愈多的工人群众证明，马克思的这学说是完全正确的。

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获得了胜利，但是这一胜利不过是劳动对资本的胜利的前阶。

三

当农奴制度被推翻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时候，立刻就暴露出一件事实，即这种自由意味着压迫和剥削劳动者的一种新制度。于是反映这种压迫并且表示反对这种压迫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就立刻产生了。但是初期的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批评资本主义社会，指斥它，咒骂它，幻想消灭它，幻想有比较好的制度出现，劝导富人，说剥削是不道德的。

但是空想社会主义不能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新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愿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

然而，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法国，在封建制度即农奴制度崩溃时随之而来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日益明显地表明了**阶级斗争**是全部发展进程的基础和动力。

没有一次向农奴主阶级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不是打退了拚命的反抗才获得胜利的。没有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不是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才在比较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马克思的天才就在于他最先从这里得出了全世界历史提示的结论，并且一贯地推行了这个结论。这一结论就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

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当那些主张改良和改善的人还不懂得任何一个旧制度，不管它怎样荒谬和腐败，都是由某些统治阶级的势力所支持的时候，他们总是会受拥护旧制度的人们愚弄的。要打破这些阶级的反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必须在我们所处的社会中找出一种力量，教育它和组织它去进行斗争，这种力量能够（而且按它的社会地位应当）成为扫除旧制度和创立新制度的力量。

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摆脱精神奴役的出路，一切被压迫阶级一直受着这种精神奴役的

痛苦。只有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在全世界，从美洲到日本，从瑞典到南非洲，无产阶级的独立组织正在不断地增加。无产阶级一面进行阶级斗争，一面受到教育和训练，他们摆脱资产阶级社会的偏见，日益紧密地团结起来，并且学习怎样估计自己的成绩，锻炼自己的力量和不可遏止地成长起来。

载于 1913 年 3 月《启蒙》

杂志第 3 期

署名：弗·伊·

按《启蒙》杂志原文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 19 卷

第 1-8 页

注 释

- 1 见本书马克思《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注 1。
- 2 见本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注 6。
- 3 斯密，亚当（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大的代表人物之一。
李嘉图，大卫（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

列 宁

卡尔·马克思¹

(传略和马克思主义概述)(摘录)

序 言

现在用单行本出版的《卡尔·马克思》一文，是我在 1913 年（根据我的记忆）为格拉纳特词典写的。原来文末附有相当详细的、多半是外文的、论述马克思的书目。这个书目没有编进本版。其次，词典编辑部考虑到书报检查，又把本文结尾阐述马克思的革命策略的部分删去了。可惜在这里我无法把结尾部分再加进去，因为原稿留在克拉科夫或瑞士我的某些文稿中。我只记得，在文章的结尾部分，我还引用了 1856 年 4 月 16 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的两句话：“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如果那样就太好了。”² 这就是我们的孟什维克从 1905 年起就没有能理解的地方，而现在，他们已完全背叛社会主义而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尼·列宁

1918 年 5 月 14 日于莫斯科

1918 年载于莫斯科“波涛”
出版社出版的尼·列宁《卡
尔·马克思》一书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 26 卷
(第二版) 第 47 页

卡尔·马克思 1818 年公历 5 月 5 日生于特里尔城（莱茵普鲁士）。他的父亲是一位律师，犹太人，1824 年加入新教。这个家庭是富裕的，有教养的，但不是革命的。马克思在特里尔中学毕业后，先后入波恩和柏林的大学毕业攻读法学，但他研究得最多的是历史和哲学。1841 年大学毕业时提交了一篇论伊壁鸠鲁哲学的学位论文。马克思就其当时的观点来说，还是一个黑格尔³唯心主义者。在柏林，他加入过“左派黑格尔派”（布鲁诺·鲍威尔等人）的圈子，这派人想从黑格尔哲学中作出无神论的和革命的结论。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迁居波恩，打算当教授。但是当时政府实行反动政策，1832 年撤销路德维希·费尔巴哈⁴的教授职务，1836 年又拒绝让费尔巴哈进大学讲课，1841 年又剥夺青年教授布鲁诺·鲍威尔在波恩的讲学资格，这样就迫使马克思放弃了当学者的前程。当时左派黑格尔派的观点在德国发展很快。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特别是从 1836 年起，开始批判神学，转向唯物主义，到 1841 年，唯物主义在他的思想中已经完全占了上风（《基督教的本质》）；他的另一著作《未来哲学原理》于 1843 年问世。后来，恩格斯在谈到费尔巴哈的这些著作时写道：这些书的“解放作用，只有亲身体会过的人才能想象得到”。“我们（即左派黑格尔派，包括马克思）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⁵ 这时，一些同左派黑格尔派接近的莱茵激进派资产者，在科隆创办了一个反对派的报纸《莱茵报》⁶（1842 年 1 月 1 日创刊）。马克思和布鲁

诺·鲍威尔被聘为主要撰稿人。1842年10月，马克思担任该报主编，并从波恩迁居科隆。该报在马克思的编辑下，革命民主倾向愈来愈明确。所以政府起初对该报进行双重的，甚至是三重的检查，后来，在1843年1月1日决定干脆将其查封。马克思被迫在查封之前辞职，但该报并没有因此而得救，终于在1843年3月被查封。马克思在《莱茵报》上发表的主要文章，除后面列举的（见参考书目^①）以外，恩格斯还曾提到论摩泽尔河谷酿造葡萄酒的农民的状况一文。办报工作使马克思感到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知识不够，于是他发奋研究这门科学。

1843年，马克思在克罗伊茨纳赫同童年时代的女友燕妮·冯·威斯特华伦结婚。马克思还在大学读书时就同她订了婚。燕妮出身于一个反动的普鲁士贵族家庭。她的哥哥曾在1850—1858年这个最反动的时期任普鲁士内务大臣。1843年秋，马克思赴巴黎，此行的目的是和阿尔诺德·卢格（1802—1880年；左派黑格尔派，1825—1830年被监禁，1848年以后流亡国外；1866—1870年以后成为俾斯麦主义者）一起在国外创办一种激进的杂志。这个《德法年鉴》⁷杂志只出了第1期。其所以停刊，是因为在德国秘密发行困难，加上马克思同卢格意见不合。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发表的文章表明他已经是一个革命家。他主张“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尤其是“武器的批判”⁸；他诉诸群众，诉诸无产阶级。

1844年9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曾到巴黎小住数日，他从这时起便成为马克思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两人一起极其

① 见《列宁全集》第21卷第50—72页，本选集未收入。

热情地投入当时巴黎各革命团体的沸腾生活（蒲鲁东⁹的学说当时特别有影响，马克思于1847年在《哲学的贫困》中对它进行了彻底的清算），并在同各种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进行的尖锐斗争中创立了革命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或者说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策略（见后面的书目所载的马克思在1844—1848年这一时期的著作）。1845年，在普鲁士政府的坚决要求下，马克思作为一个危险的革命分子而被驱逐出巴黎。此后他迁居布鲁塞尔。1847年春，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入秘密宣传团体“共产主义者同盟”¹⁰，参加了该同盟的第二次代表大会（1847年11月在伦敦举行）并起了突出的作用，他们受大会委托起草了1848年2月发表的著名的《共产党宣言》。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

1848年二月革命¹¹爆发时，马克思被驱逐出比利时。他重返巴黎，并于三月革命¹²后，又从巴黎回到德国科隆。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科隆出版了《新莱茵报》¹³；马克思任该报主编。1848—1849年的革命事态的发展极好地证实了新的理论，后来世界各国所有的无产阶级运动和民主运动也同样证实了这一理论。得胜的反革命势力起初将马克思提交法庭审判（1849年2月9日宣告无罪），以后又把他驱逐出德国（1849年5月16日）。马克思先到巴黎，在1849年6月13日游行示威¹⁴后又驱逐出巴黎，此后他

移居伦敦，直到去世。

流亡生活极端困苦，这一点从马克思同恩格斯的通信（1913年出版）¹⁵中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及其一家饱受贫困的折磨。如果不是恩格斯牺牲自己而不断给予资助，马克思不但无法写成《资本论》，而且势必会死于贫困。此外，当时占优势的小资产阶级和所有非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思潮，迫使马克思经常进行无情的斗争，有时还要反驳各种穷凶极恶的人身攻击（《福格特先生》^①）。马克思竭力避开流亡者的圈子，写了一些历史著作（见参考书目）来详细阐述自己的唯物主义理论，并主要致力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马克思通过《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出版）和《资本论》（1867年出版第一卷）这两部著作，使这门科学发生了一场革命（见后面马克思的学说）。

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民主运动复兴时期，马克思又投入实际活动。1864年（9月28日），在伦敦成立了有名的第一国际，即“国际工人协会”¹⁶。马克思是这个协会的灵魂，协会的第一个《宣言》¹⁷以及许多决议、声明和公告都出自他的手笔。马克思把各个国家的工人运动统一起来，竭力把各种非无产阶级的即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马志尼¹⁸、蒲鲁东、巴枯宁¹⁹、英国的自由派工联主义、德国拉萨尔²⁰右倾分子等等）纳入共同行动的轨道，并同所有这些派别和学派的理论进行斗争，从而为各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制订了统一的无产阶级斗争策略。在1871年巴黎公社——马克思对它曾经作过极其深刻、准确、出色而有影响的、革命的分析（1871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397-754页——编者注

年的《法兰西内战》)——失败之后,在巴枯宁分子使第一国际分裂之后,第一国际已无法在欧洲继续存在。在海牙国际代表大会(1872年)²¹以后,马克思把国际总委员会移至纽约。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国工人运动空前大发展的时代,即工人运动向广度发展,以各个民族国家为基地建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时代。

在第一国际中的紧张工作和更为紧张的理论研究活动,完全损坏了马克思的健康。他继续进行改造政治经济学和完成《资本论》的工作,为此大量收集新的资料,学习好几种语言(例如俄语),可是疾病使他没有能够写完《资本论》。

1881年12月2日,马克思的妻子去世。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静静地长眠于他的安乐椅中。他被安葬于伦敦的海格特公墓,安息在妻子的身边。马克思的子女,有几个由于当时家境十分贫困,在童年时便死于伦敦。三个女儿爱琳娜、劳拉、燕妮,分别嫁给了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艾威林、拉法格、龙格。燕妮的儿子是法国社会党²²党员。

马克思的学说

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马克思是十九世纪人类三个最先进国家中的三种主要思潮——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以及同法国所有革命学说相联系的法国社会主义——的继承者和天才的完成者。马克思的观点极其彻底而严整,这是马克思的对手也承认的,这些观点总起来就构成作为世界各文明国家工人运动的理论和纲领的

现代唯物主义和现代科学社会主义。因此，我们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即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之前，必须把他的整个世界观作一简略的叙述。

哲学唯物主义

从 1844—1845 年马克思的观点形成时起，他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首先是路·费尔巴哈的信奉者，就是到后来他还认为，费尔巴哈的弱点仅仅在于他的唯物主义不够彻底和全面。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划时代的”世界历史作用，就在于他坚决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决裂，宣扬了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早“在十八世纪，特别是在法国，就不仅是反对现存政治制度的斗争，同时是反对现存宗教和神学的斗争，而且还是……反对一切形而上学（意即与“清醒的哲学”相反的“醉熏熏的思辨”）……的斗争”^①。马克思写道：“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他称为观念而甚至把它变成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创造者、缔造者）……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② 弗·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书^③中完全以马克思的这个唯物主义哲学为依据，并阐述了这个哲学，他写道：“……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

① 《遗著》中的《神圣家族》。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59 页。

——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 1 卷第 2 版跋。——编者注

③ 见该书，马克思看过该书的手稿。——编者注

存在，而在于它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运动是物质的存在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没有也不可能有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如果要问：究竟什么是思维和意识，它们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就会发现，它们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就是说，在他看来，他头脑中的思想不是现实的事物和过程的多少抽象的反映（Abbilder，意即映象，恩格斯有时还称为“印象”），相反地，在他看来，事物及其发展只是在世界出现以前已经在某个地方存在着的‘观念’的现实化的反映。”^① 弗·恩格斯在叙述自己和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看法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中^②写道：“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精神和自然界的的关系问题。……什么是本原的，是精神，还是自然界？……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承认某种创世说的人……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③ 在其他任何意义上运用（哲学的）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概念，都只能造成混乱。马克思不但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3、98-99、74-75、64页。——编者注

② 此书付排前，恩格斯重新阅读了他和马克思于1844—1845年写的论述黑格尔、费尔巴哈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原稿。——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15页和第316页——编者注

坚决驳斥了始终这样或那样地同宗教相连的唯心主义，而且坚决驳斥了现时特别流行的休谟²³观点和康德²⁴观点，即形形色色的不可知论、批判主义

和实证论，认为这类哲学是对唯心主义的一种“反动的”让步，充其量是“把当众拒绝的唯物主义又羞羞答答地暗中接受过来”^①。关于这个问题，除上面已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以外，还可参看 1868 年 12 月 12 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在这封信中，马克思谈到了著名博物学家托·赫胥黎发表的比通常“更具有唯物主义精神的”演讲，谈到了他认为“当我们真正观察和思考的时候，我们永远也不能脱离唯物主义”，但同时又斥责赫胥黎为不可知论、为休谟主义留下了“后路”。^② 特别应当指出马克思关于自由与必然的关系的观点：“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③ 这也就是承认自然界的客观规律性，承认必然向自由的辩证转化（如同尚未认识但可以认识的“自在之物”向“为我之物”转化，“物的本质”向“现象”转化一样）。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旧”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在内（更不要说毕希纳、福格特、摩莱肖特的“庸俗”唯物主义了），其主要缺点是：（1）这种唯物主义“主要是机械的”唯物主义，它没有考虑到化学和生物学（现在还加上物质的电学理论）的最新发展；（2）旧唯物主义是非历史的、非辩证的（是反辩证法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它没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第 318 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2 卷第 213 页。——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第 153 页。——编者注

有彻底和全面地贯彻发展的观点；（3）他们抽象地理解“人的本质”，而不是把它理解为“一切社会关系的（一定的具体历史条件下的）总和”，所以他们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却在于“改变”世界，也就是说，他们不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意义^①。

辩 证 法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黑格尔辩证法这个最全面、最富内容、最深刻的发展学说，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大成就。他们认为，任何其他关于发展的原理、进化的原理的说法，都是片面的、内容贫乏的，只能把自然界和社会的实际发展过程（往往伴有飞跃、剧变、革命）弄得残缺不全。“可以说唯有马克思和我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使其不致与包括黑格尔主义在内的唯心主义同被粉碎）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而且我们必须说，现代自然科学为这种检验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这是在镭、电子和元素转化等等发现以前写的！）、与日俱增的材料，并从而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②

恩格斯写道：“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其中各个似乎稳定的

① 参看《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6-19页。

——编者注

② 见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反杜林论》第1卷第51、62页。——编者注

事物同它们在我们头脑中的思想映象即概念一样都处在生成和灭亡的不断变化中，——这个伟大的基本思想，特别是从黑格尔以来，已经成了一般人的意识，以致它在这种一般形式中未必会遭到反对了。但是，口头上承认这个思想是一回事，实际上把这个思想分别运用于每一个研究领域，又是一回事。”“在辩证哲学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终的东西、绝对的东西、神圣的东西；它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暂时性；在它面前，除了生成和灭亡的不断过程、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过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这个过程在思维着的头脑中的反映。”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就是“关于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²⁵

马克思接受并发展了黑格尔哲学的这一革命的方面。辩证唯物主义“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以往的哲学只留下了“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①而辩证法，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同样也根据黑格尔的看法，其本身包括现在称之为认识论的内容，这种认识论同样应当历史地观察自己的对象，研究并概括认识的起源和发展，从不知到知的转化。

现在，发展观念，进化观念，几乎完全深入社会的意识，但不是通过黑格尔哲学，而是通过另外的途径。不过，这个观念，按马克思和恩格斯依据黑格尔哲学而作的表述，要比一般流行的进化观念全面得多，丰富得多。发展似乎是在重复以往的阶段，但它是以另一种方式重复，是在更高的基础上重复（“否定的否定”），发展是按所谓螺旋式，而不是按直

① 见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反杜林论》第1卷第652页。——编者注

线式进行的；发展是飞跃式的、剧变式的、革命的；“渐进过程的中断”；量转化为质；发展的内因来自对某一物体、或在某一现象范围内或某一社会内发生作用的各种力量和趋势的矛盾或冲突；每种现象的一切方面（而且历史在不断地揭示出新的方面）相互依存，极其密切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形成统一的、有规律的世界运动过程，——这就是辩证法这一内容更丰富的（与通常的相比）发展学说的若干特征。^①

唯物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认识到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不完备性和片面性，确信必须“使关于社会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²⁶。既然唯物主义总是用存在解释意识而不是相反，那么应用于人类社会生活时，唯物主义就要求用社会存在解释社会意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工艺学会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以及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②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推广运用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如下的完整的表述：

“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

① 参看马克思 1868 年 1 月 8 日给恩格斯的信，其中嘲笑施泰因²⁷的“死板的三分法”，认为把三分法同唯物主义辩证法混为一谈是荒谬的²⁸。

②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13 章第一节第 470 页。——编者注

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样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象自然科学那样精确地确定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解决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

发现唯物主义历史观，或者更确切地说，把唯物主义贯彻和推广运用于社会现象领域，消除了以往的历史理论的两个主要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只是考察了人们历

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些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学”和历史学，至多是积累了零星收集来的未加分析的事实，描述了历史过程的个别方面。马克思主义则指出了对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生、发展和衰落过程进行全面而周密的研究的途径，因为它考察了所有各种

阶 级 斗 争

矛盾的趋向的总和，把这些趋向归结为可以准确测定的、社会各阶级的生活和生产的条件，排除了选择某种“主导”思想或解释这种思想时的主观主义和武断态度，揭示了物质生产力的状况是所有一切思想和各种不同趋向的根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群众的动机是由什么决定的，各种矛盾的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是由什么引起的，一切人类社会中有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是怎样的，构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是怎样的，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是怎样的，——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且指出了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

① 参看马克思 1866 年 7 月 7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的简短表述：“我们的关于生产资料决定劳动组织的理论。”——编者注

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

某一社会中一些成员的意向同另一些成员的意向相抵触；社会生活充满着矛盾；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各民族之间，各社会之间，以及各民族、各社会内部的斗争，还看到革命和反动、和平和战争、停滞和迅速发展或衰落等不同时期的更迭，——这些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有研究某一社会或某几个社会的全体成员的意向的总和，才能科学地确定这些意向的结果。其所以有各种矛盾的意向，是因为每个社会所分成的各阶级的地位和生活条件不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写道：“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恩格斯后来补充说明，原始公社的历史除外）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行会师傅和帮工，一句话，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的、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都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它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形式代替了旧的。但是，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却有一个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从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非常明显地揭示出事变的这种真实背景，即阶级斗争。法国复辟时代就出现了这样一些历史学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

也尔),他们在总结当时的事变时,不能不承认阶级斗争是了解整个法国历史的锁钥。而当今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取得了完全胜利、设立了代议机构、实行了广泛的(甚至是普遍的)选举制、有了供群众阅读的廉价的日报等等的时代,已经建立起势力强大的、范围不断扩大的工人联合会和企业主同盟等等的时代,更加清楚地(虽然有时是用很片面的、“和平的”、“立宪的”形式)表明,阶级斗争是事变的推动力。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一段话可以向我们表明,马克思怎样要求社会科学根据对现代社会中每个阶级的发展条件的分析对每个阶级所处的地位作出客观的分析:“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阶级都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趋没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间等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是为了维护他们这种中间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鉴于他们行将转入无产阶级的队伍,这样,他们就不是维护他们目前的利益,而是维护他们将来的利益,他们就离开自己原来的立场,而站到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²⁹ 在一系列历史著作中(见参考书目),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以至一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所处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说“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³⁰。我们上面引证的一段话清楚地说明,马克思为了测定历史发展的整个合力,分析了

多么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各个过渡阶段。

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写道：“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① 研究这个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的生产关系的发生、发展和衰落，就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的内容。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所以马克思的分析也就从分析商品入手。

价 值

商品是这样一种物，一方面，它能满足人们的某种需要，另一方面，它能用来交换别种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交换价值（或简称价值）首先是一定量的一种使用价值同一定量的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关系或比例。每天的经验都向我们表明，这种亿万次的交换，总是使各种极不相同的互相不可比的使用价值趋于彼此相等。这些在一定社会关系体系内总是可以彼此相等的不同物之间，究竟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它们之间的共同的东西，就是它们都是**劳动产品**。人们通过交换产品，使各种极不相同的劳动彼此相等。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7页。——编者注

商品生产是一种社会关系体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体系中，各个生产者制造各种不同的产品（社会分工），而所有这些产品在交换中彼此相等。因此，一切商品的共同的东西，并不是某一生产部门的具体劳动，并不是某一种类的劳动，而是**抽象的人类劳动**，即一般的人类劳动。表现在全部商品价值总额中的一个社会的全部劳动力，都是同一的人类劳动力，亿万次交换的事实都证明这一点。因此，每一单个商品所表现的只是一定份额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的大小由**社会必要劳动量**决定，或者说，由生产某种商品即某种使用价值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人们在交换中使他们的各种产品彼此相等，也就使他们的各种劳动彼此相等。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是他们这样做了。”^①一位旧经济学家³³说过，价值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关系。不过他还应当补充一句：被物的外壳掩盖着的关系。只有从一定的历史社会形态的社会生产关系体系来看，并且只有从表现在大量的、重复亿万次的交换现象中的关系体系来看，才能了解什么是价值。“作为价值，一切商品都只是一定量的凝固的劳动时间。”^②马克思仔细分析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以后，就进而分析价值形式和货币。这里，马克思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货币价值形式的起源，研究交换发展的历史过程——从个别的偶然的交换行为（“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一定量的一种商品同一定量的另一种商品相交换）开始，直到一般价值形式，这时若干不同的商品同一种固定的商品相交换，最后到货币

① 见《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0—91页。——编者注

② 见《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页。——编者注

价值形式，这时金成为这种固定的商品，即一般等价物。货币是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的最高产物，它把私人劳动的社会性，把由市场联结在一起的各个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遮蔽起来，掩盖起来。马克思极其详细地分析了货币的各种职能；而在这里（也如同在《资本论》开头的两章中一样）特别重要的是要看到，抽象的、有时好象是纯粹演绎式的叙述，实际上是再现了交换和商品生产发展史的大量实际材料。“货币是以商品交换发展到一定高度为前提的。货币的各种形式，即单纯的商品等价物，或流通手段，或支付手段、贮藏货币和世界货币，按其中这种或那种职能的不同作用范围和相对占优势的情况，表示社会生产过程的极不相同的阶段。”^①

剩 余 价 值

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货币就转化为资本。商品流通的公式是： T （商品）—— π （货币）—— T （商品），这就是说，卖出一种商品是为了买进另一种商品。相反，资本的一般公式是 π —— T —— π ，这就是说，买是为了卖（带来利润）。马克思把投入周转的货币的原有价值的那种增加叫作剩余价值。货币在资本主义周转中的这种“增殖”，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正是这种“增殖”使货币转化为资本，转化为一种特殊的、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剩余价值不能从商品流通中产生，因为商品流通只能是等价物的交换；也不能从加价中产生，因为买主和卖主相互间的盈亏会抵销，而

^① 见《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3页。——编者注

这里说的正是大量的、平均的、社会的现象，而不是个别的现象。为了获得剩余价值，“货币所有者就必须在市场上发现这样一种商品，它的使用价值本身具有成为价值源泉的特殊属性”^①，它的使用过程同时也是价值的创造过程。这样的商品是存在的。这就是人的劳动力。它的使用就是劳动，而劳动则创造价值。货币所有者按劳动力的价值购买劳动力，而劳动力的价值，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是由生产劳动力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费用决定的价值）决定的。货币所有者购买了劳动力，就有权使用劳动力，即迫使他整天劳动，譬如说劳动十二个小时。其实工人在六小时（“必要”劳动时间）内就创造出补偿其生活费用价值的产品，而在其余六小时（“剩余”劳动时间）内则创造出资本家没有付给报酬的“剩余”产品或者说剩余价值。因此，从生产过程来看，必须把资本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耗费在生产资料（机器、劳动工具、原料等等）上面的不变资本，它的价值（一下子或者一部分一部分地）不变地转到成品上去；另一部分是耗费在劳动力上面的可变资本。这种资本的价值不是不变的，而是在劳动过程中有所增加，创造出剩余价值。因此，为了表示资本对劳动力的剥削程度，不应当把剩余价值同全部资本相比，而应当把它只同可变资本相比。这种比例，马克思称作剩余价值率，例如，在上面所举的例子中，它是六分之六，即百分之一百。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是：第一，在一般商品生产发展到比较高的水平的情况下某些人手里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货币；

① 见《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0页。——编者注

第二，存在双重意义上“自由的”工人，从他们可以不受任何约束或限制地出卖劳动力来说是自由的，从他们没有土地和任何生产资料来说也是自由的，他们是没有产业的工人，是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工人“无产者”。

增加剩余价值可以有两种基本方法：延长工作日（“绝对剩余价值”）和缩短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在分析第一种方法时，展示了工人阶级为缩短工作日而斗争，以及国家政权为延长工作日（十四至十七世纪）和为缩短工作日（十九世纪的工厂立法）而进行干预的壮观情景。《资本论》问世后，世界一切文明国家的工人运动的历史，又提供了成千成万件表明这种情景的新的事实。

马克思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考察了资本主义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三个基本历史阶段：（1）简单协作；（2）分工和工场手工业；（3）机器和大工业。马克思在这里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基本的典型的特征揭示得多么深刻，从对俄国的所谓“手工”工业的考察提供了足以说明这三个阶段的前两个阶段的极其丰富的材料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而马克思在 1867 年所描写的大机器工业的革命作用，从那时到现在这半个世纪中在许多“新”国家（俄国、日本等等）里也都显示了出来。

资 本 积 累

其次，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分析是极其重要和新颖的。资本积累，就是把一部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不是用它来满足资本家的个人需要或嗜欲，而是把它投入新的生产。马

克思指出，整个先前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从亚当·斯密起）的一个错误就在于，它认为剩余价值在转化为资本时全部都用作可变资本。而事实上，剩余价值分为生产资料和可变资本。在资本主义发展和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不变资本部分（在全部资本中）比可变资本部分增长得快，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资本积累加速机器对工人的排挤，在一极造成富有，在另一极造成贫困，因而产生所谓“劳动后备军”，即工人的“相对过剩”或“资本主义的人口过剩”。这种过剩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并使资本有异常迅速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加上信用制度及生产资料方面的资本积累，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生产过剩危机的锁钥，这种危机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总是周期性地发生，起初平均每隔十年一次，后来则间隔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比较不固定。必须把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资本积累同所谓原始积累区别开来。原始积累是强迫劳动者同生产资料分离，把农民从土地上赶走，侵占公有地，实行殖民制度、国债制度、保护关税制度等等。“原始积累”在一极造成“自由的”无产者，在另一极造成货币所有者即资本家。

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马克思曾用下面的一段名言说明“**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疯狂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私有者（农民和手工业者）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相结合为基础的私

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力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①

平均利润率

其次，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的分析，也是极其重要和新颖的。马克思在这里考察的

① 见《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0—832页。——编者注

② 看来是笔误，应是“利润率”。——编者注。

也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普遍现象；不是社会经济的零星部分，而是整个社会经济的总和。马克思纠正了古典经济学家的上述错误，将整个社会生产分为两大部类，即（I）生产资料的生产和（II）消费品的生产，并通过他所列举的数字例证详细地考察了在以原有规模再生产的情况下和在积累的情况下社会总资本的流通。《资本论》第三卷所解决的是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形成平均利润率的问题。马克思把经济科学推进了一大步，这表现在他是根据普遍的经济现象，根据社会经济的全部总和来分析问题，而不是象庸俗政治经济学或现代的“边际效用论”那样，往往只根据个别偶然现象或竞争的表面现象来分析问题。马克思先分析了剩余价值的来源，然后考察了剩余价值之分为利润、利息和地租。利润^②是剩余价值与投入企业的全部资本之比。“有机构成高”（即不变资本超过可变资本的数额高于社会平均数）的资本所提供的利润率，低于平均利润率。“有机构成低”的资本所提供的利润率，则高于平均利润率。资本之间的竞争，资本从一个部门自由地转入另一个部门，会使上述两种情况下的利润率都趋向平均。一个社会的全部商品的价值总量是同商品的价格总量相符的，但由于竞争的影响，在各个企业和各个生产部门内，商品不是按其价值，而是按等于所耗费的资本加平均利润的生产价格出卖的。

这样，价格离开价值和利润平均化这一众所周知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就被马克思根据价值规律充分说明了，因为全部商品的价值总量是同价格总量相符的。然而价值（社会的）变为价格（个别的），不是经过简单的直接的途径，而是

经过极其复杂的途径,因为很自然,在完全靠市场联系起来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的社会中,规律性只能表现为平均的、社会的、普遍的规律性,而不同方向的个别的偏离则相互抵销。

地 租 论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示不变资本比可变资本增长得快。而既然产生剩余价值的只是可变资本,所以利润率(剩余价值与全部资本之比,而不只是与资本的可变部分之比)当然就有下降的趋势。马克思详细分析了这一趋势和阻挡或者说抵销这一趋势的许多情况。现在我们不再转述《资本论》第三卷中论述高利贷资本、商业资本和货币资本的那些引人入胜的章节,只谈最主要的——**地租**理论。由于土地面积有限,而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土地又全被各个业主所占有,所以农产品的生产价格不是取决于中等地的生产费用,而是取决于劣等地的生产费用,不是取决于产品运往市场的中等条件,而是取决于产品运往市场的劣等条件。这种生产价格与优等地(或优等条件下)的生产价格的差别,就产生等差地租或者说**级差地租**。马克思仔细分析了这种地租,说明它来源于各块土地肥力的差别,来源于土地的投资量的差别,这就完全揭露了(并见《剩余价值理论》,那里对洛贝尔图斯的批评特别值得注意)李嘉图的错误。李嘉图认为级差地租只是由于从优等地依次向劣等地转移而产生的。实则相反,也有逆向的转移,也有某一类土地转变为别类土地的情况(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城市的发展等等),所以那个出名的“土地肥力递减规律”是极其错误的,是把资本主义的缺陷、局限性和矛盾归咎于自

然界。其次，利润在工业的各个部门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中平均化的前提，是竞争的完全自由，是资本从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流动的自由。但土地私有制造成垄断，妨碍这种自由流动。由于这种垄断，资本有机构成较低从而个别利润率较高的农业的产品，就不加入完全自由的利润率平均化过程；土地所有者作为垄断者有可能使价格保持在平均价格之上，而这种垄断价格就产生绝对地租。在资本主义存在的条件下，级差地租是不可能消灭的，而绝对地租却可能消灭，例如在土地国有化的时候，在土地转归国家所有的时候就可能消灭。这种转变会打破私有者的垄断，会导致在农业中更彻底更充分地实行自由竞争。因此——马克思指出——激进派资产者曾在历史上多次提出土地国有化这一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但资产阶级中大多数人却害怕这个要求，因为这个要求太接近于“触动”当代另一种特别重要和特别“敏感的”垄断，即一般生产资料的垄断。^①讲到地租史的时候，还必须提到马克思对地租的转化过程所作的分析，即由工役地租（农民用自己的劳动在地主的土地上创造剩余产品）转化为产品地租或实物地租（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生产剩余产品，因受“经济外的强制”而将剩余产品交给地主），然后转化为货币地租（也是一种实物地租，即由于商品生产的发展而转化为货币，在旧日罗斯称“代役租”），最后转化为资本主义地租，这时农民已为使用雇佣劳动从事耕作的农业企业

① 马克思在 1862 年 8 月 2 日给恩格斯的信中，特别通俗简明地叙述了自己关于资本平均利润和绝对地租的理论。见《通信集》第 3 卷第 77—81 页。并参看 1862 年 8 月 9 日的信，同上，第 86—87 页。——编者注

主所代替。

农业资本主义进化

讲到对“资本主义地租的产生”的这种分析时，必须指出马克思关于**农业资本主义演进**的许多深刻的（对象俄国这样一些落后的国家有特别重要意义的）思想。“不仅在由实物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的同时，必然形成一个无产的、为货币而受人雇用的短工阶级，而且甚至在这种转化之前就形成这个阶级。在这个阶级刚刚产生，还只是偶然出现的时期，在那些较富裕的有交租义务的农民中间，必然有那种自己剥削农业雇佣工人的习惯发展起来，正如早在封建时期，就有富裕的农奴自己又拥有农奴一样。因此，他们积累一定的财产并且本人转化为未来资本家的可能性也就逐渐发展起来。从这些旧式的、独立经营的土地占有者中间，也就产生了培植资本主义租佃者的温床，他们的发展，取决于农村以外的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发展……”^①“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工具，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②而农村居民的贫困和破产，又在为资本造成劳动后备军方面起了作用。在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中，“一部分农村人口因此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人口或制造业人口（即非农业人口）的队伍。相对过剩人

① 《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332页。——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778页。——编者注

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①。农民对自己耕种的土地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是小生产繁荣并成为典型形态的条件。但这种小生产只能同狭隘的原始的生产范围和社会范围相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不同罢了。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一个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一个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②。“农民的小块土地现在只是使资本家从土地上榨取利润、利息和地租，而让土地所有者自己随便怎样去挣自己的工资的一个借口。”^③通常农民甚至把一部分工资交给资本主义社会，即交给资本家阶级，自己却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④。“小块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谷物价格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的原因之一”^⑤何在呢？在于农民把一部分剩余产品白白交给社会（即资本家阶级）。“因此，这种较低的价格（粮食和其他农产品的）是生产者贫穷的结果，而决不是他们的劳动生产率的结果。”^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块土地所有制，即小生产的标

① 《资本论》第2版第1卷第668页。——编者注

② 《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98页。——编者注

③ 《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第220页。——编者注。

④ 《法兰西阶级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97页。——编者注

⑤ 《资本论》第3卷《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340页。——编者注。

⑥ 《资本论》第3卷《资本论》第3卷下册第340页。——编者注。

准形态,不断衰退、毁灭、消亡。“小块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质来说就排斥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劳动的社会形式、资本的社会积聚、大规模的畜牧和科学的不断扩大的应用。高利贷和税收制度必然会到处促使这种所有制没落。资本在土地价格上的支出,势必夺去用于耕种的资本。生产资料无止境地分散,生产者本身无止境地分离。〈合作社,即小农协作社,虽能起非常进步的资产阶级的作用,但只能削弱这个趋势,而不能消灭这个趋势;同时不应当忘记,这种合作社对富裕农民的好处很多,对贫苦农民群众的好处则很少,几乎没有,而且协作社本身也会成为雇佣劳动的剥削者。〉人力发生巨大的浪费。生产条件日趋恶化和生产资料日益昂贵是小块土地所有制的规律。”^①资本主义在农业方面,也和工业方面一样,完全是以“生产者的殉难历史”为代价来改造生产过程的。“农业工人在广大土地上的分散,破坏了他们的反抗力量,而城市工人的集中却增强了他们的反抗力量。在现代的即资本主义的农业中,也和现代的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②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10页。——编者注

② 《资本论》第1卷第13章末。——编者注

社 会 主 义

从上文可以看出，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劳动社会化通过无数种形式日益迅速地向前发展，在马克思去世后的半个世纪以来，特别明显地表现在大生产与资本家的卡特尔、辛迪加和托拉斯的增长以及金融资本的规模和势力的巨大增长上，——这就是社会主义必然到来的主要物质基础。这个转变的思想上精神上的推动者和实际上的执行者，就是资本主义本身培养的无产阶级。表现于多种多样和内容日益丰富的形式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要成为以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为目标的政治斗争。生产社会化不能不导致生产资料转变为社会所有，导致“剥夺者被剥夺”。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作日缩短，完善的集体劳动代替残存的原始的分散的小生产，——这就是这种转变的直接结果。资本主义彻底破坏了农业同工业的联系，但同时又以自己的高度发展准备新的因素来建立这种联系，使工业同农业在自觉运用科学和合理组织集体劳动的基础上，在重新分布人口（既消除农村的荒僻、与世隔绝和不开化状态，也消除大量人口集中在大城市的反常现象）的基础上结合起来。现代资本主义的最高形式准备着新的家庭形式，并为妇女的地位和青年一代的教育准备新的条件。在现代社会里，女工和童工的使用，资本主义对父权制家庭的瓦解，必然采取最可怕最痛苦最可憎的形式。

但是“由于大工业使妇女、男女少年和儿童在家庭范围以外，在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生产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也就为家庭和两性关系的更高级的形式创造了新的经济基础。当然，把基督教日耳曼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就象把古罗马家庭形式、古希腊家庭形式和东方家庭形式看成绝对的东西一样，都是荒谬的。这些形式依次构成一个历史的发展序列。同样很明白，工人由各种年龄的男女搭配组合而成，尽管在其自发的、野蛮的、资本主义的形式中，也就是在工人为生产过程而存在，不是生产过程为工人而存在的那种形式中，是造成毁灭和奴役的祸根，但在适当的条件下，必然会反过来变成人类发展的源泉”^①。工厂制度使我们看到“未来教育的幼芽……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②。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把民族问题和国家问题也放在同样的历史的基础上，这就是说不仅仅限于解释过去，而且大胆地预察未来，并勇敢地用实际活动来实现未来。民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工人阶级如果不“把自身组织成为民族”，如果不成为“民族的”（“虽然完全不是资产阶级所理解的那种意思”）^③，就不能巩固、成熟和最终形成。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日益打破民族壁垒，消除民族隔绝状态，用阶级对抗代替民族对抗。因此，就发达的资本主义国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6—537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0页。——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7页。——编者注

家来说，“工人没有祖国”，工人至少是各文明国家的工人的“联合的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之一”³¹。这些论断，是不容置疑的真理。国家这个有组织的暴力，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产生的，这时社会已分裂成相互不可调和的阶级，如果没有一种似乎站在社会之上并在一定程度上脱离社会的“权力”，社会就无法存在。国家从阶级矛盾中产生后，便成为“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因此，古代的国家首先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国家是贵族用来镇压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³²。甚至民主共和国这一最自由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形式，也丝毫不能消除这个事实，而只能改变这个事实的形式（政府和交易所之间的联系，对官吏和报刊的直接或间接的收买，等等）。社会主义将导致阶级消灭，从而也导致国家消灭。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写道：“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①“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5—306页。——编者注

在一起。”^①

最后，关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对待那些在剥夺者被剥夺时期还将继续存在的小农的态度问题，必须举出恩格斯表达马克思的思想的一段话：“当我们掌握了国家权力的时候，我们绝不会用暴力去剥夺小农（不论有无报偿，都是一样），象我们将不得不如此对待大土地占有者那样。我们对于小农的任务，首先是把他们的私人生产和私人占有变为合作社的生产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过示范和为此提供社会帮助。当然，到那时候，我们将有足够的手段，使小农懂得他们本来现在就应该明了的好处。”^②

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

早在 1844—1845 年，马克思就判明了旧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之一，就是未能理解革命实践活动的情况和正确评价这一活动的意义，所以，马克思后来在从事理论写作的同时，毕生都十分注意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问题。马克思的全部著作，特别是 1913 年出版的四卷本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都在这方面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些材料还远远没有收齐，没有汇集在一起，没有加以研究和整理。因此，我们在这里只能作一个最一般最简短的评介，着重说明，马克思正确地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198 页。——编者注

② 恩格斯《西方土地问题》即《法德农民问题》，阿列克谢耶娃出版的版本第 17 页，俄译本有错误。原文载于《新时代》杂志³⁴。引文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580—581 页。——编者注

认为，唯物主义缺少这一方面，就是不彻底的、片面的、毫无生气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是严格根据他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一切前提确定无产阶级策略的基本任务的。先进阶级只有客观地考虑到某个社会中一切阶级相互关系的全部总和，因而也考虑到该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考虑到该社会和其他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据以制定正确的策略。这就是说，不应当把各个阶级和各个国家看作是静态的，而应当看作是动态的，即不应当看作是处于不动的状态，而应当看作是处于运动之中（运动的规律是从每个阶级的存在的经济条件中产生的）。而对运动，不仅要从现在的观点来看，而且要从将来的观点来看，并且不是象“进化论者”那样庸俗地理解，只看到缓慢的变化，而是要辩证地理解：“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等于一天，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写道^①。在每个发展阶段，在每一时刻，无产阶级的策略都要考虑到人类历史的这一客观必然的辩证法，一方面要利用政治消沉时代或龟行发展即所谓“和平”龟行发展的时代来发展先进阶级的意识、力量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把这种利用工作全部引向这个阶级的运动的“最终目的”，并使这个阶级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伟大日子到来时有能力实际完成各项伟大的任务。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的两个论点特别重要：一个是在《哲学的贫困》中论述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经济组织时提出的，另一个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无产阶级的政治任务时提

^① 见马克思 1863 年 4 月 9 日给恩格斯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338 页。——编者注

出的。前一个论点是：“大工业把大批互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的利益分裂。但是维护工资这一对付老板的共同利益，使他们在一个共同的反抗思想（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原来孤立的同盟就组成为集团，工人们为抵制经常联合的资本而维护自己的联盟，就比维护工资更为必要。……在这一斗争（真正的内战）中，未来战斗的一切要素在聚集和发展着。达到这一点，同盟就具有政治性质。”^① 这就是经济斗争和工会运动在以后几十年内，在准备无产阶级的力量去进行“未来战斗”的整个长时期内的纲领和策略。在这方面应当注意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有许多论述，他们用英国工人运动的实例说明，工业的“繁荣”怎样引起“收买无产阶级”^②、使无产阶级放弃斗争的尝试，这种繁荣怎样“起了败坏无产阶级的作用”^③；英国无产阶级怎样日益“资产阶级化”——“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英国），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④；英国无产阶级怎样日益丧失“革命精力”^⑤；怎样必须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等待“英国工人摆脱资产阶级对他们的明显的腐蚀”^⑥；英国工人运动怎样缺乏“老宪章派的热情”^⑦，英国工人领袖怎样在变成“在激进派资产者和工人之间”的中间类型

-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6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201页。——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25页。——编者注
④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4—345页。——编者注
⑤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34页。——编者注
⑥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38页。——编者注
⑦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99页。——编者注

的人^①；由于英国拥有垄断地位，而且只要这种垄断地位未被破坏，“不列颠工人也只能是这样”^②。与工人运动的整个进程（和结局）相联系的经济斗争的策略，在这里是以极其广阔的、全面的、辩证的、真正革命的观点来加以考察的。

关于政治斗争策略，《共产党宣言》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³⁵因此，马克思在1848年支持了波兰主张“土地革命”的政党，即“发动过1846年克拉科夫起义的政党”^③。马克思在1848—1849年支持了德国的极端革命民主派，而且以后也从没有收回他当时关于策略问题所说的话。马克思认为德国资产阶级“一开始就蓄意背叛人民（资产阶级当时只有同农民联合，才能完全实现它的任务），而与旧社会的戴皇冠的代表人物妥协”^④。下面就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代德国资产阶级的阶级状况所作的一个总结性的分析（这一分析是唯物主义从运动中并且不是只从运动的过去方面观察社会的榜样）：“……不相信自己，不相信人民，在上层面前嘟囔，在下层面前战栗……害怕世界大风暴……毫无毅力，到处剽窃；……没有首创精神……活象一个受诅咒的老头子，注定要糟蹋健壮人民的最初勃发的青春热情而使其服从于自己晚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376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6页。——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03页。——编者注

④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6页。——编者注

年的利益……”^①大约过了20年，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②中指出，1848年革命失败的原因是，资产阶级宁愿要用奴役换取的平静，而不愿看到哪怕只是争取自由的斗争的前景。当1848—1849年革命时代已经结束时，马克思便反对任何以革命为儿戏的做法了（反对沙佩尔和维利希），要求人们善于在似乎是“以和平方式”准备着新革命的新阶段进行工作。马克思当时要求人们以怎样的精神进行这项工作，这可以从他对德国在1856年这一最黑暗的反动年代的形势所作的估计中看出：“德国的全部问题将取决于是否有可能由某种再版的农民战争来支持无产阶级革命。”^③在德国的民主革命（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完成时，在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的策略方面，马克思一直是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发挥农民的民主力量上面。马克思当时所以认为拉萨尔“客观上是为普鲁士人的利益而背叛整个工人运动”^④，其原因之一就是拉萨尔纵容了地主和普鲁士民族主义。1865年，恩格斯在一封给马克思的信中就他们将在报刊上共同发表的意见同马克思交换看法时写道：“在一个农业占优势的国家里，代表工业无产阶级说话时只攻击资产阶级，而一字不提大封建贵族对农村无产阶级的宗法式的‘凭棍棒维持的剥削’，这是卑鄙的。”^⑤1864—1870

① 载于1848年《新莱茵报》，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27页。

——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69页。——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第108页。——编者注

④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8页。——编者注

⑤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8页。——编者注

年间，当德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期，即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剥削阶级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从上面完成这个革命而斗争的时期即将结束时，马克思不仅斥责过同俾斯麦³⁶勾搭的拉萨尔，而且纠正过陷入“亲奥主义”和拥护分立主义的李卜克内西³⁷；马克思当时要求实行革命策略：对俾斯麦和亲奥派同样地进行无情的斗争，不迁就“胜利者”普鲁士容克，而不顾普鲁士军事胜利所造成的状况立刻恢复反对容克的革命斗争^①。在国际 1870 年 9 月 9 日的那篇著名的宣言中，马克思曾事先提醒法国无产阶级不要举行不合时宜的起义^②；但当起义终于发生了的时候（1871 年），马克思却以欢欣鼓舞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在这种形势下，也同在许多其他形势的心情欢呼“冲天”的群众的革命首创精神^③。从马克思的辩下一样，革命行动的失败对无产阶级斗争的整个进程和结局的为害，要比放弃阵地、不战而降小，因为不战而降会使无产阶级士气沮丧，削弱无产阶级的战斗力。马克思十分重视在政治停滞和资产阶级所容许的合法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利用合法斗争手段，所以他在 1877—1878 年，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³⁸颁布以后，严厉地斥责了莫斯特³⁹的“革命空谈”，但他同样严厉甚至更为严厉地痛斥了当时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中一时占上风的机会主义，因为这个党没有立刻表现出坚

①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0 卷第 351、353、370、419 页和第 31 卷第 40、48、55、376、408、418 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285—294 页。——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3 卷第 207 页。——编者注

定性、坚决性、革命性和为对付非常法而转向不合法斗争的决心^①。

写于 1914 年 7—11 月
1915 年第一次载于《格
拉纳特百科全书》第 7
版第 28 卷
署名：弗·伊林

按手稿刊印并根据 1918
年版的小册子原文做过
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27—58 页

① 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4 卷第 54—55、64—65、89—90、101—102、105 页。——编者注

注 释

- 1 《卡尔·马克思》一文是列宁为格拉纳特兄弟百辞典出版社写的，1914年春列宁在加里西亚的波罗宁着手写，1914年11月在瑞伯尔尼脱稿在1918年出版的单行本序言中，列宁指出，他记得该文写于1913年。

该文于1915年刊载在辞典中，署名是：弗，伊林，并附有《马克思主义书目》。由于书报检查机关的关系，编辑部删掉了《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两节，并对原文做了某些修改。

1918年波涛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并附有列宁的序言，单行本按百科辞典刊印，但没有《马克思主义书目》。

手稿全文于1925年第一次发表在俄共(布)中央列宁研究院编的《论马克思恩格斯及马克思主义》文集中。

- 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48页。
- 3 见本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注6。
- 4 见本书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注1。
- 5 见本书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二部分。
- 6 见本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注3。
- 7 见本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注7。
- 8 见马克思1843年9月给卢格的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页)。
- 9 见本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注11。

- 10 见本书《共产党宣言》注 3。
- 11 指 1848 年法国二月革命。
- 12 指 1848 年奥地利和普鲁士三月革命。
- 13 见本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注 15。
- 14 1849 年 6 月 13 日法国小资产阶级政党山岳党在巴黎组织的游行示威。法国总统路易·波拿巴为了取得天主教会对他的支持，公然出兵协助罗马教皇镇压意大利革命。山岳党遂在立法议会弹劾总统和内阁违宪，因为 1848 年宪法禁止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别国人民的自由。弹劾案被立法议会内的秩序党多数否决。这次游行示威就是为此而举行的。秩序党内阁下令军队驱散了这次游行示威，并在这以后开始迫害民主主义者，其中包括外侨。
- 15 1913 年在斯图加特出版的德文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和卡尔·马克思通信集（1844—1883 年）》，共 4 卷。通信集收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书信 1500 封，是他们的理论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通信集还提供了这两位科学共产主义创始人的大量珍贵的生平资料和反映他们的组织活动和理论创作的丰富材料。列宁深入地研究了这部通信集，摘记了其中 300 封信的要点，摘抄了 15 封具有重要理论意义的信，并为一部分摘要编了名目索引。根据列宁笔记编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1844—1883 年）提要》，已收入《列宁全集》第 2 版，列为第 58 卷。
- 16 见本书马克思《格达纲领批判》注 25。
- 17 指《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6 卷第 5—14 页）。
- 18 马志尼，朱泽培（1805—1872）——意大利革命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之一，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的著名活动家，1849 年为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1850 年是伦敦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五十年代反对波拿巴法国于涉意大利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1864 年成立第一国际时企图置国际于自影响之下，1871 年反对巴黎公社和国际，阻碍意大利独立工人运动的发展。

19 见本书马克思《格达纲领批判》注 7。

20 见本书马克思《格达纲领批判》注 6。

21 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即国际工人协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 1872 年 9 月 2—7 日举行。出席大会的有 15 个全国性组织的 65 名代表。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激烈斗争的形势下召开的。代表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关于总委员会的权力和关于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这两个问题。大会通过了关于扩大总委员会的权力、关于总委员会会址迁往纽约、关于巴枯宁派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的活动等问题的决议。这些决议大部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的。代表大会就无产阶级的政治活动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无产阶级的伟大任务就是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应当组织政党，以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和达到消灭阶级的最终目的。大会从理论上、组织上揭露和清算了巴枯宁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破坏国际工人运动的种种活动，并把该派首领米·亚·巴枯宁和詹·吉约姆开除出国际。海牙代表大会的决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无政府主义者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胜利，为后来建立各国工人阶级独立的政党奠定了基础。

22 法国社会党是饶勒斯派于 1902 年建立的改良主义政党。1905 年，法国社会党和盖得派 1901 年建立的法兰西社会党合并，组成统一的社

会党。加入这个党的有各社会主义党派和团体的成员(盖得分子、布朗基分子、饶勒斯分子等)。统一的法国社会党的领导权为党内占多数的以饶勒斯为首的改良主义者所掌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它的议会党团投票赞成军事拨款,它的代表加入了资产阶级政府。在1920年12月25-30日的图尔代表大会上,法国社会党发生分裂,多数派组成法国共产党,以莱昂·勃鲁姆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少数派退出代表大会,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政党,仍用法国社会党这个旧名称。

- 23 见本书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注28。
- 24 见本书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注12。
- 25 见本书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四部分和第一部分。
- 26 见本书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二部分。
- 27 施泰因,罗仑兹(1815-1890)-只德国法学家,29 国家法专家,历史学家,庸俗经济学家,普鲁士政府的密探,《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的作者。
- 28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0页。
- 29 见本书《共产党宣言》第一、二部分。
- 30 见本书《共产党宣言》第一部分。
- 31 见本书《共产党宣言》第三部分。

- 32 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6页，这里恩格斯叙述了自己的和马克思的观点。
- 33 指十八世纪意大利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斐迪南多·加利阿尼。
- 34 《新时代》(《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杂志，1883年至1923年秋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以后改为周刊。杂志的编辑从1883年至1917年10月是卡·考茨基，从1917年10月至1923年秋是。库诺夫。1885-1894年恩格斯在杂志上发表了多篇文章，经常提出忠告来帮助杂志编辑部，并且不时地批评编辑部背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从九十年代后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之后，杂志开始系统地登载修正主义者的文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杂志采取中派立场，实际上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
- 35 见本书《共产党宣言》第四部分。
- 36 见本书马克思《格达纲领批判》注21。
- 37 见本书马克思《格达纲领批判》注4。
- 38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社会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恩格斯对这一法律的评论，见《俾斯麦和德国工人党》一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303-310页)。见原书66
- 39 约翰·莫斯特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后来成为无政府主义者。

列 宁

谈谈辩证法问题¹

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参看拉萨尔所著《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第三篇(《论认识》)开头所引用的斐洛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一段话^①,是辩证法的实质(是辩证法的“本质”之一,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之一,甚至可说是它的基本的特点或特征)。黑格尔也正是这样提问题的(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形而上学》中经常在这周围兜圈子,并跟赫拉克利特即跟赫拉克利特的思想作斗争)^②。

辩证法内容的这一方面的正确性必须由科学史来检验。对于辩证法的这一方面,通常(例如在普列汉诺夫)没有予以足够的注意:对立面的同一被当作实例的总和[“例如种子”;“例如原始共产主义”。恩格斯也这样做过。但这是“为了通俗化”……],而不是当作认识的规律(以及客观世界的规律)。

在数学中,正和负,微分和积分。

在力学中,作用和反作用。

① 见《列宁全集》第38卷第396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本卷第313页)。——编者注

在物理学中，阳电和阴电。

在化学中，原子的化合和分解。

在社会科学中，阶级斗争。

对立面的同一（它们的“统一”，也许这样说更正确些吧？虽然同一和统一这两个名词在这里并没有特别重大的差别。在一定的意义上两个名词都是正确的），就是承认（发现）自然界的（也包括精神的和社会的）一切现象和过程具有矛盾着的、相互排斥的、对立的倾向。要认识世界上一切过程的“自己运动”、自生的发展和蓬勃的生活，就要把这些过程当做对立面的统一来认识。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有两种基本的（或两种可能的？或两种在历史上常见的？）发展（进化）观点：认为发展是减少和增加，是重复，以及认为发展是对立面的统一（统一物之分为两个互相排斥的对立面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关联）。

根据第一种运动观点，自己运动，它的动力、泉源、动因都被忽视了（或者这个泉源被移到外部——移到神、主体等等那里去了）；根据第二种观点，主要的注意力正是放在认识“自己”运动的泉源上。

第一种观点是死板的、贫乏的、枯竭的。第二种观点是活生生的。只有第二种观点才提供理解一切现存事物的“自己运动”的钥匙，才提供理解“飞跃”“渐进过程的中断”、“向对立面的转化”、旧东西的消灭和新东西的产生的钥匙。

对立面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暂时的、易逝的、相对的。相互排斥的对立面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注意:顺便说一下,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首先分析资产阶级社会(商品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过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这一分析从这个最简单的现象中(从资产阶级社会的这个“细胞”中)揭示出现代社会的一切矛盾(或一切矛盾的胚芽)。往后的叙述向我们表明这些矛盾和这个社会的发展,在这个社会的各个部分总和中的、从这个社会的开始到终结的发展(既是生长又是运动)。

一般辩证法的叙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从最简单、最普通、最常见的等等东西开始;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伊万是人,茹奇卡是狗²等等。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参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施维格勒译,第2卷第40页第3篇第4章第8—9节:“因为当然不能设想:在个别的房屋之外还存在着一般的房屋”^①)。这就是说,

① 施维格勒的译文是:“denn natürlich kann man nicht der Meinung sein, daß es ein Haus gebe auBer den sichtbaren Hausern”. 原文是: ον γὰρ ἂν εἰρήμειν εἶναι τικ αον παρὰ τὰ εἰνὸς οἰκίε ——编者注

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只是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如此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如此等等。在这里已经有自然界的必然性、客观联系等等的因素、萌芽、概念了。这里已经有偶然和必然、现象和本质，因为当我们说伊万是人，哈巴狗是狗，这是树叶等等时，我们就把许多特征作为偶然的东**西**抛掉，把本质和现象分开，并把二者对立起来。

可见，在任何一个命题中，好象在一个“单位”（“细胞”）中一样，都可以（而且应当）发现辩证法一切要素的萌芽，这就表明辩证法是人类的全部认识所固有的。而自然科学则向我们揭明（这又是要用任何极简单的实例来揭明）客观自然界也具有同样的性质，揭明个别向一般的转变，偶然向必然的转变，对立面的转化、转换、相互联系。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正是问题的这一“方面”（这不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是问题的本质）普列汉诺夫没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

* * *

不论是黑格尔（见《逻辑学》），不论是自然科学中现代的“认识论者”折衷主义者、黑格尔主义的敌人（他不懂黑格尔主义！）保尔·福尔克曼（参看他的 *Erkenntnistheoretische*

Grundzige^①, S.)都把认识³看做一串圆圈。

哲学上的“圆圈”:[是否一定要以人物的年代先后
为顺序呢?不!]

古代:从德漠克利特到柏拉图以及赫拉克利特的辩证法。

文艺复兴时代:笛卡儿对伽桑狄(斯宾诺莎?)。

近代:霍尔巴赫——黑格尔(经过贝克莱、休谟、康德)。

黑格尔——费尔巴哈——马克思。

辩证法是活生生的、多方面的(方面的数目永远增加着的)认识,其中包含着无数的各式各样观察现实、接近现实的成分(包含着从每个成分发展成的整个哲学体系),——这就是它比起“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来所具有的无比丰富的内容,而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缺陷就是不能把辩证法应用于反映论,应用于认识的过程和发展。

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überschwengliches(狄慈根)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唯心

① 福尔克曼《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原理》(Erkenntnistheoretische Grundzüge der Naturwissenschaften)1910年莱比锡—柏林版第35页。见1911年圣彼得堡版第40页。——编者注

主义就是僧侣主义。这是对的。但（“更确切些”和“除此而外”）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

注意
这个
警句

人的认识不是直线（也就是说，不是沿着直线进行的），而是无限地近似于一串圆圈、近似于螺旋的曲线。这一曲线的任何一个片断、碎片、小段都能被变成（被片面地变成）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条直线能把人们（如果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话）引到泥坑里去，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而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写于 1915 年

按手稿刊印

1925 年第一次载于《布尔什维克》

选自《列宁全集》第 38 卷

杂志第 5—6 期合刊

第 403—412 页

注 释

- 1 《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写在《哲学》笔记本中，在《拉萨尔〈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一书摘要》之间：由于其中有引自《形而上学》的引文，所以有理由认为它是在列宁读过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著作以后写的。因此，《谈谈辩证法问题》是1914—1915年列宁研究哲学问题的独特总结。列宁在这篇文章中分析了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的辩证规律，形而上学的和辩证的发展观；分析了绝对和相对，抽象和具体，一般、特殊和个别，逻辑和历史等等范畴；揭示了认识过程的辩证性质；指出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和阶级根源。
- 2 伊万是俄国最常见的人名。茹奇卡是俄语中看家狗的常用名字。
- 3 此处见保·福尔克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原理及其与当代精神生活的联系》一书第2版第35页。列宁关于该书的札记，见本卷第343—344页。列宁在作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摘要时，也指出了类似的地方（见本卷第207页和第219—220页）。

列 宁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¹

通俗的论述（节录）

序 言

现在献给读者的这本小册子，是 1916 年春天我在苏黎世写成的。在那里的条件下，我当然深感法文和英文参考书的缺乏，尤其是俄文参考书的缺乏。但是，论帝国主义的一本主要英文著作，即约·阿·霍布森的那本著作，我还是利用了，并且我认为已经给了它应有的注意。

我写这本小册子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的。因此，我不但要极严格地限制自己只作纯理论性的、特别是经济上的分析，而且我在表述关于政治方面的几点必要的意见时，也不得不极其谨慎，不得不用暗示的方法，用沙皇政府迫使一切革命者提笔写“合法”作品时不得不用的那种伊索寓言式的一一可恶的伊索寓言式的一一语言。

在目前这种自由的日子里，再读到小册子里那些因顾虑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而说得走了样的、吞吞吐吐的、好象被铁钳子钳住了似的的地方，真是感到十分难受。关于帝国主义

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关于社会沙文主义（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是彻底地背叛社会主义、完全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关于工人运动的这种分裂是同帝国主义的客观条件相联系的等等，当我谈到这些问题的时候，都不得不用一种“奴隶的”语言，现在只好请关心这类问题的读者去看我那部即将再版的 1914-1917 年的国外论文集。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第 119-120 页^①上的一段文字：为了用书报检查通得过的形式向读者说明，资本家以及转到资本家方面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考茨基同他们进行的斗争是很不彻底的）怎样无耻地在兼并问题上撒谎，怎样无耻地掩饰本国资本家的兼并政策，我不得不拿……日本做例子！细心的读者不难用俄国来代替日本，用芬兰、波兰、库尔兰、乌克兰、希瓦、布哈拉、爱斯兰和其他非大俄罗斯人居住的地区来代替朝鲜。

我希望我这本小册子，能够帮助读者去理解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这个基本的经济问题。不研究这个问题，就根本不会懂得如何去估计现在的战争和现在的政治。

作 者

1917 年 4 月 26 日彼得格勒

① 见《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839-840 页。——编者注

法文版和德文版序言²

(一)

我在俄文版序言里说过，本书在 1916 年写的时候，是考虑到沙皇政府的书报检查的。现在我不可能把全文改写一遍，而且改写也许是不适当的，因为本书的主要任务，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是根据各国不容争辩的资产阶级统计的综合材料和资产阶级学者的自白，来说明二十世纪初期，即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大战前夜，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国际相互关系上的总的情况。

不改写对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共产党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无益处：他们看了这本被沙皇政府书报检查机关认为合法的书，就会相信，象在现今的美国或在法国虽然不久以前几乎全体共产党人都被逮捕，但他们还是可能并且必须利用共产党人还有的那一点点合法机会，来揭露社会和平主义观点和“世界民主”幻想的全部虚伪性。至于对本经过检查的书的一些最必要的补充，我将在这篇序言中写出来。

(二)

本书已经证明，1914—1918 年的战争，从双方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即侵略的、掠夺的、强盗的）战争，都是为了瓜分世界，为了分割和重新分割殖民地、金融资本的“势力范围”等等而进行的战争。

要知道，能够证明战争的真实社会性质，确切些说，证明战争的真实阶级性质的，自然不是战争的外交史，而是对各交战国统治阶级的客观情况的分析。为了说明这种客观情况，不应当引用一些例子和个别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而一定要引用关于各交战国和全世界的经济生活基础的材料之总和。

我在说明 1876 年和 1914 年世界分割的情形（第六章）以及说明 1890 年和 1913 年世界铁路分割的情形（第七章）时所引用的，正是这样一种驳不倒的综合材料。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的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总结，是世界贸易和资产阶级民主文明发展的总结和最显著的标志。本书前几章说明了铁路是怎样同大生产，同垄断组织，同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银行，同金融寡头联系在一起。铁路网的分布，这种分布的不平衡，铁路网发展的不平衡，就是全世界现代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的总结。这种总结表明，在生产资料私有制还存在的这种经济基础上，帝国主义战争是绝对不可避免的。

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在那些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资产阶级教授看来，在小资产阶级庸人看来，建筑铁路就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象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十亿人民（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

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

以小业主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自由竞争，民主，——所有这些被资本家及其报刊用来欺骗工农的口号，都早已成为过去的东西。资本主义已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扼制的世界体系。瓜分这种“赃物”的是两三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全身武装的强盗（美、英、日），他们把全世界卷入他们为瓜分自己的赃物而进行的战争。

（三）

君主制的德国强迫签订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以及美、法“民主”共和国和“自由的”英国强迫签订的更残暴得多、卑鄙得多的凡尔赛和约³，给人类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它们把帝国主义雇用的文丐，把那些虽然自称为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但是歌颂“威尔逊主义”硬说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可能达到和平和改良的反动市侩，完全揭穿了。

英德两个金融强盗集团争夺赃物的战争留下的几千万尸体和残废者，以及后来的这两个“和约”，空前迅速地唤醒了千百万受资产阶级压抑、踩、欺骗、愚弄的民众。于是，在战争造成的全世界的经济破坏的基础上，世界革命危机日益成熟，这个危机不管会经过多么长久而艰苦的周折，其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爆发并且获得胜利。

第二国际的巴塞尔宣言⁴，在1912年所估计的战争，正是1914年爆发的战争，而不是一般战争（有各种各样的战争，也有革命的战争），——这个宣言已经成了揭露第二国际英雄们的全部可耻的破产和一切叛变行为的纪念碑。

因此，我现在把这篇宣言转载在本版的附录里，并且再三请读者注意：宣言里有许多地方，确切、明白、直接地谈到即将到来的这次战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的联系，第二国际的英雄们总是想方设法地避开这些地方，就象小偷避开他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

(四)

本书特别注意批判“考茨基⁵主义”这一国际上的思潮，在世界各国代表这一思潮的是第二国际的“最著名的理论家和领袖(在奥地利是奥托·鲍威尔之流，在英国是拉姆赛·麦克唐纳等人，在法国是阿尔伯·托马等等，等等)，以及一大批社会党人、改良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资产阶级民主派和教士。

这个思潮，一方面是第二国际解体、腐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整个生活环境而被资产阶级偏见和民主偏见所俘虏的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的必然产物。

考茨基及其同伙的这种观点，正好完全背弃了这位作家几十年来，特别是在他和社会党人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⁶、米勒兰、海德门、龚帕斯等等)作斗争时所捍卫的那些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因此，现在“考茨基主义者”在全世界都同极端的机会主义者，(通过第二国际即黄色国际)和资产阶级政府(通过有社会党人参加的资产阶级联合政府)在政治实践上联合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

在全世界日益发展的一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特别是共产主义运动，决不能不分析和揭露“考茨基主义”的理论错误。必须这样做，尤其是因为和平主义和一般“民主主义”在

世界上还十分流行，这些思潮虽然丝毫不想冒充马克思主义，但是完全同考茨基之流一样，也在掩饰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所以，无产阶级的政党必须同这些思潮作斗争，把受资产阶级愚弄的小业主和程度不同地处在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下的千百万劳动者，从资产阶级那里争夺过来。

（五）

关于第八章《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有必要说几句话。在本书正文中已经指出：过去是“马克思主义者”、而现在是考茨基的战友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政策主要代表人之—的希法亭，在这个问题上，比公开的和平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英国人霍布森还后退了一步。现在，整个工人运动的国际性的分裂已经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这两派之间的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事实也同样暴露出来了：在俄国，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⁸支持高尔察克和邓尼金，反对布尔什维克，在德国，谢德曼和诺斯克之流同资产阶级一起反对斯巴达克派⁹；在芬兰、波兰以及匈牙利等国也是如此。这个有世界历史意义的现象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而这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所特有的。正如本书所证明的，资本主义现在已经划分出极少数特别富强的国家（其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十分之一，即使按最“慷慨”和最夸大的计算，也不到五分之一），它们专靠“剪息票”来掠夺全世界。根据战前的价格和战前资产阶级的统计，资本输出的收入每年有八

十至一百亿法郎。现在当然更多得多了。

很明显，从这样巨量的**超额利润**（因为这种利润超出了资本家从“自己”国家的工人身上取的利润）中，可以拿出一部分来**收买**工人领袖和工人贵族这个上层。而各“先进”国家的资本家也正是在收买他们，用千百种方法，用直接的和间接的、公开的和隐蔽的方法在收买他们。

这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工人阶层即“工人贵族”阶层，这个按生活方式、工资数额和整个世界观说来已经完全市侩化了的工人阶层，是第二国际的主要支柱，现在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支柱**（不是军事支柱）。因为这是**资产阶级在工人运动中的真正代理人**，是资本家阶级的工人帮办（labor li-Eutenants of the capitalist class），是改良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真正传播者。在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中，他们有不少人必然会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站在“凡尔赛派”方面来反对“巴黎公社活动家”。

如果不懂得这个现象的经济根源，如果不估计到这个现象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那末，在解决共产主义运动和即将到来的社会革命的实践任务方面，就会一步也不能前进。

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从 1917 年起，已经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证实。

尼·列宁

1920 年 7 月 6 日

七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阶段

现在我们应当作出一定的总结，把以上关于帝国主义所谈的话归纳起来。帝国主义是作为一般资本主义基本特性的发展和直接继续而成长起来的。但是，资本主义只有发展到二定的、很高的阶段，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这时候，资本主义的某些基本特性开始变成自己的对立面，从资本主义到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那个过渡时期的特点，已经全面形成和暴露出来了。在经济方面，这一过程中的基本现象，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自由竞争是资本主义和一般商品生产的基本特性；垄断是自由竞争的直接对立面，但是我们看到，自由竞争开始变成垄断，造成大生产，排挤小生产，又用最大的生产来代替大生产，使生产和资本的集中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以致产生了并且还在产生着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等垄断组织，以及同这些垄断组织溶合起来的十来家支配着几十亿资金的银行的资本。同时，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并不消除竞争，而是凌驾于竞争之上，与之并存，因而产生许多特别尖锐特别剧烈的矛盾、摩擦和冲突。垄断是从资本主义向更高级的制度的过渡。

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那就应当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样的定义包括了最

主要的内容，因为一方面，金融资本是与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溶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另一方面，世界的分割，就是由无阻碍地向未被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强国占据的地区扩张的殖民政策，过渡到垄断地占有已经瓜分完了的世界领土的殖民政策。

过于简短的定义虽然很方便，因为它概括了主要的内容，但是要从定义中特别引伸出应该规定的那个现象的极重要的特点，那毕竟是不够的。因此，一方面不要忘记，所有的定义都只有有条件的、相对的意义，永远也不能包括充分发展的现象的各方面联系，同时也应该给帝国主义下这样一个定义，其中要包括帝国主义的如下五个基本特征：(1)生产和资本的集中发展到这样高的程度，以致造成了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垄断组织；(2)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溶合起来，在这个“金融资本”的基础上形成了金融寡头；(3)与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4)瓜分世界的资本家国际垄断同盟已经形成；(5)最大资本主义列强已把世界上的领土分割完毕。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

下面我们还会看到，如果不仅注意到基本的、纯粹经济的概念（上述定义就只包括这些概念），而且注意到现阶段的资本主义在一般资本主义中所占的历史地位，或者注意到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两个主要派别的关系，那就可以而且应当给帝国主义另外下一个定义。现在必须指出，帝国主义，

按上述意义来了解,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为了使读者对于帝国主义有一个尽量确切的概念,我们故意尽量多地引用了一些不得不承认最新资本主义经济中万分确凿的事实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发表的意见。为了同一目的,我们又引用了一些详细的统计材料,来说明银行资本等究竟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量转化为质,发达的资本主义转化为帝国主义,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不用说,自然界和社会里的一切界限当然都是有条件的、变动的,如果去争论帝国主义究竟在哪一年或哪一个十年“最终”确立,那是荒唐的。

但是,在帝国主义的定义问题上必须进行争论,首先是同所谓第二国际时代,即1889-1914年这二十五年间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卡·考茨基进行争论。在1915年,甚至早在1914年11月,考茨基就十分坚决地反对我们给帝国主义下的那个定义中的基本思想,他说不应当把帝国主义了解为一个经济“阶段”,而应当了解为一种政策,即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一种政策;不应当把帝国主义和“现代资本主义”“看做一个东西”,如果把帝国主义了解为“现代资本主义的一切现象”(卡特尔、保护关税政策、金融家的统治、殖民政策),那末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所必需的这个问题就成了“最平板无味的同义反复”,因为这样一来,“帝国主义就自然是资本主义的迫切需要”等等。为了最确切地表述考茨基的思想,我们引用他给帝国主义所下的定义,这个定义是直接反对我们所阐述的那些思想的实质的(因为考茨基早已知道多年来贯彻这些思想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阵营中所提出的反驳,正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派别所提出的反驳)。

考茨基的定义说：

“帝国主义是高度发展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产物。帝国主义就是每个工业资本主义民族力图吞并或征服愈来愈多的农业（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区域，而不管那里居住的是什么民族。”^①

这个定义是根本要不得的，因为它片面地，也就是任意地单单强调了一个民族问题（虽然这个问题就其本身以及它对帝国主义的关系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任意地和错误地把这个问题单单同兼并其他民族的那些国家的工业资本联系起来，又同样任意地和错误地提出了对农业区域的兼并。

帝国主义就是力图兼并，——考茨基的定义的政治方面归结起来就是这样。这是对的，但是极不充分，因为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总是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的。不过在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考茨基本人纳入他的定义中的经济方面。考茨基定义的错误是十分明显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是工业资本而是金融资本。在法国，恰好是金融资本特别迅速的发展（在工业资本削弱的情况下），从上一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使兼并政策（殖民政策）特别加紧地推行起来，这并不是偶然的。帝国主义的特点恰好不只是力图兼并农业区域，甚至还力图兼并工业极发达的区域（德国对比利时的野心，法国对洛林的野心，因为第一、世界已经分割完了，在重新分割的时候，就不得不把手伸向任何一块土地；第

① 《新时代》杂志 1914 年（第 32 年卷）第 2 分卷（1914 年 9 月 11 日出版）第 909 页；参看同一杂志 1915 年第 2 分卷第 17 页及往下各页。

二，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其目的不完全是直接为了自己，主要还是为了削弱敌方，摧毁敌方的霸权（对德国来说，比利时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反英据点；对英国来说，巴格达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反德据点，等等）。

考茨基特别引用、并且屡次引用英国人的言论，认为英国人所确定的帝国主义这个名词的纯粹政治上的意义，是同他考茨基的意思相同的。我们现在举出英国人霍布森来，看看他在 1902 年出版的《帝国主义》一书中是怎样写的：

“新帝国主义和老帝国主义不同的地方在于：第一、一个日益强盛的帝国的野心，已经为几个互相竞争的帝国的理论和实践所代替，其中每个帝国都同样渴望扩大政治势力和获得商业利益；第二、金融利益或投资利益统治着商业利益。”^①

我们看到，考茨基说他引用一般英国人的言论，实际上是绝对错误的（除非他引用的是那些庸俗的英国帝国主义者或帝国主义公开辩护士的言论）。我们看到，考茨基自以为在继续维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比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还退后了一步，因为霍布森还比较正确地估计到现代帝国主义的两个“具体历史”（考茨基的定义恰好是对具体历史的弄！）特点：（1）几个帝国主义的竞争；（2）金融家控制着商人。如果主要是说工业国兼并农业国，那就把商人抬上首要地位了。

考茨基的定义不仅是错误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而且还

^① 霍布森《帝国主义》1902 年伦敦版第 324 页。

成了全面背离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实践的那一整套观点的基础；这一点以后还要讲到。考茨基挑起的那种字面上的争论，即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应该叫作帝国主义还是叫作金融资本的阶段，是毫无意义的争论。随便你怎样叫都是一样。关键在于考茨基把帝国主义的政策同它的经济割裂开了，把兼并解释为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政策，并且拿同一金融资本基础上的另一种似乎可能有的资产阶级政策和它对立。照这样说来，经济上的垄断是可以同政治上的非垄断、非暴力、非掠夺的行动方式相容的。照这样说来，世界领土的分割（这种分割恰巧在金融资本时代进行完毕并成了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现在互相竞争的特殊形式的基础）也是可以同非帝国主义的政策相容的。这样一来，就不是暴露资本主义最新阶段最根本的矛盾的深刻性，而是掩饰、缓和这些矛盾；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

考茨基同德国的一个帝国主义和兼并政策的辩护士库诺夫争论过。库诺夫又笨拙又无耻地推论说：帝国主义是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所以帝国主义也是进步的，所以必须跪在帝国主义面前歌功颂德！这种话就象民粹派在 1894 — 1895 年挪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所说的那些话，说什么如果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的，那末他们就应该开起酒店来培植资本主义。考茨基反驳库诺夫说：不对，帝国主义并不是现代资本主义，而只是现代资本主义政策的形式之一，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同这种政策作斗争，同帝国主义，同兼并等等作斗争。

这种反驳好象很有道理，实际上却等于更巧妙更隐蔽地（因此是更危险地）宣传同帝国主义调和，因为同托拉斯和银行的政策“作斗争”而不触动托拉斯和银行的经济基础，那就不过是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与和平主义，不过是一种善良而天真的愿望而已。不是暴露极深刻的矛盾，而是回避现有的矛盾，忘掉其中最重要的矛盾，——这就是考茨基的理论，它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显然，这种“理论”只能用来替那种主张同库诺夫保持统一的思想进行辩护！

考茨基写道：“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资本主义不是不可能再经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把卡特尔政策应用到对外政策上的超帝国主义的阶段”^①，全世界各帝国主义彼此联合而不是互相斗争的阶段，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停止战争的阶段，“由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的阶段^②。

关于这个“超帝国主义论”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以便详细地说明这个理论背离马克思主义究竟到了怎样彻底而无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我们要按照本书的总的计划来看一看有关这个问题的确切的经济材料。“从纯粹经济的观点看来”，这个“超帝国主义”究竟是可能实现的呢，还是超等废话？

如果把纯粹经济的观点看作“纯粹的”抽象概念，那末唯一可能得出的结论是：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垄断组织，因而也就是走向一个全世界的垄断组织，走向一个全世界的托拉

① 《新时代》杂志 1914 年(第 32 年卷)第 2 分卷(1914 年 9 月 11 日出版)第 921 页；参看同一杂志 1915 年第 2 分第 107 页及往下各页。

② 《新时代》杂志 1915 年第 2 分卷(1915 年 4 月 30 日出版)第 144 页。

斯。这是不容争辩的，不过也是毫无内容的，就好象说：“发展的趋势”是走向在实验室里生产食物。在这一点上说来，超帝国主义“论”和“超农业论”同样都是胡说。

如果谈金融资本时代的“纯粹经济”条件，是指二十世纪初的具体历史时代，那末对于“超帝国主义”这种僵死的抽象概念（这种概念只有一个最反动的目的，就是使人不去注意现有矛盾的深刻性的最好回答，就是拿现代世界经济的具体经济现实同它加以对比。考茨基关于超帝国主义的毫无内容的议论还鼓舞了那种十分错误的、助长帝国主义辩护士声势的思想，似乎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削弱世界经济内部的不平衡和矛盾，其实金融资本的统治是在加剧这种不平衡和矛盾。

理·卡尔韦尔在他写的《世界经济入门》^①这本小册子里，曾经把可以具体说明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世界经济内部相互关系的最重要的纯粹经济的材料作了综合。他把整个世界分为五个“主要经济区域”：（1）中欧区（俄国和英国以外的整个欧洲）；（2）不列颠区；（3）俄国区；（4）东亚区；（5）美洲区。同时他把殖民地列入所属国的“区域”内，而把少数没有按上述区域划分的国家，例如亚洲的波斯、阿富汗和阿拉伯，非洲的摩洛哥和阿比西尼亚等等，“搁在一边”。

现在把他所列出的这些区域的经济材料摘录如下：

① 理·卡尔韦尔《世界经济入门》（R. Caiwer: 《Einführung in die Weltwirtschaft》）1906年柏林版。

世界主要 经济区域	面 积	人 口	交 通 运 输 业		贸 易	工 业		
			铁 路	商 船	(进 出 口 共 计)	产 量	棉 纺 织 业 纱 锭 数 目	
	(单位百 万平方公 里)	(单位 百万)	(单位千 公里)	(单位百 万吨)	(单位十 亿马克)	(单位百万 吨)	煤 炭	生 铁
(1) 中欧区	27.6 (23.6)①	388 (146)	204	8	41	251	15	26
(2) 不列 颠区	28.9 (28.6)②	398 (355)	140	11	25	249	9	51
(3) 俄国区	22	131	63	1	3	16	3	7
(4) 东亚区	12	389	8	1	2	8	0.22	2
(5) 美洲区	30	148	379	6	14	245	14	19

我们看到有三个区域是资本主义高度发达(交通运输业、贸易和工业都十分发达)的区域,即中欧区、不列颠区和美洲区。其中德、英、美三国是统治着世界的国家。它们相互间的帝国主义竞争和斗争是非常尖锐的,因为德国的地区很小,殖民地又少,而“中欧区”的形成还有待于将来,现时它正在殊死的斗争中逐渐产生。目前整个欧洲的特征是政治上四分五裂。相反,在不列颠区和美洲区,政治上却高度集中,但是它们又有极大的差别:前者有广大的殖民地,后者的殖民地却十分少。在殖民地,资本主义刚刚开始发展。争夺南美的斗争愈来愈尖锐。

有两个区域是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区域,即俄国区和东亚区。前者人口密度极小,后者极大;前者政治上很集中,后者不集中。瓜分中国才刚刚开始,日美等国争夺中国的斗争

①② 括弧里是殖民地的面积和人口。

愈来愈激烈。

请把考茨基关于“和平的”超帝国主义那种愚蠢可笑的胡说，拿来同经济政治条件极不相同、各国发展速度等等极不一致、各帝国主义国家间存在着疯狂斗争的实际情形比较一下吧。难道这不是吓坏了的市侩想逃避可怕的现实的反动企图吗？难道被考茨基当做“超帝国主义”的胚胎的国际卡特尔（正象“可以”把实验室里的药片生产说成是超农业的胚胎一样），不就是向我们表明分割世界和**重新分割世界**、由和平分割转为非和平分割、再由非和平分割转为和平分割的一个例子吗？难道从前同德国一起（例如在国际钢轨辛迪加或国际商轮航运业托拉斯里）和平地分割过整个世界的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金融资本，现在不是在改变着的（通过完全非和平方式改变着的）新的实力对比的基础上，**重新分割世界**吗？

金融资本和托拉斯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世界经济各个部分在发展速度上的差异。既然实力对比发生了变化，那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除了用**实力**来解决矛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在铁路的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说明整个世界经济中资本主义和金融资本发展速度不同的非常准确的材料^①。在帝国主义发展的最近几十年中，铁路长度变更的情形如下：

① 1915年《德意志帝国统计年鉴》（《Stat. Jahrbuch für das deutsche Reich》）；1892年《铁路业文汇》（《Archiv für Eisenbahn-wesen》）；关于1890年各国殖民地间铁路分布方面的某些详细情形只能作一个大致的估计。

铁路长度(单位千公里)			
	1890年	1913年	增加数
欧洲·····	224	346	+122
美国·····	268	411	+143
所有殖民地·····	82	210	+128
亚美两洲的独立国 和半独立国·····	43	137	+94
	125	347	+222
<hr/>			
共 计·····	617	1104	

可见，铁路发展得最快的是亚洲和美洲的殖民地和独立国（以及半独立国）。大家知道，这里是由四五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统治着一切，支配着一切。在亚洲和美洲殖民地及其他国家建筑二十万公里的新铁路，就等于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在收入有特别的保证、铸钢厂可以获得厚利定货等等的条件下，新投入四百多亿马克的资本。

资本主义在殖民地和海外国家发展得最快。在这些国家中出现了**新起的帝国主义强国**（如日本）。全世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尖锐起来了。金融资本从特别盈利的殖民地企业和海外企业得到的贡款日益增加。在瓜分这种“赃物”的时候，有极大一部分落到了那些在生产力发展的速度上并不是常常占第一位的国家手里。各大强国及其殖民地的铁路总长度如下：

(单位千公里)			
	1890年	1913年	增加数
美国·····	268	413	+145
不列颠帝国·····	107	208	+101
俄国·····	32	78	+46
德国·····	43	68	+25
法国·····	41	63	+22
<hr/>			
五个强国共计·····	491	830	+339

可见，将近百分之八十的铁路集中在五个最大的强国手中。但是这些铁路的所有权的集中程度，金融资本的集中程度，要大得不可比拟，因为有这样的情形，例如美、俄及其他国家铁路的大量股票和债券都属于英法两国的百万富翁。英国靠自己的殖民地，把“自己的”铁路网增加了十万公里，比德国增加的多三倍。但是，谁都知道，这一时期德国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煤炭和钢铁生产的发展，比英国快得无比，更不必说比法国和俄国了。1892年，德国的生铁产量为四百九十万吨，英国为六百八十万吨，但是到1912年，已经是一千七百六十万吨比九百万吨，也就是说，德国远远地超过英国了^①！试问，在资本主义基础上，要消除生产力发展和资本积累同金融资本对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分割这两者之间不相适应的状况，除了用战争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办法呢？

八 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

现在我们还要来研究一下帝国主义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大多数关于帝国主义的言论，对这个方面多半都是估计不足的。马克思主义者希法亭的缺点之一，就是他在这一

① 再参看埃德加·克勒芒德《不列颠帝国同德意志帝的经济关系》(Edgar Crammond. 《The Economic Relations of the British and German Empires》), 该文载于《皇家统计学会杂志》1914年7月, 第777页及往下各页。

点上比非马克思主义者霍布森还倒退了一步。我们说的就是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寄生性。

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这是资本主义的垄断,也就是说,这种垄断是从资本主义成长起来并且处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竞争的一般环境里,同时又经常同这种一般环境发生无法解决的矛盾。但是,这种垄断也同任何垄断一样,必然要引起停滞和腐朽的趋向。既然规定了(虽然是暂时地)垄断价格,那末技术进步、因而也是其他一切进步的动因,前进的动因,也就在相当程度上消失了,其次在经济上也就有可能人为地阻碍技术进步。例如美国有个欧文斯,发明了一种能引起制瓶业革命的制瓶机。德国制瓶工厂主的卡特尔收买了欧文斯的发明专利权,可是却把这个发明搁起来迟迟不用。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垄断决不能全面地、长久地排除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这也是超帝国主义论荒谬的原因之一)。当然,用改良技术的办法可能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利润,这种可能性是促进着各种变更的。但是垄断所特有的停滞和腐朽的**趋势**还继续在发生作用,而且在一定的时期还会在个别工业部门、个别国家占上风。

垄断地占有特别广大、特别富饶或地理位置方便的殖民地的事实,也在发生同样的作用。义

其次,帝国主义就是货币资本大量积聚于少数国家;我们看到,这种资本是数目达到一千亿至一千五百亿法郎的有价证券。于是,以“剪息票”为生、根本不做任何事情、终日游手好闲的食利者阶级,确切些说,食利者阶层,就大大地增长起来。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之一——资本输出,

更加使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国家打上了寄生的烙印。

霍布森写道：“在 1893 年，不列颠在国外的投资，约占联合王国财富总数的百分之十五。”^① 我们要指出，到 1915 年，这种资本大约又增加了一倍半。霍布森又说：“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对于纳税人来说是沉重的负担，对于工商业者来说意义很小……然而对于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家（在英语里，这个概念是用《investor》一词来表示的，意即“投资者”，食利者），却是大量利润的来源。”“据统计学家吉芬计算，1899 年大不列颠从全部对外贸易和殖民地贸易（包括输入和输出）所得到的全部年收入是一千八百万英镑（约合一亿七千万卢布），这是按贸易总额八亿英镑的百分之二点五计算出来的。”不管这个数目多么大，它仍然不能说明侵略性的大不列颠帝国主义。能够说明的是九千万至一亿英镑的“投”资的收入，也就是食利者阶层的收入。

在世界上“商业”最发达的国家，食利者的收入竟比对外贸易的收入高四倍！这就是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寄生性的实质。

因此，“食利国”（Rentnerstaat）或高利贷国这一概念，就成了论述帝国主义的经济著作中通用的概念。世界分为极少数高利贷国和极大多数债务国。舒尔采-格弗尼茨写道：“在国外投资中占第一位的，是对政治上依赖的国家或结盟国家的投资：英国贷款给埃及、日本、中国和南美。在必要时，英国的海军就充当法警。英国的政治力量保护着英国，

① 霍布森所著前书第 59 页和第 60 页。

防止债务人造反。”^①萨尔托里乌斯·冯·瓦耳特斯豪森在他所著的《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一书中，把荷兰当做“食利国”的标本，并且说现在的英国和法国也成了这样的国家^②。施尔德尔认为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和瑞士这五个工业国家，是“名副其实的债权国”。他没有把荷兰算进去，只是因为荷兰“工业不大发达”^③。而美国仅仅是美洲的债权人。

舒尔采-格弗尼茨写道：“英国逐渐由工业国变成债权国。虽然工业生产和工业品出口有了绝对的增加，但是，利息、股息和发行证券、担任中介、进行投机等方面的收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意义愈来愈大了。依我看来，这个事实正是帝国主义高涨的经济基础。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关系，要比卖主和买主之间的关系更巩固些。”^④关于德国的情形，柏林的《银行》杂志出版人阿·兰斯堡1911年在他的《德国是食利国》一文中写了如下一段话：“德国人喜欢讥笑法国显露出来的那种变为食利者的倾向。但是他们忘记了，既然说到资产阶级，那末德国的情形同法国是愈来愈相象了。”^⑤

食利国是寄生的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到这种国家的一切社会政治条件，尤其是影响到工人运

① 舒尔采-格弗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第320等页。

② 萨·冯·瓦耳特斯豪森《国外投资的国民经济制度》1907年柏林版第4册。

③ 施尔德尔所著前书第393页。

④ 舒尔采-格弗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第122页。

⑤ 《银行》杂志1911年第1期第10-11页。

动中的两个基本派别。为了尽量把这一点说清楚，我们且引用霍布森的话。他是一个最“可靠的”证人，因为谁也不会疑心他偏袒“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思想”，同时他又是个英国人，很了解这个殖民地最广大、金融资本最雄厚、帝国主义经验最丰富的国家的情况。

霍布森在英布战争记忆犹新的时候，描述了帝国主义同“金融家”利益的联系，以及“金融家”从承包业务和供应商品等获得的利润增加的情形，他说：“指挥这一明显的寄生性政策的是资本家；但是同一动机也影响到了工人中间的特殊阶层。在很多城市中，最重要的工业部门都要依靠政府的定货，冶金工业和造船工业中心的帝国主义，在不小的程度上依赖于这种情况。”这位作者认为，有两种情况削弱了老牌帝国的力量：（1）“经济寄生性”；（2）用附属国的人民编成军队。“第一种情况是经济寄生习气，这种习气使得统治国利用占领地、殖民地和附属国来达到本国统治阶级发财致富的目的，来收买本国下层阶级，使他们安分守己。”我们要补充一句：为了在经济上有可能进行这样的收买，不管收买的形式如何，都必须有垄断高额利润。

人关于第二种情况，霍布森写道：“帝国主义盲目症的最奇怪的症候之一，就是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走上这条道路时所抱的那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在这方面最严重的是英国。我们征服印度帝国的大部分战役都是我们用土著人编成的军队进行的；在印度和近来在埃及的大量常备军都是由英国人担任指挥的；我们征服非洲的各次战争，除了征服南非的以外，几乎都是由土著人替我们进行的。”

分割中国的前景，使霍布森作出了这样一种经济上的估计：“到那时，西欧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和性质，都会象现在有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如英国南部、里符耶腊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游人最盛、富人最多的地方一样，产生出极少数从远东取得股息和年金的富豪贵族，连同一批人数稍多的职员和商人，为数更多的家仆以及在运输业和成品精制工业中工作的工人。主要的工业部门就会消失，而大批的食品和半成品会象贡品那样由亚非两洲源源而来。”“西方国家更广泛的同盟，即欧洲大国联邦所能开辟的前途就是，这个联邦不仅不会推进全世界的文明事业，反而有造成西方寄生性的巨大危险：产生出一批先进的工业国家，这些国家的上层阶级从亚非两洲获得巨额的贡款，并且利用这种贡款来拳养大批驯服的职员和仆役，这些职员和仆役不再从事大宗的农产品和工业品的生产，而是替个人服务，或者在新的金融贵族监督下从事次要的工业劳动。让那些漠视这种理论（应该说：前途）、认为这个理论不值得研究的人，去思考一下已经处于这种状态的现代英国南部各区的经济条件和社会条件吧。让他们想一想，一旦中国屈服于这种金融家、‘投资者’及其政治方面和工商业方面的职员的经济控制，使他们能从这个世界上所仅有的最大的富源汲取利润，并且用之于欧洲，这种制度将会扩展到怎样巨大的程度。当然，情况是极为复杂的，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变动也很难预料，所以不能预先肯定只有这一种前途或其他任何一种前途。但是，现在支配着西欧帝国主义的那些势力，确实是向着这一个方向发展的。如果这些势力不会遇到什么抵抗，不会被引上另一个方向，那末这些

势力就会正是朝着完成这一过程的方向努力。”^①

作者说得完全对：**如果帝国主义的力量不会遇到抵抗，它就正会走向这种结局。**这里对于“欧洲联邦”在现代帝国主义情况下的意义，作了正确的估计。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就是在工人运动内部，目前在大多数国家暂时获得胜利的机会主义者，也是经常地一贯地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的。帝国主义意味着分割世界而不只是剥削中国一个国家，意味着极少数最富的国家享有垄断高额利润，所以，它们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无产阶级的上层，从而培植、形成和巩固机会主义。不过不要把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机会主义的那些力量忘掉，这些力量，社会自由主义者霍布森自然是看不到的。

德国机会主义者格尔哈特·希尔德布兰德过去因为拥护帝国主义而被开除出党，现在满可以充当德国所谓“社会民主”党的领袖，他给霍布森作了一个很好的补充，宣传组织“西欧联邦”（俄国除外），以便“共同”行动……反对非洲黑人、反对“大伊斯兰教运动”，以便维持“强大的陆海军”对付“中日联盟”^②等等。

舒尔采-格弗尼茨对“不列颠帝国主义”的描绘，向我们表明了同样的寄生性的特征。从1865-1898年英国的国民收入大约增加了一倍，而这一时期“来自国外”的收入却增加

① 霍布森所著前书第103、205、144、335、386等页。

② 格尔哈特·希尔德布兰德《工业统治地位和工业社会主义的动摇》(Gerhard Hildebrand; 《Die Erschütterung der Industriegewalt und des Industriesozialismus》) 1910年版第229页及往下各页。

了八倍。如果说帝国主义的“功劳”是“教育黑人去劳动”（不用强制手段是不行的……），那末帝国主义的“危险”就在于，“欧洲将把体力劳动，起初把农业劳动和矿业劳动，然后把比较重的工业劳动，推给黑人去干，自己则安心地过食利者的生活，也许这样就为红种人和黑人的经济解放以及后来的政治解放做好了准备”。

在英国，愈来愈多的土地不再用于农业生产，而成了专供富人运动作乐的场所。人们谈到苏格兰这个最贵族化的、专门用来打猎和作其他运动的地方时，都说“它是专靠遗产和卡内基先生《美国亿万富翁》生活的”英国每年单是花在赛马和猎狐上面的费用，就有一千四百万英镑（约合一亿三千万卢布）。英国食利者的人数约有一百万。从事生产的人口的百分比日益下降：

英国人口 主要工业部门 工人在人口总数
的工人人数 中所占的百分比
(单位百万)

1851年………	17.9	4.1	23%
1901年………	32.5	4.9	15%

研究“二十世纪初的不列颠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学者谈到英国工人阶级的时候，不得不经常把工人“上层”和“真正的无产阶级下层”加以区别。上层中间有大批人参加合作社、工会、体育团体和许多教派。选举法是同这个阶层的地位相适应的，而这种选举法在英国“还有相当多的限制，以排除真正的无产阶级下层”!!为了粉饰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人们通常只讲到在无产阶级中占少数的这个上层，例如说：

“失业问题主要是伦敦的问题和无产阶级下层的问题，这个下层是政治家们很少重视的”……^①应该说是资产阶级政客和“社会党人”机会主义者们很少重视的。

从帝国主义国家移往国外的人口逐渐减少，从比较落后的、工资比较低的国家移入帝国主义国家的人口（流入的工人和移民）却逐渐增加，这也是与上述种种现象有关的帝国主义特点之一。据霍布森说，英国移往国外的人口从1884年起开始减少：1884年有二十四万二千人，而1900年只有十六万九千人。德国移往国外的人口，在1881—1890年的十年中达到了最高峰，有一百四十五万三千人，但是在后来的两个十年里，又减少到五十四万四千人和三十四万一千人。同时，从奥、意、俄等国移入德国的工人却增加了。根据1907年的人口调查，德国有一百三十四万二千二百九十四个人，其中产业工人有四十四万零八百人，农业工人有二十五万七千三百二十九人^②。法国的采矿工业工人“很大一部分”是外国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③。在美国，从东欧和南欧移入的侨民做工资最低的工作，在升为监工和做工资最高的工作的工人中，美国工人所占的百分比最大^④。帝

① 舒尔采-格弗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第301页。

② 《德意志帝国统计》（《Statistik des Deutschen Reichs》）第211卷。

③ 亨盖尔《法国的投资》Henger:《Die Kapitalsanlage der Franzosen》1913年斯图加特版。

④ 古尔维奇《移民与劳动》(Hourvich:《Immigration and Labour》)1913年纽约版。

国主义有一种趋势,就是在工人中间也造成一些特权阶层,并且使他们脱离广大的无产阶级群众。

必须指出:在英国,帝国主义分裂工人、加强工人中间的机会主义、使工人运动暂时腐朽的这种趋势,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以前很久,就已经表现出来了。因为英国从十九世纪中叶起,就具备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点:拥有大量的殖民地领土;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在几十年中不断地注意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和英国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特点之间的联系。例如,恩格斯在1858年10月7日给马克思的信中说:“英国无产阶级实际上日益资产阶级化了,因而这一所有民族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民族,看来想把事情最终导致这样的地步,即除了资产阶级,还要有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化的无产阶级。自然,对一个剥削全世界的民族来说,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道理的。”¹⁰将近二十五年以后,恩格斯又在1881年8月11日写的信里说到了“被资产阶级收买了的,或至少是领取资产阶级报酬的人所领导的最坏的英国工联”¹¹。恩格斯在1882年9月12日给考茨基的信中又说:“您问我:英国工人对殖民政策的想法如何?这和他们对一般政策的想法一样。这里没有工人政党,有的只是保守党人和自由激进党人,而工人十分安然地同他们共享英国的殖民地垄断权和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权。”¹² 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Briefwechsel von Marx und Engels》第2卷第290页;第4卷第453页。考基《社会主义与殖民政策》(K. Kautsky:《Sozialismus und Kolonialpolitik》)1907年柏林版第79页;这本小册子是考茨基在很早很早以前,当他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时候写的。

（恩格斯在 1892 年给《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第二版所写的序言中，也叙述了同样的看法。）

这里已经把原因和后果明白地指出来了。原因是：（1）这个国家剥削全世界，（2）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3）它拥有殖民地垄断权。后果是：（1）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已经资产阶级化了；（2）英国一部分无产阶级甘愿受那些被资产阶级收买或至少是领取资产阶级报酬的人领导。在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已经结束了极少数国家对世界的分割，其中每个国家现在都剥削着（指吸取超额利润“全世界”的一部分，而所剥削的每一部分都要比英国在 1858 年剥削的小一点；每一个国家都由于托拉斯、卡特尔、金融资本以及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关系等等而在世界市场上占有垄断地位；每个国家都在相当程度上拥有殖民地垄断权（我们已经看到，世界上七千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全部**殖民地中，有六千五百万平方公里，即百分之八十六集中在六个强国手里，有六千一百万平方公里，即百分之八十一，集中在三个强国手里））。

现在局势的特点就在于以下这些经济政治条件：帝国主义已经从萌芽状态成长为统治的体系，资本家的垄断组织在国民经济和政治中居于首要地位，世界已经分割完毕；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现在已经不是英国独占垄断权，而是少数帝国主义强国在争夺垄断权，这是整个二十世纪初期的特点。所有这些经济政治条件，不能不使机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共同的、根本的利益更加不可调和起来。现在，机会主义已经不能象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英国那样，在某一国家的工人运动里，在几十年的长时期内取得完全的胜利了，但是它在许多

国家里已经完全成熟，已经成熟过度，已经腐烂，并且作为社会沙文主义而同资产阶级的政策完全溶合起来了。^①

九 对帝国主义的批评

这里所说的对帝国主义的批评是指广义的批评，是指社会各阶级根据自己的一般意识形态对帝国主义政策所采取的态度。

一方面，巨量的金融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造成非常广泛而稠密的关系和联系网，这个密网不仅控制了大批中小资本家和业主，而且控制了最小的资本家和业主；另一方面，一个国家的金融家集团同其他国家的金融家集团，为分割世界和统治其他国家而进行着尖锐的斗争，——结果，就使所有的有产阶级全都转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了。“普遍”迷恋于帝国主义的前途，疯狂地捍卫帝国主义，尽量地美化帝国主义，——这就是当代的标志。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也渗透到工人阶级里面去了。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之间并没有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如果说现在德国所谓“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被人们公正地称为“社会帝国主义者”，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帝国主义者，那末霍布森早在1902年，就已经指出英国存在着属于机会主义“费边社”¹⁴的“费边帝国主义者”了。

① 波特列索夫先生之流、契恒凯里先生之流、马斯洛夫先生之流等等所代表的俄国社会沙文主义，无论是它的公开形式，或是它的隐蔽形式（如齐赫泽、斯柯别列夫、阿克雪里罗得、马尔托夫等先生），都是从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即从取消主义¹³生长起来的。

资产阶级的学者和政论家，通常都是用比较隐蔽的方式替帝国主义辩护，掩盖帝国主义的完全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深厚根源，竭力把局部的东西和次要的细节放在主要的地位，拚命用一些毫无意义的“改良”计划，例如由警察监督托拉斯或银行等等，来转移人们对重要问题的注意。至于那些无耻的、露骨的帝国主义者，即敢于承认改良帝国主义的基本特性是一种荒谬想法的帝国主义者，是很少发表意见的。

举个例子来说吧。德国帝国主义者在《世界经济文汇》这一出版物中，力图考察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当然特别是那些非德属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他们指出印度的风潮和抗议运动，纳塔尔（南非）的运动，荷属印度的运动等等。其中有一个人在评论用英文出版的、有关亚、非、欧三洲受外国统治的各民族代表于1910年6月28—30日举行的从属民族和种族代表会议的报告时，对会议上的演说作了这样的评价，他说：“据称，必须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统治国应当承认从属民族的独立权，国际法庭应当监督强国同弱小民族订立的条约的履行。除了表示这些天真的愿望以外，代表会议并没有继续前进。我看不出他们对下面这个真理有丝毫的了解：帝国主义同目前形式的资本主义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同帝国主义作直接的斗争是没有希望的，除非仅限于反对个别特别可恶的过火现象。”^①因为用改良主义的方法修改帝国主义的基础不过是一种欺骗，是一种“天真的愿望”因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代表没有“继续”前进，所以压

① 《世界经济文汇》第2卷第193页。

迫民族的资产阶级代表就“继续”后退了,后退到在所谓“科学性”的掩盖下向帝国主义卑躬屈膝的地步。这也是一种“逻辑”!

能不能用改良主义的方法来改变帝国主义的基础呢?是前进,使帝国主义所产生的种种矛盾更加尖锐、更加剧烈呢,还是后退,去缓和这些矛盾呢,一一这些问题是对帝国主义的批评中的根本问题。由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特点是全面的反动,是金融寡头的压迫和自由竞争的消除而引起的民族压迫的加强,所以在二十世纪初期,几乎在所有帝国主义国家中都出现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反对派。考茨基以及考茨基主义这一广泛的国际思潮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地方,就在于考茨基不仅没有设法、没有能够使自己同这个经济上根本反动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派对立起来,反而在实践上和它同流合污。

1898年对西班牙的帝国主义战争,在美国引起了“反帝国主义者”,即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最后一批莫希干人¹⁵的反对。他们把这次战争叫做“罪恶的”战争,认为兼并别国土地是违背宪法的,认为对菲律宾土著人领袖阿吉纳尔多的行为是“沙文主义者的欺骗”(先答应阿吉纳尔多给菲律宾以自由,后来又派美国军队登陆,兼并了菲律宾),并且引用了林肯的话:“白人自己管理自己是自治,白人自己管理自己同时又管理别人,就不是自治而是专制。”^①但是,既然这全部批评都不敢承认帝国主义同托拉斯、也就是同资本主义的基础,

① 约·帕士叶《美国帝国主义》(J.Patouillet;《L'impérialisme américain》)1904年第4版第272页。

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不敢表示赞同大资本主义及其发展所造成的力量，那末这种批评就仍然是一种“天真的愿望”。

霍布森批评帝国主义的时候所采取的基本立场，也是如此。霍布森否认“帝国主义的不可避免性”和主张必须“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比考茨基还要早。用小资产阶级的观点批评帝国主义，批评银行支配一切，批评金融寡头等等的，还有我们屡次引用过的阿加德、阿·兰斯堡、路·厄什韦葛，也有法国作家维克多·别拉尔，他是1900年出版的那本肤浅的《英国与帝国主义》一书的作者。所有这些人丝毫没有冒充马克思主义的企图，他们用自由竞争和民主同帝国主义相对立，谴责势必引起冲突和战争的关于巴格达铁路的计谋，表示了维护和平的“天真的愿望”等等。最后还有研究国际证券发行情况的统计学家阿·奈马尔克，他在1912年计算到“国际”有价证券达几千亿法郎时，甚至叫了起来“难道可以设想和平会受到破坏吗？……有了这样大的数字，还会去冒险挑起战争吗？”^①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这样天真，倒没有什么奇怪，而且他们做出这样一副天真的样子，“煞有介事地”谈论帝国主义制度下的和平，对他们反而是有利的。可是考茨基在1914年、1915年、1916年也采取了这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观点，硬说在和平问题上，“大家（帝国主义者、假社会主义者和社会和平主义者）意见都是一致的”，试问他还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吗？这不是分析和揭露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而是

① 《国际统计研究所公报》第19卷第2册第225页。

用改良主义的“天真的愿望”来推开这些矛盾，回避这些矛盾。

下面是考茨基从经济上对帝国主义进行批评的典型例子。他举出 1872 年和 1912 年英国对埃及进出口的统计材料，发现这方面进出口的数量比英国进出口总额增加得慢。于是考茨基得出结论说：“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认为，不用武力占领埃及而依靠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英埃贸易就会增长得慢些。”“资本扩张的愿望”，“最好能不通过帝国主义的暴力方法，而通过和平的民主来实现”。

考茨基的这个论断，被他的俄国跟班（也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的俄国掩护人）斯彼克塔托尔¹⁶先生用各种各样的调子重弹过。这个论断是考茨基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批评的基础，所以我们必须较详细地谈一谈。我们从引证希法亭的言论开始。因为考茨基曾经多次（包括 1915 年 4 月那次在内）认为，希法亭的结论是“所有社会党理论家一致同意的”。

希法亭写道：“无产阶级要做的事情，不是用已经成为过去的、自由贸易时代的政策和仇视国家的政策同更进步的资本主义政策相对立。无产阶级对金融资本的经济政策的答复、对帝国主义的答复，不可能是贸易自由，而只能是社会主义。现在无产阶级政策的目的是不可能象恢复自由竞争这样的理想（这种理想现在已经变成反动的理想了），而只能是通过消

① 考茨基《民族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和国家联盟》(Kautsky:《Nationalstaat, imperialis tischer Staatund Staatenbund》) 1915 年纽伦堡版第 72 页和第 70 页。

除资本主义来彻底消灭竞争。”^①

考茨基在金融资本时代维护“反动的理想”维护“和平的民主”和“单纯的经济因素的作用”，从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个理想在**客观上**是开倒车，是从垄断资本主义倒退到非垄断资本主义，是一种改良主义的骗局。

如果不用武力占领，如果没有帝国主义，没有金融资本那末英国同埃及（或者同其他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贸易就会“增长得”快些。这是什么意思？这岂不是说，如果自由竞争没有受到一般垄断的限制，没有受到金融资本的“联系”或压迫（这也是垄断）的限制，没有受到个别国家垄断地占有殖民地的限制，那末资本主义就会发展得快些么？

考茨基的论断不可能有别的意思，而这个“意思”却是毫无意思的。就假定会这样，如果没有任何垄断，自由竞争会使资本主义和商业发展得更快些。但是，要知道商业和资本主义发展得愈快，**产生垄断的生产集中和资本集中的程度也就愈高。而且垄断已经产生了，恰好是从自由竞争中产生出来的！**即使现在垄断开始延缓发展，这也不能成为维护自由竞争的理由，因为自由竞争在产生垄断以后，就不可能存在了。

不管你怎样把考茨基的论断翻来复去地看，这里面除了反动性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即使把这种论断修改一下，象斯彼克塔托尔说的那样，现在英属殖民地同英国的贸易，比英属殖民地同其他各国的贸

① 《金融资本》第 567 页。

易发展得慢些，——这也挽救不了考茨基。因为打击英国的也是垄断，也是帝国主义，不过是其他国家的（美国的、德国的）垄断和帝国主义。大家知道，卡特尔引起了一种新的独特的保护关税，它所保护的（这一点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上就已经指出来了¹⁷）恰好是那些能够出口的产品。其次，大家知道，卡特尔和金融资本有一种“按倾销价格输出”的做法，也就是英国人所说的“抛售”的做法：卡特尔在国内按垄断的高价出卖产品，而在国外却按贱几倍的价格倾销，以便打倒自己的竞争者，把自己的生产扩大到最大限度等等如果说德国同英属殖民地的贸易比英国同英属殖民地的贸易发展得快些，那也只能证明德国帝国主义要比英国帝国主义更新、更强大、更有组织、更高明，而决不能证明自由贸易的“优越”，因为这里并不是自由贸易同保护关税政策或殖民地附属关系作斗争，而是一个帝国主义同另一个帝国主义、一个垄断组织同另一个垄断组织、一个金融资本同另一个金融资本作斗争。德国帝国主义对英国帝国主义的优势，比殖民地疆界或保护关税的城墙更厉害。如果由此得出主张自由贸易与“和平的民主”的“理由”，那是庸俗的，是忘掉帝国主义的基本特点和特性，是用市侩的改良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

有趣的是，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兰斯堡，虽然也同考茨基一样对帝国主义作了市侩式的批评，但是他对贸易统计材料毕竟作了比较科学的整理。他并不是随便拿一个国家，也不是单拿一个殖民地来同其余国家比较，而是拿帝国主义国家的两种输出作比较：第一种是对财政上依赖于帝国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国家借钱的国家的输出，第二种是对

财政上独立的国家的输出。结果如下：

德国的输出（单位百万马克）		1889年	1908年	增加的百分数
对财政上依赖于德国的国家的输出	罗马尼亚……	48.2	70.8	+ 47%
	葡萄牙……	19.0	32.8	+ 73%
	阿根廷……	60.7	147.0	+ 143%
	巴西……	48.7	84.5	+ 73%
	智利……	28.3	52.4	+ 85%
	土耳其……	29.9	64.0	+114%
总 计……		234.8	451.5	+ 92%
对财政上不依赖于德国的国家的输出	大不列颠……	651.8	997.4	+ 53%
	法国……	210.2	437.9	+108%
	比利时……	137.2	322.8	+135%
	瑞士……	177.4	401.1	+127%
	澳大利亚……	21.2	64.5	+205%
	荷属印度……	8.8	40.7	+363%
总 计……		1206.6	2264.4	+87%

兰斯堡没有做总计，所以很奇怪，他没有看到：如果这些数字能够证明什么的话，那只能证明他自己不对，因为对财政上不独立的国家的输出，毕竟要比对财政上独立的国家的输出增加得快些，虽然快得并不多（我们把“如果”两字加上着重号，是因为兰斯堡的统计还是很不完全的）。

兰斯堡在考察输出和贷款的关系时写道：

“1890/91年罗马尼亚通过几家德国银行缔结了一项贷款条约。其实在前几年，这些德国银行就已经发放这笔贷款了。这笔贷款主要是用来向德国购买铁路材料的。1891年德国对罗马尼亚的输出是五千五百万马克。下一年就降到三千九百四十万马克，以后断断续续地下降，到1900年一直降到二千五百四十万马克。直到最近几年，因为有了两笔新的贷款，才又达到了1891年的水平。

德国对葡萄牙的输出，由于1888/89年的贷款而增加到二千一百一十万马克（1890年），在以后两年内，又降到一千六百二十万马克和七百四十万马克，直到1903年才达到原先的水平。

德国同阿根廷贸易的材料更为明显。由于1888年和1890年的两次贷款德国对阿根廷的输出在1889年达到了六千零七十万马克。两年后，输出只有一千八百六十万马克，还不到过去的三分之一。直到1901年，才达到并超过1889年的水平，这是同承办新的国家公债和市政公债，同拨款兴建电力厂以及其他信贷业务有关的。

德国对智利的输出，由于1889年的贷款增加到四千五百二十万马克（1892年），一年后降到了二千二百五十万马克。1906年通过德国几家大银行缔结了一项新的贷款条约以后输出又增加到八千四百七十万马克（1907年）而到1908年又降到了五千二百四十万马克。”^①

兰斯堡从这些事实中得出了一种滑稽的市会说教：同贷

① 《银行》杂志 1909年第2期第819页及往下各页。

款相联系的输出是多么不稳固、不平衡，把资本输出国外而不用来“自然地”“和谐地”发展祖国工业，是多么不好；办理外国贷款时，克虏伯要付出几百万的附加费，代价是多么“大”，等等。但是事实清楚地说明：输出的增加，恰好是同金融资本的骗人勾当相联系的，金融资本并不关心什么资产阶级的说教，它要从一条牛身上剥下两张皮来：第一张皮是从贷款取得的利润，第二张皮是在同一笔贷款用来购买克虏伯的产品或钢业辛迪加的铁路材料等等时取得的利润。

再说一遍，我们决不认为兰斯堡的统计是完备的，但是必须加以引用，因为它比考茨基和斯彼克塔托尔的统计要更科学些，因为兰斯堡指出了对待问题的正确方法。要议论金融资本在输出等等方面的作用，就要善于专门地、单独地说明输出同金融家骗人勾当的联系，专门地、单独地说明输出同卡特尔产品的销售等等的联系。随便地拿一般殖民地同非殖民地比较，拿一个帝国主义同另一个帝国主义比较，拿一个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如埃及）同其余一切国家比较，那就正是回避和掩饰问题的实质。

考茨基在理论上对帝国主义进行的批评，其所以同马克思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其所以只能用来宣传同机会主义者和社会沙文主义者保持和平和统一，就是因为这种批评恰恰回避和掩饰了帝国主义最深刻、最根本的矛盾：垄断同与之并存的自由竞争的矛盾，金融资本的庞大“业务”（以及巨额利润）同自由市场上“诚实的”买卖的矛盾，卡特尔、托拉斯同没有卡特尔化的工业的矛盾等等。

考茨基胡诌出来的那个臭名昭彰的“超帝国主义”论，

也具有完全相同的反动性质。请把考茨基在 1915 年关于这个问题的论断同霍布森在 1902 年的论断比较一下。

考茨基说：“……现在的帝国主义的政策难道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排除吗？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一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于能不能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来解决这一问题。”^①

霍布森说：“基督教在各自占有若干未开化的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少数大联邦帝国里已经根深蒂固了，很多人觉得基督教正是现代趋势的最自然的发展，并且是这样一种发展，它最有希望在国际帝国主义的巩固的基础上达到永久的和平。”

被考茨基叫作超帝国主义的东西，也就是霍布森比他早十三年叫作国际帝国主义的那个东西。除了用一个拉丁语字头代替另一个字头^②，编造出一个深奥的新词以外，考茨基的“科学”见解的进步的地方，不过是妄想把霍布森所描写的东西，其实是英国牧师的谎话，冒充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布战争以后，英国牧师这一高贵等级把主要力量用来安慰那些在南非战役中丧失了不少生命，并且为保证英国金融家有更高的利润而缴纳了更高捐税的英国小市民和工人，这本来是很自然的。除了说帝国主义并不那么坏，说它很快就要变

① 1915 年 4 月 30 日《新时代》杂志第 144 页。

② 原文《ультра-империализм》（“超帝国主义”）和《интер-империализм》（“国际帝国主义”）这两个词的差别只是两个拉丁语字头（ультра和интер）的差别。一编者注

成能够保障永久和平的国际（或超）帝国主义，——哪里还有什么更好的安慰呢？不管英国的牧师或甜滋滋的考茨基的意图如何善良，但是他那个“理论”的客观的即真正的社会意义只有一个：就是拿资本主义制度下可能达到永久和平的希望，对群众进行最反动的安慰，其方法就是使人们不去注意现代的尖锐矛盾和尖锐问题，而去注意某种所谓新的将来的“超帝国主义”的虚假前途。在考茨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里，除了欺骗群众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

其实只要同那些人人皆知的不容争辩的事实好好对比一下，就会清楚地知道，考茨基硬要德国工人（和各国工人）相信的那种前途是多么虚假了。拿印度、印度支那和中国来说吧。谁都知道，这三个共有六七亿人口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是受英、法、日、美等几个帝国主义强国的金融资本剥削的。假定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组成了几个彼此敌对的联盟，以保持或扩张它们在上述亚洲国家中的领地、利益和“势力范围”这将会是一些“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又假定**所有**帝国主义强国组成一个联盟来“和平”分割上述亚洲国家，这将会是一种“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就有这种联盟的实际例子，例如，列强共同对付中国就是这样。试问，在保存着资本主义的条件下（考茨基正是以这样的条件为前提的“可以设想”这种联盟不是暂时的联盟吗？“可以设想”这种联盟会消除各种各样的摩擦、冲突和斗争吗？

只要清楚地提出这个问题，就不能不给人以否定的回答。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分割势力范围、分享利益和分割殖

民地等等，除了以分割者的**实力**，也就是以一般经济、金融、军事等等的实力为根据外，不可能设想以其他的东西为根据而**这些分割者的实力的变化又各不相同**，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各个企业、各个托拉斯、各个工业部门、各个国家的发展不可能是**平衡的**。如果拿半世纪以前德国的资本主义实力同当时英国的实力相比，那时德国还小得可怜，日本同俄国相比，也是如此。能不能“设想”一二十年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实力对比依然**没有变化呢？绝对不能**。

所以，资本主义现实中的（而不是英国牧师或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庸俗的市侩幻想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一切帝国主义强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前后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休战”。和平的联盟准备着战争，同时它又是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两者互相制约，在**同一个基础上**，即在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帝国主义联系和相互关系的基础上，产生着和平斗争形式与非和平斗争形式彼此交替的情形。聪明绝顶的考茨基为了安慰工人，使他们同投到资产阶级方面去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调和，就把一条链子上的这一环节同另一环节**割开**，把今天一切强国为了“安慰”中国（请回忆一下对义和团起义的镇压）而结成的和平的（和超帝国主义的，——甚至是超而又超的帝国主义的）联盟，同明天的、非和平的冲突割开，而这种非和平的冲突，又准备在后天结成“和平的”总联盟来分割——如说——土耳其等等。考茨基不提帝国主义和平时期同帝国主义战争时期之间的活生生

的联系，而把僵死的抽象概念献给工人，是为了使工人同他们那些僵死的领袖调和。

美国人希尔在他的《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外交史》一书序言中，把现代外交史分为以下三个时期：（1）革命时代；（2）立宪运动；（3）现代“商业帝国主义”时代^①。另一个作家则把 1870 年以来的大不列颠“世界政策”史分为四个时期：（1）第一个亚洲时期（反对俄国在中亚细亚一带向印度扩张）；（2）非洲时期（大约在 1885-1902 年），为了分割非洲而同法国斗争（1898 年的“法索达”事件，一差一点同法国作战）；（3）第二个亚洲时期（与日本缔约反对俄国）；（4）“欧洲”时期，主要是反对德国^②。早在 1905 年，银行“活动家”里谢尔就指出，在意大利进行活动的法国金融资本，为法意两国的政治联盟作了准备；德英两国为了争夺波斯以及所有欧洲各国的资本为了贷款给中国而进行斗争等等，于是他写道：“政治前哨战是在金融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这就是“超帝国主义的”和平联盟与普通帝国主义的冲突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活生生的现实。

考茨基抹杀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的矛盾，也就必然要粉饰帝国主义，这种情形在他批评帝国主义的政治特性时也表现出来。帝国主义是金融资本和垄断的时代，金融资本和垄断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这种统治趋势

① 戴维·杰恩·希尔《欧洲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外交史》(David Jayne Hill: 《A History of the Diplomacy in 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Europe》) 第 1 卷第 10 页。

② 施尔德尔所著前书第 178 页。

的结果，就是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发生全面的反动，这方面的矛盾也极端尖锐化。民族压迫、兼并的趋向即破坏民族独立的趋向（因为兼并就是破坏民族自决）也变本加厉了。希法亭很正确地指出了帝国主义与民族压迫加剧之间的联系，他写道：“在新发现的国家里，输入的资本加深了各种矛盾，不断地引起那些有了民族自觉的人民对外来者的愈来愈强烈的反抗，这种反抗很容易发展成为一种反对外国资本的危险行动。旧的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的革命性的变化，各‘史外民族’千年来的农村闭塞性日益被破坏，他们正被卷到资本主义的漩涡中去。资本主义本身在慢慢地为被征服者提供解放的工具和手段。于是他们也就提出了欧洲民族曾经认为是至高无上的目标：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作为争取经济自由和文化自由的工具。这种独立运动，使欧洲资本在被它剥削的那些最宝贵的、最有光辉前途的区域中受到威胁，因此，欧洲资本只有不断地增加自己的兵力，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①

这里还要补充一点。帝国主义不仅在新发现的国家，而且在老牌国家也在实行兼并，加紧民族压迫，因而也使反抗加剧起来。考茨基表示反对帝国主义加紧进行的政治反动，然而他没有说明在帝国主义时代决不能同机会主义者统一这个十分迫切的问题。他反对兼并，然而采取的却是最无伤于机会主义者、最容易为机会主义者接受的方式。他是直接对德国听众说话的，然而他恰恰把最重要、最有现实意义的事

^① 《金融资本》第 487 页。

实，例如德国兼并亚尔萨斯—洛林的事实掩盖起来。为了评价考茨基的这种“思想倾向”，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假定日本人指责美国人兼并菲律宾，试问会不会有很多人相信这是因为他根本反对兼并，而不是因为他自己想要兼并菲律宾呢？是不是应该承认，只有日本人起来反对日本兼并朝鲜，要求朝鲜有从日本分离的自由，才能认为这种反对兼并的“斗争”是真挚的，政治上是诚实的呢？

考茨基对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以及他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帝国主义的批评，都浸透了一种同马克思主义绝不相容的、掩饰和缓和最根本矛盾的精神，都贯串着一种尽力保持欧洲工人运动中正在陷于破裂的同机会主义统一的意图。

十 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

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就其经济实质来说，是垄断资本主义。这就决定了帝国主义的历史地位，因为在自由竞争的基础上、而且正是从自由竞争中成长起来的垄断，是从资本主义结构向更高级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过渡。必须特别指出能够说明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的四种主要的垄断形式，或垄断资本主义的四种主要表现。

第一、垄断是从发展到极高阶段的生产集中成长起来的。这就是资本家的垄断同盟卡特尔、辛迪加、托拉斯。我们看到，这些垄断同盟在现代经济生活中起着多么大的作用。到二十世纪初，它们已经在各先进国家取得了完全的优势。如果说，最先走上卡特尔化道路的，是那些实行高额保护关税

制的国家《德国和美国》，袖霸躲驳未实行自由贸易制的英国也表明了垄断是由生产集中产生的这个基本事实，不过稍微迟一点罢了。

第二、垄断加紧了对最重要的原料来源的掠夺，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主要的、卡特化程度最高的工业部门，如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所需要的原料来源的掠夺。垄断地占有最重要的原料来源，大大加强了大资本的权力，加剧了卡特化的工业和没有卡特化的工业之间的矛盾。

第三、垄断是从银行成长起来的。银行已经由普通的中介企业变成了金融资本的垄断者。在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为数不过三五家的最大银行实行工业资本同银行资本的“个人联合”，把持着占全国资本和货币收入很大一部分的几十亿几十亿资金。金融寡头给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所有一切经济机构和政治机构罩上了一层依赖关系的密网，——这就是这种垄断的最明显的表现。

第四、垄断是从殖民政策成长起来的。在殖民政策的无数“旧的”动机以外，金融资本又增加了争原料来源、争夺资本输出、争夺“势力范围”（即进行有利的交易、取得租让、取得垄断利润等等的范围）以及争夺一般经济领土等等的动机。例如，当欧洲列强在非洲的殖民地占非洲面积十分之一的时候（那是远在 1876 年的情形）殖民政策可以用非垄断的方式，用所谓“自由占领”土地的方式发展。但是，当非洲十分之九的面积已经被占领（到 1900 年时）全世界已经分割完毕的时候，一个垄断地占有殖民地、因而使分割世界和重新分割世界的斗争特别尖锐起来的时代就不可避免地到

来了。

垄断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尖锐到什么程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只要指出物价高涨和卡特尔的压迫就够了。这种矛盾的尖锐化，是从世界金融资本取得最终胜利开始的这一过渡历史时期的最强大的动力。

垄断制，寡头制，代替了自由趋向的统治趋向，极少数最富强的国家剥削愈来愈多的弱小国家，——这一切便产生了帝国主义的一些特点，使人必须说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趋势之一，即形成为“食利国”高利贷国的趋势愈来愈明显了，这种国家的资产阶级愈来愈依靠输出资本和“剪息票”为生。如果以为这一腐朽趋势排除了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那就错了。不，在帝国主义时代，个别工业部门，个别资产阶级阶层，个别国家，不同程度地时而表现出这种趋势，时而又表现出那种趋势。整个说来，资本主义的发展比从前要快得多，但是这种发展不仅一般地更不平衡了，而且这种不平衡还特别表现在资本最雄厚的国家(英国)的腐朽上面。

研究德国大银行的作家里谢尔谈到德国经济发展的速度时说：“德国前一个时代(1848—1870年)的进步并不太慢，但是同德国现时代(1870—1905年)整个经济特别是银行发展的速度比起来，就好象拿旧时的邮车同现代的汽车相比一样，现代汽车行驶之快，对于不小心的行人和坐汽车的人都是很危险的。”这个异常迅速地成长起来的金融资本，正因为成长得这样迅速，所以它也不反对更“心安理得地”去占有殖民地，而这些殖民地是要从更富足的国家手里，用不单是

和平的手段加以夺取的。美国近几十年来经济的发展比德国还要快，正因为如此，美国最新资本主义的寄生性的特征就表现得特别明显。另一方面，拿共和派的美国资产阶级同君主派的日本或德国的资产阶级来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它们之间的极大的政治上的差别也大大缩小了，这倒不是因为这种差别根本不重要，而是因为所有这些资产阶级都带有明显的寄生性的特征。

许多工业部门中的某一部门、许多国家中的某一国家的资本家获得了垄断高额利润，在经济上就有可能去收买个别的工人阶层，而且还可能暂时收买相当数量的少数工人，把他们拉到该部门或该国家的资产阶级方面来反对其他一切的部门或国家。帝国主义国家因分割世界而加剧的对抗，更加强了这种趋向。于是形成了帝国主义同机会主义的联系，这种联系在英国表现得最早而且最鲜明，因为某些帝国主义发展特点的出现，在英国比在其他国家早得多。有些作家，例如尔·马尔托夫，爱用一种“官场的乐观主义的”（同考茨基、胡斯曼一样）论断，来回避帝国主义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相联系这个现在特别明显的事实，说什么假如正是先进的资本主义会加强机会主义，或者，假如正是待遇最好的工人倾向于机会主义，等等，那末反对资本主义的人们的事业就会是没有希望的。不要看错了这种“乐观主义”的意义：这是对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这是用来掩护机会主义的乐观主义。其实，机会主义特别迅速和特别可恶的发展，并不能保证机会主义取得巩固的胜利，正象健康的身体上的恶性脓疮的迅速发展，只能加速脓疮破口而使身体恢复健康一样。在

这方面最危险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愿意了解，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就是一句骗人的空话。

根据以上对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的全部论述，必须说帝国主义是过渡的资本主义，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在这一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叙述最新资本主义时常用的一些字眼，什么“交错”呀、“没有孤立性”呀，等等；什么银行“就其任务和发展而言，不是带有单纯私有经济性质的企业，而是日益超出单纯私有经济调节范围的企业”。而讲了这种话的同一个里谢尔，却非常郑重地宣称，马克思主义者关于“社会化”的“预言”并“没有实现”！

“交错”这个字眼说明了什么呢？它只抓住了我们眼前发生的那个过程的最明显的一点。它表明观察者只看到一棵棵的树木而看不到森林。它盲目地复写外表的、偶然的、紊乱的现象。它暴露出观察者被原始材料压倒了，完全不能了解其中的内容和意义。股票的占有，私有者的关系，都是“偶然交错在一起的”。但是隐藏在这种交错现象底下的，构成这种交错现象的基础的，是正在变化的社会生产关系。既然大企业变得十分庞大，并且根据对大量材料的精确估计，有计划地取得数千万居民所必需的全部原料的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既然运送这些原料到最便利的生产地点（有时彼此相距数百里数千里）是有步骤地进行的，既然从原料的依次加工一直到制成许多种成品的各个工序是由一个中心指挥的；既然这些产品分配给数千万数万万消费者是按照一个计划

进行的(在美、德两国,煤油都是由美国“煤油托拉斯”销售的);——那末很明显,摆在我们面前的就是生产的社会化,而决不是简单的“交错”;很明显,私有经济关系和私有制关系已经变成与内容不相适应的外壳了;如果人为地拖延消灭这个外壳的日子,那它就必然要腐烂,——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万一机会主义的脓疮迟迟不能治好的话),但还是必然要被消灭的。

德国帝国主义的狂热崇拜者舒尔采-格弗尼茨惊叹道:

“如果领导德国银行的责任归根到底是落在十来个人身上,那末现在他们的活动对于人民福利说来,就比大多数国务大臣的活动还要重要(在这里,把银行家、大臣、工业家和食利者“交错”的情形忘掉,是更有利的……)……如果把我们所看到的那些趋势的发展情况彻底想一番,那末结果就会是:一国的货币资本统一在银行手里;银行又互相联合为卡特尔;一国寻找投资场所的资本都化为有价证券。到那时就会实现圣西门的天才预言:“现在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是同经济关系的发展缺乏统一的调节这个事实相适应的,这种状态应当被有组织的生产所代替。指挥生产的将不是那些彼此隔离、互不依赖、不知道人们经济要求的企业家;这种事情将由某种社会机构来管理。有可能从更高的角度去观察广阔的社会经济领域的中央管理委员会,将把这种社会经济调节得有利于全社会,把生产资料交给适当的人运用,尤其是将设法使生产和消费经常处于协调的状态。现在有一种机构已经把某种组织经济劳动的工作包括在自己的任务以内了,这种机构就是银行。我们现在还远远没有实现圣西门的这些预

言；但是我们已经走在实现这一预言的道路上：这是和马克思本人所设想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马克思主义，不过也只是形式上不同而已。”^①

不用说，这是对马克思的很好的“反驳”，这样就从马克思的精确科学分析倒退到圣西门的猜测上去了，圣西门的猜测虽然是天才的猜测，但终究只是猜测。

写于 1919 年 1-6 月

1917 年 4 月第一次在

彼得格勒用单行本刊印

按手稿刊印并根据单行本

原文作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 22 卷

① 《社会经济概论》第 146 页。

注 释

- 1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是马克思《资本论》的直接继续，它总结了《资本论》出版以后资本主义在半个世纪中的发展，对帝国主义做了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指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根据他所揭示的帝国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得出了社会主义首先在一个或几个资本主义国家胜利而不可能同时在所有国家胜利的结论。列宁的这一新的、完备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坚定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信念。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是 1916 年写成的。早在 1915 年，列宁就在伯尔尼开始研究各国关于帝国主义的著作，从 1916 年 1 月起开始写这本书。这年 1 月底，列宁移居苏黎世，在苏黎世州立图书馆里继续写这本书。列宁从几百本外文书籍、杂志、报纸和统计汇编中做的摘录、纲要、札记和表格等共有四十多印张。1939 年，这些资料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的书名印成单行本出版。

1916 年 7 月 2 日，列宁写成本书，并且把手稿寄交孤帆出版社。出版社里的孟什维克分子删去了书中对考茨基和俄国孟什维克（马尔托夫等）的机会主义理论的尖锐批评，把列宁原用的词“发展成为”（资本主义发展成为资本帝国主义）改为“变成”，把“反动性”（“超帝国主义”论的反动性）改为“落后性”等等。1917 年初，孤帆出版社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的书名在彼得格勒刊印了这本书。

列宁回到俄国以后，给这本书写了序言。1917 年 9 月这本书问世。

- 2 这篇序言第一次发表在 1921 年 10 月《共产国际》杂志第 18 期上，标题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 3 凡尔赛和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英、法美、意、日等战胜国为一方和以战败的德国为另一方签订的帝国主义条约。条约于 1919 年 6 月

28 日在巴黎近郊凡尔赛城的凡尔赛宫签字。条约的目的是维护和巩固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反对和摧毁苏维埃政权；镇压各国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

4 第二国际巴塞尔代表大会 于 1912 年 11 月 24-25 日举行。这是由于欧洲面临战争的威胁而召开的一次非常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项宣言，宣言着重指出了未来世界大战的帝国主义性质，并号召各国社会党人积极参加反战斗争。

5 考茨基，卡尔(1854-1938)-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新时代》杂志编辑，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

6 伯恩斯坦，爱德华(1850-1932)——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1895 年恩格斯逝世后，从改良主义立场公开修正马克思主义；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首领之一。

7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政党，成立于 1917 年 4 月，首领是考茨基考茨基主义的组织“劳动友谊社”是该党的主要部分。“独立党人”宣传同公开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团结”，替他们辩解，庇护他们，主张放弃阶级斗争。

1920 年 10 月在哈雷举行的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生了分裂党内很大一部分人于 1920 年 12 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独立社会民主党，一直存在到 1922 年

8 社会革命党是俄国的小资产阶级政党，1902 年初由几个不同的民粹派团 5 体和小组合并而成。它代表富农阶级的利益。社会革命党人的观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折衷混合物。列宁指出，社会革命党人“竭力用机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时笔‘批评’的补钉来修补民粹主义的破洞”(见《列宁全集》第 9 卷第 295 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1917 年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充当了反革命临时政府的主要支柱。社会革命党人不支持农民消灭

地主土地所有制的要求，主张保留地主土地私有制。

1917年12月，社会革命党人左翼组成了独立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表面上承认苏维埃政权，并同布尔什维克达成协议，但很快又开始反对苏维埃政权。

在外国武装干涉和内战时期，社会革命党人曾多次策划反革命阴谋策动富农叛乱、暗害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继续进行反苏维埃国家的活动，后被苏维埃政权粉碎。

- 9 斯巴达克派(国际派)是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组织，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立。斯巴达克派的创始人和领导人是卡·李卜克内西罗·卢森堡、弗·梅林、克·蔡特金等人。1915年4月卢森堡和梅林创办了《国际》杂志，把大部分德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团结在它的周围形成国际派。从1916年起，国际派开始出版了署名斯巴达克的《政治书信》因此又称斯巴达克派。1917年4月，它加入德国中派独立社会民主党，但保持组织上的独立。1918年11月，在德国革命过程中斯巴达克派形成了斯巴达克联盟。十一月革命后，斯巴达克派同“独立党人”决裂，于同年12月建立德国共产党。

斯巴达克派在群众中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革命宣传，揭露了德国帝国主义的掠夺政策和社会民主党机会主义领袖的叛卖行为。但是斯巴达克派—德国左派，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策问题上没有摆脱半孟什维主义的错误，他们发挥了半孟什维主义的帝国主义理论，否认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自决的原则(即直到实行分离，成立独立国家)，否认帝国主义时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可能性，低估革命政党的作用而崇拜运动的自发性。列宁《论尤尼乌斯的小册子》和《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见本卷第846-860页和《列宁全集》第23卷第18-72页)等著作，以及斯大林的信《论布尔什维主义历史中的几个问题》见《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76-91页)都对德国左派的错误做了批评。

- 10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5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8页。

- 11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18页。

- 12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353 页。
- 13 取消派出现在俄国 1905 年至 1907 年革命失败后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 10 当时孟什维克背弃了党纲上的革命要求和党的革命口号，企图取消无产阶级革命秘密党，主张成立一个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公开的工人党”因而被称为取消派。1912 年布拉格代表会议把取消派清除出党。参看列宁《几个争论问题》《列宁选集》第 2 卷第 457-480 页)。
- 14 费边社分子是一批英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于 1884 年成立的改良主义的 11 机会主义的费边社的成员。它的主要首领是悉·维伯和比·维伯。费边社以古罗马统帅费边·马克西姆的名字命名。费边曾在同汉尼拔的战争中采取逃避决战的待机策略，因而得到“孔克达特”(缓进者)的绰号。费边社分子反对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鼓吹通过细微的改良来逐渐地改造社会，宣扬用所谓“地方公有社会主义”的办法使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费边社在工人阶级中传播资产阶级影响，是英国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和改良主义思想的发源地之一列宁说费边社“最完整地体现了机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工人政策”(见《列宁全集》第 21 卷第 237 页)。1900 年，费边社并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费边社分子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场。
- 15 莫希干人是美洲一个已经绝种的民族。“最后一批莫希干人”一语，来源于美国作家库伯的小说《最后一个莫希干人》。后来，此语就成了最后的代表者的同义语。
- 16 斯彼克塔托尔，即俄国经济学家、崩得分子米·伊·纳希姆森
- 17 见马克思《资本论》第 3 卷第 6 章第 2 节。

列 宁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¹

在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和瑞士，在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编造的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的谎言作斗争的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中间，有人主张取消社会民主党的最低纲领中的“民兵制”或“武装人民”这项旧条文，而代之以“废除武装”的新条文。《青年国际》杂志已经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并且在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主张废除武装的编辑部文章。很遗憾，罗·格里姆最近的提纲²也对废除武装这一思想作了让步。《新生活》杂志和《先驱》³杂志展开了讨论。

现在我们就来研究一下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论点。

—

基本的论点是：要求废除武装，就是最明确、最坚决、最彻底地表示反对任何军国主义和任何战争。

可是，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基本错误恰恰在于这个基本论点。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就不能反对任何战争。

第一，社会主义者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是革命战争的反对者。各帝国主义“大”国的资产阶级已经反动透顶了，所以我们认为这个资产阶级现在进行的战争是反动的、

奴隶主的、罪恶的战争。而反对这个资产阶级的战争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例如，受这个资产阶级压迫和支配的民族或殖民地民族争取自身解放的战争的情形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在“国际”派⁴的“提纲”第5条中看到这样一种说法：“在这猖狂的帝国主义的时代，不可能再有任何民族战争。”这显然是不正确的。

二十世纪这个“猖狂的帝国主义”世纪的历史，充满了殖民地战争。但是我们欧洲人，压迫世界大多数民族的帝国主义者，从自己固有的卑鄙的欧洲沙文主义出发称之为“殖民地战争”的，往往是这些被压迫民族的民族战争或民族起义。帝国主义最基本的特性之一恰恰在于，它加速最落后的国家中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扩大和加剧反对民族压迫的斗争。这是事实。由此必然得出结论：帝国主义势必经常产生民族战争。尤尼乌斯在自己的小册子里赞成上述“提纲”，并说：在帝国主义时代，任何反对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民族战争，都会导致同这个大国竞争的另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介入，因此，任何民族战争也会转化为帝国主义战争。但是这个论点也是不正确的。这种情形是可能的，但并不总是如此。在1900—1914年间，许多次殖民地战争走的就不是这条道路。如果我们声称，例如在当前这场战争结束以后（假如这场战争将以各交战国打得筋疲力竭而告结束），“不可能”有“任何”进步的革命的民族战争，如中国同印度、波斯、暹罗等国联合进行的反对大国的战争，那简直是可笑的。

否认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有发生民族战争的任何可能性，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而且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在实践上

则无异于欧洲沙文主义：我们属于压迫欧洲、非洲、亚洲等数亿人的民族，我们应当对各个被压迫民族说，它们进行反对“我们”这些民族的战争是“不可能的”！

第二，国内战争也是战争。谁承认阶级斗争，谁就不能不承认国内战争，因为在任何阶级社会里，国内战争都是阶级斗争的自然的一一在一定的情况下则是必然的一一继续、发展和尖锐化。所有的大革命都证实了这一点。否认或忘记国内战争，就意味着陷入极端的机会主义和背弃社会主义革命。

第三，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社会主义决不能一下子根本排除一切战争。相反地，它预计到会有战争。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这就不仅必然引起摩擦，而且必然引起其他各国资产阶级力图打垮社会主义国家中胜利的无产阶级的直接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战争，从我们方面来说就会是正当的和正义的战争。这是争取社会主义、争取把其他各国人民从资产阶级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战争。恩格斯在 1882 年 9 月 12 日给考茨基的信中直接承认已经胜利了的社会主义有进行“自卫战争”的可能性^①，他说得完全正确。他指的正是胜利了的无产阶级进行自卫以反对其他各国的资产阶级。

只有在我们推翻、彻底战胜并剥夺了全世界的而不只是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5 卷第 353 页。——编者注

一国的资产阶级之后，战争才会成为不可能的。如果我们恰恰回避或掩饰最重要的事情，即镇压资产阶级的反抗——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最艰巨、最需要进行的斗争，那么，从科学的观点来看便是完全不正确的、完全不革命的。“社会”神父和机会主义者总是情愿幻想未来的和平社会主义，而他們与革命社会民主党人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他们不愿设想，不愿考虑为实现这个美好的未来而进行的残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战争。

我们决不应该受别人的言词的欺骗。例如，很多人痛恨“保卫祖国”这个概念，因为露骨的机会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用这个概念来遮盖和掩饰资产阶级在这场强盗战争中所说的谎话。这是事实。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应当不再考虑政治口号的意义。认可在这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就意味着认为这场战争是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正义”战争，——如此而已，再没有别的意义。因为在任何战争中都不排除入侵。否定被压迫民族方面在它们反对帝国主义大国的战争中“保卫祖国”，或者否定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方面在它反对资产阶级国家的某个加利费的战争中“保卫祖国”，那简直是愚蠢的。

如果忘记任何战争都不过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那在理论上是完全错误的；现在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两个大国集团的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而这种政治是由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关系的总和所产生和培育的。但是这个时代又必然产生和培育反对民族压迫斗争的政治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政治，因此就可能有的而且必然会有：第一，革命的民族

起义和战争；第二，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和起义；第三，这两种革命战争的汇合等等。

二

此外，还要补充下面这个一般的考虑。被压迫阶级如果不努力获得有关武器的知识，学会使用武器，占有武器，那它只配被压迫，被虐待，被人当作奴隶对待。我们如果不想变成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或机会主义者，就不能忘记，我们是生活在阶级社会里，除了进行阶级斗争之外，我们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其他摆脱这个社会的出路。在任何一个阶级社会里，不管它建立在奴隶制、农奴制或现在的雇佣奴隶制之上，压迫阶级总是武装起来的。不仅现在的常备军，而且现在的民兵，连瑞士的民兵也不例外，都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武装。我认为，这个基本的道理用不着加以说明。只要指出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罢工时都出动军队就够了。

武装资产阶级以反对无产阶级，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最重大、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事实。面对这样的事实，有人竟劝告革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废除武装”的“要求”！这就等于完全放弃阶级斗争的观点和任何革命的念头。我们说：武装无产阶级，以便战胜、剥夺资产阶级，并且解除其武装，——这是革命阶级唯一可行的策略，这种策略是由资本主义军国主义的整个客观发展所准备、奠定和教给的。无产阶级只有把资产阶级的武装解除以后，才能销毁一切武器而不背弃自己的世界历史任务，无产阶级无疑会做到这一点，但只能在那个时候，决不能在那个时候以前。

如果说当前的战争在反动的社会神父和动辄哭泣的小资生产者中间只会引起恐怖和惊慌，只会使他们厌恶一切使用武器的行为，厌恶死亡和流血等等，那么，相反地我们则说：资本主义社会历来就是永无终结的恐怖。如果说当前这场在一切战争中最反动的战争正在进行准备，使这个社会以恐怖而终结，那么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陷于绝望。现在大家都看到，正是资产阶级自己在准备一场唯一正当的革命战争，即反对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废除武装的说教、“要求”（正确些说，是梦想），客观上正是绝望的表现。

如果有谁认为这是一种“灰色的理论”、“干巴巴的理论”，那我们就要提醒他注意两件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实：一方面是托拉斯和妇女从事工厂劳动的作用；另一方面是 1871 年的巴黎公社和俄国 1905 年的十二月起义。

资产阶级的事业就是发展托拉斯，把儿童和妇女赶进工厂，在那里折磨他们，腐蚀他们，使他们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我们不“支持”这种发展，不“要求”这种发展，我们反对这种发展。但是怎样反对呢？我们知道，托拉斯和妇女从事工厂劳动是进步的。我们不愿意倒退到手工业，倒退到垄断前的资本主义和妇女从事家务劳动。要通过托拉斯等等前进，并且要超过它们走向社会主义！

这一论断只要相应地改变一下，就可适用于现在人民的军事化。今天，帝国主义的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不仅使全体人民而且使青年军事化。明天，它也许要使妇女军事化。对此我们回答说：那更好！快点前进吧！军事化进行得愈快，

反对资本主义的武装起义就来得愈快。社会民主党人如果没有忘记巴黎公社的例子，那么怎么会被青年的军事化等等所吓倒而灰心丧气呢？这并不是什么“理论”，也不是什么幻想，而是事实。如果社会民主党人竟无视一切经济的和政治的事实，开始对帝国主义时代和帝国主义战争必然会使这些事实重演表示怀疑，那就真会使人感到绝望。

有一位看到过巴黎公社的资产者，1871年5月曾在一家英国报纸上写道：“如果法兰西民族都是妇女，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民族啊！”⁵在公社时期，妇女和13岁以上的儿童同男子并肩战斗。在未来的推翻资产阶级的战斗中，也不可能不是这样。无产阶级的妇女决不会坐视武装精良的资产阶级去枪杀武装很差或手无寸铁的工人，她们会象1871年那样，再次拿起武器，而且从目前“被吓倒了的”或灰心丧气的民族中，正确些说，从目前与其说是被各国政府破坏不如说是被机会主义者破坏的工人运动中，虽然迟早不定，但无疑会产生一个革命无产阶级的“可怕的民族”的国际同盟。

现在军事化正在深入到全部社会生活中。军事化成为一切。帝国主义就是大国为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而进行的残酷斗争，因此它必然导致包括小国和中立国在内的一切国家的进一步军事化。对此无产阶级的妇女该怎么办呢

只是咒骂任何战争以及和军事有关的一切，只是要求废除武装吗？真正革命的被压迫阶级的妇女，决不会甘心充当这种可耻的角色。她们会对自己的儿子说：“你快长大了。人家会给你枪。你要拿起枪来，好好地学习一切军事方面的东西——这是无产者所需要的，这并不是为了去打自己的兄弟，

象在当前这场掠夺战争中所做的那样，象社会主义的叛徒劝你去做的那样，而是为了反对‘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不是靠善良的愿望，而是用战胜资产阶级和解除它的武装的办法来消灭剥削、贫困和战争。”

谁由于当前的战争而拒绝进行这种宣传——恰恰是这种宣传，——那他就最好干脆别说什么国际革命社会民主运动、社会革命、以战争反对战争的大话。

三

主张废除武装的人反对武装人民，其理由之一就是认为这个要求似乎容易导致对机会主义让步。我们已经考察了废除武装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关系这一最重要的问题。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废除武装的要求同机会主义的关系问题。不能接受这个要求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和它必然产生的幻想会削弱和冲淡我们同机会主义的斗争。

毫无疑问，这个斗争已提上了国际的议事日程。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如果不同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那只是一句空话或欺人之谈。齐美尔瓦尔德⁶和昆塔尔的主要缺点之一，第三国际的这些萌芽可能遭到失败的基本原因之一恰恰在于，关于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问题甚至没有公开地提出，更不用说在必须同机会主义者决裂这个意义上加以解决了。机会主义在欧洲工人运动中暂时取得了胜利。在所有大国中都形成了两个主要的机会主义派别：第一，普列汉诺夫、谢德曼、列金、阿尔伯·托马以及桑巴、王德威尔得、海德门、韩德逊等先生们公开的、无耻的因而危险比较小的

社会帝国主义。第二，隐蔽的、考茨基主义的机会主义，如德国的考茨基—哈阿兹派和“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⁷，法国的龙格、普雷斯曼、迈耶拉等人，英国的拉姆赛·麦克唐纳和“独立工党”⁸的其他首领，俄国的马尔托夫、齐赫泽等人，意大利的特雷维斯和其他一些所谓左派改良主义者。

公开的机会主义公开地直接地反对革命，反对正在开始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爆发，同政府直接结成联盟，尽管这种联盟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从参加政府起到参加军事工业委员会⁹（在俄国）止。隐蔽的机会主义者，即考茨基主义者对于工人运动更有害得多，更危险得多，因为他们用娓娓动听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与“和平”口号，把他们为自己同前一类人结成联盟和实行“统一”作辩护的行为掩盖起来，并且说得头头是道。反对这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斗争，应当在无产阶级政治的一切领域内，即在议会活动、工会、罢工和军事等等领域内进行。这两种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的主要特点就是：对革命的具体问题以及当前战争同革命的联系的一般问题闭口不谈，加以掩盖或者在不触犯警察禁令的条件下“加以回答”。尽管在这场战争之前不久人们曾无数次非正式地指出过并且在巴塞尔宣言¹⁰中又正式明确地指出过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但他们还是这样做！废除武装的要求的主要缺点，恰恰在于它避开了革命的一切具体问题。也许主张废除武装的人赞成进行一种不要武装的完全新式的革命吧？

其次，我们决不反对争取改良的斗争。我们不想忽视这样一种令人失望的可能性，即尽管群众的不满和骚动多次爆

发，尽管我们很努力，但是仍然没有从这场战争中产生革命，在这种最坏的情况下人类还会经历第二次帝国主义大战。我们赞成的是那种也应当反对机会主义者的改良纲领。假如我们把争取改良的斗争完全让给机会主义者，而自己却躲到某种“废除武装”的幻境中去，逃避可悲的现实，那他们只会感到高兴。“废除武装”就是逃避丑恶的现实，而决不是反对这种现实。

在这样的纲领中，我们大概会这样说：“在 1914—1916 年的帝国主义战争中提出保卫祖国的口号，认可保卫祖国，这完全是用资产阶级的谎言去败坏工人运动。”这样具体地回答具体问题，比要求废除武装和拒绝“任何”保卫祖国，在理论上更加正确，对于无产阶级要有益得多，对于机会主义者来说会更加感到难以忍受！我们还可以补充说：“所有帝国主义大国，即英、法、德、奥、俄、意、日、美等国的资产阶级都已经反动透顶了，他们处心积虑地力图统治世界，所以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进行的任何一次战争，都只能是反动的战争。无产阶级不仅应当反对一切这样的战争，而且应当希望‘自己的’政府在这样的战争中遭到失败，并利用这种失败去举行革命起义，——如果以阻止战争为目的的起义没有成功的话。”

关于民兵制问题，我们要说：我们不赞成资产阶级的民兵制，而只赞成无产阶级的民兵制。因此，我们不仅不用一个人和一文钱去帮助常备军，而且不去帮助资产阶级的民兵，即使在美国、瑞士、挪威等这样的国家里也应当如此，况且我们亲眼看到：在最自由的共和国（例如瑞士）内，特别是从

1907年和1911年以来，民兵愈来愈普鲁士化，它已堕落到被用来镇压罢工者。我们可以要求：由人民选举军官，废除一切军法，外国工人和本国工人享有同等权利（这一条对于象瑞士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尤其重要，因为它们无耻地剥削愈来愈多的外国工人，使他们处于无权的地位）；其次，给予国内比如每一百居民以建立学习军事的自由团体的权利，自由选举教官，由国家支付薪金，等等。只有这样，无产阶级才能真正为自己而不是为奴隶主去学习军事，而这是完全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的。俄国革命证明，革命运动的任何一次胜利，哪怕是局部的胜利，比如夺取了某个城市、某个工厂区、某一部分军队等等，都必然迫使胜利了的无产阶级恰恰要实现这样的纲领。

最后，单靠纲领当然永远不能战胜机会主义，要战胜它只能用行动。破产了的第二国际的一个最大的和致命的错误就在于，人们言行不符，昧着良心提倡虚伪和讲革命空话（请看考茨基之流今天对待巴塞尔宣言的态度）。废除武装作为一种社会思想，是由一定的社会环境产生的，并且能够影响社会环境，而不仅是某个人的古怪想法，显然，这种思想来源于个别小国的狭小的、例外的“安静”生活条件，这些国家置身于世界的流血战争之外，并且希望这样继续下去。且看挪威那些主张废除武装的人的论点：我们国小兵少，我们无法反对大国（因此也就无法反对别人强迫我们去同某一大国集团结成帝国主义联盟……），我们希望在自己的偏僻的一隅安安静静地过日子，执行与世无争的政策，我们要求废除武装，成立有约束力的仲裁法庭，保持“永久”（大概是比利时

那样的吧?)中立等等。

小国想站在一旁；小资产阶级企图远远离开世界上的大搏斗，利用自己的某种垄断地位来维持消极守旧的状态，——这就是使废除武装的思想能够在某些小国内收到一定的成效并得以传播的客观社会环境。当然，这种企图是幻想的和反动的，因为帝国主义总是要把小国卷进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漩涡。

试以瑞士为例。它的帝国主义环境客观上决定了工人运动的两条路线：机会主义者力图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把瑞士变成一个民主共和制的联盟，以便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游客身上捞取利润，并且得心应手地、安静地保持这种“安静的”垄断地位。我们瑞士的真正社会民主党人则力图利用瑞士的相对的自由和“国际”地位，来帮助欧洲各国工人政党中革命分子的亲密联盟获得胜利。值得庆幸的是瑞士没有“自己独立的”语言，而是讲三种世界语言，即与它毗邻的各交战国的语言。如果瑞士党的两万个党员每周都能交纳两个生丁的“战时特别税”，那我们每年就能得到两万法郎，——这个数目就足以使我们用三种语言为各交战国的工人和士兵定期出版各种印刷品，并且不顾各国总参谋部的禁令广为散发，说明关于工人日益愤慨、他们在战壕中联欢、他们希望用革命方式利用武器去反对“自己的”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等等事实真相。

这一切都不是什么新奇的事情。象《哨兵报》¹¹、《民权报》¹²、《伯尔尼哨兵报》¹³这几家优秀的报纸都已经在这样做，只可惜还做得不够。只有通过这样的活动，阿劳党

代表大会 14 的出色的决议才不致仅仅是一个出色的决议。只要提出一个问题就够了：“废除武装”的要求是不是符合社会民主党工作的这种方针？

显然，不符合。废除武装客观上符合工人运动中机会主义的、狭隘民族的、受小国眼界限制的路线。废除武装客观上是小国地地道道民族的、特殊民族的纲领，而决不是国际革命社会民主党的国际性的纲领。

写于 1916 年 9 月

根据德文报纸译成俄文

1917 年 9 月和 10 月第

刊印

一次载于《青年国际》第

选自《列宁全集》第 23 卷

9 期和第 10 期

第 73-84 页

署名：弗·伊林

1929 年俄译文第一次载

于《列宁全集》第 2、3 版

第 19 卷

注 释

- 1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继《论欧洲联邦口号》一文之后，再次表述了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或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这个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同时也进步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的原理。

《无产阶级革命的军事纲领》一文于1916年9月用德文写成，原拟在斯堪的那维亚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刊物上发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左派社会民主党人反对社会民主党党纲中“人民武装”的条文，并提出了“废除武装”的错误口号。1916年12月，本文经过修改后以《论“废除武装”的口号》为题载于《社会民主党人文集》第2卷（见《列宁全集》第23卷第92-102页）。

1917年4月，列宁在回俄国前不久，曾将这篇文章的德文原稿交给《青年国际》杂志编辑部。文章载于1917年该杂志第9期和第10期。

《青年国际》杂志（《Jugend-Internationale》）是靠拢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国际社会主义青年组织联合会的机关刊物，1915年9月至1918年5月在苏黎世出版。威·明岑贝格任编辑。列宁对它的评价，见《青年国际（短评）》一文（见本书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序言和第一部分）。

- 2 罗·格里姆拟的关于军事问题的提纲。该提纲载于1916年7月14日和17日《格留特利盟员报》第162号和第164号。由于瑞士被卷入战争的危險日益增大，瑞士社会民主党内就对战争的态度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根据瑞士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1916年4月的委托，该党著名活动家格里姆、古·弥勒、沙·奈恩、保·伯·普夫吕格尔等分别在《伯尔尼哨兵报》、《民权报》、《格留特利盟员报》上发表文章或提纲，表明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见解。列宁密切注视这场争论的发展。他对争论材料的

批注，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17卷。

- 3 《新生活》杂志(《Neues Leben》)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刊物，1915年1月在伯尔尼创刊，1917年12月停刊。该杂志宣传齐美尔瓦尔得右派的观点，从1917年初起，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

《先驱》(《Vorbote》)是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理论性机关刊物，1916年在伯尔尼用德文出版，共出了两期：第1期于1916年1月出版，第2期于1916年4月出版。该杂志曾刊载列宁的著作《机会主义和第二国际的破产》和《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自决权(提纲)》。

- 4 见本书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注9。

- 5 这段话见于1871年5月英国《每日新闻报》，普·奥·利沙加勒《1871年公社史》曾经引用(见该书1962年三联书店版第211页)。

- 6 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和第二次代表会议。国际社会党第一次代表会议(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于1915年9月5—8日在瑞士的齐美尔瓦尔德举行。这次会议是根据意大利和瑞士社会党人的倡议召开的。出席代表会议的有德国、法国、意大利、俄国、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瑞典、挪威、荷兰和瑞士等11个欧洲国家的38名代表。第二国际的两个最大的党——德国社会民主党和法国社会党没有正式派代表参加会议；来自德国的10名代表代表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3个不同色彩的反对派；来自法国的代表是工会运动中的一些反对派分子。巴尔干社会主义联盟、瑞典社会民主党反对派和挪威青年联盟、荷兰左派社会党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也派代表出席了代表会议。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中，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和尔·马尔托夫代表孟什维克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委员会，维·米·切尔诺夫和马·安·纳坦松代表社会革命党。出席会议的大多数代表持中派立场。代表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各国代表的报告；德国和法国代表的共同声明；齐美尔瓦尔德

左派关于通过原则决议的建议；通过宣言；选举国际社会党委员会；通过对战争牺牲者和受迫害者表示同情的决议。列宁积极参加了代表会议的工作，并在会前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曾在1915年7月起草了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决议草案（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6卷第294—296页），并寄给各国左派征求意见。他还曾写信给季·布拉戈耶夫、戴·怀恩科普等人，阐述左派共同声明的基本原则，即：谴责社会沙文主义派和中派，断然拒绝在帝国主义战争中“保卫祖国”和“国内和平”的口号，宣传革命行动。在代表会议前夕，9月2日和4日之间，俄国和波兰两国代表举行了会议，讨论了列宁起草的决议草案和卡·拉狄克起草的决议草案，决定在代表会议提出按列宁意见修改过的拉狄克草案。9月4日，参加代表会议的左派代表举行了非正式会议，列宁在会上作了关于世界战争的性质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策略的报告。会议通过了准备提交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在代表会议上，以列宁为首的革命的国际主义者同以格·累德堡为首的考茨基主义多数派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代表会议通过了专门委员会起草的宣言——《告欧洲无产者书》。代表会议多数派否决了左派提出的关于战争与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的决议草案和宣言草案。但是，由于列宁的坚持，在会议通过的宣言中还是写进了一些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会议还通过了德法两国代表团的共同宣言，通过对战争牺牲者和因政治活动而遭受迫害的战士表示同情的决议，选举了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领导机关国际社会党委员会。列宁在《第一步》和《1915年9月5—8日国际社会党代表会议上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者》两篇文章中，对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布尔什维克在会上的策略作了评价（同上，第27卷第42—52页）。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昆塔尔会议）于1916年4月24日在伯尔尼开幕，以后的会议于4月25—30日在瑞士的一个山村昆塔尔举行。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波兰、塞尔维亚和葡萄牙等国的40多名代表。出席会议的俄国代表是：以列宁为首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3名代表、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的2名代表和社会革命党人左翼的3名代表。代表会议讨论了下列问题：为结束战争而斗争；无产阶级对和平问题的态度；鼓动和宣传；议会活动；群众斗争；召集社会党国际

局。由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会议前做了大量工作，左翼力量在这次会议上比在齐美尔瓦尔德会议上有所增强。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参加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有“德国国际社会党人”小组的1名代表、“国际”派的两名代表、法国社会党人昂·吉尔波、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特·卡茨列罗维奇、意大利社会党人扎·梅·塞拉蒂。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昆塔尔会议上共有代表12名，而在某些问题上可以获得12—19票，即几乎占了半数，这反映了国际工人运动中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国际主义者的变化。在昆塔尔会议期间，列宁主持了一系列左派会议，讨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向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提出的提案》。列宁成功地把左派团结了起来，以便在会议上同考茨基主义多数派进行共同的、有组织的斗争。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制定并提出了和平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草案包括了列宁的基本原则。代表会议的右派多数被迫在一系列问题上追随左派，但他们继续反对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会议围绕对召集社会党国际局的态度问题展开了极其激烈的斗争，列宁参加了关于召集社会党国际局问题的委员会。经过左派的努力，会议对一项谴责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但不反对召集社会党国际局的决议作了如下补充：社会党国际局一旦召集，即应召开国际社会党扩大委员会来讨论齐美尔瓦尔德联盟代表的共同行动的问题。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为争取和平而斗争问题的决议，并通过了《告遭破产和受迫害的人民书》。由于法国议会党团少数派投票赞成军事拨款，齐美尔瓦尔德左派在代表会议上发表声明，指出这种行为同社会主义、同反战斗争是不相容的。尽管昆塔尔会议没有通过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使“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在战争中失败、建立第三国际等布尔什维主义的基本原则，列宁认为这次代表会议的工作仍然是前进的一步。昆塔尔会议促进了国际主义分子的团结。这些国际主义分子后来组成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的核心。

- 7 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工作小组”）是德国的中派组织，由一些脱离了社会民主党国会党团的议员组成，1916年3月成立。领导人为胡·哈阿兹、格·累德堡和威·迪特曼。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曾出版《活页文选》，1916年4月以前还在《前进报》编辑部中占优势。中派分子被排除出《前

进报》以后，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把在柏林出版的《消息小报》作为自己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工作小组得到柏林党组织中多数人的支持，是1917年4月成立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基本核心。

- 8 独立工党是英国改良主义政党，1893年1月成立。领导人有凯尔-哈第、拉·麦克唐纳、菲·斯诺登等。党员主要是“新工联”和一些老工会的成员以及受费边派影响的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分子。独立工党从建党时起就采取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把主要注意力放在议会斗争和同自由主义政党进行议会交易上。列宁称它是始终依附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政党。1900年，该党作为集体党员加入工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党领袖采取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立场。
- 9 军享工业委员会是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为了帮助沙皇政府进行战争于1915年在俄国成立的。资产阶级为了使工人接受自己的影响，向他们灌输护国主义的情绪，在军事工业委员会下面成立了“工人团”，吸引工人代表参加这些团体，以便鼓动工人群众提高军事工厂的劳动生产率。孟什维克积极参加资产阶级策划的这种冒牌的爱国主义的勾当，布尔什维克则宣布抵制军事工业委员会，并且在大多数工人的支持下胜利地进行了抵制。
- 10 巴塞尔宣言即1912年11月24—25日在瑞士巴塞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一致通过的《国际局势和社会民主党反对战争危险的统一行动》决议，列宁所引的德文本称《国际关于目前形势的宣言》。宣言谴责了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备战活动，揭露了即将到来的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号召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宣言写进了1907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决议中列宁提出的基本论点：帝国主义战争一旦爆发，社会党人就应该利用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加速资本主义的崩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94]。
- 11 《哨兵报》（《LaSentinelle》）是纳沙泰尔州（瑞士法语区）瑞士社会民

党组织的机关报，1890年创刊于绍德封。1906—1910年曾停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持国际主义立场。1914年11月13日该报第265号曾摘要发表了俄国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宣言《战争和俄国社会民主党》。——[97]。

- 12 《民权报》（《*Volksrecht*》）是瑞士社会民主党、苏黎世州社会民主党组织和苏黎世工人联合会的机关报（日报），1898年在苏黎世创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刊登过一些有关工人运动的消息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文章。——[97]。
- 13 《伯尔尼哨兵报》（《*Berner Tagwacht*》）是瑞士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893年创刊于伯尔尼。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该报曾发表过卡·李卜克内西、弗·梅林以及其他一些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文章。从1917年起，该报公开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后来该报采取了反共反民主的立场。
- 14 1915年11月20—21日在阿劳举行的瑞士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瑞士社会民主党对齐美尔瓦尔德联盟的态度问题。围绕这个问题，瑞士社会民主党内的三派——反齐美尔瓦尔德派（赫·格雷利希、保·伯·普夫吕格尔等）、齐美尔瓦尔德右派的拥护者（罗·格里姆、厄·保·格拉贝等）和齐美尔瓦尔德左派的拥护者（弗·普拉滕、恩·诺布斯等）——展开了斗争。格里姆提出了一个决议案，建议瑞士社会民主党加入齐美尔瓦尔德联盟并赞同齐美尔瓦尔德右派的政治路线。瑞士左派社会民主党人以洛桑支部名义对格里姆的决议案提出修正案，建议承认展开群众性的反战革命斗争是必要的，并声明只有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才能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在格里姆的压力下，洛桑支部撤回了这个修正案，可是由瑞士社会民主党的一个组织选派参加代表大会并拥有表决权的布尔什维克莫·马·哈利东诺夫重新把它提了出来。格里姆及其拥护者从策略上考虑支持了修正案。结果，左派的修正案以258票对141票的多数被通过。

列 宁

国家与革命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
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¹（节录）

初 版 序 言

国家问题，现在无论在理论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资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国家同势力极大的资本家同盟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骇人听闻的压迫愈来愈骇人听闻了。各先进国家（我们指的是它们的“后方”）变成了工人的军事苦役监狱。

旷日持久的战争造成的空前惨祸和灾难，使群众生活痛苦不堪，使他们更加愤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正在显著地发展。这个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已经具有实践的意义了。

在几十年较为和平的发展中积聚起来的机会主义成分，造成了在世界各个正式的社会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流派。这个流派（在俄国有普列汉诺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娅、鲁巴诺维奇以及以稍加掩饰的形式出现的策列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在德国谢德曼、列金、

大卫等；在法国和比利时有列诺得尔、盖得、王德威尔得；在英国海有海德门和费边派²，等等）是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沙文主义，其特点就在于这些“社会主义领袖”不仅对于“自己”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正是对于“自己”国家的利益，采取卑躬屈膝的迎合态度，因为大多数所谓大国早就在剥削和奴役很多弱小民族。而帝国主义战争正是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这种赃物而进行的战争。如果不同“国家”问题上的机会主义偏见作斗争，使劳动群众摆脱资产阶级影响、特别是摆脱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影响的斗争就无法进行。

首先，我们要考察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特别详细地谈谈这个学说被人忘记或遭到机会主义歪曲的那些方面。其次，我们要专门分析一下歪曲这个学说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在这次战争中如此可悲地遭到破产的第二国际（1889—1914年）的最著名领袖卡尔·考茨基³。最后，我们要给俄国1905年革命、特别是1917年革命的经验，作一个基本的总结。后面这次革命的第一个阶段看来现在（1917年8月初）正在结束，但整个这次革命只能认为是帝国主义战争引起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链条中的一个环节。因此，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不仅具有政治实践的意义，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义，这个问题是要向群众说明，为了使自己从资本的枷锁下解放出来，他们在最近的将来应当做些什么。

作 者

1917年8月

第二版序言

本书第二版几乎没有变动，仅在第二章中增加了第三节。

作者

1918年12月17日于莫斯科

第一章

阶级社会和国家

1. 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

马克思的学说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各被压迫阶级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领袖的学说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现在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作这种“修琢”的事情上正一致起来。他们忘记、抹杀和歪曲这个学说的革命方面，革命精神，把资产阶

级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颂扬。现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可别小看他们！）那些德国的资产阶级学者，昨天还是摧残马克思主义的专家，现在却愈来愈频繁地谈论起“德意志民族的”马克思来了，仿佛马克思培育出极有组织的工人联合会是为了进行掠夺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在歪曲马克思主义的风气空前流行的时候，我们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真正的马克思的国家学说。为此，必须大段大段地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当然，大段的引证会使文章冗长，不通俗，但是没有这样的引证是绝对不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论到国家问题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地方，一定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证，方面使读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的全部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发展有一个独立的概念，同时也可以确凿地证实并清楚地指明现在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

我们现在先从传播最广的弗·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讲起，这本书于1894年在斯图加特印行了第六版。我们必须根据德文原著来译出引文，因为俄文译本虽然很多，但多半译得不完全，或者译得很糟。

恩格斯在总结他所做的历史的分析时说：“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象黑格尔所断言的是‘伦理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

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德文第6版第177-178页》⁴

这一段话已经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及其意义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达到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来说，国家的存在表明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

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和根本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开始受到了来自两个主要方面的歪曲。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会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论家们看来（而且往往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话作根据！），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手段和斗争方式。

例如，当1917年革命中国家的意义和作用问题正好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成为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即立刻行动而且是大规模行动的问题的时候，全体社会革命党人⁵和孟什维克下子就完全滚到“国家”“调和”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理论方面去了。这两个政党的无数决议和他们的政治家的许多论文，都浸透了这种市侩的庸俗的“调和”论。至于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这个阶级决不能与同它对立的一方（同它对抗的阶级）调和，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始终不能了解的。在对待国家的态度上，再明显不过地表明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布尔什维克向来就这样说），而是唱着貌似社会主义高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巧妙得多了。“在理论上”，它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它忽视或抹杀了以下一点：既然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既然它是驾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那末很明显，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不仅非进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灭统治阶级所建立的、体现这种“脱离”的国家政权机构不可。这个结论在理论上是不言而喻的，下面我们会看到，这是马克思对革命的任务做了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后得出的绝对肯定的结论。正是这个结论被考茨基（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证明）……“忘记”和歪曲了。

2. 特殊的武装队伍，监狱等等

恩格斯继续说……“国家和旧的氏族（或克兰）组

织⁶不同的地方，第一点就是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

我们现在看来，这种划分是“很自然”的，但这是同宗族或氏族的旧组织进行长期斗争才获得的。

……“第二个不同点，是社会权力的设立，这种权力已不再同自己组织为武装力量的居民直接符合了。这个特殊的社会权力之所以需要，是因为自从社会分裂为阶级以后，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已经成为不可能了……这种社会权力在每一个国家里都存在。构成这种权力的，不仅有武装的人，而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和各种强制机关，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克兰〉社会制度所没有的”⁷……

恩格斯在这里阐明了被称为国家的那个“力量”的概念，即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的概念。这种力量主要是指什么呢？主要是指拥有监狱等等的特殊的武装队伍。

应该说这是特殊的武装队伍，因为任何国家所具有的社会权力已经“不再直接符合”武装的居民，即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了。

同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一样，恩格斯竭力促使觉悟工人注意的东西，正是盛行的庸俗观念认为最不值得注意，最习以为常，而被根深蒂固的、可说是顽固不化的偏见奉为神圣的那些东西。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强力工具，但是——难道可能不是这样吗？

十九世纪末叶，绝大多数欧洲人认为，这是不能不这样

的。恩格斯的话正是对这些人说的。他们没有经历过，也没有亲眼看到过一次伟大的革命。他们完全不 了解，什么是“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对于为什么要有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使自己同社会脱离的特殊武装队伍（警察、常备军）这个问题，西欧和俄国的庸人总是喜欢借用斯宾塞或米海洛夫斯基的几句话来答复，说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复杂化、职能分化等等。

这种说法似乎是“科学的”，而且最能迷惑庸人，掩盖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这个主要的基本的事实。

如果没有这种分裂，“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同使用棍棒的猿猴群、或原始人、或组成克兰社会的人们的原始组织比较起来，只是在复杂的程度上、技术的高明上有所不同，但这样的组织是可能有的。

这样的组织所以成为不可能，是因为文明社会已分裂为敌对的而且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如果这些阶级都有“自动的”武装，那在它们之间就一定会展开武装斗争。于是国家形成了，特殊的力量、特殊的武装队伍建立起来了。每当革命破坏国家机构的时候，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是如何力图恢复替它服务的特殊武装队伍，被压迫阶级又是如何力图建立一种不替剥削者服务，而替被剥削者服务的新型的同类组织。

上面恩格斯从理论上提出的问题，正是每次大革命在实践中明显地而且是以大规模行动提到我们面前的问题，即“特殊”武装队伍同“居民的自动的武装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我们在下面会看到，欧洲和俄国历次革命的经验

是怎样具体地说明这个问题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恩格斯的论述

他指出，有的时候，如在北美某些地方，这种社会权力是薄弱的（这里指的只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罕见的例外，以及在帝国主义以前时期北美那些自由垦殖者占多数的地方），但一般说来，它是在加强：

……“随着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化，随着彼此相邻的各国的扩大和它们人口的增加，社会权力就日益加强。就拿我们今天的欧洲来看吧，在这里，阶级斗争和侵略竞争已经把社会权力猛增到势将吞食整个社会甚至吞食国家的高度”⁸……

这段话至迟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写的。恩格斯最后的序言⁹写于1891年6月16日。当时向帝国主义的转变，无论就托拉斯的完全统治或大银行的无限权力或大规模的殖民政策等等来说，在法国还是刚刚开始，在北美和德国更要差一些。此后，“侵略竞争”前进了一大步，尤其因为到了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初期，世界已被这些“互相竞争的侵略者”，即巨大的强盗国家瓜分完了。从此海陆军备无限增长，1914年至1917年由于英德两国争夺世界霸权和由于瓜分赃物而进行的强盗战争，使强盗国家政权对社会一切力量的“吞食”，接近于彻底崩溃的地步。

恩格斯在1891年就已指出，“侵略竞争”是各大强国对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社会沙文主义的恶棍们在1914年至1917年，即正是这个竞争加剧了许多倍而引起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却用“保卫祖国”、“保卫共和国和革

命”等等词句来掩盖他们维护“自己”资产阶级强盗利益的行为!

3. 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为了维持驾于社会之上的特殊社会权力，就需要捐税和国债。

恩格斯说：“官吏既然掌握着社会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驾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于氏族(克兰)社会机关的那种自由的、自愿的尊敬，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于是制定了官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别法律。“一个最微不足道的警察”却有大于克兰代表的“权威”，然而，即使是文明国家掌握军权的首脑，也会对“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社会“尊敬”的克兰首领表示羡慕。¹⁰

这里提出了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官吏的特权地位问题。指出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究竟什么东西使他们居于社会之上？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这个理论问题在1871年如何被巴黎公社实际地解决了，而在1912年又如何被考茨基反动地抹杀了。

……“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不仅

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是剥削奴隶和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也“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也例外地有这样的时期，那时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致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¹¹……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的专制君主制，法兰西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波拿巴主义¹²，德国俾斯麦¹³时代，都是如此。

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共和制俄国的克伦斯基政府，在开始压迫革命无产阶级以后，在苏维埃由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而已经软弱无力，资产阶级又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直接解散它的时候，也是如此。

恩格斯继续说，在民主共和国内，下“财富是间接地但也是更可靠地运用它的权力的”，它所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和交易所结成联盟”（法国和美国）。¹⁴

目前，任何最民主的共和国中的帝国主义和银行统治，都把这两种维护和实现财富的无限权力的方法“发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国实行民主共和的头几个月里，也可以说是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这两种“社会主义者”同资产阶级联姻的蜜月期间，帕尔钦斯基先生在联合政府¹⁵中实行怠工，不愿意实施遏止资本家、制止他们进行掠夺和借军事订货盗窃国库的种种措施，在帕尔钦斯基先生退出内阁以后（接替他的自然是同他一模一样的人），资本家“奖赏”给他年薪十二万卢布的肥缺，试问这究竟是怎么

一回事呢？是直接的收买，还是间接的收买？是政府同辛迪加勾结，还是“仅仅”是一种友谊关系？切尔诺夫、策烈铁里、阿夫克森齐也夫、斯柯别列夫之流究竟起着什么作用？他们是盗窃国库的百万富翁的“直接”同盟者，还是仅仅是间接的同盟者？

“财富”的无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下之所以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赖资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二掌握（通过帕尔钦斯基、切尔诺夫、策烈铁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

还应该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认为，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他显然是估计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长期经验，他说普选制是

“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¹⁶。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及其同胞兄弟西欧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却正是期待从普选制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他们自己相信而且要人民也相信这种荒谬想法，似乎普选制“在现今的国家里”真正能够体现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并保证实现这种意志。

我们在这里只是指出这种荒谬的想法，只是指出，恩格斯这个十分明确而具体的说明，经常在“正式的”（即机会主

义的)社会党的宣传鼓动中遭到歪曲。至于恩格斯在这里所唾弃的这种想法的全部虚伪性,我们在下面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今的”国家的看法时,还会详细地加以阐明。

恩格斯在他那部最通俗的著作中,把自己的看法总结如下:

“所以,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¹⁷

这一段引文在现代社会民主党的宣传鼓动书刊中很少看到,即使引用也多半是为了崇拜偶像,也就是说,为了正式表示对恩格斯的尊敬,而丝毫不想考虑一下,先要经过怎样广泛而深刻的革命,才能“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古物陈列馆去”。甚至他们往往不懂恩格斯说的国家机器究竟是什么。

4. 国家“自行消亡”和暴力革命

恩格斯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话是非常著名的,经常

有人引证，它清楚地表明了目前流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把戏的本质，因此我们必须详细地加以说明。现在我们把这句话的出处的那一整段论述转录如下：

“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迄今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劳动制）。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任何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现代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以及由此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都消失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了。国家真正作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所采取的最后一个行动，即以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同时也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中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

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当以此来衡量‘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个用语，这个用语在鼓动的意义上暂时有存在的理由，但归根到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以此来衡量所谓无政府主义者提出的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¹⁸ [《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德文第3版第301—303页]

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在恩格斯这一段思想极其丰富的论述中，只有马克思提出的与无政府主义关于“废除”国家的学说不同的一点，即国家是“自行消亡”的这一点，被现代社会党当做社会主义思想真正接受下来了。这样来割裂马克思主义，无异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机会主义，因为这样来“解释”，就只会留下一个模糊的观念，似乎只有缓慢的、平静的、逐渐的变化，而没有飞跃和风暴，没有革命。对国家“自行消亡”最普遍、最流行、最大众化的（如果能这样说的话）理解，无疑是抹杀革命，甚至是否认革命。

但是，这样的“解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粗暴的歪曲，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从理论上说，产生这种歪曲的根源就是忘记了我们上面全部摘引的恩格斯的“总结性”论述中也指出的极重要的情况和观点。

第一、恩格斯在这段论述中一开始就说，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这样一来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这是什么意思，人们是“照例不”思索的，他们不是完全忽略这一点，就是认为这是恩格斯的“黑格尔主义的毛病”。其实这句话扼要地表明了最伟大的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即

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详细地加以论述。实际上恩格斯在这里所讲的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而他讲的消亡是指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残余。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是不会“自行消亡”的，而要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来“消灭”它。在这个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或半国家。

第二、国家是“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恩格斯这个出色的极其深刻的定义在这里是说得十分清楚的。从这个定义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即一小撮富豪对千百万劳动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应该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这就是“消灭作为国家的国家”。这就是以社会名义占有生产资料的“行动”。显然，以无产阶级的“特殊力量”来代替资产阶级的“特殊力量”，这样一种更替是决不能靠“自行消亡”来实现的。

第三、恩格斯所说的“自行消亡”，甚至更明显更鲜明地说的“自行停止”，是十分明确而肯定地指“国家以整个社会的名义占有生产资料”以后的事，即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事。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时“国家”的政治形式是最完全的民主。但是那些无耻地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却没有一个人想到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就是民主的“自行停止”和“自行消亡”。乍看起来，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只有那些没有想到民主也是国家、在国家消失时民主也会消失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不可理解”的。资产阶级的国

家只有革命才能“消灭”。国家，指最完全的民主，只能“自行消亡”

第四、恩格斯在提出“国家自行消亡”这个著名的原理以后，立刻就具体地说明这一点是既反对机会主义者又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但恩格斯放在首位的，是从这个原理中得出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结论。

可以担保，在一万个读过或听过国家“自行消亡”的论述的人中，有九千九百九十人完全不知道或不记得恩格斯从这个原理中得出的结论不仅是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其余的十个人中可能有九个人不懂得什么是“自由的人民国家”，不懂得为什么反对这个口号就是反对机会主义者。历史就是这样记载的！伟大的革命学说就是这样被人偷偷地改成了流行的庸人主义！人们千百次地重复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结论，把它庸俗化并且极其简单地装到头脑中去，形成了固执的偏见。而反对机会主义者的结论，却被抹杀和“忘记”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是七十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纲领性要求和流行口号。这个口号只是市偿式地夸大了民主的概念，没有丝毫政治内容。既然人们当时可以合法地利用这个口号来暗示民主共和国，恩格斯也就从鼓动的观点同意“暂时”替这个口号“辩护”。但这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口号，它不仅起了粉饰资产阶级民主的作用，而且表现出不懂得社会主义对任何国家的批评。我们赞成民主共和制，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国家形式，但是，我们决不应该忘记，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其次，任何国家

都是对被压迫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在七十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向他们党内的同志解释这一点。

第五、在恩格斯这本著作中，除了大家记得的关于国家自行消亡的论述以外，还谈到了暴力革命的意义。恩格斯对于暴力革命的作用的有历史意义的评价成了对暴力革命的真正颂扬。但是，“谁都不记得”这一点，这个思想的意义在现代社会党内是照例不谈、甚至照例不想的，这些思想在群众中进行的日常宣传鼓动中也不占任何地位。其实，这些思想同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论是密切联系的，是一个严密的整依。

请看恩格斯的论述：

……“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除作恶以外〉即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死硬化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关于这些，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没有提到。他只是带着叹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性：为了推翻进行剥削的经济，也许需要暴力——你们看，真遗憾！——因为暴力的任何应用，据说都会使应用暴力的人道德堕落。尽管在每次革命胜利以后，道德和思想都有显著的提高，他还要这么说！而且这话是在德国说的，在那里，人民可能被迫进行的暴力冲突，至少有一个好处，即扫除三十年战争的屈辱在民族意识中造成的奴才气。而这种没有生气、萎靡不振、软弱无力的僧侣思想，竟要历史上最

革命的政党来接受!”¹⁹（《反杜林论》德文第 3 版第 193 页，第 2 编第 4 章末）

怎样才能把恩格斯从 1878 年起至 1894 年即快到他逝世的时候为止，一再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颂扬暴力革命的论点，同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论结合在一个学说里呢？

人们往往用折衷主义，用无原则地或诡辩式地任意（或者为了讨好当权者）强调前者或后者的办法把它们结合起来，而且在一百次中有九十九次（如果不是更多的话）正是把“自行消亡”论摆在首位。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这就是目前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书刊中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的最常见最普遍的现象。这种做法，自然并不新奇，甚至在希腊古典哲学史上也是常见的。把马克思主义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辩证法是最容易欺骗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发展的一切趋势，一切相互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并没有对社会发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的解释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说是针对资产阶级国家说的，在下面我们还要更详尽地说明这一点。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颂扬同马克思的屡次声明完全符合（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这两部著作的结尾部分²⁰，曾自豪地公开声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我们还可以回忆一下，约在三十年以后，

马克思在 1875 年批判哥达纲领²¹的时候，曾无情抨击了这个纲领表现的机会主义），这种颂扬决不是“迷恋”，决不是夸张，也决不是论战伎俩。必须不断地教育群众**这样来认识而且正是这样来认识暴力革命**，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学说的基础**。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流派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学说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现在这两个流派都把**这方面的宣传和鼓动**忘记了。

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非通过暴力革命不可。无产阶级国家的消灭，即任何国家的消灭，只能通过“自行消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每一个革命形势，分析每一个革命的经验教训时，总是详细而具体地发挥了他们的**这些见解**。我们现在就来谈谈他们学说中这个最重要的部分。

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 1848—1851 年的经验

1. 革命的前夜

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头两部著作《哲学的贫困》和《共

产党宣言》，恰巧是在 1848 年革命前夜写成的。由于这种情况，这两部著作除了叙述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具体的革命形势。因此，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两部著作的作者从 1848—1851 年革命的经验作出结论以前不久关于国家问题的言论，也许更为恰当。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写道：“……工人阶级在发展进程中将创造一个消除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联合体来代替旧的资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部阶级对立的正式表现。”²²（1885 年德文版第 182 页）

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个月以后（1847 年 11 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下面的论述，同这一段关于国家在阶级消灭之后消失的思想的一般论述对照一下，是颇有教益的：

“……在叙述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一般的阶段的时候，我们循序探讨了现存社会内部或多或少隐蔽着的国内战争，直到这个战争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无产阶级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自己的统治……”

……前面我们已经看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转化成（直译是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²³（1906 年德文第 7 版第 31 页和第 37 页）

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一个最卓越最

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开始这样说）²⁴ 这个思想的表述，其次我们还看到给国家下的一个非常引人注意的定义，这个定义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国家的这个定义，在正式社会民主党的占支配地位的宣传鼓动书刊中不仅从来没有解释过，而且恰巧被人忘记了，因为它同改良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它直接打击了“民主的和平发展”这种常见的机会主义偏见和市侩的幻想。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说马克思的学说就是如此，但是“忘记”补充：马克思认为，第一，无产阶级所需要的只是逐渐消亡的国家，即组织得能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国家是特殊的强力组织，是镇压某一个阶级的暴力组织。无产阶级要镇压的究竟是哪一个阶级呢？当然只是剥削阶级，即资产阶级。劳动者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而能够领导和实行这种镇压的只有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是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是唯一能够团结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对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把资产阶级完全铲除的阶级。

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维持剥削，也就是为了极少数人的私利，去反对绝大多数人。被剥削阶级需要政治统治是为了彻底消灭一切剥削，也就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去反对极少数的现代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这些用阶级妥协的幻想来代替阶级斗争的假社会主义者，对社会主义改造也想入非非，他们不是把改造想象为推翻剥削阶级的统治，而是想象为少数和平地服从那已经理解到本身任务的多数。这种小资产阶级空想同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观点有密切的联系，它在实践中导致出卖劳动阶级的利益，法国 1848 年革命和 1871 年革命的历史就表明了这一点，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英、法、意和其他国家的“社会党人”参加资产阶级内阁的经验也表明了这一点。

马克思一生都在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即目前在俄国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复活起来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马克思把阶级斗争学说一直贯彻到政权学说、国家学说之中。

只有无产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特殊阶级，它的生存的经济条件为它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作了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在分离和分散农民及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层的同时，却使无产阶级团结、联合和组织起来。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经济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的领袖，这些被剥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摧残比起无产阶级来往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他们不能为自己的解放独立地进行斗争。

阶级斗争学说经马克思运用到国家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必然导致承认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无产阶级的专政，即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

无产阶级转化成统治阶级，从而能把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拼死反抗镇压下去，并组织一切被剥削劳动群众去建立新的经济结构，才能推翻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中央集权的强力组织，暴力组织，既是为了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也是为了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者来“调整”社会主义经济。

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也就是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指导并组织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剥削劳动者在不要资产阶级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设自己社会生活的事业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领袖。反之，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机会主义却把工人的党教育成为一群脱离群众而代表工资优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²⁵，也就是放弃那领导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领袖作用。

“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马克思的这个理论同他关于无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无产阶级实行政治统治。

既然无产阶级需要国家这样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特殊暴力组织，那么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结论：不预先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为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根本就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组织！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接近于得出这个结论，马克思在总结 1848—1851 年革命的经验时也就谈到了这个结论。

2. 革命的总结

关于我们感到兴趣的国家问题，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总结 1848—1851 年的革命时写道：

“……然而革命是彻底的。它还处在通过涤罪所²⁶的历程中。它在有条不紊地完成自己的事业。1851 年 12 月 2 日（路易·波拿巴政变的日子）以前，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前一半预备工作，现在它在完成另一半。它先使议会权力臻于完备，为的是能够推翻这个权力。现在，当它已达到这一步时，它就来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使它表现为最纯粹的形式，使它孤立，使它成为和自己对立的唯一的对象，以便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权力（黑体是我们用的）。而当革命完成自己这后半一半准备工作的时候，欧洲就会站起来欢呼说：掘得好，老田鼠！”²⁷

这个行政权力有庞大的官僚和军事组织，有复杂而巧妙的国家机器，有 50 万人的官吏队伍和 50 万人的军队，——这个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堵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专制君主制时代，在封建制度崩溃时期产生的，同时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第一次法国革命发展了中央集权，“但是它同时也就扩大了政府权力的容量、职能和帮手的数目。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并没有增添什么新的东西，不过是扩大了分工……”

……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它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而外，还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和集中化。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黑体和着重号是我们用的）。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²⁸（《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907年汉堡第4版第98—99页）

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精彩的论述里，与《共产党宣言》相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那里，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只用了最一般的概念和说法。在这里，问题提得具体了，并且作出了非常准确、明确、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都是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而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正是这个基本的东西，不仅被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社会民主党完全忘记了，而且被第二国际最著名的理论家卡·考茨基公然歪曲了（这点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

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历史作了一般的总结，使人们认识到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还使人们得出这样一个必然的结论：无产阶级如果不先夺取政权，不取得政治统治，不把国家变为“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就不能推翻资产阶级；这个无产阶级国家在它取得胜利以后就会立刻开始消亡，因为在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里，国家是不需要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这里还没有提出究竟应当怎样（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以无产阶级国家来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的问题。

马克思在 1852 年提出并加以解决的正是这个问题。马克思忠于自己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他以 1848—1851 伟大革命年代的历史经验作为依据。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像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用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

国家问题现在提得很具体：资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统治所需要的国家机器在历史上是怎样产生的？在历次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和面对着各被压迫阶级的独立行动，国家机器如何改变，如何演变？无产阶级在对待这个国家机器方面的任务是什么？

资产阶级社会所特有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产生于专制制度崩溃的时代。最能表明这个国家机器特征的有两种机构，即官吏和常备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屡次谈到，这两种机构恰巧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个工人的经验都非常清楚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这种联系。工人阶级是根据亲身的体验来学习领会这种联系的，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很容易懂得并且很深刻地理解这种联系不可避免的道理，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无知地、轻率地否认这个道理，便是更轻率地加以“一般地”承认而忘记作出相应的实际结论。

官吏和常备军是资产阶级社会身上的“寄生物”，是使这个社会分裂的内部矛盾所产生的寄生物，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物。目前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内占统治地位的考茨基机会主义，认为把国家看做**寄生物体**是无政府主义独具的特性。当然，这样来歪曲马克思主义，对于那些空前地玷污社会主义、竟把“保卫祖国”的概念应用于帝国主

义战争来替这个战争辩护和粉饰的市侩，是大有好处的，然而这毕竟是无可置疑的歪曲。

经过从封建制度崩溃以来欧洲所发生的为数很多的各次资产阶级革命，这个官吏和军事机构逐渐发展、完备和巩固起来。还必须指出，小资产阶级被吸引到大资产阶级方面去并受它支配，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这个机构，这个机构给农民、小手工业者、商人等等的上层分子以比较舒适、安闲和荣耀的职位，使这些职位的占有者居于人民之上。看一看俄国在1917年2月27日以后这半年中发生的情况吧：以前优先给予黑帮分子²⁹的官吏位置，现已成为立宪民主党人³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猎取的对象。实际上他们根本不想进行任何认真的改革，力图把这些改革推迟“到立宪会议召集的时候”，而且又把立宪会议慢吞吞地推迟到战争结束再举行！至于瓜分战利品，攫取部长、副部长、总督等职位，却没有延期，没有等待任何立宪会议！玩弄联合组阁的把戏，其实不过是全国上下一切中央和地方管理机关中瓜分和重新瓜分“战利品”的一种表现。各种改革都延期了，官吏职位已经瓜分了，瓜分方面的“错误”也由几次重新瓜分纠正了，——这无疑就是1917年2月27日—8月27日这半年的总结，客观的总结。

但是在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拿俄国的例子来讲，就是在立宪民主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之间）“重新瓜分”官吏机构的次数愈多，各被压迫阶级，以无产阶级为首，就会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调和的敌对性。因此，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甚至包括最

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政党，都必须加强高压手段来对付革命的无产阶级，巩固高压机构，也就是巩固原有的国家机器。这样的事变进程迫使革命“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这样的任务：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而是破坏它、消灭它。

这样提出任务，不是根据逻辑的推论，而是根据事变的实际发展，根据 1848—1851 年的生动经验。马克思在 1852 年还没有具体提出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个必须消灭的国家机器的问题，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是多么严格地以实际的历史经验为依据。那时在这个问题上，经验还没有提供材料，后来在 1871 年，历史才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在 1852 年，要以观察自然历史那样的精确性下断语，还只能说，无产阶级革命已**面临**“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国家政权的任务，即“摧毁”国家机器的任务。

这里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把马克思的经验、观察和结论加以推广，用到比 1848—1851 年这三年法国历史更广阔的范围上去是否正确呢？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重温一下恩格斯的一段话，然后再来研究实际材料。

恩格斯在《雾月十八日》第 3 版序言里写道：

“……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比起其他国家来每一次都达到更加彻底的结局；因而阶级斗争借以进行、阶级斗争的结果借以表现出来的变换不已的政治形式，在那里也表现得最为鲜明。法国在中世纪是封建制度的中心，从文艺复兴时代起是统一等级君主制的典型国家，它在大革命时期粉碎了封建

制度，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治，这种统治所具有的典型性是欧洲任何其他国家所没有的。而奋起向上的无产阶级反对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也以其他各国所没有的尖锐形式表现出来。”³¹（1907年版第4页）

最后一句评语已经过时了，因为从1871年起，法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就停顿了，虽然这种停顿（无论它会持续多久）丝毫不排除法国在将来的无产阶级革命中有可能成为使阶级斗争达到彻底的结局的典型国家。

现在我们来概括地看一看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各先进国家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更缓慢地、更多样地、范围更广阔得多地进行着那同一个过程：一方面，无论在共和制的国家（法国、美国、瑞士），还是在君主制的国家（英国、一定程度上的德国、意大利、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都逐渐形成“议会权力”；另一方面，在不改变资产阶级制度基础的情况下，各资产阶级政党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瓜分着和重新瓜分着官吏职位这种“战利品”，为争夺政权进行着斗争；最后，“行政权力”，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日益完备和巩固起来。

毫无疑问，这是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现代整个演变过程的共同特征。法国在1848—1851年这3年内迅速地、鲜明地、集中地显示出来的，就是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所特有的那种发展过程。

特别是帝国主义，即银行资本时代，资本主义大垄断组织的时代，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时代表明，无论在君主制的国家，还是在最自由的共和制的国家，

由于要加强高压手段来对付无产阶级，“国家机器”就大大强化了，它的官吏和军事机构就空前膨胀起来了。

现在，全世界的历史无疑正在较之 1852 年广阔得无比的范围内，把无产阶级革命引向“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去“破坏”国家机器。

至于无产阶级将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这个国家机器，关于这一点，巴黎公社提供了极有教益的材料。

3. 1852 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①

1907 年，梅林把 1852 年 3 月 5 日马克思给魏德迈的信摘要登在《新时代》³²（第 25 年卷第 2 分卷第 164 页）上。在这封信里有这样一段精彩的论述：

“至于讲到我，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的存在或发现这些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这种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各个阶级作过经济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historische Entwicklungsphasen der Produktion）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②……

在这一段话里，马克思极其鲜明地表达了两点：第一、他

① 第二版增加的一节。——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332—333 页。——编者注

的学说同资产阶级最渊博的先进思想家的学说之间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第二、他的国家学说的实质。

马克思学说中的主要之点是阶级斗争。人们时常这样说，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看法，往往会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马克思主义改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阶级斗争学说**不是**由马克思，而是由资产阶级在马克思以前创立的，而且一般说来，是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谁要是**仅仅**承认阶级斗争，那他还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可能还没有走出资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圈子。用阶级斗争学说来限制马克思主义，就是割裂和歪曲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变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同庸俗小资产者（以及大资产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必须用这块试金石来测验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认马克思主义。无怪乎当欧洲的历史在**实践上**向工人阶级提出这个问题时，不仅一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义者”（动摇于改良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人），都成了**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可怜的庸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考茨基写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是在1918年8月，即在本书第一版刊行以后很久才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是用市会的观点歪曲马克思主义、**口头上假意承认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卑鄙地背弃马克思主义的典型**（见我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徒考茨基》1918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①）。

①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5卷第229—327页。——编者注

以过去的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为主要代表的现代机会主义，完全陷入了马克思在上面所评述的**资产阶级**立场，因为这种机会主义把承认阶级斗争的范围局限于资产阶级关系的领域以内。在这个领域、这个范围内，任何一个有教养的自由主义者都不会拒绝在“原则上”承认阶级斗争！）机会主义恰巧在最主要之点不承认有阶级斗争，即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因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应当是**新型民主的**（对无产者和一般穷人是民主的）国家和**新型专政的**（对资产阶级是专政的）国家。

其次，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资产阶级国家虽然形式极其繁杂，但本质是一个：所有这些国家，不管怎样，归根到底一定是**资产阶级专政**。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³³

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 1871年巴黎公社 的经验 马克思的分析

1. 公社战士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出现以前几个月，即1870年秋，马克思曾经告诫巴黎工人说，推翻政府的尝试会是一种绝望的愚蠢举动。^①但是，当1871年3月工人被迫进行决战的时候，当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极其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并没有固执己见，学究式地非难运动“不合时宜”，象臭名昭彰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叛徒普列汉诺夫那样：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1月曾写文章鼓励工人农民进行斗争，而在1905年12月以后却自由派式地大叫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³⁴。

然而，马克思不仅是为“冲天的”（他的用语）公社战士的英雄主义感到欢欣鼓舞，他还从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虽然它没有达到目的）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292页。——编者注

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提出的任务。

马克思认为对《共产党宣言》必须作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战士的革命经验作出的。

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作者署名的最后一篇序言，注明的日期是1872年6月24日。在这篇序言中，作者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说，《共产党宣言》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

接着他们说：“……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①

这段引文中单引号内的话，是两位作者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借用来的。^②

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的这个基本的主要的教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他们把这个教训加进《共产党宣言》，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这个极其重要的修改被机会主义者歪曲了，而《共产党宣言》的读者有十分之九，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大概都不知道这个修改所包含的意思。我们在下面专论歪曲的那一章里，还要对这种歪曲加以详细说明。现在只须指出，对于我们所引证的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流行的庸俗的“理解”就是认为马克思在这里是强调缓慢发展的思想，不主张夺取政权等等。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105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5页。——编者注

实际上恰巧相反。马克思的意思是说工人阶级应当打碎、摧毁“现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1871年4月12日，即正当巴黎公社存在的时候，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再不应该象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黑体和着重号是马克思用的；原文是zerbrechen），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709页）^①（马克思给库格曼的书信至少有两种俄文版本，其中有一种是由我编辑和作序^②的。）

“把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打碎”这几个字，已经简要地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问题的主要教训。而正是这个教训，不仅被人完全忘记了，而且被现时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流行的即考茨基主义的“解释”公然歪曲了！

至于马克思提到的《雾月十八日》中的有关地方，我们在前面已经全部引用了。

在以上引证的马克思的这段论述中，有两个地方是值得特别指出的。第一，他把他的结论只限于大陆。这在1871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6页。——编者注

②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14卷《卡·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编者注

年是可以理解的，那时英国还是一个纯粹资本主义的、但是没有军阀并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官僚的国家的典型。所以马克思把英国除外，当时在英国，革命，甚至是人民革命，被设想有可能而且确实有可能不以破坏“现成的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

现在，在 1917 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马克思的这个限制已经不能成立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制”（从没有军阀和官僚这个意义来说）的代表，已经完全滚到官僚和军阀支配一切、压制一切这样一种一般欧洲式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现在，无论在英国或美国，都要以**打碎、破坏**“现成的”（是 1914—1917 年间在这两个国家已制造出来而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的）“国家机器”，作为“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第二，马克思说破坏官僚军事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个非常深刻的见解是值得特别注的意。“人民”革命这一概念出自马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很奇怪的，俄国的普列权诺夫分子和孟什维克，这些愿意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的司徒卢威信徒，也许会说马克思是“失言”。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歪曲成了非常贫乏的自由主义：在他们看来，除了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对立，再没有任何东西，而且他们对这种对立的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

如果以二十世纪的革命为例，那么无论葡萄牙革命³⁵或土耳其革命³⁶，当然都应该算是资产阶级革命。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人民

的大多数，在这两次革命中都没有很积极地、独立地起来斗争，都没有明显地提出自己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反之，1905—1907年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虽然没有取得象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某些时候得到的那些“辉煌”成绩，但无疑是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人民的大多数，惨遭压迫和剥削的社会最“底层”，曾经独立奋起，给整个革命进程打上了自己的烙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自己尝试着按照自己的方式建立新社会来代替正被破坏的旧社会。

1871年，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没有占人民的大多数。当时只有把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包括进来的革命，才能成为真正把大多数吸引到运动中来的“人民”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这两个阶级构成的。这两个阶级因为都受“官僚军事国家机器”的压迫、摧残和剥削而联合起来。**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大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贫苦农民同无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而没有这个联盟，民主就不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没有可能。

大家知道，巴黎公社着力求为自己开辟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是，由于许多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没有达到目的。

所以马克思在谈到“真正的人民革命”时，极严格地估计到了1871年欧洲大陆上多数国家中实际的阶级对比关系，但他丝毫没有忘记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关于这些特点，他说得很多而且常常说）。另一方面，他又确认，“打碎”国家机器是工人和农民双方的利益所要求的，这个要求使他们联合

起来，在他们面前提出了铲除“寄生物”、用一种新东西来代替的共同任务。

究竟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呢？

2. 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1847年，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十分抽象，确切些说，只是指出了任务，而没有指出解决任务的方法。以“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代替，以“争得民主”来代替，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回答。

无产阶级组织成为统治阶级会采取什么样的具体形式，究竟怎样才能组织得同最完全最彻底地“争得民主”这点相适应，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并没有陷于空想，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经验来解答。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对公社的经验（尽管经验很少）作了极仔细的分析。现在我们把该书中最重要地方摘录下来：

起源于中世纪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军、警察、官僚、僧侣和法官”，在十九世纪发展起来了。随着资本和劳动之间阶级对抗的发展，“国家政权也就愈益具有压迫劳动的公共权力的性质，具有阶级统治机器的性质。在每次标志着阶级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愈益公开地显露出来”。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第二帝国把这

种情况固定下来了。

“公社就是帝国的直接对立面。”“公社正是”“一种不仅应该消灭阶级统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应该消灭阶级统治本身的共和国的”“一定的形式”。……

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种“一定的”形式究竟是怎样的呢？它已开始建立的国家是怎样的呢？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现在一切愿意以社会党自命的政党的纲领中都载有这个要求。但是它们的纲领究竟有什么价值，这从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行径中看得最清楚，因为他们恰巧是在2月27日革命以后就已在实际上拒绝实现这个要求！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组成的。这些代表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撤换。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

“……一向作为中央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而变为公社的随时可以撤换的负责机关。其他各行政部门的官吏也是一样。从公社委员起，自上至下一切公职人员，都只应领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级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以及支付给他们的办公费，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了。……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他们今后应该由选举产生，

对选民负责，并且可以撤换。……”^①

由此可见，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两类根本不同的机构的大更替。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例子：民主实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彻底的程度，就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化成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化成一种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东西。

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是实行镇压的机关在这里已经是居民的多数，而不象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那样总是居民的少数。既然是人民这个大多数自己镇压他们的压迫者，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大多数人可以代替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军长官）的特殊机构，自己来直接行使这些职能，而国家政权职能的行使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一项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上的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从压迫者的民主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从国家这个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5—359页。——编者注

变为由大多数人——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最干净！通俗的解释（这种解释多不胜数）是不提这一点的。人们把这一点看作已经过时的“幼稚的东西”，“照例”不讲它，正如基督教徒在获得国教地位以后，把带有民主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早期基督教的种种“幼稚的东西”“忘记了”一样。

降低国家高级官吏的薪金，看来“不过”是幼稚的原始的民主制度的要求。现代机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爱·伯恩施坦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资产阶级那种嘲笑“原始的”民主制度的庸俗做法。他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同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一样，完全不懂得：第一，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行使国家职能呢？）；第二，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原始时代或资本主义以前时代的原始民主制度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

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到普通的“工人工资”的水平，这些简

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来，同时成为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些措施关系到对社会进行的国家的即纯政治的改造，但是这些措施自然只有同正在实行或正在准备实行的“剥夺剥夺者”联系起来，也就是同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公有制联系起来，才会显示出全部意义和作用。

马克思写道：“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的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项最大的开支，即军队和官吏。”^①

农民同小资产阶级其他阶层一样，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能够“上升”，能够“出人头地”（从资产阶级的意义来说），即变成富人，变成资产者，或者变成生活富裕和享有特权的官吏。在任何一个有农民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占大多数），大多数农民是受政府压迫而渴望推翻这个政府、渴望有一个“廉价”政府的。能够实现这一要求的只有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实现了这一要求，也就是向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迈进了一步。

3. 取消议会制

马克思写道：“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

……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un -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1页。——编者注

dzertreten) 人民, 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 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任何一个工厂主服务, 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一样。”^①

由于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占了统治地位, 这个在 1871 年对议会制提出的精彩的批评, 现在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之列。部长和职业议员们, 现今的无产阶级叛徒和“专讲实利的”社会党人, 把批评议会制完全让给无政府主义者去做, 又根据这个非常正当的理由宣布, 对议会制的任何批评都是“无政府主义”!! 难怪“先进的”议会制国家的无产阶级一看到谢德曼、大卫、列金、桑巴、列诺得尔、韩德逊、王德威尔得、斯陶宁格、布兰亭、比索拉蒂之流的“社会党人”就产生恶感, 而日益同情无政府工团主义, 尽管无政府工团主义是机会主义的同胞兄弟。

但是, 马克思从来没有象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等人那样, 把革命的辩证法看作是一种时髦的空谈或动听的词藻。马克思善于无情地屏弃无政府主义, 鄙视它甚至不会利用资产阶级议会这个“畜圈”, 特别是在显然不具备革命形势的时候, 但同时马克思又善于给议会制一种真正革命无产阶级的批评。

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镇压人民、压迫人民, ——这就是资产阶级议会制的真正本质, 不仅在议会制的立宪君主国内是这样, 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

但是, 如果提出国家问题, 如果把议会看作国家的一种机构, 从无产阶级在这方面的任务的角度加以考察, 那么摆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358 页和第 360 页。——编者注

脱议会制的出路何在呢？怎样才可以不要议会制呢？

我们不得不再指出，马克思从研究公社得出的教训竟被忘得这样干净，以致对议会制的批评，除了无政府主义的或反动的批评，任何其他的批评都简直为现代的“社会民主党人”（应读作：现代的社会主义叛徒）所知道了。

摆脱议会制的出路，当然不在于取消代表机构和选举制，而在于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工作”机构。“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构。”

“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构，这正好击中了现代的议员和社会民主党的议会“哈巴狗”的要害！请看一看任何一个议会制的国家，从美国到瑞士，从法国到英国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国家”工作是在幕后做的，是由各部、官厅和司令部进行的。议会专门为了愚弄“老百姓”而从事空谈。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甚至在俄罗斯共和国这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里，在还没有来得及建立真正的议会以前，议会制的所有这些弊病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带有腐朽的市侩习气的英雄们，如斯柯别列夫和策列铁里之流，切尔诺夫和阿夫克森齐耶夫之流，竟把苏维埃糟蹋成最卑鄙的资产阶级的议会，把它变成了清谈馆。在苏维埃里，“社会党人”部长先生们用空谈和决议来愚弄轻信的人民。在政府里，不断地更换角色，一方面为的是依次让更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尝尝高官厚禄的“甜头”，另一方面为的是“转移”人民的“视线”。而在官厅里，在司令部里，却在“干着”“国家”工作！

执政的“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人民事业报》³⁷不久

以前在一篇社论中，用“大家”都以政治卖淫为业的“上流社会”中的人物的无比坦率的口吻自供说，甚至在“社会党人”（请原谅我用这个名词！）主管的各部中，整个官吏机构实际上还是旧的，还在按旧的方式行使职权，十分“自由地”暗中破坏革命的创举！即使没有这个自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参加政府的实际情况不也证明了这一点吗？这里值得注意的只是，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呆在官场里的切尔诺夫、鲁萨诺夫、晋季诺夫之流以及《人民事业报》的其他编辑先生，是这样的不知羞耻，竟满不在乎地在公众面前象谈小事情一样厚着脸皮说，在“他们的”各部中一切照旧！！革命民主的词句是用来愚弄乡下佬的，官吏的官厅的拖拉作风则是为了博得资本家的“欢心”，这就是“真诚”联合的实质。

在公社用来代替资产阶级社会贪污腐败的议会的那些机构中，发表意见和讨论的自由不会流为骗局，因为议员必须亲自工作，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实际执行的结果，亲自对自己的选民直接负责。代表机构仍然存在，然而议会制这种特殊的制度，这种立法和行政的分工，这种议员们享有的特权地位，在这里是不存在的。没有代表机构，我们不可能想象什么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民主；而没有议会制，我们却能够想象和应该想象，除非我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评是空谈，除非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愿望不是我们真正的和真诚的愿望，而是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象谢德曼、列金、桑巴、王德威尔得之流的那种骗取工人选票的“竞选”词句。

非常有教益的是：马克思在谈到既为公社需要、又为无

产阶级民主需要的那种官吏的职能时，拿“任何一个工厂主”雇用的人员来作比喻，即拿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计”的普通资本主义企业来作比喻。

马克思没有丝毫的空想主义，就是说，他没有虚构和幻想“新”社会。相反，他把从旧社会诞生新社会的过程、从前者进到后者的过渡形式，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他以无产阶级群众运动的实际经验为依据，竭力从这个经验中取得实际教训。他向公社“学习”，就象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压迫阶级的伟大运动的经验学习而从来不对这些运动作学究式的“训诫”（象普列汉诺夫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或者象策列铁里说“阶级应当自己约束自己”）一样。

要一下子、普遍地、彻底地取消官吏，是谈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一下子打碎旧的官吏机器，立刻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来逐步取消任何官吏，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经验，这是革命无产阶级当前的直接任务。

资本主义使“国家”管理的职能简化了，使我们有可能抛弃“长官职能”，把全部问题归结为无产者组织起来（成为统治阶级）以全社会名义雇用“工人、监工和会计”。

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并不“幻想”一下子就不要任何管理，不要任何服从；这种由于不懂得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无政府主义幻想，与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实际上只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拖延到人们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希望由现在的人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而现在的人没有服从、没有监督、没有“监工和会计”

是不行的。

但是所需要的服从，是对一切被剥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锋队——无产阶级的服从。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职能”可以并且应该立即开始、在一天之内就开始用“监工和会计”的简单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现在只要有一般市民的水平就完全能够胜任，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工人工资”就完全可以了。

我们工人自己将以资本主义创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工人的经验，建立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纪律，来组织大生产，把国家官吏变成我们的委托的简单执行者，变成对选民负责的、可以撤换的、领取微薄薪金的“监工和会计”（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各种等级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时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端自然会导致任何官吏逐渐“消亡”，使一种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种秩序下，日益简化的监督职能和填制表报的职能将由所有的人轮流行使，然后将成为一种习惯，最后就不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有一位聪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认为**邮政**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模型。这是非常正确的。目前邮政是按**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组织**的样式组成的一种经济。帝国主义逐渐把所有托拉斯都变为这种样式的组织。这里压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饥挨饿的“粗笨的”劳动者头上的仍然是那个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但是管理社会事务的机构在这里已经

准备好了。只要推翻资本家，用武装工人的铁拳粉碎这些剥削者的反抗，摧毁现代国家的官僚机器，我们就会有一个除掉了“寄生物”而技术装备程度很高的机构，这个机构完全可以由已经联合起来的工人自己使用，雇用一些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对所有这些人的工作如同对所有“国家”官吏的工作一样，付给工人的工资。这就是在对待一切托拉斯方面具体、实际而且立即可行的任务，它使劳动者免除剥削，并考虑到了实际上已经由公社开始了的尝试（特别是在国家建设方面）。

把整个国民经济组织得象邮政一样，做到在武装的无产阶级的监督和领导下使技术人员、监工和会计，如同所有公职人员一样，都领取不超过“工人工资”的薪金，这就是我们最近的目标。这样的国家，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的国家，才是我们所需要的。这样才能取消议会制而保留代表机构，这样才能使劳动阶级的这些机构免除资产阶级的糟蹋。

4. 组织起民族的统一

“……在公社没有来得及进一步加以发挥的全国组织纲要上说得分很清楚，公社应该成为甚至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巴黎的“全国代表会议”也应当由各个公社选举出来。

“……那时还会留给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然而非常重要的职能，则不应该象有人故意捏造的那样予以废除，而应该交给公社的官吏，即交给那些严格负责的官吏。

民族的统一不是应该破坏，相反地应该借助于公社制度组织起来，应该通过这样的办法来实现，即消灭以民族统一的体现者自居同时却脱离民族、凌驾于民族之上的国家政权，这个国家政权只不过是民族躯体上的寄生赘瘤。旧政府权力的纯粹压迫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站在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取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①

叛徒伯恩施坦所著的有赫罗斯特拉特³⁸名声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再清楚不过地表明现代社会主义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是多么不理解，或者更确切些说，是多么不愿意理解马克思的这些论述。伯恩施坦正是在谈到马克思的上述这些话时写道：这个纲领“就其政治内容来说，在一切要点上都十分类似蒲鲁东主张的联邦制……尽管马克思和‘小资产者’蒲鲁东（伯恩施坦把“小资产者”这几个字放在引号内，想必他是表示讽刺）之间有其他种种分歧，可是在这几点上，他们的思路是再接近不过的”。伯恩施坦接着又说：自然，地方自治机关的意义在增长，但是“民主的第一个任务是不是就象马克思和蒲鲁东所想象的那样是废除（Auflösung——直译是解散、融解）现代国家和完全改变（Umwandlung——变革）其组织（由各省或各州的会议选出代表组织全国会议，而各省或各州的会议则由各公社选出代表组成），从而使全国代表机关的整个旧形式完全消失，对此我是有怀疑的”。（伯恩施坦《前提》1899年德文版第134页和第136页）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9—360页。——编者注

把马克思关于“消灭国家政权——寄生物”的观点同蒲鲁东的联邦制混为一谈，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事！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机会主义者从来没有想到，马克思在这里谈的根本不是同集中制对立的联邦制，而是要打碎在一切资产阶级国家里都存在的旧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机会主义者所想到的，只是在自己周围、在充满市侩的庸俗习气和“改良主义的”停滞现象的环境中他所看到的东西，即只是“地方自治机关”！至于无产阶级革命，机会主义者连想都不会去想了。

这是很可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竟没有人同伯恩斯坦进行过争论。许多人都曾驳斥过伯恩斯坦，特别是俄国著作界的普列汉诺夫和欧洲著作界的考茨基，但是，无论前者或后者都没有谈到伯恩斯坦对马克思的这一歪曲。

机会主义者根本不会革命地思考，根本不会思考革命，他们竟把“联邦制”强加在马克思头上，把他同无政府主义的始祖蒲鲁东混为一谈。而想成为正统派马克思主义者、想捍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却对此默不作声！这就是考茨基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极端庸俗地认识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区别的根源之一。关于这种庸俗的观点，我们以后还要讲到。

在上述的马克思关于公社经验的论述中根本没有一点联邦制的痕迹。马克思和蒲鲁东相同的地方，恰巧是机会主义者伯恩斯坦看不到的。而马克思和蒲鲁东不同的地方，恰巧是伯恩斯坦认为相同的。

马克思和蒲鲁东相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两人都主张“打

碎”现代国家机器。马克思主义同无政府主义（不管是蒲鲁东或巴枯宁）这一相同的地方，无论机会主义者或考茨基主义者都不愿意看见，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离开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同蒲鲁东和巴枯宁不同的地方，恰巧就在联邦制问题上（更不用说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了）。联邦制在原则上是从无政府主义的小资产阶级观点产生出来的。马克思是主张集中制的。在他上述的论述中，丝毫也没有离开集中制。只有对国家充满市侩“迷信”的人们，才会把消灭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看成是消灭集中制！

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十分自由地按公社体制组织起来，把所有公社的行动统一起来去打击资本，粉碎资本家的反抗，把铁路、工厂、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财产交给整个民族、整个社会，难道这不是集中制吗？难道这不是最彻底的民主集中制、而且是无产阶级的集中制吗？

伯恩施坦根本不会想到可能有自愿的集中制，可能使各公社自愿统一为一个民族，可能使无产阶级的公社在破坏资产阶级统治和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事业中自愿溶合在一起。伯恩施坦同其他所有的庸人一样，以为集中制是只能从上面，只能由官吏和军阀强迫实行和维持的东西。

马克思似乎预料到会有人歪曲他的这些观点，所以特意着重指出，如果非难公社要破坏民族的统一、废除中央政权，那就是故意捏造。马克思特意使用“组织起民族的统一”这样的说法，以便提出自觉的、民主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来同资产阶级的、军阀的、官吏的集中制相对立。

但是……充耳不闻比聋子还糟。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正是充耳不闻消灭国家政权、铲除寄生物这样的话。

5. 消灭寄生物——国家

我们已经引用了马克思有关的言论，现在还应当补充几段。

马克思写道：“……新的历史创举通常遭到的命运就是被误认为是对旧的、甚至已经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的抄袭，只要它们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于是这个摧毁（bricht——打碎）现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也就被误认为是……中世纪公社的复活。……是……许多小邦的联盟（孟德斯鸠，吉伦特派³⁹）……是反对过分的中央集权的古老斗争的扩大形式。……

……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

……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领导，保证他们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他们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经不是用来对抗现在已被废弃的国家政权的東西了。”^①

“消灭国家政权”这个“寄生赘瘤”，“铲除”它，“破坏”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0—361页。——编者注

它：“国家政权现在已被废弃”，——这就是马克思评价和分析公社的经验时在国家问题上使用的说法。

所有这些都是将将近半世纪以前写的，现在必须把这些话发掘出来，使广大群众能够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马克思观察了他经历的最后一次大革命之后作出的结论，恰巧在新的无产阶级大革命时代到来的时候被人忘记了。

“……人们对公社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以及公社代表各种不同的利益，证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府形式在本质上都是压迫性的。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就是骗人的东西。……”^①

空想主义者致力于“发现”可以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政治形式。无政府主义者根本不考虑政治形式问题。现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则把议会制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形式当作不可逾越的极限，对这个“典范”崇拜得五体投地，宣布**摧毁**这些形式的任何意图都是无政府主义。

马克思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历史中得出结论：国家一定会消失；国家消失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但是，马克思并没有去发现这个未来的政治形式。他只是对法国历史作了精确的观察，对它进行了分析，得出了1851年所导致的结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61页。——编者注

论：事情已到了破坏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地步。

当无产阶级的群众革命运动已经爆发的时候，马克思就来研究这个运动究竟发现了什么样的形式，虽然这个运动遭到了挫折，虽然这个运动为期很短而且有显著的弱点。

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形式。

公社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和“终于发现的”、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代替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政治形式。

我们往下就会看到，俄国 1905 年革命和 1917 年革命在另一个环境和另一种条件下继续着公社的事业，证实着马克思这种天才的历史的分析。

第四章 续前 恩格斯的补充说明

马克思对公社经验的意义问题指出了基本的要点。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谈到这个问题，说明马克思的分析和结论，并且有时非常有力非常突出地阐明这个问题的其他方面，因此我们必须特别来谈谈这些说明。

1. 《住宅问题》

恩格斯在他论住宅问题的著作（1872 年）^① 中，已经考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233—321 页。——编者注

虑到了公社的经验，几次谈到了革命在对待国家方面的任务。很有意思的是，他在谈到这个具体问题的时候，一方面明显地说明了无产阶级国家同现今的国家相似的地方，根据这些相似的地方我们可以把两者都称为国家；另一方面又明显地说明了两者不同的地方，或者说，说明了向消灭国家的过渡。

“怎样解决住宅问题呢？在现代社会里，解决这个问题同解决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完全一样，即靠供求关系在经济上的逐渐均衡来解决，但是这样解决之后，这个问题还会不断产生，就是说，一点也没有解决。社会革命将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不仅要以时间地点为转移，而且也同一些意义深远的问题有关，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消灭城乡对立的问题。既然我们不必为未来社会的组织臆造种种空想方案，也就用不着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够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可以立即帮助解决真正的住宅缺乏问题。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剥夺现在的房主，让没有房子住或现在住得很挤的工人搬到这些住宅里去。只要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这种为社会福利所要求的措施就会象现代国家剥夺其他东西和占据住宅那样容易实现了。”（1887年德文版第22页）^①

这里没有考察国家政权形式的改变，只谈到国家政权活动的内容。剥夺和占据住宅是根据现今国家的命令进行的。无产阶级的国家，从形式上来讲，也会“下令”占据住宅和剥夺房屋。但是很明显，旧的执行机构，即同资产阶级相联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52页。——编者注

系的官吏机构，是根本不能用来执行无产阶级国家的命令的。

“……必须指出，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和全部工业，是同蒲鲁东主义 40 的‘赎买’办法完全相反的。如果采用后一种办法，单个劳动者将成为某一所住宅、某一块农民土地、某些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如果采用前一种办法，则‘劳动人民’将成为全部住宅、工厂和劳动工具的集体所有者。这些住宅、工厂等等，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而是要求把地租——虽然是用改变过的形式——转交给社会。所以，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无论如何都不排除承租和出租的保存。”（1887 年德文版第 68 页）^①

我们在下一章将要考察在这段论述中触及的问题，即关于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的问题。恩格斯非常谨慎，他说无产阶级国家“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分配住宅。把属于全民的住宅租给单个家庭就既要征收租金，又要实行一定的监督，还要规定分配住宅的某种标准。这一切都需要有一定的国家形式，但决不需要那种公职人员享有特权地位的特殊的军事和官僚机构。至于过渡到免费分配住宅，那是与国家的完全“消亡”联系着的。

恩格斯谈到布朗基主义者⁴¹在公社以后因受到公社经验的影响而转到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上时，曾顺便把这个立场表述如下：

“……无产阶级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必须实行专政，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315 页。——编者注

作为向废除阶级并和阶级一起废除国家的过渡……”
(1887年德文版第55页)^①

一些喜欢咬文嚼字的批评家或者“从事剿灭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分子大概以为，在这里承认“废除国家”，在上述《反杜林论》的一段论述中又把把这个公式当作无政府主义的公式加以否定，是矛盾的。如果机会主义者把恩格斯也算作“无政府主义者”，那并没有什么奇怪，因为社会沙文主义者给国际主义者加上无政府主义的罪名现在是愈来愈时行了。

国家会随着阶级的废除而废除，马克思主义向来就是这样教导我们的。《反杜林论》的那段人所共知的关于“国家消亡”的论述，并不是简单地斥责无政府主义者主张废除国家，而是斥责他们鼓吹可以“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

现在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把马克思主义在消灭国家问题上对无政府主义的态度完全歪曲了，因此我们来回忆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一次论战，是特别有益的。

2. 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这次论战发生在1873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把驳斥蒲鲁东主义者即“自治论者”或“反权威主义者”的文章⁴²寄给意大利的一个社会主义文集。这些文章在1913年才译成德文发表在《新时代》上。

马克思讥笑无政府主义者否认政治时写道：“……如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297页。——编者注

果工人阶级的政治斗争采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那他们就犯了侮辱原则的莫大罪行，因为工人为了满足自己低微的起码的日常需要，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废除国家，而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新时代》第32年卷（1913—1914）第1册第40页）^①

请看，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仅仅是反对这样地“废除”国家！马克思完全不是反对国家将随阶级的消失而消失，或国家将随阶级的废除而废除，而是反对要工人拒绝使用武器，拒绝使用有组织的暴力，即拒绝使用应为“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这一目的服务的国家。

马克思故意着重指出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国家具有“革命的暂时的形式”，以免人们歪曲他同无政府主义斗争的真正意思。无产阶级需要国家只是暂时的。在废除国家是目的这个问题上，我们和无政府主义者完全没有分歧。我们所断言的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暂时利用国家权力的工具、手段、方法去反对剥削者，正如为了消灭阶级，就必须实行被压迫阶级的暂时专政一样。马克思在驳斥无政府主义者时，把问题提得非常尖锐，非常明确：工人在推翻资本家的压迫时，应当“放下武器”呢，还是应当利用它来反对资本家以粉碎他们的反抗？一个阶级有系统地利用武器反对另一个阶级，这不是国家的“暂时的形式”又是什么呢？

每一个社会民主党人都应该问问自己：他在同无政府主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35页。——编者注

义者论战时是这样提出国家问题的吗？第二国际大多数正式的社会党是这样提出国家问题的吗？

恩格斯更加详尽更加通俗地阐明了这同一个思想。他首先讥笑了蒲鲁东主义者的糊涂观念，讥笑他们把自己称为“反权威主义者”，也就是否认任何权威、任何服从、任何权力。恩格斯说，试拿工厂、铁路、在汪洋大海上航行的轮船来说吧，这是一些使用机器的、很多人有计划地共同工作的复杂技术设施，如果没有一定的服从，因而没有一定的权威或权力，那就没有一样能够开动起来，这难道还不明显吗？

恩格斯写道：“……如果我拿这种论据来反对最顽固的反权威主义者，那他们就只能给我如下的回答：‘是的！这是对的，但是这里所说的并不是我们赋予我们的代表的那种权威，而是某种委托。’这些人以为，只要改变一下某一事物的名称，就可以改变这一事物本身。……”^①

恩格斯指出，权威和自治都是相对的概念，它们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变的，把它们看作绝对的东西是荒谬的；并且补充说，使用机器和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在日益扩大。然后恩格斯从权威问题的一般论述转到国家问题。

他写道：“……如果自治论者仅仅是想说，未来的社会组织只会在生产条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内允许权威存在，那也许还可以同他们说得通。但是，他们闭眼不看一切使权威成为必要的事实，只是拚命反对字眼。

为什么反权威主义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对政治权威，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3页。——编者注

反对国家呢？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但是，反权威主义者却要求在那些产生政治国家的社会关系废除以前，一举把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

这些先生见过革命没有？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权威主义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只是在散布糊涂观念；或者他们是知道的，如果是这样，那他们就是在背叛无产阶级的事业。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新时代》第32年卷（1913—1914）第1册第39页）^①

在这些论述中涉及了在考察国家消亡时期的政治与经济的相互关系（下一章要专门论述这个问题）时应该考察的问题。那就是关于社会职能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管理职能的问题和关于“政治国家”的问题。后面这个说法（它特别容易引起误会）指出了国家消亡有一个过程：正在消亡的国家在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3—344页。——编者注

它消亡的一定阶段，可以叫作非政治国家。

恩格斯这些论述中最精彩的地方，仍然是他用来反驳无政府主义者的问题提法。愿意做恩格斯的学生的社会民主党人，从 1873 年以来同无政府主义者争论过无数次，但他们在争论时所采取的态度，恰巧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而且应该采取的。无政府主义者关于废除国家的观念是糊涂的，而且是不革命的，恩格斯就是这样提问题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愿看见的，正是革命的产生和发展，正是革命在对待暴力、权威、政权、国家方面的特殊任务。

现代社会民主党人通常对无政府主义的批评，可以归结为一种十足的市侩式的庸俗论调：“我们承认国家，而无政府主义者不承认！”这样的庸俗论调自然不能不使那些稍有头脑的革命的工人感到厌恶。恩格斯就不是这样谈问题的。他着重指出，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承认国家的消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结果。然后他具体地提出革命的问题，这个问题恰巧是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通常避而不谈而可以说是把它留给无政府主义者去专门“研究”的。恩格斯一提出这个问题就抓住了关键：公社难道不应该更多地运用国家即武装起来并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这个革命政权吗？

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的社会民主党，对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具体任务问题，通常是简单地用庸人的讥笑来敷衍，至多也不过是含糊地用诡辩来搪塞，说什么“将来再看吧”。因此无政府主义者有权责备这样的社会民主党，责备他们背弃了对工人进行革命教育的任务。恩格斯运用最近这次无产阶级革命的经验，正是为了十分具体地研究一下无产阶级无

论在对待银行方面还是在对待国家方面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

3. 给 倍 倍 尔 的 信

恩格斯在 1875 年 3 月 18—28 日给倍倍尔的信中有下面这样一段话，这段话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问题的著作中，如果不算是最精彩的论述，也得算是最精彩的论述之一。附带说一下，据我们所知，倍倍尔第一次发表这封信是在他 1911 年出版的回忆录（《我的一生》）第二卷里，也就是在恩格斯写好并发出这封信的三十六年之后。

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里批判了也被马克思在给白拉克的有名的信里批判过的哥达纲领草案，并且特别谈到了国家问题，他写道：

“……自由的人民国家变成了自由国家。从字面上看，自由国家就是可以自由对待本国公民的国家，即具有专制政府的国家。应当抛弃这一切关于国家的废话，特别是在出现了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巴黎公社以后。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把我们挖苦得很够了，虽然马克思驳斥蒲鲁东的著作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经直接指出，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国家就会自行解体 and 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

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因此，我们建议把国家一词全部改成‘公团’（Gemeinwesen），这是一个很好的德文古词，相当于法文的‘公社’。”（德文原版第321—322页）^①

应当指出：这封信是谈党纲的，这个党纲马克思在离这封信仅仅几星期以后的一封信（马克思的信写于1875年5月5日）里曾作过批判；当时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住在伦敦。因此，恩格斯在最后一句话里用“我们”二字，无疑是以他自己和马克思的名义向德国工人党的领袖建议，把“国家”一词从党纲中去掉，用“公团”来代替。

如果向为了迁就机会主义者而伪造出来的现代“马克思主义”的首领们建议这样来修改党纲，那他们该会怎样狂吠，骂这是“无政府主义”啊！

让他们狂吠吧。资产阶级会因此称赞他们的。

我们还是要做我们自己的事情。在修改我们的党纲时，绝对必须考虑恩格斯和马克思的意见，以便更接近真理，以便清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而恢复马克思主义，以便更正确地指导工人阶级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在布尔什维克当中大概不会有人反对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建议。困难也许只是在用词上。德文中有两个词都作“公团”解释，恩格斯用的那个词不是指单个的公团，而是指公团的总和即公团体系。俄文中没有这样一个词，也许只好采用法文中的“公社”一词，虽然这也有它的不足之处。

“巴黎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这是恩格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8页。——编者注

斯在理论上最重要的论断。看了上文以后，这个论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公社已经不再是国家了，因为公社所要镇压的不是大多数居民，而是少数居民（剥削者）；它已经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居民已经自己上台来代替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所有这一切都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如果公社得到巩固，那么公社的国家痕迹就会自行“消亡”，它就用不着“废除”国家机构，因为国家机构将无事可做而逐渐失去其作用。

“无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词挖苦我们”，——恩格斯的这句话首先是指巴枯宁和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攻击说的。恩格斯认为这种攻击有正确之处，因为“人民国家”象“自由的人民国家”一样，都是无稽之谈，都是背离社会主义的。恩格斯竭力纠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使这个斗争在原则上正确，使它摆脱在“国家”问题上的种种机会主义偏见。真可惜！恩格斯的这封信竟被搁置了36年。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即使在这封信发表以后，考茨基实际上还是顽固地重犯恩格斯告诫过的那些错误。

倍倍尔在1875年9月21日写回信给恩格斯，信中也谈到他“完全同意”恩格斯对纲领草案的意见，并说他责备了李卜克内西的让步态度（倍倍尔的回忆录德文版第2卷第334页）。但是把倍倍尔的《我们的目的》这本小册子拿来，我们却可以看到国家问题上一种完全错误的论调：

“国家应当由基于阶级统治的国家变成人民国家。”（《我们的目的》1886年德文版第14页）

这就是倍倍尔那本小册子**第9版**（第9版！）中的话！难怪德国社会民主党竟听任一些人如此顽固地重复关于国家问题的机会主义论调，特别是在恩格斯所作的革命解释被搁置起来而整个生活环境又长期使人“忘记”革命的时候。

4. 对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批判

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时，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1891年6月29日寄给考茨基而过了十年以后才在《新时代》上发表的对爱尔福特纲领⁴³草案的批判，因为这篇文章主要就是批判社会民主党在**国家结构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

顺便指出，恩格斯还对经济问题作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指示，这说明恩格斯是如何细心、如何深刻地考察了现代资本主义的形态的变化，因而他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预先想到当前帝国主义时代的任务。这个指示是恩格斯由于该纲领草案用“无计划性”这个词来说明资本主义的特征而作的，他写道：

“……如果我们从股份公司进而来看那支配着和垄断着整个工业部门的托拉斯，那么，那里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无计划性也没有了。”（《新时代》第20年卷（1901—1902）第1册第8页）^①

这里抓住了对现代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理论评价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转化为垄断资本主义。后面这四个字必须用黑体加以强调，因为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错误就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所断言的什么垄断资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资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0页。——编者注

本主义已经不是资本主义，已经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如此等等。完全的计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对能有的。但是尽管托拉斯有计划性，尽管资本大王们能预先考虑到一国范围内甚至国际范围内的生产规模，尽管他们有计划地调节生产，我们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虽然是在它的新阶段，但无疑还是处在资本主义下。在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看来，这种资本主义之“接近”社会主义，只是证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接近，已经不难实现，已经可以实现，已经刻不容缓，而决不是证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义者否认社会主义革命和粉饰资本主义。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讲国家问题。恩格斯在这里作了三方面的特别宝贵的指示：第一是关于共和国问题；第二是关于民族问题同国家结构的联系；第三是关于地方自治。

关于共和国，恩格斯把这点作为批判爱尔福特纲领草案的重点。如果我们还记得当时爱尔福特纲领在整个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党中具有怎样的意义，它怎样成了整个第二国际的典范，那么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恩格斯在这里是批判了整个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

恩格斯写道：“草案的政治要求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这里没有说（黑体是恩格斯用的）本来应当说的东西。”^①

接着，恩格斯解释道：德国的宪法实质上是1850年最反动的宪法的抄本；帝国国会，正如威廉·李卜克内西所说的，只是“专制制度的遮羞布”；想在把各小邦的存在合法化、把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2页。——编者注

德意志各小邦的联盟合法化的宪法的基础上实现“将一切劳动资料转变成公有财产”，“显然是荒谬的”。

“谈论这个问题是危险的”，——恩格斯补充说，因为他深知在德国不能在纲领中公开提出建立共和国的要求。但是，恩格斯并不因为这个理由很明显，“大家”都满意，就这样算了。他接着说：“但是，无论如何，事情总是要去解决的。这样做是多么必要，正好现在由在很大一部分社会民主党报刊中散布的机会主义证明了。现在有人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 44 重新恢复，或者回想起在这项法律统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忽然想要党承认在德国的现行法律秩序下，可以通过和平方式实现党的一切要求。……”^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那样行事是害怕非常法重新恢复，——恩格斯把这个主要事实提到首位，毫不犹豫地称之为机会主义，而且指出，正是因为德国没有共和制和自由，所以幻想走“和平”道路是十分荒谬的。恩格斯非常谨慎，没有束缚自己的手脚。他承认，在有共和制或有充分自由的国家里，和平地向社会主义发展是“可以设想”（仅仅是“设想！”）的，但是在德国，他重复说：

“……在德国，政府几乎有无上的权力，帝国国会及其他一切代议机关毫无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而且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遮盖那赤裸裸的东西。……”^②

①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73 页。——编者注

德国社会民主党把这些指示“束之高阁”，党的大多数正式领袖果然就成了专制制度的遮羞者。

“……这样的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人们把

一般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重大事件一旦发生，政治危机一旦来临就会自行提到日程上来的迫

切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这除了使党突然在决定性的时刻束手无策，使党在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上由于从未进行过讨论而认识模糊和意见不一而外，还能有什么结果呢？……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这种做法可能也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真诚的’机会主义也许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险。……

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①

恩格斯在这里特别明确地重申了贯穿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因为这样的共和国虽然丝毫没有消除资本的统治，因而也丝毫没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阶级斗争，但是，它必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3—274页。——编者注

然会使这个斗争扩大、展开、明朗化和尖锐化，以致一旦出现满足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必然通过而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的领导得到实现。对于整个第二国际来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而孟什维克党在俄国1917年革命头半年的历史则把这种忘却揭示得再清楚不过了。

恩格斯在谈到同居民的民族成分有关的联邦制共和国问题时写道：

“应当用什么东西来代替现在的德国呢？〈它拥有反动的君主制宪法和同样反动的小邦分立制，这种分立制把“普鲁士主义”的种种特点固定下来，而不是使它们在德国的整体中被融解掉〉在我看来，无产阶级只能采取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形式。联邦制共和国一般说来现在还是美国广大地区所必需的，虽然在它的东部已经成为障碍。在英国，联邦制共和国将是前进一步，因为在这里，两个岛上居住着四个民族，议会虽然是统一的，但是却有三种立法体系同时并存。联邦制共和国在小小的瑞士早已成为障碍，它之所以还能被容忍，只是因为瑞士甘愿充当欧洲国家体系中纯粹消极的一员。对德国说来，实行瑞士式的联邦制，那就是倒退一大步。联邦制国家和单一制国家有两点区别，这就是：每个加盟的邦，即每个州都有它特别的民事立法、刑事立法和法院组织；其次，与国民议院并存的还有联邦议院，在联邦议院中，每一个州无分大小，都以一州的资格参加表决。”在德国，联邦制国家是向单一制国家的过渡，所

以不是要使 1866 年和 1870 年的“来自上面的革命”又倒退回去，而是要用“来自下面的运动”来加以补充。^①

恩格斯对国家形式问题不但不抱冷淡态度，相反，他非常细致地努力去分析的正是过渡形式，以便根据每一个别场合的具体历史特点来弄清各该场合的过渡形式是从什么到什么的过渡。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从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出发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单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他认为联邦制共和国或者是一种例外，是发展的障碍，或者是由君主国向集中制共和国的过渡，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的“前进一步”。而在这些特殊条件中，民族问题占有突出的地位。

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虽然无情地批判了小邦制的反动性和在一定的具体情况下用民族问题来掩盖这种反动性的行为，但是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丝毫没有忽视民族问题的倾向，而荷兰和波兰两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自己”小国的狭隘市侩民族主义的极正当的斗争中，却常常表现出这种倾向。

在英国，无论从地理条件、从共同的语言或从数百年的历史来看，似乎已经把各个小地区的民族问题都“解决了”。可是，甚至在这个国家里，恩格斯也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民族问题还没有完全消除，因此他承认建立联邦制共和国是“前进一步”。自然，这里他丝毫没有放弃批评联邦制共和国的缺点，丝毫没有放弃为实现单一制的、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而最坚决地进行宣传和斗争。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75 页。——编者注

但是，恩格斯绝对不象资产阶级思想家和包括无政府主义者在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家那样，从官僚制度的意义上去了解民主集中制。在恩格斯看来，集中制丝毫不排斥这样一种广泛的地方自治，这种自治在各个市镇和省自愿坚持国家统一的同时，绝对能够消除任何官僚制度和任何来自上面的“发号施令”。

恩格斯在发挥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问题的纲领性观点时写道：“……因此，需要单一制的共和国，但并不是象现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现在的法兰西共和国同 1798 年建立的没有皇帝的帝国没有什么不同。从 1792 年到 1798 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市镇，都有美国式的完全的自治权，这是我们也应该有的。至于应当怎样组织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经由美国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给我们证明了，而现在又有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英国的其他殖民地给我们证明了。这种省（州）的和市镇的自治是比例如瑞士的联邦制更自由得多的制度，在瑞士的联邦制中，州对 Bund（即对整个联邦国家）而言固然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专区和市镇也具有独立性。州政府任命专区区长和市长官，这在讲英语的国家里是绝对没有的，而我们将来也坚决不要这样的官吏，就象不要普鲁士的 Landrat 和 Regierungsrat（专员、县长、省长以及所有由上面任命的官吏）一样。”根据这一点，恩格斯建议把党纲关于自治问题的条文表述如下：“省（省或州）、专区和市镇通过普选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

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①

在被克伦斯基和其他“社会党人”部长的政府封闭的《真理报》⁴⁵（1917年5月28日第68号）上我已经指出过，在这一点上（自然远不止这一点），我国所谓革命民主派的所谓社会党人代表们是如何令人气愤地背弃民主主义。^②自然，这些通过“联合”而把自己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拴在一起的人，对我指出的这些是充耳不闻的。

必须特别指出的是，恩格斯用事实和最确切的例子推翻了一种非常流行的、特别是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间非常流行的偏见，即认为联邦制共和国一定要比集中制共和国自由。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恩格斯所举的1792—1798年法兰西集中制共和国和瑞士联邦制共和国的事实推翻了这种偏见。真正民主的集中制共和国赋予的自由比联邦制共和国要多。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地方、州等等能够享有最多自由的是集中制共和国，而不是联邦制共和国。

对于这个事实，以及关于联邦制共和国与集中制共和国和关于地方自治这整个问题，无论过去和现在，我们党的宣传鼓动工作都没有充分注意。

5. 1891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导言

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内战》第3版写的导言中（导言注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6—277页。——编者注

②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一个原则问题（关于民主制的一段“被忘记的言论”）》。——编者注

明的日期是 1891 年 3 月 18 日，最初刊载在《新时代》杂志上），除了顺便就有关对国家的态度的问题提出一些值得注意的意见，还对公社的教训作了极其鲜明的概括。这个概括，由于考虑到了公社以后 20 年的全部经验而作得非常深刻，并且是专门用来反对流行于德国的“对国家的迷信”的，完全可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问题上的**最高成就**。

恩格斯指出：法国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起来了；“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个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赢得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①

对各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作出的这个总结，真是又简短，又明了。这里正好抓住了问题的实质，也是国家问题的实质（**被压迫阶级有没有武装？**）。正是这个实质却是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教授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常常避而不谈的。在 1917 年的俄国革命中，泄露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秘密的荣幸（卡芬雅克式的荣幸⁴⁶）落到了“孟什维克”、“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策列铁里身上。他在 6 月 11 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⁴⁷中，脱口说出了资产阶级要解除彼得格勒工人武装的决定，当然，他把这个决定既说成是他自己的决定，又说成这就是“国家的”需要！

策列铁里在 6 月 11 日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当然会成为每一个研究 1917 年革命的历史学家都要援引的一个最明显的例证，证明策列铁里先生所率领的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的联盟如何转到资产阶级方面来反对革命的无产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18 页。——编者注

阶级。

恩格斯顺便提出的另外一个也是有关国家问题的意见是谈宗教的。大家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随着它的日益腐化而愈来愈机会主义化，愈来愈对“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个有名的公式进行庸俗的歪曲。就是说，把这个公式歪曲成似乎宗教问题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政党也是私人的事情**!!恩格斯起来反对的就是这种对无产阶级革命纲领的完全背叛，但恩格斯在 1891 年还只看到自己党内机会主义的**最小的萌芽**，因此他说得很谨慎：

“因为参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代表，所以它所通过的决议也就完全是无产阶级性质的。有些决议把共和派资产阶级只是由于怯懦才不肯实行的、**然而**是工人阶级自由活动的必要基础的那些改革以法令形式确定下来，例如实行宗教**对国家来说**仅仅是私人事情的原则。有些决议则直接有利于工人阶级，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深深刺入了旧社会制度的内脏。……”^①

恩格斯故意强调“对国家来说”这几个字，目的是要击中德国机会主义的要害，因为德国机会主义宣布宗教对党来说是私人的事情，这样也就把革命无产阶级政党降低到最庸俗的“自由思想派”那班市侩的水平，这种市侩可以容许不信宗教，但是拒绝执行对麻醉人民的宗教鸦片进行党的斗争的任务。

将来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历史学家在探讨该党 1914 年遭到可耻的破产的根源时，会找到许多关于这个问题的有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23 页。——编者注

趣的材料：从该党思想领袖考茨基的论文中为机会主义打开大门的暧昧言论起，直到党对 1913 年的与教会分离的运动⁴⁸的态度止。

现在我们来查看恩格斯在公社以后 20 年是怎样为斗争的无产阶级总结公社教训的。

下面就是恩格斯认为最重要的教训：

“……正是军队、政治警察、官僚这种旧的中央集权政府的压迫权力，即由拿破仑在 1798 年建立，以后一直被每届新政府当作合意的工具接收并利用来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权力，——正是这种权力应该在全国各地覆没，正如它已在巴黎覆没一样。

公社一开始就得承认，工人阶级在获得统治时，不能继续运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以宣布它自己所有的代表和官吏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来保证自己有可能防范他们。……”^①

恩格斯一再着重指出，不仅在君主国，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国家依然是国家，也就是说仍然保留着它的基本特征：把公职人员，“社会公仆”，社会机关，变为社会的主人。

“……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26—227 页。——编者注

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不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公社所曾付过的最高薪金是 6000 法郎^①。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表机构的代表以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②

恩格斯在这里接触到了一个有趣的界限，在这个界限上，彻底的民主变成了社会主义，同时也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因为，要消灭国家就必须把国家机关的职能变为非常简单的监督和计算的手续，使大多数居民，而后再使全体居民，都能够办理，都能够胜任。而要完全消除升官发财的思想，就必须使国家机关中那些无利可图但是“荣耀的”职位不能成为在银行和股份公司内找到肥缺的桥梁，象在一切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内所经常看到的那样。

但是，恩格斯并没有犯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在民族自决权问题上所犯的那种错误：他们说民族自决权在资本主义下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在社会主义下则是多余的。这种似乎很巧妙但实际上并不正确的论断，对于任何一种民主制度，包括给官吏发微薄薪金的办法在内，都可以套得上，因为在资本主义下彻底的民主制度是不可能的，而在社会主义下则任何

① 名义上约等于 2400 卢布，但按现在的汇率计算，约等于 6000 卢布。有些布尔什维克提议，例如在市杜马内，给 9000 卢布的薪金，而不提议全国以 6000 卢布（这个数目是足够的）为最高薪金，这是完全不可饶恕的。49 ——作者原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28 页。——编者注

民主都是会消亡的。

这是一种诡辩，正象一句古老的笑话所说的：一个人掉了一根头发，他是否就成了秃子呢？

彻底发展民主，找出彻底发展的种种形式，用实践来检验这些形式等等，这一切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基本任务之一。任何单独存在的民主制度都不会产生社会主义，但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制度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共同存在”的，它也会影响经济，推动经济的改造，受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这就是活生生的历史辩证法。

恩格斯继续写道：

“……这种炸毁旧的国家政权并以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已经在《内战》第3章中作了详细的描述。但是这里再一次简单地谈到这种代替的几个特点，这是必要的，因为恰巧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方面转到资产阶级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识中去了。按照哲学家的学说，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是译成了哲学语言的尘世的上帝王国，也就是永恒的真理和正义所借以实现或应当借以实现的场所。由此就产生了对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盲目崇拜，由于人们从小就习惯于认为全社会的公共事业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极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这种崇拜就更容易生根。人们以为，如果他们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拥护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经是非常大胆地向前迈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

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再好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也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①

恩格斯告诫德国人，叫他们在以共和制代替君主制的时候不要忘记社会主义关于一般国家问题的原理。他的告诫现在看起来好象是直接对策列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先生们的教训，因为他们在“联合的”实践中正好表现出对国家的迷信和盲目崇拜！

还应当指出两点：（1）恩格斯说，在民主共和制下，国家之为“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但这决不等于说，压迫的形式对于无产阶级是无所谓的，象某些无政府主义者所“教导”的那样。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采取更广泛、更自由、更公开的形式，能够大大便于无产阶级为消灭一切阶级而进行的斗争。

（2）为什么只有新一代才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呢？这个问题是同民主的消除问题联系着的，现在我们就来谈这个问题。

6. 恩格斯论民主的消除

恩格斯在谈到“社会民主党人”这个名称在科学上不正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28—229页。——编者注

确的时候，曾连带说到这一点。

恩格斯在给自己那本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主要是论述“国际”问题的文集《〈人民国家报〉国际问题论文集》作序（1894年1月3日，即恩格斯逝世前一年半）的时候写道，在所有的文章里，他都用“共产党人”这个名词，而不用“社会民主党人”，因为当时法国的蒲鲁东派和德国的拉萨尔派⁵⁰都自称为社会民主党人。

恩格斯接着写道：“……因此对马克思和我说来，用如此有伸缩性的名称来表示我们特有的观点是绝对不行的。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社会民主党人”〉也许可以过得去（magpassieren），虽然对于经济纲领不单纯是一般社会主义的而直接是共产主义的党来说，对于政治上的最终目的是消除整个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的党来说，这个词还是不确切的（unpassend，不恰当的）。然而，对真正的〈黑体是恩格斯用的〉政党说来，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①

辩证法家恩格斯到临终时仍然忠于辩证法。他说：马克思和我有过一个很好的科学上很确切的党的名称，可是当时没有一个真正的即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现在（十九世纪末）真正的政党是有了，可是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但这不要紧，“可以过得去”，只要党在发展，只要党意识到它的名称在科学上不确切，不让这一点妨碍它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行！

也许哪一位爱开玩笑的人会用恩格斯的话来安慰我们布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490页。——编者注

尔什维克说：我们有真正的政党，它在很好地发展；就连“布尔什维克”这样一个毫无意义的奇怪的名词，这个除了表示我们在1903年布鲁塞尔—伦敦代表大会⁵¹上占多数这一完全偶然的情况外并没有什么其他意思的名词，也还“可以过得去”……现在，由于共和党人和“革命”市侩民主派在7、8月间对我党实行迫害⁵²，“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获得了全民的荣誉，除此而外，这种迫害还表明我党在真正的发展过程中迈进了多么巨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在这个时候，也许连我自己也对我在4月间提出的改变我党名称的建议^①表示怀疑了。也许我要向同志们提出一个“妥协办法”：把我们党称为共产党，而把布尔什维克这个名词放在括号内……

但是党的名称问题远不及革命无产阶级对国家的态度问题重要。

人们通常在谈论国家问题的时候，老是犯恩格斯在这里所告诫的而我们在前面也顺便提到的那个错误。这就是：老是忘记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的消亡。

乍看起来，这样的论断似乎是极端古怪而难于理解的；甚至也许有人会耽心，是不是我们在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因为民主也就是承认这个原则。

不是的。民主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不是**一个东西。民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2版第29卷《四月提纲初稿》、《在出席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的会议上的报告》和《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编者注

主就是承认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使用有系统的暴力的组织。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组织有系统的暴力，消灭任何加在人们头上的暴力。我们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们在向往社会主义的同时深信：社会主义将发展为共产主义，而对人们使用暴力，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的任何必要也将随之消失，因为人们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规则，而不需要暴力和服从。

为了强调这个习惯的因素，恩格斯就说到了一代，他们是“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这里所谓国家是指任何一种国家，其中也包括民主共和制的国家。

为了说明这一点，就必须分析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问题。

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马克思在他的《哥达纲领批判》（即 1875 年 5 月 5 日给白拉克的信，这封信直到 1891 年才在《新时代》第九年卷第一分卷上发表，有俄文单行本）^①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最详尽的说明。在这篇出色的著作中，批判拉萨尔主义的论战部分可以说是遮盖了正面论述的部分，即遮盖了对共产主义发展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11—35 页。——编者注

和国家消亡之间的联系的分析。

1. 马克思如何提出问题

如果把马克思在 1875 年 5 月 5 给白拉克的信同上述恩格斯在 1875 年 3 月 28 日给倍倍尔的信从表面上比较一下,也许会觉得马克思比恩格斯带有浓厚得多的“国家派”色彩,也许会觉得这两位著作家对国家的看法有很大差别。

恩格斯建议倍倍尔根本抛弃关于国家的废话,把“国家”一词从党纲中完全去掉而用“公团”来代替;恩格斯甚至宣布公社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而马克思却谈到“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①,这就是说,似乎他认为就是在共产主义下也还需要国家。

但这种看法是根本不对的。如果仔细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国家和国家消亡问题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上面所引的马克思的话也就是指正在消亡的国家制度。

很清楚,确定未来的“消亡”的日期,这是无从谈起的,尤其因为它显然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所以有表面上的差别,是因为他们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的目的不同。恩格斯的目的是要清楚地、尖锐地、扼要地向倍倍尔指明,当时流行的(也是拉萨尔颇为赞同的)关于国家问题的偏见是完全荒谬的。而马克思只是在论述另一个问题即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时候,顺便提到了这个问题。

马克思的全部理论,就是运用最彻底、最完整、最周密、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31 页。——编者注

内容最丰富的发展论去考察现代资本主义。自然，他也要运用这个理论去考察资本主义**即将崩溃**的问题，去考察**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

究竟有什么**根据**可以提出未来共产主义的未来发展问题呢？

这里的根据就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它在历史上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它是资本主义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丝毫不想制造乌托邦，不想凭空猜测无法知道的事情。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的问题，正象自然科学家提出某一新的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的。

马克思首先扫除了哥达纲领对国家同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的糊涂观念。

他写道，……“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它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或多或少地由于每个国度的历史发展的特点而改变了形态，或多或少地发展了。‘现代国家’却各不相同。它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在瑞士完全不同，它在英国同在美国完全不同。所以，‘现代国家’是一种虚构。

但是，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极重要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

‘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

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能科学地回答；否则，即使你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联接一千次，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①……

马克思这样讥笑了关于“人民国家”的一切空话，提出了问题，并且好象是警告说：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有依靠确切证明了的科学材料。

十分确切地由整个发展论和全部科学证明了的的首要的一点，也是从前被空想主义者所忘记、现在又被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的机会主义者所忘记的那一点，就是在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别时期或特别阶段。

2.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马克思继续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②……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根据他对无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0—31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1页。——编者注

会中的作用的分析，根据这个社会发展情况的实际材料以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利益对立并且不可调和的实际材料所得出的。

从前，问题的提法是这样的：无产阶级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当推翻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

现在，问题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经过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这个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我们知道，《共产党宣言》是干脆把“无产阶级变为统治阶级”和“争得民主”^①这两个概念并列在一起的。根据上述一切，可以更准确地断定民主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中是怎样变更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顺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较完全的民主制度就是民主共和制。但是这种民主制度始终受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狭窄框子的限制，因此它实质上始终只是供少数人、供有产阶级、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终与古希腊共和国只供奴隶主享受的自由大致相同。由于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贫困压得“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和平局面下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

德国可以说是证实这一论断的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宪法规定的合法性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有半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页。——编者注

世纪之久（1871—1914年），在这个时期内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利用合法性”方面做的工作要比其他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多得多，特别是使工人参加党的比例达到了举世未有的高度。

那末这种有政治觉悟的积极的雇佣奴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占的最大的百分比究竟是多少呢？一千五百万雇佣工人中只有一百万是社会民主党党员！一千五百万雇佣工人中只有三百万是工会会员！

极少数人享受民主，富人享受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度。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民主的结构，那末无论在选举法的“细微的”（似乎是细微的）条文上（居住年限、妇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议机构的办事手续上，或是在行使集会权的实际障碍上（公共的集会场所不准“叫化子”使用！），或是在纯粹按资本主义原则办报等等事实上，到处都可以看到对民主的重重限制。对穷人的这种种限制、禁止、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很细微的，特别是在那些从来没有亲身体验过贫困、从来没有接近过被压迫阶级群众的生活的人（这种人在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来是很细微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却把穷人排斥和推出政治生活之外，使他们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

马克思正好抓住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这一实质，他在分析公社的经验时说：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压迫阶级中的哪些代表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他们！^①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9页。——编者注

但是从这种必然是狭隘的、暗中排斥穷人的、因而也是完全虚伪和骗人的资本主义民主向前发展，决不象自由派教授和小资产阶级机会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是简单地、直接地、平稳地走向“日益彻底的民主”。不是的。向前发展，即向共产主义发展，必须经过无产阶级专政，决不能走别的道路，因为再没有其他人也没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剥削者资本家的反抗。

而无产阶级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锋队组织成为统治阶级来镇压压迫者，不能简单地只是扩大民主。除了把民主大规模地扩大，使民主**第一次**成为供穷人享受、供人民享受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之外，无产阶级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剥削者、资本家采取一系列剥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们必须镇压这些人，必须用强力粉碎他们的反抗，一一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暴力的地方，也就没有自由，没有民主。

读者总还记得，恩格斯在给倍倍尔的信中已经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他说：“无产阶级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存在了。”^①

绝大多数人享受民主，对那些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实行强力镇压，即把他们排斥于民主之外，一一这就是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下形态改变了的民主。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当资本家的反抗已经彻底粉碎，

① 见恩格斯 1875 年 3 月 18 日—28 日给奥·倍倍尔的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0 页）。——编者注

当资本家已经消失，当阶级已经不存在（即社会各个成员在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已经没有什么差别）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有可能谈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全的、真正没有任何禁止的民主才有可能，才会实现。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卑鄙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自动地遵守这些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

“国家消亡”这句话说得非常恰当，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只有习惯才能够而且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剥削，如果没有某种令人气愤、引起抗议和起义并使镇压成为必要的现象，那末人们是多么容易习惯于遵守他们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规则。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将第一次提供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全的民主，而民主愈完全，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下存在的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

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少数人镇压多数人的特殊机器。很明显，为了达到剥削者少数有系统地镇压被剥削者多数的目的，就必须采取极凶恶极残酷的镇压手段，就必须造成无数流血事件，而这样的流血事件是人类在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下都经历过的。

其次，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镇压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被剥削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镇压。实行镇压的特殊机构，特殊机器，即“国家”，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过渡性质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是一件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和比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会比从前在镇压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起义时流的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要小得多。而且在实行镇压的同时，还把民主扩展到绝大多数居民身上，以致对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的需要就开始消失。自然，如果没有极复杂的实行镇压的机器，剥削者就镇压不住人民，但是人民镇压剥削者，却只要有很简单的“机器”即几乎可以不要“机器”不要特殊的机构，而只要有武装群众的组织（如工兵代表苏维埃，——我们先在这里提一下）。

最后，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完全不需要国家，因为那时已经没有人须要加以镇压，——这里所谓“没有人”是指阶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丝毫也不否认个别人捣乱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这种捣乱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实行镇压的特殊机器，特殊机构，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

容易，就象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劝解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第二、我们知道，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捣乱行为的社会根源是群众受剥削和群众贫困。这个主要原因一消除，捣乱行为就必然开始“消亡”。虽然我们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进度怎样，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行为一定会消亡而这种行为一消亡，国家也就随之消亡。

马克思并没有陷入空想，关于这个未来，他只是较详细地确定了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即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

3.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详细地驳斥了拉萨尔关于劳动者在社会主义下将领取“不折不扣的”或“全部的劳动产品”的思想。马克思指出，在整个社会的全部社会劳动中，必须拿出一部分作后备基金、作扩大生产的基金和补偿“磨损了的”机器的费用等等，然后在消费品中还要拿出一部分作为管理费以及学校、医院、养老院等等的基金。

马克思不象拉萨尔那样说些含糊不清的笼统的话（“全部劳动产品归劳动者”），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必须怎样管理的问题作了冷静的考察。马克思在具体分析这种没有资本主义存在的社会的生活条件时说道：

“我们这里所说的（在分析工人党的纲领时）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

那个旧社会的痕迹。”²³

这个刚刚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带着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

生产资料已经不是个人的私有财产，它已归整个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员都完成社会所必需的某一部分劳动，并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完成了多少劳动量。根据这张证书，他从消费品的社会储存中领取相当数量的产品。这样，除去作为社会基金的一部分劳动之外，每个劳动者从社会方面领取的，也就相当于他对社会所贡献的。

这样，似乎“平等”就实现了。

但是，当拉萨尔把这样的社会制度（通常叫做社会主义，而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说成是“公平的分配”，说成是“每人有获得同等劳动产品的平等权利”的时候，他是错误的，于是马克思就对他的错误进行了分析。

马克思说：这里确实有“平等权利”但这仍然是“资产阶级法权”，它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同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权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确，每个人付出与别人同等的一份社会劳动，就能领取一份同等的社会产品（除了上述扣除的以外）。

然而各个人是不同等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结了婚，有的没有结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以及其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1页。——编者注

他等等。

马克思总结说,……“在同等的劳动下,从而,由社会消费品中分得同等份额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要避免这一切,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①……

所以,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剥削人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那时已经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资料攫为私有了。马克思驳倒了拉萨尔关于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说法,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进程,说明这个社会最初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这“不公平”现象,却不能立即消灭“按劳动”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费品这一仍然存在的不公平现象。

庸俗的经济学家(包括资产阶级的教授和“我们的”杜冈在内)经常谴责社会主义者,说他们忘记了人与人的不平等,说他们“幻想”消灭这种不平等。我们看到,这种谴责只能证明资产阶级思想家先生们的极端无知。^②

马克思不仅极其准确地估计到人们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计到,仅仅把生产资料转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资产阶级法权”的不平等,就产品“按劳动”分配这一点说,“资产阶级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页。——编者注

② 对杜冈的批判,还可参看列宁《自由派教授论平等》一文(《列宁全集》第2版第24卷)。——编者注

法权”仍然占着统治地位。

马克思继续说道，……“但是这些缺点，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①……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法权”没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经实现的经济变革的范围内，也就是在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上取消。“资产阶级法权”承认生产资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则把生产资料变为公有财产。在这个范围内，也只有在这个范围内，“资产阶级法权”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员间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调节者（决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则已经实现了；“按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则也已经实现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对不同等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给予等量产品的“资产阶级法权”。

马克思说，这是一个“缺点”，但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义，那就不能认为，在推翻资本主义之后，人们立即就能学会不需要任何法权规范而为社会劳动，况且资本主义的废除不能立即为这种变更创造经济前提。

可是，除了“资产阶级法权”以外，没有其他规范。所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页。——编者注

以在这个范围内，还需要有国家来保卫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保卫劳动的平等和产品分配的平等。

国家正在消亡，因为资本家已经没有了，阶级已经没有什么可了，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阶级可以镇压了。

但是，国家还没有完全消亡，因为还要保卫容许在事实上存在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

4.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马克思接着说：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之后，当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的时候，当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的时候，当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社会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

现在我才认识到，恩格斯无情地讥笑那种把“自由”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连在一起的荒谬见解，是多么正确。还有国家的时候就不会有自由，有了自由就不会有国家。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2页。——编者注

国家完全消亡的经济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发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经消失，因而现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生产资料转为公有财产，光靠剥夺资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这种剥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既然我们看到资本主义现在已经怎样难以想象地阻碍着这种发展，而在已经达到的现代技术基础上又可以大大推进生产力，我们就可以有十二分把握地说，剥夺资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发展。但是，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向前发展，将怎样迅速发展发展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们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我们只能谈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发展速度。至于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体形式问题，只能作为悬案，因为现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问题的材料。

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时，也就是说，在人们已经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规则，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已经大大提高，因此他们能够自愿地尽其所能来工作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就会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超出这种使人象夏洛克⁵³那样冷酷地斤斤计较，不愿比别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愿比别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狭隘眼界。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规定每人应当领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按需”自由地取用。

从资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说成

是“纯粹的乌托邦”并冷嘲热讽地说社会主义者许下诺言，答应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领取任何数量的香菌、汽车、钢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则可以不加任何监督。就是在今天，大多数资产阶级“学者”也还是用这种讽刺的话来塘塞，但他们这样做只是暴露他们愚昧无知和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

说他们愚昧无知，是因为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过要“许诺”共产主义高级发展阶段的到来，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预见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设想的前提，既不是现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现在的庸人，因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小说⁵⁴中的神学校学生一样，惯于“白白地”糟蹋社会财富的储存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

在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标准和消费标准实行极严格的监督，不过这种监督应当从剥夺资本家和由工人监督资本家开始，并且不是由官吏的国家而是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来实行。

说资产阶级思想家（和他们的走卒如策烈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替资本主义进行自私的辩护，是因为他们一味争论和空谈遥远的未来，而不谈目前政治上的迫切问题：剥夺资本家，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人员和职员，并使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工兵代表苏维埃的国家**。

其实，当博学的教授以及附和他的庸人们和策烈铁里先生、切尔诺夫先生之流谈到荒诞的乌托邦，谈到布尔什维克的蛊惑人心的诺言，谈到不可能“实施”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们

指的正是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但是，不仅谁也没有许过“实施”共产主义高级阶段的诺言，而且连想也没有想到“实施”，因为这根本是不可以“实施”的。

这里我们也就要讲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问题，这个问题在上面引用的恩格斯说“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名称不恰当的一段话里已经谈到。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同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之间的差别，在政治上说，将来也许很大，但现在在资本主义下着重来谈它就很好笑了，至于把这个差别提到首要地位的也许只有少数无政府主义者（如果在格拉弗、柯尔涅利逊这些克鲁泡特金之流的人物以及其他无政府主义“大师”们“象普列汉诺夫那样”变成了社会沙文主义者，或象一个没有丧失廉耻和良心的无政府主义者格耶所说的那样变成了无政府主义卫国战士以后，无政府主义者当中还有人丝毫没有学到什么东西）。

但是社会主义同共产主义在科学上的差别是很明显的。马克思把通常所说的社会主义称作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既然生产资料已成为公有财产，那末“共产主义”这个名词在这里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记这还不是完全的共产主义。马克思的这些解释的伟大意义，就在于他在这里也始终应用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即发展学说，把共产主义看成是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马克思没有经院式地臆造和“虚构”种种定义，没有从事毫无意义的字面上的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而是分析了可以表现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

在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在经济上还不可能是完全成熟

的，还不能完全摆脱资本主义的传统或痕迹。由此就产生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就是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保留着“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既然在消费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法权，那当然一定要有资产阶级的国家，因为如果没有一个能够迫使人们遵守法权规范的机构，法权也就等于零。可见，在共产主义下，在一定的时期内，不仅会保留资产阶级法权，甚至还会保留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国家！

这好象是奇谈怪论，或只是一种玩弄聪明的辩证把戏，那些没有花过一点功夫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极其深刻的内容的人，就常常这样来谴责马克思主义。

其实，无论在自然界或在社会中，实际生活随时随地都使我们看到新事物中有旧的残余。马克思并不是随便把一小块“资产阶级”法权塞到共产主义中去，而是抓住了从资本主义脱胎出来的社会里那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东西。

在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中，民主具有巨大的意义。但是民主决不是一种不可逾越的极限，它只是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和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道路上的一个阶段。

民主意味着平等。很明显，如果把平等正确地理解为消灭阶级，那末无产阶级争取平等的斗争以及平等的口号就具有伟大的意义。但是，民主仅仅意味着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会全体成员在占有生产资料方面的平等实现以后，也就是说，一旦劳动平等和工资平等实现以后，在人类面前就必然会产生一个问题：要更进一步，从形式上的平等转到事实上

的平等，即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至于人类会经过哪些阶段，通过哪些实际办法达到这个最高目的，那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须认识到，资产阶级总是非常虚伪地把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僵死的、凝固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然后是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

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是有组织有系统地对人们使用暴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而这一点又是和下面一点联系着的：民主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对资本主义进行革命的阶级——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他们有可能去打碎、彻底摧毁、连根铲除资产阶级的（哪怕是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常备军、警察和官吏，而代之以更民主的、但仍然是国家的机器，即由武装工人群众（以后要过渡到全民民兵制）构成的国家机器。

在这里，“量转化为质”因为这样高度的民主，是同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框子、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相联系的。如果真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国家的管理，那末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却又为真是“所有的人”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前提。这种前提就是：在许多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达到了人人都识字，其次是千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

等等社会化的巨大复杂的机构里“受了训练而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

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推翻了资本家和官吏之后，在一天之内立刻着手由武装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计算**劳动和产品。（不要把监督和计算的问题同具有科学知识的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的问题混为一谈，这些先生今天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工作，明天他们就会在武装工人的支配下更好地工作。）

计算和监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调整好”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员。**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职员和工人。全部问题在于要他们在正确遵守工作标准的条件下同等地工作，并同等地领取报酬。对这些事情的计算和监督已被资本主义**简化**到了极点，而成为一种非常简单、任何一个识字的人都能胜任的监督和登记的手续，只是算算加减乘除和发发有关字据的手续^①。

当**大多数**人民到处开始自己来进行这种计算，对资本家（这时已成为职员）和保留着资本主义恶习的知识分子先生们实行这种监督的时候，这种监督就成为真正包罗万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监督，那时他们就绝对无法逃避这种监督，就会“无处躲藏”了。

① 当国家的最主要职能简化为由工人自己担当的这样一种计算和监督的时候，国家就不再成为“政治国家”，那时“社会职能就由政治职能变为简单的管理职能”（参看第四章第二节恩格斯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作者原注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

但是，无产阶级在战胜资本家和推翻剥削者以后在全社会推行的这种“工厂”纪律，决不是我们的理想，也决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而只是为了彻底肃清社会上资本主义剥削制造成的丑恶现象，并且为了继续前进所必需的一个阶段。

当社会全体成员或至少绝大多数成员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业，并对极少数资本家、想保留资本主义恶习的先生们和深深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工人们“调整好”监督的时候，对任何管理的需要都开始消失了。民主愈完全，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由武装工人组成的、“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国家”愈民主，则任何国家开始消亡也就愈迅速。

因为当所有的人都学会了管理，实际上都自己来管理社会生产，自己来进行计算并对寄生虫、老爷、骗子手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护者”实行监督的时候，企图逃避这种全民的计算和监督就必然很难达到目的，必然只会是极罕见的例外，并且还可能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实事求是的，不象知识分子那样抹不开情面；他们未必会让人随便跟自己开玩笑），于是，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

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会完全消亡了。

初 版 跋

这本小册子是在 1917 年 8、9 月间写成的。我当时已经拟定了下一章即第 7 章《1905 年和 1917 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的提纲。但这一章除了题目以外，我连一行字也没有来得及写，因为 1917 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我。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但是本书第 2 册（《1905 年和 1917 年俄国革命的经验》）看来只好长时间拖下去了；做出“革命的经验”是会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的。

作 者

1917 年 11 月 30 日于彼得格勒

写于 1917 年 8-9 月
1918 年“生活和知识”
出版社用单行本刊印

按 1919 年“共产党人”出版社出版的小册子原文刊印并根据手稿和 1918 年的版本作过校订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 版第 33 卷第 1—120 页

注 释

- 1 《国家与革命(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是系统述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家学说的重要著作，它透彻地回答了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和俄国革命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时期中的历史作用，粉碎了修正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歪曲和进攻，同时也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在国家问题上的荒谬观点。

《国家与革命》一书是列宁 1917 年 8-9 月在秘密状态中写成的列宁在 1916 年下半年就认为有必要从理论上探讨国家问题。当时他写了一篇短评《青年国际》(见《列宁全集》第 23 卷第 163-167 页)，在这篇短评里他批评了布哈林在国家问题上的反马克思主义立场，并表示要写一篇文章详细地论述马克思主义对国家问题的观点。列宁在 1917 年 2 月 17 日给亚·米·柯伦泰的信中谈到，他差不多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材料准备好了。这些材料是用很小的字体写在以《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为题的蓝皮笔记本里的。收集在笔记本里的材料有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摘要，有考茨基、潘涅库克和伯恩施坦著作的摘录并附有列宁的评语和结论。

《国家与革命》一书按原定计划有七章，最后一章，即第七章《1905 年和 1917 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列宁没有写，保存下来的只有这一章的详细提纲(见《列宁文集》俄文版第 21 卷第 25-26 页)。关于出版这本书的问题，列宁在给出版者的信中写道，如果他“实在来不及写完第七章，或者这本书太厚，那末可以把前六章单独出版，作为第一册……”

在手稿的第一页上，作者用的笔名是：弗·弗·伊万诺夫斯基。列宁预计用这个笔名可以出版这本书，不然就会被临时政府没收。但是这本书到 1918 年才出版，因此也就不需要再用笔名了。第二版是在 1919 年出的，列宁在第二章中加了《1852 年马克思对问题的提法》一节。

- 2 见本书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注 14。
- 3 见本书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注 5。
- 4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66 页。
- 5 见本书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注 8。
- 6 氏族组织 是人类历史上最初的社会经济形态，即原始公社制度。氏族组织产生的时期同现代人的类型的最后形成的时期相同。氏族组织的发展经过两个时期：母权制和父权制。父权制解体的时期就是原始社会变成阶级社会和国家产生的时期。“在原始公社制度下，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这在基本上适合当时的生产力性质。石器以及后来出现的弓箭，使人无法单身去同自然力量和猛兽作斗争……公共的劳动导致生产资料和产品公有制。这里还不知道什么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这里没有剥削，也没有阶级。”（见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1971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649-650 页）
- 关于原始公社制度，参看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1965 年人民出版社版）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 克兰 是爱尔兰和苏格兰的氏族公社。
- 7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66、167 页。
- 8 参看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67 页）。
- 9 指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德文 第四版序 盲（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4-16 页）。
- 10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67-168 页。
- 1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68 页

- 12 见本书恩格斯《卡尔·马克思》注 24。
- 13 见本书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注 21。
- 14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69 页。
- 15 第一届联合临时政府是在临时政府四月危机以后于 1917 年 5 月 5 日(公历 11 月 18 日)成立的,内阁名单于 5 月 6 日(公历 19 日)公布。参加联合政府的除了资产阶级的代表外,还有社会革命党人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靠近社会革命党的彼列维尔节夫,孟什维克斯柯别列夫和策烈铁里,人民社会党人彼舍霍诺夫。关于第一届联合政府的成立,参看《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4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47-248 页。
- 16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69 页。
- 17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170 页。
- 18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320-321 页。
- 19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第 223-224 页。
- 20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60-161、285-286 页。
- 21 哥达纲领是 1875 年在哥达举行的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这个纲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机会主义纲领,它根本不提无产阶级专政,否认农民参加革命的可能性,要求把国家资助工人生产合作社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方法。并要求用一切合法手段建立所谓自由的人民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两派在机会主义纲领基础上的合并,并对哥达纲领做了毁灭性的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1-33 页)。
- 22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160 页。

- 23 见本书《共产党宣言》第一、二部分。
- 24 列宁在写《国家与革命》时还不知道马克思在1871年以前已经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他在《马克思主义论国家》这本笔记中曾写道，“查对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71年以前是否说过‘无产阶级专政’？似乎没有！”（见本卷第149页）在《国家与革命》出版以后，列宁才看到了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约·魏德迈的信。他在自己的一本《国家与革命》（第1版）的最后一页上，用德文作了一段笔记：“《新时代》（第25年卷第2册第164页），1906—1907年第31期（1907年5月2日）：弗·梅林：《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传记的新材料》，引自马克思1852年3月5日给魏德迈的信。”接下去便是从信中摘录的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那一段话。《国家与革命》再版时，列宁作了相应的补充。
- 25 出典于圣经《旧约全书·创世记》第25章。故事说，一天，雅各熬红豆汤，其兄以扫打猎回来，累得昏了，求雅各给他汤喝。雅各说，须把你的长子名分让给我。以扫就起了誓，出卖了自己的长子权。这个典故常被用来比喻因小失大。
- 26 涤罪所亦译炼狱，按天主教教义，是生前有一般罪愆的灵魂在升入天堂以前接受惩戒、洗刷罪过的地方。通过涤罪所是经历艰苦磨炼的譬喻。
- 27 “掘得好，老田鼠！”出自英国作家威·莎士比亚的悲剧《哈姆莱特》第1幕第5场。马克思曾不止一次地使用善于掘土的老田鼠这一形象来比喻为新社会开路的革命。
- 28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1—692页。
- 29 黑帮分子指俄国反动组织俄罗斯人民同盟、君主派、法制党、十月十七日同盟、工商党以及和平革新党的成员。他们力图保持旧的专制制度。
- 30 立宪民主党人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的成员。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于1905年10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方自治局人士和自由派地主。

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平的宪政发展道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为资产阶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并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后，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1月28日（12月11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1921年5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

31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1—602页。

32 《新时代》（《Die Neue Zeit》）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1883—1923年在斯图加特出版。1890年10月前为月刊，后改为周刊。1917年10月以前编辑为卡·考茨基，以后为亨·库诺。1885—1895年间，杂志发表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文章。恩格斯经常关心编辑部的工作，并不时帮助它纠正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倾向。为杂志撰过稿的有威·李卜克内西、保·拉法格、格·瓦·普列汉诺夫、罗·卢森堡、弗·梅林等国际工人运动活动家。《新时代》杂志在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宣传俄国1905—1907年革命等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随着考茨基转到机会主义立场，1910年以后，《新时代》杂志成了中派分子的刊物。

33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有多种多样形式的论点，列宁最早是在1916年写的《论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一文中提出来的。但这篇文章直到1924年才在杂志上公开发表。列宁在1919年写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和1923年写的《论我国革命》（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7卷和第43卷）中也都涉及了这一问题。

- 34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在《我们的处境》和《再论我们的处境（致X同志的信）》两篇文章（载于1905年11、12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3、4期）中发表的意见。
- 35 指1910年的葡萄牙资产阶级革命。1910年10月4日，葡萄牙共和派在陆海军部队支持下举行起义，迫使国王逃亡英国。5日，宣布成立共和国，组成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实行了某些民主改革，但农民的土地问题没有解决，赋税和高利贷盘剥没有减轻。这次革命是一次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 36 指1908—1909年的土耳其资产阶级革命，史称青年土耳其革命。1908年7月，驻马其顿的军队在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领导下发动了革命。他们提出恢复1876年宪法的口号，希望把封建神权的奥斯曼帝国变成资产阶级的立宪君主国。土耳其苏丹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被迫签署了召开议会的诏书。1909年4月，忠于苏丹的军队发动了叛乱。叛乱被击败后，议会废黜了阿卜杜尔-哈米德二世，选举马赫穆德五世为苏丹，青年土耳其党人组织了新政府。新政府同封建势力、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相勾结，成为他们利益的代表者。这次革命没有发动也不敢发动广大群众，是一次极不彻底的资产阶级上层的革命。
- 37 《人民事业报》（《Дело Народа》）是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报纸（日报），1917年3月15日（28日）起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年6月起成为该党中央机关报。先后担任编辑的有B. B. 苏霍姆林、维·米·切尔诺夫、弗·米·晋季诺夫等，撰稿人有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阿·拉·鄂茨、亚·费·克伦斯基等。该报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号召工农群众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继续帝国主义战争、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该报对十月革命持敌对态度，鼓动用武力反抗革命力量。1918年1月14日（27日）被苏维埃政府封闭。此后曾用其他名称及原名（1918年3—6月）出版。1918年10月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和白卫社会革命党叛乱分子占领的萨马拉出了4号。1919年3月20—30日在莫斯科出了10号后被查封。
- 38 赫罗斯特拉特是公元前四世纪希腊人。据传说，他为了扬名于世，在公元前356年纵火焚毁了被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的以弗所城阿尔蒂米

斯神殿。后来，赫罗斯特拉特的名字成了不择手段追求名声的人的通称。

- 39 吉伦特派是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个政治集团，代表共和派工商业资产阶级和农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主要是外省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许多领导人是立法议会和国民公会中的吉伦特省代表，所以后世历史学家给它取了这个名字。吉伦特派主张各省自治，成立联邦。
- 40 蒲鲁东主义是以法国无政府主义者皮·约·蒲鲁东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流派，产生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蒲鲁东主义从小资产阶级立场出发批判资本主义所有制，把小商品生产和交换理想化，幻想使小资产阶级私有制永世长存。它主张建立“人民银行”和“交换银行”，认为它们能帮助工人购置生产资料，使之成为手工业者，并能保证他们“公平地”销售自己的产品。蒲鲁东主义反对任何国家和政府，否定任何权威和法律，宣扬阶级调和，反对政治斗争和暴力革命。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这部著作中，对蒲鲁东主义作了彻底的批判。列宁称蒲鲁东主义为不能领会工人阶级观点的市侩和庸人的痴想。蒲鲁东主义思想被资产阶级的理论家们广泛地利用来鼓吹阶级调和。
- 41 布朗基主义者是十九世纪法国工人运动中由杰出的革命家路·奥·布朗基领导的一个派别。布朗基主义者不了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忽视同群众的联系，而主张用密谋手段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少数人的专政。列宁指出，布朗基主义者期待不通过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通过少数知识分子的密谋使人类摆脱雇佣奴隶制。巴黎公社失败以后，1872年秋天，在伦敦的布朗基派公社流亡者发表了题为《国际和革命》的小册子，宣布拥护《共产党宣言》这个科学共产主义的纲领。对此，恩格斯曾不止一次地予以肯定（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79—587页）。
- 42 指马克思的《政治冷淡主义》和恩格斯的《论权威》这两篇文章（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34—340、341—344页）。
- 43 爱尔福特纲领指1891年10月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它取代了1875年的哥达纲领。爱尔福特纲领以马克思主义

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灭亡和被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的学说为基础，强调工人阶级必须进行政治斗争，指出了党作为这一斗争的领导者的作用。它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它的通过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对拉萨尔主义等小资产阶级思潮的胜利。但是爱尔福特纲领也有一些重大缺点，主要是没有提出为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任务，避而不谈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恩格斯曾对爱尔福特纲领的草案提出过批评，可是他的一些重要意见在纲领定稿时没有被采纳。

44 反社会党人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俾斯麦政府从1878年10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会党人法实施期间，有1000多种书刊被查禁，300多个工人组织被解散，2000多人被监禁和驱逐。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法于1890年10月被废除。

45 《真理报》（《Правда》）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是斯大林遵照列宁的指示发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1912年4月22日（5月5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它是依靠工人的捐款出版的。它拥有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家。《真理报》仅仅在一年之内，就刊载了一万一千多篇工人通讯。《真理报》的发行量平均每日四万份，个别月份平均每日达六万份。当时布尔什维克被称为真理派。斯大林说：“1912年的《真理报》为布尔什维主义1917年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的工作，他几乎每天都给报纸写文章给编辑部指示。斯大林在1912年9月逃出纳雷姆流放地以后参加了《真理报》的领导工作。1913年1—2月，雅·米斯维尔德洛夫担任该报编辑。1913年2月，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一起，按照列宁的指示改组了《真理报》编辑部。

《真理报》在创刊后的两年多的时间内，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被沙皇政府查封过八次，但是每次被查封后又改用别的名称出版，如：《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无产

阶级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在1914年7月21日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二月革命以后，从1917年3月18日起《真理报》复刊，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中央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3月28日，中央委员会常务局扩大会议决定斯大林参加《真理报》编辑部。列宁在1917年4月回到俄国后直接领导了《真理报》。

1917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7月5日（18日）被士官生捣毁。7月15日（28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正式下令封闭《真理报》。七月事变后，由于列宁转入秘密状态，斯大林担任了报纸的责任编辑。1917年7-10月由于临时政府的迫害，《真理报》曾先后改称《〈真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1918年3月16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版。

- 46 路·欧·卡芬雅克是法国的一个将军，反动政客。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是阿尔及利亚总督；1848年5月起为法国陆军部长，极端残酷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马克思指出：“卡芬雅克不是对资产阶级社会实行军刀专政，而是借助军刀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列宁谈到伊·格·策列铁里在1917年6月11日的演说中声言要解除工人武装的问题时，曾不止一次地拿法国将军路·欧·卡芬雅克的行为来对比。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现在和“将来出现”卡芬雅克分子的阶级根源是什么？》一文（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0卷第314—317页）。

- 47 指俄国临时政府部长、孟什维克伊·格·策列铁里1917年6月11日（24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各党团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的演说。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首领召开这次会议，把布尔什维克党原定于6月10日（23日）举行游行示威的问题列入议程，是要利用自己的多数地位来打击布尔什维克党。策列铁里在他的演说中诬蔑布尔什维克准备举行的游行示威是“企图推翻政府和夺取政权的阴谋”，说什么“布尔什维克现在从事的不是思想宣传，而是阴谋。批判的武器正在被武器的批判所代替。……对于那些不善于恰当掌握手中武器的革

命者，要从他们手中把武器夺走。必须解除布尔什维克的武装。不能让他们迄今拥有的过多的技术兵器留在他们手里。不能让机关枪和武器留在他们手里”。列宁指出，策列铁里的演说表明他是露骨的反革命分子。

- 48 与教会分离的运动，又称退出教会的运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德国发生的群众性的反教会运动。1914年1月，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发表了修正主义者保尔·格雷的《与教会分离运动和社会民主党》一文，开始就党对待反教会运动的态度问题展开讨论。格雷断言党应当对这一运动取中立态度，应当禁止党员以党的名义进行反宗教和反教会的宣传。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著名活动家们在讨论过程中始终没有批判格雷的错误。
- 49 这里说的是1917年下半年的纸币。俄国的纸卢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贬值得很厉害。
- 50 拉萨尔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在1863年于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人代表大会上成立，拉萨尔是它的第一任主席。他为联合会制订了纲领和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联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在实践活动中，拉萨尔派支持奥·俾斯麦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尔主义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指出它是德国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1875年，拉萨尔派同爱森纳赫派合并成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
- 5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于1903年7月30日-8月23日举行。代表大会最初在布鲁塞尔开了十三次会。后来因受警察迫害而移至伦敦继续举行。总共开了三十七次会。列入代表大会日程的共有二十个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党纲、党的组织（批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章）、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出席代表大会的有代表二十六个组织的四十三名代表，他们有五十一票表决权（其中八个代表各有二票），另外有十四名代表有发言权。

代表大会由列宁的《火星报》筹备。列宁为筹备代表大会做了巨大

的工作。

这次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火星报》所提出和制定的原则的和组织的基础上建立真正的政党”（见《列宁全集》第7卷第195页）。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为了在俄国建立革命无产阶级政党而进行的巨大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在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的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第一次通过了以争取无产阶级专政为基本任务的革命纲领。列宁在提出争取无产阶级专政胜利的任务的同时，着重指出农民的革命斗争的重大意义。大会把民族自决权列入党纲，维护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

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围绕着建党的组织原则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列宁和他的战友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作用的根本原理：党是工人阶级先进的、觉悟的、有组织的部队，它是由革命理论、社会发展规律和阶级斗争规律的知识以及革命运动的经验武装起来的。唯有这样高度觉悟而有组织的、团结而集中的、具有统一意志的党，才能够引导工人阶级走向胜利，夺取政权。列宁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同机会主义分子进行的不调和的斗争，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

大会一致批准了《火星报》编辑部拟定的党纲（一票弃权），并基本批准了列宁拟定的党章，但是在党章第一条这个有关党员资格的重要问题上，却以微弱多数通过了尔·马尔托夫的机会主义条文。以列宁为首的坚定的火星派和以马尔托夫为首的“温和的”火星派发生了分裂。在选举中央领导机关时，由于崩得和经济派分子退出了大会，列宁派获得了多数票，从此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机会主义分子获得了少数票，从此被称为孟什维克（少数派）。这次代表大会对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列宁曾经指出，布尔什维主义是从1903年起作为一种政治思想派别和一个政党而存在的。

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义的的评价，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5-56页。

- 52 指1917年7月3-4日（公历16-17日）彼得格勒的游行示威。7月3日（公历16日），维波尔格区开始出现反对临时政府的自发的游行示威。最先出来的是第一机枪团，接着，别的部队和工人也同他们汇合在一起了。游行示威很可能变成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

布尔什维克党反对在这个时候采取武装动，它认为革命危机还没有

成熟，军队和外地民众还没有做好准备来支持首都的起义。7月3日下午四时，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军事局的联席会议上，做出了劝阻发动的决定。当时正在开会的彼得格勒市布尔什维克第二次代表会议也通过了同样的决定。出席会议的代表分别前往各工厂和各区去劝阻工人。但是，发动仍旧开始了，要阻止已经不可能了。

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军事局考虑了群众的情绪以后，于7月3日深夜通过了参加游行示威的决定，目的在使游行示威成为和平的和有组织的运动。列宁当时不在彼得格勒。他得到消息后，于7月4日(公历17日)早晨来到彼得格勒。参加7月4日游行示威的有五十多万人。游行示威是在布尔什维克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主要的口号下进行的。

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知道并且同意派士官生和军官来镇压举行和平示威的工人和士兵。士官生和军官向群众开了枪。反革命部队也从前线调回来镇压革命运动。

7月4日夜間，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做出了停止游行示威的决定。列宁在深夜来到《真理报》编辑部，审阅当天的报纸。列宁离开半小时后，编辑部就被士官生和哥萨克部队捣毁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实际上是这次反革命屠杀的参加者和帮凶。在游行示威被镇压后，他们又同资产阶级一起攻击布尔什维克。《真理报》和《士兵真理报》等布尔什维克报纸都被临时政府封闭了。大规模的逮捕、搜查、屠杀开始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的革命部队被调离首都，开往前线。

七月事变以后，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苏维埃成了它的一个软弱无力的附属品。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经告终。革命和平发展的时期已经结束。摆在布尔什维克面前的任务是准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

- 53 夏洛克是莎士比亚的喜剧《威尼斯商人》中的人物，残酷的高利贷者他根据借约，要求不如期还债的安东尼奥割下一磅肉。
- 54 指十九世纪俄国民主义作家尼·格·波米亚洛夫斯基在1862—1863年写的一部小说《神学校随笔》。

列 宁

怎样组织竞赛？

资产阶级的著作家过去和现在耗费了无数的笔墨，来赞扬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制度的竞争、私人进取心及其他绝妙的品质和魅力。他们责备社会主义者不愿意了解这些品质的意义和不顾“人的本性”。其实，资本主义早已把那种能使竞争在稍微**广阔**的范围内培植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的独立的小商品生产排挤掉了，而代之以大的和最大的工厂生产、股份企业、辛迪加和其他垄断组织。在**这样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竞争意味着空前残暴地压制广大的、占绝大多数的居民，即百分之九十九的劳动者的进取心、毅力和大胆首创精神，而且还意味着排斥竞赛，而代之以社会阶梯上层的金融诈骗、任人唯亲和阿谀逢迎。

社会主义不仅不窒息竞赛，反而第一次造成真正**广泛地**、真正**大规模地**运用竞赛的可能，把真正大多数劳动者吸引到这样一个工作舞台上，在这个舞台上，他们能够大显身手，施展自己的本领，发现有才能的人。有才能的人在人民中间是无穷无尽的，可是资本主义却把他们成千上万乃至成百万地摧残、压制和窒息了。

现在当社会主义政府执政时，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组织竞赛。

资产阶级的走卒和食客们把社会主义描写成生活千篇一律的、死气沉沉的、单调无味的军营。富人的奴才，剥削者的仆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爷们，总是拿社会主义来“吓唬”人民，然而，正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才注定了要过那种服苦役住军营的生活，从事永无休止、令人厌烦的劳动，过着半饥半饱、贫困不堪的日子。使劳动者摆脱这种苦役生活的第一步，就是没收地主土地，实行工人监督，把银行收归国有。下一步便是把工厂收归国有，强迫全体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这种合作社同时又是产品销售合作社），以及由国家垄断粮食和其他必需品的贸易。

只有现在才广泛地、真正普遍地开辟了表现进取心、进行竞赛和发挥大胆首创精神的可能性。每个赶走了资本家或者至少是用真正的工人监督制服了资本家的工厂，每个赶跑了地主剥削者并且剥夺了他们土地的农村，现在而且只有现在才成了劳动者可以大显身手的场所，在这里劳动者可以稍微直一点腰，可以挺起胸来，可以感到自己是人了。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被迫为剥削者做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而且可以利用技术和文化的一切最新成就来工作了。

用为自己劳动取代被迫劳动，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更替，当然不能不发生摩擦、困难和冲突，不能不对那些顽固的寄生虫及其走卒采用暴力。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工人都不抱什么幻想。工人和贫苦农民成年累月地替剥削者做苦工，受到了剥削者无数的欺侮和凌辱，过着极端贫困的生活，由于他们经受了这些磨炼，他们知道要粉碎剥削者的反抗是需

要时间的。工人和农民丝毫没有染上多愁善感的知识分子老爷们、所有这些新生活派¹和其他废物的幻想，这些人声嘶力竭地“高喊”反对资本家，“指骂”资本家、“痛斥”资本家，可是一到**要真正行动**，要把威胁变成事实，要在实践中真正**去掉**资本家的时候，他们就痛哭流涕，活象一只挨了打的小狗。

用全国广大范围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国际的、世界的范围内）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为自己的劳动取代被迫劳动，——这种伟大的更替除需要采取“**军事**”措施镇压剥削者的反抗，还需要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作出**组织方面**的即组织家的巨大努力。组织任务同采取军事措施无情地镇压昨天的奴隶主（资本家）及其奴才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老爷们）的任务，已经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昨天的奴隶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奴仆们总是这样想，这样说：我们一向是组织者和长官，一向是发号施令的，我们仍旧要这样，我们不会听“老百姓”的话，不会听工人和农民的话，不会服从他们，我们要把知识变成保护富人特权和保护资本对人民的统治的工具。

资产者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这样想，这样说，这样做的。从**一己私利**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农奴主—地主所豢养的食客和寄生虫，神父、录事、果戈里笔下的那类官吏、那些痛恨别林斯基的“知识分子”，对农奴制也是“恋恋”不舍的。可是剥削者及其知识分子奴仆的事业是毫无希望的事业。工人和农民正在粉碎他们的反抗（可惜还不够坚决、果断和无情），而且一定会粉碎他们的反

抗。

“他们”以为，社会主义革命赋予劳动者的那种伟大的、在世界历史上是真正豪迈的组织任务，“老百姓”即“普通”工人和贫苦农民是负担不了的。那些惯于替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效劳的知识分子自我安慰说：“没有我们不行。”他们厚颜无耻的盘算是不会实现的，因为有学问的人现在正在分化，正在转到人民方面，转到劳动者方面来，并且帮助他们粉碎资本奴仆们的反抗。而有组织才能的人在农民和工人阶级中间是很多的，他们现在才刚刚开始认识自己，觉醒过来，投入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伟大的工作，独立地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现在最主要的任务之一，也许就是最主要的任务，是尽量广泛地发扬工人以及一切被剥削劳动者在创造性的组织工作中所表现的这种独创精神。无论如何要打破这样一种荒谬的、怪诞的、卑劣的陈腐偏见，似乎只有所谓“上层阶级”，只有富人或者受过富有阶级教育的人，才能管理国家，才能领导社会主义社会的组织建设。

这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受到了陈规陋习、守旧心理、奴才习气，尤其是资本家的卑鄙私利的支持。资本家所关心的是怎样借掠夺来管理，借管理来掠夺。不，工人们一分钟也不会忘记自己需要知识的力量。工人们在追求知识方面表现出非常大的热情，而且正是在现在表现出来，这证明无产阶级在这方面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迷误。凡是识字的、有识别人的本领的、有实际经验的普通工人和农民都能够胜任组织家的工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傲慢蔑视态度谈论的“老

百姓”中，有很多这样的人。这样的有才能的人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是无穷无尽、源源不绝的。

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对于自己现在是统治阶级这一点还不习惯，他们还不够坚决。革命不可能立刻在一生困于饥饿贫穷而不得不在棍棒下工作的千百万人身上培养出这些品质。但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力量，它的生命力，它的不可战胜性，正是在于它激发这些品质，破除一切旧的障碍，摧毁腐朽的桎梏，把劳动者引上独立创造新生活的道路。

计算和监督，这就是每个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每个消费合作社、每个工会或供给委员会、每个工厂委员会或一般工人监督机关的主要经济任务。

用被迫劳动者的眼光来看待劳动量，看待生产资料，即尽量躲避加重的担子，只求从资产阶级那里捞一把，——这种旧习惯必须破除。先进的有觉悟的工人已经开始了这场斗争，坚决反击有些新进厂的人（这样的人在战争时期特别多），因为他们现在对待人民的工厂，对待已经变成人民财产的工厂，还象从前那样，一心想“多捞一把，然后溜之大吉”。一切有觉悟的、诚实的、有头脑的农民和劳动群众，在这场斗争中一定会站到先进工人这方面来。

既然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已经建立，已经有了保障，那么，实行计算和监督，实行全面的、普遍的、包括一切的计算和监督，即对劳动数量和产品分配实行计算和监督，——只要它们由作为最高国家政权机关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来实行，或者依照这个政权机关的指示和委托来实行，——这就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

过渡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计算和监督，只能由群众来实行。只有工农群众怀着满腔的革命热情自愿地和诚挚地进行合作，共同对富人、骗子、懒汉和流氓实行计算和监督，才能清除万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些残余，清除人类的这些渣滓，清除这些无可救药的、腐烂的、坏死的部分，清除这些由资本主义遗留给社会主义的传染病、瘟疫和溃疡。

工人和农民们，被剥削劳动者们！土地、银行、工厂已经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了！大家亲自来计算和监督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吧，这是**唯一**走向社会主义胜利的道路，社会主义胜利的保障，战胜一切剥削和一切贫困的保障！因为俄国有足够的粮食、铁、木料、羊毛、棉花和亚麻，可以满足全体人民的需要，只是必须正确地分配劳动和产品，对这种分配建立**切实可行的**全民监督，**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日常经济**生活中战胜那些人民的敌人——首先是富人和他们的食客，其次是骗子、懒汉和流氓。

对这些人民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劳动者的敌人要毫不宽容。必须同富人和他们的食客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殊死的斗争，向骗子、懒汉、流氓开战。这前后两种人，都是同胞兄弟，都是资本主义的儿女，都是贵族和资产阶级社会的产儿。在这种社会中，一小撮人掠夺人民，侮辱人民。在这种社会中，贫困驱使成千上万的人走上流氓无赖、卖身投靠、尔虞我诈、丧失人格的道路。在这种社会中，必然使劳动者养成这样一种心理：为了逃避剥削，就是欺骗也行；为了躲避和摆脱令人厌恶的工作，就是少干一分钟也行；为了不挨饿，为了使自己 and 亲人吃饱肚子，就是不择手段，不

惜任何代价哪怕捞到一块面包也行。

富人和骗子是一枚奖章的两面，这是资本主义豢养的两类主要**寄生虫**，这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这些敌人应当由全体人民专门管制起来，只要他们稍一违背社会主义社会的规章和法律，就要无情地予以惩治。在这方面任何软弱、任何动摇、任何怜悯，都是对社会主义的极大犯罪。

要使社会主义社会不受这些寄生虫的危害，就必须对劳动数量，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组织全民的、千百万工人和农民自愿地积极地用满腔革命热情来支持的计算和监督。而要组织这种计算和监督，即每个诚实、精明、能干的工人和农民**完全能够**做到和**完全能够胜任**的计算和监督，就必须唤起工农自己的、也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的有组织才能的人，必须鼓励他们在组织工作方面实行**竞赛**，并在全国内把这种竞赛组织起来，必须使工人和农民清楚地懂得，应当向有学问的人请教是一回事，而应当由“普通的”工农来监督那些“有学问的”人所常有的**懈怠**是另一回事。

这种懈怠、大意、马虎、草率、急躁，喜欢用讨论代替行动，用空谈代替工作，干什么事都是开一个头但又半途而废，——这是“有学问的人”的特点之一，这根本不是由他们天性低劣，更不是由他们存心不良造成的，而是由他们的全套生活习惯、他们的劳动环境、疲劳过度、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反常分离等等造成的。

由于我们的知识分子的这种可悲的、但在目前不可避免的特点，由于工人对知识分子的组织工作**缺乏**应有的监督，因而产生了一些错误、缺点和失策，这些东西在我国革命的

错误、缺点和失策中占了不小的地位。

工人和农民还有些“胆怯”，他们应当克服这种毛病，他们一定会克服这种毛病。没有知识分子、专家这些有学问的人的建议和指导性的意见是不行的。任何一个有点头脑的工人和农民，对于这一点是知道得很清楚的，我们的知识分子不能抱怨工农对他们不够重视，对他们缺少同志式的尊敬。但是，建议和意见是一回事，组织实际的计算和监督又是一回事。知识分子往往能够提出极好的建议和意见，可是他们“笨手笨脚”到了可笑、荒谬和丢脸的地步，没有本事去实行这些建议和意见，切实监督怎样把言论变成行动。

由此可见，如果没有来自“老百姓”即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实际组织工作者的帮助，没有这些人的领导作用，是绝对不行的。“事在人为”，工人和农民应当把这个真理牢牢记住。他们应当懂得，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马克思说的“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²这句话，显得尤其正确了，——在对富人和骗子切实进行惩治、限制，对他们充分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每一步，都比一打冠冕堂皇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议论更重要。要知道，“我的朋友，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是常青的”。³

必须组织来自工农的实际组织工作者互相展开竞赛。必须反对知识分子所爱好的一切死套公式和由上面规定划一办法的企图。无论是死套公式或者由上面规定划一办法，都与民主的、社会主义的集中制毫无共同之点。在细节方面，在

地方特征方面，在**处理**问题的方法、实现监督的方法以及消灭和制裁寄生虫（富人和骗子，知识分子中间的懒汉和歇斯底里人物等等）的**手段**方面，**多样性**不但不会破坏在主要的、根本的、本质的问题上的统一，反而会保证这种统一。

巴黎公社作出了把来自下面的首创精神、独立性、放手的行动、雄伟的魄力和自愿实行的、与死套公式不相容的集中制互相结合起来的伟大榜样。我们的苏维埃走的也是这条道路。但是苏维埃还有些“胆怯”，还没有放开手脚，还没有“渗透”到建立社会主义秩序这一新的、伟大的、创造性的工作中去。必须使苏维埃更大胆、更主动地去从事工作。必须使每个“公社”——每个工厂，每个乡村，每个消费合作社，每个供给委员会——都能作为对劳动和产品分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实际组织工作者，互相展开**竞赛**。这种计算和监督的纲领是简单明了的，谁都懂得的：它就是要使每个人都有面包吃，都能穿上结实的鞋子和整洁的衣服，都有温暖的住宅，都能勤勤恳恳地工作；不让一个骗子（其中也包括不愿做工的懒汉）逍遥自在，而是把他们关进监牢，或者给予最繁重的强迫劳动的处分；不让一个违反社会主义规章和法律的富人逃脱理所当然与骗子同样的命运。“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就是**社会主义实践**的训条。这就是必须**实际**安排好的事情。我们的“公社”、我们的来自工农的组织工作者，尤其是知识分子出身的组织工作者，应当为这些实际成就而自豪（这里加上**尤其**二字，是因为知识分子太习惯于而且**过分**习惯于以自己的空泛的意见和决议而自豪）。

对富人、骗子和懒汉切实进行计算和监督的成千上万种

方式和方法，应当由公社本身、由城乡基层组织在实践中来创造和检验。方式方法的多样性，可以保证具有活力，保证成功地达到共同的一致目标，即肃清俄国土地上的一切害虫，肃清骗子这种跳蚤和富人这种臭虫，等等。有的地方会监禁十来个富人、一打骗子、半打逃避工作的工人（在彼得格勒，特别是党的各个印刷所，有许多排字工人逃避工作，这同样也是流氓行为）。有的地方会叫他们去打扫厕所。有的地方在他们监禁期满后发给黄色身分证，使全体人民在他们改过自新以前把他们当作**危害**分子加以监视。有的地方会从十个寄生虫中挑出一个来就地枪决。还有的地方会想到把不同办法配合起来运用，例如，把富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骗子和流氓中的那些可以改正的人有条件地释放，使他迅速改过自新。方式愈多愈好，方式愈多，共同的经验就愈加丰富，社会主义的胜利就愈加可靠、愈加迅速，而实践也就愈容易创造出——因为只有实践才能创造出——**最好的**斗争方式和手段。

看哪一个公社，大城市的哪一个街区，哪一个工厂，哪一个村子，**没有挨饿的人，没有失业的人，没有有钱的懒汉，没有资产阶级奴才中的恶棍和自称为知识分子的怠工分子；**看哪里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做的事情最多；看哪里为穷人建造新的好的住宅、安置穷人住进富人的住宅、按时供给穷人家小孩每人一瓶牛奶等方面做的事情最多；——正是在这些问题上，各个公社、村社、消费生产合作社和协作社以及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应当展开**竞赛**。正是应当通过这些工作让**有**组织**才能**的人在**实践**中脱颖而出，并且把他们提拔上来，参

加全国的管理工作。这样的人在人民中间是很多的。不过他们都被埋没了。必须帮助他们发挥才能。他们，而且只有他们才能在群众的支持下拯救俄国，拯救社会主义事业。

写于 1917 年 12 月 25—

接手稿刊印

28 日

选自《列宁全集》第 26 卷

第一次载于 1929 年 1 月

第 378—379 页

20 日《真理报》第 17 号

署名：弗·伊林

注 释

- 1 《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ь》）是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集团的报纸，1917 年 4 月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 年 7 月被克伦斯基政府封闭，同年 9 月起又以《自由生活报》的名称出版。该报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抱敌对态度，1918 年 7 月被封闭。

新生活派是在《新生活报》周围形成的孟什维克集团。这个集团联合了孟什维克、马尔托夫分子以及半孟什维克派的单个知识分子。

- 2 见本书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给威·白拉克的信》。
- 3 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第四场《浮士德的书斋》。第 797 页。

列 宁

在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 揭幕典礼上的讲话

今天，我们为世界工人革命的领袖马克思恩格斯的纪念碑举行揭幕典礼。

多少世纪以来，人类都是在一小撮蹂躏千百万劳动人民的剥削者的压迫下受苦受难。旧时代的剥削者地主压榨和掠夺的是分散、愚昧的农奴，而新时代的剥削者资本家所碰到的是被压迫群众的先进部队，即城市工人，工厂工人，产业工人。工厂把工人联合起来了，城市生活启发开导了他们，共同的罢工斗争和革命行动锻炼了他们。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用科学的分析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资本主义必然过渡到不再有人剥削人现象的共产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伟大功绩，在于他们向各国无产者指出了无产者的作用、任务和使命就是率先起来同资本进行革命斗争，并在这场斗争中把一切被剥削的劳动者团结在自己的周围。

我们处在一个幸福的时代，处在两位伟大社会主义者的这个预见开始实现的时代。我们大家都看到，在许多国家里已经显露出国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各民族间的

帝国主义大屠杀 所造成的不堪言状的惨祸,无论在哪里都激起被压迫群众英勇精神的高涨,大大加强他们争取解放的斗争力量。

愿一个个马克思恩格斯纪念碑都来提醒千百万工人和农民:我们在斗争中不是孤立的。更先进的国家的工人正挺身而出同我们并肩奋斗。在我们和他们的面前还有艰苦的战斗。通过共同的斗争,我们一定会粉碎资本的压迫,最终赢得社会主义!

简要报道载于 1918 年
11 月 9 日《真理报》第
242 号

全文第一次载于 1924 年
载于 4 月 3 日《真理报》
第 76 号

按手稿刊印

选自《列宁全集》第 28 卷
第 147—148 页

列 宁

无 产 阶 级 革 命

和叛徒考茨基¹（节录）

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

被考茨基搅得混乱不堪的问题实际上就是这样。

如果不是嘲弄理智和历史，那就很明显：只要有不同的阶级存在，就不能说“纯粹民主”，而只能说阶级的民主（附带说一下，“纯粹民主”不仅是既不了解阶级斗争也不了解国家实质的无知之谈，而且是十足的空谈，因为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主将演变成习惯，消亡下去，但永远也不会是“纯粹的”民主）。

“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历史上有代替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有代替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民主。

考茨基几乎用了几十页的篇幅来“证明”资产阶级民主比中世纪制度进步、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必须利用资产阶级民主这样的真理。这正是愚弄工人的自由主义空谈。不仅在文明的德国，就是在不文明的俄国，这也是人人知道的真理。考茨基一本正经地谈论魏特林²，谈论巴拉

主的耶稣会教徒，谈论许许多多 别的的东西，这不过是用那套“博学的”谎话来蒙骗工人，以便回避现代民主即资本主义民主的资产阶级实质。

考茨基把马克思主义中能为自由主义者，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对中世纪制度的批评，资本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民主在历史上的进步作用）拿来，而把马克思主义中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东西（无产阶级为消灭资产阶级而对它采用的革命暴力）抛掉、抹杀和隐瞒起来。正因为这样，不管考茨基的主观信念怎样，他的客观地位必然使他成为资产阶级的奴才。

资产阶级民主同中世纪制度比较起来，在历史上是一大进步，但它始终是而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能不是狭隘的、残缺不全的、虚伪的、骗人的民主，对富人是天堂，对被剥削者、对穷人是陷阱和骗局。正是这个真理，这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不理解的。正是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考茨基不去对那些使一切资产阶级民主变为对富人的民主的条件进行科学的批判，反而奉献出一些使资产阶级“称心快意”的东西。我们首先要向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先生提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 那些被我们的书呆子（为了迎合资产阶级）可耻地“忘记了的”理论见解，然后再来作一个最通俗的说明。

不仅古代国家和封建国家，而且“现代的代议制的国家”也“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恩格斯论国家的著作）^①。“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196页。——编者注

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恩格斯 1875 年 3 月 28 日给倍倍尔的信）^①“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这一点即使在民主共和制下也丝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恩格斯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所写的导言）^②普选制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在现今的国家里，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恩格斯论国家的著作）^③考茨基先生非常枯燥地反复解释这个论点当中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前一部分，而对我们用黑体标出的、不能为资产阶级接受的后一部分，叛徒考茨基却闭口不谈！。“公社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工作的机关，兼管行政和立法的机关……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在议会里代表和镇压（Ver- und zertreten）人民，而是应当为组织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使他们能为自己的企业找到工人、监工和会计，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了同一目的服务于任何一个工厂主一样。”（马克思论述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④

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十分熟悉的这些论点，每一条都在打他的嘴巴，揭穿他的全部的叛徒行径。在考茨基的整本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9 卷第 7 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2 卷第 228 页。——编者注

③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1 卷第 197 页。——编者注

④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7 卷第 358 页和第 360 页。——编者注

小册子中，丝毫看不出他理解了这些真理。他的小册子的全部内容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嘲弄！

只要看看现代国家的根本法，看看这些国家的管理制度，看看集会自由或出版自由，看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那就处处都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正直的觉悟的工人都很熟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是留下许多后路或保留条件，以保证资产阶级“在有人破坏秩序时”，实际上就是在被剥削阶级“破坏”自己的奴隶地位和试图不象奴隶那样俯首听命时，有可能调动军队来镇压工人，实行戒严等等。考茨基无耻地粉饰资产阶级民主，闭口不谈美国或瑞士最民主最共和的资产者对付罢工工人的种种行为。

啊，聪明博学的考茨基对于这一点是闭口不谈的！他，这位博学的政治家不知道，对这一点默不作声就是卑鄙。他宁愿向工人讲一些民主就是“保护少数”之类的童话。这很难令人相信，然而这是事实！在公元1918年，在世界帝国主义大厮杀的第五年，在各“民主国”的国际主义者（即不象列诺得尔和龙格之流，不象谢德曼和考茨基之流，不象韩德逊和维伯之流那样卑鄙地背叛社会主义的人们）少数遭受迫害的第五年，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居然用甜蜜蜜的嗓子歌颂起“保护少数”来了。谁要是愿意，可以去看看考茨基的这本小册子第十五页。而在第十六页上，这位博学的……人物还把十八世纪英国的辉格党和托利党³的故事讲给你听呢！

多么渊博啊！向资产阶级献媚是多么细致入微啊！在资本家面前卑躬屈膝、舔他们的皮靴的样子是多么文质彬彬啊！

假如我是克虜伯或謝德曼，是克列孟梭或列諾得爾，我一定會用百萬酬金酬謝考茨基先生，賞給他猶大之吻⁴，在工人面前稱贊他，勸人們同考茨基這樣“可敬的”人物保持“社會主義的統一”。著書反對無產階級專政，講述十八世紀英國輝格黨和托利黨的故事，硬說民主就是“保護少數”，絕口不談“民主”共和國美國迫害國際主義者的大暴行，難道這不是奴顏婢膝地為資產階級效勞嗎？

博學的考茨基先生“忘記了”（大概是偶然忘記了……）一件“小事情”，就是資產階級民主國的統治黨僅僅對其他資產階級政黨才保護少數，而對無產階級，則在一切重大的、深刻的、根本的問題上，不僅不“保護少數”，反而實行戒嚴或製造大暴行。民主愈發達，在發生危及資產階級的任何深刻的政治分歧時，大暴行或內戰也就愈容易發生。資產階級民主的這個“規律”，原是博學的考茨基先生在共和制法國的德雷福斯案件⁵中，在民主共和國美國對黑人和國際主義者的私刑中，在民主英國的愛爾蘭和北愛爾蘭事件⁶中，在1917年4月俄羅斯民主共和國對布爾什維克的迫害和大暴行中，都可以看到的。我故意不僅舉出戰時的例子，而且舉出戰前和平時期的例子。甜蜜蜜的考茨基先生寧願閉眼不看二十世紀的這些事實，卻向工人講述十八世紀英國輝格黨和托利黨的十分新鮮、極其有趣、大有教益、非常重要的故事。

就拿資產階級議會來說吧。能不能設想博學的考茨基從來沒有聽說過，民主愈發達，交易所和銀行家對資產階級議會的操縱就愈厲害呢？當然不能由此得出結論說，不應該利用資產階級議會（布爾什維克利用議會，恐怕比世界上任何

一个政党都更有成效，因为在 1912—1914 年，我们把第四届杜马的整个工人选民团都争取过来了)。但是应当由此得出结论说，只有自由主义者才会象考茨基那样忘记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有**历史局限性的**，是有**历史条件的**。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被压迫群众随时随地都可以碰到这个惊人的矛盾：一方面是资本家“民主”所标榜的**形式上的平等**，一方面是使无产者成为**雇佣奴隶**的千百种**事实上的限制和诡计**。正是这个矛盾使群众认清了资本主义的腐朽、虚假和伪善。为了使群众作好进行革命的**准备**，社会主义的鼓动家和宣传家向群众不断揭露的正是这个矛盾！然而当革命的纪元已经开始的时候，考茨基却转过身子把背朝着革命，赞美起**垂死的资产阶级民主**的妙处来了。

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在世界史上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正是对大多数居民即对被剥削劳动者的民主。象考茨基那样写出一整本论民主的书，用两页谈专政，用几十页谈“纯粹民主”，而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就是用自由主义观点来完全歪曲事实。

拿对外政策来说。在任何一个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中，对外政策都是不公开的。到处都是欺骗群众，而在民主的法国、瑞士、美国 and 英国，这种欺骗比其他国家更广泛百倍，巧妙百倍。苏维埃政权用革命手段揭露了对外政策的黑幕。考茨基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对这一点默不作声，虽然在进行掠夺战争和签订“瓜分势力范围”（即资本家强盗瓜分世界）的秘密条约时代，这一点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和平问题，千百万人的生死问题都是以此为转移的。

拿国家机构来说。考茨基抓住一些“小事情”，连选举是“间接的”（在苏维埃宪法中）也提到了，但问题的本质他却看不到。国家机构、国家机器的阶级实质，他却注意到。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资本家千方百计地（“纯粹的”民主愈发达，方法就愈巧妙，愈有效）排斥群众，使他们不能参加管理，不能享受集会自由、出版自由等等。苏维埃政权是世界上**第一个**（严格说来是第二个，因为巴黎公社已开始这样做过）**吸引群众即被剥削群众**参加管理的政权。劳动群众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议会**任何时候也解决不了**极其重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是交易所和银行）的门径被千百道墙垣**阻隔**着，所以工人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和感觉到，看到和觉察到：资产阶级的议会是**别人的机构**，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者的工具**，是敌对阶级即剥削者少数的机构。

苏维埃是被剥削劳动群众自己的直接的组织，它**便于**这些群众自己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建设国家和管理国家。这里，恰恰是被剥削劳动者的先锋队——城市无产阶级具有一种优越条件，就是大企业把他们极好地联合起来了，他们最容易进行选举和监督当选人。苏维埃组织自然而然**使一切被剥削劳动者便于**团结在他们的先锋队即无产阶级的周围。旧的资产阶级机构，即官吏，还有财富特权、资产阶级的教育和联系等等特权（资产阶级民主愈发达，这些事实上的特权也就愈多种多样）——所有这些，在苏维埃组织下正在消失。出版自由不再是假的，因为印刷所和纸张都从资产阶级手里夺过来了。最好的建筑如宫殿、公馆、地主宅邸等等也是如此。

苏维埃政权把成千上万座最好的建筑物一下子从剥削者手里夺过来，就使群众的集会权利更加“民主”**百万倍**，而没有集会权利，民主就是骗局。非地方性的苏维埃的间接选举使苏维埃代表大会易于举行，使**整个**机构开支小些，灵活些，在生活沸腾、要求特别迅速地召回或派遣出席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地方代表的时期，使工农更便于参加。

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只有自觉的资产阶级奴仆，或是政治上已经死亡、钻在资产阶级的故纸堆里而看不见实际生活、浸透资产阶级民主偏见、因而在客观上变成资产阶级奴才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只有不能站在**被压迫阶级**的立场上提出如下问题的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

在世界上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里，哪一个国家的**平常的、普通的工人**，平常的、普通的**雇农**或者农村半无产者（即占人口大多数的被压迫群众的一分子），能够多少象在苏维埃俄国那样，享有在最好的建筑物里开会的自由，享有利用最大的印刷所和最好的纸库来发表自己意见、维护自己利益的自由，享有推选正是本阶级的人去管理国家、“建设”国家的自由呢？

要是以为考茨基先生在任何一个国家从一千个了解情况的工人和雇农当中可以找出哪怕是一个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表示怀疑，那是可笑的。全世界的工人只要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承认真实情况的片断报道，就本能地同情苏维埃共和

国，正因为他们看到它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对穷人的民主，不是对富人的民主，而任何的、甚至最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都是对富人的民主。

管理我们（和“建设”我们国家）的是资产阶级的官吏，资产阶级的议员，资产阶级的法官。这是所有资产阶级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内）被压迫阶级中的千百万人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知道、每天感觉到和觉察到的浅显明白、无可争辩的真理。

在俄国，则完全地彻底地打碎了官吏机构，赶走了所有的旧法官，解散了资产阶级议会，建立了正是使工农更容易参加的代表机关，用工农苏维埃代替了官吏，或者由工农苏维埃监督官吏，由工农苏维埃选举法官。单是这件事实，就足以使一切被压迫阶级承认，苏维埃政权这一无产阶级专政形式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考茨基不理解每个工人都理解都清楚的这一真理，因为他“忘记了”提出、“已经不会”提出这个问题：究竟是对哪一个阶级的民主？他从“纯粹的”（即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民主的观点去推论。他正象夏洛克⁷那样来论证，只要“一磅肉”，别的什么都不要。公民一律平等，不然就没有民主。

我们不得不向博学的考茨基，向“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考茨基提出一个问题：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在讨论第二国际思想领袖的著作时竟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真是奇怪得很，真是不可思议。但是“一不做，二不

休”，既然谈起了考茨基，就必须向这位博学的人说明，为什么剥削者不可能同被剥削者平等。

被剥削者同剥削者能平等吗？

考茨基是这样推论的：

(1)“剥削者总是只占人口的极少数。”(考茨基的小册子第 14 页)

这是无可争辩的真理。从这一真理出发，应该怎样推论呢？可以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按社会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应该以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为基础。也可以按自由主义观点，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应该以多数和少数的关系为基础。

如果按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得说：剥削者必然要把国家（这里说的是民主，即国家的一种形式）变成本阶级即剥削者统治被剥削者的工具。因此，只要剥削者还统治着被剥削者多数，民主国家就必然是对剥削者的民主。被剥削者的国家应该根本不同于这种国家，它应该是对被剥削者的民主，对剥削者的镇压，而镇压一个阶级，就是对这个阶级不讲平等，把它排除于“民主”之外。

如果按自由主义观点来推论，那就得说：多数决定，少数服从。不服从者受处罚。再没有别的了。至于国家，包括“纯粹民主”在内，具有怎样的阶级性，就根本用不着讲了；这同问题没有关系，因为多数就是多数，少数就是少数。一

磅肉就是一磅肉，如此而已。

考茨基正是这样推论的：

(2) “根据什么理由无产阶级的统治要采取而且必须采取同民主不能相容的形式呢？”(第 21 页)接着他就说明无产阶级拥有多数，而且说得极其详细，极其罗嗦，既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又举出了巴黎公社选票的数字。结论是：“一个这样牢固地扎根在群众中的制度是没有丝毫理由去损害民主的。在有人用暴力来压制民主的情况下，这个制度也不免要使用暴力。暴力只能用暴力来回答。但是，一个知道自己受到群众拥护的制度使用暴力，仅仅是为了保护民主，而不是为了消灭民主。如果它要去掉自己的最可靠的基础，要去掉道义上的强大权威的深刻泉源——普选制，那它就简直是自杀了。”(考茨基的小册子第 22 页)

你们看，被剥削者和剥削者的关系在考茨基的论据中消失了。剩下来的只是一般多数，一般少数，一般民主，我们已熟悉的“纯粹民主”。

请注意，这些话还是谈到巴黎公社时说的呢！为了清楚起见，我们现在就来引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看看他们谈到巴黎公社时关于专政是怎样说的：

马克思说：“……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专政来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工人……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赋予国家以一种革命的暂时的形式……”^①

恩格斯说：(在革命中)“……获得胜利的政党迫于必要，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335 页。——编者注

不得不凭借它的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要是巴黎公社不依靠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①

恩格斯又说：“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那么，说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无稽之谈了：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②

考茨基同马克思、恩格斯之间，正如自由主义者同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一样，实有天渊之别。纯粹民主和考茨基笼统地说的“民主”不过是“自由的人民国家”的另一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考茨基带着饱学的书呆子的博学神情或者说带着十岁女孩的天真态度问道：既然拥有多数，还要专政干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说：

- 为了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
- 为了使反动派恐惧，
- 为了维持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
- 为了使无产阶级能够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

这些解释考茨基是不理解的。他迷恋于民主的“纯粹性”，看不见它的资产阶级性，“始终如一地”主张多数既然是多数，就用不着“粉碎”少数的“反抗”，用不着对少数“实行暴力镇压”，只要对破坏民主的情况实行镇压就够了。考茨基迷恋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44页。——编者注

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7页。——编者注

于民主的“纯粹性”，无意中犯了一切资产阶级民主派常犯的那个小小的错误：把形式上的平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彻头彻尾虚伪骗人的）当作事实上的平等！小事一桩！

剥削者不可能同被剥削者平等。

这个真理不管考茨基多么不喜欢，却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内容。

另一个真理是：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一切可能性没有完全消灭以前，决不可能有真正的事实上的平等。在首都起义成功或军队哗变时，可以一下子打倒剥削者。然而恐怕除了极罕见极特殊的场合，剥削者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在一个稍微大些的国家中，决不能一下子剥夺所有的地主和资本家。其次，只有作为法律行为或政治行为的剥夺，远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需要的是在事实上铲除地主和资本家，在事实上用另一种由工人对工厂和田庄的管理来代替他们。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不可能有平等，因为剥削者世代代又受教育，又有富裕的生活条件，又有各种技能，而被剥削者大众甚至在最先进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也是闭塞、无知、愚昧、胆怯和分散的。在革命以后的长时期内，剥削者必然在许多方面保持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他们还有货币（货币是不能一下子消灭的），有某些动产（往往是很多的）；有种种联系，有组织和管理的技能，知道一切管理“秘诀”（习惯、方法、手段和窍门）；有较高的教育程度，同高级技术人员（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接近；有无比高超的军事技能（这是很重要的），以及其他等等。

如果剥削者只在一国内被打倒（这当然是典型的情况，

因为几国同时发生革命是罕有的例外),他们依然比被剥削者强大,因为剥削者的国际联系是很广泛的。而且一部分被剥削者,即最不开展的中农和手工业者等等群众,是跟着并且会跟着剥削者走的,这已为过去的一切革命所证明,巴黎公社也不例外(因为凡尔赛军队中也有无产者,这一点被极其博学的考茨基“忘记了”)。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以为在比较深刻的、重大的革命中,可以简简单单地用多数和少数的关系来解决问题,那就是最大的愚蠢,就是庸俗的自由主义者的最愚蠢的偏见,就是**欺骗群众**,就是对群众隐瞒明显的历史真理。这个历史真理就是,在任何深刻的革命中,多年内对被剥削者还保持着巨大的事实上的优势的剥削者,照例要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反抗。剥削者没有在最后的、拼命的战斗中,在多次战斗中试验自己的优势以前,决不会象甜蜜蜜的傻瓜考茨基所甜蜜蜜地幻想的那样,服从被剥削者多数的决定。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整个历史时代。只要这个时代没有结束,剥削者就必然存着复辟希望,并把这种希望变为复辟尝试。被推翻的剥削者不曾料到自己会被推翻,他们不相信这一点,不愿想到这一点,所以他们在遭到第一次严重失败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疯狂的热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战斗,为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为他们的家庭而斗争,他们的家庭从前过着那么甜蜜的生活,现在却被“平凡的贱民”弄得破产和贫困(或者只好从事“平凡的”劳动……)。而跟着剥削者资本家走的,还有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世界各国几十年来的历史经验证明,小资产阶级总是

犹豫不决，动摇不定，今天跟着无产阶级走，明天又因革命遭到困难而害怕起来，因工人遭受初次失败或挫折而张皇失措，他们心慌意乱，东奔西跑，叫苦连天，从这个营垒跑到那个营垒……就象我国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在进行拼命的激烈战争的时代，当历史把千百年来的特权的存亡问题提上日程的时候，竟谈论什么多数和少数，什么纯粹民主，什么专政没有必要，什么剥削者同被剥削者平等!!要愚蠢到什么地步、庸俗到什么地步才会说出这种话来啊!但是资本主义比较“和平”发展的几十年(1871—1914年)已使迁就机会主义的各国社会党象奥吉亚斯的牛圈⁸那样堆满了庸俗、近视和叛变的秽物……

* * *

读者大概已经注意到，考茨基在我们上面从他书中引来的一段话内，说到什么侵犯普选制(附带指出，考茨基把普选制称为道义上的强大权威的深刻泉源。而恩格斯在也是论述巴黎公社并且也是论述专政问题的时候，却说的是对付资产阶级的武装人民这个权威。把庸人和革命家对“权威”的看法比较一下，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必须指出，剥夺剥削者的选举权问题，是纯粹俄国的问题，而不是一般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如果考茨基不虚伪，把他的小册子叫作《反对布尔什维克》，那么，小册子的书名就符合它的内容了，考茨基也就有权直截了当地谈论选举权了。但是，考茨基想首先以“理论家”的姿态出现。他把自己的小册子一般地叫作《无产阶级专政》。他只是在小册子的后一部分，从第6节起，才专门谈到苏维埃和俄国。前

一部分（我引证的话就在这一部分）谈的是**一般民主**和**一般专政**。考茨基一谈到选举权，便原形毕露，表明他是一个**根本不顾理论的**、反对布尔什维克的论战家。因为理论，即关于民主和专政的一般的（而不是某一个民族特殊的）阶级基础的论断，应该谈的不是选举权这样的专门问题，而是一般问题：在推翻剥削者、用被剥削者的国家代替剥削者的国家的历史时期，能不能**保留对富人的民主**，保留对剥削者的民主呢？

理论家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提出问题。

我们知道巴黎公社的例子，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巴黎公社以及谈到巴黎公社时的一切论断。我根据这种材料，在十月革命以前写的《国家与革命》那本小册子中，就分析了民主和专政的问题。我一句话也没有提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现在应该说，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是专政在某一民族中的特殊问题，而不是专政的一般问题。应该是在研究俄国革命的特殊条件和革命发展的**特殊道路**的时候才谈到限制选举权的问题。我在以后的阐述中是会这样做的。事先就担保将来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一定都会限制或大都会限制资产阶级的选举权，那是错误的。这种做法也许是可能的。在大战之后，在有了俄国革命经验之后，可能会这样做，但这不是实现专政所必需的，不是专政这一逻辑概念的必要标志，不是专政这一历史概念和阶级概念的必要条件。

专政的必要标志和必需条件，就是**用暴力镇压剥削者阶级**，因而也就是**破坏对这个阶级的“纯粹民主”**即平等和自由。

在理论上就是这样而且只能是这样提出问题。考茨基没

有这样提出问题，也就证明他不是作为理论家而是作为向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献媚的奴才来反对布尔什维克。

究竟在哪些国家里，由于某个资本主义的哪些民族特点，对剥削者的民主要实行（彻底实行或基本上实行）某种限制和破坏，这是关于某个资本主义和某个革命的民族特点问题。这不是理论问题，理论问题在于：**不破坏对剥削者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专政是否可能呢？**

考茨基正是避而不谈这个在理论上**唯一**重要的本质问题。考茨基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各种论述，就是**没有引用我在上面引过的同这个问题有关的论述。**

考茨基什么都谈了，能为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接受的、不超出他们思想范围的一切都谈了，就是没有谈主要的东西，没有谈到：**无产阶级不粉碎资产阶级的反抗，不用暴力镇压自己的敌人，就不能获得胜利，而凡是实行“暴力镇压”的地方，没有“自由”的地方，当然也就没有民主。**

这是考茨基不了解的。

写于 1918 年 10—11 月
1913 年莫斯科“共产党
人”出版社用单行本刊
印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并根
据手稿做过校订
选自《列宁全集》第 28 卷
第 224—238 页

注 释

- 1 《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这部著作是列宁继《国家与革命》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它深刻分析了

苏维埃民主的实质，揭示了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根本对立，彻底揭穿了考茨基和第二国际其他首领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的叛徒面貌。

列宁的这部著作是为批判考茨基的《无产阶级专政》一书而写的。

1918年8月，在柏林出版的考茨基主义者的《社会主义的对外政策》杂志刊登了考茨基的一篇号召各国社会民主党向布尔什维克作斗争的文章。列宁在1918年9月20日的《真理报》上读了此文的摘要后，立即给苏维埃共和国驻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全权代表瓦·瓦·沃罗夫斯基写信说：“考茨基的无耻谰言、胡说八道和庸俗不堪的机会主义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对于考茨基从理论上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行为不作任何斗争呢？”“只要考茨基的小册子（关于布尔什维克、专政等等）一出版，就请务必寄来（我特别需要），此外请替我收集考茨基关于布尔什维克的所有文章……以及其他文章（如果有的话）。”（见《列宁全集》第35卷第359、360页）

1918年10月初，列宁读了考茨基的小册子《无产阶级专政》以后，立即开始写作《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书。还在这部著作写完之前，列宁为了“尽快占领阵地，表明自己的意见”，就在10月9日写了一篇同名的文章（见《列宁全集》第28卷第88-97页），并指示苏维埃共和国驻柏林代表尽速把这篇文章译成外文发表。

1918年11月10日列宁写完《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同年由共产党人出版社出版。1919年在英国、法国、德国都出版了列宁的这部著作。

2 见本书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注25。

3 辉格党和托利党是英国的两个政党，产生于十七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辉格党起初代表大商业资产阶级、金融资产阶级以及一部分已经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利益，十九世纪中叶起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它与其他政治团体合并后，组成英国自由党。

托利党代表大地主和英国教会上层僧侣的利益，同时也依靠中、小僧侣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它维护旧的封建传统，反对国内的民主改革。

十九世纪中叶，在托利党的基础上成立了英国保守党。

这两个政党曾在英国轮流执政。

- 4 犹大之吻出自圣经《马太福音》第 26 章。犹大是耶稣的十二门徒之一，出卖耶稣的叛徒。他按照事先的约定，当着犹太教大祭司派来捉拿耶稣的兵丁亲吻耶稣，装作请安，于是那些兵丁就认出并逮捕了耶稣。后来，犹大之吻便成为虚伪的亲热的代用语。
- 5 德雷福斯案件指 1894 年法国总参谋部尉级军官犹太人阿德雷福斯 被法国军界反动集团诬控为德国间谍而被军事法庭判处终身服苦役一事。法国反动集团利用这一案件煽动反犹太主义和沙文主义，攻击共和制和民主自由。在事实证明德雷福斯无罪后，当局仍坚决拒绝重审，引起广大群众强烈不满。法国社会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进步人士（包括埃左拉、让饶勒斯、阿法朗士等）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要求重审这一案件的运动。在社会舆论压力下，1899 年瓦尔德克—卢梭政府撤销了德雷福斯案件，由共和国总统赦免了德雷福斯。但直到 1906 年 7 月，德雷福斯才被上诉法庭确认无罪，恢复了军职。
- 6 指英国资产阶级血腥镇压 1916 年爱尔兰争取摆脱英国统治的起义一事。在这一事件中，几乎全部起义领袖包括身受重伤的詹姆斯·康诺利都被枪决，一般参加者则被大批驱逐出国。

阿尔斯特是爱尔兰的东北部分，居民以英格兰人为主；阿尔斯特的军队曾和英国军队一起镇压了爱尔兰人民的起义。
- 7 见本书列宁《国家与革命》注 53。
- 8 奥吉亚斯的牛圈出典于希腊神话。据说古希腊西部厄利斯的国王奥吉亚斯养牛三千头，三十年来牛圈从未打扫，粪便堆积如山。奥吉亚斯的牛圈常被用来比喻藏垢纳污的地方。

列 宁

伟大的创举

（论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

论“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报刊上登载了红军战士的许多英勇事迹。工人和农民们在与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其他地主资本家军队作斗争中，表现了不少英勇果敢和坚韧不拔的奇迹，保卫着社会主义革命的果实。根绝游击习气和克服疲沓涣散现象的过程进行得很缓慢，很费力，然而却一直在前进。为了社会主义的胜利而自觉地承受牺牲的劳动群众的英雄主义，是红军中新的同志纪律的基础，是红军恢复、巩固和壮大的基础。

后方工人的英雄主义也同样值得重视。在这方面，工人自己发起组织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确实具有极大的意义。显然，这还只是开端，但这是非常重要的开端。这是比推翻资产阶级更困难、更重大、更深刻、更有决定意义的变革的开端，因为这是战胜自身的保守、涣散和小资产阶级利己主义，战胜万恶的资本主义遗留给工农的这些习惯。当这种胜利获得巩固时，那时，而且只有那时，新的社会纪律，社会主义的纪律才会建立起来；那时，而且只有那时，退回到资本主义才不可能，共产主义才真正变得不可战胜。

5月17日《真理报》¹登载了阿·日·同志的文章《用

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共产主义星期六）》。这篇文章很重要，所以我们把它全文照录如下：

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俄中共中央关于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信^①，给了共产党组织和共产党员以有力的推动。由于热情普遍高涨，铁路上的许多共产党员职工走上了前线，但是大多数人不能离开重要岗位，要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又找不到新的方法。来自各地的关于动员工作缓慢的消息和办事拖拉的现象，使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不得不去注意铁路机构的工作情况。结果了解到，由于劳动力不够和劳动效率低，一些急活和机车赶修任务都拖了下来。5月7日，在莫斯科—喀山铁路分局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大会上，提出了不能嘴上说帮助而要以实际行动帮助战胜高尔察克的问题。提出的建议中说：

“鉴于国内外形势的严重，为了对阶级敌人取得优势，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应当更加鞭策自己，从休息时间内抽出一小时，也就是把自己的工作日延长一小时，将这些时间集中起来，在星期六这天进行一次六小时的体力劳动，以便立即创造出实际的价值。我们认为，共产党员为保卫革命果实，不应吝惜自己的健康和生命，所以这项工作应该是无报酬的。提议在全分局内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一直干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

^①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263—266页。——编者注

开始人们有些犹豫，最后一致同意这个建议。

5月10日，星期六，晚上六点钟，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象士兵一样来到工作现场，整队之后，秩序井然地由领工员分别领到各处工作。

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下列表格指明了工作部门和工作性质。

工作地点	工作名称	工人 数目	工作时数		完成工作量
			工作 小时	合计	
莫斯科机车 总修配厂	装载发往佩罗沃 穆罗姆、阿拉特 里和塞兹兰的沿 线所需材料以及	48	5	240	装车7500普特 卸车1800普特
		21	3	63	
		5	4	20	
莫斯科客车 机务段	机车的复杂日常 修理	26	5	130	总共修理车1.5 台
莫斯科编组站	机车的日常修理	24	6	144	修理好机车2台 拆卸4台机的 应修部件
莫斯科车辆部	机车的日常修理	12	6	72	三等客车2辆
“佩罗沃”车 辆总修配厂	车辆修理和小修 星期六 星期日	46	5	230	棚车12辆 平车2辆
		23	5	115	
总计		205	—	1014	共修好机车4台 客货车16辆 装卸车9300普特

工作总值按正常工资计算为五百万卢布，按加班工资计算还应增加百分之五十。

装车的劳动效率较普通工人高百分之二百七十。其余工作的效率大致上也是这样。

因劳动力不足和办事拖拉而拖延七天至三个月的定活（紧急的）

现已完成。

由于设备发生故障(不难排除的故障),个别组曾耽误三四十分钟,但并未影响工作的完成。

留下来指导工作的管理人员,忙得几乎来不及给人们准备新的工作。一位上年纪的领工员也许是有些夸张地说,在一个**共产主义星期六**干的活,等于不自觉的疲沓的工人一个星期干的。

鉴于一些真心拥护苏维埃政权的人也来参加了工作,而且今后还会有大批这样的人来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同时其他地区也会要求学习莫斯科一喀山铁路的共产党员的榜样,现在我根据来自各个现场的消息较详细地谈谈组织方面的情况。

参加工作的约有百分之十是经常在现场工作的共产党员。其余的则是负责工作人员和选任的人员,其中有路局的政治委员,也有各企业的政治委员,以及工会人员、管理局和交通人员委员部的工作人员。

大家干活时非常努力并密切合作。当工人、办事员、管理人员齐心协力地把住40普特重的客运机车轮箍,象勤劳的蚂蚁似的把它滚往目的地的时候,人们心中油然而产生一种来自集体劳动的强烈的愉快感觉,坚定了工人阶级必胜的信心。世界上的掠夺者扼杀不了胜利的工人,国内的怠工者也盼不到高尔察克。

工作完结时,在场的人都亲眼看到这一空前未有的情景:上百个身体疲乏但眼中闪烁着愉快光芒的共产党员,唱起庄严的《国际歌》来庆祝工作的胜利,这胜利的凯歌的声浪仿佛越过墙壁,涌向工人的莫斯科,象投石激起的水波一样荡漾在整个工人的俄罗斯,激励着疲惫、懒散的人们。

阿·日·

5月20日《真理报》刊登的恩·尔·同志的《值得学习

的榜样》一文，在评价这个出色的榜样时写道：

“共产党员做这样的工作并不是罕见的事情。我知道车站和各铁路线都有这样的事例。在尼古拉铁路上，共产党员加班干了几个晚上，把陷在转盘坑里的机车起了出来；冬季，北方铁路上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用了好几个星期天去清除铁路上的积雪；许多货运站的支部为了同盗窃货物作斗争，在站上进行夜间巡逻，——不过这种工作都是偶然进行的，而不是经常性的。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提供的新的东西是，他们把这一工作变成了有系统的经常的工作。他们决定‘一直干到完全战胜高尔察克’，工作的全部意义正在于此。他们决定在整个战争状态时期把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的工作日延长一小时；同时他们作出工作高效率的榜样。

这个榜样已经引起而且今后**一定会**进一步引起大家的效法。亚历山德罗夫铁路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大会，讨论了军事形势和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的决议之后通过了如下的决议：（1）亚历山德罗夫铁路的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决定实行‘星期六义务劳动’。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定于5月17日进行。（2）把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组织成示范队，向工人表明，应当怎样工作，在现有的材料、工具和伙食的情况下实际上能够做到什么。

据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说，他们的榜样给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们预料下一个星期六将有大量的非党工人参加工作。作者写此文时，亚历山德罗夫铁路修配厂的共产党员还没有开始做加班工作，但是要组织义务劳动的消息刚一传出，非党群众就激动地谈论起来了。到处都有人说：‘昨天我们不知道，不然我们也会做好准备干它一场’，‘下星期六我一定来’。这项工作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很深的。

后方的所有共产党支部都应当向莫斯科—喀山线的同志们学习。

不仅莫斯科枢纽站上的各共产党支部应当如此，全俄罗斯的党组织都应当效法这个榜样。乡村中的共产党支部，首先应当帮助红军家属，实行代耕。

莫斯科一喀山线的同志们高唱《国际歌》结束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劳动。如果全俄罗斯的共产党组织都学习他们的榜样，而且坚持不懈地贯彻下去，那么，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就会在共和国全体劳动者的洪亮的《国际歌》声中度过今后一段艰苦的岁月……

共产党员同志们，动手干吧！”

1919年5月23日《真理报》报道说：

“5月17日在亚历山德罗夫铁路举行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共产党员和同情分子共九十八人根据大会决议在班后做了五小时无报酬的工作，他们不过有权再买一顿饭，而这顿饭同一般体力劳动工人的一样，也是每人半俄磅面包。”

尽管准备工作做得不充分，组织得也差，但劳动生产率还是比平常高一至两倍。

例如：

五个车工在四小时内做了八十根小轴。生产率等于平常的百分之二百一十三。

二十个粗工在四小时内收集了六百普特旧材料和七十各重三点五普特的车底弹簧，共重八百五十普特。生产率等于平常的百分之三百。

“同志们解释说，这是因为平时干活枯燥乏味，在这里，大家干活都兴高采烈。可是今后，平时干活比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干得少，那就太丢脸了。”

“现在有许多非党工人都表示愿意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各机车

修理队都自告奋勇要在星期六义务劳动时间内把机车从‘坟堆’里弄出来，修好使用。

有消息说，维亚济马铁路上也在组织这样的星期六义务劳动。”

阿·嘉琴科同志在6月7日《真理报》上谈到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情形，现在把他的《星期六义务劳动记》一文的主要部分摘引如下：

“我和一个同志怀着极愉快的心情，遵照铁路分局党委员会的决定，去上星期六义务劳动‘课’，让脑子暂且休息几个小时，让肌肉发挥一下作用……我们的工作是在铁路局的木工厂。到那里后，看到自己人，彼此问好，开一会儿玩笑，查点了人数——总共三十人……我们面前躺着一个‘怪物’——一个相当有份量的蒸汽锅炉，足有六百至七百普特重，要我们把它‘搬家’，就是说，要把它滚到大约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俄里以外的一个平车那里。我们心里不由得产生了一些疑虑……但我们动手干起来了：同志们把木滚就那么往锅炉下面一垫，系上两根绳子，工作就开始了……锅炉还有点不情愿挪动，但最终还是移动了。我们很高兴，要知道，我们人是这样少……就是这台锅炉，比我们多两倍的非党工人几乎拖了两个星期，在我们到来之前它还躺在原地不动……我们在一位领班同志有节奏的‘一、二、三’口令声中，齐心协力地卖劲地干了一个小时，锅炉慢慢地向前移动着。忽然，出了岔子！一长串同志突然狼狈不堪地倒了下去，——原来我们手里的一根绳子‘叛变了’……但是没有多大一会儿，就换上了一根粗缆绳……到了傍晚，天色已经明显地暗下来，但我们还得拖过一个小岗子，那时很快就会完工了。我们胳膊酸痛，手掌发烧，周身火热，还是拼命地往前拉，——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旁边站着一位‘管理人’，他被我们的成绩弄得不好意思了，也不由自主地拉起缆绳。帮着干吧！

你早就该过来了！一个红军战士出神地瞧着我们工作。他拿着手风琴。他在想什么？也许他想：这是些什么人？大家都回家去过星期六，他们这是在干什么？我打破他的疑团说：‘同志！给我们奏一个快乐的曲子吧，我们可不是什么来随便凑数干活的，我们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你看，这手里的活干得多欢，咱们可没有偷懒，是在拼命地干。’红军战士轻轻地放下手风琴，赶快跑过来抓住缆绳……

——‘英国人真机灵！’——响起了乌·同志动听的男高音。我们和他的歌声，高唱起工人歌曲：‘唉嗨，杜宾努什卡，嗨哟，拉呀，拉呀……’

干这活不习惯，累得要死，肩酸背痛，但是……明天就是假日，可以好好休息，有时间睡个够。目的地快到了，经过一番小小的周折，我们的‘怪物’已差不多靠近平车了：只要垫上木板，滚到平车上，这锅炉就能干人们早就等着它干的工作了。我们一窝蜂涌进屋里，这是地方支部的‘俱乐部’，屋里挂满标语，摆着步枪，灯光明亮，我们很好地唱完了《国际歌》，享受了加‘甜酒’的茶，还吃了面包。干完重活以后，当地同志这样款待我们，真是再惬意不过了。和同志们亲热地告别之后，我们列成纵队。夜阑人静，革命歌声响彻了沉睡的街道，整齐的步伐声应和着歌声。‘同志们，勇敢地齐步前进。’‘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我们唱起劳动歌和《国际歌》。

过了一个星期。胳膊和肩膀都歇过来了，这回我们的‘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到九俄里以外去修理车辆。目的地是佩罗沃。同志们爬到叫作‘美国人’的车厢顶上，嘹亮动听地唱起《国际歌》。乘客们带着惊异的神情静静听着。车轮有节奏地响着；我们没有来得及爬到上面去的人就蹬在‘美国人’车厢的梯子上，象是一些‘玩命的’乘客。转眼就到了车站。我们到达目的地，又走过一个长长的院子，见到了

亲热的政治委员格·同志。

——工作有的是，就是人太少了！总共才三十个人，六小时内要完成十三辆车的中修！面前就是划了记号的轮对，不光有空车，还有装得满满的一辆油罐车……不过没问题，同志们咱们‘对付得了’！

工作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我和五位同志用吊杆，也就是用杠杆干活。按照‘领头’同志的指挥，这些重六七十普特的轮对，在我们的肩膀和两个吊杆的推压下，轻快地从一条线路跳到另一条线路上。一对车轮撤掉之后，就换上一对新的。放好所有的轮对，我们就把那些磨损了的旧家伙顺着轨道迅速地‘打发到’棚子里去……一、二、三，——它们被一台旋转式铁吊杆吊到空中，轨道就腾出来了。那边，在黑暗中，响着手锤声，同志们在自己的‘病’车跟前象蜜蜂般地忙碌着。既做木工，又上油漆，还盖车顶，工作干得热火朝天，我们和政治委员同志都很高兴。那里的锻工们也需要我们帮忙。在一座移动锻工炉上放着一根烧红了的‘导杆’，也就是车辆上用的钩杆，钩已经撞弯。白热的钩杆被钳到砧子上，直冒火花，在经验丰富的同志的指导下，我们灵巧的锤击使它渐渐恢复了原状。它还放着红光就被我们迅速地抬去，冒着火花安进铁孔里，——锤了几下，就把它安好了。我们爬到车厢底下。这些车钩和导杆的构造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那里有一整套东西，有铆钉、弹簧……

工作热火朝天，夜幕降临了，炉火烧得更亮。很快就完工了。一部分同志靠着一堆轮箍在‘憩息’，慢慢地‘品’着热茶。清凉的5月之夜，一钩美妙的新月悬在天空。人们有说有笑，互相开着玩笑。

——格·同志，收工吧，修好十三辆不少了！

但格·同志还没有心满意足。

喝完了茶，我们唱着庆祝胜利的歌曲，向出口走去……”

开展“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运动的地方，不只是莫斯科。6月6日《真理报》报道：

“5月31日在特维尔进行了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有128名共产党员到铁路上劳动。三个半小时装卸了十四辆车，修好了三台机车，锯了十立方俄丈木柴，还做了别的工作。熟练的工人党员的工作效率比一般效率高十二倍。”

接着，6月8日《真理报》又写道：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

“萨拉托夫6月5日讯。铁路上的共产党员职工响应莫斯科的同志们的号召，在党员大会上决定：为了支援国民经济，每星期六无报酬地加班劳动五小时。”

* * *

我详尽无遗地援引了关于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消息，因为我们从这里无疑地可以看到共产主义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对于这个方面，我们的报刊没有充分地加以重视，我们大家也还没有给予应有的评价。

少唱些政治高调，多注意些极平凡的但是生动的、来自生活并经过生活检验的共产主义建设方面的事情，——我们大家，我们的作家、鼓动员、宣传员、组织者等等都应当不倦地反复提出这个口号。

在无产阶级革命后的初期，我们首先忙于主要的和基本的任务，即击败资产阶级的反抗，战胜剥削者，粉碎他们的阴谋（如从黑帮和立宪民主党人²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³都参加过的企图出卖彼得格勒的“奴隶主的阴谋”⁴），

这是当然的，不可避免的。但除了这个任务以外，同样不可避免地要提出——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提出——一个更重要的任务，即从积极方面来说建设共产主义，创造新的经济关系，建立新社会。

我曾屡次指出，例如3月12日我在彼得格勒工人、农民和红军代表苏维埃会议上讲话时就曾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只是对剥削者使用的暴力，甚至主要的不是暴力。这种革命暴力的经济基础，它的生命力和成功的保证，就在于无产阶级代表着并实现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类型的社会劳动组织。实质就在这里。共产主义的力量源泉和必获全胜的保证就在这里。

农奴制的社会劳动组织靠棍棒纪律来维持，劳动群众极端愚昧，备受压抑，横遭一小撮地主的掠夺和侮辱。资本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靠饥饿纪律来维持，在最先进最文明最民主的共和国内，尽管资产阶级文化和资产阶级民主有很大的进步，广大劳动群众仍旧是一群愚昧的、受压抑的雇佣奴隶或被压迫的农民，横遭一小撮资本家的掠夺和侮辱。共产主义的社会劳动组织——其第一步为社会主义——则靠推翻了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劳动群众本身自由的自觉的纪律来维持，而且愈向前发展就愈要靠这种纪律来维持。

这种新的纪律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由善良的愿望产生的，它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生长起来的，而且只能是从这种条件中生长起来。没有这种物质条件就不可能有这种纪律。代表或体现这种物质条件的是大资本主义所创造、组织、团结、训练、启发和锻炼出来的一定历史阶级。这个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如果我们把无产阶级专政这个原出拉丁文的、历史哲学的科学用语译成普通的话，它的意思就是：

在推翻资本压迫的斗争中，在推翻这种压迫的过程中，在保持和巩固胜利的斗争中，在创建新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的事业中，在完全消灭阶级的全部斗争中，只有一个阶级，即城市的总之是工厂的产业工人，才能够领导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我们要顺便指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科学区别，只在于第一个词是指从资本主义生长起来的新社会的第一阶段，第二个词是指它的下一个阶段，更高的阶段。）

“伯尔尼”国际⁵即黄色国际的错误，就在于它的领袖们只在口头上承认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却害怕思索到底，害怕作出恰恰是资产阶级觉得特别可怕和绝对不能接受的必然结论。他们害怕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也是一个阶级斗争时期，只要阶级没有消灭，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不过它的形式有所改变，在推翻资本后的初期变得更加残酷，更加独特。无产阶级夺得政权之后，并不停止阶级斗争，而是继续阶级斗争，直到消灭阶级——当然，是在另一种环境中，在另一种形式下，采取另一些手段。

“消灭阶级”是什么意思呢？凡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人，都承认社会主义的这个最终目的，但远不是所有的人都深入思索过它的含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的了）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

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

显然，为了完全消灭阶级，不仅要推翻剥削者即地主和资本家，不仅要废除他们的所有制，而且要废除任何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消灭城乡之间、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这是很长时期才能实现的事业。要完成这一事业，必须大大发展生产力，必须克服无数小生产残余的反抗（往往是特别顽强特别难于克服的消极反抗），必须克服与这些残余相联系的巨大的习惯势力和保守势力。

认为一切“劳动者”都同样能胜任这一工作，那是纯粹的空话或马克思以前的旧社会主义者的幻想。因为这种能力不是自行产生的，而是在历史上生长起来的，并且只能是从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物质条件中生长起来的。在开始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时候，只有无产阶级才具有这种能力。它能够完成它所肩负的巨大任务，第一是因为它是各文明社会中最强大最先进的阶级；第二是因为它在最发达的国家中占人口的多数；第三是因为在象俄国这样一些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大多数人是半无产者，就是说，这些人总是每年有一部分时间过着无产者的生活，总是某种程度上靠在资本主义企业中从事雇佣劳动来维持生活。

谁想根据什么自由、平等、一般民主、劳动民主派的平等这类泛泛的空话来解决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任务（象考茨基、马尔托夫和伯尔尼国际即黄色国际其他英雄们所做的那样），谁就只能以此暴露出他在思想方面奴隶般地跟着资产阶级跑的小所有者、庸人和市侩的本性。要正确地解

决这一任务，只有具体地研究已经夺得政权的那个特殊的阶级即无产阶级和所有一切非无产阶级以及半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之间的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在空想和谐的、“理想的”环境中形成的，而是在资产阶级进行疯狂的和多种多样的反抗的现实环境中形成的。

在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包括俄国在内，大多数人，尤其是劳动群众，都千百次地亲身遭受过，他们的亲属也遭受过资本的压迫、资本的掠夺和各种各样的侮辱。帝国主义战争——为决定由英国资本或德国资本取得掠夺全世界的霸权而屠杀千百万人的战争——更异常地加剧、扩大和加深了这种困苦，使人们认清了这种困苦。所以大多数人尤其是劳动群众必然同情无产阶级，因为无产阶级英勇果敢、毫不留情地以革命手段推翻资本的压迫，推翻剥削者，镇压他们的反抗，用自己的鲜血开辟一条创建不容剥削者存在的新社会的道路。

非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那种小资产阶级的犹豫动摇，即倒退到资产阶级“秩序”、资产阶级“卵翼”下去的倾向不论如何严重，如何不可避免，他们也终究不能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道义上政治上的威信，因为无产阶级不仅推翻剥削者并镇压他们的反抗，而且建立新的更高的社会联系，新的更高的社会纪律，即联合起来的自觉的工作者的纪律，这些工作者除了他们自己的职业组织的权威以外，除了他们自己的更加自觉、勇敢、团结、革命、坚定的先锋队的权威以外，是不承认任何束缚和任何权威的。

为了取得胜利，为了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解决双重的或二位一体的任务：第一，用自己在反对资本

的革命斗争中奋不顾身的英勇精神吸引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吸引他们，组织他们，领导他们去推翻资产阶级和彻底镇压资产阶级的一切反抗；第二，把全体被剥削劳动群众以及小资产阶级的所有阶层引上新的经济建设的道路，引上建立新的社会联系、新的劳动纪律、新的劳动组织的道路，这种劳动组织把科学和资本主义技术的最新成就同创造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自觉工作者大规模的联合联结在一起。

这第二个任务比第一个任务更困难，因为解决这个任务决不能靠一时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而需要在大量的日常工作中表现出来的最持久、最顽强、最难得的英勇精神。但这个任务又比第一个任务更重要，因为归根到底，战胜资产阶级所需力量的最深源泉，这种胜利牢不可破的唯一保证，只能是新的更高的社会生产方式，只能是用社会主义的大生产代替资本主义的和小资产阶级的生产。

* * *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具有巨大的历史意义，是因为它向我们表明了工人自觉自愿提高劳动生产率、过渡到新的劳动纪律、创造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的首创精神。

一位不可多得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约·雅科比（他在1870—1871年的教训之后没有转向沙文主义和民族自由主义而转向了社会主义）曾经说过，建立一个工人联合会比萨多瓦会战⁶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这话说得很对。萨多瓦会战所解决的，是在建立德意志民族资本主义国家方面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资产阶级君主

国究竟哪一个当霸主的问题。建立一个工人联合会是无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产阶级的一个小小的步骤。我们同样也可以说，1919年5月10日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一次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要比兴登堡或者福煦和英国人在1914—1918年帝国主义大战中的任何一次胜利具有更大的历史意义。帝国主义者的胜利是为了英美法三国亿万富翁的利润而对千百万工人进行的屠杀，是垂死的、快胀死的和在活活腐烂的资本主义的残暴行为。而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却是使世界各国人民摆脱资本桎梏和战争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一个细胞。

资产者老爷们及其走狗，包括那些惯于自命为“舆论”代表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当然要嘲笑共产党人的希望，称这种希望是“小花盆里栽大树”，讥笑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次数同大量存在的盗窃公物、游手好闲、生产率低落、损毁原料和产品等等现象比较起来是微乎其微的。我们回答这班老爷们说：假如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知识用来帮助劳动群众，而不是用来帮助俄国和外国资本家恢复他们的权力，那么变革会进行得快一些，和平一些。但这是空想，因为问题要由阶级斗争来解决，而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倾向于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取得胜利，将不是靠知识分子的帮助，而是排除他们的对抗（至少是在大多数场合下），抛弃那些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同时改造和重新教育动摇的知识分子，使之服从自己，把其中越来越多的人逐步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对变革中的困难和挫折幸灾乐祸，散布惊慌情绪，宣传开倒车，——这一切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阶级斗

争的手段和方法。无产阶级是不会让自己受骗的。

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错误和反复而一下子就确立起来的吗？农奴制颠覆后过了半个世纪，俄国农村仍有不少的农奴制残余。美国废除黑奴制度后过了半个世纪，那里的黑人往往还处于半奴隶状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一贯替资本服务，至今还在强词夺理，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前，他们责备我们是空想主义，在革命之后，他们却要求我们以神奇的速度铲除过去的遗迹！

但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知道资产阶级“论据”的真正价值，也知道在革命后的一定时期内旧习俗残余必然比新事物的幼芽占优势。当新事物刚刚诞生时，旧事物在某些时候总是比新事物强些，这在自然界或社会生活中都是常见的现象。讥笑新事物的幼芽嫩弱，抱着知识分子的轻浮的怀疑态度等等，——这一切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手段，是保护资本主义而反对社会主义。我们应当仔细研究新事物的幼芽，对它们极其关切，千方百计地帮助它们成长和“护理”这些嫩弱的幼芽。其中有一些不免会死亡。不能担保说，“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一定会起特别重要的作用。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应支持各种各样新事物的幼芽，生活本身会从中选出最富有生命力的幼芽。一位日本科学家为了帮助人们战胜梅毒，耐心地试验了六百零五种药品，直到制出满足一定要求的第六百零六种药品，要想解决战胜资本主义这一更困难的任務的人们，也应该具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来试验几百以至几千种新的斗争方法、方式和

手段，直到从中得出最适当的办法。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发起这种劳动的，并不是条件特别好的工人，而是各种不同专业的工人，还有并无专业的工人，也就是处于**通常的即最困难**的条件下的粗工。我们大家都清楚，现在不仅在俄国一国，而且在世界各国都出现劳动生产率低落的现象，其基本原因就是帝国主义战争所引起的破产和贫困，愤恨和疲乏，以及疾病和饥饿。最后这一点最为重要。饥饿，这就是原因之所在。为了消灭饥饿现象，必须提高农业、运输业和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个循环：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得消除饥饿，而要消除饥饿，又得提高劳动生产率。

大家知道，这类矛盾在实践上是靠打破这种循环，靠群众情绪的转变，靠一些集团的英勇首创精神来解决的，而首创精神在群众情绪转变的背景下往往起着决定的作用。莫斯科的粗工和莫斯科的铁路员工（当然指的是大多数，而不是少数投机者、管理者以及诸如此类的白卫分子）是生活极端困难的劳动者。他们经常吃不饱，而在目前青黄不接、粮食状况普遍恶化的时候，简直是在饿肚子。可是，就是这些处在资产阶级、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恶毒的反革命煽动包围中的忍饥挨饿的工人，不顾饥饿、疲乏和衰弱，实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不领任何报酬地加班工作，并且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难道这不是极伟大的英雄主义吗？难道这不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的开端吗？

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使新社会制度取得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资本主义创造了在农奴制度下所没有过的

劳动生产率。资本主义可以被最终战胜，而且一定会被最终战胜，因为社会主义能创造新的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这是很困难很长期的事业，但这个事业已经开始，这是最主要的。度过四年艰苦的帝国主义战争、又度过一年半更艰苦的国内战争的挨饿的工人，1919年夏季尚且能在饥饿的莫斯科开始这件伟大的事业，一旦我们在国内战争中取得胜利并争得和平，它又将获得怎样的发展呢？

共产主义就是利用先进技术的、自愿自觉的、联合起来的工人所创造的较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非常可贵，它是共产主义的实际开端，而这是极其难得的，因为我们现时所处的阶段，“只是采取最初步骤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正如我们党纲中完全正确地指出的那样）^①。

普通工人起来承担艰苦的劳动，奋不顾身地设法提高劳动生产率，保护**每一普特粮食、煤、铁**及其他产品，这些产品不归劳动者本人及其“近亲”所有，而归他们的“远亲”即归全社会所有，归起初联合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然后联合为苏维埃共和国联盟的亿万人所有，——这也就是共产主义的开始。

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讥笑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人权大宪章的浮华辞藻，讥笑了所有关于一般自由、平等、博爱的美丽词句，这些词句迷惑了一切国家的市侩和庸人，也迷惑了今日的卑鄙的伯尔尼国际的卑鄙英雄们。与这种冠冕堂皇的人权宣言针锋相对，马克思用无产阶级的平凡的、

^① 见《列宁全集》第2版第36卷第417页。——编者注

质朴的、实在的、简单的提法提出问题。由国家规定缩短工作日，就是这种提法的一个典型。^① 无产阶级革命的内容愈展开，马克思意见的全部正确性和深刻性在我们面前就显得愈清楚，愈透彻。真正共产主义的“公式”与考茨基之流、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及其在伯尔尼国际中的亲爱“兄弟们”的华丽、圆滑、堂皇的辞藻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把一切归结于劳动条件。少谈些什么“劳动民主”，什么“自由、平等、博爱”，什么“民权制度”等等的空话吧。今天有觉悟的工人和农民从这些浮夸的词句里，是不难看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欺诈手腕的，正象每个有生活经验的人只要看到那种“贵人”修饰得十分“光滑的”面孔和外表，就能一下子正确无误地断定“这准是个骗子”。

少说些漂亮话，多做些平凡的、日常的工作，多关心每普特粮食和每普特煤吧！多多努力使挨饿的工人和褴褛的农民所必需的每一普特粮食和每一普特煤，不是通过奸商的交易，通过资本主义的方式获得，而是通过象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粗工和铁路员工这样的普通劳动者自觉自愿的奋不顾身的英勇劳动来获得。

我们大家应当承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革命问题上崇尚空谈的遗风现在还到处都可以看到，甚至在我们队伍里也是这样。例如，我们的报刊很少向腐朽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这些腐朽的残余开战，很少支持普通的、质朴的、平凡的但是生气勃勃的真正共产主义幼芽。

拿妇女状况来说吧。在这一方面，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先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33—335页。——编者注

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内任何一个民主政党，几十年中也没有做出我们在我国政权建立后第一年内所做到的百分之一。我们真正彻底废除了那些剥夺妇女平等权利、限制离婚、规定可恶的离婚手续、不承认私生子、追究私生子的父亲等等卑鄙的法律，这种法律的残余在各文明国家内还大量存在，而这正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耻辱。我们有充分的权利以我们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而自豪。可是，我们把旧时资产阶级法律和制度的废物清除得愈干净，我们就愈清楚地看到，这只是为建筑物清理地基，还不是建筑物本身。

尽管颁布了种种解放妇女的法律，妇女仍然是**家庭奴隶**，因为琐碎的家务压在她们身上，使她们喘不过气来，变得愚钝卑微，把她们禁锢在做饭管孩子的事情上，用完全非生产性的、琐碎的、劳神的、使人愚钝的、折磨人的事情消耗她们的精力。只有在大规模地开始为消除这种琐碎家务而斗争（在掌握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领导下），更确切地说，大规模地开始把琐碎家务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地方和时候，才开始有真正的**妇女解放**，真正的共产主义。

对于这个所有共产党员在理论上都没有异议的问题，我们在实践中给予了足够的注意吗？当然没有。我们对于这方面已有的共产主义幼芽给予了足够的关心吗？还是这句话：没有，没有。公共食堂、托儿所和幼儿园就是这些幼芽的标本，正是这些平凡的、普通的、既不华丽、也不夸张、更不显眼的设施，在实际上能够**解放妇女**，减少和消除她们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方面同男子的不平等。这些设施不是新的，它们（也如社会主义的一切物质前提一样）是由

大资本主义造成的，但它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第一，数量极少，第二，——这点特别重要——不是具有投机、渔利、欺骗、伪造等劣迹的营利性企业，就是理应受到优秀工人憎恶和鄙视的“资产阶级慈善事业的把戏”。

毫无疑问，在我国，这样的机构已经比过去多得多了，而且它们的性质已经**开始**改变。毫无疑问，女工和农妇中有**组织才能**的人比我们知道的要多许多倍，她们善于举办有很多工作者和更多使用者参加的实际事业，而没有自命不凡的“知识分子”或幼稚的“共产党员”所常“患”的那些毛病：空话连篇，无事奔忙，无谓争吵，空谈计划、体系等等。可是我们还没有认真地**护理**这些新事物的幼芽。

请看看资产阶级。他们多么善于宣扬他们所需要的东西！资本家在他们发行千百万份的报纸上对他们心目中的“模范”企业大肆赞扬，把资产阶级的“模范”机构当作民族的骄傲！我们的报刊却不注意或者说几乎完全不注意报道那些最好的食堂或托儿所，不断促使其中一些机构成为模范机构，为它们作宣传。至于模范的、共产主义的工作，在节省人力方面，在便利使用者、节约产品、把妇女从家庭奴隶境遇中解放出来、改善卫生条件等方面正在作出什么成绩，能够作出什么成绩，以及如何将这一切推广到全社会，推广到全体劳动群众中去，报刊也没有详细报道。

模范的生产，模范的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对取得和分配每普特粮食所表现的模范的认真负责态度，模范的食堂，某个工人住房和某个街区的模范的清洁卫生工作，——这一切是我们的报刊和**每个工人和农民组织**应当比现在更加

十倍注意和关心的对象。所有这些都是共产主义的幼芽，照管这些幼芽是我们共同的和首要的义务。不管我们的粮食和生产状况怎样困难，在布尔什维克执政的一年半中还是在各方面取得了无可怀疑的进展：粮食的收购量从三千万普特（1917年8月1日至1918年8月1日）增加到1亿普特（1918年8月1日至1919年5月1日）；蔬菜业发展了，未播种的土地面积减少了，铁路运输在燃料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开始得到改善，等等。在这样的总的背景下，在无产阶级国家政权的支持下，共产主义的幼芽不会夭折，一定会茁壮地成长起来，发展成为完全的共产主义。

* * *

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意义，以便从这个伟大创举中得出一切由它产生的极其重要的实际教训。

从各方面支持这一创举，这是首先的、也是主要的教训。“公社”这个词在我们这里用得也太随便了。凡是共产党员创立的或在共产党员参加下创立的一切企业，往往一下子就宣布为“公社”，而人们却往往忘记，如此光荣的名称是要用长期顽强的劳动争得的，是要用在真正共产主义建设中证实了的实际成效争得的。

因此，中央执行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已经考虑成熟，决定废除人民委员会法令中涉及“消费公社”这一名称⁷的内容，这个决定在我看来是完全正确的。让名称普通一些，这样，新的组织工作在最初阶段上的缺陷和缺点也就不会推到“公社”身上，而将由不好的共产党员负责（这是理所当然的）。

最好是不允许广泛使用“公社”字样，禁止动辄使用这个字眼，或者只承认那些在实践中真正证明（并由附近全体居民一致公认）有按共产主义精神办事的能力和本领的真正的公社，才有权使用这个名称。首先你要证明自己能为社会、为全体劳动群众无偿地劳动，能“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模范地进行工作，然后你才有权取得“公社”这个光荣称号！

在这方面，“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是一个十分宝贵的例外，因为这里，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粗工和铁路工人首先在实际上证明了他们确实能象共产主义者一样工作，然后他们才称自己的创举是“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应当努力争取，而且一定要做到。今后不论是谁，只要未经艰苦劳动和长期劳动的实际成效以及真正按共产主义精神办事的模范事迹证实，就把自己的企业、机关或事业称作公社，都应当被看成骗子或空谈家，受到无情的嘲笑和羞辱。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个伟大创举，在另一方面，即在清党工作中，也应当予以利用。在革命后的初期，很多“诚实的”和抱着庸俗心理的人特别胆小畏缩，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然包括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内——则全体怠工，以此讨好资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冒险家和其他危害分子乘机混进执政党里来，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任何革命都有过这种现象，而且不可能没有这种现象。全部问题在于，以健康的强有力的先进阶级作为依靠的执政党，要善于清洗自己的队伍。

在这方面我们早已开始工作。要坚持不懈地继续这一工

作。动员共产党员去作战这件事帮助我们——胆小鬼和坏蛋逃到党外去了。让他们滚开吧！党员数量上的这种减少意味着党的力量和作用的大大增加。要利用“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这个创举继续清党：非经半年“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考验”或“见习期”，不得接收入党。1917年10月25日以后入党的一切党员，如果没有特殊的劳动或功绩证明自己绝对忠诚可靠，能够做一个共产党人，都需要经过这样的审查。

清党工作，同不断提高党对真正共产主义工作的要求联系起来，将会改善国家政权机关，并大大促使农民早日彻底转到革命无产阶级方面来。

“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也非常鲜明地显示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国家政权机关的阶级性质。党中央写过一封“用革命精神从事工作”的信。^①这是拥有一二十万党员（我预料在严格清党后将留下这么多，目前党员人数是超过这一数字的）的中央委员会提出的主张。

这个主张得到了工会的有组织的工人的响应。这样的工人在我们俄罗斯和乌克兰有四百万人。他们绝大多数是拥护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拥护无产阶级专政的。二十万和四百万，这就是两个“齿轮”（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比例。此外，还有几千万农民，他们主要分成三类：人数最多的、同无产阶级最接近的一类，即半无产者，或者说贫苦农民；其次是中农；最后是人数最少的一类，即富农，或者说农村资产阶级。

只要还有可能买卖粮食和利用饥荒来干投机勾当，农民

^① 舒尔采-格弗尼茨《不列颠帝国主义》第320等页。——编者注

就仍是（这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定时期内是不可避免的）半劳动者和半投机者。作为投机者，农民是敌视我们，敌视无产阶级国家的，他们同资产阶级和主张自由买卖粮食的资产阶级的忠实奴仆（直到孟什维克舍尔或社会革命党人波·切尔年科夫）往往是一致的。但是**作为劳动者**，农民是无产阶级国家的朋友，是工人在反对地主资本家的斗争中最忠实的同盟者。作为劳动者，千百万的农民大众是支持一二十万人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并由几百万有组织的无产者所组成的国家“机器”的。

真正更民主的、同被剥削劳动群众有更紧密联系的国家在世界上还没有过。

正是这种由“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所标志所实现的无产阶级工作，一定会彻底巩固农民对无产阶级国家的尊敬和爱戴。这种工作，而且只有这种工作，才会彻底使农民相信我们正确，相信共产主义正确，才会使农民成为我们无限忠实的拥护者，也就是说，才会把粮食困难完全克服，使共产主义在粮食生产和分配问题上完全战胜资本主义，使共产主义完全巩固起来。

1919年6月28日

1919年7月在莫斯科用

单行本刊印

署名：尼·列宁

按手稿刊印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第39卷第1—29页

注 释

- 1 见本书列宁《国家与革命》注 45。
- 2 见本书列宁《论工人政党对宗教的态度》注 13。
- 3 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成员。该党是 1901 年底—1902 年初由一些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的。社会革命党人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策略方面，社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法还是搞个人恐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1917 年二月革命后，随着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群众参加政治生活，社会革命党的影响扩大，党员人数激增。社会革命党中央实行妥协主义和阶级调和的政策，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党的首领亚·费·克伦斯基，尼·德·阿夫克森齐耶夫，维·米·切尔诺夫等参加了临时政府。1917 年七月事变时期，社会革命党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面。社会革命党中央的妥协政策造成党的分裂，左翼于 1917 年 12 月组成了一个独立政党——左派社会革命党。1917 年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右派和中派）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建立地下组织，1918 年 6 月被开除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18—1920 年国内战争时期，他们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人实行个人恐怖。社会革命党人推行所谓“第三种力量”的蛊惑政策，在 1918 年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在各地参与建立反革命“政府”，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统治扫清了道路。1919 年 8 月，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人民派，同苏维埃政权合作。该党的极右派则同白卫分子结成公开联盟。内战结束后，社会革命党重新成了俄国国内反革命势力的领导。他们提出“不要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组织了一系列的叛乱。这些叛乱被平息后，1922 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

- 4 指 1919 年夏尤登尼奇白卫军进攻彼得格勒期间潜藏在苏维埃军队后方的反革命分子所策划的阴谋活动。1919 年 6 月 12 日夜間，反革命组织“民族中心”的成员策动位于芬兰湾东端南岸的红丘、灰马等炮台的守备部队举行叛乱。叛乱分子企图使喀琅施塔得防区陷于瘫痪，然后与白卫军进攻相配合，攻占加契纳，切断彼得格勒同莫斯科的联系，进而夺取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组织了主要由水兵和彼得格勒工人参加的海岸部队，于 15 日发动进攻，在海军舰艇和飞机配合下，迅速攻下了这些炮台，平定了叛乱。同时，15000 多名彼得格勒工人同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一起在彼得格勒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搜查，拘捕了反革命分子数百人。
- 5 伯尔尼国际是持社会沙文主义、机会主义和中派主义立场的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首领们在 1919 年 2 月伯尔尼代表会议上成立的联盟。伯尔尼国际的领袖是卡·亚·布兰亭、卡·考茨基、爱·伯恩斯坦、皮·列诺得尔等。他们力图恢复已于 1914 年瓦解的第二国际，阻挠革命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防止成立共产国际。他们敌视苏维埃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颂扬资产阶级民主。1921 年 2 月，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法国社会党、英国独立工党等退出伯尔尼国际，成立了维也纳国际（第二半国际）。1923 年 5 月，在革命斗争浪潮开始低落的形势下，伯尔尼国际同维也纳国际合并成为社会主义工人国际。
- 6 萨多瓦会战亦称克尼格雷茨会战，是 1866 年普奥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交战，于当年 7 月 3 日在捷克境内的萨多瓦和克尼格雷茨（今赫拉德茨—克拉洛韦）地区进行，结果普军大败奥军，从而决定了这次普奥战争的结局。
- 7 人民委员会于 1919 年 3 月 16 日通过法令，将消费合作社合并、改组为统一的分配机关，名为“消费公社”。这一新名称在某些地方引起了对法令的一些误解。有鉴于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 1919 年 6 月 30 日通过了《关于工农消费合作社的决定》，在对上述法令表示赞同的同时，决定用人民用惯了的“消费合作社”的叫法来代替“消费公社”这一名称（见 1919 年 7 月 3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第 143 号）。

列 宁

工人国家和征收党员周

莫斯科征收党员周¹是在苏维埃政权困难的时刻举行的。由于邓尼金的胜利，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朋友们拼命加紧阴谋活动，资产阶级竭力扰乱人心，千方百计想动摇苏维埃政权的决心。犹豫动摇的不自觉的庸人以及同他们在一起的知识分子，社会革命党人²和孟什维克，照例都更加动摇起来，而且最先被资本家吓倒了。

但是，我认为，莫斯科在困难时刻举行征收党员周对我们更有利，因为这对事情更有益处。我们举行征收党员周并不是为了炫耀一番。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意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我们曾不止一次地重新登记党员，以便把这种“混进党里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³。我们还用动员人们上前线和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的办法，来清洗党内那些一心想从执政党党员的地位“捞到”好处而不愿肩负为共产主义忘我工作的重担的人。

目前正当加紧动员人们上前线的时候，举行征收党员周的好处是，不致对那些想混进党里来的人有什么诱惑力。我们只是号召大批普通工人和贫苦农民即劳动农民入党，而不

是号召投机农民入党。我们不向这些普通党员许愿，说入党有什么好处，也不给他们什么好处。相反地，现在党员要担负比平常更艰苦更危险的工作。

这样更好。入党的将都是一些真心拥护共产主义的人，真正忠于工人国家的人，正直的劳动者，在资本主义下受过压迫的群众的真正代表。

只有这样的党员才是我们需要的。

我们需要新党员不是为了做广告，而是为了进行严肃的工作。我们号召他们加入党。我们向劳动者敞开党的大门。

苏维埃政权是为彻底推翻资本压迫而斗争的劳动者的政权。首先起来进行这种斗争的，是各城市和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它取得了第一次胜利，夺得了国家政权。

工人阶级把大多数农民团结到自己方面来。因为倾向于资本、倾向于资产阶级的，只是经商的农民，投机农民，而不是劳动农民。

最开展最觉悟的彼得格勒工人为管理俄国输送了最多的力量。可是我们知道，在普通工人和农民中，忠于劳动群众利益、能够做领导工作的人是很多很多的。在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是有组织才能和管理才能的，资本主义不让这些人发展，我们却尽力帮助他们，而且应当帮助他们涌现出来，让他们担负起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发现这些质朴的不知名的新人才是不容易的。吸收那些长期受地主资本家压迫和恐吓的普通工农来参加国家工作是不容易的。

但是，我们应该进行而且必须进行这种不容易的工作，以便更深入地从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中间发掘新人才。

非党的工人和劳动农民同志们，加入党吧！我们不向你们许愿，说入党有什么好处，我们号召你们来进行困难的工作，进行建设国家的工作。如果你们真心拥护共产主义，你们就应该大胆地担负起这种工作，不要怕工作生疏和困难，不要被那种陈腐偏见弄得惶惑不安，以为只有受过正规教育的人才能胜任这种工作。这是不对的。能够而且应当有愈来愈多的普通工人和劳动农民来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

劳动群众拥护我们。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可战胜的根源就在这里。多吸收群众中新的工作者入党，使他们独立参加建设新生活的工作，这就是我们克服一切困难的手段，这就是我们走向胜利的道路。

1919年10月11日

载于1919年10月12日

《真理报》第228号

署名：尼·列宁

按手稿刊印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第39卷第224—226页

注 释

- 1 指 1919 年 10 月 8—19 日莫斯科市党组织举行的征收党员周。征收党员周是根据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举行的。在苏维埃共和国处于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的极其困难的时刻，俄共（布）彼得格勒党组织于 1919 年 8 月 10—17 日、莫斯科省党组织于同年 9 月 20—28 日相继举行了征收党员周。俄共（布）中央全会总结初步经验后，9 月 26 日决定在各城市、农村和军队中举行征收党员周。9 月 30 日，中央在给各级党组织的关于征收党员周的通告信中指出，在各地党组织已经完成党员重新登记的情况下，着手吸收新的党员是适时的。通告信要求在征收党员周期间只吸收工人、红军战士、水兵和农民入党。通过举行征收党员周，仅俄罗斯联邦欧洲部分 38 个省就有 20 多万人入党，其中 50% 以上是工人，在作战部队中被接受入党的约 7 万人。
- 2 见本书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注 8。
- 3 俄共（布）根据该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于 1919 年 5—9 月进行了党员重新登记。俄共（布）中央于 1919 年 4 月 24 日在《真理报》上公布了重新登记的实施细则，其中说，全体党员重新登记是对各个党组织的全体人员进行的认真考核，其目的是清除党内的非共产主义分子，主要是那些混入执政党以便利用党员称号谋取私利的人。重新登记时，全体党员必须交回党证，填写履历表，呈交由两名具有半年以上党龄并被党委会认为可靠的共产党员出具的介绍书。在重新登记期间，停止接受新党员。凡是被揭发有不配党员称号的行为者（酗酒、腐化、以权谋私等）、临阵脱逃者、违反党的决议者、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党的会议者以及不交纳党费者，都应开除出党。重新登记期间，恰逢动员党员入伍，有些人动摇脱党，这大大帮助了各个党组织清除那些不合格分子。据尼·尼·克利斯廷斯基在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经过重新登记，党员人数减少了一半。

列 宁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 经济和政治

在苏维埃政权成立两周年快要到来的时候，我曾打算用本文题目写一本小册子。但因忙于日常工作，直到现在还只是为某些部分做了初步的准备。^① 所以，我决定试一试，把我认为是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思想，简单扼要地叙述一下。自然，扼要的叙述有许多不便和缺点。但是一篇不大的杂志论文，也许还能达到一个小小的目的，就是把问题及其要点提出来，供各国共产党人讨论。

1

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这在理论上是毫无疑问的。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性。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换句话说，就是已被打败但还未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和已经诞生但还非常幼弱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

具有这种过渡时期特点的整个历史时代的必然性，不仅

^① 见《列宁全集》第37卷第253—262、428—437页。——编者注

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而且对任何一个有学识的、多少懂得一点发展论的人来说，应当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们听到的现代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第二国际一切代表人物，包括麦克唐纳、让·龙格、考茨基和弗里德里希·阿德勒之流在内，都是这样的代表，尽管他们挂着所谓社会主义的招牌）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议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完全忘掉了这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特性就是厌恶阶级斗争，幻想可以不要阶级斗争，力图加以缓和、调和，磨掉锐利的锋芒。所以，这类民主派或者根本不承认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或者认为自己的任务是设想种种方案把相互斗争的两种力量调和起来，而不是领导其中一种力量进行斗争。

2

由于我国十分落后而且具有小资产阶级的性质，俄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有一些不同于先进国家的特点。但是俄国的基本力量以及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却是同任何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的，所以这些特点能涉及的只是非最主要的方面。

这些社会经济的基本形式就是资本主义、小商品生产和共产主义。这些基本力量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特别是农民）和无产阶级。

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俄国经济表现为如下双方的斗争，一方面是在一个大的全国范围内按共产主义原则联合劳动的最初步骤，另一方面是小商品生产，是保留下来的以及在

小商品生产基础上复活着的资本主义。

说劳动在俄国按共产主义原则联合起来了，第一，是指废除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第二，是指由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在全国范围内在国有土地上和国营企业中组织大生产，把劳动力分配给不同的经济部门和企业，把属于国家的大量消费品分配给劳动者。

我们说俄国共产主义的“最初步骤”（1919年3月通过的我们的党纲也是这样说的），因为所有这些条件在我国还只实现了一部分，换句话说，这些条件的实现还处在开始的阶段。凡是一下子可以办到的事情，我们用革命的打击一下子都办到了。例如，在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天，即1917年10月26日（1917年11月8日），就废除了土地私有制，无偿地剥夺了大土地所有者。在几个月内，又同样无偿地剥夺了几乎所有的大资本家即工厂、股份企业、银行、铁路等等的占有者。由国家来组织工业大生产，从“工人监督”过渡到“工人管理”工厂、铁路，——这基本上已经实现了，但在农业方面，事情还只是刚刚开始（办“国营农场”，即由工人国家在国有土地上办的大农场）。同样，把小农组织成各种合作社这一从小商品农业过渡到共产主义农业的办法，^①也刚刚开始实行。由国家组织产品分配来代替私营商业这件事，即由国家收购粮食供应城市、收购工业品供应农村这件事，也是这样。下面将引用一些有关本问题的统计材料。

① 苏维埃俄国的“国营农场”大约有三千五百三十六个，“农业公社”大约有一千九百六十一个，农业劳动组合有3696个。我国中央统计局现在正对全国的国营农场和农业公社作一次精确的统计。1919年11月间就会陆续得到统计结果。——作者原注

农民经济仍然是小商品生产。这是一个非常广阔和极其深厚的资本主义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资本主义得以保留和重新复活起来，同共产主义进行着极其残酷的斗争。这个斗争的形式，就是以私贩粮食和投机倒把来反对国家收购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总之，是反对由国家分配农产品。

3

为了说明这些抽象的原理，我们来引用一些具体的数字。

根据粮食人民委员部的统计资料，从1917年8月1日到1918年8月1日，俄国由国家收购的粮食约为3000万普特。下一个年度约为11000万普特。再下一个收购年度（1919—1920年）头三个月的数字看来可以达到4500万普特，而在1918年同时期（8—10月）只有3700万普特。

这些数字清楚地说明，从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意义上说来，情况虽然改善得很慢，但总是不断地在改善着。尽管俄国和外国的资本家动用世界列强的全部力量来组织国内战争，造成了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困难，情况还是在改善着。

所以，不管各国资产者及其公开的和隐蔽的帮凶们（第二国际的“社会党人”）怎样造谣诬蔑，有一点是不容怀疑的：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经济问题来看，共产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在我国是有保证的。全世界资产阶级之所以疯狂地拼命地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组织军事进攻，策划阴谋活动等等来反对布尔什维克，正是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若不用武力把我们压倒，我们就必然会在改造社会经济方面获得胜利。但资产阶级要想这样把我们压倒是办不到的。

在我们所经历的这个短时期内，在我们所处的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困难条件下，我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战胜了资本主义，从下述总结数字中就可以看出来。中央统计局刚刚整理了一份关于苏维埃俄国 26 个省（不是全国）粮食生产情况和消费情况的统计材料，准备发表。

统计结果如下：

苏维埃 俄 国 26 省	人 口 (单位百万)	粮食产量 (不包括 种子和 饲料) (单位百 万普特)	粮 食 供 应 量 (单位百万普特)		居民的粮 食拥有量 (单位百 万普特)	每人的粮 食消费量 (单 位 普 特)
			由粮食人 民委员部 供应的	由 投 机 商 贩 供 应的		
产粮省	城市…… 4.4	—	20.9	20.6	41.5	9.5
	乡村…… 28.6	625.4	—	—	481.8	16.9
消费省	城市…… 5.9	—	20.0	20.0	40.0	6.8
	乡村…… 13.8	114.0	12.1	27.8	151.4	11.0
总 计(26省)	52.7	739.4	53.0	68.4	714.7	13.6

由此可见，城市的粮食大约有一半是由粮食人民委员部供应的，另一半是由粮贩供应的。根据 1918 年的精确调查，对城市工人的粮食供应的比例正是如此。不过工人购买国家的粮食比购买粮贩的粮食要少付九成的钱。粮食的黑市价格十倍于国家价格。这是精确研究工人收支情况所得出的结果。

4

如果仔细研究一下上面引的统计资料，就可以看出，这个准确的材料勾划出了目前俄国经济的一切基本特点。

劳动群众摆脱了长期以来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地主和

资本家。这个向真正自由和真正平等跨出的一步，按其大小、规模和速度说来，都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而资产阶级的拥护者（包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内）对这一步却不加考虑。他们从资产阶级议会民主的意义上侈谈自由和平等，把这种民主虚伪地称为一般“民主”或“纯粹民主”（考茨基）。

但劳动群众所考虑的却是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不受地主资本家压迫的自由），所以他们这样坚定地拥护苏维埃政权。

在一个农民国家里，从无产阶级专政方面首先获得利益、获得利益最多和马上获得利益的是农民。农民在地主资本家统治下的俄国是经常挨饿的。在我国多少世纪的漫长历史中，农民从来没有可能为自己劳动，总是把亿万普特粮食交给资本家，运往城市和国外，自己只好挨饿。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农民才第一次为自己劳动，而且比城市居民吃得好些。农民第一次看到了真正的自由，即享用自己粮食的自由，不挨饿的自由。谁都知道，在分配土地时做到了最大限度的平等，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农民是“按人口”分配土地的。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

为了消灭阶级，首先就要推翻地主和资本家。这一部分任务我们已经完成了，但这只是任务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困难的部分。为了消灭阶级，其次就要消灭工农之间的差别，使所有的人都成为工作者。这不是一下子能够办到的。这是一个无比困难的任务，而且必然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这个任务不能用推翻哪个阶级的办法来解决。要解决这个任务，只有把整个社会经济在组织上加以改造，只有从个体的、单独

的小商品经济过渡到公共的大经济。这样的过渡必然是非常长久的。采用急躁轻率的行政手段和立法手段，只会延缓这种过渡，给这种过渡造成困难。只有帮助农民大大改进以至根本改造全部农业技术，才能加速这种过渡。

为了解决这个最困难的第二部分任务，战胜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在对农民的政策中应当始终不渝地贯彻以下基本路线：无产阶级应当把劳动者农民和私有者农民，即把种地的农民和经商的农民、劳动的农民和投机的农民区别开来，划分开来。

这种划分就是社会主义的全部实质所在。

那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马尔托夫之流、切尔诺夫之流和考茨基之流等等）不懂得社会主义的这种实质，是并不奇怪的。

这里所说的划分，做起来很困难，因为在实际生活中，“农民”的各种特性不管多么不同，多么矛盾，总是溶合成为一个整体。但是划分还是可能的，不仅可能，而且是农民经济条件和农民生活条件必然产生的结果。劳动农民历来都受地主、资本家、商人、投机者和他们的国家（包括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内）的压迫。多少世纪以来，劳动农民养成了一种敌视和仇恨这些压迫者和剥削者的心理，实际生活所给予的这种“教育”使农民不得不寻求同工人结成联盟来反对资本家，反对投机者，反对商人。同时，经济环境，商品经济的环境，又必然使农民（不是任何时候，而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成为商人和投机者。

我们上面引用的统计资料清楚地说明了劳动农民和投机

农民的区别。例如，一种农民在 1918—1919 年间为了供应城市里挨饿的工人，按照国家固定价格，把 4000 万普特粮食交给了国家机关，尽管这些机关还有种种缺点（这些缺点是工人政府清楚地意识到的，但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初期是无法消除的），——这种农民是劳动农民，是社会主义工人真正的同志，是他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他在反资本压迫斗争中的亲兄弟。而另一种农民却利用城市工人的饥饿和困苦，非法地按相当于国家价格十倍的高价，出卖了 4000 万普特粮食，他们欺骗国家，使蒙骗、掠夺和欺诈勾当在各地应运而生并且日益猖獗——这种农民是投机者，是资本家的同盟者，是工人的阶级敌人，是剥削者。因为，粮食是从全国公有土地上收获来的，所用的农具也不仅是农民而且还有工人等等花了某种劳动才创造出来的，而有了余粮就拿来投机，这就是剥削挨饿的工人。

人们指着我们宪法上工农的不平等以及解散立宪会议、强行拿走余粮等等事情，从四面八方我们大叫大嚷：你们是自由、平等、民主的破坏者。我们回答说：世界上还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做过这样多的事情，来消除劳动农民多少世纪以来所遭受的事实上的不平等和事实上的不自由。可是对于投机的农民，我们永远也不会承认跟他们有平等，正如我们永远不承认剥削者同被剥削者、饱食者同挨饿者有“平等”，不承认前者有掠夺后者的“自由”一样。而对于那些不愿意了解这种区别的有教养的人，我们就要用对待白卫分子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尽管他们自称为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考茨基派、切尔诺夫派或马尔托夫派。

5

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为此，无产阶级专政已做了它能做的一切。但是要一下子消灭阶级是办不到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始终是存在的。阶级一消失，专政也就不需要了。没有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是不会消失的。

在无产阶级专政时代，阶级依然存在，但每个阶级都起了变化，它们相互间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并不消失，只是采取了别的形式。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是被压迫阶级，是被剥夺了任何生产资料所有权的阶级，是唯一同资产阶级直接对立和完全对立的因而也是唯一能够革命到底的阶级。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夺得政权以后，成了统治阶级：它掌握着国家政权，支配着已经公有化的生产资料，领导着动摇不定的中间分子和中间阶级，镇压着剥削者的日益强烈的反抗。这些都是阶级斗争的特殊任务，是无产阶级以前不曾提出也不可能提出的任务。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剥削者阶级，即地主和资本家阶级，还没有消失，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剥削者已被击溃，可是还没有被消灭。他们还有国际的基础，即国际资本，他们是国际资本的一个分支。他们还部分地保留着某些生产资料，还有金钱，还有广泛的社会联系。正是由于他们遭到失败，他们反抗的劲头增长了千百倍。管理国家、军事和经济的“艺术”，使他们具有很大很大的优势，所以他们的作用比他们在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大得多。被推翻了的剥削者反对胜利了

的被剥削者的先锋队，即反对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变得无比残酷了。既然说的是革命，既然不是用改良主义的幻想去代替革命这个概念（象第二国际中的一切英雄所干的那样），那么情况就只能如此。

最后，农民和任何小资产阶级一样，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也处于中间的地位：一方面，他们是由劳动者要求摆脱地主资本家压迫的共同利益联合起来的、人数相当多的（在落后的俄国是极多的）劳动群众；另一方面，他们又是单独的小业主、小私有者、小商人。这样的经济地位必然使他们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摇摆不定。到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到了一切社会关系遭到非常急剧的破坏的时候，由于农民和一般小资产者最习惯于因循守旧，那就很自然，我们必然会看到他们从一边转到另一边，摇摆不定，反复无常，犹豫不决，等等。

对于这个阶级，或者说，对于这些社会成分，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领导他们，设法影响他们。带领动摇分子和不坚定分子前进，这就是无产阶级应做的事情。

我们把所有的基本力量或基本阶级及其被无产阶级专政改变了的相互关系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第二国际的一切代表所持的、流行的小资产阶级观念，即“经过”一般“民主”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观念，在理论上是何等荒谬，何等愚蠢。这种错误观念的根源就是从资产阶级那里继承下来的偏见，即以为“民主”具有绝对的、超阶级的内容。其实，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民主也进入了崭新的阶段，阶级斗争也上升到了更高的阶段，而使一切形式都服从它。

搬弄关于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笼统词句，实际上等于盲目重复那些反映商品生产关系的概念。用这些笼统词句来解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任务，就意味着全面地转到资产阶级的理论立场和原则立场上去了。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问题只能这样提：是不受哪个阶级压迫的自由？是哪一个阶级同哪一个阶级的平等？是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还是废除私有制的斗争基础上的民主？如此等等。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早已阐明，如果不把平等了解为消灭阶级，反映商品生产关系的平等概念就会变成一种偏见。^① 这个关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平等概念不同于社会主义平等概念的起码真理，是常常被人遗忘的。只要不忘记这个真理，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就是朝着消灭阶级的方向迈进了最有决定意义的一步，而无产阶级要完成这一事业，就应当利用国家政权机关来继续进行阶级斗争，就应当对被推翻了的资产阶级和动摇不定的小资产阶级采用斗争、影响、诱导等不同的方法来继续进行阶级斗争。

（待续）^②

1919年10月30日

载于1919年11月7日

《真理报》第250号

署名：尼·列宁

按手稿刊印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

第39卷第269—282页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16—118页。——编者注

② 本文没有写完。——俄文版编者注

列 宁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 “左派”幼稚病¹

（节录）

二

布尔什维克成功的基本条件之一

大概，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能看出，如果我们党没有极严格的真正铁的纪律，如果我们党没有得到整个工人阶级全心全意的拥护，就是说，没有得到工人阶级中所有一切善于思考、正直、有自我牺牲精神、有威信并且能带领或吸引落后阶层的人的全心全意的拥护，那么布尔什维克别说把政权保持两年半，就是两个半月也保持不住。

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的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由于资产阶级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资产阶级的强大不仅在于国际资本的力量，在于它的各种国际联系牢固有力，而且还在于习惯的力量，小生产的力量。这是因为世界上可惜还有很多很多小生产，而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由于

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不进行长期的、顽强的、拼命的、殊死的战争，不进行需要坚持不懈、纪律严明、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和意志统一的战争，便不能战胜资产阶级。

再说一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取得胜利的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问题的人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实现无条件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

人们时常议论这个问题。但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在什么情况下才是可能的呢？关于这些，他们却考虑得远远不够。在对苏维埃政权和布尔什维克欢呼的同时，是不是应该对布尔什维克**为什么能够建立革命无产阶级所必需的纪律的原因多作些极其认真的分析呢？**

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作为一个政党而存在，是从1903年开始的。只有布尔什维主义存在的**整个时期**的历史，才能令人满意地说明，为什么它能够建立为无产阶级胜利所必需的铁的纪律并能在最困难的条件下坚持住这种纪律。

这里首先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靠什么来维持的？是靠什么来检验的？是靠什么来加强的？第一，是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和它对革命的忠诚，是靠它的坚韧不拔、自我牺牲和英雄气概。第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首先是同无产阶级劳动群众，**但同样也同非无产阶级劳动群众联系、接近**，甚至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同他们打成一片。第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而最广大的群众

根据切身经验也确信其正确。一个革命政党，要真正能够成为必将推翻资产阶级并改造整个社会的先进阶级的政党，没有上述条件，就不可能建立起纪律。没有这些条件，建立纪律的企图，就必然会成为空谈，成为漂亮话，成为装模作样。可是另一方面，这些条件又不能一下子就产生。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和艰苦的实践才能造成这些条件；正确的革命理论——而理论并不是教条——会使这些条件容易造成，但只有同真正群众性的和真正革命的运动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些条件才能最终形成。

布尔什维主义所以能够建立并且在 1917—1920 年异常艰难条件下顺利地实现极严格的集中和铁的纪律，其原因仅仅在于俄国有若干历史特点。

一方面，布尔什维主义是 1903 年在最坚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产生的。而这个——也只有这个——革命理论的正确性，不仅为整个十九世纪全世界的经验所证实，尤其为俄国革命思想界的徘徊和动摇、错误和失望的经验所证实。在将近半个世纪里，大约从上一世纪四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俄国进步的思想界在空前野蛮和反动的沙皇制度的压迫之下，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俄国在半个世纪里，经受了闻所未闻的痛苦和牺牲，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革命英雄气概，以难以置信的毅力和舍身忘我的精神去探索、学习和实验，经受了失望，进行了验证，参照了欧洲的经验，真是饱经苦难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唯一正确的革命理论。由于人们在沙皇政府的迫害下侨居国外，俄国的革命者在十九

世纪下半叶同国际的联系相当广泛，对世界各国革命运动的形式和理论十分熟悉，这是世界上任何一国所不及的。

另一方面，在这个坚如磐石的理论基础上产生的布尔什维主义，有了十五年（1903—1917年）实践的历史，这段历史的经验之丰富是举世无比的。这是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这15年内，在革命经验方面，在各种运动形式——合法的和不合法的、和平的和激烈的、地下的和公开的、小组的和群众的、议会的和恐怖主义的形式——更替的迅速和多样性方面，都没有哪怕类似这样丰富的经历。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在这样一个短短的时期内，集中了现代社会一切阶级进行斗争的如此丰富的形式、特色和方法，而且由于俄国的落后和沙皇制度的残酷压迫，这个斗争成熟得特别迅速，它如饥如渴又卓有成效地吸取了欧美政治经验方面相宜的“最新成就”。

五

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

我们现在所要讲的那些德国共产党人，他们不是把自己叫作“左派”，而是叫作——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原则上的反对派”²。但是他们却完全具有“左派幼稚病”的症候，这从下面的阐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有一本持这个反对派观点的小册子，叫作《德国共产党（斯巴达克联盟）的分裂》，是由“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地方组

织”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把这一反对派的观点的实质，叙述得极其鲜明、确切、清楚、扼要。我们只要从中引证几段，就足以使读者了解这一实质了。

“共产党是进行最坚决的阶级斗争的政党……”

“……从政治方面来看，这个过渡时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时期……”

“……现在发生这样一个问题：谁应当是专政的**执行者**，**是共产党，还是无产阶级**？……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的是共产党的专政，还是无产阶级的专政？……”

（引文内的着重标记全录自原文。）

往下小册子的作者责难德国共产党“中央”，说这个“中央”在寻求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的途径，说这个“中央”提出“原则上承认”斗争的“一切政治手段”（包括参加议会活动）“的问题”，只是为了掩饰它想同独立党人结成联盟这一真正的和主要的意图。小册子接着说道：

“反对派选择了另一条道路。它认为共产党的统治和党的专政问题只是一个策略问题。不管怎样，共产党的统治是一切政党统治的最后形式。原则上应该力求实现无产阶级的专政。党的一切措施、党的组织、党的斗争形式、党的战略和策略，都应该适应这一目的。因此，凡是同其他政党妥协，凡是回头再去采用在历史上和政治上已经过时的议会制斗争形式，凡是实行机动和通融的政策，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无产阶级所特有的革命斗争方法应该大力加以强调。为了把那些应当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各行业各阶层的最广大群众吸收进来，就必须在最广泛的基础上和最广大的范围内建立新的组织形式。这种汇集一切革命分子的场所，便是以工厂组织为基础

而建立起来的工人联合会。凡是响应‘退出工会！’这一口号的工人，都应当联合在这里。在这里，正在斗争的无产阶级组成最广大的战斗队伍。凡承认阶级斗争、苏维埃制度和专政的人，都可以加入。至于进一步对正在斗争的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和在斗争中进行政治指导，则是站在工人联合会之外的共产党的任务……”

“……于是，现在有两个共产党彼此对立着：

一个是领袖的党，它力图从上面来组织和指挥革命斗争，不惜实行妥协和参加议会活动，以便造成一种形势，使他们可以参加掌握专政大权的联合政府。

另一个是群众的党，它等待革命斗争从下面高涨起来，为了进行这一斗争，它只知道并且只采用一个明确地引向目的的方法，而排斥任何议会方法和机会主义方法；这个唯一的方法就是无条件地推翻资产阶级，以便随后建立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来实现社会主义……”

“……那里是领袖专政，这里是群众专政！这便是我们的口号。”

这就是表明德国共产党内反对派观点的最重要的论点。

凡是自觉参加过或仔细观察过 1903 年以来布尔什维克主义发展过程的布尔什维克，读了这些议论，一定会立刻说：“这是多么熟悉的陈词滥调！这是多么‘左的’孩子气！”

不过，我们还是来进一步考察一下这些议论吧。

“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这些人竭力要标新立异，结果却弄巧成拙。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只有把不按照生产的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区分的大多

数同在生产的社会结构中占有特殊地位的集团对立时，才可以把群众和阶级对立起来；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这都是简单明了的道理。何必再另来一套胡说八道，另造一套新奇的沃拉皮尤克³呢？一方面，大概是由于党的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的迅速更替破坏了领袖、政党和阶级之间那种通常的、正常的和简单的关系，人们面对这种难于理解的情况，思想便发生了混乱。在德国，也象在欧洲其他国家那样，人们过分习惯于合法状态，习惯于由政党定期举行的代表大会自由地正常地选举“领袖”，习惯于通过议会选举、群众大会、报章杂志，通过工会和其他团体的情绪变化等方便办法来检验各政党的阶级成分。但是，由于革命的急剧发展和内战的展开，不得不放弃这种通常的办法，而迅速转为交替使用合法的和不合法的方式，结合使用这两种方式，采用“不方便的”和“非民主的”方法来推选或组成或保留“领导集团”，在这个时候，人们不知所措，开始臆想出一些荒谬绝伦的东西。大概荷兰共产党某些党员⁴由于不幸生在一个具有特别优越和特别稳定的合法状态的传统和条件的小国，根本没有见过合法状态和不合法状态的相互更替，因此思想上发生了混乱而不知所措，助长了这种荒谬的臆想。

另一方面，很明显，这不过是未经很好考虑就胡乱使用“群众”和“领袖”这类当今“时髦”的字眼而已。这些人

时常听到并切实学会了怎样攻击“领袖”，怎样把“领袖”同“群众”对立起来；但是他们却不能想一想究竟是怎么回事，不能把事情弄清楚。

在帝国主义战争末期和战后时期，在一切国家里，“领袖”和“群众”的分离表现得特别明显而突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基本原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52—1892 年间曾以英国为例作过多次说明^①。英国的垄断地位使“群众”分化出一部分半市侩的机会主义的“工人贵族”。这种工人贵族的领袖们总是投靠资产阶级，直接间接地受资产阶级豢养。马克思所以光荣地被这班坏蛋痛恨，就是因为他公开地斥责他们是叛徒。现代（二十世纪的）帝国主义造成了某些先进国家的垄断特权地位，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第二国际中纷纷出现了叛徒领袖、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这样一种人，他们只顾自己这个行会的利益，只顾自己这个工人贵族阶层的利益。于是机会主义的政党就脱离了“群众”，即脱离了最广大的劳动阶层，脱离了大多数劳动者，脱离了工资最低的工人。不同这种祸害作斗争，不揭露这些机会主义的、背叛社会主义的领袖，使他们大丢其丑，并且把他们驱逐出去，革命无产阶级就不可能取得胜利；第三国际所实行的正是这样的政策。

为此竟把群众专政和领袖专政**根本**对立起来，实在是荒唐和愚蠢得可笑。尤其可笑的是，人们在“打倒领袖”这一口号掩饰下，实际上竟把一些胡说八道、满口谬论的**新领袖**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8 卷第 724 页；第 22 卷第 320—325、377—382 页；第 28 卷第 146 页；第 29 卷第 344—345 页；第 33 卷第 521、526、637 页；第 35 卷第 18、353 页；第 37 卷第 314—316 页。——编者注

拉出来代替那些对普通事物还能持常人见解的老领袖。德国的劳芬贝格、沃尔弗海姆、霍纳、卡尔·施勒德尔、弗里德里希·文德尔、卡尔·埃勒，就是这样的新领袖。^①埃勒企图使问题“深入一步”，他宣称政党是根本不需要的，是“资产阶级性”的，这真是荒谬绝顶，简直使人啼笑皆非。如果坚持错误，深入一步地来为错误辩护，把错误“坚持到底”，那就往往真要把小错铸成骇人听闻的大错了。

否定政党和党的纪律，——这就是反对派得到的结果。而这就等于完全解除无产阶级的武装而有利于资产阶级。这也恰恰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散漫、动摇、不能坚持、不能团结、不能步调一致，而这些一旦得到纵容，就必然断送无产阶级的任何革命运动。从共产主义的观点看来，否定政党就意味着从资本主义崩溃的前夜（在德国）跳到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而不是进到它的低级阶段和中级阶段。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刚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阶级还存在，而且在任

① 《共产主义工人报》⁵（1920年2月7日汉堡出版的该报第32号所载卡尔·埃勒《论解散政党》一文）上说：“工人阶级不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就不能摧毁资产阶级国家，而不摧毁政党，它就不能消灭资产阶级民主。”

罗马语国家的工团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头脑最糊涂的人物可以“心满意足”了，因为那些显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庄重的德国人（卡·埃勒和克·霍纳通过在上述报纸上发表的文章特别庄重地证明，他们认为自己是庄重的马克思主义者，可是同时他们又极其可笑地说出一些荒谬绝伦的话，暴露出他们连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知识都没有），竟也发表出这种极不恰当的议论。只承认马克思主义还不能保证不犯错误。这一点俄国人特别清楚，因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曾特别经常地成为“时髦的东西”。——作者原注

何地方，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都还要存在好多年。也许，在没有农民（但仍然有小业主！）的英国，这个时期可能会短一些。消灭阶级不仅意味着要驱逐地主和资本家，——这个我们已经比较容易地做到了——而且意味着要消灭小商品生产者，可是这种人不能驱逐，不能镇压，必须同他们和睦相处；可以（而且必须）改造他们，重新教育他们，这只有通过很长期、很缓慢、很谨慎的组织工作才能做到。他们用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从各方面来包围无产阶级，浸染无产阶级，腐蚀无产阶级，经常使小资产阶级的懦弱性、涣散性、个人主义以及由狂热转为灰心等旧病在无产阶级内部复发起来。要抵制这一切，要使无产阶级能够正确地、有效地、胜利地发挥自己的组织作用（而这正是它的主要作用），无产阶级政党的内部就必须实行极严格的集中和极严格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的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没有铁一般的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一切正直的人们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战胜集中的大资产阶级，要比“战胜”千百万小业主容易千百倍；而这些小业主用他们日常的、琐碎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腐蚀活动制造着资产阶级所需要的，使资产阶级得以复辟的那种恶果。谁哪怕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铁的纪律稍微削弱一点（特别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那他事实上就是在帮助资产阶级来反对无产阶级。

除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问题外，还必须提出“反动”工会的问题。但是先让我根据我们党的经验讲几句话来结束前一问题。在我们党内，对于“领袖专政”的攻击**是一直都有的**。我记得这样的攻击最早是在1895年，那时党还没有正式成立，但是彼得堡的中心小组⁶已经开始形成，并且就要负起领导该城各区小组的责任。在我们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⁷（1920年4月）上，有一个小小的反对派，也声言反对“领袖专政”，反对“寡头政治”等等。所以德国“左派共产党人”的“幼稚病”是毫不足怪的，既没有什么新东西，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地方。这种病没有什么危险，一经治愈，机体甚至会更加强壮。另一方面，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的迅速更替，正是要求我们特别要把总指挥部，把领袖们“藏起来”，隐蔽起来，这有时就使我们党内产生十分危险的现象。最糟糕的就是1912年奸细马林诺夫斯基混进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他断送了几十个上百个极优秀极忠实的同志，使他们去服苦役，并使其中许多人过早去世。他所以没有能够造成更大的祸害，是因为我们的合法工作和非法工作配合得正确。为了取得我们的信任，马林诺夫斯基作为党中央委员和杜马代表，曾不得不帮助我们创办合法的日报，这些日报即使在沙皇制度下也能进行反对孟什维克机会主义的斗争，并且能采用适当的隐蔽方式宣传布尔什维主义的原理。马林诺夫斯基一只手把几十个上百个极优秀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送去服苦役，使他们丧生，另一只手又不得不通过合法报刊来帮助培养成千上万个新的布尔什维克。对于这个事实，那些必须学会在反动工会里进行革命工作的德国

同志（以及英国、美国、法国、意大利的同志），不妨好好地考虑一下。^①

在许多国家里，包括最先进的国家在内，资产阶级无疑正在派遣而且今后还会派遣奸细到共产党里来。对付这种危险，办法之一就是要把不合法的工作同合法的工作巧妙地结合起来。

八

不作任何妥协吗？

我们从上面引自法兰克福出版的小册子的那段话里，已经看到“左派”何等坚决地提出“不作任何妥协”的口号。这些无疑是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并且愿意做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真理，这实在使人感到可悲。请看看 1874 年恩格斯反驳三十三个布朗基派公社战士的宣言时说的话吧（恩格斯同马克思一样，都属于那种少见的和极少见的作家，能做到每一巨著中的每一句话含义都极为

① 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在德国被俘。他在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时回到俄国，立即被送交法庭审判，由我们的工人枪决了。孟什维克特别恶毒地攻击我们竟让一个奸细混进了我们党中央的这个错误。可是当我们在克伦斯基执政时期要求逮捕杜马主席罗将柯并且将他提交法庭审判（因为他在战前就知道马林诺夫斯基的奸细活动，却没有把这事告知杜马中的劳动派⁸和工人）时，同克伦斯基一起执政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没有支持我们的要求，因此罗将柯得以逍遥法外，自由自在地投奔邓尼金去了。——作者原注

深刻):

“‘……〈布朗基派公社战士的宣言中说〉我们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我们要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在中间站停留，不作妥协，因为妥协只会推迟胜利到来的日子，延长奴隶制的时期。’

德国共产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通过一切不是由他们而是由历史发展进程造成的中间站和妥协，清楚地看到并始终不懈地追求最后目的：消灭阶级和建立不再有土地私有制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制度。三十三个布朗基主义者所以是共产主义者，是因为他们以为，只要他们愿意跳过各个中间站和各种妥协，那就万事大吉了，只要——他们确信如此——日内‘干起来’，政权落到他们手中，那么后天‘就会实行共产主义’。因此，如果这不能立刻办到，那他们也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了。

把自己的急躁当作理论上的论据，这是何等天真幼稚！”
(弗·恩格斯《公社的布朗基派流亡者的纲领》^①，载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人民国家报》⁹ 1874年第73号，引自《1871—1875年论文集》俄译本1919年彼得格勒版第52—53页)

恩格斯在这篇论文中对瓦扬深表敬意，说瓦扬有“不容争辩的功绩”(瓦扬和盖得一样，在1914年8月背叛社会主义以前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影响极大的领袖)。但是，恩格斯对他的明显的错误却没有放过，而作了详尽的剖析。当然，在年纪很轻、没有经验的革命者看来，以及在甚至岁数很大、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85—586页。——编者注

经验很多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看来，好象“容许妥协”是异常“危险的”，是不可理解和不正确的。而许多诡辩家（那班十二分“有经验的”政客）也正象兰斯伯里同志所提到的那些英国机会主义领袖那样，议论什么“既然布尔什维克可以作某种妥协，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作任何妥协呢？”但是，在多次罢工（我们只拿阶级斗争的这一种表现来说）中受到教育的无产者，对恩格斯所阐明的这一极深刻的（哲学上的、历史上的、政治上的、心理学上的）真理通常都能很好地领会。每个无产者都经历过罢工，都同可恨的压迫者和剥削者作过“妥协”，那就是，在自己的要求完全没有达到，或者只得到部分的满足时，也不得不去上工。每个无产者由于处在群众斗争和阶级对立急剧尖锐化的环境里，都看到了下列两种妥协之间的差别：一种是为客观条件所迫（罢工者的基金告竭，没有外界援助，陷于极端饥饿和苦难的境地）而作的妥协，这种妥协丝毫不会削弱实行这种妥协的工人对革命的忠诚和继续斗争的决心；另一种是叛徒的妥协，他们贪图私利（工贼也实行“妥协”！），怯懦畏缩，甘愿向资本家讨好，屈从于资本家的威胁、利诱、劝说，捧场（这种叛徒的妥协，在英国工人运动史上，英国工联领袖作得特别多，然而所有国家的几乎所有的工人都见到过这种或那种形式的类似现象），却把原因推给客观。

当然，有时也可以遇到异常困难复杂的个别情况，要花极大的气力，才能正确断定某一“妥协”的真实性质，——正象有些杀人案件，很难断定这些杀人行为是完全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例如正当防卫），或者是不可原谅的疏忽，或

者甚至是经过精心策划的谋害。当然，在政治上有时由于各阶级和各政党之间的（国内的和国际的）相互关系异常错综复杂，有许多情况判断起来，要远比判断什么是罢工中的合理“妥协”，什么是工贼、叛徒领袖等等的叛卖性“妥协”，更为困难。如果要开一张包治百病的丹方，或者拟订一个适用于一切情况的一般准则（“不作任何妥协”！），那是很荒谬的。为了能够弄清各个不同的情况，应该有自己的头脑。党组织的作用和名副其实的党的领袖的作用，也正在于通过本阶级一切肯动脑筋的分子^①所进行的长期的、顽强的、各种各样的、多方面的工作，获得必要的知识、必要的经验、必要的（除了知识和经验之外）政治嗅觉，来迅速而正确地解决各种复杂的政治问题。

幼稚而毫无经验的人们以为，只要一承认容许妥协，就会抹杀机会主义（我们正同它并且必须同它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或共产主义之间的任何界限。假使这些人还不懂得，无论自然界还是社会中，一切界限都是变动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有条件的，那么除了通过长期的训练、培养和教育，让他们取得政治经验和生活经验以外，就没有别的办法可以帮助他们。重要的是在每个个别的或特殊的历史关头，要善于从实际政治问题中识别哪些问题上表现出某种最主要的而且是不能容许的、叛卖性的、危害革命

① 每个阶级，即使是在最文明的国家里，即使它是最先进的阶级，并且由于当前的形势，它的一切精神力量得到最高度发挥，其中也总会有一些分子不动脑筋和不会动脑筋，而且只要阶级还存在，只要无阶级的社会还没有在自己的基础上完全加强、巩固和发展起来，就必然还会有这样一些分子。否则，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压迫群众的资本主义了。——作者原注

阶级的机会主义的妥协，并且要竭尽全力揭露这种妥协，同它进行斗争。在两个同样进行抢劫、进行掠夺的国家集团间进行帝国主义战争（1914—1918年）时，这样的最主要的、基本的一种机会主义，就是社会沙文主义，也就是主张“保卫祖国”，在这样一场战争中“保卫祖国”，实际上就等于保卫“本国”资产阶级的强盗利益。在大战以后，保卫掠夺性的“国际联盟”¹⁰；保卫同本国资产阶级订立的直接或间接的联盟而反对革命无产阶级和“苏维埃”运动；保卫资产阶级民主制和资产阶级议会制而反对“苏维埃政权”——这些就是不能容许的叛卖性妥协的最主要表现，这些妥协合在一起就是危害革命无产阶级及其事业的机会主义。

德国左派在法兰克福出版的小册子里写道：

“……凡是同其他政党妥协……凡是实行机动和通融的政策，都应当十分坚决地拒绝。”

也真奇怪，这些左派既抱着这种见解，却没有坚决地斥责布尔什维主义！德国左派不会不知道在布尔什维主义全部历史中，无论在十月革命前或十月革命后，都充满着对其他政党包括对资产阶级政党实行机动、通融、妥协的事实！

为了推翻国际资产阶级而进行的战争，比国家之间通常进行的最顽强的战争还要困难百倍，费时百倍，复杂百倍；进行这样的战争而事先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这岂不是正象我们千辛万苦攀登一座未经勘察、人迹未到的高山，却预先拒绝

有时要迂回前进，有时要向后折转，放弃已经选定的方向而试探着从不同的方向走吗？而那些如此缺乏觉悟、如此没有经验的人（如果这真是因为他们年轻，那还算好：上帝本来就让青年在一定的时间内说这类蠢话的），居然能得到荷兰共产党内某些党员的支持（不管是直接或间接的，公开或隐蔽的，完全或部分的支持，都是一样）!!

在无产阶级进行了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之后，在一国内推翻了资产阶级之后，这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很长时期内，依然要比资产阶级弱，这只是因为资产阶级有很广泛的国际联系，还因为在这个推翻了资产阶级的国家里，小商品生产者自发地、经常地使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复活和再生。要战胜更强大的敌人，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同时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一方面利用敌人之间的一切“裂痕”，哪怕是最小的“裂痕”，利用各国资产阶级之间以及各个国家内资产阶级各个集团或各种类别之间利益上的一切对立，另一方面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有条件的。谁不懂得这一点，谁就是丝毫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丝毫不懂得现代的科学社会主义。谁要是没有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和在各种相当复杂的政治形势下，在实践上证明他确实会运用这个真理，谁就还没有学会帮助革命阶级去进行斗争，使全体劳动人类从剥削者的压榨下解放出来。以上所说的一切，对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和以后的时期，都是同样适用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我们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

的指南^①；卡尔·考茨基、奥托·鲍威尔这类“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他们不懂得这一点，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按此行事。马克思以前时期的俄国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常说：“政治活动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¹¹（涅瓦大街是彼得堡一条笔直的主要街道，它的人行道清洁、宽阔而平坦。）从车尔尼雪夫斯基那时以来，俄国革命家由于忽视或忘记了这个真理，遭受过无数的牺牲。我们无论如何要使西欧和美国的左派共产党人和忠于工人阶级的革命家，不至于象落后的俄国人那样，为领会这个真理付出如此昂贵的代价。

在沙皇制度被推翻以前，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曾经多次利用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帮助，那就是说，同他们作过多次实际的妥协；在1901—1902年间，在布尔什维主义产生之前，旧《火星报》编辑部（当时参加这个编辑部的有普列汉诺夫、阿克雪里罗得、查苏利奇、马尔托夫、波特列索夫和我）就曾同资产阶级自由派政治领袖司徒卢威结成正式的政治联盟¹²（时间固然不长），同时却善于不间断地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及其在工人运动内部反映出来的任何最微小的影响作最无情的斗争。布尔什维克一直奉行这个政策。从1905年起，他们一贯坚持工农联盟，反对自由派资产阶级和沙皇制度，同时从来也不拒绝支持资产阶级去反对沙皇制度（例如在第二级选举或在复选时），从来也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对农民的资产阶级革命党，即对“社会革命党人”作最不调和的斗争，而是揭露他们的面目，揭露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566页。——编者注

他们是冒充社会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1907年，在杜马选举中，布尔什维克曾同“社会革命党人”结成短期的正式政治联盟。1903—1912年期间，我们不止一次地和孟什维克形式上同处在一个统一的社会民主党内，每次都有好几年，但是**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跟他们这些对无产阶级散布资产阶级影响的人和机会主义者作斗争。在大战期间，我们同“考茨基派”即左派孟什维克（马尔托夫）以及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纳坦松）作过某些妥协，同他们在齐美尔瓦尔德和昆塔尔一起开过会¹³，发表过共同宣言，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停止和削弱对“考茨基派”、对马尔托夫和切尔诺夫的斗争（纳坦松死于1919年；他当时已是一个非常靠拢我们、跟我们意见几乎完全一致的民粹派“革命共产党人”¹⁴）。正当十月革命的时候，我们同小资产阶级的农民结成了一个非正式的、但又非常重要的（而且是非常成功的）政治联盟，我们未作任何修改就**全盘**接受了**社会革命党的土地纲领**，也就是说，我们作了一次明显的妥协来向农民证明，我们并不想用多数票压他们，而是愿意同他们妥协。同时，我们曾经向“左派社会革命党人”¹⁵建议结成（而且不久就实现了）正式的政治联盟，请他们参加政府；但是在缔结布列斯特和约以后，他们破坏了这个联盟，到1918年7月甚至举行了武装暴动，继而又进行武装斗争来反对我们。

因此，很明显，德国左派因为德国共产党中央想跟“独立党人”（“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即考茨基派）结成联盟，便加以攻击，在我们看来是极不严肃的，而且这种攻击明显地证

明“左派”是错误的。我们俄国也有过同德国谢德曼之流类似的右派孟什维克(他们参加过克伦斯基政府)和反对右派孟什维克而同德国考茨基派类似的左派孟什维克(马尔托夫)。1917年,我们明显地看到工人群众逐渐离开孟什维克而转向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6月举行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只占代表总数的百分之十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占大多数;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俄历1917年10月25日)上,我们已占代表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一。为什么德国工人有同样的、完全相同的从右向左的转变趋势,却没有立即增强共产党人的力量,而首先增强了中间政党——“独立”党(虽然这个党从来没有过任何独立的政见和任何独立的政策,而只是摇摆于谢德曼之流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力量呢?

很明显,原因之一就是德国共产党人采取了错误的策略,德国共产党人必须大胆地老实地承认这个错误,并且学会纠正这个错误。这个错误就是否认有必要参加反动的资产阶级议会和反动的工会,这个错误就是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左派”幼稚病,这种病症现在已经暴露出来,这就可以更好更快地把它治好,对于机体会更有益处。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内部,显然是不一致的:其中除那些已经证明不能理解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不能领导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机会主义老领袖(如考茨基、希法亭,看来克里斯平、累德堡等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以外,还有一个左翼,即无产阶级一翼已经形成,并且正在非常迅速地发展着。该党数十万无产者党员(党员总数似为七十五万)正在离开谢德曼而迅速靠拢共产党人。这个无产

阶级一翼已经在“独立党人”莱比锡代表大会（1919年）上提议无条件地立即加入第三国际。如果害怕同该党的这一翼“妥协”，那简直是可笑的。恰恰相反，共产党人必须寻找而且必须找到一种同他们妥协的适当形式，这种妥协一方面可以促进和加速共产党人同这一翼实现必要的完全融合，另一方面丝毫不妨碍共产党人对“独立党人”机会主义右翼进行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斗争。要找到这样一种适当的形式，大概是不容易的，然而只有骗子才会向德国工人和德国共产党人许诺一条“容易”致胜的道路。

如果“纯粹的”无产阶级没有被介于无产者和半无产者（一半依靠出卖劳动力来获得生活资料的人）之间、半无产者和小农（以及小手艺人、小手工业者和所有的小业主）之间、小农和中农之间等等为数众多的形形色色的中间类型所包围，如果无产阶级本身没有分成比较成熟的和比较不成熟的阶层，没有乡土、职业、有时甚至宗教等等的区分，那么资本主义便不成其为资本主义了。由于这一切原因，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的觉悟部分，即共产党，就必须而且绝对必须对无产者的各种集团，对工人和小业主的各种政党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办法。全部问题在于要善于运用这个策略，来提高无产阶级的觉悟性、革命性、斗争能力和致胜能力的总的水平，而不是降低这种水平。顺便应当指出：布尔什维克为了战胜孟什维克，不仅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前，就是在此以后也需要采取机动、通融、妥协的策略，自然，我们所采取的这种策略是靠削弱孟什维克来促进、增进、巩固和加强布尔什维克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包括孟什维克

在内)必然要动摇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动摇于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苏维埃制度之间,动摇于改良和革命之间,动摇于喜爱工人和畏惧无产阶级专政之间等等。共产党人的正确策略,应该是利用这种动摇,决不是忽视这种动摇;既然要利用这种动摇,那就得对那些转向无产阶级的分子,在他们转向无产阶级的时候,实行让步,看他们转的程度,来决定让步的程度;同时要同那些转向资产阶级的分子作斗争。由于我们运用了正确的策略,我国孟什维主义已经而且还在日益瓦解,顽固的机会主义领袖陷于孤立,优秀的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优秀分子,都转入我们的阵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所以“不作任何妥协,不实行任何机动”这种操之过急的“决定”,只会有害于加强革命无产阶级影响和扩大革命无产阶级力量的事业。

最后,德国“左派”十分固执地坚持不承认凡尔赛和约¹⁶,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明显的错误。这种观点表述得愈“庄重”、愈“神气”、愈“坚决”、愈武断(象克·霍纳所表达的那样),结果就显得愈不明智。在现时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下,仅仅唾弃“民族布尔什维主义”(劳芬贝格等人的)那种竟然主张同德国资产阶级结盟对协约国作战的荒谬立场,是不够的。应当认识到,苏维埃德国(如果苏维埃德意志共和国不久就可以成立的话)在一定的时期内必须承认和服从凡尔赛和约,不容许这样做的策略是根本错误的。当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当谢德曼之流还呆在政府里、匈牙利苏维埃政权还没有被推翻、维也纳的苏维埃革命尚有可能去援助苏维埃匈牙利的时候,在当时这样的条件之下,“独立党人”

提出签订凡尔赛和约的要求是正确的。“独立党人”当时实行的机动和灵活是很不好的，因为他们多少替叛徒谢德曼之流分担了责任，多少离开了同谢德曼之流进行无情的（和十分冷静的）阶级战争的观点，而滑到了“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观点上去。

然而，现在的局势却显然是这样的：德国共产党人不当束缚自己的手脚，不应当许诺，共产党人一旦取得胜利，就一定废除凡尔赛和约。这是愚蠢的。应该说：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干了一系列的叛卖勾当，阻碍了（就某种程度上说简直是断送了）同苏维埃俄国和苏维埃匈牙利结成联盟的事业。我们共产党人则要采取一切办法去促成和准备实现这个联盟，至于凡尔赛和约，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一定而且立刻加以废除。能不能顺利地废除这个和约，不仅取决于苏维埃运动在德国的胜利，而且取决于苏维埃运动在国际上的胜利。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阻碍了这个运动，而我们却要帮助这个运动。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所在，这就是根本的差别所在。既然我们的阶级敌人、剥削者、他们的走狗谢德曼之流和考茨基之流，放过了加强德国及国际苏维埃运动、加强德国及国际苏维埃革命的许多机会，那么，这种罪责就应该由他们来承担。德国的苏维埃革命会加强国际苏维埃运动，而国际苏维埃运动则是反对凡尔赛和约、反对整个国际帝国主义的最强大的堡垒（而且是唯一可靠的、不可战胜的、威震全球的堡垒）。硬要迫不及待地把摆脱凡尔赛和约一事放在第一位，放在使其他被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摆脱帝国主义压迫的问题之上，这就是市侩的民族主义（很合乎考茨基、希

法亭、奥托·鲍威尔之流的身分)，而不是革命的国际主义。在欧洲任何一个大国，其中包括德国，推翻资产阶级将是国际革命的一大胜利，为了这种胜利，如果有必要，可以而且应当容忍凡尔赛和约存在一个较长的时期。既然俄国一国为了革命的利益能够忍受几个月布列斯特和约，那么苏维埃德国在同苏维埃俄国结成联盟的情况下，为了革命的利益在更长一段时间里忍受凡尔赛和约决不是不可能的。

法、英等国帝国主义者挑动德国共产党人，给他们设下圈套：“你们说你们不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吧。”而左派共产党人不善于随机应变，同诡计多端而且目前比他们强大的敌人周旋，不会回答敌人说，“现在我们要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了”，却象小孩子一样上了这个圈套。事先就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公开告诉那个目前武装得比我们好的敌人，我们是否要同他作战，什么时候同他作战——这是愚蠢行为，而不是革命行为。当应战显然对敌人有利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却去应战，那就是犯罪；革命阶级的政治家如果不善于实行“机动、通融、妥协”，以避免显然不利的战斗，这样的政治家是毫无用处的。

戴·伊·怀恩科普

1920年6月30日于莫斯科

写于1920年4—6月间

1920年6月在彼得格勒

由国家出版社用单行本

刊印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并根

单行本据手稿作过校订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

5版第41卷第1—104页

注 释

- 1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夕写成并出版，分发给了代表大会全体代表。书中的论点和结论是代表大会决议的基础。为了能赶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开会之前出书，列宁曾亲自过问本书的排印计划。这本书于1920年4月27日脱稿，5月5日手稿发到国家出版社彼得格勒分社。5月9日，一校样发回莫斯科。5月23日，列宁将5月12日写完的本书增补部分连同他校阅过的校样一起发往彼得格勒。6月12日本书俄文本出版，接着法文本和英文本也几乎同时于7月在俄国出版。列宁在5月23日写的一封有关这本书的出版工作的信，收在《列宁全集》第2版第49卷中。1920年下半年，这本书的德、英、法、意译本分别在柏林、汉堡、伦敦、纽约、巴黎和米兰出版。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手稿上有一个副标题《〈马克思主义战略和策略通俗讲话的尝试〉》和一段讽刺性献词：“谨将此小册子献给最可敬的劳合—乔治先生，以对其1920年3月18日所作的几乎是马克思主义的、至少是对全世界共产党人和布尔什维克极有教益的演说表示谢忱。”但是，列宁亲自校阅过的该书第1版，以及根据这一版刊印的其他各种单行本和全集本都删去了这个副标题和献词，只有《列宁全集》俄文第2、3版刊印过这个副标题和献词。

《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总结了俄国三次革命和苏维埃国家成立初期的经验，进一步发展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和策略，指出了布尔什维克党革命经验的国际意义，阐述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间的相互关系。列宁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指出国际机会主义是工人运动内部的主要敌人，他痛斥了第二国际机会主义首领的叛卖行为，详尽地批判了一些国家共产党内的“左”倾思潮。

- 2 原则上的反对派即德国“左派”共产党人集团。这一集团在1919年10

月于海德堡举行的德国共产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开除出德国共产党，1920年4月组成了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为了促使德国所有共产主义力量联合起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于1920年11月暂时同意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作为同情政党加入共产国际，同时向该党提出同德国统一共产党合并和支持其一切行动的要求。1921年6—7月举行的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作出决议，要该党在一定期限内并入德国统一共产党。由于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这项决议，该党被认为自行退出共产国际。该党后来蜕化成为宗派小集团。

- 3 沃拉皮尤克是德国语言学家约·施莱尔于1880年设计出的一种世界语方案。——21。
- 4 指荷兰“论坛派”。是集聚在《论坛报》周围的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的左派集团。1909年，论坛派被开除出荷兰社会民主工党，组成独立的政党（荷兰社会民主党）。论坛派是荷兰工人运动的左派集团，但不是彻底革命的政党。1918年，论坛派参加了建立荷兰共产党的工作。

《论坛报》（《DeTribune》）是荷兰社会民主工党左翼的报纸，1907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该报从1909年起是荷兰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1918年起是荷兰共产党的机关报。
- 5 《共产主义工人报》（《KommunistischeArbeiterzeitung》）是德国“左派”共产党人无政府工团主义集团的机关报，1919—1927年在汉堡出版。
- 6 指列宁在1895年秋天组成的工人阶级解放斗争6协会。该协会统一了彼得堡所有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小组。领导斗争协会的是以列宁为首的中心小组。

斗争协会第一次在俄国开始实现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的结合，把在少数先进工人中间宣传马克思主义变为在工人阶级广大群众中进行政治鼓动。斗争协会领导了工人运动，把工人为实现经济要求的斗争同反对沙皇制度的政治斗争联系起来。斗争协会给工人印发传单和小册子，

领导了罢工运动。斗争协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彼得堡。在斗争协会的推动下，俄国其他城市和区域中的工人小组也相继统一成为这样的协会。

1895年12月20日夜，以列宁为首的斗争协会的 leadership 核心被捕。列宁在狱中从没有停止革命斗争。他提出种种意见和指示帮助斗争协会，送出他自己所写的传单和小册子。党纲草案也是列宁在狱中写的。

“彼得堡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的意义，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就在于它是依靠着工人运动的革命政党的最初重大萌芽。”（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1954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3页）

- 7 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3月29日—4月5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代表大会的共有715名代表，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553名，有发言权的代表162名，共代表611978名党员。这次代表大会是在红军取得了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的决定性胜利、苏维埃俄国获得了暂时的和平喘息时机的条件下召开的。大会主要议程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工会运动；组织问题；共产国际的任务；对合作社的态度；向民兵制过渡；选举中央委员会。列宁直接领导了代表大会的工作。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经济建设问题，即从军事战线的斗争转向劳动战线的斗争、战胜经济破坏、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列·达·托洛茨基作了关于经济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苏维埃俄国经济恢复的基本条件是贯彻执行最近一个历史时期的统一的经济计划。决议规定了完成统一计划的各项根本任务的先后顺序：（1）首先是改善运输部门的工作，调运和储备必要的粮食、燃料和原料；（2）发展为运输业和获取燃料、原料、粮食服务的机器制造业；（3）加紧发展为生产日用品服务的机器制造业；（4）加紧生产日用品。实现国家电气化在统一经济计划中居于重要地位；大会通过了关于制定电气化计划的指示。代表大会要求各级党组织执行俄共（布）中央关于给运输部门调配5000名优秀的经过考验的共产党员的指令，并决定动员这次代表大会的10%的代表投入运输战线。代表大会决定把1920年的五一节（适逢星期六）定为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日。代表大会批准了俄共（布）中央关于动员工业无产阶级、实行劳动义务制、经济军事化以及为经济需要动用军队等问题的提纲，责成党组织帮助工会和劳动部门统计全部熟练工人，以便吸收他们参加生产，同时断

然拒绝了托洛茨基关于把成立劳动军作为保证国民经济劳动力的唯一良策和把军事方法搬用于和平经济建设的意见。代表大会十分重视生产管理的组织问题。大会就这个问题通过的决议指出，必须在“一长制”的基础上建立熟悉业务、坚强得力的领导。以季·弗·萨普龙诺夫等为代表的民主集中派反对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和个人负责制，坚持无限制的集体管理制，同时也反对使用旧专家，反对国家的集中管理，他们得到了阿·伊·李可夫、米·巴·托姆斯基、弗·巴·米柳亭、阿·洛莫夫等人的支持。大会谴责和拒绝了民主集中派的建议。代表大会在关于工会问题的决议中明确规定了工会的作用、工会同国家和党的相互关系、共产党领导工会的形式和方法以及工会参加经济建设的方式，在关于合作社问题的决议中要求巩固党在合作社组织中的领导地位。代表大会还作出了关于出版《列宁全集》的决定。4月4日，在大会秘密会议上选出了由19名委员和12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新的中央委员会。

- 8 劳动派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1906年4月由第一届国家杜马的农民代表组成。劳动派党团在所有四届杜马中都存在。

劳动派要求废除一切等级限制和民族限制实行地方和城市的自治机关的民主化，用普选制选举国家杜马。劳动派的土地纲领是根据民粹主义的土地平均使用制的原则制定的，这个原则就是：用官地、皇族土地、皇室土地、寺院土地以及私有土地（如果占有的面积超过了规定的劳动土地份额）组成全民土地；只许耕者本人享有土地的使用权。对出让的私有土地规定给予报酬。由地方农民委员会负责进行土地改革。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采取了沙文主义立场。在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后，劳动派同社会民主党人一起投入反革命阵营。劳动派对十月革命采取敌视态度。

- 9 《人民国家报》（《Der Volksstaat》）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的中央机关报，1869年10月2日—1876年9月29日在莱比锡出版，最初每周出两次，1873年7月起改为每周出三次。该报反映了德国工人运动中革命派的观点，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最优秀的工人报刊之一。由威·李卜克内西领导编辑部工作，奥·倍倍尔负责出版工作。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因反对德国兼并阿尔萨斯—洛林于1870年12月被捕后，该报由卡·希尔施和威·布洛斯相继主持工作。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该报创

刊起就为它撰稿，并经常帮助编辑部纠正工作中的错误。

- 10 国际联盟（国际联合会）是根据 1919 年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国际联盟章程》于 1920 年 1 月成立的，总部设在日内瓦，先后参加的国家有 60 多个。美国本是国际联盟的倡议者之一，但因没有批准国际联盟章程，所以不是会员国。国际联盟自成立起就为英、法帝国主义所操纵。它表面上标榜“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工具。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际联盟无形中瓦解，1946 年 4 月正式宣告解散。
- 11 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对美国经济学家亨·查·凯里《就政治经济学问题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信》一书的评论中说：“历史道路并不是涅瓦大街的人行道，它全然是在旷野上穿行，时而尘土飞扬，时而泥泞不堪，时而经过沼泽，时而穿过密林。谁怕沾上尘土和弄脏靴子，他就不要从事社会活动。”（见《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集》1950 年俄文版第 7 卷第 923 页）。
- 12 指《火星报》编辑部同彼·伯·司徒卢威就共同在国外出版秘密刊物《时评》的问题进行谈判并曾暂时达成协议一事。在谈判中，《火星报》编辑部要求新刊物《时评》作为《曙光》杂志的附刊，期数不得多于《曙光》杂志，《时评》编辑部应在平等基础上由《火星报》编辑部与司徒卢威和米·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组成。在谈判过程中发现，司徒卢威打算利用《火星报》编辑部为《时评》服务，企图把《时评》变成一个同《火星报》竞争的刊物。列宁在 1901 年 1 月 30 日写给格·瓦·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叙述了谈判的内容（见《列宁全集》第 2 版第 44 卷）。后来，普列汉诺夫代表《火星报》和《曙光》杂志、司徒卢威代表民主反对派共同准备了关于出版《时评》的声明。这个刊物最后没有出版。《火星报》的代表同司徒卢威的进一步谈判以完全破裂告终。虽然如此，但由于存在这个协议，当时《火星报》刊登了司徒卢威的《专制制度和地方自治机关》一文，曙光杂志社协助出版了由司徒卢威作序加注的沙皇政府财政大臣谢·尤·维特的秘密记事。
- 13 指 1915 年 9 月 5—8 日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一次

代表会议和1916年4月24—30日在瑞士昆塔尔举行的国际社会党第二次代表会议。参加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是列宁和格·叶·季诺维也夫，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代表是尔·马尔托夫和帕·波·阿克雪里得，社会革命党代表是马·安·纳坦松和维·米·切尔诺夫。参加会议的俄国代表还有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扬·安·别尔津和《我们的言论报》代表列·达·托洛茨基。参加昆塔尔代表会议的布尔什维克代表是列宁、伊·费·阿尔曼德和季诺维也夫，孟什维克组织委员会代表是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得，社会革命党代表是纳坦松和化名为萨韦利耶夫、弗拉索夫两个人。

- 14 革命共产党人是在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叛乱以后退出该党的一部分人于1918年9月组织的革命共产党的成员。革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安·卢·柯列加耶夫、马·安·纳坦松等。该党谴责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搞恐怖活动和企图破坏布列斯特和约，主张同俄共（布）合作。但是它的纲领是混乱和折中的，一方面认为苏维埃政权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创造了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又否认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该党成立后不断有人退党，其中有些人加入了俄共（布），有些人回到了左派社会革命党内。该党曾被准许派两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作出了一个国家只应有一个共产党的决定之后，革命共产党于1920年9月决定加入俄共（布）。同年10月，俄共（布）中央作出决定，允许自己的党组织接受原革命共产党党员加入俄共（布）。

- 15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俄国小资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左翼，于1917年12月2日（15日）组成了独立的政党，其领袖人物是玛·亚·斯皮里多诺娃、波·达·卡姆柯夫和马·安·纳坦松。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这一派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形成，1917年七月事变后迅速发展，在十月革命中加入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参加了武装起义。在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社会革命党党团中是多数派。当右派社会革命党人遵照社会革命党中央的指示退出代表大会时，他们仍然留在代表大会中，并且在议程的最重要的问题上和布尔什维克一起投票。但是在参加政府的问题上，他们拒绝了布尔什维克的建议，而同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一起要求建立有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参加

的所谓“清一色的社会党人政府”。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在长期犹豫之后，为了保持他们在农民中的影响，决定参加苏维埃政府。经过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谈判，1917年底有7名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加入了人民委员会，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保证在自己的活动中实行人民委员会的总政策。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虽然走上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道路，但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同布尔什维克有分歧。1918年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反对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在同年3月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批准布列斯特和约后退出了人民委员会，但仍留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其他苏维埃机关中。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反对苏维埃政权关于在企业和铁路部门中建立一长制和加强劳动纪律的措施。1918年夏天，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在农村中的展开和贫苦农民委员会的建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中的反苏维埃情绪开始增长。1918年6月2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通过决议，提出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纠正苏维埃政策的路线”。接着，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于1918年7月6日在莫斯科发动了武装叛乱。这次叛乱被粉碎之后，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决议，把那些赞同其上层领导路线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从苏维埃开除出去。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很大一部分普通党员甚至领导人并不支持其领导机构的冒险主义行动。1918年9月，一部分采取同布尔什维克合作立场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组成了民粹派共产党和革命共产党。这两个党的大部分党员后来参加了俄共（布）。20年代初，左派社会革命党不复存在。

- 16 凡尔赛和约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法、意、日等国对德和约，于1919年6月28日在巴黎郊区凡尔赛宫签订。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德国将阿尔萨斯和洛林归还法国；萨尔煤矿归法国；德国的殖民地由英、法、日等国瓜分；德国向美、英、法等国交付巨额赔款；德国承认奥地利独立；限制德国军备，把莱茵河以东50公里的地区划为非军事区。列宁在评价凡尔赛和约时指出：这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

列 宁

青年团的任务

（1920年10月2日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¹

（大会向列宁热烈欢呼）同志们！今天我想讲的题目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什么，以及社会主义共和国内青年组织应当是怎样的组织。

这个问题应当讲一讲，尤其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真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任务正是要由青年来担负。很明显，从资本主义社会培养出来的一代工作者所能完成的任务，至多是消灭建筑在剥削上面的资本主义旧生活方式的基础。他们至多也只能建立这样一种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帮助无产阶级和劳动阶级保持自己的政权，奠定巩固的基础，至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建设，那就只有靠在新条件下，在人与人之间的剥削关系已不存在的情况下参加工作的一代人去担负。

如果根据这一点来看青年的任务，就应当说，全体青年的任务，尤其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及其他一切组织的任务，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要学习。

当然，这仅仅是“一句话”，还没有答复主要的和最本质的问题——学习什么和怎样学习。而这里的全部关键就在于：

在改造资本主义旧社会的同时，将来要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新一代人的训练、培养和教育，就不能再象从前那样了。青年的训练、培养和教育应当以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材料为出发点。我们只能利用旧社会遗留给我们的全部知识、组织和机关，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力和物力的条件下建设共产主义。只有把青年的训练、组织和培养这一事业加以根本改造，我们才能做到：青年一代努力的结果将建立一个与旧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因此，我们需要详细论述的问题，就是我们应当教给青年什么；真正想无愧于共产主义青年称号的青年应当怎样学习；以及应当如何培养青年，使他们能够彻底完成我们已经开始的事业。

我应当指出，看来首先的和理所当然的回答是：青年团和所有想走向共产主义的青年都应该学习共产主义。

但是“学习共产主义”这个回答未免太笼统了。为了学会共产主义，我们应该怎样呢？为了学到共产主义知识，我们应该从一般知识的总和中吸取哪些东西呢？这里我们可能遇到许多危险，如果把学习共产主义的任务提得不正确，或者对这一任务理解得太片面，往往就会出现危险。

初看起来，总以为学习共产主义就是领会共产主义教科书、小册子和著作中所讲的一切知识。但是，给学习共产主义下这样的定义，就未免太草率、太不全面了。如果说，学习共产主义只限于领会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我们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而这往往会使我们受到损害，因为这种人虽然把共产主义书本和小册子上的东西读得烂熟，却不善于把所有这些知识融

会贯通，也不会按共产主义的真正要求去行动。

资本主义旧社会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就是书本与生活实践完全脱节，因为那些书本把什么都描写得好得了不得，其实大半都是最令人厌恶的谎言，虚伪地向我们描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情景。

因此，单从书本上来领会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述，是极不正确的。现在我们的讲话和文章，已经不是简单地重复以前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那些论述，因为我们的讲话和文章都是同日常各方面的工作联系着的。离开工作，离开斗争，那么从共产主义小册子和著作中得来的关于共产主义的书本知识，可以说是一文不值，因为这样的书本知识仍然会保持旧时的理论与实践的脱节，而这正是资产阶级旧社会的一个最令人厌恶的特征。

如果我们只求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那就更危险了。我们若不及时认清这种危险，不用全力来消除这种危险，那么五十万至一百万男女青年这样学了共产主义之后，将自称为共产主义者，这就只会使共产主义事业遭到莫大的损害。

这样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了学习共产主义，我们应该怎样把这一切结合起来？从旧学校和旧的科学中，我们应当吸取一些什么？旧学校总是说，它要造就知识全面的人，它教的是一般科学。我们知道，这完全是撒谎，因为过去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维持的基础，就是把人分成阶级，分成剥削者和被压迫者。自然，贯串着阶级精神的旧学校，也就只能向资产阶级的子女传授知识。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话，都是根据资产阶级的利益捏造出来的。在这样的学校里，与其

说是教育工农的年青一代，倒不如说是对他们进行符合资产阶级的利益的训练。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训练对资产阶级有用的奴仆，使之既能替资产阶级创造利润，又不会惊扰资产阶级的安宁和悠闲。因此在否定旧学校的时候，我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从这种学校中只吸取我们实行真正共产主义教育所必需的东西。

这里我要谈谈经常听到的人们对旧学校的斥责与非难，从这些话中，往往会得出完全不正确的结论。有人说，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实行强迫纪律的学校，死记硬背的学校。这说得对，但是，要善于把旧学校中的坏东西同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区别开来，要善于从旧学校中挑选出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东西。

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它迫使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这种知识塞满了青年一代的头脑，把他们变成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官吏。但是，如果你们试图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如果以为不必领会共产主义本身借以产生的全部知识，只要领会共产主义的口号，领会共产主义科学的结论就足够了，那是错误的。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

你们读过和听说过：主要由马克思创立的共产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科学，即马克思主义学说，已经不仅仅是十九世纪一位社会主义者——虽说是天才的社会主义者——的个人著述，而成为全世界千百万无产者的学说；他们已经运用这个

学说在同资本主义作斗争。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的全部知识的坚实基础；马克思研究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导致共产主义，而主要的是他完全依据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最确切、最缜密和最深刻的研究，借助于充分掌握以往的科学所提供的全部知识而证实了这个结论。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

例如，当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必须注意这一点。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²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条条大道小路一向通往，而且还会通往无产阶级文化，正如马克思改造过的政治经济学向我们指明人类社会必然走到那一步，指明必然过渡到阶级斗争，过渡到开始无产阶级革命。

当我们听到有些青年以及某些维护新教育制度的人常常

非难旧学校，说它是死记硬背的学校时，我们就告诉他们，我们应当吸取旧学校中的好东西。我们不当吸取旧学校的这样一种做法，即用无边无际的、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只学共产主义的结论，只背共产主义的口号。这样是建立不了共产主义的。只有了解人类创造的一切财富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我们不需要死记硬背，但是我们需要用对基本事实的了解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因为不把学到的全部知识融会贯通，共产主义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就会成为一块空招牌，共产主义者也只会是一些吹牛家。你们不仅应该掌握知识，而且应该用批判的态度来掌握这些知识，不是用一堆无用的垃圾来充塞自己的头脑，而是用对一切事实的了解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没有这种了解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有学识的人。如果一个共产主义者不下一番极认真、极艰苦而巨大的工夫，不弄清他必须用批判的态度来对待的事实，便想根据自己学到的共产主义的现成结论来炫耀一番，这样的共产主义者是很可悲的。这种不求甚解的态度是极端有害的。要是知道自己懂得太少，那就要设法使自己懂得多一些，但是如果有人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同时又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任何扎实的知识，那他就根本不能成为共产主义者。

旧学校培养资本家所需要的奴仆，把科学人才训练成迎合资本家口味来写作和说话的人。因此我们必须废除这样的学校。我们应当废除这样的学校，摧毁这样的学校，但这不是说，我们就不应当从这种学校里吸取人类所积累起来而

为人们所必需的一切呢？这是不是说，我们就不应当去区别哪些是资本主义所需要的东西，哪些是共产主义所需要的东西呢？

我们废除资产阶级社会内违反大多数人的意志而实行的强迫纪律，代之以工农的自觉纪律，工人和农民不但仇恨旧社会，而且有毅力、有本领、有决心团结和组织力量去进行这一斗争，以便把散居在辽阔国土上的分散而互不联系的千百万人的意志统一为一个意志，因为没有这样的统一意志，我们就必然会遭到失败，没有这样的团结，没有这样的工农的自觉纪律，我们的事业就毫无希望。不具备这些条件，我们就不能战胜全世界的资本家和地主。我们就会连基础也不能巩固，更谈不到在这个基础上建成共产主义新社会了。同样，我们否定旧学校，对旧学校怀着完全正当和必要的仇恨心理，珍视那种要摧毁旧学校的决心，但是我们应当了解，废除以前的死读书、死记硬背和强迫纪律时，必须善于吸取人类的全部知识，并要使你们学到的共产主义不是生吞活剥的东西，而是经过你们深思熟虑的东西，是从现代教育观点上看来必然的结论。

我们在谈论学好共产主义这一任务时就应该这样来提出基本任务。

为了向你们说明这一点，同时也谈谈怎样学习的问题，让我举一个实际例子。你们都知道，紧接着军事任务即保卫共和国的任务之后，我们即将面临经济任务。我们知道，如果不恢复工业和农业（而且必须不按旧方式来恢复），那么共产主义社会是建设不成的。必须在现代最新科学成就的基础

上恢复工业和农业。你们知道，这样的基础就是电；只有全国电气化，一切工业和农业部门都电气化的时候，只有当你们真正担负起这个任务的时候，你们才能替自己建成老一代人所不能建成的共产主义社会。你们面临的任务是振兴全国的经济，要在立足于现代科学技术、立足于电力的现代技术基础上使农业和工业都得到改造和恢复。你们完全了解，不识字的人实现不了电气化，而且仅仅识字还不够。只懂得什么是电还不够，还应该懂得怎样在技术上把电应用到工农业上去，应用到工农业的各个部门中去。你们自己必须学会这一点，而且还要教会全体劳动青年。这就是一切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也就是每一个认为自己是共产主义者的青年，每一个明确地认识到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就负起了帮助党建设共产主义、帮助整个青年一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责任的青年的任务。每个青年必须懂得，只有受了现代教育，他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如果不受这种教育，共产主义仍然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

老一代人的任务是推翻资产阶级。那时的主要任务是批判资产阶级，激发起群众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提高阶级觉悟，提高团结自己力量的本领。新一代人面临的任务就比较复杂了。你们不只是应当团结自己的一切力量来支持工农政权抗击资本家的侵犯。这一点你们应当做到。这一点你们完全了解，每个共产主义者都非常清楚。但是这还不够。你们应当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前一半工作在许多方面已经完成了。旧东西应该摧毁，而且已经摧毁了，它应该变成废墟，而且已经变成了废墟。地基已经清理好，年青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应

当在这块地基上建设共产主义社会。你们当前的任务是建设，你们只有掌握了一切现代知识，善于把共产主义由背得烂熟的现成公式、意见、方案、指示和纲领变成能把你们的直接工作统一起来的活生生的东西，把共产主义变成你们实际工作的指针，那时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这就是你们在教育、培养和发动整个青年一代的事业中应当执行的任务。你们应该是千百万共产主义社会建设者的带头人，一切男女青年都应该成为这样的建设者。不吸收全体工农青年参加共产主义建设，你们就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这里我自然要讲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当怎样教授共产主义，我们的方法应该有什么特点。

我在这里首先要谈谈共产主义道德问题。

你们应当把自己培养成共产主义者。青年团的任务就是要这样来安排自己的实际活动：使团员青年在学习、组织、团结和斗争的过程中把他们自己和那些以他们为带头人的人都培养成共产主义者。应该使培养、教育和训练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成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

但是，究竟有没有共产主义道德呢？有没有共产主义品德呢？当然是有的。人们往往硬说我们没有自己的道德；资产阶级常常给我们加上一个罪名，说我们共产主义者否定任何道德。这是一种偷换概念、蒙骗工农的手段。

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我们否定道德，否定品德呢？

是在资产阶级所宣传的道德的意义上，这种道德是他们对上帝的意旨中引伸出来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当然说，我

们不信上帝，并且我们十分清楚，僧侣、地主和资产阶级都假借上帝的名义说话，为的是谋求他们这些剥削者自身的利益。或者他们不是从道德的要求，不是从上帝的意旨，而是从往往同上帝意旨很相似的唯心主义或半唯心主义论调中引伸出这种道德来的。

我们否定从超人类和超阶级的概念中引出的这一切道德。我们说这是欺骗，这是为了地主和资本家的利益来愚弄工农，禁锢工农的头脑。

我们说，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来的。

旧社会建筑在地主和资本家压迫全体工农的基础上。我们应当摧毁这个社会，应该打倒这些压迫者，为了这个目的就必须团结起来。而上帝是不会创造这种团结的。

只有工厂，只有受过训练的、从过去的沉睡中觉醒过来的无产阶级，才能创造这种团结。只有当这个阶级已经形成的时候，群众运动才开展起来，才造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形，即无产阶级革命在一个极弱的国家中获得了胜利，这个国家三年来抗击了全世界资产阶级对它的进攻。同时我们还看到，无产阶级革命在全世界日益发展。现在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经验来说，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创造一种团结一致的力量，这种力量在引导分散的农民，并且经受住了剥削者的一切进攻。只有这个阶级才能帮助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团结起来，彻底捍卫和巩固共产主义社会，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因此，我们说：在我们看来，超人类社会的道德是没有的；那是一种欺骗。在我们看来，道德是服从于无产阶级阶

级斗争的利益的。

这种阶级斗争究竟是什么呢？这就是推翻沙皇，打倒资本家，消灭资本家阶级。

阶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允许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占有别人的劳动。如果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占有全部土地，那就有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如果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拥有工厂，拥有股票和资本，而另一部分人却在这些工厂里做工，那就有了资本家阶级和无产者阶级。

赶走沙皇并不困难，这总共用了几天的工夫。赶走地主也不很困难，这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赶走资本家同样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是，要消灭阶级就无比困难了；工人和农民的区分仍然存在。如果一个农民单独占用一块土地，拥有余粮，即他本人及其家畜都不需要的粮食，而别人却没有粮食吃，那么这个农民也就变成剥削者了。他剩余的粮食愈多，获利就愈大，至于别人，就让他们挨饿去吧，“他们愈饿，我的粮食就卖得愈贵”。应该使所有的人都按照一个共同的计划和共同的规章，在公共的土地上和公共的工厂中工作。这容易做到吗？你们知道，要做到这一点，决不象赶走沙皇、地主和资本家那样容易。这里需要无产阶级去重新教育和改造一部分农民，把劳动农民争取过来，以便消灭那些富裕的和专靠别人贫困来发财致富的农民的反抗。可见，无产阶级斗争的任务，并没有因为推翻了沙皇、赶走了地主和资本家而宣告结束，我们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正是要来完成这项任务。

阶级斗争还在继续，只是改变了形式。这是无产阶级为

了使旧的剥削者不能卷土重来，使分散的愚昧的农民群众联合起来而进行的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继续，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使一切利益都服从这个斗争。我们也要使我们的共产主义道德服从这个任务。我们说：道德是为摧毁剥削者的旧社会、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创立共产主义者新社会的无产阶级周围服务的。

共产主义道德是为这个斗争服务的道德，它把劳动者团结起来反对一切剥削，反对一切小私有制，因为小私有制把全社会的劳动所创造的成果交给了个人。而在我国，土地已经是公共财产了。

如果我从这个公共财产中拿一块土地来，种出超过我的需要一倍的粮食，然后用余粮来投机倒把，那又怎样呢？如果我这样盘算：饿肚子的人愈多，我出卖粮食的价钱就愈高，那又怎样呢？难道我这是共产主义者的行为吗？绝对不是，这是剥削者的行为，私有者的行为。应该同这种行为作斗争。如果听之任之，那一切都会开倒车，回复到资本家的政权，资产阶级的政权，就象过去一些革命中常有的情形那样。因此，为了不让资本家和资产阶级的政权恢复，就要禁止投机买卖，就要使某些人不能用损人利己的手段来发财致富，就要使劳动者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建设共产主义社会。这也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青年组织基本任务的主要特征。

旧社会依据的原则是：不是你掠夺别人，就是别人掠夺你；不是你给别人做工，就是别人给你做工；你不是奴隶主，就是奴隶。可见，凡是在这个社会里教养出来的人，可以说从吃母亲奶的时候起就接受了这种心理、习惯和观点——不

是奴隶主，就是奴隶，或者是小私有者、小职员、小官吏、知识分子，总之，是一个只关心自己而不顾别人的人。

既然我种我的地，别人的事就与我无关；别人要是挨饿，那更好，我可以抬高价格出卖我的粮食。如果我有了医生、工程师、教员或职员的小职位，那么别人的事也与我无关。也许，只要我讨好、巴结有权势的人，就不仅能保住我的小职位，还可以爬到资产者的地位上去。共产主义者就不能有这种心理和情绪。当工人和农民已经证明我们能本身的力量捍卫自己并且创造新社会的时候，也就开始了新的共产主义的教育，反对剥削者的教育，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利己主义者和小私有者，反对“我赚我的钱，其他一切都与我无关”的心理和习惯的教育。

这就是对青年一代应该怎样学习共产主义的回答。

青年们只有把自己的训练、培养和教育中的每一步骤同无产者和劳动者不断进行的反对剥削者的旧社会的斗争联系起来，才能学习共产主义。当人们向我们讲到道德的时候，我们回答说：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全部道德就在于这种团结一致纪律和反对剥削者的自觉的群众斗争。我们不相信有永恒的道德，并且要揭穿一切关于道德的骗人的鬼话。道德是为人类社会上升到更高的水平，为人类社会摆脱对劳动的剥削服务的。

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有这样的青年一代，他们在有纪律地同资产阶级作殊死斗争中已开始成为自觉的人。在这个斗争中，他们中间一定会培养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们应当使自己的训练、教育和培养中的每一步骤都服从这个斗争，

都同这个斗争联系起来。培养共产主义青年，决不是向他们灌输关于道德的各种美丽动听的言词和准则。我们要培养的并不是这些。当人们看到他们的父母在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下怎样生活的时候，当他们自己分担那些开始同剥削者作斗争的人们所受的痛苦的时候，当他们看到为了继续这一斗争以保卫已经取得的成果，付出了多大的牺牲，看到地主和资本家是多么疯狂的敌人的时候，他们就在这种环境中培养成为共产主义者。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这也就是共产主义培养、教育和训练的基础。这也就是对应该怎样学习共产主义的回答。

训练、培养和教育要是只限于学校以内，而与沸腾的实际生活脱离，那我们是不信赖的。只要工农还受地主和资本家的压迫，只要学校还操纵在地主和资本家手里，青年一代就仍然是愚昧无知的。可是我们的学校应当使青年获得基本知识，使他们自己能够培养共产主义的观点，应该把他们培养成有学识的人。我们的学校应当使人们在学习期间就成为铲除剥削者这一斗争的参加者。共产主义青年团只有把自己的训练、培养和教育中的每一步骤同参加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总斗争联系起来，才符合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一称号。你们很清楚：目前俄国还是唯一的工人共和国，世界其他地区还存在着资产阶级旧制度，我们还比它们弱；我们随时都有遭到新的进攻的危险；只有学会团结一致，我们才能在今后的斗争中获得胜利，而我们得到巩固之后，就会成为真正不可战胜的力量。因此，做一个共产主义者，就要把全体青年都组织和团结起来，要在这个斗争中作出有教养和守纪律

的榜样。那时你们才能着手建设并彻底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大厦。

为了把这一点说得更清楚，我来给你们举个例子。我们把自己叫作共产主义者。什么是共产主义者呢？共产主义者是个拉丁词，communis 一词是“公共”的意思。共产主义社会就意味着土地、工厂都是公共的，实行共同劳动——这就是共产主义。

如果每个人都单独经营一块土地，那劳动能是共同的吗？共同劳动不是一下子就能实行的。这是不可能的事。共同劳动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需要经过艰苦努力和创造，要在斗争进程中才能实行。这里不能靠旧的书本，书本是谁也不会相信的。这里要靠自己的生活经验。当高尔察克从西伯利亚，邓尼金从南方进攻时，农民是站在他们那边的。当时农民不欢迎布尔什维主义，因为布尔什维克按固定价格收购粮食。但是农民在西伯利亚和乌克兰尝到了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政权的滋味之后，就认清了农民没有别的选择余地：或者投奔资本家，那么资本家就要你去给地主当奴隶；或者跟着工人走，虽然工人没有许愿让你过天堂般的生活，而且还要你在艰苦的斗争中遵守铁的纪律并具有坚强的意志，可是他们却能使你摆脱资本家和地主的奴役。甚至是那些愚昧无知的农民，只要根据亲身的经验懂得和认识了这一点，也就成了自觉的、经过艰苦磨炼的共产主义拥护者。共产主义青年团也应当把这种经验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基础。

我已经回答了我们应该学什么，应该从旧学校和旧科学中吸取什么的问题。现在我还想来回答一下应当怎样学习这

些东西的问题。我的回答是：只有把学校活动的每一步骤，把培养、教育和训练的每一步骤，同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我要从某些青年组织的工作经验中举出几个例子，向你们具体说明应该怎样进行这种共产主义教育。大家都在谈论扫除文盲。你们知道，在一个文盲的国家里是不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单靠苏维埃政权颁布一道命令，或者靠党提出一定的口号，或者派一部分优秀的工作人员去进行这项工作，那是不够的。还需要青年一代自己把这个工作担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体现在参加青年团的男女青年自己站出来说：这是我们的事情，我们要联合起来到农村去扫除文盲，使我们这代青年中不再有文盲。我们要努力使青年们能主动积极地从事这个工作。你们知道，要把俄国从一个愚昧的文盲国家很快变成人人识字的国家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青年团能担负起这个工作，如果全体青年都能为大家的利益而工作，那么这个团结着四十万青年男女的组织，就有权称为共产主义青年团了。青年团的任务还在于：除了掌握各种知识，还要帮助那些靠自己的力量摆脱不了文盲愚昧状况的青年。做一个青年团员，就要把自己的工作和精力全部贡献给公共事业。这就是共产主义教育。只有在这样的工作中，青年男女才能培养成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只有当他们在这种工作中取得实际的成绩时，他们才会成为共产主义者。

就拿城郊菜园工作来做例子吧。难道这不是该做的事吗？这也是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之一。人民在挨饿，工人在挨饿。为了不再挨饿，应该发展菜园，但是耕作还在按旧

的方式进行。因此必须让觉悟较高的人来担任这个工作，这样你们就会看到，菜园数目会增加，面积会扩大，效果会更好。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积极参加这个工作。每个青年团组织，每个青年团支部，都必须把这件事看成是自己的事情。

共产主义青年团应当是一支能够支援各种工作、处处都表现出主动性和首创精神的突击队。青年团应当成为这样的一个团体，使每个工人都感觉到，这个团体中人们所讲的学说也许是他不了解的，也许是他还不能一下子就相信的，但是从这些人的实际工作和活动可以看出，他们真正是能给他指明正确道路的人。

如果共产主义青年团不能在各方面这样来安排自己的工作，那就说明它走上了资产阶级的老路。我们的教育应当同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结合起来，以便帮助劳动者完成共产主义学说提出的任务。

青年团员应当利用自己的每一刻空闲时间去改善菜园工作，或在某个工厂里组织青年学习等等。我们要把俄国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一个富裕的国家。因此共产主义青年团必须把自己的教育、训练和培养同工农的劳动结合起来，不要关在自己的学校里，不要只限于阅读共产主义书籍和小册子。只有在与工农的共同劳动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必须使大家都看到，入团的青年个个都是有文化的，同时又都善于劳动。当大家看到，我们已经废除了旧学校里的旧的强迫纪律，代之以自觉的纪律，看到每个青年都去参加星期六义务劳动，看到他们利用每个近郊菜园来帮助居民，那时人民就不会用从前的眼光来看待劳动了。

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任务，是要在农村或自己的街道上帮助做些事情，我举一个小例子，象卫生工作或分配食物的工作。在资本主义旧社会里，这些事情是怎样进行的呢？那时每个人只为自己工作，谁也不注意这里有没有老人或病人；或者全部家务都压在妇女肩上，因而妇女处在受压迫受奴役的地位。谁应当来反对这种现象呢？青年团。青年团应当出来说：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组织青年队经常到各家各户去，协助搞卫生工作或分配食物，正确地调配力量，有组织地为全社会的利益工作，让大家看到，劳动应该是有组织的劳动。

现在五十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指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候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十五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手建设这个社会，因而他们就应当知道，他们终身的全部任务就是建设这个社会。在旧社会中，是各家各户单独劳动，除了压迫老百姓的地主和资本家外，谁也没有组织过劳动。任何一种劳动，不管它怎样脏，怎样吃力，我们都应当把它组织起来，使每个工人和农民对自己都有这样的认识：我是自由劳动大军的一分子，不需要地主和资本家，我自己就会建设自己的生活，建立共产主义的秩序。共产主义青年团要使大家从小^①就在自觉的有纪律的劳动中受教育。这样我们才有希望完成现在所提出的任务。我们应该估计到，要全国实现电气化，使我国贫瘠化了的土地能采用最新的技术来经营，至少要花10年工夫。

① 1920年10月7日的《真理报》第223号上刊印的不是“从小”，而是“从十二岁起”。——编者注

因此，现在是十五岁、再过十至二十年就会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里的这一代人，应当这样安排自己的全部学习任务：在每个乡村和城市里，青年每天都能实际完成共同劳动中的某种任务，哪怕是最微小、最平常的任务。能否保证共产主义建设成功，就要看这个工作在每个乡村里进行得怎样，就要看共产主义竞赛开展得怎样，就要看青年组织自己的劳动本领怎样。只有根据共产主义建设的业绩来检查自己的每一步骤，只有经常问问自己：为了成为团结一致的自觉的劳动者，我们是否做到了所要做的一切——只有这样，共产主义青年团才能把自己的五十万团员联合成一支劳动大军并且赢得普遍的尊敬。（掌声雷动）

载于1920年10月5、
6和7日《真理报》第
221、222和223号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并根据
1920年尼·列宁《青年的
任务》小册子原文校订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5
版第41卷第298—318页

注 释

- 1 列宁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最初发表于1920年10月5、6、7日《真理报》第221、222、223号，当年用《青年团的任务（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为书名印成小册子出版。讲话的这一最早的单行本经列宁审阅过，是政治教育总委员会丛书第1种。这个版本印了20万册，仍不能满足需求，因而出现了一些打字本和手抄本。此后，各出版社曾用《学什么和怎样学》、《共青团员

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伊里奇的遗训》、《伊里奇对青年的遗训》、《青年的任务》、《青年怎样学习共产主义》、《论共产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等书名多次重印这个讲话。1930年，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了《青年团的任务》出版十周年纪念版，这个版本的注释经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审阅过。在《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中，这个讲话是按1920年出版的单行本刊印的，删去了小册子编者所加的小标题。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20年10月2—10日在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举行。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约有600名代表。大会议程如下：共和国的军事和经济形势；青年共产国际；俄国共青团中央的工作报告；青年的社会主义教育；民兵和青年体育；团纲；团章；选举俄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列宁于10月2日晚在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并回答了与会代表提出的许多问题。在回答共青团和俄共（布）之间应该是什么关系这一问题时，列宁指出，共青团如果真正愿意成为共产主义的青年团，就应该在党的领导下工作，遵循党的总的指示。列宁强调共青团的活动应成为正在成长的一代青年的楷模。列宁说，共产主义社会是在反对一切剥削者的斗争中形成的。“这是长期的事业，它要求组织、学习、培养。”根据列宁的指示，共青团第三次代表大会强调指出：“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是对劳动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在这一教育中要把理论教育与积极参加劳动群众的生活、工作、斗争和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 2 指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代表人物。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是苏联早期的群众性文化组织，十月革命前夕在彼得格勒成立。十月革命后在国内各地成立分会。各地协会最多时达1381个，会员40多万。参加协会的有真诚希望帮助苏维埃国家文化建设的青年工人。但是协会的 leadership 为亚·亚·波格丹诺夫及其拥护者所把持。他们在十月革命后仍继续坚持协会的“独立性”，从而把它置于同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相对立的地位。他们否认以往的文化遗产的意义，力图摆脱群众性文教工作的任务，而企图通过脱离实际生活的“实验室的道路”来创造“纯粹无产阶级的”文化。波格丹诺夫口头上承认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鼓吹马赫主义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见本卷第331—333页）等著作中批判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于20年代初趋于衰落，1932年停止活动。

斯大林 悼列宁

(1924年1月26日在全苏苏维埃
第二次代表大会¹上的演说)

同志们！我们共产党人是具有特种性格的人，我们是由特殊材料制成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军队，列宁同志的军队就是由我们这些人组成的。在这个军队里做一个战士，是再光荣不过的了。以列宁同志为创始人和领导者的这个党的党员称号，是再高尚不过的了。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做这个党的党员。并不是任何人都能经得住这个党的党员所必须经历的种种苦难和风暴。工人阶级的儿女，在贫困和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儿女，在千辛万苦和英勇奋斗中成长起来的儿女，——首先就是这些人应当成为这个党的党员。正因为如此，列宁主义者的党，共产主义者的党，同时也叫做工人阶级的党。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伟大称号的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二十五年来列宁同志培养了我们党，把我们党培养成为

世界上最坚固最有锻炼的工人党。沙皇政府及其走狗的打击，资产阶级和地主的疯狂暴行，高尔察克和邓尼金的武装袭击，英国和法国的武装干涉，一切资产阶级报刊异口同声的造谣和诬蔑，——二十五年来所有这一切恶毒的攻击都落在我们党的头上。可是，我们党象一座石山一样屹立着，打退了敌人无数次的攻击，引导工人阶级向胜利前进。我们党在残酷的战斗中锻炼了自己队伍的统一和团结。它依靠统一和团结战胜了工人阶级的敌人。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我们党的统一，如同保护眼珠一样。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工人阶级的命运痛苦不堪。劳动者备受折磨和苦难。奴隶和奴隶主，农奴和农奴主，农民和地主，工人和资本家，被压迫者和压迫者，——自古以来世界就是这样构成的，而且现在绝大多数国家都还是这样的。千百年来，劳动者数十次数百次地企图推翻压迫者，使自己成为自己生活的主宰。但是他们每一次都遭到失败，受到侮辱不得不退却，不得不把委屈和耻辱、愤怒和绝望埋在心里，仰望茫茫的苍天，希望在那里找到救星。奴隶制的枷锁依然如故，或者旧枷锁只是被一些同样沉重同样侮辱人的新枷锁所代替。只有在我们国家里，被压迫被践踏的劳动群众才推翻了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建立了工人和农民的统一。同志们，你们知道，而且现在全世界都承认，这个伟大的斗争是由列宁同志和他的党领导的。列宁的伟大首先就在于他创立了苏维埃共和国，从

而在事实上向全世界被压迫群众表明了：得救的希望并没有丧失；地主和资本家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劳动王国是可以靠劳动者自身的努力来建立的；劳动王国是应该建立在地上，而不应该建立在天上的。这样，他就激发了全世界工农争取解放的热望。这也就说明为什么列宁的名字成了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最爱慕的名字。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不遗余力来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我国无产阶级专政是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的。这是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一个和根本的基石。工人和农民不结成这样的联盟就不能战胜资本家和地主。工人没有农民的支持就不能打倒资本家。农民没有工人的领导就不能打倒地主。我国国内战争的全部历史说明了这一点。可是巩固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还远没有结束，它只是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从前工农联盟具有军事联盟的形式，因为它是以反对高尔察克和邓尼金为目标的。现在工农联盟应当采取城市和乡村间、工人和农民间经济合作的形式，因为它是以反对商人和富农为目标的，因为它是以工人和农民互相供给一切必需品为目标的。你们知道，没有一个人象列宁同志那样坚决地执行过这个任务。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竭力巩固工农联盟。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我国各民族劳动者的联盟是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基石。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巴什基里亚人和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和阿捷尔拜疆人，阿尔明尼亚人和达格斯坦人，鞑靼人和吉尔吉斯人，乌兹别克人和土尔克明尼亚人，他们都同样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休戚相关。不仅无产阶级专政使这些民族摆脱枷锁和压迫，而且这些民族也以他们对苏维埃共和国的无限忠诚，以他们为苏维埃共和国牺牲的决心来使我们苏维埃共和国免遭工人阶级的敌人的暗算和袭击。正因为如此，列宁同志始终不倦地对我们说明我国各族人民自愿联盟的必要性，说明我国各族人民在共和国联盟内实行兄弟合作的必要性。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巩固并扩大共和国联盟。列宁同志，我们常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我们的红军我们的红海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三个基石。列宁曾屡次对我们说过，我们从资本主义国家那里争得的喘息时机可能是很短的。列宁曾屡次向我们指出，巩固红军和改善红军状况是我们党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和寇松最后通牒以及和德国危机²有关的事变再一次证实了列宁向来是正确的。同志们，我们来宣誓：我们一定不遗余力地来巩固我们的红军，巩固我们的红海军！

处在资产阶级国家汪洋大海包围中的我国象一座巨大的石山一样屹立着。波浪一个接着一个地向它冲击，声势汹汹地要把它淹没，把它冲毁。但是这座石山仍然屹立不动。我

国为什么这样有力量呢？这不仅因为我国建立在工农联盟上，它体现着各自由民族的联盟，它受到红军和红海军的强有力的保护。我国所以有力量，所以坚强巩固，还因为它得到全世界工人和农民深刻的同情和坚决的支持。全世界工人和农民都想保全苏维埃共和国，认为这是列宁同志用他百发百中的妙手射入敌人阵营的一枝箭，是他们希望摆脱压迫和剥削的靠山，是给他们指出解放道路的可以信赖的灯塔。他们想保全苏维埃共和国，不让地主和资本家破坏它。我们的力量就在这里。世界各国劳动者的力量就在这里。全世界资产阶级的软弱也在这里。

列宁从来没有把苏维埃共和国看做最终目的。他始终把它的看做加强西方和东方各国革命运动的必要环节，看做促进全世界劳动者战胜资本的必要环节。列宁知道，不仅从国际的观点来看，而且从保全苏维埃共和国本身的观点来看，只有这样的见解才是正确的。列宁知道，只有用这样的方法，才能鼓舞全世界劳动者去进行争取解放的坚决战斗。正因为如此，列宁这位无产阶级英明的领袖中最英明的领袖，还在无产阶级专政成立的第二天，就奠定了工人国际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列宁始终不倦地扩大并巩固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

这几天你们已经看见有几万几十万劳动者来拜谒列宁同志的灵柩。过一些时候你们会看见有几百万劳动者的代表们来拜谒列宁同志的陵墓。用不着怀疑，在几百万劳动者的代表们后面，一定会有全世界各地几千万、几万万劳动者的代表们接踵而至，以证实列宁不仅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领袖，不

仅是欧洲工人的领袖，不仅是殖民地东方的领袖，而且是全球整个劳动世界的领袖。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忠实于共产国际的原则。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人我们一定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

载于 1924 年 1 月 30 日
《真理报》第 23 号

选自《斯大林全集》第 6
卷第 42-46 页

注 释

- 1 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 1924 年 1 月 26 日—2 月 2 日在莫斯科举行。约·维·斯大林在代表大会为追悼弗·伊·列宁而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发表了演说，在演说中代表布尔什维克党做了遵守和执行列宁遗训的伟大宣誓。代表大会为列宁逝世而通过了《告劳动人民书》。代表大会为永久纪念列宁做出下列决定：出版《列宁全集》，将彼得格勒城改名为列宁格勒城，规定悼念日，在莫斯科红场建造列宁墓，在各加盟共和国首都以及在列宁格勒和塔什干城内建立列宁纪念像。代表大会讨论了苏联政府的工作报告、苏联预算问题和设立中央农业银行问题。1 月 31 日，代表大会批准了在约·维·斯大林领导下拟定的第一部苏联宪法（根本法）。代表大会选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联盟院和民族院。约·维·斯大林被选为联盟院委员。
- 2 指 1923 年德国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当时德国国内展开了群众革命运动，结果在萨克森和绍林吉亚成立了工人政府，在汉堡发生了武装起义，德国革命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在整个欧洲猖獗起来，对苏维埃共和国进行新干涉的危险也增大了。

马列著作选读
战士读本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

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零一工厂印刷

*

开本:787X1092 毫米 1/64 · 印张 15⁵/₁₆ 字数 430,000

1977 年 11 月第 1 版(北京)

197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毛泽东博览 网站制作
www.mzdbl.cn